



2 023 8916 5

# 托洛茨基 反动言論摘录

上

(供内部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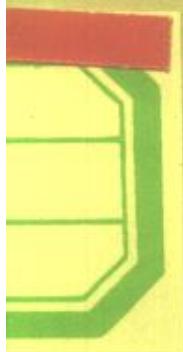


2 023 8921 8

# 托洛茨基 反动言論摘录

下

(供内部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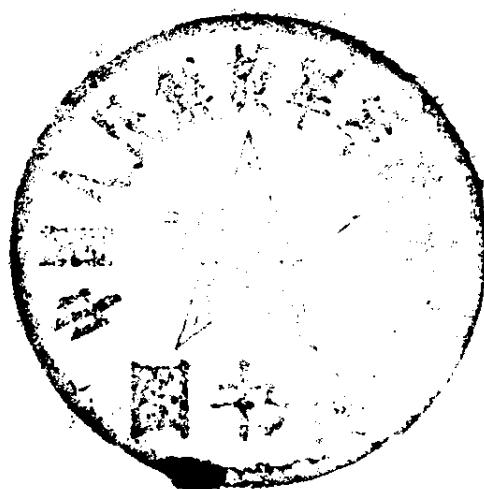
## 編者說明

本书分十五个专题，摘录托洛茨基的有关言论。各专题是作为独立的材料编选的，因此部分材料难免重复。

各专题内的材料，按内容分类编排；各章节内的材料，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内容提要基本上采用托洛茨基的原话，某些地方作了改写。为便于阅读，正文中较重要的地方用黑体排印，原有的着重号一律用黑点标出。

托洛茨基的许多反动言论往往利用一些革命词句作伪装，如果不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托洛茨基反动集团的整个言论、活动而孤立起来看待，很容易鱼目混珠。由于本书的体例和性质，不能在书中把这些情况一一指出，希望读者在使用时注意。

编者水平不高，时间仓促，从选材到编排，错误在所不免，希读者批评指正。



# 目 录

## (一) 关于“不断革命論”

一、 妄談“不断革命論”的基本內容 .....	1
二、 主張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完成 .....	12
三、 鼓吹革命在一國胜利后立即向邻国扩展并使世界 革命化 .....	38

## (二) 关于“世界革命”

一、 认為我們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	47
二、 鼓吹革命在一國胜利后立即向国际舞台扩展 .....	53
三、 說我們的直接責任是用武装力量帮助其他国家 革命 .....	62
四、 宣传“欧洲联邦”是我們这个时代的口号 .....	73

## (三) 关于一国建設社会主义

一、 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由来、錯誤和目的 .....	82
二、 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 .....	89
三、 关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規律 .....	94
四、 关于国际分工 .....	100

五、世界社会主义經濟	121
六、西方革命和一国社会主义	130

#### (四)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

一、鼓吹废除民族国家	136
二、否认有反帝正义战争	140
三、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革命性	143
四、混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	145
五、鼓吹“欧洲联邦”，取消民族自决	149

#### (五) 关于“欧洲中心論”

一、断言革命中心在西方	153
二、宣称只有“欧洲革命”才能拯救俄国	155
三、鼓吹“欧洲联邦”是“革命时代的口号”	163

#### (六) 关于战争与和平

一、战争的根源	167
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反战策略	169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169
2. 反战策略	171
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战策略	182
1. 战争的性质和起因	182
2. 反战策略	186
四、关于反苏战争	190
1. 反苏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190
2. 保卫苏联的策略	191

<b>五、关于保卫和平的道路</b>	197
1. 裁軍問題	197
2. 国际联盟、集体安全和仲裁法庭	203
3. 人民陣線	206
4. 国际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	209
<b>六、战争与革命</b>	212

### (七) 关于布列斯特和談

<b>一、鼓吹不战不和同时复員军队的机会主义路線</b>	218
<b>二、变相拥护“革命战争”</b>	225
<b>三、攻击贊成簽訂和約是投降情緒的表現</b>	231
<b>四、依賴欧洲革命</b>	237

### (八) 工业化問題

<b>一、工农业的关系</b>	242
<b>二、工业的发展速度</b>	250
1.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	250
2. 一九二八年以后	255
<b>三、資金的来源</b>	258
<b>四、工业化和苏联經濟对世界經濟的依賴</b>	269
<b>五、国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b>	274

### (九) 农业集体化問題

<b>一、胡說农业集体化取决于工业提供机器的能力</b>	279
<b>二、污蔑全盘集体化使苏联充滿了毁灭的气息</b>	282
<b>三、断言集体农庄不是社会主义企业</b>	286

## (十) 关于苏联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一、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	295
1. 說“誰战胜誰”的問題要在长期阶级斗争中解决 .....	295
2. 談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期間的基本阶级 .....	296
3. 断言新的阶级分化不断出現 .....	300
二、工人 .....	310
1. 宣传应当不断改善工人的生活 .....	310
2. 造謠工人生活水平显著下降 .....	310
3. 声称无产阶级内部分化，出現工人貴族 .....	314
三、农民 .....	318
1. 說农村在进行着日益尖銳的阶级斗争 .....	318
2. 指責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在农民問題上修正列宁主义 .....	320
3. 宣传农民的阶级分化 .....	330
4. 攻击官僚为爭权夺利而进行反富农斗争 .....	335
5. 妄談党应当采取的政策 .....	338
6. 断言全盘集体化沒有消灭富农，反而培植了“資產阶级 集体农庄” .....	346
四、新資產阶级 .....	353
五、官僚阶层 .....	359

## (十一) 关于苏联国家的性质

一、污蔑当时苏联的社会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制度 .....	360
二、說超过限度的“資產阶级的分配标准”摧毁国有制 和集体农庄所有制 .....	368
三、攻击当时苏联已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向資產阶级 政制 .....	373

## (十二) 关于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 “官僚化”和“蜕化变质”

一、說世界革命不取得胜利，就会出現資本主义复辟 .....	381
二、說当时苏联出現了五六百万人的官僚阶层，他們 独占了文明的新老成果 .....	389
三、认为官僚統治的基础是缺乏消費品 .....	400
四、攻击斯达汉諾夫运动培植了工人貴族，集体化建 立了一批資产阶级集体农庄 .....	405
五、斷言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和平溶入世界資本主义 体系；資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现复辟 .....	410
六、声称党的执行机关之代替党、領導干部和全体党 員的对立将使党和老干部蜕化变质 .....	424

## (十三) 关于工会国家化

一、声称經濟机构和工会并存不是“工人国家的原則” .....	433
二、鼓吹工会国家化，由工会来管理生产.....	436
三、詭称工会国家化不是工团主义 .....	446

## (十四) 关于党内派別斗争

一、妄談派別斗争的必然性 .....	447
1. 說派別斗争是社会矛盾的反映，声称真正的革命組織 不可能沒有暫时的派別組織.....	447
2. 声称官僚主义是派別活动的主要来源之一.....	454
二、妄談对待派別活动的办法 .....	459
1. 攻击禁止反对派是非常时期的临时不得已的坏做法.....	459

2. 妄談聯共黨內幾種消除派別活動的正確方法.....	465
3. 攻擊斯大林的方法是扼殺反對派，進行人身攻擊以至 肉体消滅.....	467

## (十五) 对列宁和斯大林的攻击

<b>一、对列宁的攻击 .....</b>	<b>473</b>
<b>二、对斯大林的攻击 .....</b>	<b>475</b>
1. 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475
2. 攻击所謂斯大林主义.....	484
3. 叫嚷反对对斯大林的“神化”.....	493
4. 历数斯大林的“錯誤”.....	499
(1)起初是孟什維克，一九〇六年属分地派.....	499
(2)在反动年代是調和派分子.....	503
(3)二月革命后有考茨基主义倾向，十月革命前夕暗 中反对起义.....	507
(4)在布列斯特和平谈判时主张只談判而不簽訂和約.....	515
(5)在国内战争中违抗軍令，是軍事反対派的首腦.....	517
(6)在民族問題上犯过許多錯誤.....	520
(7)和列寧的关系.....	524
(8)全盤集体化使用粗暴、冒险的方法，使苏联充滿 了毁灭的气息.....	532
(9)暗害和处死了大批領導人.....	534

## (一) 关于“不断革命論”

### 一、妄談“不断革命論”的基本內容

声称“不断革命論”有两个基本論点：（一）尽管俄国在历史上是落后的，但是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先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二）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所碰到的矛盾，只能“在世界革命的战场上找到出路”。

說“不断革命”包含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一）民主革命必須立即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二）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是不断的，“即在国内引起內战，在国外引起革命战争”；（三）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性的，一国的革命只是“国际鏈条中的一个环节”，而“国际革命是个不断的过程”。

至于說到“不断革命論”，我认为沒有理由要擯弃我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和一九〇六年以及后来就这个主題所写的一切。在今天看来，我仍坚决认为在当时我所發揮的思想，整个說来要比当时許多布尔什維克同志所写的更加接近列宁主义的真諦。

“不断革命”这个术语是馬克思对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所用的一个术语。在馬克思主义文献中——当然不是在那些修正主义的馬克思主义文献而是在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文献中——，这个术语是

被公认的。弗兰茨·梅林曾用这个术语来说明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革命。“不断革命”这个术语忠实地翻译出来也可以译为“永久革命”或“不间断的革命”。这个术语所包括的政治概念究竟是什么呢？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在已经取得这一个或那一个政治成就之后，在实现了这种或那种社会改革之后，革命并不就此完结，它仍旧继续向前发展，而它的唯一界限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革命一旦开始（既然我们参与其间，特别是当我们在领导革命的时候），不论在哪一个形式阶段上，我们都决不能使它中断。反过来讲，只要革命运动的所有潜力和所有资源尚未耗尽，当然我们就要根据情况继续不断地坚持把革命推向前进去。这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内的革命胜利，同时也适用于革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

对俄国来说，这个理论意味着：我们需要作为政治上最高成就的并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也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而是受到农民支持并开辟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工人政府。<sup>①</sup>

可见，不断革命这个概念是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战略方针完全符合的。如果说在十八年或者十五年前看不到这一点，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当这个总的公式已经得到实际历史过程证实的今天，再不理解和不认识这一点那是不可能的了。

任何人也不可能在我当时的著述中发现丝毫想要越过农民的意图。不断革命的理论直接导致了列宁主义，特别是导致了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提纲。

可是大家知道，预先决定我党在十月革命整个时期政策的这个提纲，在那些今天一提起“不断革命论”就吓得有如见到鬼神似

<sup>①</sup> 参看列·托洛茨基著《总结与展望》，俄文版。——托洛茨基注

的很大一部分人当中却引起了混乱。

摘譯自《对农民的“估計不足”》(1923年年底)，  
載于《新方針》伦敦 1956 年版第 52—54 頁。

不断革命論有两个基本論点。第一，尽管俄国在历史上是落后的，通过革命可以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取得政权以前就把政权轉移到俄国无产阶级的手里去。其次，一个被无数資本主义敌人包围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将碰到的那些矛盾，将在世界革命的戰場上找到出路。第一个論点是以对发展不平衡的規律的正确理解作为基础的。第二个論点則依靠对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經濟政治紐帶的不可分割性具有正确的理解。布哈林說得对，甚至今天我仍然坚持不断革命論的这两个基本論点。今天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坚持这些論点。因为，依我看來，它們已經完全得到证实：从理論上得到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的证实；在实践中得到十月革命的經驗的证实。

摘譯自《列寧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 年)，  
紐約 1936 年版第 40 頁。

不断革命，从馬克思賦予这个概念的意义來說，意味着一种同阶级統治的任何形式都不妥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停留在民主主义阶段，而要进一步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并进行反对外国反动勢力的战争，这就是說，这种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前一阶段相銜接，它只有在阶级社会完全消灭的时候才能够結束。

为了澄清围绕着不断革命論所产生的各种混乱思想，必須弄清楚这一理論中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

第一，就是关于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这一点实质上是这个理論的历史根源。

不断革命的概念是十九世紀中叶的伟大共产主义者馬克思和他的信徒們提出来同民主主义思想相对立的，大家知道，民主主义

思想所主张的是，“合理的”或民主的国家建立以后一切問題都可以通过改良主义的或进化的措施和平地加以解决。馬克思曾經把一八四八年的資產階級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馬克思“犯了一个錯誤”。不过他的錯誤是事實上的，而不是方法論上的錯誤。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沒有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也正是为什么它沒有获得民主制的原因。至于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它并不是完成了民主任务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是被社会民主党人扼杀了的无产阶级革命；更确切些說，这是一种在战胜无产阶级以后被迫保持假民主形式的資產階級反革命。

庸俗的“馬克思主义”設計出一套历史发展图式，按照这种图式，每个資產階級社会迟早要建立民主制度；有了民主制度以后，无产阶级就会在民主的条件下为社会主义而逐渐組織起来并受到教育。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际情况，有許多不同的設想：自称的改良主义者設想这种过渡就是用改良的办法以社会主义的內容来充实民主制（如饒勒斯）。正式的革命家則承认，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必須使用革命的暴力（如蓋得）。但是这两种人都认为，对于一切民族和国家說来，民主和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阶段，由于在时间上彼此相距很远，这两个阶段不仅完全不同，而且是彼此割裂的。在那些一九〇五年时期属于第二国际左翼的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当中，这种观点也占支配地位。俄国馬克思主义的杰出先驅者普列汉諾夫认为，在当代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一种空想。为这种观点辯护的，不仅有孟什維克，而且还包括絕大多数布尔什維克领导人，特別是現在党的领导人。当时他們毫无例外地都是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不过在他們看来，不仅在一九〇五年，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前夜，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仍然是遙远的未来的音調不清的音乐。

在一九〇五年重新提出的不斷革命論，向这些思想情緒宣了

战。这个理論指出，在我們这个时代，落后資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可以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这就是这个理論的中心思想。传统的观点认为，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民主制时期；不断革命論則肯定，落后国家通向民主制的道路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民主制不是在数十年之内停滞不前的制度，而只不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两者由一条牢不可破的鏈条互相联結在一起。因此，在民主革命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間就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断性。

“不断”論的第二个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断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在不能确定的长时期內和經常不断的内部斗争中得到改造的。社会繼續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性质。改造的每个阶段都直接从前一个阶段产生出来。这个过程必然带有政治性质，就是說，它是通过改造中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集团之間的冲突来发展的。**國內战争和对外战争的爆发是同“和平”改革时期相互更替的。**經濟、技术、科学、家庭、道德和日常生活等方面革命，是在錯綜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发展的，它不让社会达到平衡状态。这就是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

不断革命論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这一点是从人类的經濟和社会结构的現状中产生的。国际主义决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世界經濟的性质、生产力的世界性发展、阶级斗争的世界規模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的——但是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在民族范围内維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状态——尽管象苏联經濟所表明的，是一种长时期的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各种国内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繼續处于孤立状态，那末，无产阶级国家最后就必然成为这些

矛盾的牺牲品。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从这个观点来看，民族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尽管它有暂时的衰退和低潮。

不肖徒輩<sup>①</sup> 反对——尽管并不总是同样明确地反对——不断革命論的所有这三个方面。既然这个問題是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地連結在一起的三个部分，那末事情又怎么能够不是这样呢？不肖徒輩机械地把民主专政同社会主义专政割裂开来。他們把民族的社会主义革命同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割裂开来。他們认为，从本质上說，在民族范围内取得政权不是革命行动的开始，而是革命行动的終結；随后就是走向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时期。在一九〇五年，他們甚至不承认俄国无产阶级可以先于西欧取得政权的思想。在一九一七年，他們鼓吹在俄国进行独立自在的民主革命而拒絕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他們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要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方針。后来，他們給中国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来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相对立。他們宣称在苏联有可能建設孤立无援的和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他们說来，世界革命已經不是胜利的必要前提，而只不过是一种有利的环境而已。不肖徒輩就这样在反对不断革命論的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大大背离了馬克思主义。

这种从人为地复活历史的回忆和歪曲久远的过去而开始的斗争，使得革命领导阶层的世界观完全改变了。我們已經一再說明，对于价值的这种重新估計，是在苏联官僚集团的社会需要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个集团已經变得空前保守，它拚命維持国家的秩序，并要求現在应当把已經實現的革命——这次革命保证了这个

---

① 这是托洛茨基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污蔑性称呼。——編者注

集團享有特權地位——看成是适合于和平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我們不想在这里再来談論这个課題。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官僚深刻地意識到，它在物质上和思想意識上的地位是同民族社会主义理論有联系的。这一点現在表現得非常明显，尽管有这样的事實，或者不如說是由于有这样的事實，即斯大林主义的政府机器在它沒有預見到的矛盾的压力之下，現在正在拚命向左轉，正在狠狠地打击昨天的右派鼓動家。那些官僚分子虽然急急忙忙借用了馬克思主義反对派的口号和論据，但是大家知道，他們对反对派的敌对态度絲毫沒有改变。当反对派成員为了支持工业化方針等而提出恢复党籍的問題时，就被要求首先譴責不断革命論，并且承认——即使只是間接地——一国社会主义理論。通过这一点，斯大林主义官僚表明，它在保持民族改良主义战略基础的同时向左轉这种做法，純粹是策略性质的。这意味着什么，用不着多加解釋；在政治上如同在軍事上一样，归根到底策略是从属于战略的。

問題早已超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具体范围。这个問題逐漸扩大，今天实际上已經涉及到革命世界观的一切問題。是不断革命还是一国社会主义？——这个抉择同时涉及到苏联的國內問題和东方革命的前途，最后，还涉及到整个共产国际的命运。

摘譯自《不断革命》(1929年)，  
伦敦1962年版第6—11頁。

我希望，讀者不会反对我在結束这本书的时候，不嫌重复，試把我的基本結論簡單明了地表述出来。

一、不斷革命論現在要求每个馬克思主义者給予最大的重視，因为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进程終於把这个問題从回忆俄国馬克思主义者旧意見分歧的領域中充分地提出来了，并且使它变成一个关于一般世界革命的性质、內在联系和方法的問題。

二、对于资产阶级发展較迟的国家，特別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國家說來，不斷革命論意味著，要彻底地真正解决它們的民主和民族解放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民族的领导者、首先是作为它的农民群众的领导者——的专政才有可能。**

三、在民主革命中，不仅土地問題而且民族問題都給落后国家中占人口絕大多数的农民安排了一个特殊地位。沒有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可能解决，甚至不可能认真地提出。但是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只有通过同民族自由資产阶级的影响进行不可調和的斗争才能实现。

四、不管个别国家中革命的最初插曲性阶段的情况如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只有在組織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就是說，民主革命，只有通过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并且首先解决民主革命的所有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五、从历史的角度来估价，布尔什維主义的旧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确切地表达了上面所說的那种无产阶级、农民和自由資产阶级之間的关系。这已經为十月的經驗所证实。但是列寧的旧公式并沒有預先解决在革命联盟內部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間的相互关系問題。換句話說，这个公式有意保留了某种代数学的性质，这种性质就是要在历史經驗的过程中演算出比較确切的算术数字。然而，历史經驗表明，而且在不可能作任何歪曲解釋的情况下表明，农民所担任的革命角色无论多么伟大，它决不能担任独立的角色，更不用說担任领导的角色。农民不是跟着工人走，便是跟着資产阶级走。这就是說，“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只有作为领导着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才是可以設想的。

六、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就其阶级內容來說，是与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的一种制度，它只有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这个党要能够代表农民的利益和总的來說也

能够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要能够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程度的援助下夺取政权，并且要能够决定自己的革命纲领。整个现代史表明，特别是最近二十五年的俄国经验表明，在建立农民政党的道路上，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就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内部分化，由于这种原因，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上层分子在一切决定性的关头，尤其是在战争和革命中，总是跟着大资产阶级走，下层分子跟着无产阶级走，中层分子则不得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在克伦斯基政权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在国民党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阶段，即没有工农民主专政。

七、共产国际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个口号强加于东方国家的企图，早已为历史彻底粉碎，这种企图只能起反动的作用。只要这个口号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对立，它在政治上就会促使无产阶级溶解于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这样就会为民族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因而也会为民主革命遭到失败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在共产国际纲领中采用这个口号，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十月传统。

八、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了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同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有密切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

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完成，而是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展开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上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革命战争，这里就包含着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性质，不论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昨天才完成民主革命的落后国家，还是一个在民主革命后经历了漫长的民主制与议会制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国家。

十、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不再能同民族国家的界限协调一致。因此，一方面产生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就产生一种资产阶级的欧洲联邦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一种在更新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只有当新社会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获得最后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

十一、上面关于世界革命发展的简要论述，一笔勾销了现在的共产国际纲领迂腐死板地把国家划分为社会主义“已经成熟”或“尚未成熟”的问题。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建立了世界市场，创造了世界的分工和生产力，整个来说它也就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世界经济。

不同的国家都将以不同的速度经历这个过程。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

一个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它的无产阶级没有作好联合农民和夺取政权的充分准备，就不能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反之，在一个无产阶级由于进行了民主革命而掌握了政权的国家，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归根到底不仅取决于民族的生产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十二、从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势力方面发酵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坚决、彻底反对不断革命论的独一无二的理论。

不肖徒輩由于受到我们的严厉批判，便想借口俄国的特点（地大物博）而把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范围只限于俄国，这种企图是徒劳无益的，只能弄巧成拙。背离国际主义立场，就必然要走向民族救世主义，即认为本国具有一些特殊的优越性和特点硬说这

些优越性和特点使它能担任别的国家所不能担任的角色。

世界性的分工，苏联工业对于外国技术的依赖，欧洲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对亚洲原料的依赖等等，使得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建設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不可能的事。

十三、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理論同俄国革命的全部經驗背道而驰，它不仅机械地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而且把民族革命同国际革命割裂开来。

这种理論向落后国家的革命提出建立一种根本不能实现的民主专政制度的任务，同时又把这种制度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样，这种理論就把幻想和虚构带到政治中来，麻痹东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妨碍殖民地革命的胜利。

从不肖徒輩的理論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夺取到政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完成（按照斯大林的公式，完成了“十分之九”）和国家改造时期的开始。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論和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的理論，都必然是同一国社会主义理論分不开的。它们是息息相关的。

按照一国社会主义理論，共产国际已被贬低为一种只对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有用处的辅助性武器。共产国际目前的政策、制度及其领导人物的选择，是同共产国际被降低为不是要解决独立任务的辅助性机关这种角色完全适应的。

十四、布哈林所写的共产国际綱領，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的綱領。它妄图把一国社会主义理論同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而这种国际主义同世界革命的不断性是不可分割的）調和起来。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为了使共产国际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建立健全的制度而进行的斗争，是同爭取制訂馬克思主义綱領的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关于綱領的問題又是同关于不断革命論和一国社会主义論这两种互不相容的理論的問題分不开的。不断革

命的問題，早已不是列寧同托洛茨基之間的插曲性的意見分歧，這些分歧已經由歷史徹底解決了。現在的鬥爭是馬克思和列寧的基本思想同中派的折衷主义思想之間的鬥爭。

同上，第 152—157 頁。

依照其直接任務說，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但是俄國資產階級是反對革命的，所以革命的勝利只有成為無產階級的勝利才有可能。但是勝利的無產階級將不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政綱上，它將走到社會主義的政綱上去。俄國革命將成為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之第一階段。

這即是在一九〇五年為我所提出的不斷革命的理論，此後即在“托洛茨基主義”名義下遭到人們最严厉的批評。

更精确些說，这只是這一理論的一部分，其特別適用於現在時機的另一部分是：

現在的生產力早已發展得超過了國家的界限。社會主義社會在國家的界限內是不能建立的。無論一個孤立的工人國家的經濟成績如何大，“一國社會主義”的綱領也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只有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歐洲聯邦，以後是世界的聯邦，才是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園地。

摘自《十月革命之歷史意義》（1932年11月27日），載于《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新生命書局1933年版第22—23頁。

## 二、主張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一次完成

1. 說資產階級是反動的。斷言“無論什么地方，無產階級一作為獨立力量出現，資產階級就要轉入反革命營垒去”。

认为俄国“缺乏革命民主派”，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东方无法形成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的手工业工人是个“愚昧的”、“凶狠的阶级”。

宣传农民“不能起独立的作用”，它的革命作用日益缩小。硬说它从来也不是社会主义同盟军，“工业无产阶级只能在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中找到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声称“农民必须在物质上或精神上不再成为农民，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在一九二四年以前，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没有一个人曾把农民看作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

说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它注定要在民主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资产阶级将把一切革命阵地交给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者阶级来解放农民”。

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首先应当为自己提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问题：它可以依靠哪些阶层或阶级呢？

**大资产阶级谈不上是革命的力量，这是我们都同意的。**某些里昂工业家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也起了反革命的作用，这是在最广泛意义上的民族革命。但是有人对我们说，中等、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但这小资产阶级是什么呢？

雅各宾派依靠从手工业行会中成长起来的城市民主派。小工匠、帮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小市民组成了革命的长裤汉大军，领导政党山岳党的支柱。正是这经历过长期的行会手工业的历史学校的密集的城市居民群众承担了革命变革的全部重担。革命的客观后果是创立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正常”条件。但是历史过程的社会

结构造就了这种情况，即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是由平民、街头民主派、长裤汉创造的。他们的恐怖专政为资产阶级社会清除了旧的垃圾，然后资产阶级推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专政进行统治。

.....

不错，我们有大量的革命农民群众。但是孟什维克同志知道得不比我差，农民，不管它如何革命，不能起独立的作用，尤其是起政治领导作用。农民无疑可以以其巨大的力量为革命服务；但是如果认为庄稼汉的政党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变革，并能主动地把国家的生产力从古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那就不配称作马克思主义者。城市——现代社会的领导者，也只有它才有能力扮演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的角色。而我们的有能力领导民族的城市民主派在哪儿呢？

马尔丁诺夫同志已经不止一次地拿着放大镜来寻找它了。他找到了萨拉托夫的教师、彼得堡的律师和莫斯科的统计学家！他以及他的所有同道们只是不愿看到，在俄国革命中工业无产阶级已占领了十八世纪末长裤汉的手工业半无产阶级民主派的地盘。同志们，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一根本事实。

我们的大工业不是从手工业中自然成长起来的。我们城市的经济史完全不知有行会时期。我们的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欧洲资本的直接逼迫下产生的。它实质上占据了原始的处女地，而没有遇到手工业文化的反抗。外国资本通过国债的渠道和私人倡导的孔道流入我国。它在自己周围纠集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军，不让手工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由于这个过程的结果，在我们这儿当临近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城市中的主要力量是属于极高的社会类型的工业无产阶级。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这一事实必须作为我们全部革命策略判断之基础。

如果少数派同志相信革命能胜利，或甚至仅只承认有这种胜

利的可能，那么他們就不能否认，除了无产阶级之外在我們这儿沒有革命政权的历史竞争者了。正如法国革命中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领导了革命民族，同样，无产阶级，这一我們城市中的唯一的革命民主派，必須在农民群众中找到支柱并掌握政权，——只要革命取得胜利的話。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并通过它依靠革命农民的政府还不就是社会主义专政。現在我不去談无产阶级政府的今后前途。也許无产阶级注定要失败，如同雅各宾民主派的失败一样，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扫清地盘。我只想肯定一点：如果我們这儿的革命运动如普列汉諾夫所預言的一样，作为工人运动而取得了胜利，那末革命的胜利在我們这儿只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或者是根本就不可能。

我以全部决心坚持这种結論。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間的社会矛盾使无产阶级不能领导后者、无产阶级還沒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那就必須得出結論：我們的革命是根本就命定不能胜利的。在这种条件下革命的自然終局必然是自由资产阶级和旧政权的妥协。这是其可能性决不能否认的結局。但是非常清楚，这是由于革命內部軟弱所造成的革命失败道路上的結局。

摘譯自《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1907年5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載于《一九〇五年》莫斯科 1922 年第 2 版第 250—252 頁。

第三等級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欧洲革命动力的社会基础。其核心乃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商人和知識分子。十九世紀下半叶是其完全衰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扼杀了西欧的手工业民主派，并且不让它在东方形成。

欧洲資本在俄国碰到了农村家庭手工业者，并且，不让它从农民中分出并变成手工业者，就立即用工厂来摧殘之。同时它把我們旧的古老的城市——其中包括莫斯科这“大村庄”——变成最新

工业的集中点。沒有过手工业的过去、沒有傳統和偏見的无产阶级立即成为大量集中的阶级。在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門中，大的和最大的資本沒經過任何战斗就夺去了中小資本的基地。

摘譯自《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論孟什維主义的俄国革命論)》(1908年)，同上，第 262—263 頁。

我們的、就其所引起的直接任务而言是資产阶级的革命，由于工商业居民的激烈的阶级分化，不会有能领导人民群众、把自己的社会威望和政治經驗和他們的革命毅力結合起来的这种資产阶级。

同上，第 265 頁。

俄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手工业民主派的工业职能的同时，也夺取了它的任务，其中包括对农民的政治領導。是它的任务，而不是它的方法和手段。

同上。

欧洲資本扼杀了萌芽状态中的俄国手工业，从而也就抽掉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基础。是否可以把現在的彼得堡或莫斯科与一八四八年的柏林或維也納，甚而与一七八九年的巴黎(不論是铁路还是电报它都梦想也沒想到过，并且把有三百名工人的工場看作是最大的企业)相提并論呢？我們这儿根本就沒有那种经历过整个世紀的自治和政治斗争的学校，然后和年輕的、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并肩冲击封建制度的巴士底獄的健壯的市民阶层。代替它的是什么呢？“新的中等阶层”，职业知識分子：律师、記者、医生、工程师、教授、教师。在社会生产中失去独立作用的、人数不多的、經濟上不独立的这个阶层，正确地意識到本身的无力，始終不渝地在寻求可以依靠的坚强的社会阶级。妙事！这种靠山起先不是在資本家那儿，而是在土地占有者那儿找到了。

也就是这个对抗在小生产还具有意义的一切部門彻底粉碎了小生产。手工业无产阶级在大工业的环境中发展，因而和工厂无产阶级没有多少不同。**被大工业和工人运动所挤压的俄国手工业工人是个愚昧的、半饥饿的、凶狠的阶级，它和流氓无产阶级一起是黑色百人团示威和蹂躏的打手……**

結果，在一片社会主义的詛咒声中誕生的、无可挽回地迟到了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悬身于无底的阶级矛盾之上，为地主的传统所重压和为教授的偏見所欺騙，沒有主动精神，在群众中沒有影响，并且失去对明天的信心。

摘譯自《一九〇五年》(1909年)，莫斯科  
1922年第2版第48—49頁。

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由它在现代經濟中的作用决定的。民族的最强大的生产手段是直接依赖于工人的。……

.....

因此，手工业，整个小生产的微不足道和俄国大工业的极端发展的性质在政治上使无产阶级民主派排挤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生产作用，工人阶级还夺取了它过去的政治作用及其在农民阶层从貴族一国庫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时代中领导农民的历史僭望。

同上，第50—51頁。

俄国革命就其直接任务而言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它力求把资产阶级社会从专制制度和封建所有制的束缚和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一革命的主要动力是由无产阶级组成的，——因而就其方法而言它是无产阶级的。

同上，第55—56頁。

在这十年間我們的社会关系的全部发展都是沿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可能的革命作用的继续縮小和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和生

产作用繼續增长的道路进行的。如果說一九〇五年不可能完成“民族的”革命，那末第二次的民族革命，即联合整个“民族”来反对旧政制的革命甚至不可能为历史所提出。

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斗争中自然顾及并利用其他社会力量的任何反对派运动。但是大問題、基本問題是：我們是否认为在对外政策上已彻底暴露了其帝国主义反动本性的俄国资产阶级在对內政策上能起革命作用？我們是否使俄国革命的发展，因而也就是在实践上使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从属于俄国知識分子、城市小資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运动？或者是我们使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服从整个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和目标？

摘譯自《軍事潰敗和政治前景》(1915年9月)，  
載于《戰爭与革命》第1卷第255—256頁。

然而这封“信”<sup>①</sup>的作者完全避而不談這些問題。一九一五年俄国的“人民革命”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他們只告訴我們說，它“应当”由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去完成。什么是无产阶级，这我們是知道的。但什么是“民主派”呢？是个政党嗎？从以上所說的那些看来显然不是。那末是人民群众嗎？是什么样的群众呢？显然，是指小工商业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农民，这里所談的只能是这些人。

我們在以《軍事潰敗和政治前景》为題的一系列文章中已經对这些社会力量可能具有的革命意义作了一般的估計。我們根据上次革命的經驗探討了一九〇五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十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有利还是不利于民主派（资产阶级的）？这是在討論革命的前景和无产阶级策略时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心問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从一九〇五年以来究竟是强大起来了，还是更加衰落了？我們以前所有的爭論都圍繞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命

① 指由巴·阿克雪里罗德、阿斯特罗夫、馬尔丁諾夫、馬尔托夫等孟什維克分子具名的《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給俄国同志的一封信》。——編者注

运問題，而誰要是到現在仍然沒找到对此問題的答案，那他还是在黑暗中摸索。我們对这个問題的回答是：**由于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俄国不可能有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經过去了（至少对欧洲是如此），正如民族战争的时代已經过去一样。**在民族革命和民族战争之間具有一种深刻的內在联系。我們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不仅是一种殖民掠夺的体系，而且也是一定的國內政制。它不是使資產階級民族和旧政权对抗，而是使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民族对抗。

手工业的和商业的小資產阶级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就已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阶层的社会意义在过去十年中无疑地更为縮小了：在我們这里，资本主义对付中間阶级的办法比老的經濟文明国家残酷得多和剧烈得多。

知識分子的数量无疑是增长了。它在經濟方面的作用也增长了。但是与此同时，他們以前那种虛妄的“独立性”也最終丧失了。知識分子的社会意义完全决定于他們在組織资本主义經濟和資產階級輿論方面的作用。他們同资本主义的物质联系使他們身上充滿了帝国主义傾向。如我們已經听到的，这封“信”說：“甚至一部分激进的知識分子……也要求为国防事业而把一切社会力量动员起来。”这是完全不对的。不是一部分激进知識分子，而是全体激进知識分子。事实上，應該說，不仅是全体激进的，而且甚至相当大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极大一部分的話）社会主义知識分子。我們未必能用夸大知識分子特性的办法来增加“民主派”的人員。

这样，工商业資產阶级进一步沒落了，而知識分子則放弃了革命的立場。城市民主派作为一个革命因素來說已不值一提了。剩下的是农民。但是就我們所知，不論是阿克雪里罗得还是馬尔托夫都从沒有对农民的独立革命作用寄予过大的希望。他們是否得出了在农民当中不断发生阶级分化的过去十年中这种作用已經增

强了的結論呢？这种假定是既违背理論見解又违背历史經驗的。

那末，这封信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派”呢？而“人民革命”又是什么意思呢？

立宪會議的口号需有革命形势作为前提。存在这种形势嗎？存在。只是它絲毫不取决于下面这一点：彷彿俄国終于出現了資产阶级民主派，它現在准备并能去和沙皇制度进行清算。相反地，如果这次战争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什么的話，那恰恰是表明了國內缺乏革命民主派。

摘譯自《为政权而斗争》（1915年10月17日），載于《一九〇五年》莫斯科1922年第2版第289—290頁。

农民在俄国的生活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在一九〇五年，农民直到它的最底层都动起来了。农民赶走了地主，焚毀了庄园，夺取了貴族的土地。但是，农民最糟糕的地方是他們的分散、互相隔絕、落后。而且，农民的不同阶层的利益又很不一致。农民曾挺身而出反对他們本地的农奴主，可是他們对全俄的农奴主却敬若神明。此外，农民士兵不懂得，工人流血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他們，而他們作为沙皇政权的盲目工具鎮压了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工人起义。

无论誰只要仔細想想一九〇五年的經驗，并纵观一九〇五年起到目前止的这段期間的情形，他就会懂得，我們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所抱的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实行革命合作的希望，是多么渺茫和多么可怜。最近十二年以来，大資本在俄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中小資产阶级变得更加依賴于銀行和托拉斯。人数已有增长的工人阶级，現在被一道比一九〇五年更深的深淵同資产阶级隔絕开来了。如果說，十二年前“全民族的”革命沒有成功，那末，現在对它的希望就更加小了。誠然，这些年来农民的文化和政治水平提高了很多。可是，对农民作为一个阶层起革命作用的希望，

**还是比一九〇五年小得多。工业无产阶级只能在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中找到真正可靠的同盟者。**

摘譯自《伟大的一年的教訓》(1917年1月20日),載于《战争与革命》莫斯科1925年版第2卷第434—435頁。

这样一来,对于自由資产阶级的态度,便成了区别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試金石了。俄国革命能够进行多远,未来临时革命政府将具有什么性质,它将面临什么任务,它将依照什么次序来解决那些任务,——这些問題的重大意义,必須同无产阶级政策的基本性质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提出来;而无产阶级政策的基本性质首先是由无产阶级对于自由資产阶级的态度决定的。普列汉諾夫裝腔作勢地固执地閉起眼睛,不理会十九世紀政治史上的实际教訓:无论什么地方,无产阶级一作为独立力量出現,資产阶级就要轉入反革命营垒去的。群众斗争愈加勇敢,自由派就愈加迅速变为反动派。至今还没有人发明一种能使阶级斗争規律不起作用的办法。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1963年版下冊第553頁。

**民粹派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看做簡單的“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同样关心社会主义;而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乃是小資产阶级分子,农民必須在物质上或精神上不再成为农民,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民粹派以其特有的感情认为上述那种社会学的分析乃是对于农民的一种刻薄的侮辱。俄国各派革命者曾在这个問題上进行主要的斗争达两代之久。为了了解后来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間的冲突,必須着重指出:列寧遵照馬克思主義的整个传统,从来没有把农民看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盟軍;恰好相反,正因为农民占居压倒的多数,列寧才斷言在俄国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所有直接或間接地与土地問題有关的論文中**

都再三發揮了這個觀念。

一九〇五年九月間，列寧寫道：“當農民運動是革命民主運動的時候，我們是支持農民運動的。我們準備着（現在立刻準備），當它一旦變為反動的、反無產階級的運動時，就同它作鬥爭。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實質就在於提出這一雙重任務。……”<sup>①</sup> **列寧把西方無產階級看做社會主義同盟軍，在某種程度上也把俄國鄉村中半無產階級分子看做社會主義同盟軍，但他從來沒有把全體農民看做社會主義同盟軍。**他以他特有的堅定性反覆地說：“我們起初是用一切方法支持一般農民反對地主，直到沒收地主的土地，然後（甚至不是然後，而是同時）我們支持無產階級去一般地反對農民。”<sup>②</sup>

一九〇六年三月間，他又寫道：“農民將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獲得勝利，因而將完全耗盡他們作為農民的革命性。無產階級也將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獲得勝利，因而將真正開始發揮它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性。”同年五月間，他重複道：“農民運動是另一個階級的運動；……這不是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鬥爭，而是替資本主義的基礎清除農奴制一切殘余的鬥爭。”<sup>③</sup> 我們從列寧的這一篇到那一篇文章，從這一年到那一年，從這一卷到那一卷著作，都可以找到這個觀點。文句和例證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則是不變的。這個基本思想不可能發生過變化。**列寧如果把農民看做社會主義同盟軍，那麼他堅持革命的資產階級性，把革命限制在“工農民主專政”範圍內，限制在純粹的民主任務的範圍內，就會毫無根據了。**有時列寧指責我對農民“估計過低”，他的意思並不是說我沒有認識農民的社會主義傾向，而是說我沒有充分認識（就列寧的觀點說）：農民的資產階級民主獨立性，農民有建立自己的政權的能力，

① 《列寧全集》第9卷第220頁（指中譯本頁次，以下同）。——編者注

② 同上，第222頁。——編者注

③ 《列寧全集》第10卷第381頁。——編者注

**又有通过它去阻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建立的能力。**

对这个問題的重新估价，是到了“热月”反动年代才开始的；这个反动大体上是从列宁患病和逝世时开始。从此以后，俄国工农联盟就被宣布本身含有足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充分保证，含有在苏联境内达到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斯大林拿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論来代替世界革命論之后，就开始把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的評价称为“托洛茨基主义”，不仅指現在，而且追溯到整个过去。

当然，可以提出馬克思主义对农民的經典的看法是否被事实证明为錯誤的問題，但这个問題将使我們远远地超出本附录的范围。目前，我們只說下面一点就够了，即馬克思主义把农民看做非社会主义的阶级的时候，从来没有賦予这一評价以一种絕對的不可更改的性质。马克思早已說过：农民有判断能力，也有臆断能力。农民的本性是随条件不同而改变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发现了影响农民、改造农民的十分巨大的可能性。历史还没有彻底探明这个可能性的限度。然而已經清楚的是，苏联的国家强制作用的日益增长，不仅沒有駁倒使俄国馬克思主义者有別于民粹派的对于农民的評价，反而根本证实了这个評价。現在，新政权建立了二十多年之后，无论关于这个問題的情况如何，**下面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宁可說在一九二四年以前，馬克思主义阵营內沒有一个人曾把农民看做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列寧更不待說**。列寧一再重申：如果沒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资产阶级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寧并沒有想錯：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阶段。

同上，第 556—558 頁。

在写了《一月九日以前》这个小册子之后，我一再恢复发展和論证不断革命論的工作。鉴于不断革命論后来在本传記的主人公

的思想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用摘录的形式在这里介紹一下不断革命論是必要的。以下便是我的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六年著作的准确的摘录。

“在現代的城市中，至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城市中，居民的核心乃是急剧分化了的雇佣劳动阶级。正是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时基本上还不存在的阶级，注定要在我們的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經濟上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比资本主义較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获得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机械地受本国技术力量和技术手段所决定的这一种思想乃是极其简单化的‘經濟’唯物主义，这一种观点与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美国工业生产力虽然比我国高十倍，可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它对于本国政治的影响，以及不久之后对于世界政治发生影响的可能性，要比美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影响大得多。……

“我觉得俄国革命将会造成这样的条件，使政权在資产阶级自由派政治家尙未能充分施展其統治才能以前就有可能（在胜利情形之下則必然）落入无产阶级手中。……俄国資产阶级将把一切革命陣地交给无产阶级，它也不得不把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交给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者阶级来解放农民。……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将动员一切力量来提高乡村文化水平，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

“但农民自己不会把无产阶级赶走而取代它的地位么？那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历史經驗都否定了这个假設。历史經驗证明：农民完全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从以上所說就可以清楚看出我对‘工农专政’的思想的看法。問題并不在于我原則上承认不承认它、‘要’‘不要’这种政治合作形式。我认为，这种合作形式是不能实现的，至少不能馬上直接实现。……”

有人硬說这里闡述的观点是“跳过資产阶级革命”，后来人們

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一說法，上面所引的几段話业已证明这种說法多么不正确。我同时写过：“为俄国的民主革新而斗争，整个說来，是从資本主义来的，是資本主义基础上所形成的力量領導的，它的矛头首先直接指向資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上的封建障碍。”但是問題的实质在于用什么力量、什么办法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可以用下面的說法限定一切革命問題的范围：我們的革命，就其客观的目的以及从而就其一切不可避免的結果說来，是資产阶级革命。同时可以閉上眼睛不看这个事实，即这个資产阶级革命主要的能动的力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靠革命的一切冲击力量推动自己向政权前进。……人們也可以以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經濟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这种想法安慰自己，而同时忽略这个思想，即无产阶级执政后，它的地位必然推动它靠国家的力量去管理經濟。……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力的人质，而是作为領導力量进入政府的，他們只靠这个办法打破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界限，即把集体主義提到議事日程上来。无产阶级朝着这个方向走多远，要看各种力量間的相互关系而定，决不随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初的意图而定。……

“但我們已經可以自問道：无产阶级专政是否一定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資产阶级革命的框框？它打破这个框框后，能不能根据現存的世界历史情况期待胜利的前途？……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即：如果沒有欧洲无产阶级政府直接支援，俄国无产阶级将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将不能把自己暫时的統治轉变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但这不一定导致悲观的預斷。“俄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解放，将把領導者提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将賦予領導者以巨大的力量和手段，使其成为在世界范围内肃清资本主义的創始人，历史已經为在世界范围内肃清资本主义創造了一切客观前提。……”

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能够执行其革命任务到什么程度，我在一九〇六年写道：“欧洲的各个社会党，首先是其中最强大的德国党，已經发展了它們的保守性，随着倾向社会主义的群众增多，随着这些群众的組織和紀律的效力提高，它們的保守性也愈加强烈。因此，社会民主党这个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經驗的組織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間的公开斗争的道路上的直接障碍。……”但我在总结我的分析时表示确信“东方革命将以革命的理想主义影响西方无产阶级，将激发它开始同它的敌人說‘俄国話’的願望。……”

同上，第561—563頁。

2. 宣传“旧政制的馬廄只能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扫箒来打扫干淨”，“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才是可能的”。

断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会和国家的經濟落后发生冲突”。它“不仅要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和资产阶级发生敌对冲突的同时，还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所以，无产阶级一取得政权就必然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取消最低綱領与最高綱領之間的分界線”。攻击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成两个阶段，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和工农民主专政之間規定原則性的區別是“純粹形式主义的推論”。

我們知道革命的典型例子，在这个革命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統治条件是由胜利了的长褲汉的恐怖专政所准备好的。这是城市居民的主要群众由手工业-商业市民組成的时代。雅各宾派率

領他們。目前俄国城市居民的主要群众是工业无产阶级。仅仅这一类比已經提示出关于出現下列历史形势的可能性的思想：在这种历史形势下，“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才是可能的。革命是否会因此而不成其为资产阶级的呢？又是，又不是。这不取决于形式上的定义，而取决于事变的继续发展。如果无产阶级被各资产阶级的，其中包括为无产阶级所解放的农民的联盟所抛弃，那么革命将保持其狭隘的资产阶级性质。而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并善于把自己政治统治的全部手段用于打破俄国革命的民族界限的运动，那末俄国革命就能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激变的序幕。关于俄国革命将走到哪个阶段的问题，自然只能是有条件地解决。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是肯定的：空洞地規定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等于根本没有談其内部发展的型式，并且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应当使自己的策略去适应作为国家政权自然合法的追求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行为。

摘譯自《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論孟什維主义的俄国革命論）》（1908年），載于《一九〇五年》莫斯科1922年第2版第260—261頁。

拉薩爾从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事件中吸取了如下不可动摇的教训：“欧洲的任何斗争，只要它不从一开始就宣布是純粹社会主义的斗争，那么都不会成功，社会問題在斗争中只是个模糊不清的因素并被置諸脑后，而且表面上是在民族复兴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斗争，任何这种斗争都再也不会成功了。”……

在一九〇五年开始的革命中，无产阶级第一次在自己的旗帜下，为自己的目标而行动。同时也毫无疑问，没有一个旧的革命象到目前为止的俄国革命那样耗費了如此大量的人民的精力，而给予了如此微小的积极成果。我們远非企图預言在最近数周或数月

事变将如何发展。但对我们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只有沿着拉萨尔在四九年提出的那条道路才可能取得胜利。从阶级斗争回到资产阶级的民族团结已成为过去。俄国革命的无所成就不是别的，而是其深刻的社会性质的暂时反映。在这一没有革命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事物的内部进程把无产阶级推向领导农民和为国家政权而斗争。

摘译自《一九〇五年》(1909年)，同上，第60—61页。

完全正确！——布尔什维克说道。我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农民必须共同斗争。列宁在《Przeglad》(《评论》)第二期上说，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sup>①</sup> 其活动的内容是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范围内使经济和政治关系民主化。列宁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和工农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之间规定了原则性的区别。他觉得这种逻辑上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推论完全能解救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工人阶级统治之间的物质矛盾。他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会遭到政治上的破产。但是既然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执政，确认其专政只有“民主主义性质”，那么一切都得救了。从一九〇四年起，列宁孜孜不倦地重复这一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正确一些。

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条件还未成熟，因此政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会是个极大的不幸。孟什维克是这样讲的。列宁回答说，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认识到问题只在于民主革命，这也许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客观条件的矛

---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38页。——编者注

盾的出路在于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同时由于理论上认识到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自我限制是必然会出现的。列宁把客观矛盾转到无产阶级的認識中去，并用阶级禁欲主义来解决之，这种禁欲主义的根源不在于宗教信仰，而在于“科学的”公式。只要清楚地想象一下这种設計，就足够了解它那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性质。

在另一个地方我已詳尽地指出<sup>①</sup>，在“民主主义专政”的第二天这种准马克思主义的禁欲主义的牧歌就会烟消云散。无产阶级无论在何种理論标志下执掌政权，它不能不馬上（就在第一天）面对面地碰着失业問題。在这种事情上，解释社会主义专政和民主主义专政之間的区别未必能有力地帮他的忙。执政的无产阶级必須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共工程等等）立即由国家开支来保障失业者的生活。这种做法本身立刻会引起經濟斗争的强大高涨及整整的一篇罢工的英勇的史詩：这一切在一九〇五年年底我們已經小規模地見到过了。而資本家将会以当时回答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那样来回答它：关闭工厂。他們在大門上鎖上一把大鎖，并对自己說：“我們的私有財产不会遇到危险，因为已經規定，現在无产阶级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专政，而是民主主义专政。”在关闭的工厂面前工人政府能做些什么呢？它必須使工厂开工，并由国家开支来恢复生产。但是这难道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嗎？当然是！你們难道能提出別的道路嗎？

可能会有人反駁說，你們描繪的是无限制的工人专政。而要知道这里讲的却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专政。——好吧，就把这种反駁也考慮在內。刚才我們已經看見，无产阶级是如何违背其理論家們的善良意願，在实践中消除了那种必定把它限制

---

① 《我們的革命》第 249—259 頁。——托洛茨基注

于民主主义专政的邏輯特征。現在有人建議以合作者-庄稼汉的形式給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加上一个客观的反社会主义的“保证”。如果想以此說明，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执政的农民政党不会允許由国家开支負担失业者和罢工者，也不会允許打开資本家关闭的工厂供国家生产，那么这就是說，就在第一天，即远在完成“联盟”任务之前，我們将会看到无产阶级和革命政府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可能以农民政党制服工人告終，或者是以前者被排除出政权之外而結束。而前一种或后一种情况都和联合“民主主义”专政很少有共同之点。全部不幸就在于布尔什維克只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到革命胜利的时刻：此后它就暂时消融于“民主主义”合作之中。而只有在最終建立共和制之后，无产阶级才以純粹的形式(这一次是在直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形式下)重新进行阶级斗争。如果说孟什維克从“我們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抽象概念出发，陷入使无产阶级的全部策略迎合自由资产阶级的行为直到它夺得国家政权为止的思想，那么布尔什維克从“民主主义的，而非社会主义的专政”这同样是赤裸裸的抽象概念出发，陷入使执掌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保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我限制的思想。是的，这两者之間在这个問題上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孟什維主义的反革命一面現在已表露无遗，而布尔什維主义的反革命特点只有在革命胜利的时候才会有巨大的危险性<sup>①</sup>。当然，孟什維克以及布尔什維克經常談論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前者在对待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后者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这一事实絲毫不改变下列事实，即无论前两者还是后者(只是在事变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为阶级斗争的后果所吓倒，而想用自己形而上学的設計

---

① 对本版的附注。如所周知，这并没有发生，因为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布尔什維主义在1917年春，即夺取政权以前，在这极端重要的問題上完成了(不是沒有内部斗争地)自己思想上的重新武装。——托洛茨基注

来使之严守秩序。

摘譯自《我們的意見分歧》(1909年)，  
同上，第283—285頁。

革命胜利后只能把政权交给能依靠城市的武装人民即无产阶级民警的政党手里。社会民主党执掌政权后就处于最深刻的矛盾之中，它不能用“只是民主主义专政”的天真的幌子来克服。工人政府的“自我限制”不是别的，而只会是为了实现共和国而叛卖失业者、罢工者、以至全体无产阶级的利益。在革命政权面前摆着种种客观的社会主义任务，但是要解决这些任务在一定阶段上就会和国家的经济落后发生冲突。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内没有摆脱这种矛盾的出路。在工人政府面前从最初起就提出下列任务：使自己的力量和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它的暂时的革命统治才会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序幕。因此，不断革命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阶级自卫的要求。如果工人政党缺乏足够的革命—进攻<sup>①</sup>政策的主动性，并且打算转向于巴巴的只是民族的和只是民主主义的专政，那么欧洲联合起来的反动派将会毫不迟延地对它说明，执掌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把全部政权放在天平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边去。

同上，第286頁。

在一九〇五年我們有个很大的优越性，这就是在革命序幕的时代，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已經用认识历史过程的科学方法武装起来了。这使得有可能从理論上来搞清楚那些历史的物质过程只給予某些暗示的关系。南俄一九〇三年混乱的七月罢工已提供了作出下列結論的材料，即俄国革命的基本方法是无产阶级的总罢工及其随后向武装起义的轉变。明显地证实了这一預測的一月九日的事变，要求具体地提出革命政权問題。从这时起，在当时的俄国

① “进攻”的原文为 агрессивная，也可譯作“侵略的”。——編者注

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尖銳地提出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内部阶级动力的问题。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論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

虽然事隔十二年，这种估计却完全被证实了。俄国革命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完成。它必须把政权交给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还无力夺取政权，它是被迫在六月三日政变后的沙皇制度下的地下活动中、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壮大和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依据其老一辈在一九〇五年获得的经验，在一九一七年掌握了政权。年轻的工人应当掌握这些经验，应当知道一九〇五年的历史。

摘譯自《〈一九〇五年〉第一版序言》  
(1922年)，同上，第3—5頁。

农民阶级对布尔什维克完成了民主主义的土地革命和他们奠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这二者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国家和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掌握；农民再无需交纳五亿卢布左右的地租，这是民主革命的好处。但是农民由于价格差距（“剪刀差”）付出的一笔钱比这要大得多，这笔钱归国营工业所得。因此，把十月革命同时进行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算一笔总账，对农民阶级来说，直到目前还是要吃几亿卢布的亏。对于愿意既弄清国家的经济状况又弄清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人说来，这是个无可争辩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事实。我们应当明确地正视这一事实。**农民阶级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的根源就在这里。**

摘译自《十月革命十二周年》（1929年10月17日），载于《托洛茨基文选》第1卷巴黎1955年版第75页。

布尔什维克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那时它一定知道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当时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被推到了非常遥远的未来，至少是不确定的未来。只有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这一革命才能实际上提上日程，这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所得出的论点，是党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由此就产生一种设想：如果民主革命在俄国具有宏伟的规模，它就能直接推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将促使俄国无产阶级在以后迅速取得政权。即使按照这个比较顺利的方案进行，总的历史前途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发展进程加速了和期限提前了。

正是按照这些观点的精神，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写道：“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

义革命过渡。我們主张不断革命。我們决不半途而废。”<sup>①</sup> 令人奇怪，这段引文竟被斯大林用来证明党对一九一七年事变实际进程早有預測。不过仍然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党的干部当时被列宁的《四月提綱》弄得大吃一惊呢？

实际上，按照旧的概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解决了土地問題以后，才能开展起来。困难在于，农民在满足了自己的渴望土地的要求以后，就会失去支持一次新的革命的热情。因为在國內占明显的少数的俄国工人阶级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夺取政权，所以列宁一貫认为，在西方无产阶级胜利以前，就談不上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写道：“現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終結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滿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度一爭得，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結，而无产阶级爭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sup>②</sup> 这里所說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而言。

在这种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口号是从哪里来的呢？列宁的回答是：俄国革命家，由于具有許多欧洲老前輩的經驗，應該“有理想”，能“空前完滿地实现一切民主主义改造，实现我們的全部最低綱領……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延燒欧洲……欧洲工人也将发动起来，并向我們表明‘該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年的革命时代”<sup>③</sup>。俄国革命的独立內容——即使它发展到最高限度——，也不会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即使对于

① 《列宁全集》第9卷第221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115頁。——編者注

③ 同上，第8卷第257頁。——編者注

俄国无产阶级來說，也只有西方的胜利的革命才能够开辟一个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代。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这种观点在党内是完全有效的。

如果抛开成堆的插話、論战中的种种夸大和一些个人的錯誤，則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間关于不断革命問題的爭論的实质，并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能否建立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問題——关于这个問題，在一九二四年以前，沒有一个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失口提到过——，而是在俄国仍然有可能进行真正能够解决土地問題的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問題。

列宁在其四月提綱中修改了他早期观点的哪些部分呢？他从来連一分钟也沒有放弃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的学說，以及落后的俄国只有在西方的直接协助之下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但是，就是在这里列宁第一次宣布，正是由于本国的条件很落后，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日掌握政权。

二月革命表明，它既沒有力量解决土地問題，也沒有力量解决民族問題。俄国的农民和各被压迫民族在爭取实现民主目标的斗争中不能不支持十月革命。只是因为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力完成他們的西方前輩已經实现的历史任务，俄国无产阶级才得到了比西方无产阶级早取得政权的机会。一九〇五年，布尔什維主义企图要到完成民主任务以后才过渡到爭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一九一七年，却在沒有完成民主任务的基础上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俄国革命的复杂的性质还不止于此。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这就自然而然地取消了“最低綱領”与“最高綱領”之間的分界綫。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但只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民主任务必然要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任务，尽管欧洲工人还没有来得及

## 告訴我們“談怎么办”。

西方和东方之間的革命程序上的变化尽管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命运都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毕竟只有历史局限的意义。不論俄国革命向前跃进得多么远，它对世界革命的依赖性既沒有消除，甚至也沒有减少。民主改革轉变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能性，是直接由复杂的国内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間的相互关系——产生的。但是，归根到底，社会主义改造的界限要取决于世界舞台上的經濟和政治条件。这个国家的冲力不論多大，它总不可能跳出这个星球。

共产国际在譴責“托洛茨基主义”时，特別大肆攻击这样一种見解：俄国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而得不到西方支援的情况下，“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即使你們认为历史的實驗已經完全駁倒了这个預測（它是由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作的，現在批評他的人中間，当时沒有一個人哪怕是贊同无产阶级在俄国实行专政的观点），即使如此，俄国的所有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內，当时都把农民看作是一个不可靠的、叛卖的盟友，这一点仍然是一个不可辯駁的事实。布尔什維主义的真实传统与认为工农利益預先注定是協調的这种說法，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地，对这种小資产阶级理論进行批判，在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主义者的长期斗争中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摘譯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載于《俄国革命史》伦敦1936年版第1222—1225頁。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之所以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小資产阶级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不言而喻，如果没有农民以武装分遣队、地方委员会等形式积极参加，是不可能进行农民革命的。然而农民革命的命运不决定于乡村，而是决定于城市。农民阶级在现代社会中是缺乏定形的中世紀的残余，它不可能有

独立的政策；它需要外来的領袖。两个新兴的阶级在夺取对农民的领导权。如果农民跟着自由资产阶级走，革命就会半途而废，结果还会倒退。如果农民以无产阶级作为领袖，革命就会不可避免地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不断革命的前景正是建立在历史发展比较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特殊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的。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上冊第108—109頁。

一九〇五年，在发动强大的一月罢工的同时，人们向沙皇递交了天真的請愿书。一九一二年，工人們立即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一九〇五年的思想、传统和組織經驗——它們为在反动时代取得的辛酸教训所丰富——滋養了新的革命时期。从一开始，领导作用就是属于工人的。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內，领导权属于布尔什維克。这在实质上預先决定了未来的革命的性质，虽然布尔什維克自己还没有清楚認識到这一点。通过加强无产阶级，并且为它取得在国家經濟和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作用，工业复兴加强了持久革命前景的基础。旧政制的馬廐只能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扫帚来打扫干淨。民主革命只有把自己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也是征服自己，才能够胜利。

“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場繼續是这样。

同上，第173頁。

俄国民主制，恰恰相反，只能作为大规模革命暴动結果而实现，这个革命暴动的动力不容許工人政府保持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框框之内。

同上，下冊第561頁。

不断革命論的見解可以概括如下：俄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只有采取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才是可以思議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把民主任务提到議事日程上来，

而且把社会主义任务提到議事日程上来，同时有力地推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唯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除资产阶级复辟危险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設。

以上的概括的公式同样清楚地显示后两种观点<sup>①</sup>是相似的，它们与自由派孟什維克的見解是根本对立的，同时显示后两种观点在革命必然产生的“专政”的社会性质和任务問題上也有极其重大的本质差別。現在的莫斯科理論家的著作时常埋怨无产阶级专政綱領在一九〇五年提得“过早”，这說得不恰当。經驗證明，工农民主专政綱領也是提得“过早”的。第一次革命时期各种力量配合不当与其說有碍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如說有碍于一般革命的胜利。然而，各个革命党派所依据的是对完全胜利的希望；沒有这一种希望，就不可能有最高的革命斗争。革命的一般前途以及由此生出的战略問題是意見的分歧所在。孟什維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是根本錯誤的：他們給无产阶级指出錯誤的道路。布尔什維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他們正确地指出斗争的总方向，但关于斗争的阶段說得不正确。布尔什維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的缺陷，一九〇五年革命时还没有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是仅仅因为革命本身还没有进一步发展。可是，一九一七年革命开始时，列宁就不得不改变他对革命前途的看法，而直接与他的党的老干部发生冲突了。

同上，第 564—565 頁。

### 三、鼓吹革命在一国胜利后立即向 邻国扩展并使世界革命化<sup>②</sup>

认为无产阶级在本国取得胜利后应立即“使革命扩

---

① 指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論”的观点和列宁的观点。——編者注

② 本节論点詳見本书第二部分：《世界革命》。——編者注

展到毗邻的国家并拿起武器支持这些国家的起义”，进行世界革命。“国际主义”和“阶级自卫”都要求这样做。說“只有当新社会在我們整个星球获得最終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

此外，俄国无产阶级在执掌革命赋予的政权的同时，将做到环境所規定的一切，以便立即把本民族事业的命运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直接联系起来，不仅无产阶级政策的一般国际主义原則要求这样做，——阶级自卫的威严的要求也将迫使它走上这条道路。

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在打破我們伟大革命的民族框子，并使之成为劳动取得世界胜利的序幕的条件下，才不会被赶回去，才能够把我們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摘譯自《三十五年以后，一八七一一九〇六年》  
(马克思著《巴黎公社》一书序言，1905年12月)，  
載于《巴黎公社》彼得堡1906年版第XXI頁。

但是現在，在俄国革命的大有希望的开端之后，我們有一切理由期望，就在这次战争期間，强大的革命运动会在全欧洲开展起来。很明显，它只有作为全欧的运动才能順利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內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它必然会遭到毁灭。我們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指出了威胁着俄国革命的来自德国軍国主义的危险。这种危险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危险。对俄国革命來說，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軍国主义比起霍亨索伦王朝的軍事机器来，并不是威胁性更小的敌人。拯救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把革命轉到整个欧洲去。如果革命运动在德国扩展开来，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就会在西方的“敌对”国家中寻找并找到革命的反响；而如果欧洲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政权，那么即使仅仅是为了掌握住这个政权，它也会不得不立即使

这个政权去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換言之，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建立，只有在全欧洲的幅員之内，也就是說在欧洲共和联邦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靠武力、靠工业和外交协定都不能取得的欧洲的国家联合就会成为得胜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項迫切任务。

歐洲聯邦是我們已經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不管今后軍事行动的进程如何，不管外交对目前的战争如何总结，不管革命运动在最近时期的发展速度如何，欧洲联邦口号在一切情况下都将作为欧洲无产阶级爭取政权的政治公式而获得巨大意义。这一綱領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框框，作为阶级斗争的基地，因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都已經过时了。只有当我们把建立新的、更高級的革命“祖国”——共和欧洲的进步任务同保守地保卫过时的民族祖国对立起来的时候，我們对“保卫祖国”这一过时的无产阶级政治綱領的否定才不再成为在思想政治上的自卫的純粹消极的行动，而获得自己的全部革命內容。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組織起来。

有些人教条主义地問：“为什么是欧洲的联合，而不是全世界的联合？”这里順便也对这种人作了答复。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詞，而且是某种經濟和文化历史的共同体。欧洲革命不必等待亚洲和非洲的革命，甚至也不必等待澳洲和美洲的革命。然而，沒有德国的革命，俄国或英国的胜利的革命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說也是一样。現在的战争被称为世界大战。然而甚至在美国参战以后，作战的仍然是欧洲。而革命的問題也首先摆在欧洲无产阶级面前。

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将仅仅成为世界經濟組織的两个中枢中的一个。另一个中枢将是美洲联邦。

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归结为下面的一句話：“經濟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义的絕對規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結論說，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內胜利，因而每一个別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須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sup>①</sup>。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爭辯的意見。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經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間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間消极等待的思想暗中頂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說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繼續下去，深信我們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国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論都证明了的。

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会意味着成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那种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用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的办法来为保存革命的民族基地而斗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挖革命的牆脚；革命不能不在民族基地上开始，但是在目前欧洲各国經濟上和軍事政治上处于相互依賴的情况下，革命是不可能在民族基地上完成的，这种相互依赖正是在目前这場战争中空前有力地暴露出来了。欧洲联邦口号也就是这种将直接促使

---

① 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布尔什維克的中央机关报。托洛茨基这里指的是列宁 1915 年在該报发表的《論欧洲联邦口号》一文（見《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321 頁）。——編者注

## 歐洲無產階級在革命中行動一致的相互依賴的表現。

摘譯自《和平綱領》(1917年5月)，載《戰爭與革命》  
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497—501頁。

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馬爾托夫同志的同道們，與我們相反，他們否認對政治任務的社會革命提法。他們在自己的政綱中宣稱：俄國還沒有成熟到實行社會主義的程度，所以我們的任務只能限於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這整個議論是建立在完全踐踏無產階級的國際聯繫和國際任務之上的。如果說世界上只有俄國，那末馬爾托夫的議論或許是對的。可是，問題却在於消滅世界大戰，在於同世界帝國主義作鬥爭，在於履行世界無產階級包括俄國無產階級的任務。馬爾托夫同志不是向俄國的工人進行解釋：說俄國的命運現在跟歐洲的命運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繫；歐洲無產階級的勝利必將保證我們更快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反過來說，歐洲工人的失敗將把我們拋回到帝國主義獨裁和君主制去，最後變為英國和美國的殖民地；不是使我們的全部策略服從於歐洲和世界無產階級的總目標和總任務。他反而從帶有局限性的民族的框子來看俄國的革命，並把革命任務歸結為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這樣提問題是根本錯誤的，這種提法籠罩著一種導致第二國際崩潰的該受詛咒的民族局限性的危險。

.....

奪取政權的鬥爭，對於我們不只是當前民族主義革命的一個階段；不，這是完成一項國際義務，這是在同世界帝國主義鬥爭的整個戰線上占領最重要的陣地之一。正是這一基本觀點，決定著我們對待所謂民族自衛的態度。戰線暫時移動到某个方面，既不能使我們停止，也不能使我們放棄反對資本主義基礎本身的鬥爭，這種資本主義已到了使各國人民進行帝國主義的互相殘殺的地步。

## 不断革命反对不断屠杀！这就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

摘译自《国际主义的策略》(1917年9月)，  
载于《无产者报》1917年9月6日第10号  
第4—5版。

但是我要追溯更远的过去并引证我自己在一九〇五年所写的几段话。

“这点（俄国革命的发展）一开始便赋予正在展开的事件以国际的性质，并开拓了一个最伟大的前景：俄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解放把领导者提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使他掌握了巨大的力量和手段，并使他成为在世界上消灭资本主义——历史已经为它提供了一切客观前提——的开路先锋。

**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在暂时取得政权的情况下不是出于自己的主动把革命推行到欧洲的土地上，那末，欧洲的封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将迫使它这样去做。**

现在来预测俄国革命将通过怎样的道路延及老资本主义的欧洲，这自然是白费力气，因为这条道路可能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们打算谈谈作为联系革命的东方和革命的西方的链环的波兰问题，这与其说是预言，倒不如说是为思想提供例证。

俄国革命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波兰革命的胜利。不难想象，俄属波兰十个省的革命制度将必然使加里西亚和波兹南行动起来①。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政府将把他们的军队集中到波兰边境上来回答这一点，以便然后越过边境并在敌人的中心华沙打击他们。无疑，俄国革命是不会听任它在西方的先头部队落在普鲁士-奥地利大兵的手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威廉第二及弗兰茨·约瑟夫的政府作战对于俄国革命政府来说将成为自卫的法律。那

---

① 我回想起，这是我在1905年写的。——托洛茨基注

时德国和奥地利的无产阶级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无疑，他們不会漠不关心地旁观本国军队的反革命十字军征伐。封建-资产阶级的德国反对革命的俄国的战争必然意味着在德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让那些认为这种断言过于绝对的人去臆想另一个更适合于把德国工人和德国反动势力推上公开的力量较量的道路的历史事件吧。”（见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俄文版第280—281页）

当然这些事件没有按照在十六年前的这几段话中仅仅作为假设并且为了叙述生动而预先描绘的历史顺序发生。但是整个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并且今后还要证明这一预言：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革命战争的时代，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这就将不可避免地把它推向和世界反动势力的列强作战。可见我们在十五年以前就已经基本上弄清楚我们将必须创造“什么样的军队”以及“为了什么任务”而创造它。

摘译自《军事学说还是臆造的军事空谈》（1922年），载于  
《共产国际》杂志德文版1922年第9期第148—149页。

如果我們从一个国家发展甚至完成社会主义的概念出发，事情就完全变样了。我們今天有一种“理論”，說什么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說什么这个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相互关系可以建立在“中立”世界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斯大林）。如果采取这种基本上是民族改良主义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观点，那末就没有必要、至少是不象原来那样必要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但是，从我們的观点来看，这个口号是重要的，十分必需的，因为它包含着对孤立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譴責。对于每一个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使革命扩大到毗邻的国家并拿起武器支持这些国家的起义是极为必要的，甚至比对苏联更为必要——当然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这样說并不是出于任何有关国际团结的抽象的考

慮——仅仅这些考慮是不能使各个階級行动起来的——，而是出于列寧曾經千百次提出过的那些重要理由，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国际革命的支持，我們就无法支持下去。苏維埃联邦的口号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进程，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在所有国家内同时爆发，但是它会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要求这些国家——特别是在欧洲范围内——为了抵抗最强大的外部敌人和进行經濟建設而建立最紧密的联系。

摘譯自《列寧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16—17頁。

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資產階級社會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社会所創造的生产力不再能同民族国家的界限協調一致。因此，一方面产生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就产生一种資產階級的欧洲联邦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一种在更新的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只有当新社会在我們整个星球上获得最終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

摘譯自《不断革命》(1929年)，  
伦敦1962年版第155頁。

托洛茨基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即在取得政权的时候說过：“如果欧洲人民不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我們就会被打倒，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俄国革命将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就是各國資本家扼杀我国的革命。”当时會議席上有一人喊道：“还有第三条道路！”也許，这是斯大林的喊声吧？不是，这是一个孟什維克的喊声。这是在布尔什維克发现那个“第三条道路”以前若干年的事。

由于斯大林派的国际报刊无数次的反复宣传，在許多不同的政界人士当中差不多已經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布列斯特-立托夫

斯克意見分歧的基础是两种观念。一种观念的出发点是不仅能够支持下去，而且能够依靠俄国的内部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另一种观念是把自己的希望只是寄托在欧洲发生起义上面。实际上，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是在几年以后捏造出来的，捏造者沒有煞費苦心做到使自己的发明哪怕是非常表面地符合历史文件。当然，这不会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所有的布尔什維克在布列斯特时期都一致认为，如果欧洲不在最近的将来爆发革命，苏維埃共和国就注定要灭亡。有些人估計是几个星期的事，另一些人估計是几个月的事，就沒有人是估計为几年的。

摘譯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載于《俄国革命史》伦敦1936年版第1231頁。

我們取得胜利以后，在一九一九年建立了共产国际。我們不止一次地宣称，革命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責任去援助被压迫的和起来反抗的阶级，而且不仅是思想上进行援助，如果可能的話，还要拿武器去援助。我們也并沒有局限于只是三番五次地宣告这一点。我們在我們自己那个时期曾經用武装力量去援助芬兰、拉脫維亚、爱沙尼亞和格魯吉亞的工人。我們曾經試圖以紅軍进攻华沙的行动去援助正在暴动的波兰无产阶级。我們派遣了組織者和指揮官去帮助中国人革命。一九二六年我們募集了千百万卢布去援助英国的罢工工人。而现在，所有这些似乎都变成誤会。是悲剧的誤会嗎？不，是喜剧的。难怪斯大林宣称，住在苏联已經成为“愉快”的事。甚至共产国际也从一个严肃的角色改变成一个喜剧性的角色了。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8頁。

## (二) 关于“世界革命”

### 一、认为我們的时代是 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认为我們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經濟先决条件的成熟程度已經达到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的頂点”。断言在这个时代，任何党都不能仅仅从“本国条件及其发展趋势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綱領。“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已經永远为民族性綱領敲了丧钟”。說共产国际是作为“世界革命的党”而建立起来的。宣传欧洲“比其他各洲冲突得更加厉害”，“从‘有組織的’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过渡”“特別急驟”。胡說革命中心已从苏联“轉到了西方”。“在我們的时代，只有国际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力量”。

在我們目前的社会状态和社会主义之間还要經歷一个社会革命的大时代，即无产阶级为国家政权而进行公开斗争、夺取政权和运用这个政权使社会关系彻底民主化并把資本主义社会系統地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和解和平靜的时代，正相反，而是社会斗争极其紧张的时代，是人民起义、战争、无产阶级制度的經驗日益扩大、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无产

階級对關於今后民族存在的条件及其与国家和經濟的相互关系問題作出实际的，即直接有效的回答。

摘譯自《和平綱領》(1917年5月)，載于《戰爭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494頁。

有些人教条主义地問：“为什么是欧洲的联合，而不是全世界的聯合？”，这里順便也对这种人作了答复。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詞，而且是某种經濟和文化历史的共同体。欧洲革命不必等待亚洲和非洲的革命，甚至也不必等待澳洲和美洲的革命。然而，沒有德国的革命，俄国或英國的胜利的革命是不可想像的，反過來說也是一样。現在的戰爭被称为世界大战，然而甚至在美国参战以后，作战的仍然是欧洲。而革命的問題也首先摆在欧洲无产阶级面前。

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将仅仅成为世界經濟組織的两个中樞中的一个。另一个中樞将是美洲联邦。

同上，第499頁。

由世界大战和我国革命所开始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是布尔什維主义的一个根本內容。共产国际是作为一个“世界革命的党”而建立起来的。“二十一个条件”中包含着对这个事实的承认。并且，正是沿着这条路線，共产党人同各种各样社会民主主义的“独立的”孟什維克分裂了。

承认戰爭和十月革命开始了世界革命的时代这一事实，当然并不意味着每时每刻我們身边都有立即爆发革命的形势。在一定时期中，在个别的国家里，在个别的生产部門里，“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是能够局部重建其經濟甚至进一步发展其生产力的。世界革命的时代将有它的高潮和低潮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准备，反动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程度，共产国际的正确領導，也就更加重要了。但是，革命的这种涨潮和退潮并沒有改变列寧关于

**当前历史时代的全面根本估計。只有这个估計才能成为共产国际革命战略的基础。**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1—92页。

我們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的时代，即金融資本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中处于統治地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能仅仅或主要从自己本国的条件及其发展趋势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綱領。这个論点对于在苏联疆域以內掌握政权的党也完全适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sup>①</sup>已經永远为民族性的綱領敲了葬钟。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只能以符合目前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和资本主义崩溃的时代——的性质的国际綱領作为自己的基础。国际共产主义的綱領决不是各国綱領的总和，也不是各国綱領共同特点的混合物。国际綱領必須直接从这样一点出发：即以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体系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对它的各种联系和矛盾，也就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依賴的关系加以分析。在目前这个时代，在比过去大得多的程度上，无产阶级必須而且只能从整个世界的方向中找到自己本民族的方向，而不能加以顛倒。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和主要区别正在于此。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3—4頁。

**战略策略一章<sup>②</sup> 根本沒有对帝国主义时代作为和战前时代截然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战略”特点作任何有条理的闡述。**

的确，綱領草案第一章說，整个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特点是

① 这一天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編者注

② 指《共产国际綱領草案》中的有关章节。下文及以下从《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中摘录的言論中提到的“綱領”都是指上述文件。——編者注

“用瓜分和武力夺取尚未被占领的殖民地的方式，使资本主义相对地不断发展和扩大到全世界的时期。”

这种概括的确是十分矛盾的，它显然使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时期理想化了。这个时期是一个充满巨大的震荡、战争和革命的时期，其程度远远超过在此之前的全部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震荡、战争和革命。为了对纲领草案的作者最近提出的荒谬的争辩至少提供部分理由，这种对特点进行牧歌式的描述显然是必要的。他们争辩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根本还谈不上”[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将工业资本主义全部时期的特点说成是“继续发展”是不真实的，但是，另一方面，将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或至少到一九〇五年划为一个欧洲的特别时期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一个矛盾的有机积累的时期，就欧洲内部的阶级关系而论，这些矛盾几乎从未超出合法斗争的范围，就国际关系而论，这些矛盾都使它们自己适应一个武装的和平的局势。这是第二国际发生、发展和僵化的时期，它的进步的历史作用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而完全告终了。

在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力量来考虑时，政治总是落后于经济的。因此，虽然金融资本和托辣斯垄断集团的统治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开始，反映这个事实的国际政治的新时代，在世界政治中首先都是以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和第三国际的建立作为开始的。

由于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经常发生间歇性的阶级斗争，这一新时代的爆炸性特点表现于，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经筋疲力尽，整个说来是不能再前进了。这并不是说，个别的工业部门和个别的国家不能发展，不再发展和甚至不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了。然而，这是在损害而且必然损害其他工业部门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支出，以空前未有的增长比例吞噬着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收入。

因此，由于战前飞速的和几乎不停顿的发展带来的惯性、新的力量对比、世界市场的重新瓜分和战争加深了的矛盾等原因，惯于对世界进行统治的欧洲，现在比其他各洲冲突得更加厉害。正是在欧洲，从“有组织的”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过渡是特别急骤的。

确实，理论上，甚至并不排除资本主义有可能在最强大的、居于统治和主要地位的国家内，取得新的普遍进展。但要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必须首先扫除一个巨大的阶级的障碍，和具有国家与国家之间性质的障碍。它必须绞杀无产阶级革命使其长期不再发生；它必须完全奴役中国，推翻苏维埃共和国，等等。我们距离这种境地仍然远得很。理论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政治上估计会发生的事情根本是两回事。自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于我们自己，即决定于共产国际的革命战略。归根结蒂，这个问题将取决于国际力量之间的斗争。虽然如此，但在作为草拟纲领着眼点的当代，总的讲，资本主义的发展仍面临着不可克服的障碍、矛盾，并疯狂地企图扫除障碍和矛盾。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的时代具有革命的性质，使革命具有不断性。

时代的革命性质并不在于它容许完成革命，即在一切特定时刻都可以夺取政权。它的革命性在于这个时代存在着深刻的和激烈的波动，在于直接的革命形势——换句话说，就是能使共产党能夺取政权的那种局势，——经常会突然转化为法西斯或半法西斯反革命的胜利，再从后者转化为温和的临时政权（“左翼联盟”，社会民主党加入联合政府，政权转入麦克唐纳的党的手中等等），由此立即迫使各种对抗再度达到顶点并尖锐地提出政权问题。

在战前的几十年内，欧洲局势是怎样的呢？在经济方面：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伴随着危机时期的“正常”波动。在政治方面：在牺牲自由主义和“民主”而又没有发生重大动荡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发展。换言之，这是一个经济的和政治的矛盾经常不断

地加剧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讲，它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前提。

战后时期的欧洲局势又是怎样的？经济方面是不定期的、痉挛性的生产萎缩和扩大。虽然若干工业部门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生产大体上环绕着战前水平而波动。政治方面：政治局势时左时右地急剧地摆动。十分明显，在一年、两年或三年内政治局势的陡变，并不是任何基本经济因素的变化造成的，而是由完全属于上层建筑性质的原因和冲激所造成的，因此显示出整个制度的极端不稳定性，不可调和的矛盾腐蚀着这个制度的基础。

革命战略——和策略迥然不同——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其原因正在于此。党和党的领导的新的意义也是由此产生的。

同上，第 79—82 頁。

布尔什维克党从帝国主义大战开始的时候起，并且在十月革命后，就以发展的形式在世界革命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今天，这种地位已经完全丧失了。不仅党的官式的滑稽模拟物是如此。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所处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也使他们不可能在国际范围起到领导的作用。除此以外，苏联的左翼反对派集团只有在新国际顺利组成和成长以后才能发展成为一个新党。革命的中心确定已经转到了西方，在西方，立即建立新党的可能性要大得很多很多。

摘译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 年)，  
纽约 1934 年版第 28 页。

商业、工业、农业和财政方面灾难性的危机，国际经济联系的中断，社会生产力的衰退，阶级矛盾和国际矛盾的极度尖锐化，——这些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日暮途穷，并且充分地证实了关于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列宁主义的论断。

摘译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 年 6 月)，  
纽约 1934 年版第 4 页。

总的說來，無產階級革命的經濟先決條件的成熟程度已經達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能達到的頂點。人類的生產力已陷于停滯。新的發明和改進再不能提高物質財富的水平。在整个資本主義體系陷入社會危機的情況下發生的相互交錯的危機為廣大群眾帶來日益深重的貧困和痛苦。不斷擴大的失業反過來又使國家的財政危機更趨嚴重，并且還破壞本來已不穩定的貨幣制度。民主政權，和法西斯政權一樣，也跌跌撞撞地從一個破產走向另一個破產。

摘譯自《資本主義的垂死掙扎和第四國際的任務》  
(1938年9月3日)，紐約1946年版第5頁。

第四國際並不嚴格區分落後國家和先進國家、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它配合這兩種國家，這兩個革命，使之從屬於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世界鬥爭。既然在我們的時代只有國際無產階級是真正的革命力量，那麼，也只有不斷革命的綱領才是真正消除一切社會和民族壓迫的綱領。

摘譯自《帝國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第四國際緊急會議宣言，1940年5月)，第25頁。

## 二、鼓吹革命在一國勝利後 立即向國際舞台擴展

認為“革命不能不在民族基地上開始”，但“不可能在民族基地上完成”。奪取政權是要“完成一項國際義務”，是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整個戰線上“占領最重要的陣地之一”。革命一旦開始就不能中斷，就必須“不斷地把革命推向前进”，國際主義和階級自衛都要求這樣做。聲稱工人國家的政策“不能降低到仅仅限於本民族的經濟建設”，“如果無產階級專政不發展成歐洲和世界規模，它必

然会朝着它本身崩溃的方向发展”。说什么“欧洲工人的失败将把我们抛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变为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说革命“在民族阵线和世界阵线这两个决定性阵地上站稳以前，是决谈不到它的完全胜利的”。只有“在整个星球上获得最终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主要历史斗争的结局”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此外，俄国无产阶级在执掌革命赋予的政权的同时，将做到环境所规定的一切，以便立即把本民族事业的命运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直接联系起来。不仅无产阶级政策的一般国际主义原则要求这样做，——阶级自卫的威严的要求也将迫使它走上这条道路。

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在打破我们伟大革命的民族框子，并使之成为劳动取得世界胜利的序幕的条件下，才不会被赶回去，才能够把我们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摘译自《三十五年以后，一八七一——一九〇六年》  
(马克思著《巴黎公社》一书序言，1905年12月)，载于《巴黎公社》彼得堡1906年版第XXI页。

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归结为下面的一句话：“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sup>①</sup>。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

<sup>①</sup>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托洛茨基这里指的是列宁1915年在该报发表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1页)。——编者注

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經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間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間消极等待的思想所暗中頂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說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們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国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論都证明了的。**

**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会意味着成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那种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瓦揚至死还认为法国是社会革命的福地，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主张护国到底。連奇等人(有的是虛伪地，有的是真誠地)认为，德国的失敗首先意味着社会革命基础的破坏。最后，我們的策烈铁里和切尔諾夫之流在我们的民族条件下重复法国内閣主义的极为悲惨的試驗时宣誓說，他們的政策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因此同盖得和桑巴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不应当全然忘記，除了最庸俗的改良主义，在社会爱国主义中还有民族-革命救世主义在作祟，这种救世主义认为，正是自己的民族国家，由于工业水平、或者由于民主形式和革命成就而負有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或“民主制”的使命，如果革命在一个比較有准备的民族的范围内取得胜利是真的可以想象的話，那末同护国的綱領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救世主义就会有其相对的历史依据了。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存在的。用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联系的办法来为保存革命的民族基地而斗争，这就是在实际上挖革命的墙脚；**革命不能不在民族基地上开始，但是在目前欧洲各国經**

济上和軍事政治上处于相互依賴的情况下（这种相互依賴正是在目前这場战争中空前有力地暴露出来了），革命是不可能在民族基础上完成的。欧洲联邦口号也就是这种将直接促使欧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行动一致的相互依賴的表現。

摘譯自《和平綱領》（1917年5月），載于《戰爭与革命》  
莫斯科1925年版第2卷第499—501頁。

孟什維克国际主义者，馬尔托夫同志的同道們，与我們相反，他們否认对政治任务的社会革命的提法。他們在自己的政綱中宣称：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所以我們的任务只能限于建立資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整个議論是建立在完全践踏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和国际任务之上的。如果說世界上只有俄国，那末馬尔托夫的議論或許是对的。可是，問題却在于消灭世界大战、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世界无产阶级包括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向俄国的工人进行解释：說俄国的命运現在跟欧洲的命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必将保证我們更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反过來說，欧洲工人的失敗將把我們抛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变为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不是使我們的全部策略服从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总目标和总任务，馬尔托夫同志反而从具有局限性的民族的框子来看俄国的革命，并把革命任务归結为建立資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样提問題是根本錯誤的，这种提法籠罩着一种导致第二国际崩溃的該受詛咒的民族局限性。

馬尔托夫同志在实践上把自己局限于民族的前景，因而还保留着跟社会爱国派在一个組織內和睦相处的可能。他希望跟唐恩和策烈铁里一起熬过那种将和战争同时消失的民族主义的“疫病”，然后又指望与他們一起回到“正常的”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来。把馬尔托夫跟社会爱国派联結在一起的并不是空洞的派別传统，

而是对社会革命所抱的程度极深的机会主义态度，把社会革命看作是不能决定今天任务的安排的遥远目标。而这就把他跟我們分开了。

**夺取政权的斗争，对于我們不只是当前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不，这是完成一項国际义务，这是在同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整个战线上占领最重要的阵地之一。**正是这一基本观点，决定着我們对待所謂民族自卫的态度。战綫暂时移动到某个方面，既不能使我們停止，也不能使我們放弃反对資本主义基础本身的斗争，这种資本主义已到了使各国人民进行帝国主义的互相殘杀的地步。

**不断革命反对不断屠杀！这就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

摘譯自《国际主义的策略》(1917年9月)，  
載于《无产者报》1917年9月6日第10号  
第4—5版。

**德国的处境异常严重。只有本来應該拯救我們的东西，即敌人國內爆发的革命（而这一次是在法国和英国），以及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和扩大，能够拯救它。但是，为了使这一切能更迅速、更正确地发生，需要使德国本国的革命沿着自己的自然的道路繼續前进，需要撤換胆小的妥协派，因为他們力图縮小、誣蔑和麻痹德国革命，把它限制在資产阶级的框框里，使它丧失它所應該發揮的那种鼓动力量，——一句話，需要使李卜克內西領導的革命政府代替謝德曼分子和艾伯特分子。**

摘譯自《捍卫世界革命》(1918年11月8日)，載于《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莫斯科1923年版第1卷第383頁。

至于說到“不断革命論”，我认为沒有理由要擯弃我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和一九〇六年以及后来就这个主題所写的一切。在今天看来，我仍坚决认为在当时我所發揮的思想，整个說来要比当

時許多布尔什維克同志所寫的更加接近于列寧主義的真諦。

“不斷革命”這個術語是馬克思對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所用的一個術語。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當然不是在那些修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獻而是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中——，這個術語是被公認的。弗蘭茨·梅林曾用這個術語來說明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革命。“不斷革命”這個術語忠實地翻譯出來也可以譯為“永久革命”或“不間斷的革命”。這個術語所包括的政治概念究竟是什么呢？

就我們共產黨人說來，在既經取得這一個或那一個政治成就之後，在實現了這種或那種社會改革之後，革命並不就此完結，它仍舊繼續向前發展，而它的唯一界限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因此，革命一旦開始（既然我們參與其間，特別是當我們在領導革命的時候），不論在哪一個形式階段上，我們都決不能使它中斷。反過來說，只要革命運動的所有潛力和所有資源尚未耗盡，當然我們就要根據情況繼續不斷地堅持把革命推向前进去。這不僅適用於一個國家內的革命勝利同時也適用於革命在國際舞台上的發展。

對俄國說來，這個理論意味著：我們需要作為政治上最高成就的並不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甚至也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而是受到農民支持並開辟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紀元的工人政府。<sup>①</sup>

可見，不斷革命這個概念是和布尔什維主義的基本戰略方針完全符合的。

摘譯自《對農民的“估計不足”》（1923年年底），  
載於《新方針》，倫敦 1956 年版第 52—54 頁。

布哈林說，就世界範圍而論，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力量對比絲毫

---

<sup>①</sup> 參看列·托洛茨基著《總結與展望》，俄文版。——托洛茨基注

不比苏联現在的情况更为有利。因此，如果說由于落后状态而不可能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那末在世界經濟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这种議論值得作为煩瑣思維的典范編进所有的辩证法教科书里。

首先，很可能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对比与苏联國內这两者的力量对比沒有多大差別。但是，世界革命决不是按照算术平均数的方法来完成的。順便說一句，民族革命也不是这样完成的，例如，十月革命首先是在无产阶级的彼得格勒发生和巩固的，并沒有选择工农之間的力量对比与全俄国一般情况相当的地区。在彼得格勒，随后在莫斯科，产生了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以后，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不得不花几年的时间去推翻边远地区的资产阶级；只是作为被称作革命的这个过程的結果，才在苏联境内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間現有的力量对比。革命不是按照算术平均数方法发生的。它可以在比較不利的陣地开始，但是在它在民族陣綫和世界陣綫这两个决定性的陣地上站稳以前，是决談不到它的完全胜利的。

其次，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对比(假定技术已达到“一般的”水平)，也不是解决問題的唯一因素。除此以外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战争。包围着苏联的不是工人和农民的世界，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假若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被推翻，那末这个事实本身仍然既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对比，也不会改变苏联国内以及全世界的一般技术水平。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会立即获得絕非目前所可比拟的完全不同的机会和規模。

第三，假定每个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已經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国家界限，那末按照布哈林的理論，就應該得出这样的結論：所有国家的生产力加在一起，就超出了我們所在星球的界限，因此社会

主义非在太阳系的規模上建立不可了。

我們再說一遍，从工农平均比例出发的布哈林式的論证必須編进所有政治入門的教科书，自然它在教科书中所占的位置不能同現在一样(現在是为了替一国社会主义理論辯护)，它在教科书中應該作为煩瑣詭辯同馬克思主義辯证法完全不相容的一个证明。

摘譯自《列寧以後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 1936 年版第 59—61 頁。

當綱領草案說苏联的經濟成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它表达的思想是无可非議的。但是，这个新理論在政治上的危险性在于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两种杠杆——一种是我們的經濟成就，另一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了錯誤的比較。沒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我們就不能建設社会主义。欧洲工人和全世界工人必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經濟建設的杠杆是极为重要的。沒有正确的領導，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它的垮台将使国际革命遭到許多年都无法复原的打击。但是，社会主义世界和資本主义世界之間的主要历史斗争的結局决定于第二种杠杆，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苏联的巨大重要性在于它是世界革命爭夺的基地，根本不在于它能够独立于世界革命以外而建成社会主义的这个假設。

同上，第 63 頁。

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地发展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彻底地解除外部和內部的危机。对于馬克思主义者來說，这是最起碼的常識。但是这种看法和布哈林主义的經院哲学給我們描绘得娓娓动听的絕望的宿命論之間存在着一道无法填补的鴻沟。危机是各种各样的。資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决定它是无法摆脱危机的。这絕不是說占統治地位的資产阶级的政策无足輕重。正确的政策可以促进資产阶级国家的发展，錯誤的政策則使它們遭到毁灭或阻碍。

官方的經院哲学完全不能理解在机械决定論(宿命論)和主观自我意志之間还存在唯物主义的辯证法。宿命論认为：“面临如此落后的状况，什么也办不成。”庸俗的主观主义认为：“这有何难！我們有决心，我們要建設社会主义！”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你意識到自己对世界局势和国内落后状况的依赖，那末，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你就可以爬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进入胜利的世界革命。”

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坚定而巩固地夺得政权以前，过渡性的苏维埃政权发生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統治政策的任务就是要防止苏维埃政权内部危机的积累，使它不至发展成为整个政权的危机。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是维护、发展和加强作为統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地位和自觉。而一个能够独立行动的、灵活而积极的无产阶级政党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的工具。

同上，第 298—299 頁。

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社会所創造的生产力不再能同民族国家的界限协调一致。因此，一方面产生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就产生一种资产阶级的欧洲联邦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一种在更新的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只有当新社会在我們整个星球上获得最终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

摘譯自《不断革命論》(1929 年)，  
伦敦 1962 年版第 155 頁。

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即在取得政权的时候說过：“如果欧洲人民不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我們就会被打倒，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俄国革命将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就是各国

**資本家將扼殺我的革命。”**當時會議席上有一人喊道：“還有第三條道路！”也許，這是斯大林的喊聲吧？不是，這是一個孟什維克的喊聲，這是在布爾什維克發現那個“第三條道路”以前若干年的事。

摘譯自《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1932年），載于《俄國革命史》倫敦1936年版第1231頁。

**工人國家的正確政策不能降低到仅仅限于本民族的經濟建設。如果革命不循着无产阶级的螺旋綫向国际舞台扩展，那它必然会开始沿着官僚的螺旋綫局限于民族范围内。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发展成欧洲和世界規模，它必然会朝着它本身崩溃的方向发展。作为广泛的历史远景，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无可爭辯的。**

摘譯自《蘇聯與第四國際》（1934年），  
紐約1934年第4頁。

### **三、說我們的直接責任是用武裝力量 幫助其他国家革命**

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革命戰爭的時代”。“使革命扩大到毗邻的国家并拿起武器支持这些国家的起义是极为必要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将不可避免地要“和世界反动势力的列強作战”。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必須突破民族国家的范围，开展軍事进攻，进行世界革命，用武装力量帮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对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的可耻的背叛”。攻击斯大林的“我們不要別人一寸土地”的公式，說这“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攻性质根本矛盾的、維持現狀的保守綱領”。

革命胜利后，只能把政权交给能依靠城市的武装人民即无产阶级民警的政党手里。社会民主党执掌政权后就处于最深刻的矛盾之中，它不能用“只是民主主义专政”的天真的幌子来克服。工人政府的“自我限制”不是别的，而只会是为了实现共和国而叛卖失业者、罢工者、以至全体无产阶级的利益。在革命政权面前摆着种种客观的社会主义任务，但是要解决这些任务在一定阶段上就会和国家的经济落后发生冲突。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内没有摆脱这种矛盾的出路。**在工人政府面前从最初起就提出下列任务：使自己的力量和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它的暂时的革命统治才会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序幕。因此不断革命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阶级自卫的要求。如果工人政党缺乏足够的革命-进攻<sup>①</sup>政策的主动性，并且打算转向于巴巴的只是民族的和只是民主主义的专政，那么欧洲联合起来的反动派将会毫不迟延地对它说明，执掌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把全部政权放在天平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边去。**

摘译自《我们的意见分歧》(1909年)，载于《一九〇五年》  
莫斯科1922年第2版第286页。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作进攻的尝试，那么，对苏维埃俄国来说，主要的义务就是在革命斗争中不考虑民族的界线。德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是我们自己的斗争。苏维埃俄国感到自己只是德国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但是，不能排除革命的德国在一定时期内即几个月内有击退帝国主义匪帮的可能性。而预见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一个拥有全部技术的德国无产阶级和我们无组织的、但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二亿人口的俄国将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帝国主义的一切风浪**

---

<sup>①</sup> “进攻”也可译作“侵略的”。——编者注

都將被它粉碎。對我們來說，不可能有帝國主義陣營中的同盟者。同帝國主義進行着公開鬥爭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陣營才是我們的同盟者。李卜克內西用不着和我們簽訂條約，沒有條約我們也將竭盡一切力量和使用一切手段在鬥爭中幫助他。為了共同的無產階級的世界鬥爭，我們將獻出一切。在宣讀過的列寧同志的信里明顯地和清楚地指出，要竭力建立一支百萬人的軍隊來保卫蘇維埃共和國。這個綱領是狹隘的。歷史在說：你們的任務不仅是保證喘息时机，你們的任務已經變得更加廣泛。因為在德國和整個中歐，危機正在成熟。也許，德國的工人階級明天就向你們求援，因而你們所要建立的不是一百萬人的軍隊，而是二百萬人的軍隊，因為你們的任務已經加重了兩三倍。我們已經準備把我們的力量加強兩三倍。它們正在天天增長。德國無產階級忍受的飢餓比我們多。但願它去奪取政權，但願它把政權奪取到手，並且依靠它來幫助我們整頓鐵路，而我們將從薩馬拉省和頓河區——我在那裡見到有取之不盡的糧食儲藏——取得豐富的糧食，並且為了共同鬥爭的勝利而和德國工人階級兄弟般地分享它們。這是俄國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意志，因為這裡聚集著他們的賦有聲望和威信的代表——俄羅斯共和國的優秀分子。這裡有中央執行委員會、莫斯科蘇維埃、工會和工廠委員會的代表。這是俄國的精華和意志。當德國工人階級進行鬥爭的時候，我們將完全和他們站在一起。作為共產黨人，我們要把我們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伸延到德國工人階級中去。我們的一切就是他們的一切。我們的力量和糧食就是他們進行共同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和糧食。

摘譯自《國際局勢》（1918年10月3日），載于《革命是怎樣武裝起來的》莫斯科1923年版第1卷第372—373頁。

一九〇五年我們有個很大的優越性，這就是在革命序幕的時代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已經用認識歷史過程的科學方法武裝起來

了。这使得有可能从理論上来搞清楚那些历史的物质过程只給予某些暗示的关系。南俄一九〇三年混乱的七月罢工已提供了作出下列結論的材料，即俄国革命的基本方法是无产阶级的总罢工及其随后向武装起义的轉变。明显地证实了这一預測的一月九日的事变，要求具体地提出革命政权問題。从这时起，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尖銳地提出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内部阶级动力的問題。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論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統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絕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內，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

虽然事隔十二年，这种估計却完全被证实了。俄国革命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完成。它必須把政权交给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还无力夺取政权，它是被迫在六月三日政变后的沙皇制度下的地下活动中、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壮

大和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依据其老一辈在一九〇五年获得的經驗，在一九一七年掌握了政权。年轻的工人們应当掌握这些經驗，应当知道一九〇五年的历史。

摘譯自《〈一九〇五年〉第一版序言》(1922年)，載于《一九〇五年》莫斯科1922年第2版第3—5頁。

人們將對我們說，并且現在也這樣說：在決議和法令中，紅軍的国际作用、特別是为革命的进攻战争作准备的必要性強調得不够。佐罗明特別重視这一点，他在同一个地方（第22頁）写道：“……我們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阶级军队，一支工农军队，不仅是为了防御资产阶级和容克的反革命，而且也是为了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革命战争（无论是否是防御性的或是进攻性的），为了半內战（？）型的战争。在后一种战争中，进攻性的战略能够起巨大的作用。”可見这就是佐罗明的启示，这就是他的革命的斋期福音。但是很可惜，如果我們的作者自以为发现了什么崭新的东西，那他就犯了大錯誤，就象使徒常常犯錯誤一样。他只是很糟地表述了已有的东西。正因为战争是政治通过手中武器的继续，所以关于革命战争在工人阶级世界革命的发展中能够和應該起什么作用的問題，对我们党來說，过去不可能現在也不可能有原則性的爭論。这个問題在俄国馬克思主义的报刊上并不是从昨天起才被提出并得到解决的。我可以引证党的报刊上的許多社論尤其是帝国主义大战时期以来的社論，在这些社論中，一个工人国家的革命战争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我要追溯更远的过去并引证我自己在一九〇五年所写的几段話。

“这点（俄国革命的发展）一开始便赋予正在展开的事件以国际的性质，并开拓了一个最伟大的前景：俄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解放把领导者提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使他掌握了巨大的力量和手段，并使他成为在世界上消灭资本主义——历史已經为

它提供了一切客观前提——的开路先鋒。

**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在暂时取得政权的情况下不是出于自己的主动把革命推行到欧洲的土地上，那末，欧洲的封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将迫使它这样去做。**

現在來預測俄国革命將通過怎样的道路去干涉老資本主义的欧洲，这自然是白費力气，因为这条道路可能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們打算談談作为联系革命的东方和革命的西方的鏈环的波兰問題，这与其說是預言，倒不如說是为思想提供例证。

俄国革命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波兰革命的胜利。不難想象，俄属波兰十个省的革命制度將必然使加里西亚和波茲南行动起来<sup>①</sup>。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政府將把他們的军队集中到波兰边境上回答这一点，以便然后越过边境并在敌人的中心华沙打击他們。无疑，俄国革命是不会听任它在西方的先头部队落在普魯士-奥地利大兵的手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威廉第二及弗兰茨·約瑟夫的政府作战对于俄国革命政府來說将成为自卫的法律。那时德国和奥地利的无产阶级將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无疑，他們不会漠不关心地旁观本国军队的反革命十字軍征伐。封建-资产阶级的德国反对革命的俄国的战争必然意味着在德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让那些认为这种断言过于絕對的人去臆想另一个更适合于把德国工人和德国反动势力推上公开的力量較量的道路的历史事件吧。”（見托洛茨基《我們的革命》（1906年），俄文版第280—281頁）

当然这些事件沒有按照在十六年前的这几段話中仅仅作为假設并且为了叙述生动而預先描繪的历史順序发生。但是整个的历史进程已經证明并且今后还要证明这一預言：无产阶级革命的时

---

① 我回想起，这是我1905年写的。——托洛茨基注

代將不可避免地變成革命戰爭的時代，年輕的俄國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這就將不可避免地把它推向和世界反動勢力的列強作戰。可見我們在十五年以前就已經基本上弄清楚我們將必須創造“什麼樣的軍隊”以及“為了什麼任務”而創造它。

摘譯自《軍事學說還是臆造的軍事空談》(1922年)，載于《共產國際》雜誌德文版1922年第9期第148—149頁。

同志們，要知道我們總是肯定，我們的革命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可能時間拖得長些，但它的勝利是有保證的，和它一同到來的是我們的勝利。我們總是痛斥以社會主義命運和他們個別國家聯在一起為辯護的愛國的機會主義者，不論這班愛國者是否還向革命獻媚，或者象他們大多數人那樣完全拒絕革命而採取改良主義的綱領。另一方面，我們總是說，如果情況使一國的無產階級有可能向前推進，掌握政權，開展社會主義建設或軍事進攻，或者，確切些說，兩者一同開展的話，它沒有權利去等待別的國家，因為世界革命也正是在這樣擴展的。我們的黨作為無產階級的領導者掌握了政權，我們建設着社會主義，我們以此向世界無產階級提供偉大的范例，我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日益鞏固我們的國家，這種種對於我都是不言而喻的。爭論的難道是這個嗎？但正因為如此，正因為我們是世界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個部分，用自己的建設參加世界革命的勝利發展，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不能要求有什么特別的保證，使我們能不依賴世界革命而在我們建成社會主義。而在這種情況下還竟然說，如果我們要求（向誰要求？）這種保證而不可得，我們就該辭職，把事情歸之為內閣危機，並轉為蘇維埃國家的在野黨。這樣提問題難道不是偽善透頂嗎？

摘譯自《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的發言》(1926年12月)，載于《真理報》1926年12月14日第289號。

如果我們从一个国家发展甚至完成社会主义的概念出发，事情就完全变样了。我們今天有一种“理論”，說什么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說什么这个国家和資本主义世界的相互关系可以建立在“中立”世界資产阶级的基础上(斯大林)。如果采取这种基本上是民族改良主义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观点，那末就没有必要、至少是不象原来那样必要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但是，从我們的观点来看，这个口号是重要的，十分必需的，因为它包含着对孤立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譴責。对于每一个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來說，使革命扩大到毗邻的国家并拿起武器支持这些国家的起义是极为必要的，甚至比对苏联更为必要——当然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这样說并不是出于任何有关国际团结的抽象的考虑——仅仅这些考虑是不能使各个阶级行动起来的——，而是出于列宁曾經千百次提出过的那些重要理由，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国际革命的支持，我們就无法支持下去。苏維埃联邦的口号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进程，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在所有国家內同时爆发，但是它会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要求这些国家——特别是在欧洲范围内——为了抵抗最强大的外部敌人和进行經濟建設而建立最紧密的联系。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16—17頁。

极左派抛弃了阶级观点，采取抽象的民族观点，就必然从革命的立場滾到純粹和平主义的立場上去。魯钟叙述苏联军队当时如何占領西伯利亚铁路，后来“紅軍”又如何“按照列宁的反帝国主义的政策，小心地在中国边境上停下来了，再也沒有試圖重占中东铁路区”(《无产阶级革命报》第228頁)。原来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任务：在国家的边界上应当把自己的旗帜小心地放下来。照魯钟的意思，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的本质就在于此！讀

到这一种“一国革命”的哲学真令人难堪。紅軍之所以在中国边境前停下来，是因为它的力量还不足以越过边境，并抵挡日本帝国主义的必然的攻击，如果紅軍当时有足以展开这次攻势的力量，那末它就應該采取攻势。如果紅軍拒絕为中国工农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向帝国主义的力量展开革命的攻势，那就不仅沒有实行列宁的政策，而且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的可耻的背叛。魯钟之流的不幸到底在什么地方？就在他用民族和平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国际革命的政策。这与列宁毫无共同之处。

紅軍当时攻进了孟什維克的格魯吉亚，帮助格魯吉亚的工人起来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权，第二国际直到如今还在痛罵我們。在格魯吉亚住的是格魯吉亚人，而紅軍主要是由俄罗斯士兵組成的。在这个过去的冲突中魯钟站在哪一边呢？

对一九二〇年夏天向华沙进军又怎样呢？魯钟也許知道，我当时是反对这次战役的。然而我之所以反对，純粹是从实际出发的。我认为波兰的劳动群众来不及起义（因为战争的进展通常比革命快），而且远离我們的根据地，我觉得这对我們有危险。后来的事件证明了这个預見的正确：向华沙进军是一个錯誤。然而这不过是实践上的錯誤，絕不是原則上的錯誤。如果那时的物质条件好一些，我們首要的义务就是要用武器来援助波兰革命，正如我們应当援助所有其他革命一样。然而，那时正是劳合·乔治、邦納·劳首先罵我們是赤色帝国主义。社会民主党又照样責罵，极左派不知不觉地从那里接受了这套罵法。

魯钟反对革命的“干涉”，牛头不对馬嘴地提出了老的而又毋容爭辯的原則：“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个原則是就民族范围說的嗎？是仅仅就一国范围說的嗎？一国的工人可不可以援助其他国家的罢工工人？他們可不可以送武器給起义的工人？如果他們有军队，可不可以派他們的军队去援助起义者，或

**者去发动起义，犹如罢工工人派自己的队伍去发动留在车间里的工人罢工一样？**

摘译自《保卫苏联与反对派》(1929年9月7日)，  
巴黎版第15—17页。

37、苏联政府有权在同帝国主义者的任何协定中以最大的精确性确定侵略的定义，对于这种权利，我们决不能争论。但是如果企图把这个有条件的合法主义公式变成调节国际关系的最高准绳，那就是要用保守主义的标准来代替革命的标准，而把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降为保卫以用武力兼并建立起来的现有边界了。

38、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认为，革命战争和起义同样是无产阶级政策的一种手段。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不是取决于对“侵略”作出的合法主义定义，而是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战争的问题。在国与国的冲突中，也和在阶级斗争中一样，“防御”与“侵略”仅仅是实际的权宜的问题，而不是法律标准或伦理标准的问题。单一个侵略标准只能为莱昂·勃鲁姆和王德威尔得等人的社会爱国主义政策创立一个支座，这些人是由于凡尔赛条约才有可能在保卫和平的幌子下保卫帝国主义的赃物的。

39、斯大林的著名的公式“我们不要别人的一寸土地但也不放弃自己的一寸土地”，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攻性质根本矛盾的、维持现状的保守纲领。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模糊民族国家的反动作用，使人们安于民族国家，把民族国家理想化，并削弱革命的国际主义的重要意义。

摘译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纽约  
1934年版第18—19页。

**我们取得胜利以后，在一九一九年建立了共产国际。我们不止一次地宣称，革命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责任去援助被压迫**

的和起来反抗的阶级，而且不仅是思想上进行援助，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拿武器去援助。我們也并没有局限于只是三番五次地宣告这一点。我們在我们自己那个时期曾经用武装力量去援助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工人。我們曾经试图以紅軍进攻华沙的行动去援助正在暴动的波兰无产阶级。我們派遣了組織者和指揮官去帮助中国人革命。一九二六年我們募集了千百万卢布去援助英国的罢工工人。而现在，所有这些似乎都变成誤会。是悲剧的誤会嗎？不，是喜剧的。难怪斯大林宣称，住在苏联已經成为“愉快”的事。甚至共产国际也从一个严肃的角色变成一个喜剧性的角色了。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8頁。

作者在报刊上答复了古謝夫，請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革命进程中，外国軍事力量只能起輔助性的作用，而不能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在有利的条件下，它們才能加速革命的完成和促进胜利的到来。“軍事干涉就象医生的产鉗一样。运用得及时，就可以減輕分娩的痛苦；运用得过早，就只能造成流产。”(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

同上，第153—154頁。

波兰军队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占领了得文斯克，迫使紅軍放弃了拉特加利亚，在三月間占领了莫泽尔，并且在波兰的“解放者”約瑟夫·皮尔苏茨基亲自統率下，在四月間会同已經垮台了的佩特留拉政府的部队，向乌克兰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虽然紅軍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作战的，然而苏維埃政府的目标却不仅是要打退进攻，而且要把布尔什維克革命引入波兰，并由此为共产主义打开进入欧洲的大門。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冊第427頁。

## 四、宣传“欧洲联邦”是我們 这个时代的口号

宣称“‘欧洲联邦’是我們已經进入的革命時代的口号”，是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可以設想的形式”。說什么民族国家已經成为“經濟发展的主要障碍”，它“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框框，作为阶级斗争的基地，因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都已經过时了”。欧洲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永远保持边界，而是通过革命来废除边界。断言“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組織起来”。认为世界經濟組織的另一个中樞将是“美洲联邦”。只有“南美和中美苏維埃联邦”才能使南美和中美人民“摆脱落后和被奴役状况”。欧洲联邦将“通过苏联这个桥梁扩大到亚洲，从而实现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邦”。

资本主义所发展的生产力，已經突破民族和国家界限。民族国家，即当前的政治形式，对于这些生产力的运用来說，已嫌过于狭窄。因此，我們經濟制度的自然趋势，乃是力求打破国家疆界。整个地球，陆地与海洋，地面和地下，都已变成一个經濟工場，地球的各个部分已彼此不可分离地連結着。這項工作是由資本主义来完成的。与此同时，這項工作的完成也促使資本主义国家使世界經濟服从各国资产阶级的利潤收入。帝国主义的政治首先证明：在一七八九——一八一五年，一八四八——一八五九年，一八六四——一八六六年以及一八七〇年等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旧式的民族国家，已經衰老，它現在已經成为經濟发展的不可容忍的障碍。

当前的战争，归根結蒂是生产力对于民族和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一种反抗。它意味着作为一个独立的經濟单位的民族国家的瓦解。

民族，作为一种文化的、思想的和心理的事实，还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它的經濟基础却已被从脚下抽去了。一切有关的談論，說当前这次流血冲突是保卫民族的結果，不是伪善，就是盲从。相反，战争的真正的和客观的意义，乃是摧毁当前的民族經濟中心，而代之以世界經濟。但是各国政府謀求的解决这一帝国主义任务的方法，不是通过全人类生产者的明智的、有組織的合作，而是通过战胜国資本家阶级对于世界經濟的利用；而战胜国經過这次战争，就会从一个大国变成一个世界强国。

战争宣布了民族国家的沒落。但同时它也宣布了资本主义經濟制度的沒落。資本主义利用民族国家已使世界上全部經濟制度进行了革命。它把整个世界瓜分給少数大国巨头，大国周围是处在列强角逐之中的它們的卫星国，即弱小国家。建立在資本主义基础上的世界經濟的未来发展，意味着无休止地爭夺資本主义剥削的新而又新的場所，而这种場所却只能得自这同一个唯一的来源——地球。在軍国主义旗帜下进行的經濟竞争，是与破坏人类經濟基本原則的掠夺和毀坏行为不断交替的。世界生产不仅反抗着由民族和国家的区分而产生的混乱，而且也反抗着現在业已陷入野蛮的无政府状态中的资本主义經濟制度。

.....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对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說来，問題不在于保卫这个过时的和陈旧的民族“祖国”，因为它业已变成經濟发展的主要障碍。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創立一个远为强大的、更能抵御强敌的祖国——欧洲共和联邦，以作为世界联邦的基础。

无产阶级只能用社会主义的世界經濟組織作为現时的实践綱

**領，来对付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混乱局面。**

战争乃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登峰造极阶段，用以寻求解决其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方法。无产阶级只能用它自己的方法，即社会革命的方法，来制止战争。

摘譯自《布尔什維克与世界和平》(原名《战争与国际》)(1914年10月)，紐約1918年版第20—23, 28—29頁。

因此，預計會給生产者和消費者以及整个文化发展带来巨大好处的欧洲經濟聯合就成了欧洲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及其工具——軍国主义作斗争中的革命任务。

因此，**沒有君主政体、常备軍和秘密外交的欧洲联邦是无产阶级和平綱領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摘譯自《和平綱領》(1917年5月)，載于《战争与革命》莫斯科1925年版第2卷第495頁。

如果德国軍国主义像普魯士軍国主义当时实现德国的半統一一样，真正得以强制实现欧洲的半联合，那么欧洲无产阶级的中心口号会是什么呢？是废除强制实行的欧洲联合和让一切民族返回到孤立的民族国家的屋頂下去嗎？是恢复“自治的”关卡、“民族的”貨币、“民族的”社会立法等等嗎？自然不是。在保持和继续发展已实现的联合的基础（如完全消灭关税壁垒，统一立法、首先是工人立法以及其他等等）的同时，消灭其强制和反民主的形式将会成为欧洲革命运动的綱領。換言之，**沒有君主政体和常备軍的欧洲联邦口号在上述情况下就会成为欧洲革命的联合的和指导性的口号。**

同上，第496頁。

但是現在，在俄国革命的大有希望的开端之后，我們有一切理

由期望，就在这次战争期间，强大的革命运动会在全欧洲开展起来。很明显，它只有作为全欧的运动才能顺利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内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它必然会遭到毁灭。我们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指出了威胁着俄国革命的来自德国军国主义的危险。这种危险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危险。对俄国革命来说，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军国主义比起霍亨索伦王朝的军事机器来，并不是威胁性更小的敌人。拯救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把革命转到整个欧洲去。如果革命运动在德国扩展开来，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就会在西方的“敌对”国家中寻找并找到革命的反响；而如果欧洲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政权，那么即使仅仅是为了掌握住这个政权，它也会不得不立即使这个政权去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换言之，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建立，只有在全欧洲的幅员之内，也就是说在欧洲共和联邦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像的。在这种情况下，靠武力、靠工业和外交协定都不能取得的欧洲的国家联合就会成为得胜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项迫切任务。

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不管今后军事行动的进程如何，不管外交对目前的战争如何总结，不管革命运动在最近时期的发展速度如何，欧洲联邦口号在一切情况下都将作为欧洲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政治公式而获得巨大意义。这一纲领中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框架，作为阶级斗争的基地，因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都已经过时了。只有当我们把建立新的、更高级的革命“祖国”——共和欧洲的进步任务同保守地保卫过时的民族祖国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对“保卫祖国”这一过时的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否定才不再成为在思想政治上的自卫的纯粹消极的行动，而获得自己的全部革命内容。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

能把全世界組織起来。

.....

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将仅仅成为世界經濟組織的两个中枢中的一个。另一个中枢将是美洲联邦。

同上，第 497—499 頁。

真正能够保证民族发展自由的民主共和的欧洲联合，只有通过反对軍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和王朝的集权制的革命斗争，通过各个国家的起义，通过把这些起义汇合成全欧洲的革命才有可能。但是，得胜的欧洲革命——不論它在个别国家遇到什么样的波折——由于沒有其他的革命阶级，只能把政权轉交給无产阶级。可見，欧洲联邦首先是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也是唯一可以設想的形式。

同上，第 502 頁。

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曾經幻想过欧洲联邦。这个理想在这次战争的第一个时期，在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言論里得到了虚伪的和为时已晚的反响。资产阶级不可能使欧洲联合起来，因为它把民族帝国主义的分割願望和经济发展的联合趋向对立起来了。要把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就必须把经济从私有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民族发展的要求納入自然的合理的疆域之内，把各民族結合在劳动协作的統一体中：这就是欧洲各族人民在自由自决基础上所建立的欧洲苏維埃共和国联盟。其它的解决办法是没有的。如果英国在革命的发展中落后于大陆，那么这个联盟将反对英国。当大洋彼岸的美国仍然是金元共和国的时候，当紐約交易所內洋洋得意的猪哼声还没有变成临死前的沙哑声的时候，欧洲联邦将和苏維埃英国一起把自己的斗争鋒芒指向

## 北美的帝国主义专政。

摘译自《由混乱构成的秩序》(1919年1月13日)，  
载于《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第2卷第1分册  
莫斯科1924年版第12—13页。

《和平纲领》按其内容来说同编在第一卷中的《战争与国际》是紧密地衔接在一起的。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民族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在落后的一国抗拒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这个时期为革命-国家的自卫而进行的斗争使生产力大为下降；而只有在生产力增长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以想象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租让、热那亚会议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鲜明的证据。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能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欧洲不仅是地理上的术语，而且是经济和政治上的术语，最近几年的事件：欧洲的衰落，美国实力的增长，劳合-乔治借助于把帝国主义的与和平主义的方法同时并用来“拯救”欧洲的尝试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欧洲工人运动处在防御、积聚力量和准备的时期。夺取政权的公开革命战斗的新时期必然会提出革命欧洲各族人民相互之間的国家关系問題。唯一能够綱領性地解决这个問題的办法是欧洲联邦。既然俄国的經驗提出了苏維埃国家这一最自然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既然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先鋒队在原則上接受这种国家形式，那就可以設想：在恢复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欧洲无产阶级将提出欧洲苏維埃联邦共和国的綱領。俄国在这方面的經驗是极为有益的。它证明在无产阶级制度下，最广泛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同經濟上的集权制是完全相容的。在这种意义上說，轉譯成苏維埃国家語言的欧洲联邦口号不仅保持着自己的全部意义，而且看来还刚刚开始預示出自己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时代中的巨大意义。

譯自《〈和平綱領〉跋》(1922年)，載于  
《战争与革命》莫斯科1925年版第2  
卷第503頁。

一九一五年，我們在为欧洲苏維埃联邦口号辩护时曾經指出，关于不平衡发展的規律本身并不能作为反对这个口号的理由，因为不同国家和不同大陆之間的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这个情况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欧洲国家的发展相互之間是不平衡的。然而，可以象历史事实一样絕對肯定，至少在我們考察的这个历史时期內，这些国家里面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以美洲超过欧洲的程度超过其他国家。对于美洲有一种衡量不平衡的尺度，而对于欧洲則需要另一种尺度。欧洲各国之間的紧密的有机联系是地理和历史条件决定的，是无法擺脫的。現代欧洲的資产阶级政府象一伙綁在同一个車上的杀人犯。如前所述，欧洲的革命归根結底将会对美洲也发生決定性的影响。但是，从直接影响來說，从历史发展的直接順序來說，德国发生革命对法国比对美国的影响要大得无可

比拟。欧洲苏维埃联邦这个口号的政治生命力正是来自这种历史上一脉相传的关系。我們談的是它的相对的生命力，因为这个联邦理所当然地将会通过苏联这个巨大的桥梁扩大到亚洲，从而实现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然而这将组成另一个时代，或者說是继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出現的新的伟大的一章。当我们进一步接近这个时代的时候，我們也将发现与之相适应的法則。

摘譯自《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14—15頁。

17. 在南美洲，兴起較晚并已开始衰退的資本主义正在維持半封建的或半奴隶的生活条件，在那里，世界性的对抗矛盾引起了买办集团間的剧烈火拚，引起了各国内部連續不断的政变，也引起各国之間曠日持久的武装冲突。美洲的资产阶级在其历史上的兴盛时期把美洲大陆北半部联合成为一个联邦，因而它現在可以利用他們由此而得到的全部力量用来瓦解、削弱和奴役这个大陆的南半部。**南美和中美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組成一个强大的联邦，才能使自己擺脫落后和被奴役的状况。**但是，能够响应号召解决这一任务的，决不是后起的南美资产阶级，完全为外国帝国主义所收买的代理人，而是年輕的南美无产阶级这个被压迫群众的理想的領導者。因此，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暴行和阴谋以及反对当地买办集团的血腥勾当的斗争中的口号是：**南美和中美苏维埃联邦。**

无论在什么地方，民族問題都同社会問題合为一体。

摘譯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11頁。

欧洲工人和殖民地各国人民是不能在維持現状的旗帜下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也不能在这个旗帜下起来反对这样一种战争，即它必然要打破和推翻現状，几乎就象发育好的胎儿不可避免地要

破坏怀孕的現状一样。劳苦者对保卫現存的边界一点兴趣也沒有，特別是在欧洲——在他們的資产阶级的指揮下是这样，在反对資产阶级的革命暴动中更是这样。欧洲的衰落正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即它在經濟上已經分裂成差不多四十个半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拥有自己的海关、护照、币制以及龐大的军队来保卫民族特殊性，它們已經成为人类經濟和文化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欧洲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使边界永远保持下去，而恰恰相反是通过革命来废除边界；不是維持現状，而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联邦！**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 年)，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69—170 頁。

## (三) 关于一国建設社会主义

### 一、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 由來、錯誤和目的

1. 声称“欧洲无产阶级的大規模失敗”和“社会主义建設遭到了挫折”，使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創造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論，以給无产阶级“一种‘精神’安慰”。胡說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先驅其实是德国老修正主义者福尔馬尔。

但是你們知道斯大林是师承哪个“乐观主义者”的嗎？

我带来了一份重要的文件，如果你们想要的話，可以发给你们。这是福尔馬尔<sup>①</sup>在一八七九年写的一篇文章——福尔馬尔后来以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聞名。文章的題目是《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篇东西應該翻譯出来发給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监察委員會的全体委員，当然也應該发給全体党员參閱。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馬尔早在一八七九年就提出了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論，他的門徒却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才开始提出他这种“独創的”理論。为什么是在一八七九年？因为，当时是一个反动时代，是欧洲工人运动普遍衰退的时期。法国的公社在一八七一

---

① Vollmar, Georg Heinrich von(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的修正主义者。——編者注

年被击碎。一直到一八七九年，法国沒有出現过革命运动。在英国，自由派工联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一帆风順。当时是英国和欧洲大陆革命运动处于最低潮的时期。同时，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迅速发展。这种矛盾使福尔馬尔形成了他的独創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論。你們知道福尔馬尔最后的結局嗎？他最后成了极端右派的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沙文主义者。你們会說今天的局势不同了。当然，今天的总的局势是不同了，但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遭受了重大的失敗。进行国际革命的前景，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时期出現过的国际革命立即胜利的前景被推迟了，多数派內的某些“乐观主义者”完全失去了希望，于是他們就得出了結論說我們不要国际革命也可以存在下去。从福尔馬尔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論开始到狭隘民族主义的福尔馬尔主义，这一机会主义墮落的前提恰恰就在这里。

摘譯自《在中央监察委員會主席团會議上的发言》(1927年6月)，載于《斯大林伪造学派》紐約1937年版第135—136頁。

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現在那些預言家的先驅正是福尔馬尔先生。在一八七八年写的一篇題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里，福尔馬尔描述了德国——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比先进的英国的无产阶级还要发达得多——孤立建設社会主义的前景。在好几个地方，他肯定而且十分明确地談到据斯大林說連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了解的发展不平衡的規律。根据这个規律，福尔馬尔在一八七八年就得出了这个无法駁斥的結論：

“在当前普遍存在而且将来也会保持其力量的状况下，可以預見，社会主义在一切文明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是絕對談不上的。”

在进一步闡述这个思想时，福尔馬尔說：“这样我們就得出了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結論。我希望我已經证明这是最有可能虽然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这里我們可以把“孤立的国家”这个詞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这个意义來說，福尔馬尔表达了一个为馬克思和恩格斯熟知的、也是列宁在前面引用的一九一五年的文章中曾經表达过的不容駁斥的思想。

但是接着下来就純粹是福尔馬尔自己的思想了。附帶說一句，和我們現在鼓吹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的那些人的提法比較起来，福尔馬尔的提法远不是那样片面和錯誤。福尔馬尔在他的解释中以下列論点作为出发点之一：社会主义德国将和世界资本主义經濟保持活跃的經濟关系，同时具有技术远較发达而生产成本远較便宜的有利条件。这种解释以社会主义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前景作为基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須不断显示它在生产上的巨大优越性，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就自行消失了：社会主义将以在市場用更低的价格銷售貨物的办法战胜資本主义。

摘譯自《列寧以後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43—44頁。

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的决定<sup>①</sup>已經使农村日趋分化的現象合法化，为这种分化敞开了大門，所以結合<sup>②</sup>意味着工人国家和富农之間的商品交換将不断增加。人們不但不承认这种可怕的危险，而且立即制造出使富农并入社会主义的卑鄙理論。这种办法第一次作为脱离世界經濟和世界革命而独立地“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办法，以党的名义一古脑儿提交給党的代表會議。由此可知，这种小资产阶级反动理論之所以出現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設真正取得了成就——这些成就是不可爭辯的——而恰恰是因为社会

① 指1925年4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作出的一些关于农村工作的决定。  
——編者注

② 指城乡之間的“結合”。——編者注

主義建設遭到了挫折，从而領導人認為有必要給无产阶级提供一种“精神”安慰，以便抵消对资本主义作出的新的物质让步的影响。

同上，第 269 頁。

斯大林把不平衡发展的規律奉为偶象，也就宣布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充分根据，不过这种民族社会主义不是所有国家共同的型式，而是例外的、救世主的、純粹俄国的型式。据斯大林看来，只有俄国有可能建設一个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就从这一点出发，把俄国的民族特殊点不仅提高到各个資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点”之上，而且提高到整个世界經濟之上。斯大林全部概念的致命的裂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苏联的特殊点是那样强有力，以致它可以使苏联在自己的边界以內建設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不管人类的其他部分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于其他国家，由于救世主沒有批准，它們的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只不过是脸上的贅疣。斯大林教导說：“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上，那就錯了”。这个訓誡适用于美国、英国、南非以及塞尔維亚的共产党，——但是不适用于俄国共产党，因为俄国共产党的活动不是建立在“共同点”的基础上，而恰恰是建立在“特殊点”的基础上的。从这里就产生了共产国际的彻头彻尾二元論的战略。当苏联在“消灭阶级”并建設社会主义的时候，所有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却完全不顾現有的民族条件，而被迫按照日历（八月一日，三月六日，等等）进行一模一样的活动。**救世主的民族社会主义以官僚的抽象的国际主义为补充。**这种二元論貫穿在共产国际的整个綱領中，使它失去了任何原則的意义。

如果我們把英国和印度当作截然相反的資本主义类型国家，那末，我們就不得不說，英国和印度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决不是建立在同样的条件任务和方法上，而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相互依靠关系上。印度解放运动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是英国展开革命运

动，反过來說也是一样。無論印度或者英國，都不可能建立一个獨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两者都必須作为一部分加入更高的整体。馬克思主義国际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就建立在这一点上，而且也只建立在这一点上。

最近，即一九三〇年三月八日，《真理报》重新解释了斯大林的不走运的理論。这家報紙說：“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經濟結構”，即作为生产关系的一定形式，可以“在苏联的民族范围内”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終胜利，即保证不受资本主义包围的干涉”，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最終胜利“实际上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在列宁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摆出一种学識淵博的姿态来解释这样拙劣的經院哲学，要理論思想堕落到多么严重的程度才行！如果我們有一剎那的可能在孤立的苏联范围内实现作为一种完善的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那末，那就是“最終胜利”，——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还談得上什么可能的干涉呢？社会主义秩序的先决条件是高度的技术、文化水平和居民的團結一致。由于苏联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可以設想，将拥有二亿至二亿五千万人口，我們不免要問：到那时候还有什么干涉可言呢？在那种情况下，哪个国家或者国家联盟还敢于妄想进行干涉呢？可以想像的干涉只可能来自苏联方面。但是有这种必要嗎？几乎沒有。一个落后的国家用几个“五年計劃”的時間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義社會，这种榜样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将意味着一个致命的打击，将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要付出的代价减少到如果不是零的話，至少也是最低的程度。这就說明了为什么斯大林主义的全部概念实际上导致共产国际的消灭。的确，如果社会主义的命运由可能有的最高权威即国家計劃委员会来决定的話，那末，共产国际还有什么历史意义呢？在那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任务将是同臭名远揚

的“苏联之友”一道，保障社会主义建設，使免遭干涉，也就是說，从实质上看，扮演邊防哨兵的角色。

摘譯自《〈不斷革命〉德文版序言》(1930年3月29日)，  
載于《不斷革命》倫敦1962年版第25—27頁。

欧洲无产阶级的大规模失败和苏联所取得的最初的微小的經濟成就，使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产生了这样的思想：苏维埃官僚們的历史使命是在单独一个国家內建立社会主义。围绕着这个問題展开了一場爭論，这場爭論在对許多見識浅薄的人看来似乎是学究气的或者是煩瑣的，但是，实际上，这場爭論反映了第三国际墮落的开始，并为第四国际准备条件。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13頁。

在第二个阶段，在一九二四年，发动了反对不断革命論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政治內容縮小到这一主題，即我們对国际革命不感兴趣，为了发展我們的經濟，我們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官僚主义越来越担心，同国际革命政策发生关系的危险，正在危害它的地位。反对不断革命論的运动，其本身沒有任何理論价值，但是表現了脱离布尔什維主义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傾向。从这个斗争中出現了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論。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冊第514頁。

2. 攻击“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是一个庸俗的民族改良主义的烏托邦”，說它的錯誤在于：“夸大了苏联的生产力”；“故意不看各个工业部門发展不平衡的規律”；“忽視国际分工”；“忘記了帝国主义时代內在的最重要的矛盾，即生产力和国家壁垒的矛盾”。

在力圖證明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時，綱領草案犯了雙重的、三重的以至四重的錯誤：它夸大了蘇聯的生產力；它故意不看各個工業部門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它忽視國際分工；最後，它還忘記了帝國主義時代內在的最重要的矛盾，即生產力和國家壟斷的矛盾。

摘譯自《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59頁。

世界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比蘇維埃國家强大得不可限量，這是無疑義的。因此，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一個庸俗的民族改良主義的烏托邦。但是，我們並不是這樣提問題的。世界無產階級的生產上和政治上的作用是力量對比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鬥爭是在世界範圍上進行的，十月革命的命運就在此場鬥爭中決定。

摘自《保卫蘇聯與反對派》（1929年9月7日），巴黎版第40頁。

3. 攻擊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目的”在於向社會意識灌輸一套思想：“革命已經徹底完成；社會矛盾將不斷緩和；富農將逐漸長入社會主義；整個發展與外部世界的事件无关，將保持和平的和計劃的性質”。斷言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接受了這種思想，就與社會民主黨“相差無幾了”。

關於根本的階級目的甚至比局部的目標還不能用民族手段或在國家界限內實現這一無比堅定的信念構成革命國際主義的核心。然而，如果這個最終目的能夠在民族界限內通過民族無產階級的努力來實現，那麼，國際主義的脊梁就被打斷了。關於一國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理論破壞了勝利了的無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的失敗主義之間的內在聯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仍然在通往奪取政權的道路上移動。它怎樣以及用

什么方式夺取政权，完全要看它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看做是一項民族任务还是一項国际任务。

假定說有絲毫可能在一國實現社会主义，那不仅在夺取政权以后，而且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可以相信这个理論。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在落后的俄国的民族界限內实现，那就更有理由相信它能在先进的德国实现。明天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們将担负起闡发这个理論的任务。綱領草案授权他們这样做。后天就該輪到法国党了。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着社会爱国主义路線瓦解的开端。任何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果接受了它本国具备有单独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需的和足够的”先决条件的思想，那它在实质上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就相差无几了。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 年)，  
紐約 1936 年版第 72 頁。

一國社会主义的“理論”(附帶說一下，这是斯大林本人过去从未說明过或提出过任何根据的一种“理論”)現在变成了一种內容枯燥和非历史的观点：由于有国家的自然財富，在苏联国境內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此类推，你也可以斷言，如果地球上只有現在人口的十二分之一，社会主义就能胜利。实际上，这种新理論的目的是要向社會意識灌輸一套更加具体的思想，这就是：革命已經彻底完成；社会矛盾将不断地緩和；富农将逐漸长入社会主义；整个发展与外部世界的事件无关，将保持和平的和計劃的性质。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 年)，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216 頁。

## 二、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

說“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使国家消

亡”；农业的“高度工业化”，“克服城乡之間的矛盾”。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超过资本主义的“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学化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使现代尖端技术结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由于生产力是“世界性的”，单独一国“不能作为完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盘”；由于世界资产阶级还存在，因而不能使国家消亡。因此，一国范围内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

同志們，这以前在这个問題上相当片面的爭論倒也收了良好的效果，它促使斯大林比較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从而暴露了自己立場的荒謬无稽。且看斯大林同志报告第一部分的最重要的地方，这里的荒謬无稽是白紙黑字明摆着的。斯大林同志說：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是否可能呢？……

如果用具体的阶级語言解释这一公式，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請注意这一思想！——托洛茨基注）因此，当人們說在苏联有沒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也就是想說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在解决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課題时，問題就是如此，而且只能如此。

党对这个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sup>①</sup>

这样說来这里的全部問題在于我們能不能战胜本国资产阶级、仿佛社会主义建設問題的解决就在于此。其实不然！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消灭阶级、按社会主义方式組織全部生产和消費，以取代阶级社会。問題在于克服城乡之間的矛盾，这又要求农业

---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頁。——編者注

本身的高度工业化。而这一切都要在资本主义依然包围的环境下进行。不能把这个問題和仅仅对國內資產階級的勝利等同起来。

在不同的情况下，我們對“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解各有不同。例如，当談到西欧时，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写道，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可能夺取政权，組織社会主义生产，然后向其他国家資產階級交战。他这里說的組織社会主义生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們近年来已經获得的：工厂已經从資產階級手中夺过来，采取了必要的步驟由国家負担費用来保证生产，从而使人民能够生活、建設、保卫自己抵抗資產階級国家等等。这也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組織社会主义生产，只不过是最初的而已。然而从这里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还远得很。因为，重复一遍，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階級，然后并使国家消亡。而斯大林同志居然說，我們只要战胜國內的資產階級，就能保证在我国建成这种完全意义的社会主义。可是，同志們，我們需要国家和军队反对外来的敌人。可見，只要还有世界資產階級，这个因素就总是要保留的。此外，能不能設想，在欧洲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我們就能仅仅依靠国内的經濟与文化資源，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溶和在統一的社会主义計劃經濟之中？上面說过，为此我們就必须大力提高技术，这首先要增加粮食的出口和机器的进口。机器在世界資產階級手中，它又是我国粮食和原料的买主。世界資產階級暂时还操纵着世界价格，因此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就得依賴它并同它作斗争。为了消除这种依賴，战胜本国資產階級是决不够的，因为这里問題不是在政治上鎮压資產階級，政治上我們早在一九一七年就在我国把它推翻了，問題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即在向世界資產階級作斗争（經濟、政治和軍事的斗争）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只有使这个孤立并且暫时还是非常落后的国家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更为强大才行。因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不是一年，不是十年，甚

至也不是二十年，而是好几十年，所以只有使我国生产力超过資本主义生产力才能达到这一点。所以問題不是民族的无产阶级反对民族的資产阶级，而是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作殊死的斗争。問題只應該这样提。

摘譯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1926年12月)，载于《真理报》1926年12月14日第  
289号第2—3版。

由于資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起彼伏的，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也是时间不一的、不平衡的、此起彼伏的；由于各国的相互依赖是极为紧密的，所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也是不可能的。

讓我們从这个角度再一次比較仔細地看看綱領本文是怎样說的。我們已經在导言中看到这样一句話：

“帝国主义……使世界經濟生产力的增长和民族国家的壁障之間的矛盾加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我們已經說过，这个論点是——毋宁說原来打算成为——国际綱領的基础。但是，正是这个論点先天地把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作为一种反动理論而排斥、拒絕和抛到一边去了，因为这种理論不仅和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趨勢、而且和这一发展已經取得的物质成果是互相对立的，不可調和的。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相容的。結果不仅带来了对外貿易、人力和資本的輸出、强占領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使建立一个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在經濟上成为不可能的事。資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早已打破国家疆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学化的基础上，建立在使現代尖端技术結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从馬克思开始，我們不断重复指出資本主义不

能适应它自己带来的新技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撕破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外皮，而且正如一九一四年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国界的铁箍。然而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怎么能够把生产力赶回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经猛烈企图冲破的民族国家的疆界中去呢？或者说，是否我们应当放弃使国家疆界从而也使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疆界显得过分狭隘的、让生产力“肆意”发展的想法，而局限于——譬如说——受约束的、驯服的生产力即经济落后的技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在许多工业部门我们现在就应当立即停止前进，而且逐渐降低到甚至比我们目前这样可怜的技术水平更低的水平去，因为目前的水平曾经使资产阶级的俄国和世界经济结成不可分离的纽带，使俄国卷入帝国主义为了扩张领土、使已经突破国家疆界的生产力获得新的领域的战争漩涡中去。

在继承和恢复这些生产力以后，工人国家就不得不开展进出口贸易。

摘译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纽约1936年版第51—53页。

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进行的有计划的、和谐的社会生产的组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它在法律上的先决条件而已。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不能同生产力问题分开，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生产力实质上是世界的。单独一个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已经变得过分狭小，因此更加不能作为完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盘。此外，一个革命国家的落后条件还增加它被人拉回到资本主义去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在拒绝孤立的社

会主义发展前途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机械地孤立开来的武装干涉問題，而是与社会主义的国际經濟基础有关的問題之总和。

摘譯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載于《俄国革命史》伦敦 1936年版第 1237頁。

### 三、关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規律

1. 声称“企图把个别国家从世界經濟整体的联系和相互依属中抽出来，从而去看个别国家的經濟和政治命运，这是根本錯誤的；不平衡发展的規律是完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論”。

目前的結論是，我所說的由于落后所产生的内部矛盾必須在国际革命中得到解决的观点，并不是我的特殊观点，伊里奇也不止一次地，并且是更尖銳和坚决地表达过同一个观点。

有人对我们說，这在似乎还未发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規律的时代，即在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是正确的。对于这点我不能詳細談。但是遺憾的是，应当說，斯大林同志陷入了最严重的理論上和历史上的錯誤。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規律要比帝国主义老一些。此其一。沒有疑問，资本主义在一切国家就是現在也是发展得极不平衡的，但在十九世紀这种不平衡要比在二十世紀更加厉害。当时，英国是世界的霸主，而例如日本，根据我們上一代的記憶，曾是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絕的封建等級国家。在我国农奴制废除的同时，日本开始加入资本主义文明世界。中国在酣睡，等等。在这个时期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更加尖銳，更加深刻；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不平衡性知道得不比我們差。正因为金融資本是最活跃和灵活的資本形态，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使

“均衡的”趋势比金融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更为加强了。現在仍然保持着发展的巨大不平衡性，这是不容爭辯的。但如果說在过去，在十九世紀，在帝国主义以前，資本主义发展得較为平衡，因而說什么当时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是不正确的，而現在，当帝国主义增加了发展的不同形态，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就是正确的了，——不，这是說不通的，这和全部历史經驗相矛盾，这完全顛倒事实，應該寻找别的更有份量的論据。

摘譯自《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发言》  
(1926年11月1日)，載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  
會議（速記記錄）》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  
524頁。

同志們，这个理論的前提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斯大林指責我不承认或不完全承认这个規律。其实不然！不平衡发展的規律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規律，这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規律。資本主义在其初期的发展大大加深了不同民族在經濟和文化发展水平上的悬殊；帝国主义的发展，即資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并沒有扩大这种水平的悬殊，相反地，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助长了水平的均衡化。这种均衡化从来不会是比较完全的。发展速度的差异将一再破坏均衡化，这就使得稳定在一定水平上的帝国主义成为根本不可能的事。列寧把不平衡总的归結为两点：第一，速度；第二，不同国家經濟和文化发展的水平。由于問題牽涉到速度，帝国主义在这里使不平衡发展到极高的程度；而由于問題牽涉到不同資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所以这里速度的悬殊引起一定的均衡化趋势。誰不懂得这点，他就是不懂得这全部問題的根本点。且拿英國和印度來說。印度某些部分的資本主义发展，比英國最初的資本主义发展要快得多。但是英國和印度的差別，經濟上的距离現在比五十年前要大些还是小些呢？小些。再以加拿大、南美、南非为一

方，英國為另一方為例。加拿大、南美、南非近一個時期的發展以瘋狂的速度進行着。英國的“發展”則是停滯，甚至下降。因此，速度比歷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不平衡些。在這些國家的發展水平方面，彼此比三十年或五十年前更加接近。由此得出什麼結論呢？很重要的結論。正由於某些落後國家最近一個時期的發展速度是急劇的，而某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却延緩甚至倒退，正是這種事實使得考茨基關於按計劃組織起來的超帝國主義的假設完全不可能實現，同時因為不同的國家在水平上彼此接近（當然決不會達到平衡），它們就發生了同樣的要求（銷售市場、原料等等）、同一類型的競爭。正因為如此，戰爭的危險才越來越尖銳，而戰爭本身也必然具有龐大的規模。但是也正是這一點才保證和加深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性質。

同志們，世界經濟並非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近二、三十年來由於落後國家和整個整個大陸加速發展而日益確立起來的現實。這是一個根本事實，正因為如此，企圖把個別國家從世界經濟整體的聯繫和相互依屬中抽出來，從而去看個別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命運，這是根本錯誤的。不平衡發展的規律是完全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

帝國主義大戰是什麼？是生產力暴動，它不僅反對資產階級所有制形式，而且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範圍。帝國主義大戰意味著下列事實，民族國家的範圍對於生產力已狹小到難以容忍的程度。我們總是肯定說，資本主義不能掌握它發展起來的生產力，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容納超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範圍而成為更發達的經濟整體的生產力。退回到孤立的國家去是走不通的。

摘譯自《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的發言》  
(1926年12月)，載於《真理報》1926年12月14日第  
289號。

2. 說落後國家無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能比先進國家早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但要比他們晚進入社會主義，換句話說，先進國家無產階級奪得政權要比落後國家困難得多，但是他們奪得政權以後，不僅會“超過”落後國家，而且“會帶動”落後國家“走向以最高的世界技術和國際分工為基礎的真正社會主義建設”。

……你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承認，我和你們一同認為國家是無產階級的國家。對於這個國家是否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我已經在許多引文中作了回答。如果你們問，國內有沒有足夠的力量和資金，以便不管全世界將發生什麼，在三十年或五十年內把建成社會主義的事業進行到底，那我要說，問題的提法本身就是根本不正確的。我們有足够的資金向前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從而幫助世界革命無產階級，而世界無產階級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內奪得政權的機會決不比我們建成社會主義的機會少；機會決不更少，而是更多！

同志們！請問，當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時，歐洲會發生什麼事件呢（而且這是基本點，是整個問題的中心）？你們說：不管在這段期間在全世界發生什麼事件，我們將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好的。我們建成社會主義需要多少時間？伊里奇認為，二十年內我們無論如何建不成社會主義，由於我們農民國家的落後，就是三十年內也建不成。姑且以三十五十年作為最低標準。那末請問，這一時期內歐洲會發生什麼事件呢？我不能預測歐洲的情形，也不能預測我國的情形。這裡可能有幾種前景。如果你們說，三十五十年內歐洲無產階級自然會奪得政權，那時也就什麼問題也沒有了，因為如果歐洲無產階級在最近十二三十年內取得政權，那末社會主義的陣地在我國和在國際範圍都是有保

证的。

摘譯自《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发言》  
(1926年11月1日),載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  
會議(速記記錄)》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  
531頁。

“帝国主义陣綫在其最薄弱的环节上，即在沙皇俄国(被一九一七年革命)冲破了。”(着重号是我們加的。)

这是列寧的光輝的公式。它的意思是說，俄国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落后、經濟上最薄弱的国家。正因为如此，它的統治阶级才第一个垮台，因为他們使这个国家的不足的生产力承受了不堪忍受的負担。不平衡的、間歇的发展就这样迫使这个最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第一个夺取了政权。从前我們受到的教誨是：恰恰由于这个理由，“最薄弱的环节”的工人阶级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相比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最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将比較困难，但是当他們在我們还远未克服落后状态的时候夺得政权以后，他們將不仅超过我們，而且还会带动我們走向以最高的世界技术和国际分工为基础的真正社会主义建設。

摘譯自《列寧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56頁。

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是不相同的，不相似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对立的。俄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取得政权的事实，决不意味着它将第一个走到社会主义。引起了十月革命的那种矛盾的发展不平衡状态，并沒有随着十月革命成功而消失。它恰恰是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基础。

.....  
历史上各时代的文化水平各不相同。要超越过去，是需要时

間的，但是不需几百年，只需几十年就够了。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寧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說：“我們的下一代會更發達一些，但也不見得能完全過渡到社會主義。”<sup>①</sup> 約兩年之後，在農業公社的代表大會上，他把期限推遲得更遠了：“我們現在還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勞動制，希望我們的儿子也許孫子能够把這種制度建成也就好了。”<sup>②</sup> 俄國工人比其他国家工人動身得要早，但卻要比他們晚點到達目的地。這並不是悲觀主義，而是歷史的現實主義。

摘譯自《獨一無二的社會主義？》（1932年），載于  
《俄國革命史》倫敦1936年版第1239—1240頁。

十一月八日，列寧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說：“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國家內的完全勝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幾個先進國家（我們還不能把俄國列為先進國家）最積極的合作。”<sup>③</sup> 列寧不僅否認俄國有權利建設自己的社會主義，而且明確地指定俄國在與其他國家一起建設的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只占次等的地位。把我國搞得“威信扫地”，這是多大的罪過呀！

同上。

發言人在代表大會上解釋共產主義青年團新團綱的必要性時這樣說：“舊團綱中有一個非常錯誤的反列寧主義的說法，即俄國‘只有通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才能達到社會主義’。團綱上的這個觀點是根本錯誤的。它反映了托洛茨基主義觀點。”而這正是斯大林到一九二四年四月還在保衛的觀點。除此以外，還有一點一直得不到解釋，即一九二一年由布哈林起草而在列寧參加下由政治局慎重通過的一個團綱，十五年以後怎麼會變成“托洛茨基主義”，並且必須修改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但是，合乎邏輯的辯論對利益

① 《列寧全集》第27卷第275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30卷第175頁。——編者注

③ 同上，第28卷第134頁。——編者注

攸关的問題是无能为力的。官僚既然摆脱本国无产阶级而赢得了独立，它就不能承认苏联必须依靠世界无产阶级。不平衡发展的規律已經使技术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之間的矛盾粉碎了世界鏈条上最薄弱的一环。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破产付出代价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規律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是由联合发展的規律来加以补充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崩溃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說，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跳到先进国家前面去了。然而，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同不相称的技术和文化水平发生了抵触。十月革命本身是高度的世界生产力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間的矛盾的产物，而它自己却产生了低下的民族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間的矛盾。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219 頁。

#### 四、关于国际分工

1. 声称世界經濟“不是各民族部分的总和”，而是“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場所形成的强有力而独立的現實”。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世界分工才能得到最高度的发展，“世界范围的分工超出子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而且用命令的方式指出它前进的道路”。断言“如果要在民族范围内孤立地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一种与外界隔絕的經濟各部門的均衡”，就是“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就是“追求一种反动的烏托邦”。孤立地建設，虽能取得暂时的成就，但“总不能达到一个和諧的新社会的高度”，只是“在‘貧困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

在《和平綱領》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民族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論斷，在某些讀者看来也許已被我們蘇維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經驗推翻了。但这样的結論是沒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在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較先进、比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們虽然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們并沒有达到甚至還沒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这个时期为革命一国家的自卫而进行的斗争使生产力大为下降；而只有在生产力发达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以想象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貿易談判、租让、热那亚會議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极其鮮明的证据。**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們为了打破經濟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設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協議；同时可以确信地說：这种協議至多只能帮助我們治愈某些經濟創傷，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經濟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內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摘譯自《〈和平綱領〉跋》(1922年)，載于《战争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502—503頁。

根据以上所說，不难理解，对这个問題的唯一正确的提法应当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就得出了結論，认为不平衡的即此起彼伏的历史发展使无产阶级革命要延續整整一个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民族将相继卷入革命的洪流；而另一方面，向国际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間的有机的相互依賴关系排除了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就是說，在帝国主义已經发展了、加深了和加剧了这两种对立的趋势的現代，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然而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

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變得加倍地甚至三倍地真實，現在則更是如此。在這一點上，列寧只是發展了馬克思自己的提法和馬克思為這個問題提供的答案，使它們具體化了。

摘譯自《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22頁。

以資本主義的尺度來衡量，工業取得了、並且不斷取得驚人的成就。而農業在這幾年中的發展就慢得多了，但無疑在上升。我們同時注意到一種完全反常的現象：儘管就整體來說經濟在發展，市場上商品嚴重匱乏的現象却年復一年地沒有改變，甚至在某些時期危機達到嚴重的程度。儘管工業在高速前進，但必要的工業品都缺乏。儘管這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產品的不足却使人感到實在無法忍受。

這些矛盾究竟意味着什麼？其原因有兩類。

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勉強地首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種客觀形勢是主要原因。領導受到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執行了錯誤的政策，不能及時地认清形勢和合理地使用專政的經濟和政治手段，這是次要的原因。

摘譯自《十月革命十二周年》（1929年  
10月17日），載于《托洛茨基文選》第1  
卷巴黎1955年版第73頁。

首先，讓我們回憶一下，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是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首先提出來的，這個理論不僅同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傳統和列寧學派完全矛盾，而且甚至同斯大林本人在同年春天所寫的東西完全矛盾。從原則的觀點來看，斯大林“學派”在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問題上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意義和嚴重性，並不亞于，例如，一九一四年秋天即斯大林轉變以前整整十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戰爭和愛國主義的問題上同馬克思主義的決裂。這一對比，从

性质上說，完全不是偶然的。斯大林的“錯誤”，同正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錯誤”一样，也是民族社会主义。

馬克思主義认为世界經濟并不是各民族部分的总和，而是一种由国际分工和在我們这个时代中专横地統治着民族市場的世界市場所形成的强有力而独立的現實。資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早已发展得超过了民族界限。（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事实的表現之一。在生产技术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必須代表比資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如果要在民族範圍內孤立地建設社会主义社会，那末，不管暂时取得多少成就，都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資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不顾构成世界統一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在地理、文化的和历史方面的条件，而試圖在一个民族範圍內实现一种与外界隔絕的經濟各部門的均衡，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烏托邦。如果这种理論的先驅和追随者还参加国际革命斗争（取得什么成就，是另外一个問題），那是因为作为不可救药的折衷主义者，他們把抽象的国际主义同反动的烏托邦民族社会主义机械地結合在一起了。这种折衷主义的最高表現就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綱領。

摘譯自《〈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1930年3月29日），  
载于《不断革命》伦敦1962年版第22—23頁。

要想了解被十月革命喚醒而进入新生活的广闊的土地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必須清楚地考慮到，除了最近由于經濟上取得的成就而重新出現的旧矛盾以外，还增加了一种新的最强有力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苏联工业的集中性质和苏联經濟的孤立处境之間的矛盾；苏联工业的集中性质为空前的发展速度提供了可能性，苏联經濟的孤立处境則排除了正常利用世界經濟潜力的可能性。旧矛盾加上新矛盾就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令人感到痛苦的困难也产生了。这些困难最直接最强烈

地表現在这样一件每个工人和每个农民天天都感觉到的事实上，即劳苦群众的生活条件并没有随着經濟的普遍增长而改善，而是由于粮食困难目前正在日益恶化。苏联經濟的严重危机說明，資本主义所創造的生产力不适应于民族市場，只有在国际的規模上才能做到社会主义式的協調和一致。換句話說，苏联經濟的危机不仅是成长期間产生的病症，一种初期的病态，而且表明了更加有意义得多的事情——即世界市場的严格控制，这个市場用列寧的話來說就是，“我們从属于它，我們同它結合在一起，我們擺脫不了它。”（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同上，第30頁。

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未来社会的因素可以說是分散的。把这些因素汇集和互相結合起来，这便是构成总的世界革命的一系列的国家革命的任务。

列寧預先嘲笑了关于苏維埃經濟自給自足性的观念。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他在苏維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說：“只要我們苏維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經濟完全可以独立……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sup>①</sup>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寧发出警告說：我們面临着“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試，我們依靠这个市場，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这是一次严格的考試，因为在这場考試中人家可能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把我們打垮。”<sup>②</sup>

現在，共产国际竟然把社会主义經濟依賴世界經濟的这种思想，看成是“反革命的”。社会主义不能依賴資本主义！不肖徒輩聰明得忘記了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以世界分工为基础的，这种分工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最高度的发展。一个孤立的

① 《列寧全集》第31卷第447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33卷第243頁。——編者注

工人国家內的經濟建設，無論其本身如何重要，終歸是殘缺的、狹隘的和矛盾的，它總不能達到一個和諧的新社會的高度。

摘譯自《獨一無二的社會主義？》（1932年），載于《俄國革命史》倫敦1936年版第1240—1241頁。

事實上，目前蘇維埃經濟的增長仍然是一個對立過程。經濟的成就雖然加強工人國家，但決不自動地導致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相反地，它們正在準備孤立的社會主義結構的種種矛盾在更高的水平上的尖銳化。同過去一樣，農村的俄國需要一個與城市的歐洲共同的工業計劃。世界範圍的分工超出了獨一無二的無產階級專政之上，而且用命令的方式指出它前進的道路。十月革命沒有把俄國排除於人類其他部分發展之外，反而使俄國與他們更密切地聯繫起來了。俄國既不是未開化之邦，但也還不是社會主義樂土。它是我們這個過渡時代的過渡性最強的國家。“俄國革命只不過是國際革命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世界經濟的現狀使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資本主義離無產階級革命，比蘇聯離社會主義要近得多。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命運，是與西方和東方解放運動的命運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

同上，第1257頁。

左翼反對派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秘密散發的一個文件中寫道：社會主義必須在一切領域不可避免地“超過”資本主義，“但是，現在的問題不是社會主義同一般資本主義的關係的問題，而是蘇聯的經濟發展同德國、英國和美國比較的問題。怎樣理解‘最短歷史時期’這幾個字呢？一系列的未來五年計劃將使我們遠遠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家的水平。在這個時期內，資本主義世界將發生什麼變化呢？……如果你們承認資本主義在幾十年的時間內有重新繁榮的可能，那末，談論在我們的後面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就是可悲的

廢話。这样，也就有必要說：我們过去把整个时代估計为一个資本主义腐朽的时代是錯誤的。这样，苏維埃共和国也将证明，它是巴黎公社以来在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第二次試驗，虽然更广泛，更富有成就，但毕竟是一次試驗…… 然而，对于我們的整个时代，对于十月革命是国际革命的一个环节的意义，有沒有任何严肃的理由进行这样具有決定性意义的重新考慮呢？沒有！ ……在資本主义国家或多或少比較完全地度过其恢复时期〔战后〕的时候，……它們也在日益复活，而且正在以无比尖銳的形式恢复战前一切旧的國內矛盾和国际矛盾。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我們正在建設社会主义。这是事實。然而更大的、一点也不小的事實——因为一般說来，全局总是大于局部——是欧洲的和世界的革命都在准备中。局部只有同全局結合在一起才能取得胜利。……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所需的时间，远比我們在技术上赶上欧美所需的时间短得多……同时我們还必須有系統地縮短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同世界其他部分的劳动生产率之間的差距。我們愈向前进，可能遭到廉价商品干涉并进而遭到武装干涉的危险就愈小……我們把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得越高，我們就越能真正加速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这种革命就能更快地把世界技术供給我們，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也就能作为欧洲和世界建設的一部分而更真实地向前迈进。”这个文件象其他文件一样，一直沒有得到回答——除非是把开除出党和逮捕当作对它的回答。

烏龟速度的想法放弃以后，与此有关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想法也必須否定了。然而，用行政手段消灭富农的作法却給予一国社会主义理論提供了新的論据。一旦阶级“基本上”被消灭了，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基本上”建成了（一九三一年）。从本质上說，这个公式恢复了在“貧困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我們記得，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位官方記者解釋說，婴儿沒有牛奶

喝是由于缺少奶牛，而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缺点。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17—218页。

2. 說資本主義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敵对社会制度的胜负取决于“两个制度間劳动生产率的对比”。认为“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取决于速度”，由于苏联在物质上“依賴”世界經濟，“受着世界市場的相对监督”，苏联的发展速度是由“整个世界发展”予以規定的，“全部建設受着国际的制約”。“閉关自守、自給自足的經濟”“必然以降低发展水平和速度为代价”。

我肯定，如果沒有两个国际条件，世界上就不会有我們所理解的我們的革命：第一，金融資本，它猛烈地推动了我們的经济发展；第二，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論概括——馬克思主义，它推动了我們无产阶级的斗争。在一九一七年以前，革命是通过伟大世界力量的相互作用而准备起来的，十月革命就是通过这种相互作用，經過世界大战而产生的，現在却有人对我们說：“撇开”国际环境，在我們家里来建設社会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态度是形而上学的。决不可能撇开国际环境。什么是出口？内部事务还是国际事务？要在國內收集出口的产品，这仿佛是内部的事务，但是要輸输出外，这好象是国际事务吧。(笑声)

而什么是进口？进口好象是国际事务，因为要到国外去购买商品，但輸入國內却象是内部事务。(笑声)請看，布哈林同志建議“撇开”国际环境的全部理論在进口与出口的問題上立刻破綻百出。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取决于速度，而我国經濟发展的速度現在却最直接、最尖銳地由輸入原料和装备所决定。固然，可以

“撇开”外汇不足的情况并订购大量棉花和机器，但这只能来一次，下一次就不能再“撇开”了。（笑声）我們全部建設受着国际的制约。

摘譯自《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发言》（1926年11月1日），載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速記記錄）》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530—531頁。

……如果旧俄国家是一个孑然独存的国家，如果俄国站在世界发展的旁边，站在帝国主义旁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旁边，如果俄国既沒有金融資本在本国經濟中的統治，也沒有馬克思主義在本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精神統治，它就决不能“凭自己的力量”如此迅速地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以为当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以后，它就能够象一掀电鈕关上电灯一样使一个国家脱离世界經濟，那是根本錯誤的。

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这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杠杆。希望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我們自問，我国工厂的技术装备如何？根据这一問題的专家瓦尔查尔的統計，战前我国工业的装备有63%是进口的机器。只有三分之一的装备是国产貨，而且这三分之一都是极简单的机器，因为比較复杂的和最重要的机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因此，如果你們察看一下我国工厂的技术装备，你們就会亲眼看見俄国以及苏联在物质上对世界經濟的依賴。誰要是不注意問題的这个方面，誰要是議論这个問題而把它的经济技术基础和世界經濟政治关系撇开不談，他就必然会成为赤裸裸的抽象概念和断章取义的引文的俘虏。

近十年来，我們几乎沒有更换我国工业的固定資本。國內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們根本沒有从国外輸入机器。显然，这种情况就使得某些人认为我国工业的技术装备属于我国的天然財富，仿佛今后可以在这种“自然的”基础上孤立地繼續建設社会主

义，直至完全建成。但这是幻想。我們現在处在所謂恢复时期的終点。我們接近了战前水平。但是恢复时期的終点同时也就是恢复我們和世界經濟的物质联系的始点。我們應該更新現在經歷着危机的固定資本。誰要是以为今后几年我們就能够自己制造全部或大部分装备，他就是一个幻想家。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重要任务提出的国家工业化，意味着在最近时期和相当长的时期中不是减少，反而是增加我們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也意味着增加我們对世界市場、对资本主义、对它的技术和經濟的依賴（当然是互相的依賴），并意味着加强向世界資产阶级作斗争。这就是說，不能把我国建設社会主义的問題和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經濟变化的問題割裂开来。这两个問題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如果有人对我们說：“可是，亲爱的朋友們，你們自己可以制造机器”，那我就要回答：“当然，如果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今天就垮台，那我們在一、二十年后就能制造出比今天多得多的机器。”如果我们想离开实在的资本主义世界而“隱居”，如果我们提出任务要就在最近時間內凭自己的双手制造出全部机器或至少是最重要的机器，就是說，如果我们企图忽視世界經濟中的分工，并跳过造成我国現有工业这种状况的先前的經濟历史，总之，如果我们走上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的”門罗主义而一切靠自己的双手制造的話，这就必然会大大减低我們經濟发展的速度。因为极其自然，拒絕利用世界市場来弥补我国装备的漏洞，就会使我們自身的发展慢得惊人。而发展的速度是一个决定因素，因为地球上到底不止我們这些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暂时还只存在于新聞記者和決議起草人的幻想之中。实际上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总是（直接或間接地）受着世界市場的相对监督。这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发展速度不能任意規定。这是由整个世界发展給我們規定的，因为世界經濟处于最高一級的地位监督着自己的每一个部分，即使这个部分处

## 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并建設着社会主义。

为了使我国工业化，我們需要輸入机器。而农民需要輸出粮食及其他产品。如果我們不輸出，我們就不能輸入。另一方面，國內市場不能吞納全部农产品。因此，无论农民的需要或工业的需要都把我們重新納入世界經濟，我們和世界經濟的联系，也就是說斗争将与时俱增。我們越来越走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孤立地位，而納入世界經濟联系和相互依从的体系中。而誰如果談論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而忽視我国經濟与世界资本主义經濟“合作”和斗争的事实，他就是在搞赤裸裸的形而上学。

摘譯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1926年12月)，載于《真理报》1926年12月14日第  
289号第2版。

在两个不可調和的敌对社会制度——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未来长期的斗争中，最終說來，胜负决定于两个制度間劳动生产率的对比。而这在市場条件下，可以用我国国内价格同世界价格的对比来衡量。列宁在他最后的一些讲话中有一次曾警告党說：即将到来的“考試”“是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試’，我們依靠这个市場，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sup>①</sup>当时他心中考慮到的就是这个根本事实。因此，布哈林关于我們可以用任何速度，甚至“龟行”的速度走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废话。

我們不能在閉关自守的經濟的掩护下躲开資本主义包围。正因为閉关自守，这样一种經濟就将不得不以极端緩慢的速度前进，于是就必将遇到不是削弱了的而是加强了的压力，这压力不仅来自資本主义的军队和舰队（“干涉”），而且首先来自資本主义的低

① 《列寧全集》第33卷第243頁。——編者注

廉商品。

当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較高的技术时，对外貿易垄断制是社会主义存在下去的必要武器。但是，目前处在建設過程中的社会主义經濟，只有在技术、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价格問題上逐漸接近世界經濟水平，才能保持这种垄断。經濟領導方面的目标不應該是閉关自守、自給自足的經濟，这种經濟必然以降低发展水平和速度为代价。正相反，它的目标應該是用最大限度加快速度的方法，达到我們在世界体系中的比重的全面增长。

为此：（一）必須了解我們出口的重大意义，目前，出口落后于我国工业的总发展，已經到了危险的地步。（苏联在世界商业交易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經以一九一三年的 4.22% 減少到一九二六年的 0.97%。）（二）尤其必須改变我們对富农的政策，這項政策使富农可以囤积原料牟取暴利而破坏我們社会主义的出口。（三）必須全面加速我国經濟的工业化和加强我国經濟的社会主义成分（而不是資本主义成分），来发展我們同世界經濟的联系；在最近将来不應該分散我們有限的积累，而應該通过深思熟慮的計劃把它逐步投入一种新的生产，这种生产首先要保证大量生产最必需和最有用的机器；我們應該有計劃地利用世界資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周密而灵活地用这些成就来补充和刺激我們自己的工业。

把我們的希望寄托在孤立发展社会主义上面，寄托在一种脫离世界經濟的速度上面，这样就破坏了我們的整个前途。这样就使得計劃領導机关离开了正軌，并且提供不出正确的方針以調整我們同世界經濟間的关系。我們没有办法决定什么应由自己生产，什么应从国外輸入。坚决抛弃孤立建設社会主义經濟的理論，这意味着在很少几年的过程內我們的資源将得到无比迅速的利用，更快地工业化，我們自己的机器生产将更加有計劃和有力地增长。这意味着就业工人数量的更快增加和物价的真正降低——一句

話，处在資本主義包围中的苏联得到了真正的加強。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4—56頁。

資本主義世界通過它的進出口數字告訴我們：除了軍事干涉以外，它還擁有其他的說服工具。勞動生產率和整個社會制度的生產率在市場上是通過價格的相互關係予以衡量的。就這個意義來說，蘇維埃經濟所面臨的最大、最直接的威脅也許並不是軍事干涉，而是更廉價的資本主義商品的干涉。單單這個事實就說明：問題決不僅僅是對“本國”資產階級取得孤立的經濟勝利：“世界各國行將爆發的社會主義革命，決不會只是一個無產階級战胜本國資產階級的事情。”<sup>①</sup>這裡涉及到兩種社會制度的競爭，兩種社會制度進行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一種社會制度還是剛剛開始在落後的生產力的基礎上進行建設，而另一種社會制度今天仍然有大得無可衡量的生產力作為依據。

如果任何人認為承認我們依賴世界市場（列寧直率地談到過我們對世界市場的依賴）是一種“悲觀”的表現，那就說明他自己在世界市場面前表現了土里土氣的小資產階級的膽怯，說明他這種沒有見過世面的樂觀——希望離開世界經濟，躲到一叢小樹後面去設法用自己的資源敷衍一下——是極為可怕的。

摘譯自《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47—48頁。

就任何一個具體國家獨立建成社會主義是“可能還是不可能”的問題作出決定，甚至只是提出這個問題，也是同樣不能容許的。這個問題決定於兩種制度、兩個世界階級之間的鬥爭的發展進程；而在這個鬥爭中，無論我們在恢復時期增長系數是多高，一個無可

① 《列寧全集》第30卷第136頁。——編者注

爭辯的基本事實仍然是：

“如果就國際範圍的資本來說，那末它現在不但在軍事上，而且在經濟上仍比蘇維埃政權強大。應當從這一基本情況出發，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記這一點。”<sup>①</sup>

不同發展速度的相互關係問題仍然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它不僅決定於我們是否能够達到“結合”，保證糧食的征收和增加進出口；換句話說，它不僅決定於我們國內的勝利——當然，這些勝利在這場鬥爭中是極其重要的因素——，而且決定於世界資本主義的命運，決定於世界資本主義是停滯、上升還是崩潰，也就是說，決定於世界經濟和世界革命的發展。因此，這個問題不是在國家範圍內、而是在世界經濟政治鬥爭的範圍內加以解決。

同上，第 50—51 頁。

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問題是在一九二三年開始的兩種傾向的鬥爭過程中提出的。從理論上說，這個問題和國內國際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是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

官方領導集團受到以取自資產階級的現成資本作為基礎而實現的恢復時期（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幻象的欺騙，越來越朝著以孤立發展經濟本身作為目標的立場滑下去。而正是在這種最嚴重的錯誤的基礎上，由於國際上的失敗的打擊，後來就出現了僅僅一個國家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理論。正是在恢復時期結束，從而使和世界經濟保持聯繫的需要日益迫切的時候，和世界經濟斷絕聯繩的理論却得到了宣揚。

我們的經濟發展速度問題根本不是官方領導集團提出來的。這個領導集團絲毫也不理解蘇聯經濟受到世界市場更加嚴格的節制，其程度和蘇聯經濟不得不通過進出口貿易和這個市場保持聯

<sup>①</sup> 《列寧全集》第 30 卷第 463 頁。《列寧全集》無着重點，在“蘇維埃政權”後面還有“和蘇維埃制度”等字。——編者注

系的程度是一致的。

當我們堅持不懈地指出蘇聯建設的速度以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為條件的時候，官方路線的指導者和鼓舞者回答我們說：“沒有必要把國際因素塞到我們的社會主義發展中來”（斯大林），另一方面又說：“即使用蝸牛的速度我們也要建設社會主義”（布哈林）。如果人們敢于把這種思想按照邏輯引導到它的結論，即“沒有必要把國際因素塞到”我們的經濟發展速度問題中去，那末人們就會發現它的意思不過是說沒有必要把共產國際“塞到”（德國的）十月革命的命运中去，因為共產國際正是“國際因素”的革命表現，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但是，問題在於中派主義對自己的思想是從來不徹底追究的。

速度問題顯然不僅在經濟中、而且特別在作為“經濟的集中表現”的政治中，都具有帶決定性的重要意義。

如果說在國內問題上我們之所以遲緩是因為對經濟採取了錯誤的態度，是因為害怕往前走得太遠，所以使經濟的發展越來越慢，那末在國際革命問題上則剛剛相反，在這方面，速度之所以一貫降低是因為中派主義不能充分估計革命形勢，不能在关键时刻利用這種形勢。

同上，第253—254頁。

如果一個獨立的工人國家為自己制訂一個現實主義的綱領，那就不可能為自己規定脫離世界經濟而“獨立”的目標，尤其不可能為自己規定“在最短的時期內”建設一個民族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任務並不是要達到抽象的最高速度，而是達到最適宜的，也就是根據國內和世界的經濟條件來決定的最好的速度，這種速度可以加強無產階級的陣地，準備未來的國際社會主義社會的民族因素，同時首先有步驟地提高無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和加強無產階級同農村非剝削群眾的聯盟。這個前景應當適用於整個準備時期，這

就是說，一直到先进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把苏联从目前的孤立处境中解放出来为止。

摘譯自《〈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1930年3月29日)，  
載于《不断革命》伦敦1962年版第32頁。

說到底，苏联发展的一切矛盾就这样导致了孤立的工人国家同资本主义对它的包围之間的矛盾。由于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建設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經濟，就使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矛盾每到一个新阶段都要以更大的規模和更大的深度重新出現。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世界其他部分的资本主义政权表明自己能够維持另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的話，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破坏。但是，只有那些相信资本主义是牢固的或长命的人才能认为这种前途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哪怕是最可能的。左翼反对派与这种资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它也同样不能同意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这个理論是向资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投降的表現。

摘譯自《苏联的发展問題》(1931年)，  
紐約1931年版第9—10頁。

3. 对外貿易垄断制使苏联“脱离国际分工”，“与世界經濟隔絕”，从而使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成为“不可能”。“假如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对外貿易垄断制当然就不需要了；苏联就可以以較資產阶级俄国有利得多的条件，从較发达的国家取得自己缺少的产品。”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领导，即使是最正确和最明智的领导，假如由于实行对外貿易垄断而使其国家与世界經濟隔絕，都不可能使苏联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推迟几十年，苏維埃共和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注定要垮台，

**或者純粹是經不住經濟矛盾的压力，或者由于軍事干涉而消亡。**  
用政治术语来讲，这就是說，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在我們前面說过的一般条件下，既取决于对国内的經濟領導，又取决于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領導。总之，恰恰是后一因素才能解决一切。

摘譯自《十月革命十二周年》(1929年10月17日)，  
載于《托洛茨基文选》第1卷巴黎1955年版第75頁。

**但是不要忘記，对外貿易垄断制自然而然地使俄国脱离国际分工，脱离资本主义演变賴以完成的基础。其直接后果是就整体來說經濟在增长，而对外貿易却大量縮減。因此，迅速发展用于工业化的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维埃共和国必須生产一切原来资产阶级俄国以远为有利的条件从国外取得的物品。假如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对外貿易垄断制当然就不需要了；苏联就可以以較资产阶级俄国有利得多的条件，从較发达的国家取得自己缺少的产品。**

摘譯自《十月革命十二周年》(1929年10月17日)，  
載于《托洛茨基文选》第1卷巴黎1955年版第74頁。

**4. 說“同农民的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本身所必需的，但这不能代替国际革命”，用以“改造农村”的工业也得在“国境之外”去解决。**

能不能設想，欧洲资本主义在三十一——五十年內将腐朽下去，而无产阶级却没有能力完成革命？請問，为什么我一定要接受这种只能称之为对于欧洲无产阶级抱着毫无根据的漆黑一团悲观主义的前提，同时又得发揚对靠我国孤立无援的力量建設社会主义的无批判的乐观主义呢？我的共产党员的理論或政治上的責任在什么意义上使我必須接受这样的前提：欧洲无产阶级在四、五十年內夺取不到政权（如果夺得到政权，那末爭論的問題也就沒有了）。我肯定，我沒有任何理論或政治上的根据去設想，我們和农民一起

**建設社会主义会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还容易些。**

**不，这里較大的成功的可能性完全是在欧洲无产阶级那一方面。**

摘譯自《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发言》  
(1926年11月1日)，載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  
(速記記錄)》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533頁。

**不过，除了这个“最低限度的”方案之外，必須立即准备另一个更加长远的、不仅估計到國內資源而且估計到国外資源的方案。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决不比俄国农民真正集体化的前景的現實性更小。更确切地說，第二种前景只有同第一种前景联系起来才能成为現實。共产国际的官方領導执行着这样的政策，就好象我們处在欧洲无产阶级起义的前夕一样。同时，十至十五年的經濟計劃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制訂的，即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要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远远抛在后面”。从反动的、空想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論产生出来的这种两重性，貫穿着共产国际的綱領和它所有的政策。沒有人知道日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說的：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毫无疑问将比在苏联消灭阶级更接近于这个日期。**

摘譯自《世界失业問題和五年計劃》(1930年)，  
科伦坡1952年英文版第2—3頁。

**但是，苏联最剧烈的震动是由下列事实造成的，即目前的领导設法把迫不得已的事装成心甘情願的样子，他們从工人国家的政治孤立中制定出一个經濟上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綱領。这就导致試圖在資本主义以前的农具的基础上把农民土地全盤社会主义集体化——一种最危险的冒险，这种冒险有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可能性遭到破坏的危险。**

摘譯自《〈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1930年3月29日)，載于《不断革命》伦敦1962年版第31—32頁。

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社会主义經濟的真正高涨，只有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后才有可能。”这些話竟然成了起訴书；然而当时它們却表达了全党的共同思想。一九一九年，列宁說过：“建設工作完全要看革命是否在欧洲最主要国家中迅速取得胜利。只有这个胜利之后，我們才能认真地抓建設事业。”<sup>①</sup> 这些話不是說明对俄国革命缺乏信心，而是說明深信世界革命即将来到。而现在，当苏联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社会主义經濟的真正高涨”只是在国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的这种說法仍然是正确的。

过去，党也是以同样的观点来观察农业集体化問題的。无产阶级若不通过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引导农民到达社会主义，便不能建設新社会，因为农民在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好多国家中占绝大部分——，而且在全世界也占很大的多数。一切問題当中的这个最困难的問題的解决，归根到底依賴于工农业之間的量和质的对比关系。城市越是能够卓有成效地使农民的經濟和文化繁荣起来，农民就会越自觉自願地和成功地走上集体化道路。

然而，有沒有足够的工业来改造农村呢？列宁又把这个問題推到了国境之外。他在苏維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說道：“就世界范围來說，能够給全世界供給一切产品的发达的大工业是有的……這是我們估計的根据。”<sup>②</sup> 俄国的工农业之間的对比关系比西方国家的要不相适应得多，这种关系至今仍是在某些时刻威胁着苏維埃制度的稳定的經濟和政治危机的基础。

根据以上所說，可以看出，所謂“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决不是以在一国之内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为基础的。惟有嘲弄苏維埃政权的孟什維克才把这样的計劃算在它的賬上。在布尔什維克看

① 沒有查到列寧的原文。——編者注

② 《列寧全集》第33卷第129—130頁。——編者注

來，因經濟破坏和內戰而不得不实行的斯巴達式制度的未来命运，直接依賴于西方革命的发展。一九一九年一月，正值战时共产主义处在高潮的时候，列寧說道：“我們还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共产主义粮食政策的原則，并把这些原則坚决貫彻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sup>①</sup> 那时列寧和全党都錯了。后来我們不得不修改粮食政策。現在我們可以断定，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头两三年內欧洲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俄国要沿着新經濟政策的道路后退仍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回顾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阶段，我們就很清楚地看到：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及其幻想，同不断革命的前途是多么紧密地互相交織在一起。

三年內战結束时所发生的深刻的内部危机，包含着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間、党和无产阶级之間有发生直接破裂的危险。从根本上重新审查苏維埃政权所采用的方法，就成为必要的了。列寧解釋說：“我們必須在經濟上滿足中农，实行周轉自由，否則，在国际革命延緩的情况下，在俄国要保持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sup>②</sup>。但是，在采取新經濟政策时，國內任务和国际任务之間的联系会不会根本破裂呢？

列寧在他的給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写的提綱中对那时正在开始的新阶段作了一个总的估計：“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的观点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要在实际上考驗和检验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資产阶级群众的政策。”<sup>③</sup> 他对新經濟政策的輪廓所下的定义本身就把一国社会主义問題一笔勾銷了。

在討論和草拟工业中的一些新方法那些日子里，列寧为自己

① 《列寧全集》第 28 卷第 377 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 32 卷第 214—215 頁。——編者注

③ 同上，第 444 頁。——編者注

所写的那些話，也具有同样的教育意义：“只要在十——二十年內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sup>①</sup>

目标确定了：这就是要使我們自己适应于一个新的更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西方革命成熟所必需的。在这个意义上，而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表示确信：“新經濟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sup>②</sup>

說在这里国际革命的思想根本沒有改变，还嫌不够；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思想表現得更加深刻更加清楚了：列寧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解释新經濟政策的历史地位时說，“在資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有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发展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資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們在許許多的著作中，在我們所有的讲演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都強調說，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則占絕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

“另一个条件，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間互相協議……

“……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協議，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sup>③</sup> 問題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集合为一点。**同农民的联盟是苏維埃政权的存在本身所必需的；但这不能代替国际革命，惟有国际革命能够創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經濟基础。**

摘譯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  
伦敦 1936 年版第 1241—1243 頁。

① 《列寧全集》第 32 卷第 313 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 33 卷第 401 頁。——編者注

③ 同上，第 32 卷第 203—204 頁。——編者注

## 五、世界社会主义經濟

1. 声称“世界社会主义經濟决不是民族社会主义經濟的总和”，它只有“通过把单独国家的各种内部不协调交给许多国家来共同解决，通过各国间的互相服务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部门的相互补充，才能建立起来”，即“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从世界范围的分工出发，使国际间的货物交换和互相服务得到最高限度的发展。”攻击说，斯大林所指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一种建立在国际分工之上的世界社会主义經濟，而是一种体现着极乐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公社的联盟”。

要是我們把“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几个字解释为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种說法，那末我們就会得出一个任何人不能反駁的一般結論，虽然这个結論的表述應該不是那样模棱两可。但是这不是綱領作者們所想的。他們所說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仅是夺取政权和生产資料的国有化，而且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是我們接受这种解釋，那我們得出的将不是一种建立在国际分工之上的世界社会主义經濟，而是一种体现着极乐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公社的联盟，所不同的只是，这些公社将扩大到現有民族国家的規模。

綱領硬要利用旧的、习惯的公式，折衷地把新說法掩盖起来，它乞灵于下列論点：

“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完全的世界范围的胜利、它的世界范围的政权得到巩固以后，一个长期的紧张的世界社会主义經濟建設

时代才会到来。”(第四章)

把这个原理作为一面理論盾牌实际上只能暴露出根本的矛盾。要是我們把这个論点解释为真正社会主义建設的时期只能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至少在几个先进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才开始，这簡直就是推翻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而回到了馬克思和列寧的立場。但是如果我們从体现于綱領草案各个章节中的斯大林、布哈林的新理論出发，那我們会得出如下的发展前景：在世界无产阶级取得完全的世界范围的胜利以前，許多单个国家分別在本国內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然后由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世界社会主义經濟，就象小孩子用現成的积木造房子一样。**事实上，世界社会主义經濟决不会是民族社会主义經濟的总和。**它的基本特点只有在資本主义过去全部发展所造成的世界范围的分工的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就其基本成份來說，它的构成和建立不是在許多单个国家建立了“完全的社会主义”以后，而是在需要数十年时间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之中。衡量第一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經濟成就的标准将不是它們接近自給自足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程度，而是专政本身的政治稳定性和在准备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經濟要素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

摘譯自《列寧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54—55頁。

制訂其目的在于緩和正在来到的危机的最低限度的計劃，必須从苏联經濟目前所处的孤立地位的事实出发。但同时必須拟定一个以苏联經濟和世界經濟实行广泛的相互联系为基础的方案。十年、十五年、甚至更多年的總計劃不可能用別的办法制訂出来。

显然，有系統的、全面的、国际性經濟合作，只有在各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才有可能。然而，首先，这个大轉变的时间不能預見到。这就是为什么必須在政治上和經濟上

进行及时的准备的原因。

摘譯自《世界失业問題和五年計劃》(1930年)，  
科伦坡1952年英文版第4頁。

总之，我們沒有把十月革命归因于俄国的落后，而把它归因于綜合发展的規律。历史的辩证法既不知道有赤裸裸的落后，也不知道有化学般純粹的进步，这完全是一个具体的相互关系的問題。人类当前的历史充滿了各种“古怪現象”，虽然不象在落后国家产生无产阶级专政那样古怪，属于同一历史典型。落后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正在热烈接受唯物主义學說，而文明英国的工人領袖却相信教会的經咒魔力，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經超过了英国。但是，从中国工人对麦克唐納那种中世紀式愚蠢的鄙視，不能得出中国在一般发展上已經超过大不列顛的推論。英國在經濟和文化上的优越性是能用准确数字表明的，这些数字尽管生动有力，却不能排除中国工人先于英国工人取得政权的可能性。而将来中国无产阶级的专政也决不是意味着在万里长城的疆域內建設社会主义。学究式的和迂腐片面的标准或者过于近視的民族标准都不适用于我們的时代。世界的发展迫使俄国擺脫落后地位和亚洲式状态。离开这种发展的錯綜复杂的关系，俄国未来的命运是无法理解的。

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既反对封建所有制关系，又反对地方割据的局面。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解放旗帜上并排地写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西方人早已穿破这种童鞋了。我們时代的生产力不仅突破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而且冲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都已成为束縛世界经济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既反对生产資料私有制，又反对世界经济的民族分裂状态。东方各国民众争取独立的斗争包含在这个世界过程之中，而且必然要同这个过程汇合起来。建立一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这样一个

目的一般能够實現的話——意味着人类經濟力量的大倒退。正因为如此，它是不能實現的。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經濟事实的表現。正如过去自由主义是民族的一样，社会主义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从世界范围的分工出发，使国际間的貨物交換和互相服务得到最高限度的发展。从来沒有任何地方的一次革命完全符合革命参加者原来的想法，它也不可能做到这样。虽然如此，参加斗争的那些人的思想和目的却是革命的重要組成因素。这对十月革命來說尤其正确，因为过去革命者心目中的革命理想，从来沒有象一九一七年那样与事变的实际內容如此密切相近。

摘譯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載于《俄国革命史》伦敦1936年版第1220—1221頁。

由于世界性的分工，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各国經濟的相互依赖，由于各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的不平衡性，由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規律，社会主义的結構，只有通过經濟螺旋体系統，通过把单独国家的各种內部的不协调交給許多国家来共同解决，通过各国間的互相服务以及經濟和文化的各个部門的相互补充，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說，归根結蒂，只有在世界范围之内才能建立起来。

同上，第1252頁。

2. 声称經濟发展的“自然趋势”是“力求打破国家疆界”，“只有废除了私有制和国与国之間的障壁”，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創造条件”。统一的世界經濟“同民族界限和国家关卡无关，而只服从于土壤、地下資源、气候的性能和分工的需要”。因此，民族国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已經“过时”。宣称“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

創立一个远为強大的、更能抵御強敌的祖国——共和歐洲聯邦”(歐洲聯邦和美洲聯邦是世界經濟組織的两个中樞),“以作为世界聯邦的基地”。

资本主义所发展的生产力，已經突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民族国家，即当前的政治形式，对于这些生产力的运用来说，已嫌过于狭窄。因此，我們經濟制度的自然趋势，乃是力求打破国家疆界。整个地球，陆地与海洋、地面和地下，都已变成一个經濟工場，地球的各个部分已彼此不可分离地連結着。这项工作是由資本主义来完成的。与此同时，这项工作的完成也促使資本主义国家使世界經濟服从各国資产阶级的利潤收入。帝国主义的政治首先证明：在一七八九——一八一五年，一八四八——一八五九年，一八六四——一八六六年以及一八七〇年等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旧式的民族国家，已經衰老，它現在已經成为經濟发展的不可容忍的障碍。

当前的战争，归根結蒂是生产力对于民族和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一种反抗。它意味着作为一个独立的經濟单位的民族国家的瓦解。

.....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对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說来，問題不在于保卫这个过时的和陈旧的民族“祖国”，因为它业已变成經濟发展的主要障碍。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創立一个远为强大的、更能抵御强敌的祖国——欧洲共和联邦，以作为世界聯邦的基础。

无产阶级只能用社会主义的世界經濟組織作为現时的实践綱領，来对付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混乱局面。

战争乃是資本主义在其发展的登峰造极阶段，用以寻求解决其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方法。无产阶级只能用它自己的方法，即社

会革命的方法，来制止战争。

摘譯自《布尔什維克与世界和平》(原名《战争与国际》)

(1914年10月)，紐約1918年版第20—23, 28—29頁。

資本主义力图把民族和經濟都塞进国家的框框里去。它建立了强有力的、在整整一个时代当中作为民族和經濟的发展舞台的建筑物。但是民族和經濟既同国家发生了矛盾，二者彼此之間也发生了矛盾。对于經濟說來，国家变得太狭小了。国家为了竭力扩张，就蹂躏民族。另一方面，經濟拒絕使自己力量和資源的自然运动服从地球上民族集团的划分。国家本质上是經濟的組織，它一定要适应經濟发展的需要。閉关自守的民族国家的地位，必然会被各先进国家在消灭一切关税壁垒基础上的广泛民主联盟所取代。由文化发展的需要所产生的民族共同性，不但不会因此而消灭，相反地，只有在各先进国家共和国联盟的基础上，它才能臻于完善。作到这一点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使民族的框框摆脱經濟框框、以及經濟框框摆脱民族框框的束縛。要在作为世界組織之中心的欧洲联邦的广闊舞台上來組織經濟。政治形式只可能是共和国联盟，在这一联盟的灵活的富有弹性的范围之内，每一个民族都可以非常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力量。

同德国的以及其他的社会兼并分子相反，我們决不打算抛弃对民族自决权的承认。相反地，我們认为，这种权利最后能付諸实现的时代快要来到了。另一方面，我們完全不是要把每一个民族集团和小集团的“拥有主权的”权利同經濟的集中化的需要对立起来。但是我們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本身当中使民族的和經濟的这两种“自发势力”辩证地調和起来。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对于我们來說，必須以一切先进民族民主联盟的口号、欧洲联邦的口号作补充。

摘譯自《民族和經濟》(1916年7月9日)，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215頁。

民族自決權不可能從無產階級的和平綱領中抹去，但是它不能妄求絕對的意义，相反地，它受到歷史發展中我們遇到的深刻的进步趨勢的限制。一方面，這種“權利”必須——通過革命力量——同奴役弱小和落後民族並蹂躪民族文化發源地的帝國主義集中方法相抗衡，另一方面，無產階級也不能允許“民族原則”阻擋現代經濟在我們整個大陸、並進而在全世界有計劃地組織起來的不可抑制的和深刻的进步趨勢，帝國主義用資本主義的貪暴的形式表現了這種經濟趨勢——徹底擺脫民族局限性的愚昧狀態，如同它當時擺脫村和區的局限性的愚昧狀態一樣。社會主義在反對經濟集中的帝國主義形式的同時，不僅不反對這種趨勢本身，而且相反地要把它作為自己的指導原則。

從歷史發展的觀點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的觀點看來，現代經濟的集中趨勢是基本的，必須確保它有充分可能完成其真正解放的歷史使命：建立聯合的世界經濟，這種經濟同民族界限和國家關卡无关，而只服從於土壤、地下資源、氣候的特性和分工的需要。波蘭人、亞爾薩斯人、达尔馬提亞人、比利時人、塞爾維亞人以及還沒有被占領的歐洲其他弱小民族，只有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才能得以復興或者第一次在他們所嚮往的民族範圍內立足，而主要的是，只有到民族集團不再成為經濟集團，不再同國界聯繫在一起，不再在經濟上彼此隔離和彼此對立這樣的程度，他們才能留在這些範圍之內並自由地保持自己的文化。換言之，為了使波蘭人、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等等能夠建立真正不受限制的民族統一，必須消滅目前把他們分割成各個部分的國界，必須使作為經濟組織而不是民族組織的國家的範圍擴展開來，而包括被海關和疆界所割開、被目前戰爭所撕裂的整個資本主義歐洲。歐洲本身的國家聯合是歐洲大小民族自決的前提。只有在擺脫了國家關稅壁壘的民主聯合的歐洲的屋頂下，民族和文化才可能在真正自決的基礎上，在擺脫

民族对抗和經濟对抗的情况下存在和发展。

摘譯自《和平綱領》(1917年5月)，載于  
《戰爭與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  
第493頁。

但是現在，在俄国革命的大有希望的开端之后，我們有一切理由期望，就在这次战争期間，强大的革命运动会在全欧洲开展起来。很明显，它只有作为全歐的运动才能順利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內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它必然会遭到毁灭。我們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指出了威胁着俄国革命的来自德国軍国主义的危险。这种危险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危险。对俄国革命來說，英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軍国主义比起霍亨索伦王朝的軍事机器来，并不是威胁性更小的敌人。拯救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把革命轉到整个欧洲去。如果革命运动在德国扩展开来，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就会在西方的“敌对”国家中寻找并找到革命的反响；而如果欧洲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政权，那么即使仅仅是为了掌握住这个政权，它也会不得不立即使这个政权去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換言之，**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建立，只有在全欧洲的幅員之内、也就是說在欧洲共和联邦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場合下，靠武力、靠工业和外交协定都不能取得的欧洲的国家联合就会成为得胜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項迫切任务。

**欧洲联邦是我們已經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不管今后軍事行动的进程如何，不管外交界对目前的战争作出什么样的总结，不管革命运动在最近时期的发展速度如何，欧洲联邦口号在一切情况下都将作为欧洲无产阶级爭取政权的政治公式而获得巨大意义。这一綱領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框框，作为阶级斗争的基地，因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

**都已經過時了。只有當我們把建立新的、更高級的革命“祖國”——共和歐洲的進步任務同保守地保卫過時的民族祖國對立起來的時候，我們對“保卫祖國”這一過時的無產階級政治綱領的否定才不再成為在思想政治上的自衛的純粹消極的行動，而獲得自己的全部革命內容。無產階級只有以共和歐洲為出發點，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組織起來。**

有些人教條主義地問：“為什麼是歐洲的聯合，而不是全世界的聯合？”，這裡順便也對這種人作了答復。歐洲不僅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而且是某種經濟和文化歷史的共同體。歐洲革命不必等待亞洲和非洲的革命，甚至也不必等待澳洲和美洲的革命。然而，沒有德國的革命，俄國或英國的勝利的革命是不可想像的，反過來說也是一樣。現在的戰爭被稱為世界大戰，然而甚至在美國參戰以後，作戰的仍然是歐洲。而革命的問題也首先擺在歐洲無產階級面前。

**不言而喻，歐洲聯邦將僅僅成為世界經濟組織的兩個中樞中的一個。另一個中樞將是美洲聯邦。**

同上，第497—499頁。

9. 在資本主義同中世紀地方割據主義進行的鬥爭中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變成了資本主義的正統的活動場所。但是，民族國家剛剛形成，就成了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障礙。生產力和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再加上生產力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這個主要矛盾，使資本主義的危機變成世界性的社會制度的危機。

10. **如果國與國之間的邊界，能夠一下子廢除的話，那末，甚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在一定的時期內還能夠繼續上升到一個較高的水平的（這當然要作許多犧牲）。**如果取消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那末正如蘇聯的經驗所表明的，甚至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生產力也有可能獲得較高的發展。但是，只有廢除了私有制和

国与国之間的障壁，才能为一种新的經濟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創造条件。

11. 保卫民族国家，首先在分裂成許多小国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发祥地——是一項十足的反动的任务。設有边界、通行证、貨币制度、关卡以及保护关卡的军队的民族国家，已經变成为人类社会經濟和文化发展的可怕障碍。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保卫民族国家，而是完全地、最后地清除掉民族国家。

摘譯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9—10頁。

## 六、西方革命和一国社会主义

胡說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間的矛盾、苏联國內的矛盾都“直接取决于欧洲和世界斗争的趋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某些主要国家內的胜利将打破资本主义包围，并将解除我們沉重的軍事負担”，在技术上大大加強我們，“大大加速我們的城市和乡村、工厂和学校的全面发展”，使我們有可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声称“如果资本主义世界还能存在几十年，那末这对于社会主义俄国就等于判处死刑”。“苏維埃政权已不再可能单单依靠內部力量維持下去了”，“长期孤立的不可避免的結局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复辟”。“閉关自守”的苏維埃制度将“先蛻化，后垮台”。“沒有西方革命，布尔什維主义将会被國內反革命，或者国外武装干涉，或者此两者合伙消灭”。

如果资本主义世界还能存在几十年，那末这对于社会主义的

**俄国就等于是判处死刑。**

摘译自《关于俄国革命的讲话》(1922年11月14日),  
载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公报》第10号。

以我們社會結構无比的優越性，我們在“和平”時期利用世界市場以加速我國的工業發展，我們將能夠準備得更好和武裝得更好地對付封鎖或者干涉。

任何國內政策本身都不能使我們免於資本主義包圍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危險。國內問題就是用正確的階級政策——即工人階級同農民間的正確關係——加強我們自己，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盡量前進。蘇聯內部資源極為豐富，我們完全能够這樣前進。我們為了這個目的而利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就是把我們對歷史的根本估計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進一步發展結合起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在某些主要國家內的勝利將打破資本主義包圍，並將解除我們的沉重的軍事負擔。**它將大大地在技術上加強我們，大大地加速我們的城市和鄉村、工廠和學校的全面發展。它將使我們有可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這就是，以最進步的技術和所有成員真正平等地勞動和享用勞動成果為基礎的無階級社會。

摘自《俄國局勢真相》(1927年9月)，  
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56頁。

**我們國內的矛盾直接決定於歐洲和世界鬥爭的趨勢。**如果以馬克思主義的預見性為基礎採取正確的國內政策，可能對這些矛盾進行合理的控制，使它們有所緩和。但是只有在克服階級矛盾以後才能最終克服這些矛盾，而沒有歐洲革命的勝利就談不上克服階級矛盾。斯大林說得不錯，分歧正在於此。**這是民族改良主義和革命國際主義的根本分歧。**

摘譯自《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65頁。

一國社会主义論的必然后果是低估必須加以克服的困难，夸大已經取得的成就。斯大林斷言“社会主义已經在苏联實現了十分之九”。<sup>①</sup>再也找不出比这种断言更加反社会主义和反对革命的說法了。……为了加强他們的信心，需要的是严酷的真理，而不是甜蜜的謊言。我們不应当对他們胡說什么社会主义已經實現十分之九；我們必須告訴他們：我們今天的經濟水平以及社会和文化条件接近資本主义——而且是落后的不文明的資本主义——的程度远甚于接近社会主义的程度。我們必須對他們說：只有在最先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我們才会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必須不屈不挠地为这个目的而努力，同时使用两种杠杆——我們國內的經濟努力这个短杠杆，还有国际无产阶级斗争这个长杠杆。

同上，第 66 頁。

**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間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这个矛盾靠机动手段是逃避不了的。依靠对資本实行明确的、坦率承认的让步，依靠利用它的各个部分之間的矛盾，可以延长喘息时机，可以赢得時間，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只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而不是在任何的和所有的情况下。如果相信国际資产阶级能够被“中立化”，直到社会主义建成，也就是說，相信根本矛盾能借助于机动手段克服，那完全是自欺。这种自欺可以使苏維埃共和国灭亡。**只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我們擺脫这个根本性的矛盾。**

同上，136—138頁。

因此在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到来的时候，苏維埃共和国和共产

---

① 斯大林的原話是：“我国革命已經實現了这个綱領的十分之九。”这里說的“綱領”是指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綱領。参看《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270 頁。——編者注

国际正处于最大的困难和矛盾之中，这些困难和矛盾从反面证明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的正确。同列寧一样，在參加十月革命的时候，我們深信俄国革命不可能不依靠其他国家而取得完全的成功。我們认为十月革命只能是世界革命的第一环，而这一环的命运又决定于整个鏈条的命运。我們至今坚持这一立場。社会主义建設的进展及其矛盾同时在增长，如果苏維埃共和国日後得不到国际革命成功的支持，那么建設的进展必将被矛盾所吞沒。

摘譯自《十月革命十二周年》(1929年10月17日)，  
載于《托洛茨基文选》第1卷巴黎1955年版第  
79頁。

工人國家的正确政策不能降低到仅仅限于本民族的經濟建設。如果革命不循着无产阶级的螺旋綫向国际舞台扩展，那它必然会开始沿着官僚的螺旋綫局限于民族范围之内。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发展成欧洲和世界規模，它必然会朝着它本身崩溃的方向发展。作为广泛的历史远景，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无可爭辯的。

摘譯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年)，  
紐約1934年版第4頁。

已經為官僚主义所削弱的苏維埃政权瓦解的危机和无产阶级團結在一个能够拯救十月革命遺产的新党周围的时机，哪一个会先到来呢？对于这个問題沒有現成的答案，这要由斗争来决定。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考驗——可能是一次战争——将会决定力量的对比。总而言之，隨着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繼續衰落和法西斯統治的繼續扩大，苏維埃政权已經不再可能单单依靠内部力量來維持下去，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苏維埃国家唯一彻底改造的基本条件是胜利地开展世界革命。

同上，第26頁。

“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已不是一种历史的假設，而成为一个事实了——当然是在俄国，而不是在德国。但是，孤立状态这个事实也确切地表明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强大和社会主义的相对軟弱。从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一个永久废除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經歷一段漫长的历史道路，而这条道路同国际革命的道路是完全一致的。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215 頁。

說实在的，苏联的孤立并没有产生人們本来所害怕的那些具有直接危险的后果。资本主义世界太散漫混乱，瘫痪无力，因此它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潜力。事实证明，“喘息时机”比有眼光的乐观主义者所敢希望的还要长些。由于孤立，由于即使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对外貿易总额从一九一三年以来已經减少了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也不能使用世界經濟資源，結果不仅使軍事防衛費用浩大，而且使生产力的分布极端不利，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但是，孤立和落后所产生的一个更有害的产物却是官僚主义这条章魚。

由革命所建立的法律和政治准则对落后的經濟起了一种进步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准则本身却受到那种落后所发生的消极影响。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时间愈长，社会結構的蛻化也就愈深。长期孤立的不可避免的結局，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而是資本主义复辟。

如果说，资产阶级不可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那末，同样真实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和平地溶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摆在历史日程上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和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是接連不断的世界动乱：战争和革命。在苏联的国内生活中，动乱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官僚在爭取实现計劃經濟的斗争

中被迫使富农非富农化，那么，工人阶级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就会被迫使官僚非官僚化。后者的墓碑将刻上这样的墓志铭：

“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此长眠。”

同上，第 219—220 頁。

然而，布尔什维克不必等到莫斯科审讯的时候，才回过头来解释苏联执政党瓦解的原因。他们早就预见到并事先谈到过这一种发展的理论可能性。让我们回想一下不仅在十月革命前夜，而且在这以前许多年布尔什维克所作的预测。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力量的特殊结合使无产阶级可能在象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取得政权。但是这种力量的结合也预先表明，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或早或迟地迅速取得胜利，工人国家在俄国是站不住脚的。闭关自守的苏维埃制度定将垮台或蜕变。更准确些说：先蜕变，后垮台。一九〇五年以来我个人不得不一再论述这一点。在我的《俄国革命史》中（见最后一卷附录：《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我收集了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期间布尔什维主义领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所有这些言论都归结为一点：没有西方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将会被国内反革命，或者国外武装干涉，或者此两者合伙消灭。其中列宁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苏维埃制度的官僚化不是技术问题或组织问题，而是工人国家社会蜕变之可能的始点。

摘译自《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1937年），载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9—10月第58—59期第9页。

## (四)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

### 一、鼓吹废除民族国家

声称“民族”国家已成为經濟发展的障碍，“現在是打碎它的时候了”。把人类經濟“拉到民族狭隘性襁褓中去”的赤裸裸的民族思想是“反动的”，保卫民族国家是个“十足反动的任务”。鼓吹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完全地、最后地清除掉民族国家”。

帝国主义用資本主义的野蛮方式来表現經濟发展的这种进步趋势：使人类的經濟从民族和国家的紧紧的鎊铐中解放出来，然后把它建筑在世界規模之内。同帝国主义相对立的赤裸裸的民族思想，不仅是軟弱无力的，而且是反动的，因为它把人类的經濟拉向后退，拉到民族狭隘性的襁褓中去。为其軟弱性所决定的民族思想的可悲的政治使命，就是为帝国主义屠夫的行动在思想意識上打掩护。

正在破坏着經濟基础本身的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它是用思想貧乏的或招搖撞騙的民族思想来加以說明和补充的——，是資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已陷入絕境的最有說服力的表現。只有社会主义——它应当使民族在經濟上守中立，从而把人类联合在团结一致的合作之中；它要把世界經濟从民族的虎头鉗里解放出来，从而使民族文化从民族經濟競爭的虎头鉗里解放出来——，只有社

会主义能够提供一条出路来摆脱作为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可怕威胁而摆在我們面前的矛盾。

摘譯自《帝国主义和民族思想》(1915年5月6日)，  
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莫斯科一列寧格勒1927  
年版第208—209頁。

目前的战争，以它包含的发展趋势来看，所威胁着的不是民族本身，而是作为民族在历史上的居住場所的国家。资本主义所实现的民族团结少得同它所实现的民主一样。它造成了民族团结的需要，但是它也产生了一些不容许实现这种需要的倾向。而民族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强有力的和极其稳定的因素。民族正在经历着的不仅是目前的战争，而且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摆脱了国家的和经济的依赖性之桎梏的民族，将在长时期内一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发源地，因为这种文化的最重要的工具，即语言，是由民族来使用的。国家则是另外一回事。它是由于王朝的、帝国主义的和民族的利益交織在一起、以及由于各种暂时的物质力量的对比关系而形成的。国家比起民族来，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历史发展因素。在过去的时代里，经济发展是在非常勉强地被称为“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的。通过国家机构剥削或者力图剥削其他民族的、几乎总是被分裂了的民族的文化发展，也是在这个称为祖国的国家中进行的。因为一个国家的范围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变得很狭小，于是这个国家就用兼并和殖民地附属建筑物而扩充起来。为争夺殖民地，即为蹂躏落后国的经济和民族独立而斗争，构成了所谓民族国家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争夺殖民地的竞争导致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斗争。一个国家的范围最后已经容纳不下生产力了。如果说现在的“民族”国家正处在危险中，那末这种危险是由于它的边界同已经达到的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而产生的。危险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

敌人，而是来自內部，来自经济发展本身，因为经济发展用世界戰爭的語言告訴我們：“民族”國家已經成为发展的障碍，現在是打碎它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保卫祖国，即保卫已經过时的民族国家的思想，是一种很反动的意識形态。既然社会爱国主义者把民族的命运——民族本身决不麻痹经济发展，决不妨碍经济发展采取全欧洲的和世界的規模——同閉关自守的国家的和軍事的組織联系起来，所以我們国际主义者就不得不起来反对民族的保守的“爱国主义的”卫士而捍卫各民族独立和发展的历史权利。

資本主义力图把民族和經濟都塞进国家的框框里去。它建立了强有力的、在整整一个时代当中作为民族和經濟的发展舞台的建筑物。但是民族和經濟既同国家发生了矛盾，二者彼此之間也发生了矛盾。对于經濟說来，国家变得太狭小了。国家为了竭力扩张，就蹂躏民族。另一方面，經濟拒絕使自己力量和資源的自然运动服从地球上民族集团的划分。国家本质上是經濟的組織，它一定要适应經濟发展的需要。閉关自守的民族国家的地位，必然会被各先进国家在消灭一切关税壁垒基础上的广泛民主联盟所取代。由文化发展的需要所产生的民族共同性，不但不会因此而消灭，相反地，只有在各先进国家共和联盟的基础上，它才能臻于完善。作到这一点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使民族的框框摆脱經濟框框、以及經濟框框摆脱民族框框的束縛。要在作为世界組織之核心的欧洲联邦的广阔舞台上來組織經濟。政治形式只可能是共和联盟，在这一联盟的灵活的富有弹性的范围之内，每一个民族都可以非常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力量。

同德国的以及其他的社会兼并分子相反，我們决不打算抛弃对民族自決权的承认。相反地，我們认为，这种权利最后能付諸实现的时代快要来到了。另一方面，我們完全不是要把每一个民族集团和小集团的“拥有主权的”权利同經濟的集中化的需要对立起

来。但是我們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本身当中使民族的和經濟的这两种“自发势力”辩证地調和起来。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決权，对于我們來說，必須以一切先进民族民主联盟的口号、欧洲联邦的口号作补充。

摘譯自《民族和經濟》(1916年7月9日)，  
同上，第214—216頁。

9. 在資本主义同中世紀地方割据主义进行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变成了資本主义的正統的活动場所。但是，民族国家刚刚形成，就成了經濟和文化发展的障碍。生产力和民族国家之間的矛盾，再加上生产力与生产資料私有制之間的这个主要矛盾，使资本主义的危机变成世界性的社会制度的危机。

10. 如果国与国之間的边界，能够一下子废除的話，那末，甚至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在一定的时期內还能够繼續上升到一个較高的水平的(这当然要作許多牺牲)。如果取消生产資料的私人所有制，那末正如苏联的經驗所表明的，甚至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生产力也有可能获得較高的发展。但是，只有废除了私有制和国与国之間的障礙，才能为一种新的經濟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創造条件。

11. 保卫民族国家，首先在分裂成許多小国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发祥地——是一項十足的反动的任务。設有边界、通行证、貨币制度、关卡以及保护关卡的军队的民族国家，已經变成为人类社会經濟和文化发展的可怕障碍。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保卫民族国家，而是完全地、最后地清除掉民族国家。

12. 如果現在的民族国家还起着进步的作用，那末，不管它的政治形式如何，当然也不必去問是誰首先“发动”战争，还是必須保卫它的。把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的問題同某一特定政府的“罪行”問題混淆起来，那是十分可笑的。难道能够仅仅因为一所适于居

住的房子的火灾是由于房主人的不小心或意图不良所引起的就拒絕搶救嗎？但是这里所談的恰好是一所不~~适于生活而只适于死亡的房子~~。为了使各国人民能够生活下去，必須把民族国家的結構彻底夷平。

13. 进行保卫国家的說教的“社会主义者”，是为腐朽的資本主义效劳的小資产阶级反动派。只有在和平时期已經向民族国家宣告了不可調和的战争的政党，才能在战争时期不受民族国家的束縛，才能做到不信奉战争的地图，而信奉阶级斗争的地图。只有充分地認識到帝国主义国家客观上的反动作用，无产阶级先鋒队才能經得起各种各样社会爱国主义的侵襲。这就是說，只有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才能与“保卫国家”的思想和政策真正地划清界限。

摘譯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9—10頁。

## 二、否认有反帝正义战争

声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正义战争”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殖民地、任何一个被压迫民族，“如果不依靠某一个帝国主义強国，或者不充当它手中的工具，都不可能进行解放战争”。胡說民族战争和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經过去，“各落后国家的‘民族’战争再也不可能具有任何独立意义”。“落后国家的独立必然是半虛幻的”。“亚洲和非洲后起的革命并不能够为民族国家的复兴开辟一个新时代。”

由于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資产阶级民主派，俄国不可能有資产

階級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經过去了（至少对欧洲是如此），正如民族战争的时代已經过去一样。在民族革命和民族战争之間具有一种深刻的內在联系。我們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不仅是一种殖民掠夺的体系，而且也是一定的國內政制。它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和旧政权对抗，而是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对抗。

摘譯自《为政权而斗争》(1915年10月17日)，載于《一九〇五年》莫斯科1922年第2版第289頁。

当然，可以反駁英國的勳爵說：在将来的战争中，正如在目前的战争中一样，所有的主要参加者都是同一原則的代表者，因而現在用不着一般地談論什么“正义的”即在历史上进步的战争。在本报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中，我們不止一次地闡述过：各资本主义民族爭取世界地位的斗争，是一条基本“原則”，現在无论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政策还是它們的國內統治，都完全服从这条“原則”。誠然，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压迫它們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正义战争”，初看起來是可能的。但是在現今的世界关系和力量組合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殖民地，任何一个被压迫民族，如果不依靠某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或者如果不充当它手中的工具，都不可能进行解放战争。各落后国家的“民族”战争再也不可能具有任何独立的意义。但是，资本主义历史所实现的对事情的这种簡化，即把国际政策以及由这种政策所产生的战争都以帝国主义作分母絲毫不減輕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和平的保障的任务。宣布目前的边界或战争所造成的边界不可侵犯，这并不困难：在历史上已經这样做过不止一次。然而任何條約，任何仲裁法庭都不能阻止生产力的增长、它对民族国家框框的冲击以及民族国家要借助于軍国主义来扩大民族資本的剥削場所的意图。一劳永逸地、或者哪怕是长期地冻结世界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关系是完全不可

能的，这就使得各种和平主义的計劃和口号命中注定是毫无用处的。

摘譯自《“和平的保障”》(1916年9月)，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莫斯科一列寧格勒1927年版第238—239頁。

16. 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問題占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甚至到今天都还在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战斗。它們的斗争具有双重的进步意义：它使落后人民摆脱亞細亞主义、地方主义和外国的束缚，从而给予帝国主义国家以有力的打击。但是必须預先清楚地理解到，亚洲和非洲后起的革命并不能够为民族国家的复兴开辟一个新时代。殖民地的解放在将来只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巨大的插曲，正如在半殖民地国家俄国发生的后起的民主革命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序曲一样。

摘譯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紐約1934年版第11頁。

同时，第四国际預見到，而且公开提醒落后的民族：它們的迟到了的民族国家，再不能寄望于独立的民主发展了。一个处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包围中并陷入帝国主义矛盾中的落后国家的独立必然是半虛幻的，而它的政府在内部阶级矛盾和外部压迫的夹攻下，也将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压迫人民的独裁制，——土耳其的人民党，中国的国民党的政府如此；印度的甘地政府在将来也会如此。殖民地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从革命的无产阶级观点看来，不过是一个把落后国家引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去的过渡阶段罢了。

摘譯自《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第四国际紧急會議宣言，1940年5月)，第24頁。

### 三、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革命性

断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比“处在民主革命时代的一个非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更进步和更革命”。“越往东方向去，资产阶级就越下贱、越卑劣”。声称认为“殖民地压迫必然会使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这就是“重犯”“孟什维主义的根本错误”。

和资产阶级达成任何协议的唯一“条件”，为了适应某一具体情况而达成的任何单独的、属于实用范围的、作为权宜之计的协议所需要的唯一“条件”，在于一天也不容许、甚至片刻也不容许组织上或旗帜上的混淆，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混淆；在于区分红色力量和蓝色力量，在于一分钟也不相信资产阶级能够或准备领导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或不去妨碍工人和农民。就作为权宜之计的实用的协议而言，我们绝对不需要上述那种条件。相反地，它只能给我们造成危害，和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即使在存在“协议”的短暂时期，这个斗争也不会中断——的总路线背道而驰。过去早就说过，如果在当时这种协议是有利的话，即使和魔鬼本身也可以达成纯属实用范围的协议，例如对我们不会有任何政治上的约束，也不会使我们承担任何政治义务的协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魔鬼完全皈依基督教，要求他不用自己的角来反对工人和农民而专门为虔诚的目的服务，这种要求是荒谬的。我们提出这种条件，实际上是在给魔鬼当保镖，祈求他让我们充当他的教父。

摘译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纽约1936年版第168—169页。

列寧事實上曾經教導我們要严格划分被压迫的和实行压迫的資產階級國家。由此可以得出极为重要的結論。例如我們對待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之間的戰爭的态度：对于一个和平主义者來說，这样一场戰爭就和其他任何戰爭一样；而对一个共产党人來說，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戰爭則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戰爭。这样一来，列寧就把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起义和被压迫国家的戰爭提高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水平，特別是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水平。但是，列寧根本沒有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轉变以后的布哈林現在所做的那样，把民族解放戰爭置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上。列寧坚持要区分被压迫的資產階級國家和資產階級压迫国家。但是列寧在任何地方也沒有提出过，也决不可能提出這樣的問題，彷彿处在民族解放斗争时代的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資產階級必定比处在民主革命时代的一个非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更进步和更革命。这既不能从理論上找到任何根据，也不能从历史上得到任何证实。举例來說，尽管俄国的自由主义是很可怜的，尽管它的左面一半——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是一个大杂燴，但是未必能够說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資產階級民主达到了比它們的俄国原型更高的水平，或者更为革命。

把問題說成彷彿殖民地压迫必然会使民族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那就是彻底重犯认为俄国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是封建和专制压迫的必然产物的、孟什維主义的根本錯誤。

同上，第 171—172 頁。

甚至在过去三年来的中国事态发展出現以前，馬克思主义者就清楚地知道——而今天甚至瞎子都應該清楚地知道——作为中国内部生活的一个直接因素的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的米留可夫

們和中国的克伦斯基們归根結底甚至要比他們的俄国原型更加卑劣。我們党在发表得最早的一个宣言中不是毫无原因地指出过：我們越往东方去，資產階級就越下賤、越卑劣，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的任务也就越重大<sup>①</sup>。这个历史“規律”对中国也是完全适用的。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179頁。

普列汉諾夫裝腔作勢地固執地閉起眼睛，不理會十九世紀政治史上的實際教訓：無論什么地方，无产阶级一作為獨立力量出現，資產階級就要轉入反革命營垒去。群众斗争愈加勇敢，自由派就愈加迅速变为反动派。至今還沒有人發明一種能使階級斗争規律不起作用的办法。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下冊第553頁。

#### 四、混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的不同阶段

斷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要彻底地真正解决民主和民族解放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它們爭取民族独立、資產階級民主的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沒有分成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是彼此互为因果的”。胡說“在国民党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間阶段，即沒有工农民主专政”。

---

①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原文是：“在欧洲，越往东去，資產階級在政治方面也越軟弱、越怯懦、越卑劣，无产阶级所担负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也越大”。——編者注

二、对于资产阶级发展较迟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说，不断革命论意味着，要彻底地真正解决它们的民主和民族解放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民族的领导者、首先是作为它的农民群众的领导者——的专政才有可能。

三、在民主革命中，不仅土地问题而且民族问题都给落后国家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安排了一个特殊地位。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可能解决，甚至不可能认真地提出。但是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只有通过同民族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才能实现。

四、不管个别国家中革命的最初插曲性阶段的情况如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只有在组织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就是说，民主革命，只有通过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并且首先解决民主革命的所有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五、从历史的角度来估价，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确切地表达了上面所说的那种无产阶级、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已经为十月的经验所证实。但是列宁的旧公式并没有预先解决在革命联盟内部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换句话说，这个公式有意保留了某种代数学的性质，这种性质就是要在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演算出比较确切的算术数字。然而，历史经验表明，而且在不可能作任何歪曲解释的情况下表明，农民所担任的革命角色无论多么伟大，它决不能担任独立的角色，更不用说担任领导的角色。农民不是跟着工人走，便是跟着资产阶级走。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只有作为领导着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才是可以设想的。

六、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就其阶级内容来说，是与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的一种制度，它只有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

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这个党要能够代表农民的利益和总的來說也能够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要能够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程度的援助下夺取政权，并且要能够决定自己的革命纲领。整个现代史表明，特别是最近二十五年的俄国经验表明，在建立农民政党的道路上，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就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内部分化，由于这种原因，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上层分子在一切决定性的关头，尤其是在战争和革命中，总是跟着大资产阶级走，下层分子跟着无产阶级走，中层分子则不得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在克伦斯基政权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在国民党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阶段，即没有工农民主专政。

七、共产国际硬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主专政这个口号强加于东方国家的企图，早已为历史彻底粉碎，这种企图只能起反动的作用。只要这个口号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对立，它在政治上就会促使无产阶级溶解于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这样就会为民族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因而也会为民主革命遭到失败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在共产国际纲领中采用这个口号，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十月传统。

八、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了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同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有密切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

.....

十一、上面关于世界革命发展的简要论述，一笔勾销了现在的共产国际纲领迂腐死板地把国家划分为社会主义“已经成熟”或“尚未成熟”的问题。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建立了世界市场，创造了世界的分工和生产力，整个來說它也就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世界经济。

不同的国家都将以不同的速度经历这个过程。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

一个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它的无产阶级没有作好联合农民和夺取政权的充分准备，就不能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反之，在一个无产阶级由于进行了民主革命而掌握了政权的国家，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归根到底不仅取决于本民族的生产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

十三、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理論同俄国革命的全部經驗背道而驰，它不仅机械地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而且把民族革命同国际革命割裂开来。

这种理論向落后国家的革命提出建立一种根本不能实现的民主专政制度的任务，同时又把这种制度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样，这种理論就把幻想和虚构带到政治中来，麻痹东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妨碍殖民地革命的胜利。

摘譯自《不断革命論》(1929年)，伦敦1962年  
版第152—157頁。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就其本质說来是落后国家。但是落后国家是帝国主义統治下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它們的发展具有綜合性质，即最原始的經濟形式同資本主义技术及文化的最新成就相結合。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治斗争也可以同样确定为：把爭取实现最基本的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与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结合起来。在这个斗争中，民主口号、过渡要求和社会主义革命問題沒有分成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是彼此互为因果的。中国无产阶级刚开始組織工会就不得不动手組織苏維埃。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綱領完全适用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

家，至少适用于无产阶级已經能够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国家。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即消灭封建殘余）和民族独立（即擺脫帝国主义束縛）。这两項任务彼此密切相关。

不能单单拒絕民主綱領，必須让群众在斗争中去取消它。对于象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爭取成立国民（或制宪）議会的口号仍然具有充分的效力。必須把这个口号同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問題緊密地結合起来。作为第一步，工人必須以这个民主綱領武装起来。只有他們能够号召和團結农民。必須让工人在革命的民主綱領的基础上反对民族資產阶级。然后，在革命的民主政体的口号下动员群众的某一个阶段，便能够而且應該建立苏維埃。在每一个特定时期，苏維埃的历史作用，特別是它們同国民議会的关系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水平、他們同农民的联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的性质。苏維埃迟早必然会推翻資產阶级民主政体。只有它們能够結束民主革命并且开辟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个别的民主和过渡的要求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相对重要性、它們的共同联系和提出要求的次序，决定于每一个落后国家的特点和具体条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它的落后程度。尽管如此，在所有落后国家中，革命发展的总趋势可以依据俄国的三次革命（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一九一七年十月）所明确闡明的意义，由不断革命的公式来决定。

摘自《資本主义的垂死掙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1938年9月3日），紐約1946年版第40—41頁。

## 五、鼓吹“欧洲联邦”，取消民族自决

說对許多被压迫民族來說，“自決就是廢除現存的疆

界和肢解目前的国家”。声称民族自决权“不能妄求絕對的意义”，“欧洲本身的国家联合”、“經濟和政治聯合是民族自决成为可能的必要前提”，自决权只有在欧洲联邦共和国的条件下“才能有血有肉”。不应当“退回到‘自治的’民族国家”去，而应当建立“共和欧洲联邦”。

对許多（如果不是对大多数）被压迫民族、民族集团和残余來說，自决就是废除現存的疆界和肢解目前的国家。同时，这一民主原則也包括使殖民地就得解放。然而，帝国主义的全部政策却是不顾民族原則去扩大国界，在于把弱小民族强行納入关税界限之内，攫取新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扩张的和进攻的，它的特征正是自己的这种性质，而不是变化无常的外交手腕。

摘譯自《和平綱領》（1917年5月），載于《战争与革命》  
莫斯科1925年版第2卷第491頁。

民族自决权不可能从无产阶级的和平綱領中抹去，但是它不能妄求絕對的意义，相反地，它受到历史发展中我們遇到的深刻的进步趋势的限制。一方面，这种“权利”必須（通过革命力量）同奴役弱小和落后民族并蹂躏民族文化发源地的帝国主义集中方法相抗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也不能允許“民族原則”阻挡現代經濟在我們整个大陆、并进而全世界有計劃地組織起来的不可抑制的和深刻的进步的趋势。帝国主义用資本主义的貪暴的形式表現了这种經濟趋势——彻底摆脱民族局限性的愚昧状态，如同它当时摆脱村和区的局限性的愚昧状态一样。社会主义在反对經濟集中的帝国主义形式的同时，不仅不反对这种趋势本身，而且相反地要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則。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观点看来，現代經濟的集中趋势是基本的，必須确保它有充分可能完成其真正解放

的历史使命：建立联合的世界經濟，这种經濟同民族界限和国家关卡无关，而只服从于土壤、地下資源、气候的特性和分工的需要。波兰人、亚爾薩斯人、达尔馬提亚人、比利时人、塞尔維亚人以及还没有被占領的欧洲其他弱小民族，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能得以复兴或者第一次在他們所向往的民族范围内立足，而主要的是，只有到民族集团不再成为經濟集团，不再同国界联系在一起，不再在經濟上彼此隔离和彼此对立这样的程度，他們才能留在这些范围之内并自由地保持自己的文化。換言之，为了使波兰人、塞尔維亚人、羅馬尼亞人等能够建立真正不受限制的民族統一，必須消灭目前把他們分割成各个部分的国界，必須使作为經濟組織而不是民族組織的国家的范围扩展开来，而包括被海关和疆界所割开、被目前的战争所撕裂的整个资本主义欧洲。欧洲本身的国家联合是欧洲大小民族自决的前提。只有在摆脱了国家关税壁垒的民主联合的欧洲的屋頂下，民族和文化才可能在真正自决的基础上在摆脱民族对抗和經濟对抗的情况下存在和发展。

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之直接取决于欧洲整个制度的这种情况，使无产阶级不可能离开欧洲革命而提出諸如波兰的独立或全体塞尔維亚人的統一的問題。但是从另一方面來說，这意味着作为无产阶级和平綱領組成部分的自決权具有不是“烏托邦的”而是革命的性质。这种見解是針對两种人，既針對德国的大卫之流和兰德斯堡之流，也針對我們革命阵营中那些把問題看得过于简单的人說的，前者从自己的帝国主义“現實主义”的高度誣蔑民族独立原則为反动的罗漫蒂克，而后者則宣称这一原則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实现，并以此使自己避开对战争所直截了当地提出的、必須回答的民族問題作出原則性的回答。

同上，第492—493頁。

**歐洲的經濟和政治聯合是民族自決成為可能的必要前提。**正如塞尔維亞人、保加利亞人、希腊人等等的民族獨立口号如果沒有在巴爾干社會民主黨的整個政策中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巴爾干聯邦共和國的口号作為補充，就會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一樣，在全歐範圍內，**自決“權”的原則只有在歐洲聯邦共和國的條件下才能有血有肉。**

但是，如果民主聯邦的口号在巴爾干半島是純粹無產階級的口号，那麼對於存在着深刻得多的資本主義對抗的歐洲來說就更其如此了。

同上，第 494 頁。

如果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得以聯結成帝國主義托拉斯，這自然是比目前狀況前進了一步，因為它首先為工人運動建立了聯合起來的全歐的物質基礎。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也應該不是為退回到“自治的”民族國族，而是為把帝國主義的國家托拉斯變成共和歐洲聯邦而鬥爭。

同上，第 497 頁。

**國際主義拒絕**——不是以一個宣傳小組的名義、而是以一個最重要的階級的名義拒絕在最大的災禍期間支持國家，它在這樣做的時候，不是單純消極地避開“罪惡”，而是說明，**對我們來說，世界發展的命運不再同民族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不但如此，這種民族國家已經成為限制發展的虎頭鉗，因而必須除去，即必須代之以在更廣泛基礎上的更高級的經濟-文化組織。**如果社會主義問題同民族國家範圍是能夠相容的，那麼它也就同民族防衛是相容的了。**但是，我們面臨的社會主義問題是在帝國主義的基礎上提出的，也就是在資本主義本身不得不強行打破它自己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的框子的那種環境下提出的。

同上，第 501 頁。

## (五) 关于“欧洲中心論”

### 一、断言革命中心在西方

宣称革命問題“首先摆在欧洲无产阶级面前”，欧洲“比其他各洲冲突得更加厉害”；“从‘有組織的’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过渡”“特別急驟”；“同非洲和亚洲比較起来”，欧洲是“已經成熟到实行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声称“欧洲革命不必等待亚洲和非洲的革命，甚至也不必等待澳洲和美洲的革命”。断言“革命的中心确定已經轉到了西方”。

有些人教条主义地問：“为什么是欧洲的联合，而不是全世界的联合？”，这里順便也对这种人作了答复。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詞，而且是某种經濟和文化历史的共同体。欧洲革命不必等待亚洲和非洲的革命，甚至也不必等待澳洲和美洲的革命。然而，沒有德国的革命，俄国或英国的胜利的革命是不可想像的，反过來說也是一样。現在的战争被称为世界大战，然而甚至在美国参战以后，作战的仍然是欧洲。而革命的問題也首先摆在欧洲无产阶级面前。

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将仅仅成为世界經濟組織的两个中樞中的一个。另一个中樞将是美洲联邦。

摘譯自《和平綱領》(1917年5月)，載于《战争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499頁。

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归結为下面的一句話：“經濟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义的絕對規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結論說，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內胜利，因而每一个別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須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sup>①</sup>。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爭辯的意見。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國、奧國、德国或法国的資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經成熟到实行社会革命的資本主义“歐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間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家間消极等待的思想暗中頂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說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繼續下去，深信我們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国能在資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論都证明了的。

同上，第 499—500 頁。

由于战前飞速的和几乎不停頓的发展带来的慣性、新的力量对比、世界市場的重新瓜分和战争加深了的矛盾等原因，惯于对世界进行統治的欧洲，現在比其他各洲冲突得更加厉害。正是在欧洲，从“有組織的”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过渡是特別急驟的。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 1936 年版第 81 頁。

<sup>①</sup> 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布尔什維克的中央机关报。托洛茨基这里指的是列宁 1915 年在該报发表的《論欧洲联邦口号》一文(見《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321 頁)。——編者注

布尔什維克党从帝国主义大战开始的时候起，并且在十月革命后以发展的形式，在世界革命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今天，这种地位已經完全丧失了。不仅党的官式的滑稽模拟物是如此。俄国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者所处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也使他們不可能在国际范围起到领导的作用。除此以外，苏联的左翼反对派集团只有在新国际順利組成和成长以后才能发展成为一个新党。革命的中心确定已經轉到了西方，在西方，立即建立新党的可能性要大得很多很多。

摘譯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年)，  
紐約 1934 年版第 28 頁。

## 二、宣称只有“欧洲革命”才能拯救俄国

断言“一切都取决于欧洲革命的觉醒和发展”，“如果欧洲人民不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我們就会被打倒”，“不是俄国革命将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就是各国资本家将扼杀我国革命”。

声称只有在西欧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下，俄国工人的“暂时的革命統治才会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序幕”。胡說“欧洲工人的失敗”会把俄国“抛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并最后变成“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硬說“俄国社会主义經濟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內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宣称在战争中只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苏联”，“如果帝国主义沒有因西方的革命而陷于瘫瘓状态的話，它将会鏟除这个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制度”。

但是在俄国的經濟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能走多远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远在遇到国家技术落后之前，就会碰到政治上的障碍。**沒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統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但是另一方面，西方社会主义的胜利将使我們把工人阶级的暂时統治直接变成社会主义专政，这也是不容怀疑的。

摘譯自《我們的革命》(1906年)，格拉哥列夫出版社1906年版第277—278頁。

革命胜利后只能把政权交给能依靠城市的武装人民即无产阶级民警的政党手里。社会民主党执掌政权后就处于最深刻的矛盾之中，它不能用“只是民主主义专政”的天真的幌子来克服。工人政府的“自我限制”不是别的，而只会是为了实现共和国而叛卖失业者、罢工者、以至全体无产阶级的利益。在革命政权面前摆着种种客观的社会主义任务，但是要解决这些任务在一定阶段上就会和国家的經濟落后发生冲突。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内沒有摆脱这种矛盾的出路。**在工人政府面前最从初起就提出下列任务：使自己的力量和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它的暂时的革命統治才会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序幕。**因此不断革命对俄国无产阶级來說是阶级自卫的要求。如果工人政党缺乏足够的革命—进攻<sup>①</sup>政策的主动性，并且打算轉向干巴巴的只是民族的和只是民主主义的专政，那么欧洲联合起来的反动派将会毫不迟延地对它說明，执掌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須把全部政权放在天平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边去。

摘譯自《我們的意見分歧》(1909年)，載于《一九〇五年》莫斯科1922年第2版第286頁。

---

① “进攻”也可譯为“侵略的”。——編者注

孟什維克国际主义者，馬尔托夫同志的同道們，与我們相反，他們否认对政治任务的社会革命的提法。他們在自己的政綱中宣称：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所以我們的任务只能限于建立資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整个这种議論是建立在完全践踏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和国际任务之上的。如果說世界上只有俄国，那末馬尔托夫的議論或許是对的。可是，問題却在于消灭世界大战、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世界无产阶级包括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向俄国工人进行解释：說俄国的命运現在跟欧洲的命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必将保证我們更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說，欧洲工人的失敗将把我們拋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变为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不是使我們的全部策略服从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总目标和总任务，馬尔托夫同志反而从具有局限性的民族的框子来看俄国的革命，并把革命任务归結为建立資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样提問題是根本錯誤的，这种提法籠罩着一种导致第二国际崩溃的該受詛咒的民族局限性。

摘譯自《国际主义的策略》(1917年9月)，載于  
《无产者报》1917年9月6日第10号第4—5版。

我們来总结一下在我国革命和西欧革命的发展速度上出現不平衡的时期。毫无疑问，我們或多或少都曾是怀疑論者，但是我們大家曾一致认为，欧洲革命的速度應該和我国革命的規模相近。毫无疑问，我們大家曾一致认为，我国十月革命这一事实本身，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們的社会措施、废除和公布旧条约、公开建議举行和談，所有这一切将会直接推动西欧风潮的发展。我們曾认为，这种震动将削弱欧洲资本主义的堡垒，为我們向俄国資产阶级和欧洲資产阶级进攻建立新的、日益壮大的支柱。这儿出現了某种不平衡，它的极其深刻的根源在于我国落后，在于我国无

力經受这种长期的世界大屠杀，然而却被卷进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漩涡。

从这种尖銳的不平衡中，我国革命在其他国家之先，远在欧洲革命之前成长起来了。它在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就沒有得到必要的支持。因此产生了我們所面临的一切极其深刻的策略上的困难。而現在（这种想法目前好象是个磨損了的硬币，然而它現在还保持自己的价值），不管我們怎样自作聪明，不管我們发明出什么样的策略，只有欧洲革命才能真正地拯救我們。

摘譯自《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18年3月7日），載于《联共（布）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七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28年版第67—68頁。

如果我們仅仅根据这些事实，那么，当然，我們就是在英國战胜的情况下，也会陷入最不幸的状况。因为在現代战争中付出代价的从来就是最弱的国家，而由于事物的整个历史进程，俄国已經成为所謂大国中最弱的一国。从这种观点出发，資产阶级报刊认为如果我們的盟国同我們一起参加談判，我們就会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这种論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为了这个目的，我們就要首先繼續进行战争，而繼續进行战争，就要大量消耗我們的經濟力量，使国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陷于破产。这样，我們就会更加削弱我們在将来和平談判中的作用，最后，各国資本家就会彼此算賬，而迫使我們赔偿一切伤亡和損失。因此，我們要避免最后彻底失败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我們的命运——俄国革命的命运——同西欧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摘譯自《談判总结》（1918年2月14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員會會議上的报告），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1分冊莫斯科1926年版第108頁。

《和平綱領》按其內容來說同編在第一卷中的《戰爭與國際》是緊密地銜接在一起的。

在《和平綱領》中一再重複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在民族範圍內勝利完成的論斷，在某些讀者看來也許已被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將近五年的經驗推翻了。但這樣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工人的國家在一國而且是在落後的一國抗住了全世界，這個事實證明無產階級有雄偉的力量，這種力量在其他比較先進、比較文明的國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蹟來的。可是，我們雖然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保持為一個國家，但是我們並沒有達到甚至還沒有走近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這個時期為革命-國家的自衛而進行的鬥爭使生產力大為下降；而只有在生產力發達和繁榮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才是可以想像的。同資產階級國家進行的貿易談判、租讓、熱那亞會議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國家範圍內孤立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極其鮮明的證據。當其餘的歐洲國家還是資產階級掌握著政權的時候，我們為了打破經濟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設法和資本主義世界達成協議；同時可以確信地說：這種協議至多只能幫助我們治愈某些經濟創傷，獲得某些進展，可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才會是可能的。

歐洲不僅是地理名詞，而且是經濟和政治名詞，最近幾年的事件——歐洲的衰落，美國實力的增長，勞合-喬治借助於把帝國主義的與和平主義的方法同時並用來“拯救”歐洲的嘗試——鮮明地證明了這一點。

目前，歐洲工人運動處在防禦、積聚力量和準備的時期。奪取政權的公開革命戰斗的新時期必然會提出革命歐洲的各族人民相互之間的國家關係問題。唯一能夠綱領性地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歐洲聯邦。既然俄國的經驗提出了蘇維埃國家這一最合乎自然

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既然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原則上接受这种国家形式，那就可以設想：在恢复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欧洲无产阶级将提出欧洲联邦苏維埃共和国的綱領。俄国在这方面的經驗是极为有益的。它证明在无产阶级制度下，最广泛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同經濟上的集权制是完全相容的。在这种意义上說，轉譯成苏維埃国家語言的欧洲联邦口号不仅保持着自己的全部意义，而且看来还刚刚开始預示出自己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时代中的巨大意义。

摘譯自《〈和平綱領〉跋》(1922年)，載于《战争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503頁。

托洛茨基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即在取得政权的时候說过：“**如果欧洲人民不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我們就会被打倒，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俄国革命将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就是各国資本家将扼杀我国的革命。**”

摘譯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載于《俄国革命史》伦敦1936年版第1231頁。

47. 但是，正是战争的曠日持久的性质，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苏联过渡时期的經濟与官僚主义計劃的矛盾。許多巨大的新企业可能表明只是一大堆死資本。在政府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的影响下，农民經濟中的个体主义傾向将会大大加强，集体农庄內的离心力量将随着战争逐月增长。不受监督的官僚的統治将会变成一种軍事独裁。缺少一个生气勃勃的党作为政治上的监督者和調節者，就会导致矛盾的急剧积累和加剧。在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中，人們将会看到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急剧轉向个体主义原則、轉向吸收外国的和“盟国的”資本，将会看到对外貿易垄断制的破坏，政府对托拉斯的监督的削弱，托拉斯相互間競爭的尖銳化，以及它們同工人之間发生冲突等等。在政治方面，这些过程可能意味着波拿巴

主义已臻于成熟，同时在所有制关系方面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或一系列变化。換句話說，假使戰爭曠日持久而与此同时世界无产阶级又消极被动，那末苏联內部的社会矛盾不仅可能而且一定会导致一場資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

48. 由此而得出的政治結論是明显的：

(1) 在戰爭曠日持久的情况下，只有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苏联这个工人阶级国家。

(2) 世界无产阶级先鋒队只有在摆脱苏联的官僚而完全独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友好的”、“結盟的”以及敌对的国家中准备无产阶级革命。

(3) 无条件地支持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军队的行动，必須同对战争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所进行的革命的馬克思主批評密切地配合起来，必須同在苏联国内建立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革命党的工作密切地配合起来。

摘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21—22頁。

工人国家的正确政策不能降低到仅仅限于本民族的經濟建設。如果革命不循着无产阶级的螺旋綫向国际舞台扩展，那它必然会开始沿着官僚的螺旋綫局限于民族范围之内。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发展成欧洲和世界規模，它必然会朝着它本身崩溃的方向发展。作为广泛的历史远景，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无可爭辯的。

摘譯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年)，  
紐約1934年版第4頁。

然而，我們能够指望苏联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不致战敗嗎？对于这个坦率地提出的問題，我們將同样坦率地回答：如果戰爭始終只是一場战争，苏联战敗将是不可避免的。从技术、經濟和軍事意义上說，帝国主义是无可比拟地更为强大的。如果帝国主义沒有

因西方的革命而陷于瘫痪状态的話，它将会鏟除这个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制度。

人們可以这样回答：“帝国主义”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也是被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这是十分正确的，如果帝国主义不是因为有这些矛盾的話，苏联早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苏联簽訂的外交和軍事协定有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的。然而，如果看不到这些矛盾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消失，那将是一个致命的錯誤。正如从最反动的政党到社会民主党这些資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間的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威胁面前会消失一样，为了阻止苏联取得軍事胜利，帝国主义的对抗也总会找到妥协办法的。

.....

如果資产阶级盟国得到这样的物质保证，即莫斯科政府不仅在战争的壕沟上而且在阶级的壕沟上也同它們站在一边，当然情况就会根本不同了。資本主义的“和平之友”利用苏联将在两面夹攻之下所遭到的困难，当然会采取一切措施在对外貿易垄断方面和苏联財产法方面打开一个缺口来。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白俄流亡者所展开的日益强大的“保卫”运动，就是完全依靠这种估計的。如果你认为，世界斗争将只限于在軍事方面进行下去，那末，盟国就有达到它們的目的的好机会。如果沒有革命来干涉，苏联的社会基础不仅在失敗的情况下，就是在胜利的情况下也必然要被摧毁。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5—167頁。

### 三、鼓吹“欧洲联邦”是 “革命时代的口号”

宣称“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创立“欧洲共和联邦，以作为世界联邦的基础”。断言“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组织起来”。说“欧洲革命归根结蒂将会对美洲也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胡说“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东方的完全解放”。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对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来说，问题不在于保卫这个过时的和陈旧的民族“祖国”，因为它业已变成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创立一个远为强大的、更能抵御强敌的祖国——欧洲共和联邦，以作为世界联邦的基础。

摘译自《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原名《战争与国际》）  
(1914年10月)，纽约1918年版第29页。

但是现在，在俄国革命的大有希望的开端之后，我们有一切理由期望，就在这次战争期间，强大的革命运动会在全欧洲开展起来。很明显，它只有作为全欧的运动才能顺利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内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它必然会遭到毁灭。我们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指出了威胁着俄国革命的来自德国军国主义的危险。这种危险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危险。对俄国革命来说，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军国主义比起霍亨索伦王朝的军事机器来，并不是威胁性更小的敌人。拯救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把革命转到整个欧洲去。如果革命运动在德国扩展开来，

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就会在西方的“敌对”国家中寻找并找到对革命的反响；而如果欧洲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政权，那么即使仅仅是为了掌握住这个政权，它也会不得不立即使这个政权去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换言之，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建立，只有在全欧洲的幅员之内，也就是說在欧洲共和联邦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場合下，靠武力、靠工业和外交协定都不能取得的欧洲的国家联合就会成为得胜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项迫切任务。

**欧洲联邦是我們已經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不管今后軍事行动的进程如何，不管外交对目前的战争如何总结，不管革命运动在最近时期的发展速度如何，欧洲联邦口号在一切情况下都将作为欧洲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政治公式而获得巨大意义。这一綱領中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框框，作为阶级斗争的基地，因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都已经过时了。只有当我们把建立新的、更高級的革命“祖国”——共和欧洲的进步任务同保守地保卫过时的民族祖国对立起来的时候，我們对“保卫祖国”这一过时的无产阶级政治綱領的否定才不再成为在思想政治上的自卫的純粹消极的行动，而获得自己的全部革命内容。**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組織起来。**

摘譯自《和平綱領》(1917年5月)，載于《战争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497—499頁。

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曾经幻想过欧洲联邦。这个理想在这次战争的第一个时期，在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言論里得到了虚伪的和为时已晚的反响。资产阶级不可能使欧洲联合起来，因为它把民族帝国主义的分割願望和经济发展的联合趋向对立起来了。要把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就必须把经济从私有制的桎梏中解放出

来。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民族发展的要求纳入自然的合理的疆域之内，把各民族结合在劳动协作的统一体中：这就是欧洲各族人民在自由自决基础上所建立的欧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其它的解决办法是没有的。如果英国在革命的发展中落后于大陆，那么这个联盟将反对英国。当大洋彼岸的美国仍然是金元共和国的时候，当纽约交易所内洋洋得意的猪哼声还没有变成临死前的沙哑声的时候，欧洲联邦将和苏维埃英国一起把自己的斗争锋芒指向北美的帝国主义专政。

摘译自《由混乱构成的秩序》（1919年1月13日），载于《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第2卷第1分册莫斯科1924年版第12—13页。

第三国际越过所有的障碍为自己开辟道路，走向并引导欧洲无产阶级走向革命。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欧洲就无法得救。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东方的完全解放。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

摘译自《〈西方与东方〉序》（1924年7月15日），  
载于《西方与东方》莫斯科1924年版第II页。

一九一五年，我们在为欧洲苏维埃联邦口号辩护时曾经指出，关于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本身并不能作为反对这个口号的理由，因为不同国家和不同大陆之间的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这个情况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欧洲国家的发展相互之间是不平衡的。然而，可以象历史事实一样绝对肯定，至少在我考察的这个历史时期内，这些国家里面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以美洲超过欧洲的程度超过其他国家。对于美洲有一种衡量不平衡的尺度，而对于欧洲则需要另一种尺度。欧洲各国之间的紧密的有机联系是地理和历史条件决定的，是无法摆脱的。现代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象一伙绑在同一个车上的杀人犯。如前所述，欧洲的革命归根结底将会对

**美洲也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从直接影响來說，从历史发展的直接順序來說，德国发生革命对法国比对美国的影响要大得无可比拟。欧洲苏維埃联邦这个口号的政治生命力正是来自这种历史上一脉相传的关系。我們談的是它的相对的生命力，因为这个联邦理所当然地将会通过苏联这个巨大的桥梁扩大到亚洲，从而实现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然而这将組成另一个时代，或者說是继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出現的新的伟大的一章。当我们进一步接近这个时代的时候，我們也将发现与之相适应的法則。**

摘譯自《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14—15頁。

**官方的爱国主义乃是保卫剥削者利益的假面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要輕蔑地把这个假面具抛在一边。他們不要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而只要保卫本国以及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利益。第四国际的提綱宣布說：“为了反对‘保卫祖国’这个反动口号，必須提出以革命手段粉碎民族国家的口号。**必須提出作为走向‘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阶段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綱領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欧洲瘋人院。”****

摘譯自《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第四国际紧急會議宣言，1940年5月)，紐約版第12頁。

## (六) 关于战争与和平

### 一、战争的根源

断言民族国家已經過时，“已經成为經濟发展的不可容忍的障碍”。声称世界大战是由生产的“世界性”和占有的“民族性”之間的矛盾产生的，是生产力对于民族和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反抗，其意义在于“摧毁当前的民族經濟中心，而代之以世界經濟”。

资本主义所发展的生产力，已經突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民族国家，即当前的政治形式，对于这些生产力的运用來說，已嫌过于狭窄。因此，我們經濟制度的自然趋势，乃是力求打破国家疆界。整个地球，陆地与海洋、地面和地下，都已变成一个經濟工場，地球的各个部分已彼此不可分离地連結着。這項工作是由資本主义来完成的。与此同时，這項工作的完成也促使資本主义国家使世界經濟服从各国資产阶级的利潤收入。帝国主义的政治首先证明：在一七八九——一八一五年，一八四八——一八五九年，一八六四——一八六六年以及一八七〇年等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旧式的民族国家，已經衰老，它現在已經成为經濟发展的不可容忍的障碍。

当前的战争，归根結蒂是生产力对于民族和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一种反抗。它意味着作为一个独立的經濟单位的民族国家的

瓦解。

民族，作为一种文化的、思想的和心理的事实，还一定会繼續存在下去，但是它的經濟基础却已被从脚下抽去了。說当前这次流血冲突是保卫民族的事业，所有这些說法要么是伪善，要么是盲从。相反地，**战争的真正的和客观的意义，乃是摧毁当前的民族經濟中心，而代之以世界經濟**。但是各国政府謀求解决这一帝国主义任务的方法，不是通过全人类生产者的明智的、有組織的合作，而是通过战胜国資本家阶级对于世界經濟的利用；而战胜国經過这次战争，就会从一个大国变成一个世界强国。

**战争宣布了民族国家的沒落。但同时它也宣布了资本主义經濟制度的沒落。** 資本主义利用民族国家已使世界上全部經濟制度进行了革命。它把整个世界瓜分給少数大国巨头，大国周围是处在列强角逐之中的它們的卫星国，即弱小国家。建立在資本主义基础上的世界經濟的未来发展，意味着无休止地爭夺資本主义剝削的新而又新的場所，而这种場所却只能得自这同一个唯一的来源——地球。在軍国主义旗帜下进行的經濟競爭，是与破坏人类經濟基本原則的掠夺和毀坏行为不断交替的。**世界生产不仅反抗着由民族和国家的区分而产生的混乱，而且也反抗着現在业已陷入野蛮的无政府状态中的資本主义經濟制度。**

摘譯自《布尔什維克与世界和平》(原名《战争与国际》，1914年10月)，紐約1918年版第20—23頁。

我們生活的时代首先是国际政治的时代。在“和平”、“安靜”的时期，国际政治問題对普通人來說，好象是对于他們的个人命运沒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天上的星星問題。但是，我們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已經有几年了，即在这个时代里由于各种事件，每个公民的命运，不管他願意与否，不仅和他本阶级的本国的命运，而且和整个国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資本主义的功績或者說罪惡，——

你爱怎么說都行。資本主义把各民族結合成一个强大的經濟有机体，同时又使各民族的統治阶级互相敌視。可以說，資本主义是通过国际交換，即世界市場，用苦役的暴力鎖鏈把各民族联結成为一个整体，各民族为了力求在資本主义世界經濟的苦役中占个位置，被迫要打破这条鎖鏈，从而把这个整体撕得四分五裂。这就是当代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它是由生产的界性和占有、即資本主义掠夺的民族性之間的矛盾产生的。資产阶级是无法解决这个矛盾的。

摘譯自《捍卫世界革命》(1918年11月8日)，載于《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第1卷莫斯科1923年版第377頁。

9. 在資本主义同中世紀地方割据主义进行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变成了資本主义的正統的活动場所。但是，民族国家刚刚形成，就成了經濟和文化发展的障碍。生产力和民族国家之間的矛盾，再加上生产力与生产資料私有制之間的这个主要矛盾，使資本主义的危机变成世界性的社会制度的危机。

摘譯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紐約1934年版第9—10頁。

## 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反战策略

###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声称“民族疆域的范围对欧洲的生产力已經是过于狭小”；一九一三年的經濟危机“在各統治阶级中引起了紧张的神經质，期待和謹慎迅速地消溶于神經质之中，結果在一九一四年爆发了战争。”

一九一四年的戰爭，是歷史上一種被自身固有的矛盾所摧毀的經濟制度的最大崩潰。

一切以指導資產階級社會、以資產階級社會的名義說話和以剝削這個社會為其任務的歷史勢力，都被這次戰爭宣告了歷史性的破壞。這些歷史勢力把資本主義當作人類文明的制度來加以保衛，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所產生的災難主要地也就是這些歷史勢力自身的災難。事變一开始，把各個國家的政府和軍隊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使各民族暫時團結在它們的政府和軍隊周圍。但是當被隆隆大炮所震驚的人民，一旦認識到目前發生的事變的真相和可怕性之後，各國政府就將遭到更為悲慘的失敗。

當前歷史所帶給人民的動亂越大，人民群眾的革命的反作用也越有力。

資本主義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物質基礎。帝國主義把資本主義民族導向歷史性的混亂。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強烈地迫使無產階級走上革命的道路，從而指出了擺脫這種混亂局面的出路。

摘譯自《布爾什維克與世界和平》（原名《戰爭與國際》，1914年10月），紐約1918年版第23—24頁。

我們回憶一下：長期的蓬勃的工業繁榮，在一九一三年為經濟危機所代替，這一危機的性質已不僅是行情性的，而且也是結構性的：民族疆域的範圍對歐洲的生產力已經是過於狹小了。一九一三年的危機在各統治階級中引起了緊張的神經質，期待和謹慎迅速地消溶於神經質之中：結果在一九一四年爆發了戰爭。

摘譯自《在新的世界大戰之前》（1937年8月9日），載于《反對派通報》1937年9—10月第58—59期第10頁。

## 2. 反戰策略

1. 声称拒绝利用战争的失败进行“冒险主义的”“投机”。说失败只会“瓦解无产阶级的意志”，使无产阶级“组织涣散”。革命从战争失败中获得的遗产只是“被战争破坏得乱七八糟的经济生活，是耗尽一空的国家财政以及困难重重的国际关系”。攻击“俄国失败——祸害较小”的口号给德国革命者“制造了困难，也没有丰富我们的鼓动工作”。说什么俄国的失败必然加强德国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暂时胜利了的俄国革命，也只是一个历史的流产”。断言无产阶级革命政策“不能把失败看作哪怕是自己的间接盟友”。

《我們的言論报》<sup>①</sup>（在它彻底转入左翼编辑手中之后也是这样）和《社会民主党人报》<sup>②</sup>有三点不一致的地方。这三点涉及失败主义、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将来的俄国革命的性质。《我們的言論报》否定失败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报》否定为和平而斗争的口号……以国内战争与之对立。最后，《我們的言論报》持下列观点：我党的任务应当是为社会主义变革而夺取政权。《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立场。

摘译自《战争与革命》第1卷莫斯科版第27页。

难道沙皇制度的失败，不能在实际上促进革命事业吗？

这种可能性，是无可争议的。日本天皇和他的武士对于俄国

① 《我們的言論报》是大战期间托洛茨基在巴黎出版的俄文报纸。——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编者注

的解放是絲毫也不感兴趣的，然而俄日战争却給了此后发生的革命事件以强有力的推动。

因此，德俄战争也是会有同样結果的。

但是要对这些历史的可能性作出正确的政治估計，我們就必須考慮到下列情况。

那些相信俄日战争引起了革命的人，既不知道也不理解历史事件以及它們的关系。那次战争仅仅只加速了革命的爆发，但是那次战争也削弱了革命。因为，如果革命是从内部力量的有机增长中发展出来的話，它就会来得迟一些，但是会来得更加强烈和更有計劃。所以，战争对于革命是沒有什么真正好处的。这是第一点理由。第二点是，俄日战争在削弱了沙皇制度的同时，却加强了日本的軍国主义。对于目前的德俄战争來說，上述两点理由就更加适用了。

在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年期間，俄国由于工业的巨大发展，終於把这个国家从反革命的消沉状态里拖了出来。

革命运动在劳动群众的經濟和政治罢工的基础上的增长，广大阶层人民的反抗的增长，导向了一个新的暴风驟雨时期。但是和一九〇二——一九〇五年相比，这次运动是在一种远为自觉，更有計劃的状态中发展的，而且还可以說，是在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发展的。革命运动的成熟还需要时间，但是它并不需要普魯士武士的枪矛。相反地，普魯士武士倒給了沙皇以这种机会来扮演塞尔維亚人、比利时人和法国人的保护者的角色。

如果俄国遭到慘敗，这次战争就能够促使革命更快地爆发，但是要以它的內在的衰弱作为代价。而如果革命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占了优势，那么霍亨索伦王朝军队的刺刀也会轉而进攻革命的。这种前景就很难不使俄国的革命力量瘫痪；因为我們不能否认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站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刺刀后面这一事实。

然而这只是問題的一个方面。俄国的失敗必然是以德奧在其他战场上获得决定性胜利为前提的，而这就意味着中歐和东南歐被迫保持著民族和政治的混乱，以及德国軍国主义对整个欧洲的无限控制。

强迫法国裁軍，索以亿計的賠款，把那些被征服国家强拉入关税壁垒，以及强加給俄国的一項通商條約，这一切联系起来，就会促使德帝国主义成为今后数十年的局势的主人。

随着无产阶级政党投降民族主义的軍国主义而开始的德国的新政策，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还会加强。德国的工人阶级固然可以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靠着那胜利的帝国主义的餐桌上的面包屑来养活自己，但是社会革命运动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暂时胜利了的俄国革命，也只是一个历史的流产，这点用不着再证明。**

因此，目前在各国間进行的这一次战争，是由資产阶级所强加給各国的軍国主义来支配的，战争的本身包含着一些奇怪的矛盾，这些矛盾既不是战争本身，也不是进行战争的各国政府能够用任何方法，为着未来的历史发展的利益，来予以解决的。社会民主党人过去未能够，現在也不能够，把他們的目的和这次战争的任何历史可能性結合起来，也就是说，不能够和三国同盟的胜利或者协約国的胜利結合起来。

摘譯自《布尔什維克与世界和平》(原名《战争与国际》，1914年10月)，紐約1918年版第85—89頁。

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一种历史的考試，它測驗社会物质基础的力量、各阶级之間物质联系的牢固程度、国家組織的稳固性和灵活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胜利——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揭示某一种国体的相对的牢固程度，提高这种国体的威望并且从而使它得到巩固。反之，失敗損害国家組織的威信，从而使它受到

削弱。

俄国在反革命势力获得胜利之后，不可能发展胜利的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它会暴露出自己在社会和国家制度方面的一切流弊；——对于这一点在战前没有一个思维健全的社会民主党人曾加以怀疑。当时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反对战争。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把我们的革命的或改良的政治希望同沙皇制度在军事上的失利联系起来，虽然我们毫不怀疑，一旦爆发战争，失利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跟现在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告密分子一样，认为一个革命的阶级盼望本国政府在军事上遭到破产是“道义上不能容许的”。这也不是由于盲目的民族和国家的本能——在俄国一些革命者当中这种本能具有十分强大的、能大大抵消对沙皇制度的仇恨的力量。最后，这也不是由于对战争必然带来的种种苦难的一般人道的考虑。数百以至数千年来的阶级社会的“正常”生活，都是建筑在群众遭受最骇人听闻的苦难上面，战争只不过是在一段时间内把这些苦难集中起来而已；如果战争是求得解放的一条最可靠的或最短的道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就会下定外科医生那样的决心毫不犹豫地走上这条道路，——当外科医生认为应当开刀时，他是不害怕痛苦和流血的。

如果说我们拒绝拿战争以及战争的失败进行投机，那末这并不是根据民族的和人道的理由，而是根据国际以及国内方面的革命的和政治的理由。

既然，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失败动摇某一种国体，所以由此方失败所决定的对方的胜利巩固对方的国家组织。而我们不知道有这样一种欧洲的社会和国家机体，巩固这种机体对于欧洲无产阶级是有好处的；同时我们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也不能让俄国担任这样一个被遴选国家的角色，即其他欧洲各国的发展利益都应服从它的利益。问题的这一方面在我们的报纸上已经讲得够清楚的

了，現在就用不着更加詳細地來談了。

但是，即使不超出狹隘民族发展前景的范围，俄国社会民主党也不能把自己的政治計劃同軍事潰敗的革命化影响联系起来。

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即当内部改革的已經成熟的必要性在社会中根本找不到能够实现、或者强迫实行这些改革的新的历史阶级时，失败才是无可争辩和不可代替的发展推动力。在这种条件下，打了败仗以后，由上面实行的改良，能够有力地推动进步社会阶级的发展。可是战争是一个异常矛盾的、很能引起两种相反后果的历史发展的因素，所以认为自己是站在牢固阶级基础之上的、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政党，不能够把失败的道路看作是自己获得政治胜利的道路。

失败使統治的反动派組織涣散和士气頽喪，但同时，战争也使得整个社会生活、首先是使得工人阶级組織涣散。

其次，战争不是革命阶级能够对它进行控制的“輔助性的”因素：不可能在它提供了預期的革命推动力之后就任意把它消灭掉，就如同完成了自己工作的摩尔人<sup>①</sup>那样。

最后，从失败当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所获得的遗产，是被战争破坏得乱七八糟的經濟生活，是耗費一空的国家財政以及困难重重的国际关系。

如果说甚至在反革命势力大获全胜的暗无天日的年代里，俄国社会民主党也断然反对冒险主义的战争投机，那末这正是因为：假使战争能够推动革命的話，它同时也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环境，这种环境使得人們很难从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利用革命的胜利。

然而現在我們不得不不仅估計到战争和失败会朝着什么方向

---

① 源于席勒的悲剧《热那亚的費埃斯柯的阴谋》中的一句話“摩尔人已經干完了自己的事，摩尔人可以走开了”，比喻一个人完成了某种不光彩的任务之后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編者注

影响政治发展进程，我們首先不得不在失敗所造成那个基础上进行活动。因为，不管战争将来发生什么样的波折，有一点是可以有充分把握說的：要在短期内把自己的实力恢复和增加到这种程度，以致在这一次战争中就可以实现世界性征服的計劃，——关于这一点认真地說是根本談不到的。沙皇的軍队已經被击潰了。它可能有一些个别的胜利。但是这場战争它打輸了。目前的一些失敗标志着軍事潰敗的开始。我們要再重复說一下：社会民主党人无法任意給自己創造历史环境。它只是历史过程的各种力量中的一种力量。它不得不站在历史为它所創造的基础上。

現在，在俄国的一切政党中政治上起領導作用的一代，完全是以我国发展中最近十至十五年来的經驗教育出来的。仅仅由于这一点，他們一想到軍事潰敗可能造成的國內后果，就必然情不自禁地同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年間的事变进行类比。一九〇三年，群众性罢工的狂风大浪震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当时把这些事变看作是革命的序幕。一九〇四年一月，日俄战争打响了。它馬上就使得革命运动停止了。在半年多的時間內，国家就好像丧失了知觉一般。戰場上的失敗灭了政府政权的威风而使它受到了削弱，同时有力地助长了各社会阶级和集团的不滿情緒。在这一基础上，革命急剧地向前发展了。

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正如在一九〇三年一样，群众运动的增长主要又是表現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罢工。这时候，工人运动依靠着俄国历史上翻天复地的、內容最丰富的十年的經驗，在更加高得多的水平上开展起来了。又正如上次一样，战争一爆发之后，馬上就使革命运动的发展停止了。國內几乎是一片万籟无声的沉寂。政权在最初打了几个胜仗、而且是性质极其有限的胜仗之后，就神魂顛倒起来，采取了革命前俄国所沒有見过的反动的方針。但是“打胜仗”的时期很快就結束了。隨后接踵而来的接二連

三的失敗，彻底把統治集團搞得暈头轉向，引起了資產階級地主聯盟的爱国主义的憤懣情緒，这样一来，就為廣泛的社會運動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根據同過去十年的類比，可以設想，在有產階級的“反政府”動員之後，民主派的、首先是無產階級的動員一定會隨之而來，其結果就將是革命的震蕩。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開始散布俄國失敗會起拯救和解放作用這種希望的人，正是那些原來最殷切地盼望俄國勝利的人。英國的一位大臣勞合-喬治已經看到被潰敗驚醒了的俄羅斯巨人在怎樣扔掉反動派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鎖。王德威爾得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曾經要說服我們的杜馬黨團，使之相信將來俄國勝利的進步意義，現在正在搖頭擺腦滔滔不絕地大談其俄國失敗的好處。愛爾威在寫文章談論痛苦的益處，說它是推動俄國歷史發展的一個因素。最後，在俄國獲勝的那幾個月里按照“先勝利，後改革”這個公式進行推理的某些社會爱国主义的投敵分子，在華沙失守之後奔走呼號要求大赦……在這種明顯的“失敗主義”之中，當然沒有任何革命性的成分。勞合-喬治也好，王德威爾得也好，愛爾威也好——他們全都把希望一古腦兒寄託在軍事失敗會喚醒俄國統治階級“國事理智”這一點上面。他們全都在內心深處輕視俄國，在對俄國所持的態度上都是赤裸裸的失敗主義者，他們指望着不要革命階級直接干預，軍事破綻會有一種獨立的和自動的力量。而從我們的觀點看來，對於俄國最近將來的命運具有中心意義的，正是關於戰爭和失敗如何影響革命力量覺醒、團結和積極起來的問題。

從這種觀點看來，必須首先說明：在戰爭對人民群眾情緒的影響這一方面，如果把過去的經驗簡單地搬到當前的時代來，那就大錯特錯了。當前的潰敗，按其巨大的規模，也就是按它對於國內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破壞作用來說，根本不可以同日俄戰爭那一次殖民冒險相比擬。一方面，這當然一定會使得現在的失敗對於

人民群众的意識发生更加广泛和深刻得多的作用。在这里，社会民主党拥有进行革命鼓动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种鼓动的每一句話都会引起强烈的共鳴。但是，另一方面，必須明确，耗尽居民的經濟和精神力量以及种种資財的軍事潰敗，只是在达到某种限度以前能够引起积极的憤怒、抗議和革命行动。耗費超过某种界限，就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致能摧残人們的精力和麻痹人們的意志。絕望、消沉和精神頹喪就会开始产生。失敗和革命之間的联系，具有不是机械的，而是辯证的性质。

劳合-乔治以及其他一些人希望俄国統治者会在失敗的独立自在的力量下面发出自由主义的“智慧之光”——如果說这种希望散发出绝望的自由主义的庸俗气味，那末，另一方面，根据被作了錯誤解釋的“日俄”战争經驗斷言軍事失敗对于群众会产生自动的革命化的影响，就是一种幼稚的糊塗思想。正是这次战争的巨大規模，在它不定期拖延下去的条件下，能够在长时期內妨碍整个的社会发展，因而，首先是妨碍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因此，必須为爭取尽快地停止战争而斗争。一个接着一个的失敗进一步发展下去，对于革命并沒有好处。相反地，爭取和平的斗争，对于我们說来是革命的自我保存的遺訓。劳动者反对战争的动员进行得愈坚强有力，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对失敗的經驗就会估計得愈充分，它就会愈快地变成革命运动的推动力。

摘譯自《軍事潰敗和政治前途》(1915年9月)，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莫斯科—列寧格勒1927年版第146—151頁。

毫无疑问，俄国工人运动中，护国主义情緒和社会爱国主义思想风行的相当重要原因は去年德奥军队的胜利攻势。失敗不仅使当权的官僚和整个六三联盟<sup>①</sup>全部陷于混乱，而且也使工人阶级

① 指1907年6月3日在俄国发动反动的“六三政变”的反革命集团。——編者注

队伍陷于混乱。失败不仅起了它的革命化的作用，而且还起了它的败坏士气和瓦解瘫痪的影响。“俄国失败——祸害较小”的口号至少在理論預見的意义上讲是个猜测性的口号，在鼓動的意义上是全然无用的，并因为这样而被俄国的所有国际主义集团所否定，这一口号终于在政治事件的考驗中被粉碎了：如果失败瓦解无产阶级的意志，给它的广大群众带来处于民族的和所謂“生物的”中间的那种情緒，那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就不能把失败看作哪怕是自己的間接的盟友。

摘譯自《俄国的社会爱国主义》(1916年2月10日—3月15日)，  
載于《战争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174頁。

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會議的思想准备工作的过程中以及此后以其決議为基础的工作中，《我們的言論报》过去和現在都不得不同作为一种思潮的极端主义进行思想斗争，这一思潮是对社会爱国主义和观望的調和主义的模糊观念的不調和的反动，它往往在忽視过去的发展所造成的或由战争引起的政治問題和民族問題中，在夸大革命的口号（“俄国失败——祸害较小”、“不是爭取和平的斗争，而是國內战争”）或者跟所有各种具有細微差別的国际主义在組織上划清界綫中去寻找反对上述現象的虛假保障。

摘譯自《〈我們的言論报〉周年紀念》(1916年5月16日)，同上，第116—117頁。

2. 宣传停止战争的口号对无产阶级來說是“阶级的自我保全的口号”，只有在爭取和平的口号之下，“現在才能对群众进行真正广泛的动员”。指責列宁用國內战争的口号来同“爭取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认为“爭取和平的斗争的口号是毫无革命內容的”。声称这种对立使國內战争的口号“悬在空中”，失去意义。

追随《社会民主党人报》立場的集团(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和波兰“反对派”)在单独的预备會議上把自己的立場表述如下：譴責各正式的社会主义政党；提出革命的阶级政策的原则并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志同道合的左派。爭取和平的群众斗争的任务在这个提法中甚至提也沒提到。列宁在自己的演說——他的最有原則性的演說正是在这次预备會議上发表的——中证明說，爭取和平的斗争口号是毫无革命內容的。

阿克雪里罗得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場。在我們的一次正式會議上，在討論表决方法問題时，阿克雪里罗得证明說，目前摆在我們面前有两种基本傾向在进行斗争：一种傾向是想要利用會議，或者更确切点說，利用这次會議的一部分人，在某种革命策略綱領的基础上，把他們联合起来，作为建立第三国际的基石；另一种傾向是想依靠一切对战争抱否定态度的社会主义者，开始爭取和平的国际运动，认为这正是恢复国际的最好的途徑。

与此相反，《我們的言論报》的代表证明說，除上述两种傾向之外，还有第三种傾向，它认为爭取和平的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认为只有在这种口号之下，現在才能对群众进行真正广泛的动员；但是，这种傾向同时想把爭取和平的鼓动工作立即轉上革命的阶级策略的轨道，决定对正在流行的社会民族主义方針采取毫不調和的态度，从而試圖使这次會議成为建立第三国际的工作的出发点。

摘譯自《結論》(1915 年 10 月 3—6 日)，  
載于《戰爭与革命》第 2 卷莫斯科 1925 年  
版第 58—59 頁。

曾經提出了三种宣言草案：《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的，德国反对派右翼的和《我們的言論报》代表团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草案企图按照已被否定的決議案的精神

指出明确的斗争方法。把决议案中纯粹策略性的指示搬到宣言中来，在什么限度之内是恰当的呢，对于这一点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显然，下面的一点是与此漠不相干的，即当决议案已被否决之后，没有任何希望可以把决议案的基本策略思想搬到另一文件中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草案的主要过错是对争取和平的斗争口号抱不坚决的、模棱两可的、骑墙的态度。列宁同志充分地表示过——特别是在预备会议上，正如过去在他的一些摘要性的报告和文章中一样——，他个人对争取和平的斗争口号完全抱否定的态度。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我们的任务是不要让四二大炮沉默，而是要叫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毫无疑问，革命者同和平主义的区别，顺便说说，在于连军事手段我们也不想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但是，把这一任务同争取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要使德国无产阶级愿意把四二大炮对准自己的阶级敌人，那末它应当不再愿意向阶级兄弟射击。换句话说，它应当在对这一战争持敌视态度的基础上同阶级兄弟联合起来，因为这场战争毁灭和摧残它自己以及堑壕那一边的它的社会同盟者。停止战争的口号，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来说，是阶级的自我保全的口号、国际接近的口号，因而是革命行动的前提。可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草案中，正象在它的全部政纲中一样，和平口号不是作为动员起来反对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无产阶级在当前的中心号召提出的，而是作为纯粹革命精神对和平主义的人类肉体所作的不坚定的让步提出来的。

摘译自《罗·格里姆和奥·莫尔加利》(1915年10月14日)，同上，第51—52页。

6. 在俄国国际主义者阵营里，我们首先遇到《社会民主党人报》集团。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这个组织的某些特点，这些特

点在目前的危机时代沒有使它失去重要的革命因素的作用，却妨碍了它吸收运动中的一切革命人士。从战争刚一开始时起，《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对爭取和平的斗争的口号采取敌对的态度，而經驗证明，正是在这些口号下，无产阶级反对派到处动员起来了并正在动员起来，并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現在才能有成效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國內战争的公式实质上正确地表达了在已經到来的时代里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必然尖銳化的事实，但由于同爭取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因而是悬在空中的，并且对我们所处的时期來說它正在失去自己的意义。最后，似是而非的和自相矛盾的公式“俄国失敗——禍害較小”給我們的德国同道們制造了困难，也沒有丰富我們的鼓动工作，反而增加了它的困难，这个公式是跟我們共同的旗帜作斗争中的最重要的社会爱国主义的蛊惑煽动的武器。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立即把这些公式变成国际主义的絕對标准，对革命口号的这种夸大就更为危险了。

上述这些消极的特点从来沒有妨碍我們——而現在更不会妨碍——承认与《社会民主党人报》协同行动的迫切必要性。

摘譯自《俄国社会民主党內的派別》  
(1916年8月)，同上，第208—209頁。

### 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战策略

#### 1. 战爭的性质和起因

声称大国間的現代战争“并不就是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間的冲突，而是两个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在两个陣营中都既会有法西斯主义国家”，“也会有‘民主主义的’国家”。攻击为拥护民主反对法西斯而

戰的口號，說這是騙人的。認為無產階級只能提出這樣的問題：“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某一個帝國主義陣營的勝利，還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污蔑蘇聯的外交政策“為了斯大林集團的利益而犧牲了世界革命的利益”，說什麼“斯大林與希特勒的聯盟揭開了世界大戰的序幕”，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領袖們“幫助資產階級發動了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

18. 保卫國家的騙局，是到處都補以保卫民主的騙局作為掩飾的。如果說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在帝國主義時代的今天也不把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看做是一樣的東西，而且隨時準備擊退法西斯主義對民主主義的進攻，那末在戰爭的情況下，無產階級不應該支持民主政府來反對法西斯政府嗎？

真是奇談怪論！我們是通過無產階級的組織和方法來保卫民主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同社會民主黨人相反，我們決不把這種保卫的責任委託給資產階級國家（“Staat, greif zu!”<sup>①</sup>）。如果說在和平時期，我們同最“民主”的政府就處於不可調和的對立狀態，那末，到了資本主義的一切丑行和罪行都採取了最殘酷而且血腥的形式的戰爭時期，難道我們還能對它負擔絲毫的責任嗎？

19. 大國之間的一場現代的戰爭，所意味著的並不就是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衝突，而是兩個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同時，戰爭不可避免地具有國際的性質，在兩個陣營中都既會有法西斯主義的（半法西斯主義的，波拿巴主義的，等等）國家，也會有“民主主義的”國家。法帝國主義的共和國形式在過去並沒有防止它在和平時期把自己的基礎建立在波兰、南斯拉夫和羅馬

---

① 归国家负责！——编者注

尼亞的軍事資產階級專政之上，而將來在必要時它也會恢復奧匈君主國家來阻止奧地利與德國的聯合。最後，在法國本身，議會民主制今天已經相當削弱了，這個議會民主制如果在戰爭開始前還沒有被推翻的話，那末它毫無疑問將會成為戰爭的首批犧牲者之一。

.....

22. 帝國主義戰爭，遠比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形式的問題更为重要。它向每一個民族資產階級提出了民族資本主義的命運問題，向各國的資產階級提出了總的資本主義命運的問題。因此無產階級也必然提出這樣的問題：**資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某一个帝国主义阵营的胜利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摘譯自《戰爭與第四國際》（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11—13頁。

為了替自己的軍國主義和沙文主義政策辯解，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宣傳一種思想，彷彿新的戰爭將有保護自由和文化，抵制法西斯侵略者的使命：一方面——由新舊大陸的民主大國所領導的“和平”國家；另一方面——德國、意大利、奧地利、匈牙利、波蘭、日本。這樣的分類，即使從純粹形式方面來看，也是值得懷疑的。南斯拉夫國家的“法西斯性”並不遜於匈牙利；而羅馬尼亞也不比波蘭更接近民主一些。軍事獨裁不但統治著日本，而且統治著中國。斯大林的政治制度日益接近希特勒的制度。在法國，甚至在新的戰爭發生以前，法西斯主義就有可能掃除民主：“人民陣線”的政府在任何地方都盡其所能地幫助這一轉變。我們看，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區分野狼和羔羊並不這麼容易呵！

摘譯自《在新的世界大戰之前》（1937年8月9日），載於《反對派通報》1937年9—10月第58—59期第8頁。

为維护民主反对法西斯而战这个口号也同样是騙人的。难道工人們忘記了英國政府帮助希特勒及其匪徒取得政权了吗！帝国主义民主国家事实上是历史上最大的貴族国家。英法荷比都是建立在对殖民地人民的奴役上的。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则是建立在对整个大陆的广大財富的掠夺上的。这些“民主国家”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这些帝国主义民主国家把战争負担的很大一部分轉嫁到自己的殖民地人民头上。奴隶們不得不供給血和金錢来保证自己的主人繼續做奴隶主。沒有殖民地的小資本主义民主国家則是諸大帝国的卫星，分沾一部分殖民地利潤。这些小国的統治阶级为了保全自己的特权是可以随时抛弃民主的。

.....

**战争并没有使民主国家轉化为反动的独裁政制的过程停頓下来；恰恰相反，战争正在我們眼前把这个过程进行到底。**

摘譯自《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第四国际紧急會議宣言，1940年5月)，紐約版第12—13頁。

**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联盟揭开了世界大战的序幕，直接导致了波兰民族的被奴役；这是苏联的軟弱以及克里姆林宮在德国面前惊慌失措所造成的。苏联所以軟弱的責任，完全在于克里姆林宮本身：在于它在統治阶层和人民之間划下一道鴻沟的內政政策，在于它为了斯大林集团的利益而牺牲了世界革命的利益的外交政策。**

同上，第18頁。

如果西班牙革命取得胜利，欧洲本可以开始一个革命的时代，因而就会阻止此次战争的发生的。但是这次本有种种可能获得胜利的英勇的革命却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怀抱之中被窒息了，这两个国际在这样作的时候还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积极合作。世

界无产阶级又丧失了一次大希望，又增加了一次骇人的背叛的教训。

一九三六年六月间法国无产阶级的强有力运动，显示了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一个法兰西苏维埃共和国本可以立即取得欧洲的革命领导权，并在每个国家造成革命的波澜，动摇极权国家的统治，这样使全人类免于目前这次帝国主义大屠杀及其不可数计的牺牲。然而莱昂·勃鲁姆和莱昂·茹奥的极端卑鄙，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在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积极援助下，竟把十年来最有希望的运动之一引上了失败的道路。

西班牙革命的被绞杀和法国无产阶级攻势的被破坏，是这次战争前夜的两个悲惨事件。资产阶级深深相信，有这样的“劳动领袖”供其驱使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连对人民的大屠杀也敢去做。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结束的时候曾经阻止无产阶级去推翻资产阶级。**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领袖们又帮助资产阶级发动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让这次战争成为他们的政治坟墓吧！

同上，第28—29页。

## 2. 反战策略

攻击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破坏了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的失败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说今天保护祖国“也就是保护束缚他们自己的锁链”。宣传“为了反对‘保护祖国’这个反动口号，必须提出以革命手段粉碎民族国家的口号”“必须提出作为走向‘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阶段的‘欧洲社会主义

聯邦’綱領來反對資本主義的歐洲瘋人院”。

說“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是無產階級政黨戰時的全部工作所必須服從的總戰略任務”。曲解列寧的公式“失敗是較輕的禍害”，說這“並不是意味著本國的失敗要比敵國失敗的禍害輕，而是意味著革命運動的增長所造成的軍事上的失敗，肯定比‘國內和平’所保證的軍事勝利更有利于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宣傳和平的口號同失敗主義的公式“並不矛盾”，“爭取和平的鬥爭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最可靠的手段”。

關於根本的階級目的甚至比局部的目標更不能用民族手段或在國家界限內實現這一無比堅定的信念構成革命國際主義的核心。然而，如果這個最終目的能夠在民族界限內通過民族無產階級的努力來實現，那麼，國際主義的脊梁就被打斷了。**關於一國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理論破壞了勝利了的無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的失敗主義之間的內在聯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仍然在通往奪取政權的道路上移動。它怎樣以及用什麼方式奪取政權，完全要看它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看做是一項民族任務還是一項國際任務。

假定說有絲毫可能在一國實現社會主義，那不僅在奪取政權以後，而且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可以相信這個理論。如果社會主義能够在落後的俄國的民族界限內實現，那就更有理由相信它能在先進的德國實現。明天德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將擔負起闡發這個理論的任務。綱領草案授權他們這樣做。後天就該輪到法國黨了。這將是共產國際沿着社會愛國主義路線瓦解的開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如果接受了它本國具有獨自建立“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必需的和足夠的”先決條件的思想，那它在實質上同革

命社会民主党就相差无几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同样不是从諾斯克事件开始，而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恰恰在这个問題上跌了决定性的一跤。

如果宣称：苏联存在本身就是抵御社会爱国主义的保证，因为在对待工人共和国时爱国主义是一項革命义务；如果这样說，那么这种对正确的思想的片面应用就表現了民族狭隘思想。讲这样的话的人脑子里想的只是苏联，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則閉眼不看。要能够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采取失敗主义立場，只有在綱領中对这个中心問題貫彻国际主义方針，并且无情地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私貨。社会爱国主义到現在为止还戴着假面具，但企图在列寧的国际的綱領中給自己搭一个理論巢穴。

摘譯自《列寧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 1936年版第 72—73 頁。

58. 假如发生資本主义国家互相冲突的問題，那末这些国家中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都会毅然决然地拒絕为了资产阶级在军事上的胜利而牺牲自己的历史的利益，因为这种利益归根結底是与民族和人类的利益一致的。列寧的公式“失敗是較輕的禍害”，并不是意味着本国的失敗比敌国失敗的禍害輕，而是意味着革命运动的增长所造成的军事上的失敗，肯定比“國內和平”所保证的军事胜利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卡尔·李卜克內西为战时的无产阶级政策提出了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公式：“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在本国国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会弥补失敗所引起的禍害，而且还会建立起防止未来的战争和失敗的最后保证。对待战争的这种辩证的态度，是进行革命訓練从而也是进行反战斗爭的最重要的因素。

59.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國內战争是无产阶级政党战时的全部工作所必須服从的总战略任务。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普法战

爭的結果以及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帝国主义大屠杀的結果（巴黎公社、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若干交战国中的起义运动），无可辯駁地证明，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一場現代战争会为每个国家带来國內各阶级之間的战争，而革命党的任务就是在后一种战争中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进行准备工作。

60.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經驗还证明，和平的口号同“失敗主义”的战略公式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能发展磅礴的革命力量，在战争曠日持久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和平的口号只有当民主党人和其他政治家利用它来进行誑騙的时候，当牧师們举行禱告祈求最迅速地停止屠杀的时候，当“人类的博爱者”（包括社会爱国主义者在内）泪汪汪地敦促政府在“正义的基础”上迅速媾和的时候，它才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亦即欺騙、麻痹和涣散人心的性质。但是，当和平的口号是发自工人阶级的营房和战壕，并且同作战双方兵士携手友爱、团结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口号結合起来的时候，它就同和平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了。采取更广泛更大胆的形式的爭取和平的革命斗争，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國內战争”的最可靠的手段。

摘譯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26—27頁。

差不多一百年以前，当民族的国家还是一个比較进步的因素的时候，《共产党宣言》便已宣告：无产阶级沒有祖国。**无产阶级唯一的目的，就是創建一个包括全世界的劳动者祖国。**及至十九世紀末，拥有军队和关税壁垒的资产阶级国家就已經成为妨害那需要更广阔的活动場所的生产力发展的最坏的障碍了。今天出来保护祖国的社会主义者所起的反动作用和法兰西大革命时代起来保卫封建制度也就是保护束縛他們自己的鎖鏈的汪德农民的反动

**作用是完全一样的。**

摘譯自《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第四国际  
緊急會議宣言，1940年5月)，紐約版第11頁。

官方的爱国主义乃是保卫剥削者利益的假面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要輕蔑地把这个假面具抛在一边。他們不要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而只要保卫本国以及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利益。第四国际的提綱宣布說：“为了反对‘保卫祖国’这个反动口号，必須提出以革命手段粉碎民族国家的口号。必須提出作为走向‘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阶段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綱領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欧洲瘋人院。”

同上，第12頁。

## 四、关于反苏战争

### 1. 反苏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声称“对革命后果的恐惧，到现在还麻痹着种种武装干涉的計劃”，“然而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之間不可調和的对抗，正日趋表面化”。断言世界资产阶级不会中立到社会主义制度完成时为止。

**一場帝国主义者反对苏联的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推迟这个危险，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加强苏联并团结国际上革命的无产阶级，这應該是我们主要的实际任务之一。只有主

**要国家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才能最后消除这个危险。**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3页。

欧洲资产阶级在上次战争中吃够了苦头，不肯轻易发动另一次战争。对革命后果的恐惧，到现在为止还麻痹着种种武装干涉的计划。但是恐惧的因素是不稳定的。革命的威胁还没变成革命本身。一个危险如果迟迟不实现，便失去它的效力。同时，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正在日趋表面化。近来的种种事变已经雄辩地说明：要使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完成时为止的这种希望，已经被现在的当权派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变成了自身的反面。

摘译自《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  
载于《俄国革命史》伦敦1936年版第1256页。

## 2. 保卫苏联的策略

说“第四国际只能以革命的阶级斗争来保卫苏联”。  
扬言在战争中将按克里孟梭的先例行事：“在对莫斯科的  
寡头政治进行不懈斗争的同时，坚持反对任何足以帮助  
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政策”。声称“无产阶级在保卫苏联  
时，并不是保卫国界线，而是保卫暂时被国界包围起来的  
社会主义专政”。

断言“如果战争始终只是一场战争，苏联的战败将是  
不可避免的”。“如果帝国主义没有由于西方革命而陷于  
瘫痪状态的话，它将会铲除这个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制  
度”。胡说“如果没有革命来干涉，苏联的社会基础不仅  
在战败的情况下，就是在胜利的情况下也必然要被摧

毀”。“只要其它国家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即使苏联在軍事上遭到失敗也只是一个短暫的插曲”。“如果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余部分还能坚持下来，那末，什么样的軍事胜利也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重申“惟有世界革命才能拯救苏联的社会主义，但是世界革命不可避免地要連帶着消灭克里姆林宮的寡头政治”。

我們的整个工作應該早已在这些口号下进行：（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工人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战争。（二）在所有进攻苏联的国家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國內战争。（三）使一切对苏联进行战争的資產阶级国家陷于失敗。資本主义国家內一切正直的无产阶级應該为“本国”政府的失敗而积极努力。（四）一切不願帮助“本国”劳动剥削者的外国士兵，投向紅軍这边来。苏联是所有工人的祖国。（五）除了正在进行反帝民族革命战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外，“保卫祖国”的口号只不过是一切資產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利益的伪装。在苏联，“保卫祖国”是真实的口号，因为我們所保卫的是社会主义祖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基地。（六）自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来，我們就是“祖国的保卫者”。我們的“爱国”战争是“为了作为社会主义世界大軍的一个团队的苏維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战争。“我們的‘爱国’战争不是走向資產阶级国家的一步，而是走向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步”（列宁）。我們保卫祖国即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們的战争是由工人和雇农，在貧农的支持之下，并和中农联盟反对“他們的”富农、新資產阶级、官僚、烏斯特里雅洛夫派的专家以及白俄之下进行的。我們的战争是真正的正义战争。誰不是苏联的保卫者，誰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彻头彻尾的叛徒。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5—86頁。

(五)我們必須始終如一，有步驟和頑強地進行爭取和平的鬥爭。我們必須推遲戰爭，“用購買辦法使我們自己免于戰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一切可能的和可允許的事情都必須去做(參閱第一點)同時我們必須立刻做好戰爭準備，不能有片刻的懈怠。我們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制止一切關於是否存在戰爭迫近的危險這種涣散精神的知識分子式的政治閑談和猜測。

(六)我們必須堅決地糾正我們在國內的階級路線。假使戰爭不可避免，只有嚴格的布爾什維克政策才能贏得戰爭，這就是：工人和雇農，取得貧農支持，同中农聯盟，反對富農、耐普曼、官僚。

同上，第 99—100 頁。

在英俄關係破裂的時候，俄國的反對派抱着鄙視的態度駁斥了那些責備它是失敗主義者、並給它扣上有條件的護國主義的帽子的人的謠言，同時用正式的文件宣告，在它看來，一切不同意見在戰時比在和平時期還要更加尖銳地提出來。在同英國斷絕外交關係的時候，在革命專政的國家發表的這種宣言，用不着作別的解釋，無論如何比起在這兒那兒寫的某些小文章來，提供了莊嚴得多的保證。

這問題在一九二七年引起了激烈的鬥爭。烏爾邦斯和贊同他的觀點的人聽說過所謂《克里孟梭論綱》嗎？幾個月來，中央機關手里拿着這個提綱，鼓動全黨。要知道，我會舉克里孟梭的態度作為帝國主義者陣營內的愛國反對派的例子，他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不顧資產階級世界已宣告訂立神聖同盟，而進行反對資產階級其余的各派的鬥爭，他掌握了政權，並確保法國帝國主義的勝利。我會問道，在資產階級的陣營中，是否找得着這樣的蠢材，他為這件事情稱呼克里孟梭是失敗主義者，或者是有條件的護國主義者？這就是在幾千篇論文中和在幾萬次演說中受批評的有名

的《克里孟梭論綱》。

摘譯自《保卫苏联与反对派》(1929年9月7日),  
巴黎版第51—52頁。

34. 在取得政权后,无产阶级本身就要轉到“保卫祖国”的立場上。但是从这时起,这个公式获得了全新的历史內容。孤立的工人阶级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实体,而仅仅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练兵場。无产阶级在保卫苏联时,并不是保卫国界綫,而是保卫暂时被国界围起来的社会主义专政。只有深刻地理解这样的事实: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的范围内完成;沒有无产阶级在主要国家里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一切成就都注定要失敗;除了通过国际革命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不到拯救;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只有把这个坚定的信念注入血液和骨髓,才能为战争时期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策創立可靠的基础。

摘譯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17頁。

47. 但是,正是战争的曠日持久的性质,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苏联过渡时期的經濟与官僚主义計劃的矛盾。許多巨大的新企业可能表明只是一大堆死資本。在政府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的影响下,农民經濟中的个体主义傾向将会大大加强,集体农庄內的离心力量将随着战争逐月增长。不受监督的官僚的統治将会变成一种軍事独裁。缺少一个生气勃勃的党作为政治上的监督者和調節者,就会导致矛盾的急剧积累和加剧。在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中,人們将会看到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急剧轉向个体主义原則、轉向吸收外国的和“盟国的”資本,将会看到对外貿易垄断制的破坏,政府对托拉斯的监督的削弱,托拉斯相互間競爭的尖銳化,以及它們同工人之間发生冲突等等。在政治方面,这些过程可能意味着波拿巴

主义已臻于成熟，同时在所有制关系方面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或一系列变化。換句話說，假使戰爭曠日持久而与此同时世界无产阶级又消极被动，那末苏联内部的社会矛盾不仅可能而且一定会导致一場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

48. 由此而得出的政治結論是明显的：

(1) 在戰爭曠日持久的情况下，只有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苏联这个工人阶级国家。

(2) 世界无产阶级先鋒队只有在擺脫苏联的官僚而完全独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友好的”、“結盟的”以及敌对的国家中准备无产阶级革命。

(3) 无条件地支持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军队的行动，必須同对战争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所进行的革命的馬克思主張批評密切地配合起来，必須同在苏联国内建立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革命党的工作密切地配合起来。

同上，第 21—22 頁。

然而，我們能够指望苏联在即将到来的大戰中不致战敗嗎？对于这个坦率地提出的問題，我們將同样坦率地回答：如果戰爭始終只是一場戰爭，苏联战敗将是不可避免的。从技术、經濟和軍事的意义上說，帝国主义是无可比拟地更为强大的。如果帝国主义沒有由于西方的革命而陷于瘫瘓状态的話，它将会鏟除这个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制度。

.....

如果资产阶级盟国得到这样的物质保证，即莫斯科政府不仅在战争的壕沟上而且在阶级的壕沟上也同他們站在一边，当然情况就会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的“和平之友”利用苏联将在两面夹攻之下所遭到的困难，当然会采取一切措施在对外貿易垄断方面和

苏联财产法方面打开一个缺口。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白俄流亡者所展开的日益强大的“保卫”运动，就是完全依靠这种估计的。**如果你认为，世界斗争将只限于在军事方面进行下去，那末，盟国就有达到他们的目的的好机会。如果没有革命来干涉，苏联的社会基础不仅在战败的情况下，就是在胜利的情况下也必然要被摧毁。**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5—167页。

**战争危险和苏联战败是一个现实，但革命也是一个现实。如果革命不阻止战争，战争就会帮助革命。第二次分娩通常总比第一次要容易些。在新战争中，将不需要等待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才发生第一次暴动。不仅如此，一旦战争爆发，这一次革命就不会半途而废。归根到底，苏联的命运将不是在参谋本部的地图上决定，而是在阶级斗争的地图上决定。只有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和他们在同一阵营中的那些“和平之友”的欧洲无产阶级，才能保护苏联，使它免遭毁灭或者“盟国”的暗害。只要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即使苏联在军事上遭到失败也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另一方面，如果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余部分还能坚持下来，那末，什么样的军事胜利也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

同上，第168—169页。

破坏国防的流血清洗，首先表明执政的寡头已和人民、包括红军在内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的尖锐性本身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国内经济和文化的巨大进步已越来越难于容忍斯大林政制了。苏联的政治革命，即推翻腐化透顶的官僚等级，无疑地将是战争的最近后果之一。然而，一切都使我们相信，只要整个人类不退到野蛮时代，则苏维埃制度的社会基础(新的所有制关系及计划经济)，

一定会經得住战争的考驗，甚而在战争中得到加强。

摘譯自《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1937年8月9日)，載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9—10月第58—59期第15—16頁。

**第四国际只能以革命的阶级斗争来保卫苏联。教导工人去正确了解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工人国家——的阶级性，理解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以及每一国家的内部矛盾，使得工人能够在每个特定的形势下做出正确的实际結論。第四国际在对莫斯科的寡头政治进行不懈斗争的同时，坚决反对任何足以帮助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政策。**

保卫苏联，在原則上是与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一致的。我們断然拒絕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这是无知而反动的斯大林主义的精神产儿。唯有世界革命才能拯救苏联的社会主义。但是世界革命不可避免地要連帶着消灭克里姆林宮的寡头政治。

摘譯自《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第四国际紧急會議宣言，1940年5月)，第21頁。

## 五、关于保卫和平的道路

### 1. 裁軍問題

攻击苏联以“普遍裁軍”和“互不侵犯”为基础的对外政策是“最恶劣的和平主义幻想和社会爱国主义的錯誤的根源”。說裁軍不是反对战争的手段，而是“重整軍备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普遍’裁軍即使可以实现，也只能意味着比較強大的工业国的军事优势的加強”。“‘百分之五十的裁軍’决不是完全裁軍的道路，而是絕對的百

分之百的重整軍备的道路”。“所謂‘逐步裁軍’的思想，只不过意味着在和平时期設法削減过多的軍事費用。这是一个資金問題，而不是爱好和平的問題”。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裁軍的要求显然是“幻想”，“只会轉移工人对武装自己的必要性的注意”。

35. 从一国社会主义理論出发的苏联对外政策，即实际上把国际革命的問題置之不理的政策，是以普遍裁軍和互不侵犯这两个主张为基础的。为了寻求外交上的保证，苏联政府对战争与和平問題不得不采取純粹形式主义的說法，这是从有資本主义包围的情况出发的。但是由于国际革命的軟弱并且在頗大程度上由于苏联政府本身以往的錯誤而不得不采取的这些迁就敌人的方法，是决不能上升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办法的。然而苏联外交的行动和言論，长久以来超越了不可避免的、可以容許的实际妥协的界綫，这种行动和言論居然被規定为第三国际的国际政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并且已經成为最恶劣的和平主义幻想和社会爱国主义的錯誤的根源。

36. 裁軍并不是反对战争的一种手段，因为，正如德国本身的经验表明，插曲性质的裁軍只不过是走上新的重整軍备道路的一个阶段罢了。有了現代工业技术，就有重新发动十分迅速的重整軍备的可能性。“普遍”裁軍即使可以实现，也只能意味着比較强大的工业国的軍事优势的加强。“百分之五十的裁軍”决不是完全裁軍的道路，而是絕對的百分之百的重整軍备的道路。把裁軍說成是“防止战争的唯一現實的手段”，就是为了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結成共同陣綫而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

摘譯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17—18頁。

要求資產階級國家解除法西斯匪帮武装，正如斯大林分子做的那样，是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道路。正是威尔斯和奧托·鮑威尔“要求”这个国家解除納粹的武装，确保國內的和平。的确，“民主”政府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是可能解除个别法西斯集团的武装的，但这仅仅是为了更加凶殘地解除工人們的武装和防止他們进行武装。就在第二天，資產階級国家会让昨天才“被解除武装”的法西斯分子双倍地武装起来，并以双倍的力量把武器对准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向国家，也就是向資本家要求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意味着散布最坏的民主幻想，意味着麻痹无产阶级的警惕性，意味着腐蝕无产阶级的意志。

同上，第 27 頁。

在帝国主义矛盾还存在的时候，“裁軍”計劃是最有害的假象。这种計劃即使由于取得普遍協議而實現了——这显然是荒謬的假定！——也一点也不会防止新战争。帝国主义者并不是由于有了軍备才进行战争的；恰恰相反，他們制造武器是因为他們需要打仗。要想进行新的而且很迅速的武装，关键在于当代的技术。不管有了什么样的協議、限制和“裁軍”，軍火庫、軍事工厂、实验室以及整个資本主义工业都还保留着自己的力量。例如，德国虽然被它的征服者在最細致的监督下解除了武装（順便說一句，这才是唯一真正的“裁軍”形式！），可是由于它拥有强大的工业，現在又开始变成欧洲軍国主义的堡垒。在德国方面，则想把它的某些邻国“解除武装”。所謂“逐步裁軍”的思想，只不过意味着在和平时期設法削減过多的軍事費用。这是一个資金問題，而不是爱好和平的問題。但是即使这样，這項任务也还是沒有实现。由于地理位置、經濟力量以及殖民地的大小不同，任何裁軍标准都不可避免地会使力量对比的改变有利于一些国家而不利于另外一些国家。这就是在

日內瓦所作的努力总是沒有結果的原因。在裁軍問題上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談判和會談以后，只不过是掀起了新的扩軍浪潮，这种浪潮的推进使我們迄今所看到的一切事情都远远地落在后面。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建筑在裁軍計劃上，意味着不是把这种政策建筑在沙漠上，而是建筑在軍国主义的烟幕上。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6頁。

然而軍备状况只是战争的因素之一，而且不是最主要的。一切国家都感觉到自己已“充分地”武装起来的时刻是永远不会到来的。軍备的動向，单就其自身而言，自然是走向战争而不是走向和平的。但軍队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又是物质利益的工具。引起新战争的推动力，多半将由經濟状况的轉变来提供。

摘譯自《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1937年8月9日)，  
載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9—10月第58—59期第  
10頁。

其实“技术”和“群众”的对立，或像有时所說的“质”与“量”的对立，只是一种毫无生气的抽象概念。假使二十万人的机械化軍团能作出奇迹，那么两个这样的軍团所能作的，将不是二倍而是四倍多的奇迹。数字的法則，就是在最高的技术基础上也是有效的。簡單点說，作战的民族将不得不派出尽量多的武装得尽量好的士兵。

同上，第12頁。

然而，不管无畏舰的情况如何，英國将不得不重新在欧洲大陆上来保卫自己。人不是生活在水上，也不是在空中，而是生活在

地上的。海軍和空軍只是侵入敵人領土或防卫自己領土的輔助工具，戰爭的命运还是决定于陆地上。陸軍至少在欧洲或世界的范围中，是进攻和防守的主要力量。軍隊的基础是步兵。别的条件如果相等，則陸軍的人数愈多，胜利的机会便愈大。

同上，第 13 頁。

“裁軍嗎？”——但是整个問題在于誰解除誰的武装。唯一能够避免或結束戰爭的裁軍是工人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装。但是为了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装，工人自己必須先武装起来。

“中立嗎？”——在日本与中国的戰爭中，或者在德国与苏联的戰爭中，无产阶级决不是中立的。“那么这里所指的是不是保卫中国和苏联呢？”当然是！但是，不能由要扼杀中国和苏联的帝国主义者来保卫。

“保卫祖國嗎？”——但是資產階級这一抽象概念的意思是保卫他們的利潤和掠夺物。如果我們首先束縛住我們自己的（資本家的）手脚，使他們不能进攻外国人的祖國；如果我們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如果国家的財富从一小撮人的手里轉到人民的手里；如果軍隊成为被剝削者的武器而不是剝削者的武器，我們就准备保卫祖國不受外国資本家的侵略。

摘譯自《資本主義的垂死掙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1938 年 9 月 3 日），紐約 1946 年版第 29 頁。

戰爭是一桩大买卖，对軍事工业說来尤其如此。因此，“六十大家族”是第一綫的爱国者和主要的戰爭煽动者。由工人对軍事工业实行監督是对戰爭“制造商”进行斗争的第一步。

改良主义者提出的口号是：对戰爭利潤征稅；为了对抗这个口号，我們提出这样的口号：沒收戰爭利潤和剝奪經營軍火工业的擴

客。在把軍事工业“收归国有”的地方，如法国，工人监督的口号仍然充分有效。无产阶级不信任资产阶级政府，正如他们不信任资本家个人一样。

不給資產階級政府一个人，一分錢！

不要軍备綱領，而要兴办有用的公共事业的綱領！

工人組織完全摆脱军队和警察的控制！

我們必須一劳永逸地掙脫背着人民玩弄阴谋貪得无厌而又残酷无情的帝国主义集团任意摆布人民命运的魔掌。

根据这一点，我們要求：

完全废止秘密外交，让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知道所有的條約和协定；

在工人委員会和农民委員会的直接监督下武装工人和农民，实行軍事訓練；

成立軍事学校，訓練由工人組織挑选出来的劳动者为指揮官；

以与工厂、矿山、农場等等保持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民兵来代替常备軍。

同上，第 31—32 頁。

用和平主义者对和平的虔誠哀叹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是不行的。“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传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sup>①</sup> 帝国主义者所締結的和約只是取得新战争以前的喘息时间。只有对战争和战争所产生的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群众斗争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认为不經過一系列革命就能实现所謂民主和平的想法，是极其錯誤的。”<sup>②</sup>

① 《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40 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 141 頁。——編者注

反对和平主义幻想的斗争是列宁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他特别痛恨地拒绝了“裁军”的要求，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显然是幻想，只会转移工人对武装自己的必要性的注意。“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唤。”<sup>①</sup>而且，“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sup>②</sup>列宁拒绝了空洞的“和平”口号，而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来与它相对抗。

摘自《斯大林评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上册第223页。

## 2. 国际联盟、集体安全和仲裁法庭

认为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仲裁法庭、裁减军备都是些“和平主义的幻想”，“只不过是欺骗劳苦群众的一种方法，使他们在新战争爆发的时候措手不及”。说“国联在维护现状方面并不是一个‘和平’组织，而是一个少数帝国主义者用暴力对付绝大多数人类的组织”。“苏联加入国际联盟不能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却给自己增加了严重的限制和义务”。说外交协定不过是“废纸”，“到欧洲任何一部分有发生社会革命的直接威胁的时候，同苏联订立的条约就没有一个还会存在下去”。认为应当区别两种和平主义：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充满了欺骗”，是“帝国主义的烟幕”；被压迫者的和平主义是“对毁灭性战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94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95页。——编者注

爭的憎恨”，是“不信任帝国主义的混乱表示”。

和平主义对于被事变吓破了胆的那部分社会党上层來說意味着自我擺脫和消极等待。对于群众來說，和平主义則意味着思考的时刻、在由奴隶式的爱国主义走向行动的国际主义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摘譯自《五·一·》(1916年5月1日)，  
《載于戰爭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  
年版第110頁。

那个时期<sup>①</sup>的领导人特別反对各种各样的和平主义幻想——如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仲裁法庭、裁減軍备等等。他們认为这些幻想只不过是欺騙劳苦群众的一种方法，使他們在新战争爆发的时候措手不及。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7頁。

苏联官僚利用戈培尔慣用的那套欺騙手法，把苏联加入国际联盟这件事向俄国人民說成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結果。实际上，资产阶级之所以接受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只不过是由于革命的危险已經大大减少。这件事并不是苏联的胜利，而是热月官僚向这个无原則妥协的日內瓦机构的投降。按照上面所引的布尔什維克党綱上的話，这个机构“将在将来努力于镇压革命运动”。自从布尔什維主义的大宪章頒布以来，什么东西使国际联盟的性质、和平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职能以及苏维埃的政策发生了这样根本性的变化呢？提出这个問題也就回答了这个問題。

---

① 指列宁领导苏维埃国家的时期。——編者注

經驗很快就证明，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不能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这种实际利益通过同个别资产阶级国家订立协定是可以得到的），与此同时，却给自己增加了严重的限制和义务。苏联为了维护它刚刚得到不久的保守声望，正在最忠实地遵守这些限制和履行这些义务。

同上，第 141 頁。

國聯在維护現狀方面并不是一个“和平”組織，而是一个少数帝国主义者用暴力对付絕大多数人类的組織。要保持这样的“秩序”，只有依靠接連不断的战争——小的和大的，今天在殖民地，明天在大国之間。帝国主义对現狀的忠实，总是具有一种有条件的、暂时的和有限度的性质。

同上，第 145 頁。

人們可以这样回答說：“帝国主义”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也是被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这是十分正确的，如果帝国主义不是因为有这些矛盾的話，苏联早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苏联簽訂的外交和軍事协定有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的。然而，如果看不到这些矛盾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消失，那将是一个致命的錯誤。正如从最反动的政党到社会民主党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間的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威胁面前会消失一样，为了阻止苏联取得軍事胜利，帝国主义的对抗也总会找到妥协办法的。

正如某位总理有一次不无理由地說的，外交协定不过是一些“废紙”。哪里也沒有写着这样的话：甚至到爆发战争的时候，这种协定还必须存在下去。到欧洲任何一部分有发生社会革命的直接威胁的时候，同苏联簽訂的條約就沒有一个还会存在下去。不用

說法國，只要西班牙的政治危機進入革命階段，勞合-喬治所提出的對救世主希特勒的希望就會不可抗拒地掌握所有資產階級政府的心靈。另一方面，如果西班牙、法國、比利時等國的不穩定的局勢最後導致反動的勝利，那末，蘇聯簽訂的公約也將不會留下一點痕迹。最後，即使這些“廢紙”在軍事行動的初期還能有效，毫無疑問，各種力量集團在戰爭的決定階段，將決定於比外交家的誓言強大得無可比擬的一些因素，因為外交家的職業就是說假話。

同上，第166頁。

有必要嚴格地區別外交家、教授、新聞記者的和平主義與木匠、農業工人和女幫工的和平主義。前一種和平主義是帝國主義的烟幕；後一種和平主義是不信任帝國主義的混亂表示。當小農或工人談到保卫祖國的時候，他們指的是保卫他們的故鄉、家庭和其他類似家庭不遭受侵略，不受炸彈和毒氣的危害。而資本家及其新聞記者所謂的保卫祖國則是指奪取殖民地和市場，掠奪性地增加“本民族”在世界收入中所占有的部分。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和愛國主義充滿了欺騙。被壓迫者的和平主義、甚至是愛國主義中，有一些因素一方面反映了他們對毀滅性戰爭的憎恨，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們對他們認為是自己利益的東西緊緊抓住不放——為了得出必要的結論，我們必須知道如何利用這些因素。

摘譯自《資本主義的垂死掙扎和第四國際的任務》  
(1938年9月3日)，紐約1946年版第29—30頁。

### 3. 人民陣線

污蔑共產國際所執行的人民陣線政策是階級合作的背叛政策，是“帝國主義在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中所凭

借的最后的政治手段”。攻击它“麻痹劳动群众”，使之“替‘进步的’资产阶级当炮灰”。“在一切可能建立的人民阵线中，流亡的‘人民阵线’是最恶毒和不忠实的”，这是同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声称“无情地揭发‘人民阵线’的理论和实践是进行反法西斯革命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54. 用共产主义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集团（其中每一个忠实的迷失方向者就有数十个野心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即工人阶级组织的战斗协议，那就会导致完完全全的策略問題中的折衷主义。巴比塞-明岑堡（Barbusse-Muenzenberg）代表大会认为他们的特殊功绩是把各种类型的反战“斗争”结合了起来，其中包括：人道主义的抗议，个人拒绝服兵役，“舆论”的教育，总罢工甚至起义。他们把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调和地矛盾着的而在实际上只能互相冲突的一些方法，说成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宣传“综合策略”（自由主义者、个人恐怖行动和群众斗争的联合）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比起阿姆斯特丹集团的鼓舞者来倒可说是一批实实在在的人物。但是工人們必須記住，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民粹派的折衷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摘译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纽约1934年版第24页。

共产国际明确地倒向了资产阶级政府秩序的一边，它在全世界，尤其是西班牙、法国、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扮演了无耻的反革命角色，所有这一切都为世界无产阶级增添了异乎寻常的困难。“人民阵线”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实行的妥协策略必然使无产阶级陷于软弱无能状态，并且为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

**一方面是“人民陣線”——另一方面是法西斯主义；这就是帝国主义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所凭借的最后的政治手段。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两个手段都只能是权宜之計。在法国，资本主义继续在自由帽<sup>①</sup>的标志下衰朽下去，正如它在德国在卐字旗的标志下继续腐朽下去一样。不推翻资产阶级就无法找到一条出路。**

摘譯自《資本主义的垂死掙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938年9月3日)，紐約1946年版第7—8頁。

**共产国际为了維持与“民主的”奴隶主的友誼而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不能不同时背叛爭取殖民地人民解放的斗争，其无耻程度甚至超过它以前的第二国际。人民陣線和“保卫祖国”政策的任务之一是把亿万殖民地人民变成“民主的”帝国主义的炮灰。为解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即人类的足足一半)而斗争的旗帜肯定已經轉到了第四国际的手里。**

同上，第42頁。

**第四国际与早就破产的旧政党正是从这一点上开始发生不可調和的分歧的。在一切可能建立的“人民陣線”中，流亡的“人民陣線”是最恶毒和最不忠实的。本质上它只是无能为力地渴望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自由资产阶级联合。如果它成功了，也只不过为无产阶级准备了一系列西班牙类型的新失敗。因此，无情地揭发“人民陣線”的理論和实践是进行反法西斯革命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同上，第45頁。

**最近五年来，克里姆林宮以阶级合作这一背叛的政策帮助了**

---

<sup>①</sup> 古罗馬解放后奴隶所戴圓錐帽，共和政体的标志。——編者注

**資本主义政府准备战争，那些政府一旦不再需要和平主义的伪装，就立刻抛弃这种政策。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不仅在中国和印度，而且在拉丁美洲——“人民阵线”的骗局还继续在麻痹劳动群众，使群众替“进步的”资产阶级当炮灰，这样来为帝国主义在本国创造政治基础。**

摘译自《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第四国际紧急会议宣言，1940年5月)，第27页。

#### 4. 国际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

认为苏联在战时“同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可能是“铁的需要”，但“不会因此而不再是对苏联和对世界革命的最大危险”。说国际无产阶级应当“保证自己在政治上完全不依赖苏联外交”。“一个同苏联结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充分地和完全地保持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不可调和的敌愾心”，进行“不可调和的反对活动”，“应当以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夺取政权为目的”，而不能成为“苏联的帝国主义盟国的盟友”。

20. 一些文明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表明而且还在继续表明，在发生国内危险时，它可以不费多大周折就能把议会制的统治形式变成极权的、专制的、波拿巴主义的或法西斯主义的形式。一旦发生战争，国内和国外的危险，会以十倍的力量威胁它的基本阶级利益，到那时候，它会更迅速得多地、更果断得多地实行这种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党如果为了一个脆弱的民主外壳而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那就意味着放弃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意味着沙文主义的道德败坏，也就是说，毁灭了能够把人类从灾难中拯救

出来的唯一的因素。

21.“保卫民主的斗争”在战争时期首先是意味着为保存工人的出版物和工人的组织以防放肆的军事检查和军事当局的侵害而斗争。革命的先锋队，要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寻求同其他工人阶级的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本国的“民主”政府，但决不是寻求同本国政府的团结以反对敌对的国家。

摘译自《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  
纽约1934年版第12—13页。

40. 第三国际的领导人，以工人国家必须利用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为理由，来为苏联的外交政策辩护。这种论断本身固然无可厚非，但需要加以具体化。

每个阶级的对外政策，都是它的国内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如果说当权的无产阶级必须认识和利用国外敌人阵营中的矛盾，那末，仍在为取得政权而战斗的无产阶级，就必须知道如何认识和利用国内敌人阵营中的矛盾。第三国际原来是根本不能理解和利用改良主义的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而直接地导致了无产阶级极大的失败，并使它面临一场新的战争的危险。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各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必须从国际革命着眼才能加以利用。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在不以苏联外交政策为转移的情况下，只有在有充分自由来揭露这种违反国际革命利益从而也违反苏联利益的民族主义的保守方法的情况下，保卫苏联才是可以理解的。

同上，第19页。

43. 在当前的形势下，苏联在发生战争时同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或是同某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结盟反对另外一个集团，这决

不能认为是不会有的。在形势的压迫下，这种暂时的結盟可能成为铁的需要，而且还会因此而不再是对苏联和对世界革命最大的危险。

即使苏联被迫同某些帝国主义者結成軍事同盟来反对另外一些帝国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也不会拒絕保卫苏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甚至更需要保证自己在政治上完全不依赖苏联外交，因而也不依赖第三国际的官僚。

44.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际无产阶级仍旧是工人国家的坚决而忠誠的保卫者，但决不会成为苏联的帝国主义盟国的盟友。一个同苏联結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須充分地和完全地保持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不可調和的敌愾心。在这个意义上讲，它的政策和同苏联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但是实际行动的性质，可能由于具体的战争形势而产生許多差异。譬如說，在苏联和日本之間发生战争时，假若美国的无产阶级阻撓美国的軍火运往苏联，那就是可笑的和犯罪的了。但是，同苏联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就应义不容辞地采取罢工和怠工以及諸如此类的行动。

45. 无产阶级对苏联的帝国主义盟国的不可調和的反对活动，必須一方面根据国际阶级政策，另一方面根据該政府的帝国主义目的，来揭示这个“联盟”的背叛性质，揭示它利用苏联資本主义顛复的图謀。因此，在“結盟的”和在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应当以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夺取政权为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同苏联的真正的联盟，才能把第一个工人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同上，第 20—21 頁。

## 六、战争与革命

說“在历史上，战争往往是革命之母”。认为“对于一場新的战争的后果的恐惧，是唯一束縛帝国主义意志的因素”；“所有研究人类未来大屠杀的认真的理論家，都考虑到这种大屠杀的結果有可能引起革命，甚至不可避免引起革命”。断言“如果革命不阻止战争，战争就会帮助革命”。“战争不仅是一場‘大灾难’，而且也是立即把我們的社会发展，而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推到新的更高范围上去的历史因素”。战争将成为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崩溃的巨大“加速器”，无产阶级只能用“社会革命的方法”去制止战争，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作原則的抉擇。說“沒有新的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也将发展，但新的战争必将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sup>①</sup>，对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說来，問題不在于保卫这个过时的和陈旧的民族“祖国”，因为它业已变成經濟发展的主要障碍。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創立一个远为强大的、更能抵御强敌的祖国——欧洲共和联邦，以作为世界联邦的基础。

无产阶级只能用社会主义的世界經濟組織作为現时的实践綱領，来对付資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混乱局面。

战争乃是資本主义在其发展的登峰造极阶段，用以寻求解决其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方法。无产阶级只能用它自己的方法，即社

① 指“資本的扩展已經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这个界限对它的束縛已不可容忍。民族的大国必須让位，必須由帝国主义大国取而代之”。——編者注

会革命的方法，来制止战争。

摘譯自《布尔什維克与世界和平》(原名《战争与国际》)  
(1914年10月)，紐約1918年版第28—29頁。

这件工作不仅加深国际主义者和社会爱国主义者之間的鴻沟，而且也揭露了国际主义者阵营內的各种傾向間的差异。在其右翼聚集了和平主义分子和消极的国际主义者，最能說明他們活動綱領的是面面俱到的口号 *status quo ante bellum*<sup>①</sup>，回到国内正式反对党的策略上去；回到战前那样的第二国际去；最后，恢复旧的欧洲疆界(不割地的和平——并且仅限于此)。对消极的国际主义來說，战争实质上仅仅是暫时侵害社会主义文明的积累過程的外部大灾难，它认为必須采取較为和解的态度去对待作为外部大灾难的“暫时”反映的社会爱国主义。

对革命的国际主义來說(《我們的言論报》是站在它的旗帜下的)，战争不仅是一場“大灾难”，而且也是立即把我們的社会发展，而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推到新的更高范围上去的历史因素，在这个范围上，在帝国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之間作原則的抉择是作为直接的革命行动的任务客观地摆在无产阶级的面前的。从这一观点看来，“和平綱領”問題对我们來說，不是恢复昨天的欧洲的空想保守綱領的問題，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再复活它了，而是历史迫使其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自主的革命綱領的問題。消极的和革命的国际主义之間的矛盾：一端在恢复第二国际的口号上，另一端在爭取第三国际的斗争中得到了明显的表現。海牙和齐美尔瓦尔得！

摘譯自《〈我們的言論报〉周年紀念》(1916年5月16日)，載于《战争与革命》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116—117頁。

① 战前秩序。——編者注

(7)在我們整個經濟、預算等方面，進行應付戰爭事變的全面準備。

資本主義正進入一個新的混亂時期。一場對蘇聯的戰爭就象一場對中國的戰爭一樣，它對世界資本主義意味著一系列的災難。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的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巨大“加速器”（列寧）。新的戰爭，特別是一場反對蘇聯的戰爭，只要我們這方面在戰爭中有一項正確的政策，我們就會贏得全世界勞動群眾的同情，這場戰爭就將成為更加巨大的促使世界資本主義崩潰的“加速器”。**沒有新的戰爭，社會主義革命也將發展，但新的戰爭必將導致社會主義革命。**

摘自《俄國局勢真相》（1927年9月），  
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00頁。

1.與現代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造成上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同樣問題，現在已經達到了遠比一九一四年六、七月間更嚴重的緊張局面。對於一場新的戰爭的後果的恐懼，是唯一束縛帝國主義意志的因素。但是，這種遏制力量的效用是有限的。內部矛盾的壓力，把一個個的國家先後推上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而法西斯主義本身，除了準備國際性的爆發行動外，是不能保持政權的。各國政府都害怕戰爭。但是無論哪一國政府都沒有任何選擇的自由。**不經過一次無產階級的革命，一場新的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

摘譯自《戰爭與第四國際》（1934年6月），  
紐約1934年版第5頁。

然而，上面談到的種種考慮一點也得不出所謂“悲觀主義的”結論。如果說我們不願閉眼不看資本主義世界的巨大物質優勢、帝國主義“盟國”不可避免的背叛以及蘇維埃制度的內部矛盾，那末，另一方面我們也就絕不會傾向於過高地估計敵國或者同盟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在一場使雙方精力消耗殆盡的戰

爭能够彻底衡量經濟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前，它早就使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受到考驗。所有研究人类未来大屠杀的认真的理論家，都考慮到这种大屠杀的結果有可能引起革命，甚至不可避免引起革命。某些集团一再提出的小規模的“职业”军队的想法，虽然不比关于大卫和歌利亚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想法实际多少，但是它的荒唐想法正好显示了那种畏惧武装起来的人民的現實情况。希特勒从来不放过一次机会来加强他“对和平的爱”，其办法是大談西方一旦进行战争，就不可避免地招来一場新的布尔什維克风暴。暫时抑制战争狂热的力量并不是国际联盟，也不是共同安全公約，更不是和平主义的公民投票，而完全是統治阶级在革命面前的那种自卫性的恐惧。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67—168 頁。

**战争危险和苏联战敗是一种現實，但是革命也是一种現實。如果革命不阻止战争，战争就会帮助革命。第二次分娩通常总比第一次要容易些。在新战争中，将不需要等待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才发生第一次暴动。不仅如此，一旦战争爆发，这一次革命就不会半途而废。归根到底，苏联的命运将不是在參謀本部的地图上决定，而是在阶级斗争的地图上决定。只有坚决反对資产阶级以及和他們在同一陣營中的那些“和平之友”的欧洲无产阶级，才能保护苏联，使它免遭毁灭或者遭“盟国”的暗害。只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即使苏联在軍事上遭到失敗也只是一个短暫的插曲。另一方面，如果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余部分还能坚持下来，那末，什么样的軍事胜利也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

同上，第 168—169 頁。

由于新的战争的結果，人类的长期衰落，并非不可能，但幸而

这不是唯一的前途。在各民族的互相毁灭完成之前，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将受到考验。革命能够制止战争的进行。

上面說过，为什么我們不大把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能在必要的时刻用自己的力量阻止战争的爆发上。相反地，在临近战争危险的月份，以及在战争的初期，由于自然反射，群众将为“国家的”、向心的、爱国主义的倾向所掌握。这无论是在一国内的各阶级和民族集团，或是在例如不列颠帝国的各组成部分，都是如此。然而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及随之而来的贫困化、野蛮化和失望，一定不仅将使一切磨擦、对抗和离心的倾向复活，而且将使其得到极端的发展，它们迟早将以起义和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自然，战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使人类陷于前所未有的灾难。然而人民群众使战争结束得愈早，则人类医治它给自己带来的创伤亦愈容易。然则从这观点看来，未来战争的时间将延续多久呢？

由于新的各族人民的大屠杀是从旧的战争结束的地方开始的，因而从战争一开始，人类生命之牺牲及军用物资的耗費，一定要比过去战争开始时的牺牲与耗費高几倍，而且其趋势是继续迅速增加的。速度将是更为狂热的，破坏力将是更大規模的，各民族的痛苦将是更为不可忍受的。所以我們有一切理由相信，群众的反作用不会像在沙俄时代那样需要經過两年半，像在德国及奥匈之需經過四年多才出現，而是要快得多。但是自然只有事变本身才能給期限問題提供最后的答案。

摘譯自《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1937年8月9日)，  
載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9—10月第58—59期  
第14—15頁。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已由历史經驗来确立了，而且在理論上也解释清楚了。（一）资产阶级沒有出路因而造成了統治阶级的徬徨无措；（二）小资产阶级深刻不满，因而要求断然改变現

狀，沒有他們的贊助，大資產階級是站不住腳的；（三）無產階級覺悟到現在的局勢不可忍受，并準備採取革命行動；（四）無產階級先鋒隊有明確的綱領和堅定的領導。——這些便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四個條件。好多次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在於這四個條件很少同時達到必需的成熟程度。在歷史上，戰爭往往是革命之母，正是因為戰爭從根本上動搖了衰朽的制度，削弱了統治階級，并促進了被壓迫階級中革命怒氣之發展。

摘譯自《帝國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第四國際緊急會議宣言，1940年5月），第40頁。

## (七) 关于布列斯特和談

### 一、鼓吹不战不和同时复員军队 的机会主义路綫

1. 声明苏俄拒絕在和約上签字，单方面退出战争，同时复員军队。声称不能用俄国革命的签字来“使暴力神圣化”。說要把军队“領出杀人場”，让士兵回去从事和平劳动。“已經经历了战争造成巨大苦难和灾禍的人民群众必須被送回田間和工厂，以便通过工作而在精神上体力上得到恢复”，从而“建立必要的內部紀律”。声称要让庄稼汉士兵“回到自己的耕地”，以便就在今春“和平地耕种”革命夺来的土地；让工人士兵回到工場，以便“生产不是进行破坏的工具，而是建設的工具，和庄稼汉一起建設新的社会主义經濟”。瞎說德国军队发动进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

正像我們所了解的，小組委員会的任务是回答如下問題：对方所提出的边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哪怕是在最低限度內保障俄国人民的自決权。我們听取了参加小組委員会的我方代表关于領土問題的报告，我們认为，在对問題作了长时间的討論和全面研究以后，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經到了。各国人民在迫不及待地等待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談判的結果。各国人民在問，什么时候才

能結束这种由世界各国的統治阶级的自私和貪权所引起的空前的人类自相殘杀？如果战争在某个时候曾經是为了自卫而进行的，那么它对交战两个阵营來說早就不再是这样的了。如果大不列顥攫取非洲殖民地、巴格达和耶路撒冷，那末这就不是自卫战争；如果德国攫取塞尔維亚、比利时、波兰、立陶宛和羅馬尼亞以及侵占莫昂群島，这也不是自卫战争。这是分割世界的斗争。現在這一点是很清楚的，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

我們再不願意參加這場純粹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場战争中，为了滿足有产阶级的貪欲，公然以人类的鮮血为代价。我們对两个阵营的帝国主义采取同样的不妥协的态度，我們不再同意用我國士兵的鮮血去保卫一个帝国主义者阵营的利益，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阵营。

我們正在等待我們所相信的那个即将到来的时刻，那时，世界各国的被压迫劳动阶级将象俄国的劳动人民那样把政权掌握到自己的手里，我們正在把我們的军队和人民撤出战争。我們的庄稼汉士兵要回到自己的耕地，以便就在今春和平地耕种革命从地主手里夺来轉交给农民的土地。我們的工人士兵要回到工場，以便在那里生产不是进行破坏的工具，而是建設的工具，和庄稼汉一起建設新的社会主义經濟。

我們退出战争。我們把这一点通告各國人民和他們的政府。我們向目前正在抗击德国、奧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等国军队的我國军队发出了全面复員的命令。我們等待并且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不久也会按照我們的榜样去做。同时我們声明，德国和奧匈帝国政府向我們提出的条件是根本违背各國人民利益的。这些条件遭到世界各国劳动群众（其中也包括奧匈帝国和德国人民）的拒絕。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庫尔兰、爱斯兰的人民认为这些条件是强奸他們的意志；而对俄国人民來說，这些条件則意味着經常

的威胁。根据政治认识或道德本能行事的全世界人民群众都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他们正在等待由世界各国的劳动阶级制定各国人民和平共居和友好合作的原则的那一天到来。我们拒绝认可德国和奥匈帝国主义用利剑刺在活着的各国人民身上的那些条件。我们不能以俄国革命的名义在给千百万活着的人带来压迫、痛苦和不幸的条件下签字。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府想根据军事占领的权利占有各国的土地和各国人民。让他们公开地去干自己的勾当吧。我们不能使暴力神圣化。我们退出战争，但是我们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根据上述声明，我向同盟国联合代表团递交如下业已签署的书面声明：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以人民委员会名义，兹通知同我国交战的同盟国和中立国政府和人民，俄国拒绝在割地条约上签字，同时单方面宣布结束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同时向全俄的俄国部队发出全面复员的命令。”

托洛茨基、越飞、波克罗夫斯基、比岑科、卡列林

摘译自《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宣读的声明》(1918年2月10日)，载于《联共(布)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七次代表大会》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244—246页。

丘尔曼<sup>①</sup>询问：苏维埃政府在停战以后是否打算声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境线准确地通过哪些地方？苏维埃政府是否同意恢复与各国间和平状态相适应的贸易关系和法律关系？

托洛茨基：我要对我们所发表的声明再作一些补充。俄国政

---

① 德国代表团团长。——编者注

府在这个书面声明里說：它单方面宣布結束战争状态；为了执行这个决定，它已向整个前綫发出全面复員军队的命令。至于由現存局势所产生的实际困难，我不能提出任何解决它們的法律条文。提不出必要的法律条文的情况，并不是由于偶然的誤会；和平談判的整个进程证明，由于基本观点的深刻分歧，不可能找出一种确定俄国政府和中欧列强相互关系的条文。据我对德国代表团团长先生的了解，至少在理論上，他似乎认为今后依靠大炮和刺刀能够找到我們在实践中所找不到的条文。我不相信这一点。不管你們在这次战争期間怎样濫用国家防御的概念，不管保卫祖国的思想怎样受到糟塌，全世界沒有一个正直的人会說，德国和奥匈帝国繼續采取軍事行动在当前条件下是保卫祖国。我深信，德国人民和奥匈帝国的人民不容許这样做；如果我們的基本立場为各国人民所了解，那么，这些实际困难就会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徑而得到解决。我們递交的文件明确无誤地表达了我們的意图。**我們单方面宣布結束战争状态并且让我們的士兵回到和平劳动中去。**

摘譯自《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代表团會議（政治委員会）》（1918年2月10日），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1分冊莫斯科1926年版第104—105頁。

在此以后，俄国代表团只好发表声明，它曾及时发表在报上。托洛茨基同志說，这个声明不仅对中欧列强代表团的代表，同时对当时驻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德國士兵都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不仅德國士兵，而且軍官們也說：“我們不是强盜”，“要我們向俄国推进，办不到。”，“可見，我們受騙了”，等等。但是，托洛茨基同志断定，不应当认为进攻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他只是說，迫使德國帝国主义者參加和平談判并且至今阻止他們进攻的一切因素，不仅保持了自己的作用，而且相反地，为布列斯特的和

平談判所加強了。因此，托洛茨基同志認為可以毫不猶豫地復員我們飽嘗痛苦的軍隊，讓他們回到日常勞動中去，以便建立勞動紀律和在他們的各个部分之間重新建立勞動聯繫。而如果，一方面，中歐列強和協約國帝國主義者之間已經達成默契，而且可能不只是默契，如果世界帝國主義在搞反對俄國革命的陰謀，那麼，另一方面，我們則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全部策略保持並且鞏固了同我們的天然同盟者——法國、英國、德國、奧地利和美國的工人——的聯繫。同盟國大使反對廢除債務等等的抗議在我們的周圍形成了世界帝國主義的包圍圈。但是，世界革命、西歐無產階級起義不用說會粉碎這種陰謀，並且會把世界從壓迫者反對被壓迫者的陰謀中永遠解放出來。

摘自《談判總結》(1918年2月14日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同上，第110頁。

我們在布列斯特曾經聲明，我們要退出這場大屠殺。我們應當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當我們宣讀了這個聲明的前半部時，德國人就以為他們的事業已經取得了勝利。可是，在聽取我們聲明的第二部分的時候，他們確信，俄國革命不會在這個和約上蓋章。我們坦率而公開地實說：我們不能作戰，但是，也不能締結帝國主義的和約。而我認為，我們的國際地位只會因此而得到好处。為什麼丘爾曼和霍亨索倫還是需要同我們坐在綠絨桌旁談判整整兩個月？他們需要我們蓋章。要知道，他們仇恨我們，並不亞於我們對他們的仇恨。但是，如果你們記得，他們老向我們說恭維話並且無條件地同意與仇視他們的蘇維埃政權進行談判，這只是因為他們要應付本國的工人，需要有俄國工人和農民的圖章，以便向他們表明：我們在他們的和約上簽字了，簽署的正是德國工人走上街頭表示抗議的那種和約。因此，我們千万不能簽訂這樣的和約。

讓丘爾曼回德國去，把他的和約告訴他的工人們并向他們解

釋，为什么上面沒有我們的簽字。

我认为德国军队向我們发动进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把进攻的可能性化成百分比，那么，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而百分之九十是不可能的。

从軍事观点和粮食观点来看，从他們方面发动进攻是困难的；至于在国内方面，現在派遣德国士兵来进攻大声疾呼地声明要擺脫戰爭状态的俄国，那就一定会激起德国工人方面的强大的革命抗議，喚起他們进行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妄想扼杀我国革命的斗争。因此，我們保卫我們国家的这种步驟是当前最好的步驟。

我們在发表退出戰爭声明的时候，同时向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們呼吁：

我們向他們說：請你們听着！我們要退出戰爭。但是，如果德国軍国主义調动他們的反革命军队来进攻我們，如果德国的兼并者妄图打击我国的革命，那么，我們就要德国社会民主党担负全部責任，它必須尽最大努力，运用自己的一切影响，以便不让帝国主义者来扼杀我們。而我們將尽我們之所能去做。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珍惜我們的运动即我国革命的生存和发展的正直公民都将以自己的生命奋起保卫革命，我們將竭尽一切努力，不惜任何牺牲来保卫自己和我們建設新生活的权利。

摘譯自《在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報告》(1918年  
2月17日)，同上，第115—116頁。

我們不能宣戰，因為我們太弱。軍隊內部處於完全瓦解状态。为了使我国免于灭亡，必須重新建立劳动群众的内部組織。这种精神上的團結只有靠乡村里、車間里、工厂里的建設性工作才能建立起来。已經經歷了戰爭造成的大苦難和災禍的人民群众必須被送回田間和工厂，以便通过工作而在精神上和体力上得到恢复，从而才能够建立必要的内部紀律。沒有别的拯救我国的办法，我

國必須為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所犯下的罪行償付代價。我們被迫退出戰爭，把我們的軍隊領出這個殺人場。同時我也面對面地向德帝國主義聲明過：“你們強迫我們接受的和平條件是武力和掠奪的和平條件。我們不能允許你們這些外交官對德國工人這樣說：‘你們罵我們是兼并主義者；看，那些要求已經由俄國革命簽字同意了！’是的，我們弱，我們目前不能打仗，但我們有足夠的革命勇氣對你們說，我們永遠不會自願地簽字同意你們正在用軍刀在活人身上寫下的那些條件。”我們拒絕了簽字，同志們，我相信我們的行動正是我們所應採取的行動。

“同志們，我不想說德國人決不會再向我們進攻。如果考慮到德帝國主義方面的力量，這樣說是太冒險了。但是我想，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已採取的立場已經使得任何新的進攻對德國軍國主義者說來都是難辦的事。如果他們仍然進攻了又會怎樣？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如果說在我們被置于絕境的疲憊不堪的國家里最革命、最健全的分子之中還可能鼓起精神，如果說俄國還可能起來保卫我們的革命和革命的領土，那末其所以可能，只能是由於目前的情況，由於我們退出戰爭和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摘譯自《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  
(1918年2月27日)，載于《俄國革命》倫敦  
1919年版第138—142頁。

2. 宣傳當時在黨內要通過列寧的觀點只有“分裂和政變”才行，在這種情況下，“不戰不和”的公式是“通向列寧的立場的橋梁”。

黨內鬥爭一天比一天激烈。不管後來散播的謠言如何，當時的爭論並非發生在列寧和我之間，而是在列寧和絕大多數的主要黨組織之間。當時爭論的最重要的問題是：那時我們是否能夠繼

續进行一場革命戰爭？一般說来是否可以容許革命政府同帝国主义者簽訂协定？在这两个問題上我是毫无保留地站在列寧一边的，我和列寧一样，給予第一个問題以否定回答，对第二个問題給予肯定回答。

在党和国家的一切領導机关中，列寧是居于少数地位。人民委員會要求各地蘇維埃就和戰問題表示意見，有二百多个蘇維埃表示了意見。其中只有两个較大的蘇維埃——彼得格勒和塞瓦斯托波尔的蘇維埃贊成和平（后者还附有保留条件）。在另一方面，有几个大工业城市，莫斯科，叶加特林堡，哈尔科夫，叶加特林諾斯拉夫，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喀琅施塔得等等則以压倒的多数主张中止談判。同样态度也流行在我們的党组织中，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間当然也是如此。**在当时要通过列寧的观点，除了分裂和政变外沒有其他道路。**然而贊成列寧主张的人必然一天天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不战不和”的公式实际上**是通向列寧的立場的桥梁**，党内大多数或至少其领导分子都跨过了这个桥梁。

.....

中央委員會正是在一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决定性會議上通过了我的建議：拖延談判，如果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就宣布戰爭已經結束，但是拒絕簽訂和約，到以后再見机行事。

摘譯自《托洛茨基自傳》（1929年），  
紐約1930年版第382—384頁。

## 二、变相拥护“革命戰爭”

声称如果“全党意見一致”，就可采用“革命戰爭的政策”。那时即使被迫放弃彼得堡和莫斯科，“也不会起不好的作用”，“就能使整个世界保持紧张状态”。但是“当党

內存在以列寧为首的一半人或大部分人反对自己的時候”，就不可能进行反对德国人和本国资产阶级的战争。

說什么如果革命的无产阶级在目前条件下不能給德国以“作为国家統治阶级应給予的反击”，这就說明，“苏維埃政权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是过重的负担，我們出来得太早了，應該回到地下去”。揚言“如果不得不下台的話，我們應該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下台，即为每一个陣地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在党内发生分裂的情况下，我們不能进行革命战争。要考慮的不仅是国际关系，而且在目前条件下，我們党无力領導战争，尤其是一部分拥护战争的人不願意要进行所需的物质資料<sup>①</sup>。弗·伊·〔列寧〕的論据是远不足以說服人的。如果我們意見一致，我們就能担负起組織防御的任务，我們就能胜任这个任务。那时即使我們被迫放弃彼得堡和莫斯科，我們也不会成为坏角色。我們就能使整个世界保持紧张状态。……从國內政策来看，沒有列寧所描繪的那种非此即彼的情况，但是从国际政策的角度来看，可以贏得很多东西。然而这便要有最大限度的意見一致；既然沒有一致的意見，我就不能承担拥护战争的責任。**

摘譯自《1918年2月23日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发言》，  
載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員会速記記錄》  
莫斯科1958年版第211—212頁。

由于两个原因，在决定这个极其重要的問題时，我在中央委員会表决时弃权。第一，因为我不认为，我們对这个問題采取这种或那种态度能够决定我国革命的命运。我不认为它有决定意义。关

<sup>①</sup> 指1918年2月22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員會會議。这次會議上討論了向协約国购买武器和粮食以抵御德帝国主义者的問題。——原編者注

于哪里成功的希望大一些的問題(那里还是这里)，我认为，較大的希望不在列寧同志所站的那一邊，這一點我下面再談。第二，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所謂反對派所支持的那種政策——革命戰爭的政策，為了能夠真正在實際中得到採用，就需要各派意見一致，全黨的意見一致——這是首要的一點。當黨內存在以列寧為首的一半人或大部分人反對自己的時候，要克服落後的人民群眾廣大階層的因循守舊心理去進行反對德國人和反對我國資產階級的戰爭是不可能的……

摘譯自《在俄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18年3月7日)，載於《聯共(布)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七次代表大會》莫斯科一列寧格勒1928年版第68頁。

情況是嚴重的：黨內一部分人不承認主張簽訂和約的人的決定，——我指出這一點不是作為譴責；主張革命戰爭的人認為，戰爭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和唯一的拯救辦法，他們應該不顧黨的正式意見，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我們面臨的情況是：在目前條件下，我們黨的很大一部分人退黨了，這一點大大地削弱了蘇維埃政權。在國家衰弱、農民消極、無產階級的情緒顯然很低落的情況下，黨還有分裂的危險。〔對我來說，下述一點是很清楚的：在號召無產階級去進行革命防禦的時候，我們在黨內應該是團結的，我們的策略應該是一致的。〕鑑於在中央委員會內形成的力量對比，我這一票關係重大；這個問題的決定就取決於我這一票，因為，某些同志是同意我的立場的。我棄權了，並以此表明，我不能對黨內未來的分裂承擔責任。〔對我來說很清楚：黨不應該發生分裂，少數應該服從多數。〕我認為，退却比為了取得虛構的喘息时机而簽訂和約更合適些，但是我不能在這種情況下承擔起領導黨的責任。我認為，在國家所處的目前局勢下，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分裂是不可設想的。拉狄克同志說得完全正確，外交人民委員沒有權利在戰爭與

和平問題上弃权。因此，我当时就在那一次我們党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提請免除我的外交人民委員的职务。

同上，第 72—73 頁。

如果革命战争是持久性的战争，这两种前景都是可能的。它們会把党弄到分裂的地步。如果欧洲革命发展得过于迟缓，如果我們为了取得喘息时机而簽訂和約，并为此而交出烏克兰的話，这种危险性不会消失，也不会减少。我們对我們革命军队的直接斗争沒有給以支持，然而，据最近消息看来，那里的斗争进行得非常激烈，而且取得了一些胜利。我們沒有进行战争，而同时我們苏維埃联邦的部队却在进行斗争。明天彼得格勒或莫斯科可能会面临支持烏克兰无产阶级的問題，但是它們能做些什么呢？后天德国人会要求我們同烏克兰拉达簽訂和約；这一点在他們的和約条件中是有的，但目前還沒确定下来。我們能不能去同被我們和烏克兰工农一块儿驅散了的烏克兰拉达簽訂和約呢？其次，当斯文胡伍德击潰了芬兰紅軍的时候，还会要求我們同斯文胡伍德去簽訂和約。这种要求不是不可能的，相反地，这种要求是从和約条件中合乎邏輯地产生出来的。我們能不能还說我們力量薄弱、我們不能拒絕和抵抗而同意这样做呢？这說明什么呢？革命无产阶级在目前条件下不能給以作为国家統治阶级应給予的反击。那么就請說出来，苏維埃政权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是过重的負担，〔我們出来得太早了，應該回到地下去〕——这就是含意所在。对于革命阶级來說，同帝国主义者勾結是不能容許的<sup>①</sup>，——主要之点就在这里。我們仍然保持苏維埃政权。这个政权應該发展并加强。难道我們在保持着政权的同时却由于那喘息时机的不确定的期限，还

① 在《托洛茨基全集》中，这里加了一个注，意思是說，記錄中記錯了，因为托洛茨基曾主张接受盟国帝国主义者的援助，以便去同德国人作斗争。——原編者注

要繼續退却和接連不斷地作出新的讓步，而根本不提出任何限度，不提出任何保障嗎？我們力量薄弱，並因而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即在廢除債務、我國工業國有化等問題上作出讓步。如果我們為了一個前景不清的喘息时机而讓這種退却发展下去的話，那末這就會使我們陷入內部矛盾的地步。我們以此表明，俄國無產階級無力保持住階級政權，〔歷史過早地把政權交給了俄國無產階級〕。歷史上種種情況的配合把这个政權交給了它，但是它由於各種條件，不仅在地理上，而且也在政治上正在交出這個政權並實行退却。我認為，我們能建成即使不是很好的、但多少能过得去的鐵路的事情是不會出現的。這個喘息时机最多不過幾個月，而更可能是只有幾個星期和幾天。在此期間，問題將會弄清楚：或者我們將聲明，我們出來得太早了，我們要下台，回到地下去，同時讓切爾諾夫、古契可夫、米留可夫這些著名的政客去同斯文胡伍德或烏克蘭算賬。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得不下台的話，我們應該作為一個革命政黨下台，即為每一個陣地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歷史條件正使我們面臨着這種前景。

同上，第 73—74 頁。

正式締結和約的巨大政治困難即宣傳心理上的困難就在於這種情況<sup>①</sup>。由此產生了意見分歧。我們大家一致認為：談判必須盡量拖延下去，以便從中取得全部宣傳“資本”，同時盡量贏得更多的時間，為歷史提供使我們與德國革命和全歐革命靠近的機會。意見分歧是從這樣一個問題開始的：一旦下了最後通牒怎麼辦？列寧同志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無論如何，不能使談判破裂。既然我們不能進行戰爭，那就不容許把戰爭當兒戲。黨的少數派則恰恰

① 指有人受了資產階級欺騙以為蘇德早有勾結而和約只是幌子。——編者注

相反，认为必須使談判破裂，而用游击战争来回击进攻。最后，还有一派认为不可能进行軍事抵抗，同时认为必須坚持談判到公开破裂，到德国发动新的进攻的时候为止，要到帝国主义明显地使用武力的时候才不得不投降，从而根除說什么談判仅仅是为了掩飾已做成的交易的种种誹謗和怀疑。本文作者认为，这种宣传論据具有决定意义。在党内两个极端派別进行斗争的时候，“中間”的观点暂时占了优势，它使每一个派別抱着希望：事件的下一步进程将证实它的判断和預測的正确性。

談判中断。德国甚至违反停战协定中关于七天前提出警告的规定而轉入了进攻。为进行这种欺騙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是由丘尔曼男爵和霍夫曼將軍友好地商定的，虽然，一般說来他們在其他一切方面还象猫狗共处那样的不和。德国人轉入进攻，占领許多城市，在乌克兰枪杀共产党人，所有这一切十分清楚地表明，沒有暗中交易的行为。我們除了在武力面前暂时投降以外，沒有別的办法。

毫无疑问，如果我們沒有卷入这場会使俄国革命在两三个月內就被摧毁的毫无希望的战争中去，那么，党和革命应当把这一点归功于列宁同志当时提出必須暫時投降問題所表現的那种果断精神，——“轉入秘密状态去对付德国帝国主义”，如他在党的會議上所說的那样。但是，回顾过去，現在可以充滿信心來說，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的暫時破裂和德国军队向我們发动进攻，归根到底，不但沒有損害，反而帮助了欧洲革命的事业。德国人占领得文斯克、列維里和普斯科夫以后，英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当然不会相信布尔什維克同霍亨索伦进行了幕后的合作。这在很長時間內使协約国强盗难于向我們发动进攻。拉柯夫斯基同志有一次这样說：“如果簽訂第二阶段的布列斯特和約使我們免遭德国帝国主义繼續不断的进攻，那么，在此以前拒絕簽訂第一阶段的布列斯特和

**約則使我們很久免遭協約國的進攻”。無論如何，在這裡比在任何地方都更適宜於這樣說：結果好就好。**

摘譯自《布列斯特階段》(1919年8月1日)，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1分冊莫斯科1926年版第147—148頁。

### **三、攻擊贊成簽訂和約 是投降情緒的表現**

1. 污蔑贊成簽訂和約是同反對十月革命一樣的“投降情緒的表現”。声称在口头的最后通牒逼迫下就立即簽訂和約有“使党分裂”、“陷入极端右傾”、失去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支持和“导致无产阶级的瓦解”的危险。

**如果我們今天接受德国的最后通牒，那我們明天還會有新的最后通牒。所有的措詞都提供了日后提出最后通牒的可能性。我們可以簽訂和約；這会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中失去支柱，無論如何也會導致无产阶级的瓦解。**

摘譯自《1918年2月23日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  
載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速記記錄》莫斯科  
1958年版第212頁。

**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在苏維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贊成媾和的人得胜了。在一月間曾反对在布列斯特和約上签字的人們中間有許多人現在贊成媾和。他們說：“那個時候，我們如果簽字，會被英國和法國的工人理解為不試圖鬥爭就可耻地投降，甚至英法沙文主义者关于苏維埃政权同德国人秘密勾結的这种无耻誹謗也會使西歐某些部分的工人相信。但是在我們拒絕簽字以後，在德国人對我們发动新攻势以后，在我們試圖抵抗以后，我們的軍事弱点**

在世界面前暴露得一清二楚以后，誰也不敢責備我們不戰而降。”第二次的比原来更苛刻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正式簽訂並被批准了。

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和芬兰，効子手們正繼續逞凶肆虐，越来越厉害地威胁着大俄罗斯的最重要的一些中心城市。因此，我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問題就不可分割地同欧洲革命問題联系起来了。

摘譯自《第二次戰爭及和約的簽訂》(1918年5—6月)，  
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1分冊莫斯科1926年  
版第127—128頁。

在这些問題的主要困难以外，还加上党內的許多严重困难。在党內，至少在領導人中間，大半对簽訂布列斯特條約抱不調和的态度。我們的報紙上所揭載的关于談判的消息煽动了，并且加强了这种情緒。这最明显地表現在左派共产党人集團中間，他們提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这种局势，当然使列宁感到极大的不安。

我說：“如果仅在一种口头的最后通牒的压迫下，中央委員會就决定簽訂德国所提出的条件，我們就会冒使党分裂的危险。我們的党需要把事态的真相揭露出来，并不亚于欧洲工人。如果我們与左派决裂的話，党就会陷入极端右傾。要知道，那些坚决反对十月革命或贊成各社会主义党派聯合的同志，都无条件贊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我們的任务并不因締結和約而完成。左派共产党人中有許多人在十月革命时期及其他等等方面起了极大的战斗作用。”

列宁回答道：“这一切是无可爭辯的，可是此刻的問題是革命的命运問題，我們將恢复党的平衡。但首先需要拯救革命，而只有簽訂和約，才能拯救革命。分裂較諸武力摧毁革命的危险来得好些。左派同志鬧一陣，以后——即使發生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分

裂，——将回到党里来。而如果德国击潰了我們，那末，我們中間就沒有一個人能回到党里来……好吧，就算接受你的計劃。我們拒絕簽訂和約。然而德国立刻向我們进攻。那时你怎么办？”

“我們就在刺刀下簽訂和約。那时，全世界的工人就都明了真相了。”

“但是你將不支持革命戰爭的口号么？”

“决不。”

摘譯自《關於列寧》(1924年)，莫斯科  
1924年第2版第60—61頁。

无论如何，要明了并評价列寧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策略，只有把它和列寧的十月革命的策略联系起来看。反对十月革命和贊成布列斯特和約，两者实质上都是同一种投降情緒的表現。全部实质在于，列寧發揮了与曾保证党在十月取得胜利的同样无穷的革命毅力来爭取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投降。正是这种十月革命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伟大的胆略与大胆的謹慎、进击与前后照应之自然的、有机的結合提供了衡量列寧的方法与列寧的力量的准绳。

同上，第65頁。

2. 认为必須以拒絕簽字和復員军队来“弄清楚实际情况”。竟說德軍的推进，城池被占是我們无力作战的最好证据，这样就可以消除同德国人串演滑稽戏的謠言。声称“从‘爱国的’观点来看，立即簽訂这些条件会比較有利”，但是“不战不和”是为了“革命的鼓动”，拒絕簽字“具有不可估計的鼓动影响”，应把“国际革命的任务放在爱国考慮之上——在和約的領土条件和其他一切条件之上”。

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了一个問題，革命战争怎样对待世界国际关系？要知道，目前整个問題在于力量的对比。我們是积极地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还是表示不积极，我們反正是参加了战争。因此我們应当考虑怎样对我们更有利。把我們的全部力量变成軍事力量，这是空想。因此关于革命战争的問題，是一个不現實的問題。军队必須遣散，但是遣散军队并不就是簽訂和約。在談判期間，我們怎样也未能摸清奥匈帝国和德国的相互关系。我們通过拒絕簽訂和約和复員军队就会弄清楚实际情况，因为德国人正是在我們复員军队的情况下才会进攻。我們这样就清楚地告訴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存在按事先分配好的角色演戏一事。我們也未能摸清德国的反抗力量有多大，因为德国人不知道报刊上发表的和約条件，德国的书报检查机关編造了談判情况。斯图奇卡同志建議我們向德国人提議成立仲裁法庭，我认为这个建議作为再次拖延談判的办法是可以采納的；如果他們拒不接受，我們就停止談判，但是我們声明我們也不打下去。

譯自《在 1918 年 1 月 24 日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发言》，  
載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員會速記記錄》  
莫斯科 1958 年版第 170—171 頁。

托洛茨基同志（反对发出建議和談的电报）证明說，現在群众刚刚領会所发生的事情；在目前簽訂和約只会在我們的队伍中造成混乱；对于德国人也是同样的，他們认为，我們只是在等待最后通牒。可能他們指望心理上的影响。必須等一等看这一切对德国人民产生怎样的印象。在德国，人們曾高兴地迎接停战，有可能德国的进攻在德国引起强烈的爆发。應該等一等看影响，如果这种影响沒有發生的話，那时还可以建議媾和。

譯自《1918 年 2 月 18 日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发言》，同上，第 198 頁。

如果國內有一个能够反抗德国帝国主义的党，那么，这就是我們的党，我再說一遍，甚至同盟国大使館也是这样确信不疑的。在两个半月期間，我們依靠革命的道义力量，使德国政府无法了解和平談判的結局。我們拒絕簽訂和約。这样，我們就越过了德国軍事检查机关和官方造謠家，而使德国劳动群众知道，向我們提出的和約是兼并的、苛刻的和掠夺的和約。我們拒絕簽字，这件事具有不可估計的鼓动影响，它的后果可能在最近的将来还会显示出来。

摘譯自《为什么我們同意德国的和平条件?》  
(1918年2月24(11)日)，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1分冊莫斯科1926年版第122—123頁。

显然战争是不能繼續进行下去了，关于这一点，列宁和我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霍亨索伦政府究竟能把对我們的战争进行到怎样的地步？二月革命以及后来的十月革命对德国军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影响还須經過多久才能表現出来？这些問題都还没有答案。我們必須在談判过程中設法弄清楚。因此我們必須尽可能地拖延談判。須得让欧洲工人有时间来好好了解苏維埃革命的事实，尤其是革命的和平政策，由于协約国報紙和俄国“妥协派”一样事先都把此次媾和談判說成是一种各方角色已巧妙派定的滑稽剧，因而拖延談判就更加重要了。……协約国的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如果能成功地在工人群众中散播有关我們的錯誤观念，那就会更便于协約国对我们实行军事干涉。因此我坚持：在簽訂单独和約——如果簽訂单独和約是絕對不可避免的話——之前，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价給欧洲工人一个明白无誤的证据，证明我們和德国統治阶级之間存在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时候，正是这些考慮使我得出政治示威的想法，提出了“我們停止战争，复員

**軍队，但不簽訂和約”的口号。**我的推理是：如果德国帝国主义沒有能力驅使其军队来进攻我們，这就表示我們取得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惊人的胜利。如果霍亨索伦王朝还能够給我們以打击，我們到那时再屈服还不算迟。

摘譯自《托洛茨基自傳》(1929年)，  
紐約1930年版第380—381頁。

在整个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期間，列宁所采取的政策同斯大林的政策之間当然有很大的差別。斯大林更加接近季諾維也夫。必須說明，只有季諾維也夫有勇气要求立即簽訂和約，他預言拖延談判会更加真正地增加和約条件的苛刻性，以此来吓唬我們。我們沒有一人怀疑，从“爱国的”观点来看，立即簽訂这些条件会比較有利，但是列宁认为，拖延和談是进行革命鼓動，国际革命的任务在爱国考慮之上——在和約的領土条件和其它一切条件之上。对列宁來說，这是一个在国际革命斗争中爭取喘息时机的問題。斯大林认为国际革命是一个我們不能依靠的“可能性”。不錯，后来他的确修正了这些話，以便使自己可以反对其他人，但是实质上，在当时正如在很久以后一样，国际革命对他來說一直是一个沒有生命的公式，他不知道如何在政治实践中利用这个公式。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下冊第334—335頁。

革命斗争要求我們向工人們表明，我們不能采取别的行动，敌人正在輕易地击败我們，我們不得不簽訂和約。正是为了这个理由，德軍的进攻是我們的最好证据，证明這項條約是被迫簽訂的。德国的一項最后通牒是不够的；一項最后通牒可能同样是預演的一出戏的一部分。德軍的真正的調動，城市的被攻占，軍用財產的被劫夺，則完全不同了。我們失掉大量財富，但是我們却贏得全世

界工人阶级的政治信心。分歧意见的意义就在于此。

同上，第 335 頁。

#### 四、依赖欧洲革命

胡說苏俄的整个策略是“建立在冒险的基础上的”。宣传“一切都取决于欧洲革命的觉醒和发展速度”，“只有欧洲革命才能拯救”苏维埃政权。断言如果欧洲无产阶级不支持我们，“我们将被击溃”。

……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这些事实，那么，当然，我们就是在英国战胜的情况下，也会陷入最不幸的状况。因为在现代战争中付出代价的从来就是最弱的国家，而由于事物的整个历史进程，俄国已经成为所谓大国中最弱的一国。从这种观点出发，资产阶级报刊认为如果我们的盟国同我们一起参加谈判，我们就会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这种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要首先继续进行战争，而继续进行战争，就要大量消耗我们的经济力量，使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陷于破产。这样，我们就会更加削弱我们在将来和平谈判中的作用，最后，各国资本家就会彼此算账，而迫使我们赔偿一切伤亡和损失。因此，**我们要避免最后彻底失败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我们的命运——俄国革命的命运——同西欧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摘译自《谈判总结》（1918年2月14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载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1分册莫斯科1926年版第108页。

我们来总结一下在我国革命和西欧革命的发展速度上出现不

平衡的时期。毫无疑问，我們或多或少都曾是怀疑論者，但是我們大家曾一致认为，欧洲革命的速度應該和我国革命的規模相近。毫无疑问，我們大家曾一致认为，我国十月革命这一事实本身，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們的社会措施、废除和公布旧条约、公开建議举行和談，所有这一切将会直接推动西欧风潮的发展。我們曾认为，这种震动将削弱欧洲資本主义的堡垒，为我們向俄国資产阶级和欧洲資产阶级进攻建立新的、日益壮大的支柱。这儿出現了某种不平衡，它的极其深刻的根源在于我国落后，在于我国无力經受这种长期的世界大屠杀，然而却被卷进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漩渦。

从这种尖銳的不平衡中，我国革命在其他国家之先，远在欧洲革命之前成长起来了。它在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就沒有得到必要的支持。因此产生了我們所面临的一切极其深刻的策略上的困难。而現在（这种想法目前好象是个磨損了的硬币，然而它現在还保持自己的价值），不管我們怎样自作聪明，不管我們发明出什么样的策略，只有欧洲革命才能真正地拯救我們。

摘譯自《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18年3月7日)，載于《联共(布)代表大会  
和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七次代表大会》莫斯科  
1928年版第67—68頁。

……再說一遍，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得到最有利的和平，我們早在十一月間就應該同意簽訂和約了。但是沒有一個人（无论是在中央委員會，还是在我們全党）曾贊成这样做。〔我們曾把希望寄託在国际运动上。〕当时我們大家都主张进行鼓动，进行爭取和平的斗争，促使德国、奥匈帝国和整个欧洲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当时我們主要是指望西欧革命运动的发展。最近我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到了德国和奥地利罢工的消息。試問：在这种情况下，

我們應不應該考驗一下德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它的政治覺悟、它的鬥爭能力呢？我認為，我們當時首先應該承認簽訂和約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應該作最後一次試驗，在這裡，列寧同志是反對這樣做的，雖然他反對這一點並不那麼堅決。然而，那些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聲明而譴責我們的同志們當時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這一點必須予以考慮。如果硬要我去同德國人繼續談判，我在一月十日就會重做我已做过的事情。我就不會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sup>①</sup>。我會認為，在那種情況下簽訂和約是絕對不能容許的，雖然我清楚地知道，每拖延一天都會使和約條件更加不利。為什麼？因為所有我們過去同德國人的談判和我們的宣傳，只有當人們相信它們的真實性時，才有推動革命的意義。在第三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我曾在黨團中說，正象前奧匈帝國的長官格拉茨所說過的，德國人只是需要一個提出最後通牒的借口。他們以為，我們示意要他們提出最後通牒。我們的敵人和愚昧知無的、不夠覺悟的朋友把我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時期的立場說成是玩弄早先做出的決定，說我們把我們進行單獨媾和和早先答應簽訂任何和約的做法當作兒戲，說我們在演革命的滑稽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簽訂這個和約，而不試驗一下德國無產階級的战斗力，那末我們一方面有喪失列維里和其他地區的危險，另一方面又有失去法國和英國無產階級或他們的很大一部分人的同情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把責任放在德國無產階級和它的黨身上，結果，黨是完全軟弱无力的，它不僅沒有試圖反抗（喊聲：“正式的黨，——而另一個黨呢？”），而且還不斷地為德國帝國主義對俄國的侵略行為進行辯護。〔德國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已經成了叛變的黨。〕

① 這裡顯然是荒謬的。在《托洛茨基全集》中改正為：“如果硬要我去同德國人重新談判，我在2月10日就會重做我已做过的事情。”——原編者注

我是曾經认为德国人不会进攻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当时我說，如果他們进攻，我們随时都有時間簽訂这个和約，哪怕是在更坏的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相信了，别的出路我們是沒有的……

我們現在还不知道迫使或促使德国举行进攻的一切因素。拉狄克同志說，德国的報紙現在指出，在我們动身四天以后，德国的报刊說过，进攻不会举行。这里牵涉到哪些因素，是在暗中摆弄我們的同盟者呢，还是可能只是德国本国的最极端的軍国主义派取得了胜利，——这对我们來說几乎是无关紧要的。显然，我們采取了冒险的步驟。这不是个人的、不是小集团的冒险。这里曾下了很大的賭注：欧洲的无产阶级支持不支持我們？在后一种情况下，我們將被击潰。这种冒险是由我們所意識到的形势的本质引起的。我們对目前这种冒险的危险程度的估計是不同的。列寧同志认为，在德国人攻克了列維里和其他城市以后，現在必須簽訂和約；另一派人认为，对我们來說（既然这取决于我們的意願），現在是以革命化的方式影响德国无产阶级的唯一时机。这样就不割断我們曾进行的鼓动的继承性，不給它造成历史的間断。当然，以后一切都会弄明白的。

現在必須使欧洲的无产阶级，首先是德国无产阶级，面对那个不是由我們造成而是从国际形势的本质中产生的政治悲剧，要德国党对它不支持我們这一点負全部責任。〔如果把全部責任推到德国无产阶级身上，那是不正确的。〕我們在退却、在自卫，因为這是我們能胜任的。我們将實現列寧所預言的前途：我們要退到烏拉尔，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我应当說，列寧同志曾說过德国人想在彼得格勒簽訂和約，几天以前我和他曾是这样想的。但是我記得，好象列寧在一次具有莫大社会意义的私人談話中，对德国人的这个計劃实现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显然，他认为，攻克彼得格勒的

事会使德国工人大大革命化。这是可能的。攻克彼得格勒是危险的事实，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是，这对德国人来说，显然也是一种冒险的策略。但是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冒险的，而我们的整个策略正是建立在这种冒险的基础上的：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把握，只能在许多不清楚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和那种政策来寻求解决，而一切都取决于欧洲革命的觉醒和发展的速度。如果甚至在我们批准这个和约的情况下它也将得到发展……那些说明和平的必要性的论据就不仅瓦解建立军队的工作，而且瓦解直接的动员工人群众的工作。同时在普斯科夫和其他地方对他们说，工人被赶去屠杀，但是这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不知道，是否会有结果。

同上，第 69—72 頁。

斯大林在二月二十三日的会议上第二次发言，这次是为签订和约的必要性辩护。他还乘此机会纠正了他自己对国际革命问题的看法，[因为]<sup>①</sup>列宁[批评了他。斯大林说，]“我们也是把赌注押在革命上。你们估计几周会发生革命，而我们估计几个月才会发生。”这番话完全符合当时的情绪以及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十一日）]的会议上所说的话：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在一件事情上意见一致，即如果没有国际革命的胜利，在最短不过的时间里（据斯大林说是在今后几个月内），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灭亡。这样，“托洛茨基主义”当时就在党中央委员会里得到了一致的赞同。

摘译自《斯大林评传》（1940 年），三联书店  
1963 年版下册第 333 页。

① ( ) 内的文字是《斯大林评传》原编者整理托洛茨基此书遗稿时加上去的，  
以下同。——编者注

## (八) 工業化問題

### 一、工农业的关系

认为“如果国营工业赶不上农村剩余产品的积累，那么，在这种积累的基础上就会产生私人資本”，“促成商业資本同手工业者和富农的結合”。断言“‘专政’权必須掌握在工业手里”，只有这样才能使国营經濟綜合体和农民經濟的結合“轉入經濟現實的范围”。說在缺乏工业品的情况下，农业丰收就会“破坏經濟”，“使城乡关系尖銳化”，推动农民“反对社会主义工业”，“会成为使經濟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速度不能加快的因素”。

新經濟政策的第一个总结是：工业在恢复起来，不过我們暫時有亏损，这种亏损是我們在历史的“預備班”或“一年級”对学习权所付的学费——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們是在預備班学习。

在“二年級”，我們应当减少“学费”，然后不再付“学费”，而要經營謀利。我們将向国外輸出粮食，并用粮食从那里换来商品。我們将加重資本主义自发势力对我国的年轻經濟——它在工业方面共拥有二十五亿固定資金和流动資金——的压力。我不知道未来的收成怎样，我們希望有好收成。但是，好收成意味着危险的增长。固然，好收成是需要的，但好收成不只是为国家工业扩大市場容量，而且也为商人、資本家和私人資本扩大市場容量。在我們国

家存在着競爭者，他們正在壯大、抬頭，我們如果經商亏本，他們就會經商取利，而且還有從西方來的由我們通過糧食輸出而使我國農民與之發生聯繫的西歐資本的壓力。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增長和發展的時代開始了。而且這只野獸正在大步躍進。因此，誰能知道，我們在最近幾年不需要用一切力量去反對私人資本主義勢力的離心傾向而保卫社會主義領土的每一寸土地即保卫國營經濟所轄的每一個小單位呢？

摘譯自《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第八次會議上的發言》  
(1923年4月20日夜)，載于《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公報》，莫斯科克里姆林1923年版第7號第256頁。

既然我提出的只是第一個標準，我就來分析一下：小手工業在恢復起來嗎？這樣好嗎？這有什么不好，這是需要的、正常的、必然的和進步的東西。沒有它，我們就無法前進。這是市場的基礎。這是正常的、必然的和進步的東西，但這畢竟是初級的東西。

下面是第二個問題：小手工業意味着什么呢？這裡有一些人會說，不知是我自己被小手工業者所吓倒呢，還是在用他們吓唬別人。不應該這樣提問題。小手工業本身現在是進步的事物。它的发展是一種必然現象。但是，在國營工業不能同時增長和發展的情況下，在它不能滿足市場需要並且處於亏本的情況下，這種小手工業將不是處在我國合作社的影響之下，而是處在我們所組織的國家信貸的影響之下，而是將處在私人商業資本的統治之下。因此，現在在我國已有相當廣泛影響的商業資本和開始逐漸支配其他手工業者的富農小手工業者的結合，可能第二次在我國造成真正俄國土產的資本主義。這就是客觀的分析。這個危險大嗎？怎麼講呢？這是一種不能用統計數字事先估計出來的危險，它取決於事物的進程，取決於各種力量的鬥爭，而我們是這個鬥爭中的主力。但是看不到這種前景，對它估計不足，就等於盲目行動，必然

要大碰釘子。我在報告中說過，小手工業和手工業所提供的產品，共有四億一千五百万盧布。

從這裡應得出什麼結論？難道還是那個壓制小手工業者或者重新限制我國農業經濟的結論嗎？只有瘋子才能得出這種結論。非常清楚，我們不但不準備壓制這種小手工業，恰恰相反，我們越往后去，就越要從我們這方面盡一切努力，通過合作社和國家信貸去同它實行結合，使它逐步納入國營經濟系統。而這個任務我們只是在着手解決。另一方面，我們將使我們的國庫、征稅機構日益適應農民經濟和小手工業經濟的各種特點，即更多地壓制富農和富農小手工業者。我們將千方百計幫助農業和小手工業的發展，而同時要盡力使這種發展納入一定的軌道，與我們的國營經濟聯繫起來。但是，如果閉眼不看這一事實，即它可能成為反對我們的另一種發展的源泉，成為可能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營養肉湯，那就是犯罪的和荒謬的行為，我現在正是要談這個問題。我們是否能夠——怎樣說好呢——用機械地把農村和手工業的生產力轉入工業的辦法強迫農村和小手工業的發展有利於國營經濟呢？不，我們不能。這在經濟上會造成災禍。而在經濟災禍發展以前，我們會碰到政治災禍。

我們二月間在喀琅施塔得聽見了這種災禍的暗示。因此，我們經營管理的藝術就是要在國外資本（我們還要單獨談它）涌入我國以前，把工業的發展和農業，特別是農民經濟最緊密地聯繫起來。這種依賴關係是通過複雜的道路來建立的。首先，我們通過合作社和私人貿易額的情況來摸清市場，另一方面，我們通過國庫和稅務機關來摸清農民的購買力。稅務機關現在對農民的壓力太重；我們大家都想把這種壓力減到必要的最低限度。關於這點，將有專門報告。我們的工業企圖用一個翅膀直接依靠農民市場，這就是輕工業，另一個翅膀則依靠預算，而預算同樣來自農民。因

此，如果我們不能保持平衡，破坏平衡，如果我們不能滿足农民，脫离他們，或者我們在這裡或那裡把賦稅增加得太重，因而破坏平衡，那么，工业就可能从某一块基石上滑跌下来。这是关于正确和实事求是地估計农民的力量、弱点及其經濟彈性的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向自己提出跳过农民經濟或乘汽車超过它的任务，那么，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敢落在它的后面。这是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們的提綱在这方面明确地写道：“对国营工业同样重要的是，不要落后于农业，否则，私人工业就会在农业基础上产生出来，它最后将吞噬和挤垮国营工业”。这种危险并不亚于第一个危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們太冒进了，脱离了农民群众。但是，現在有工人阶级专政被推翻的危险；有落后于农业經濟及其剩余产品积累的危险，有被私人資本碰得头破血流的危险，而在农民經濟剩余产品积累的基础上，私人資本是必然要产生的。关于这些危险，同志們，我在昨天报告的主要部分中已經談过了。

我們說，要是赶不上去，那么，隨着今年和明年的丰收，会有很大的危险。如果接連三年丰收，这对我们來說，自然是一种天賜厚礼，但这种丰收就要在国内外寻找銷路。我們能够向国外运出多少，这取决于欧洲的购买力，但是，主要取决于运输条件和我們的技术条件。國內将有农村本身不需要的大量剩余农产品。这意味着什么？是优点还是缺点？这是最大的优点。但是，这个优点既能为国营工业奠定基础，也能为私人資本打下基础。如果国营工业赶不上农村剩余产品的积累，那么，在这种积累的基础上就会产生私人資本，这就是說，这种剩余产品会促成商业資本同手工业者和富农的結合，如此等等。这就是問題的本质，我們进入了整个經濟机体恢复的时期，但面临着一个严重危机——我国工业原料的危机。而且我們正面临着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危机——固定資金的危机，即我們的設備的損耗日益增加，需要更新設備，为此，在工业

**的国家手中需要拥有資金。同志們，这就是总的情况，但是，这不是为了吓唬人，而是为了对它作清楚的估計。国家的經濟正在恢复。有两三个丰收，恢复就将大踏步前进。超过农村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落后。决不能落后。**

摘譯自《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十次會議上的发言》  
(1923年4月21日夜)，同上，第8号第297—299頁。

无论大小工业部門或是任何企业，如果没有指引方向的計劃，就决不能合理地分配它們的資源和力量。同时所有这些局部計劃又都是有关联的，它們是互相依賴互相制約的。必須把这种互相依存关系作为制訂計劃和計劃执行的基本准绳，也就是說要在既經获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对計劃定期加以核实。

有些为期多年的长期計劃事后证明都不能实现，嘲笑这些計劃是容易的。这样的計劃多得很，毋庸說經濟幻想在經濟中是没有地位的。但为了要制訂出合理的計劃，不幸的是必須从最簡單和概括的計劃开始，正如在得到鋼刀之前必須先使用石斧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今天还有許多人对計劃經濟問題抱有幼稚的想法，他們說：“我們不需要这样多(?!)的計劃；我們有了一个电气化計劃，讓我們实现这个計劃就够了！”这种理解意味着对于这个問題完全缺乏最起码的認識。电气化远景計劃是完全从属于工业、运输、金融和最后还有农业各主要部門的远景計劃的。首先必須使所有这些局部性計劃在我們所拥有的关于經濟資源和潜力的資料的基础上彼此保持协调。

正是这样一个协调的總計劃，例如一个年度計劃（包括三年或五年等等的特殊計劃的年度部分，并且只代表实际分配的計劃任务）才能够而且應該成为保证計劃的执行和在执行的过程中作出必要調整的主管机关在实践中的根据。这样一种領導具有一切必要的灵活性和行动自由，不致蜕变（也就是說應該不会蜕变）成为

一系列临时应急行动，因为这种领导方法有一个合理的有关整个經濟過程的总概念作为依据，而在作出必要的調整的时候，它会努力使經濟計劃完善化，并根据物质情况和資源使其具体化。

这就是国家經濟計劃工作的最一般的方式。但是市場的存在使这种計劃的执行变得异乎寻常地复杂化。在边远地区，国家經濟会与小农經濟結成联盟或者至少試圖与它結成联盟。結合的直接工具是輕工业产品和部分的中型工业产品的貿易，而直接为国家(为军队、运输和国营工业)服务的重工业只是間接地、部分地或者附帶地参与貿易。农民經濟是不受計劃的控制的，但是它受自发地发展的市場的影响。国家能够而且應該对农民經濟施加影响，推动它前进，但国家还絕對沒有能力根据单一的計劃把农民經濟納入軌道。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好多年(恐怕首先要依靠电气化)。在下一个时期，(这是我們实际上最感到兴趣的)我們將有一个計劃国营經濟，使国营經濟与农民市場更加紧密地結合起来，其結果則是国营經濟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适合农民市場的需要。虽然这个市場自发地发展着，但国营工业并不是无意識地适应这个市場的。相反地，我們在經濟組織中的成就，主要取决于我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对市場情況的确切了解和正确的經濟預測成功地根据明确的計劃協調国营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各个国营工厂之間或者各个托拉斯之間的一定程度的竞争，絲毫也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国家是所有国有化工业的所有者，国家作为一个所有者、管理者和經理，在对待农民市場的关系上是把它的全部財产看作一个整体的。

显然，对农民市場不可能作精确的預計，正如我們不可能精确預計世界市場的情况一样，因为我們同世界市場加强联系主要是通过输出谷物和原料，单单因为收成等等情况的变化无常，估計的錯誤就在所难免。这种差錯将通过市場以局部的或者甚至普遍的

产品不足、混乱和危机的形式表現出来。虽然如此，但是只要更加认真地把計劃經濟推行到国家經濟所有部門中去，使这些部門不断地統一步伐，那末这些危机就不会尖銳和持久，这是很明显的。如果說布伦坦諾派（德国经济学家路約·布伦坦諾的信徒）和伯恩施坦派的学說——根据这个学說，資本主义托拉斯的統治可以“調节”市場从而使工商业危机成为不可能——是根本錯誤的話，那末把它应用到工人国家方面則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个国家是托拉斯的托拉斯和銀行的銀行。換言之，在我国經濟中，国营經濟与私人活动相比危机范围的扩大和縮小是其是否取得成就的最清楚和最正确无誤的晴雨計。**在国营工业爭取控制市場的斗争中，計劃經濟是我們的主要武器。**沒有它，国有化本身就会成为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而私人資本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

所謂国营經濟，我們所指的除工业之外，当然还有交通运输、对外貿易、國內貿易和金融事业。这一整个“綜合体”<sup>①</sup>——就其整体及其各个部分而言——是在适应农民市場和适应作为納稅人的个体农民。但是这种适应有其基本目的，那就是提高、巩固和发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石和社会主义基础的国营工业。如果认为有可能孤立地发展这个“綜合体”的某一部分——不論是运输和金融或者任何其他部分——并使其臻于完善，那就大錯特錯了。它們的进步和它們的退步都是紧密地互相依賴的。因此，国家計劃委員会是具有原則的巨大意义的，它的作用在我們当中还很难为人所理解。

国家計劃委員会必須調整国家經濟中的一切基本因素，也就是說有系統地統一并指导国家經濟中所有的基本因素，使它們与

---

① Combine, 通常譯为联合企业、綜合工厂。——編者注

国家經濟，也就是主要与农民經濟保持正常的关系。國家計劃委員會所关心的主要目标必須是发展国营(社会主义)工业，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說在国营經濟綜合体当中，“专政”权必須掌握在工业手里，而不是在財政金融手里。当然，正如我業已指出的那样，“专政”这个字眼的意义在这里是极其有限和有条件的：这是用来与財政金融所要求的“专政”的相对提法。換句話說，不仅对外貿易，而且还有恢复稳定的通貨，都必須严格服从国营工业的利益。当然不用說，这决不会是針對結合关系的，也就是說决不是违背国家整体和农民經濟之間的正常关系的。相反地，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我們才能逐渐順利地把这种“結合”从純修辭的范围轉入經濟現實的范围。如果說，这样提出問題就是“忽視”了农民，或者說让国营經濟独攬一切就不符合整个国民經濟的状况，那真是荒謬透頂，无论怎么說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摘譯自《計劃經濟》(1923年底)，載于  
《新方針》伦敦 1956年版第 70—73頁。

在这样的条件下<sup>①</sup>，丰收，即农业剩余商品数量的可能增加，会成为使經濟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速度不能加快的因素，相反地，会成为破坏經濟，使城乡关系尖銳化的因素，而在城市里則成为使消費者和国家的关系尖銳化的因素。从实际上說，丰收在缺乏工业品的情况下就会意味着把更大数量的粮食蒸餾为私酒，延长城市居民购买粮食的行列。从政治上說，丰收就将意味着农民反对对外貿易的垄断即反对社会主义工业。

摘自《对李可夫的決議草案的修正案》，  
1926 年中央四月全会會議速記記錄 第  
164 頁，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257頁。

---

① 斯大林在引述这段話时加注說：“托洛茨基說的是現时不按比例的条件。”——  
編者注

工业发展的迟缓已經在价格上造成令人不能容忍的“剪刀差”。官僚主义者为降低价格而进行的斗争仅仅扰乱了市場，剥夺了工人而并未給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农民从十月革命以后完成的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大量利益正在遭受工业品价格的吞噬。这种情况損害了联盟，把农村中广大阶层驅赶到大喊國內貿易和对外貿易自由化口号的富农那边去。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商人找到了便于发展的土壤和掩护，国外的資产阶级也获得了一个基地。

摘譯自《列寧以後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1936年版第294—295頁。

## 二、工业的发展速度

### 1.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

指責“工业发展得太慢”，“是蜗牛的速度”。这阻碍了农业的发展，破坏了工农联盟。声称“如果有集中的领导，工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决不是办不到的”。攻击斯大林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說这是“官僚不想干扰居民中开始致富的阶层”——“小資产阶级上层”，是直接为“富农的利益”服务的。

在一定的历史情况下——資本主义的包围和世界革命的迟迟不来，在目前最初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就是工业化的速度必須迅速到足以保证在最近的将来至少解决下列問題：

(一) 国内无产阶级的物质地位必須絕對地和相对地加强(增加就业工人的数量，减少失业人数，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水平，特別需要按照卫生标准扩大工人阶级的住房面积)。

(二)工业、运输和电站工作的发展速度至少必须同全国需要和资源的增长相适应。

(三)必须使农业有可能逐步过渡到较高的技术基础上，并且保证为工业提供日益增多的原料。

(四)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在技术问题上，在改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物质条件问题上，苏联绝不能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而必须在最近的将来超过它们。

(五)工业化必须达到足以保证国防的程度，特别是保证军事工业的适当增长。

(六)社会主义成分、国家成分和合作社成分必须有步骤地增长，排挤一部分、同时控制和改造另外一部分前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资本主义的和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虽然我们在工业、电气化和运输方面有很大成就，但是工业化还远没有得到必需和可能的发展。目前工业化的速度以及为今后几年规定的速度是显然不够的。

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有一种政策使我们可以一下子解决所有的困难，或者把有步骤地发展我国工业和文化的一个长时期一下子跳过去。但是我们在工业和文化上十分落后的状态要求特别紧张的努力，把我们的一切财富真正地、及时地动员起来，正确地利用每一种资源，最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工业，还有运输、电气化和建筑工作长期落在人民的要求和需要后面，落在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制度的要求和需要后面；由于这种落后，全国经济周转好象被夹在一把钳子里。这种落后使得农产品商品部分的成交和出口降低。它使进口受到极为狭窄的限制，使生产价格和成本提高，使切尔文<sup>①</sup>不稳定，使生产力的发展迟缓。它延迟了无产阶

---

① 二十年代的十卢布纸币。——编者注

級和农民群众一切物质条件的改善，造成了失业的惊人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它破坏了工业同农业的联盟，削弱了我国自卫的能力。

工业发展速度不够快，轉过来又导致农业发展的迟緩。同时，沒有农业生产力的决定性的提高和商品生产的大量增加，工业化也是不可能的。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0—51頁。

我們經濟困难的总的、基本的原因可以簡單說明如下。

近年来工业发展得太慢，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結果城市缺乏商品去交換农产品。錯誤的政治路綫，尤其是錯誤的稅收政策使富农易于在自己手中集中粮食和其他儲备中的最大最好的一份。这种比例失調的現象是寄生分子滋长、投机倒把、資本主义阶层获取巨額利潤的經常的源泉。

同时，农业中資本主义成份也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增长。因此，国营經濟在原料、出口、粮食儲备方面对富农資本主义成份的依靠在增长。

富农依据自己日益加强的經濟陣地和不断增多的儲备，和自己在城市中的資本主义补充力量結成联盟，破坏苏維埃政权的經濟計劃，对于出口以及基本投資和工业化的速度，即对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实际上提出了富农的界限。

出口不发展，生产資料进口不足，缺乏新資金来修建新工厂、扩建和改建旧工厂，城乡失业人数不断增加，都和这些基本現象有着直接的联系。

結果，在十周年的末尾，我們不仅取得若干經濟成就，如：国营工业产量不断增加，基本投資和新建設的增长，在合作社和国营商业絕對和相对增长的条件下城乡商品交流的增多，中农物质生活

的改善；但是与此同时具有社会阶级性质的困难也无疑地增加了。

摘譯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計劃的反提綱》(1927年11月)，載于《真理报》1927年11月17日第263号第4版。

为了了解斯大林目前政治困难的意义，有必要简单追溯一下使我們与斯大林派之間发生爭論的那些分歧的实质。反对派曾指出：官僚低估了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可能性；他們以得过且过的經驗主义方法执行經濟工作；必須扩大規模和加快速度。反对派要求放弃一年計劃而采用五年計劃，断定如果有集中的領導，工业生产每年增长20%决不是办不到的。斯大林官僚集团当时指責反对派的主张是超工业化主义和烏托邦主义。他們向个体农民叩头，准备放弃土地国有化，为烏龟爬的工业发展速度辯解，嘲笑計劃的原則，这些就是斯大林派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八年的綱領。現在所有的政治局委員无一例外地都以一个固定不变的問題来回答我們关于加快工业化速度的要求：我們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弄資金呢？政府机关在被迫害的“托洛茨基派”的压力下于一九二七年开始实行的五年計劃的第一个草案，是建立在下降曲線的原則上的。生产的增长率曾被規定从9%降到4%。这一草案會受到反对派的严厉批評。經党的第十五次大会批准的五年計劃第二次修正案（这次大会曾指責反对派为工业的“浪漫主义”）所要求的平均增长率是9%。

仅仅下面这个事实就足以說明斯大林本人在現在的五年計劃批准前一年对这个計劃是多么不了解：当他在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回答托洛茨基的时候——后者那时是德涅泊水电站建筑工程委员会的主席——曾宣布：“对我们來說从事德涅泊水电站建筑工程（德涅泊河上的巨大的电力站）的建設，等于替农民买一架留声机而不給他們买一头牛。”在中央委員

会的速記記錄中曾經注明這些話的的確確是斯大林的意見。他後來說反對派的提議“不成熟”，企圖以此來為他反對工業化的鬥爭進行辯解，這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那不是當時一項特殊任務的問題，而是工業和五年計劃的总的前景的問題。約在一年前的公開審判叛國工程師的事情表明：實際領導權是操在社會主義經濟的不可調和的敵人手中。斯大林在為他的計劃的“烏龜爬的速度”辯護的時候，對反對派使用了鎮壓的手段。

摘譯自《是斯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削弱？》（1932年），載于《政治季刊》1932年7—9月第3卷第3期第312—314頁。

反對超工業化的鬥爭，在一九二二年進行得非常謹慎，在一九二三年公開而激烈。反對不斷革命的鬥爭，在一九二四年公開開始，在這之後的幾年里，以各種形式和各種方式繼續進行。反對托洛茨基對不平等的指責的鬥爭在一九二五年底前開始，而且在實質上成為官僚主義社會綱領的軸心。反對超工業化的鬥爭是公然直接地為富農的利益進行的。所以需要以蝸牛速度來發展工業，是為了讓富農得到對抗社會主義的沒有痛苦的解藥，這種哲學在當時是右翼的哲學，也是斯大林中派的哲學。官僚同城鄉小資產階級組成的集團在這個時期鼓吹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反對平等的鬥爭把官僚不但同農村和城市的小資產階級，而且同工人貴族空前牢固地結合在一起。不平等成為這些同盟者的共同的社會基礎、根源和存在的原因。因此，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八年，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紐帶把官僚和小資產階級連結在一起了。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下冊第515頁。

在斯大林派機器和反對派進行論戰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這些概念給發動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人提供了思想上的工具，從而獲得了決定性的意義。只要指出其中一些突出的

概念，對我們的目的就足够了。各種政治力量集結在這些概念的周圍。這些概念有三個。它們有時部分地互相補充，部分地互相替代。

第一個概念同工業化有關。三巨头<sup>①</sup> 起初反對我提出的工業化計劃，為了進行論戰，他們把它叫做超工業化計劃。在三巨头分裂，斯大林同布哈林和右翼組成集團後，這種態度更加強了。反對所謂的超工業化的官方論點的总的傾向是，迅速工業化只有犧牲農民才能辦得到。因此，我們必須以蝸牛的速度前進。工業化速度的問題實際上是沒有意義的，等等。事實上，官僚不想干擾居民中開始致富的階層，也就是新經濟政策小資產階級的上層。這是它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中所犯的第一個嚴重錯誤。但是它從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它僅僅在這個問題上整整翻了一個筋斗，然後輕鬆愉快地着手打破以前一切超工業化的紀錄——大部分是在紙面上和演說中，嗚呼！

同上，第 513—514 頁。

## 2. 一九二八年以後

聲稱斯大林派“在成就的影響下，開始魯莽地加快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的速度”。胡說什麼烏龜爬行速度被“冒險主義”所代替，兩者的“理論基礎”都是“民族社會主義觀念”。斷言如果採取過份快的速度，“那末城市與鄉村之間，工業各部門之間可能產生不平衡，因而造成可怕的危機”；而且工業投資太快“將會過分地減少分配給日常消費的部分，不能保證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必要提高”。

---

① 指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編者注

鼓吹“从冒险主义的陣地上实行有計劃的退却”。

我們必須在尽可能迅速的工业化和集体化速度的帮助下尽可能迅速地取得經濟的“独立性”！——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經濟政策在过去两年中所发生的轉变。爬行的和小手小脚的做法被冒险主义代替了。而两种做法的理論基础都是一样的：民族社会主义观念。

摘譯自《〈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1930年3月29日），  
載于《不断革命》伦敦1962年版第31頁。

苏联国内的发展已經達到了一个临界点。无论我們怎样来評价目前的集体化进程——它在一年当中已超过了預定在整整五年之内完成的計劃一倍半：原定到第五年年底有百分之二十的农戶实现集体化，而結果現在已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戶实现了集体化——，显然集体化的速度早已突破了整个五年計劃。到目前为止，官方領導对这点一直保持沉默。但是，要长期保持沉默是不行的。认为这个計劃的所有其他部分——工业、运输、商业、財政——都能以預定的規模发展，而农业却实行完全沒有預料到的跃进，这就标志着經濟計劃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只是一些部分的簡單汇集。直到最近才承认、至少在原則上承认，工业和农业之間的关系（結合）构成这个計劃的主要軸心。那末，这个軸心又怎么样了呢？如果在这个計劃中考慮到了結合的話，那末，这种結合現在一定已被沒有人預見到的集体化的巨大跃进破坏了。这个計劃的路綫要按照什么方向来加以糾正呢？

目前“全盤集体化”已經在吓慌了的領導人中間引起了某种后退的运动。业已开始的退却要到什么地方才能停止呢？現在还不可能預言。可能这一次的退却又比客观条件所需要的走得更远。但是，退却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很可能由于通貨膨脹要开始修改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这个口号。

退却，在軍事方面和政治上一样，总归是一种令人痛苦的行动。但是，进行得及时的和有秩序的退却，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为将来展开攻势准备机会。致命的危险向来是当敌人已追得迫近时在炮火下进行的、为时已晚的、惊惶失措狼狽不堪的那种退却。因此，我們左翼反对派不怕对正在盲目向前奔驰的官僚高呼：后退！必須停止工业化的奖励竞赛，根据經驗和理論預見修改速度，使集体化同技术及其他資源协调起来，使对待富农的政策服从集体化的真正可能性。一句话，在尾巴主义和冒险主义时期以后必須走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在这个意义上經過修訂的計劃将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方案。它必須从由于巨大的成績以及同样巨大的錯誤而造成的当前形势出发。这样一个計劃不能消除由历史的过去和世界环境所造成的种种矛盾。但是，它必須使錯誤所产生的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部分地緩和及部分地推迟危机的爆发，从而使孤立的工人国家获得一个新的喘息时期。目前的任务是要从冒险主义的陣地上实行有計劃的退却。

摘譯自《世界失业問題和五年計劃》(1930年)，  
科伦坡 1952年英文版第1—2頁。

素来短視的經驗主义的斯大林官僚集团在成就的影响下，于一九二八年开始魯莽地加快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速度。这里两种角色对调了位置。左翼反对派提出警告說：如果采取未經以前經驗证明的过份快的速度，那末城市与乡村之間、工业各部門之間可能产生不平衡，因而造成可怕的危机。而且——这是反对派的主要論据——过份迅速地把資本投入工业将会过分地减少分配給日常消費的部分，不能保证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必要的提高。拉柯夫斯基虽然被流放在巴尔瑙尔，处在与全世界隔絕的状态，他还是

发出了警告，他說，即使要付出降低速度的代价仍然必須改善工人群众的物质状况。在这个問題上，斯大林官僚集团最后不得不听从反对派的意見。最近由最高国民經濟委員会分出單一个独立的輕工业人民委員部。它的任务是照管居民的日常需要。在目前阶段这一改革还是具有純粹官僚主义性质的，但是它的目标很明白：在政府机构中創造某些保障，不要因为重工业而太多地牺牲群众的日常需要。在这个問題上，缺乏远見和創造力的斯大林派在今天不得不称贊他們在昨天詛咒的东西。

摘譯自《是斯大林还是苏維埃在削弱？》（1932年），載于《政治季刊》1932年7—9月第3卷第3期第312—314頁。

### 三、資金的来源

声称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的五年內，“每年从預算中投入工业化需要的純投資可以而且应当达到五亿至十亿”。这些資金的主要来源是：对私营企业家各种超額利潤征收不少于一亿五千万至两亿卢布（現在只有五千万）的稅款；从約占农戶总数10%的富农和富裕阶层的存粮中征借不少于一亿五千万至两亿普特的粮食；“压缩龐大的官僚机构”。“資金的补充源泉应当是正确地利用和世界經濟的联系”。

污蔑联共中央想“加紧压榨工人的肌肉”，“靠实行更严格的劳动定額、减少工資的附加开支（免除企业对公用事业、托儿所、休养所等等开支）和减少社会保险費扣款的百分比来减低成本”，同时在各种借口下“保存資本主义阶层的积累”。

中央的提綱在五年計劃的这个重要問題上說了什么？提綱提出了什么样的基本投資的数字呢？提出了旨在消除商品荒的必要數量的工业投資数字了吗？沒有。提綱只限于下列模糊指示：

“在把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工业的再分配的同时，增加工业内部的积累就能实现足以保证生产的必要增长及其合理化的数额的工业基本投資。”

可見，中央对于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問題沒有作出任何切实的、具体的答复。但是在談“主导基础——工业”和巩固城乡結合的同时，却不善于指出防止商品荒增至十亿至十五亿卢布这龐大数字的具体办法，就等于使党盲目地走向巨大的經濟震荡。

然而我們有国家計劃委員会对这个問題的回答。在国家計劃委員會預見到上述商品荒的增长的同一个五年計劃中，委員會肯定，可以而且应当只靠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治疗这种病症。**国家計劃委員會的五年計劃絲毫不指望夺取城市資產階級的收入，因为：**

“第一，革命后新出現的耐普曼資產階級阶层在我国城市居民中很单薄，仅仅因此就不可能成为預算收入的源泉，第二，这并不是独立的源泉，因为，我們对資本主义成分的收入征稅，反正只能从中征得由农民和工人劳动所創造的那部分。”（《国家計劃委員會的五年計劃》，第 28 頁）

总而言之，国家計劃委員會认为从資本家的收入中吸取工业化的資金是不行的、也是无望的，因为，第一，其数不多，第二，因为这些收入是由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所創造的！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低下和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收入少，“农村”（應讀作富农）也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积累的源泉。由此就得出一个自然的結論：

“一般只有生产力更高的非农业劳动（應讀作工人阶级）才能

**是預算收入和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源泉。”**

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五年計劃並沒有得到正式的承认，但是在其中得到表現的“許多思想”却是很能說明現在的經濟領導的特点的。这个五年計劃是很清楚的。它为加紧压榨工人的肌肉来堵塞我們发展中的矛盾的做法作辩护，同时在任何一种借口下保护資本主义阶层的积累。但是中央的提綱用什么来同这种政策对立呢？什么也沒有。它是否給予这些傾向以坚决的反击呢？沒有。它有沒有提出一个解决工业基本投資的根本問題的独立計劃？沒有。这样一来，提綱就助长了反无产阶级傾向在我国经济社会主义成分与資本主义成分相互关系的基本問題上在实际上取得越来越多的胜利。

摘譯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計劃的反提綱》（1927年11月），載于《真理报》1927年11月17日第263号第3版。

减低成本、减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是苏維埃政权可以而且应当执行的唯一的政策。但是中央的提綱又忘記了小事：我国經濟发展的矛盾，苏联的阶级环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建設的利益和我国經濟中資本主义成分利益的冲突。

非常明显，减低成本和价格的先决条件首先是更改工厂的装备和修建新工厂。可是中央的提綱却极力迴避下列問題：为此必須事先实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把其中的一大部分从資本主义成分手中轉入社会主义成分手中，从富农經濟手中轉入国营工业手中，把耐普曼的积累轉用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作为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关于这一点反对派早就一再申說，而我們这里却无可救药地拖延下来，借口說如果触动富农和富裕农民，中农是会为他們而見怪的。

中央的提綱閉口不談这点，从而必然把解决这整个任务的重

担压在工人阶级肩上。

实际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新方案规定，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实行更严格的劳动定额、减少工资的附加开支（免除企业对公用事业、托儿所、休养所等的开支）和减少社会保险费扣款的百分比来减低成本。

不仅如此。中央的提纲不愿了解或至少是没有向党说明，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将不仅意味着扩大和农村的商品流转及缓和商品荒（这是必要和有益的），不仅意味着巩固和贫农及中农的结合并加强他们的经济（这是巨大的成就），而且也必然意味着给农村富农上层的积累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富农将能够用自己的储存换取大量的工业品，从而更为增加自己的积累，即加强压榨中农和贫农的工具，并提高自己的比重。如果中央的提纲清楚这一点，它就应当在提出减低成本和价格政策的同时，指出一系列防止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份利用这个正确的政策的后果的措施。

为了避免这种后果应当做些什么呢？

无可争辩的是，必须极力不断减低工业的成本，不断减低工业品价格，但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但仅仅这样还不能解决比例失调的问题。必须同时在所有一切五年计划方案中规定不断增加从殷实的、富裕的农户，尤其是从富农经济的积累中取出数以亿计的卢布用于工业化，同时压制私人工商业者和“压榨”官僚。否则，在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情况下发展工业的全部重担就会落到工人阶级肩上。可是，无论在哪一个五年计划方案中或是在中央的提纲中都甚至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除其他原因之外还由于农产品将和不断降低价格的工业品交换之故，富裕农户一年比一年增加的大量积累将向何处去。

### 九、从哪儿取得资金？

对于从哪儿取得资金以便采取更大胆、更革命的办法解决真

正工业化和更快地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任务，即社会主义专政的命运有賴于其解决的任务，反对派回答道：

**資金的基本源泉就是用正确地利用預算、信貸和价格的办法对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資金的补充源泉应当是正确地利用和世界經濟的联系。**

一、最近五年內每年从預算中投入工业化需要的純投資可以而且应当达到五亿至十亿。

二、必須通过稅收系統：1、实际征收私营企业家各种超額利潤的稅額不少于一亿五千万至两亿卢布，而不是象現在这样只有五千万；2、为了增加出口，从約占 10% 农戶的富裕阶层和富农阶层的实物儲存中征借不少于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糧食。在滿足城市需要的条件下，这些糧食就能为工业从国外換入額外的原料和装备。

三、执行不断减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以及縮小批发 和零售价格的“剪刀差”的坚决政策时，应首先减低工人和农民日常消費品的价格（但不应象現在这样使本来很低的质量更加下降），使物价的降低不减少国营工业的必要积累，而主要是靠增加商品的数量和降低成本、减少杂費、削減官僚机构等等来实现。

一种更适合市場条件、更灵活、更加分別对待，即考慮到市場上每一件商品状况的减低出厂价格的政策，可以使国营工业保存大量的資金，这些資金現在滋養着私人資本和一般商业寄生集团。

四、根据斯大林和李可夫去年所宣布的应当每年提供三亿至四亿卢布的节约制度，实际上取得的結果是微不足道的。节约制度是个阶级政策的問題，只有在群众的直接压力下才能实现。为此工人們应当敢于施加压力。每年减少四亿卢布的非生产开支是完全可能的。

五、善于利用諸如对外貿易垄断制、外国的貸款、租让制、技术

援助合同等工具，能够提供一部分补充的資金，而主要的是能大大提高我們自己使用資金合理性，用新技术使其富有成效，加速我們发展的整个进程，并从而巩固我們在資本主义包围下真正的社会主义独立。

六、关于自下而上挑选人材以及关于他們之間不正确的相互关系的問題并不是一个最次要的財政問題。挑选得越糟糕，越需要資金。官僚主义制度阻撓进行正确的挑选和建立正确的关系。

七、經濟領導的尾巴主义意味着在实践上損失千百万的卢布，作为无远見、不协调、舍本逐末、行动落后的罰金。例如，据某些統計，单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无远見和缺乏計劃所引起的我們工业、商业及其他企业人員的流动不定，就使国家經濟損失了約五亿卢布（《工商业报》1927年8月2日第173号）。

八、稅款不足以滿足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信貸应当成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設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越来越重要的杠杆，这首先要求巩固稳定的通貨制度和健全貨币流通。

九、縮小投机和高利貸活动范围的阶级性更坚定的經濟政策，有利于国家机关和信貸机关更順利地动员私人积累，并通过长期信貸的形式比現在更广泛地給工业以撥款。

十、削減目前消耗19%（战前只占8.5%）的国民收入的大量流通費用，加速国家資金的周轉也是相当一部分資金的来源。

十一、国家专卖烧酒最初是作为試驗，并且打算把卖酒的主要收入用于工业化事业，首先是用于发展冶金工业的。实际上，工业化事业由于国家专卖烧酒只是遭到了損失。应当承认这个試驗是失敗的。在苏維埃制度下国家专卖烧酒不仅和沙皇制度下一样对于私人經濟是一个損失，而且主要地是对于国营經濟是一个損失。曠工的增加、馬馬虎虎的工作、废品的增加、机器的损坏、不幸事故的加多、火灾、斗殴、殘废等等的損失一年以几亿卢布計算。工业

由于烧酒而遭到的损失不比预算从烧酒中的所得小些，而要比工业本身从预算中得到的大好几倍。在最短期间(两三年内)停止国家专卖烧酒就会自然而然地增加工业化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这就是对于从哪儿取得资金问题的回答。说工业化速度因缺乏资源而直接受到障碍是不对的。资金是菲薄的，但是有的。需要的是正确的政策。

\* \* \*

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应当坚决予以推翻和谴责，它们是和“变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为社会主义的俄罗斯”的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必须改变各阶级赋税负担的分配，加重富农和耐普曼的负担，减轻工人和贫农的负担。减低间接税的比重。

保证货币单位的绝对稳定。切尔文的巩固一方面需要减低物价，另方面需要一个没有赤字的预算。不容许用发行纸币来弥补预算的赤字。

应当有一个有严格目标、没有赤字、无伸缩余地的、不容许有追加的和意外的项目的预算。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预算应当大大增加对国防（主要是军事工业）、对一般工业、对电气化、运输业、住宅建设和对农业集体化措施的撥款。

坚决反击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的行为。采取在提高经济的技术力量和改善群众的物质状况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电气化和合理化的坚定方针。

#### 十、两条道路

国内有两种互相排斥的基本立场。一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另一种是力图使发展回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资产阶级立场。

資产阶级以及跟着他們走的那些小资产阶级阶层的阵营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商品生产者的私有的主动精神和个人利益上。这个阵营指靠“人强馬壮的农民”，想使合作社、工业和对外貿易正是为它服务。这个阵营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不应当指望国家預算，其发展速度不应当破坏资本主义农場积累的利益。爭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在日益强大的小资产者看来就是压榨工人的肌肉和神經。爭取减低价格的斗争对他來說就是为商业资本的利益而去削减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小资产者看来就是分散工业，削弱計劃基础，把重工业推到次要地位，就是說，还是去迁就强壮的农民，并在最近取消对外貿易垄断制。这是烏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道路。國內这股强大的潮流对我們党的某些集团也有影响。

这些集团的綱領在今天看来会是什么样的呢？可以大胆无誤地說，这个綱領大致包括下列几点：

- 第一、削減已經規定的基本投資的最低計劃；
- 第二、把这些已經削減的費用，在生产資料生产和消費品生产之間作有利于后者的再分配；
- 第三、从国外进口制成品；
- 第四、在信貸上压制工业；
- 第五、削減国家預算对工业的撥款。

同上。

反对派要求通过在稅收上更坚决一貫地压制富农和私人工商业者的办法，通过压缩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办法，更迅速地发展工业。中央的多数指責反对派犯了“超工业化主义”和在富农面前“惊慌失措”。多数派随波逐流，指望侥幸成功。目前的困难是党为尾巴主义的领导政策所付出的代价。

今年年初，农村中、主要是富农和富裕农民手中积存的粮食实物儲存达八亿至九亿普特。这些超过了必要防灾儲备量的儲存还在繼續迅速增长，到本农业年度末还要增加二亿至三亿普特，从而突破十亿。这个事实是同农村的商品流轉閉塞的可怕的明证，結果必然是播种面积停止增加。我們在这里遇到工业不够发展的后果，它无法提供换取农村这些儲存的資金。工业的緩慢发展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和农村中实物儲存的积累密切相关的是我們出口不足以及富农和富裕农民阶层破坏我們进出口計劃的問題。加米涅夫同志在一九二五年秋季完全正确地解釋粮食出口計劃沒有完成的原因，說这是因为富农掌握了粮食儲存，从而破坏了这个計劃。当时对他群起而攻之，并專門編制了統計表予以“駁斥”。可是現在农村中我們采购工作人員无法弄到的大量实物儲存，已經把加米涅夫同志的說法变为每个經濟工作人員都知道的常識。尤有甚者，接任他的职位的米高揚同志不得不去应付今年最初的時候出口計劃所遭到的破坏，应付本来就大为削減了的进口計劃遭到破坏的前景。这第二次“失算”更不可以原諒，因为这是在第一次“失算”之后两年，即在农村分化的后果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条件下发生的。米高揚同志在《真理报》第二五二号上的文章中非常正确地指出，“我国对外貿易額是确定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限度(界限)”。而这些限度倒底是谁規定的？对外貿易額一部分是由我国工业出口数字（占一九二五——二六年度的 35.8%）确定的，而主要是由农业出口量（占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全部出口的 64.2%）确定的。而由于我們首先是从农村富裕阶层取得供出口的多余的粮食和原料，由于正是这些阶层囤存的粮食最多，結果通过出口“調節”我們的首先倒是富农和富裕农民。我們正确地认为对外貿易是国营經濟最重要的命脉之一。我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結果使这个經濟

命脉的某些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其所以是重要的部分,因为我們主要是农业国)轉入我們的阶级敌人手中。这里在党和工人阶级面前充分呈现出中央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起在“向左开火”的口号下所执行的那个政策的最危险的后果之一。現在每个普通工人都了解这个致命的后果了。这个后果就是: 在有着十亿普特的粮食实物儲存的情况下削减出口量,在进口最必需的原料,包括生产日用必需品的紡織工业部門、羊毛加工工业部門、制革工业部門所必需的原料方面发生困难, 在进口最必需的机器装备方面发生困难, 在清算国外債務方面发生困难, 城乡商品荒的加剧。

中央近两年来經濟政策的客观意义在于: 在这个政策的庇护下, 資本主义成分的陣地(首先是在农业中)大为加强, 資本主义成分現在对苏維埃政权的經濟計劃公然施加压力, 破坏这些計劃。現在連瞎子也看得見这一点了(見上面所引米高揚同志的說法以及在他同一篇文章中其他的地方)。

但是只有仍然想繼續做瞎子的人才会看不見上述困难和對外貿易垄断制問題直接有关。

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拖下去, 摆脫这种局面的出路只有两条。

**第一条出路就是反对派提出的向农村10%的富农和富裕农戶征借一亿五千万至两亿普特的粮食。**在滿足城市需要的条件下把这些粮食出口, 用換得的外汇购买額外的原料和工业装备, 从而在国内准备大量的补充商品以减少农村的商品荒和城市中粮食方面的混乱。

誰拒絕走这条道路, 他就只好放弃对外貿易垄断制, 吸引外国資本到进出口方面来, 为农村輸入外国商品并輸出积存的粮食。中央現在的多数在一切尖銳問題上慣于实行原地踏步的政策, 自然不能及时地选定左的或右的道路來解决問題。但是犹豫不決本身就会导致匆忙地、惊慌失措作出决定并必然走上右傾政策的道路

上去。

反对派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說过，彷彿中央委員會決定廢除對外貿易壟斷制，承认全部旧債等等。廢除或者“緩和”對外貿易壟斷制的思想从来没有在會議上也沒有在报刊上正式宣布过。但是在各主管部門的办公厅里面，在生意人、包括共产党生意人的狹小圈子里，越来越坦率地承认在“緩和”的意义上“改革”對外貿易制度是增加农业出口和发展全国生产力（当然是在資本主义道路上，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必要条件。中央委員會政策的总的方向及其客观后果比任何口头上的保证都更有力一些。反对派現在警告党制止在對外貿易問題上的正在向右轉的曲折路線。

同上。

城市中两千万失业工人和农村中十亿普特未动用的粮食儲存，这就是我国經濟所面临的那些矛盾的最鮮明、最触目的图景，而这些矛盾在很大的程度上又是由于現在領導的錯誤所积下来的。

在国家經濟中失业是什么？

这首先是国家缺乏新的生产資金，缺乏新的資本。

而十亿普特未經动用的粮食儲存又是什么？

这是主要落在富农阶层和富裕阶层手中的苏維埃社会的死資本。从扣除保险儲备以后剩下的五亿普特中拿出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粮食来，就会使我們获得几亿卢布的新的生产資金（按國內价格計算）。这一大笔新的資金就会使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获得就业的机会，把几亿額外商品投入市場并給予整个經濟发展以有力的推動。反对派一分钟也不犹豫地願意担负执行这个計劃的責任，把它当作自己的擺脫危机的总綱領的組成部分之一。中央委員會的多数則在束手无策地踏步，并且只能原地踏步，坚持自己的錯

誤，从而使本来就很困难的状况更加尖銳。把束手无策的原地踏步冒充为高度的“謹慎”的那种政策是毫不中用的！

\* \* \*

反对派在自己的政綱中从这样一个簡單的思想出发：为了使社会主义建設获得成就，必須使工人阶级在事实上，根据逐年逐月的切身經驗感觉和意識到自己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自己在一切建設和創造部門中的作用的不断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反对派反对通过压榨工人的办法来实行节约制度或实行合理化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反对派要求更坚决地提高工人的工资和采取其他一系列措施，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必要前提的原因。

同上。

#### 四、工业化和苏联經濟 对世界經濟的依賴

宣传世界經濟“监督着自己的每一个部分，即使这个部分处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并建設着社会主义”。断言国家工业化“意味着增加我們对世界市場、对资本主义、对它的技术和經濟的依賴”。揚言如果“要在最近時間內凭自己的双手制造出全部机器或至少是最重要的机器”，“企图忽視世界經濟中的分工”，“就必然会大大減低我們經濟发展的速度”。声称不能忽視“与世界资本主义經濟的‘合作’”。必須全面加速俄国經濟的工业化和加強社会主义經濟成分，来发展俄国同世界經濟的联系；有計劃地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来刺激俄国的工业。

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这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杠杆。希望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我們自問，我国工厂的技术装备如何？根据这一問題的专家瓦尔查尔的統計，战前我国工业的装备有 63% 是进口的机器。只有三分之一的装备是国产貨，而且这三分之一都是极简单的机器，因为比較复杂的和最重要的机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因此，如果你們察看一下我国工厂的技术装备，你們就会亲眼看見俄国以及苏联在物质上对世界經濟的依賴。誰要是不注意問題的这个方面，誰要是議論这个問題而把它的經濟技术基础和世界經濟政治关系撇开不談，他就必然会成为赤裸裸的抽象概念和斷章取义的引文的俘虜。

近十年来，我們几乎沒有更換我国工业的固定資本。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們根本沒有从国外輸入机器。显然，这种情况就使得某些人认为我国工业的技术装备属于我国的天然財富，仿佛今后可以在这种“自然的”基础上孤立地繼續建設社会主义，直至完全建成。但这是幻想。我們現在处在所謂恢复时期的終点。我們接近了战前水平。但是恢复时期的終点同时也就是恢复我們和世界經濟的物质联系的始点。我們應該更新現在經历着危机的固定資本。誰要是以为今后几年我們就能够自己制造全部或大部分装备，他就是一个幻想家。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重要任务提出的国家工业化，意味着在最近时期和相当长的时期中不是减少，反而是增加我們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也意味着增加我們对世界市場、对资本主义、对它的技术和經濟的依賴（当然是互相的依賴），并意味着加强向世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就是說，不能把我国建設社会主义的問題和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經濟变化的問題割裂开来。这两个問題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如果有人对我们說：“可是，亲爱的朋友們，你們自己可以制造机器”，那我就要回答：“当然，如果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今天就垮台，

那我們在一、二十年后就能制造出比今天多得多的机器。”如果我們想离开实在的資本主义世界而“隱居”，如果我們提出任务要就在最近時間內凭自己的双手制造出全部机器或至少是最重要的机器，就是說，如果我們企图忽視世界經濟中的分工，并跳过造成我国現有工业这种状况的先前的經濟历史，总之，如果我們走上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的”門罗主义而一切靠自己的双手制造的話，这就必然会大大減低我們經濟发展的速度。因为极其自然，拒絕利用世界市場来弥补我国装备的漏洞，就会使我們自身的发展慢得惊人。而发展速度是一个决定因素，因为地球上到底不止我們这些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暫时还只存在于新聞記者和決議起草人的幻想之中。实际上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总是（直接或間接地）受着世界市場的相对监督。这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发展速度不能任意規定。这是由整个世界发展給我們規定的，因为世界經濟处于最高一級的地位监督着自己的每一个部分，即使这个部分处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并建設着社会主义。

为了使我国工业化，我們需要輸入机器。而农民需要輸出粮食及其他产品。如果我們不輸出，我們就不能輸入。另一方面，國內市場不能吞納全部农产品。因此，无论农民的需要或工业的需要都把我們重新納入世界經濟，我們和世界經濟的联系，也就是说斗争将与时俱增。我們越来越走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孤立地位，而納入世界經濟联系和相互依从的体系中。而誰如果談論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而忽視我国經濟与世界资本主义經濟“合作”和斗争的事实，他就是在搞赤裸裸的形而上学。

.....

这样說来这里的全部問題在于我們能不能战胜本国资产阶级，仿佛社会主义建設問題的解决就在于此。其实不然！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消灭阶级，按社会主义方式組織全部生产和消費以

取代階級社會。問題在於克服城鄉之間的矛盾，這又要求農業本身的高程度工業化。而這一切都要在資本主義依然包圍的環境下進行。不能把這個問題和僅僅對國內資產階級的勝利等同起來。

.....

.....此外，能不能設想，在歐洲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我們就能僅僅依靠國內的經濟與文化資源，使無產階級和農民溶和在統一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中？上面說過，為此我們就必須大力提高技術，這首先要增加糧食的出口和機器的進口。機器在世界資產階級手中，它又是我國糧食和原料的買主。世界資產階級暫時還操縱著世界價格，因此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就得依賴它並同它作鬥爭。為了消除這種依賴，战胜本國資產階級是決不夠的，因為這裡問題不是在政治上鎮壓資產階級，政治上我們早在一九一七年就在我國把它推翻了，問題是在資本主義包圍下，即在向世界資產階級作鬥爭（經濟、政治和軍事的鬥爭）中建成孤立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只有使這個孤立並且暫時還是非常落後的國家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更強大才行。因為，完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需的不是一年，不是十年，甚至也不是二十年，而是好幾十年，所以只有使我國生產力超過資本主義生產力才能達到這一點。所以問題不是民族的無產階級反對民族的資產階級，而是孤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向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作殊死的鬥爭。問題只應該這樣提。

摘譯自《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的發言》（1926年12月），載于《真理報》1926年12月14日第289號第2—3版。

在兩個不可調和的敵對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未來長期的鬥爭中，最終說來，勝負決定於兩個制度間

劳动生产率的对比。而这在市場条件下，可以用我国國內价格同世界价格的对比来衡量。列宁在他最后的一些讲话中有一次曾警告党說：即將到来的“考試”“是俄国和国际市場举行的‘考試’，我們依靠这个市場，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sup>①</sup>当时他心中考慮到的就是这个根本事实。因此，布哈林关于我們可以用任何速度，甚至“龟行”的速度走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廢話。

**我們不能在閉关自守的經濟的掩护下躲开资本主义包围。正因為閉关自守，这样一种經濟就将不得不以极端緩慢的速度前进，于是就必将遇到不是削弱了的而是大为加强了的压力，这压力不仅来自资本主义的军队和舰队（“干涉”），而且首先来自资本主义的低廉商品。**

当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較高的技术时，对外貿易垄断制是社会主义存在下去的必要武器。但是，目前处在建設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經濟，只有在技术、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价格問題上逐渐接近世界經濟水平，才能保持这种垄断。經濟領導方面的目標不應該是閉关自守、自給自足的經濟，这种經濟必然以降低发展水平和速度为代价，正相反，它的目標應該是用最大限度加快速度的方法，达到我們在世界体系中的比重的全面增長。

为此：（一）必須了解我們出口的重大意义，目前，出口落后于我国工业的总发展，已經到了危险的地步。（苏联在世界商业貿易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經从一九一三年的 4.22% 减少到一九二六年的 0.97%。）（二）尤其必須改变我們对富农的政策，這項政策使富农可以囤积原料牟取暴利而破坏我們社会主义的出口。（三）必須全面加速我国經濟的工业化和加强我国經濟的社会主义成分（而不

---

① 《列寧全集》第 33 卷第 243 頁。——編者注

是資本主义成分)，来发展我們同世界經濟的联系；在最近将来不應該分散我們有限的积累，而應該通过深思熟慮的計劃把它逐步投入一种新的生产，这种生产首先要保证大量生产最必需和最有用的机器，我們應該有計劃地利用世界資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周密而灵活地用这些成就来补充和刺激我們自己的工业。

把我們的希望寄托在孤立发展社会主义上面，寄托在一种脱离世界經濟的速度上面，这样就破坏了我們的整个前途。这样就使得計劃領導机关离开了正軌，并且提供不出正确的方針以調整我們同世界經濟間的关系。我們没有办法决定什么应由自己生产，什么应从国外輸入。坚决抛弃孤立建設社会主义經濟的理論，这意味着在很少几年的过程內我們的資源将得到无比迅速的利用，更快地工业化，我們自己的机器生产将更加有計劃和有力地增長。这意味着就业工人数量更快地增加和物价的真正降低——一句話，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联得到了真正的加强。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4—56頁。

还有另一問題，即最主要的问题，在斯大林与坎伯尔的对话中明确地被發揮了，这就是一国社会主义的問題，不顾一切半生不熟的預言，五年計劃并沒有增加苏联的經濟“独立”。恰恰相反，工业化的进展扩大了与加深了苏联經濟对世界經濟之依赖，也就是它們中間的相互依赖。

摘自《用一双手》(1932年)，載于《俄国革命与五年計劃》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第158頁。

## 五、国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

胡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不是

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厂轉到国家手中，只是从法律上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工人对工厂的管理根本不发生影响，官僚是“他的經理”，国家是“他的雇主”，談不上什么“自由劳动”。声称只有“社会特权和社会分化消失以及国家的必要性从而消失”以后，国有制才会成为全民所有制。

由于各个托拉斯和工厂之間的竞争，由于劳动群众所处的沉重的物质地位，由于劳苦人民中占重要地位的阶层的文化水平不够，我国国营工业是极为分散的。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工业的社会性质，在决定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作用，取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自愿的内部团结，取决于行政管理人员、工会干部、车间核心成员等等有意識地服从紀律，并且通过这一切来加以保证。如果我們承认这个系統正在削弱、崩溃和瓦解，那末任何人都可以不言而喻，国营工业、运输业等等的社会主义性质很快就会蕩然无存了。托拉斯和各个工厂就会开始自行其是。目前已經如此薄弱的有計劃的开端就会連影子也找不到了。工人的經濟斗争将会达到除力量对比以外就毫无約束的程度。生产資料国家所有制将开始变成法律上的一紙空文，以后連这种法律上的存在也会被一扫而光。由此可知，在这里，問題也归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須有意識地保持团结，必須保护无产阶级先锋队，使它不受官僚主义的侵蝕和烏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毒害。

摘譯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紐約 1936 年版第 300 頁。

新宪法——我們在下面将要看到，它完全是建立在把官僚与国家等同起来，把国家与人民等同起来的基础之上的一—写道：“国有制即全体人民的財产”。这种等同是官方学說的詭辯基础。

一点不錯，馬克思主义者，从馬克思本人开始，在說到工人国家时，曾經把國家所有制，民族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几个名詞，当作簡單的同义語使用。在广泛的历史范围上，这种說法不致引起什么特別的麻煩。不过，当它被应用到一个新社会（而且是一个孤立的在經濟上落在資本主义国家后面的社会）的最初的還沒有得到保证的发展阶段时，它就变成巨大錯誤和公然欺騙的源泉了。

私有制要变成社会所有制，必不可避免地要經過国有的阶段，正象幼虫要变成蝴蝶，必須經過蛹的阶段一样。但是蛹并不是蝴蝶。无数的蛹根本沒有变成蝴蝶就死了。国家所有制成为“全体人民”所有制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特权和社会分化消失以及国家的必要性从而消失的程度。換句話說：国家所有制轉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程度是同它不再是国家所有制的程度成比例的。反过来說也是正确的：苏維埃国家越是高踞在人民之上，它越是激烈地把自己当作财产的保护人而和作为財产浪费者的人们相对立，它就越是明显地证明这种国家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摘譯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伦敦1937年版第224—225頁。

如果我們用市場上的語言來說明社会主义关系的話，那末，我們可以把公民当作拥有国家財产的一家公司的一个股东。如果说財产是属于全体人民的，那就应当假定“股票”是平均分配的，因而所有的“股东”都有权分得一样的紅利。然而，公民参加国家企业，不仅是作为“股东”，而且还要作为生产者。在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也就是在我們已經同意称为社会主义的阶段，劳动的报酬还是按照資产阶级标准来支付的——即按照技术和劳动强度等等来支付的。因此，从理論上說，每个公民的收入应当包括甲和乙两个部分——也就是紅利和工資两个部分。技术越高，工业的組織越完善，甲所占的地位就比乙越大，而个人劳动的差別对生产水平的影

响就越小。苏联工資的差別不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小些，而是还要大些；从这个事实必須得出这样的結論，即苏維埃公民所持有的股票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在他們的收入中，紅利和工資也不是一样的。不熟练的工人只能得到乙，这是在类似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可以得到的最低收入；斯达汉諾夫工作者或者官僚則可以得到 $2\text{ 甲} + \text{乙}$ ，或者 $3\text{ 甲} + \text{乙}$ ，等等，而这里的乙还可以变成 $2\text{ 乙}$ 、 $3\text{ 乙}$ ，等等。換句話說，收入的差別不仅决定于个人生产率的不同，而且还决定于隐蔽地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多少。拥有特权的少数股东是靠牺牲被剥夺了权利的多数股东的利益生活的。

如果你认为苏联的不熟练工人可以比在类似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下的资本主义企业收入多些——这就是說，他还是一个小股东——那末，必須认为他的工資等于 $\text{甲} + \text{乙}$ 。工种較高的工資将表現为这样的公式： $3\text{ 甲} + 2\text{ 乙}$ ， $10\text{ 甲} + 15\text{ 乙}$ ，等等。这种情况意味着，不熟练工人只有一股，斯达汉諾夫工作者有三股，专家則有十股。不仅如此，他們的真正工資的比例是 $1:2:15$ 。在这种情况下，对神圣的社会主义財产的贊美，在經理或者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看来是很有說服力的，在普通工人或者集体农庄庄員看来则沒有什么令人信服的地方。然而，普通工人占社会的絕大多数。社会主义所关心的正是这些工人，而不是那些新貴族。

“我国的工人不是工資奴隶，不是称之为劳动力的商品的出售者。他是一个自由的工人。”（《真理报》）在目前这个时期，这个漂亮的公式还不容許加以夸大。**工厂轉到国家手中，只是从法律上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实际上，他还不得不在匱乏中生活，不得不为一定的工資干一定時間的活。工人从前对党和工会所抱的那些希望，在革命以后轉而寄托在自己所創造的国家身上了。但是，这种工具的有用职能却受到技术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为了提高这种水平，新的国家便用老一套办法来压制工人的筋肉和神經。一批鞭

策奴隶的人已經成长起来。工业的管理工作变成超官僚主义式的了。工人对工厂的管理已經完全不能发生影响，在实行計件工資、物质生活条件艰苦、不能自由行动以及恐怖的警察压制深入到每个工厂的生活当中的情况下，的确很难让工人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工人”。他只能从官僚中看到他的經理，从国家方面看到他的雇主。自由劳动同官僚国家是不能并存的。

同上，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75—177 頁。

## (九) 農業集體化問題

### 一、 胡說農業集體化取決于 工业提供机器的能力

斷言農業集體化的真正可能性主要決定于“工業供給大規模農業以必需機器的能力”。声称企图“在農民的土地的基礎上”、“在資本主義以前的農具的基礎上”实行全盤集體化，“是孕育着農業生產危機和危險政治後果的一種冒險”。它“有使無產階級和農民合作的可能性遭到破壞的危險”。宣傳集體化和技術狀態之間的這種“比例失調”是由“蘇聯經濟所處的孤立地位”、不能利用“國際關係中的資本主義‘正常’貸款”造成的。

在農民問題上，斯大林-布哈林集團正在修正列寧，他們修正的主要方面可以概括為以下八點：

(1) 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即：只有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才能幫助農民沿着集體化道路改造農業。

(2) 對於雇農和貧農是無產階級專政在農村地區的社會基礎這個問題，估計不足。

(3) 把我們農業經濟的希望寄托在所謂“力量強的”農民身上——這在實質上即是富農。

(4) 忽視或公然否認農民所有制和農民經濟的小資產階級性

质。这是离开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轉向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說。

(5)低估資本主义成分目前在农村中的发展，并且掩飾农民中正在发生的阶级分化。

(6)創造了一种起瓦解作用的学說，大意是：“富农和富农組織是沒有任何希望的，因为我国发展的总框框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决定的”<sup>①</sup>。

(7)鼓励“富农合作社的核心长入我們的制度里来”<sup>②</sup>。“这个問題可以表述为，必須让富裕农民和富农發揮他們的經濟潜力”<sup>③</sup>。

(8)企图把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同他的电气化計劃对立起来。按照列寧自己的意見，只有把这两个計劃結合起来才能保证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利用官方集团这些修正主义的倾向，已經同我們国家机关的某些环节勾結起来，他們正公然企图把我們在农村中的全部政策轉到資本主义的轨道上去。并且，附帶說一下，富农和富农思想的辩护人把他們的野心用关心生产力的发展、关心“一般的”商品产量的增长等等托詞掩盖起来。事实上，富农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农的商品生产的增长正在压制和阻碍着所有其他农民經濟生产力的发展。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3—44頁。

**在农民的土地的基础上实行的全盘集体化，是孕育着农业生产危机和危险政治后果的一种冒险。但是假使現在有可能大量采用先进技术使集体农庄立即繁荣起来，那么，集体化了的农业就可**

① 布哈林：《到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第49頁。——托洛茨基注

② 同上，第49頁。——托洛茨基注

③ 《真理报》，1925年4月24日。——托洛茨基注

以非常容易地度过婴儿病时期，而且几乎在最近短短几年内就能获得很好的收成，有这样多粮食用于出口以致可以大大改变欧洲粮食市场的景况，然后把工人群众的消费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上。集体化倾向和技术状态之间的有威胁性的比例失调，是直接由苏联经济所处的孤立地位产生的。如果苏联政府能够哪怕是仅仅利用国际关系中的资本主义“正常”贷款，那末作为集体化的支柱的工业化的速度甚至现在就可以大大增长。

摘译自《世界失业问题和五年计划》(1930)，  
科伦坡 1952 年英文版第 5 页。

苏联最剧烈的震动是由下列事实造成的，即目前的领导设法把迫不得已的事装成心甘情愿的样子，他们从工人国家的政治孤立中制定出一个经济上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这就导致试图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农具的基础上把农民土地全盘社会主义集体化——一种最危险的冒险，这种冒险有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可能性遭到破坏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极其尖锐的时候，布哈林这位昨天的“乌龟速度”理论家已经为今天“疯狂的奔驰”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创作了一首动人的赞美歌。令人担心的是，这首赞美歌不久恐怕也会被宣布为最大的异端。因为在空中已经出现了新的曲调。在经济现实抵制的影响下，斯大林不得不退却。现在危险的是，昨天的那种由惊慌情绪所产生的冒险主义攻势可能变成一次惊慌失措的退却。这种阶段的变来变去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性质无情地带来的结果。

摘译自《〈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1930 年 3 月 29 日)，  
载于《不断革命》伦敦 1962 年版第 31—32 页。

现在，谁也不会愚蠢到再去重复自由主义分子的谎言，说什么集体化整个说来是在赤裸裸的武力下实现的。在以前的几个历史

时期，农民在爭取土地的斗争中，有一个时期举行了反对地主的起义，另一个时期向未开垦的地区輸送了大批移民，还有一个时期則紛紛奔向形形色色的派別，这些派別答应用天上的乐园来补偿农民在地球上的那一小块土地。現在，在沒收大庄园和彻底分配土地以后，要把小块土地再联合成大片土地，成了农民、农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死存亡問題。

然而，只是这种一般的历史性考虑，問題还远远沒有解决。集体化的真正可能性，并不决定于农村陷入困境的深度，也不决定于政府的管理能力，而主要决定于現有的生产資源——也就是工业供給大規模农业以必需机器的能力。这种物质条件是缺少的。集体农庄建立时所拥有的装备，主要只适用于小規模經濟。在这种情况下，言过其实的迅速集体化便具有了一种經濟冒险的性质。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8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5頁。

## 二、污蔑全盘集体化使苏联 充滿了毁灭的气息

攻击集体化所使用的是“一套盲目的、粗暴的和冒险性的方法”。反富农的斗争采取了“震动的、掠扰的和野蛮的方式”，是“踩在劳动者背上”进行的，有着“极其令人震惊的血腥性质”。“集体化的迅速实行乃是絕望的一种标志”。

污蔑集体化对农民來說是“沒收他的所有財物的一种形式”，不仅把馬、牛、羊、猪集体化，“而且把新生的小鸡也集体化了”。

說由于集体化，粮食产量由一九三〇年的八亿三千

五百万担降至一九三二年的七亿担以下，糖由一亿零九百万普特降至四千八百万普特；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四年間，馬減少 55%，牛 40%，猪 55%，羊 66%；人的死亡达数百万。其結果是使集体农庄庄員“对于社会化的財产以及自己的劳动成果根本漠不关心”。

由于事先沒有料到自己的政策进行了这样急剧的轉变，因此政府在新方針方面沒有、也不可能进行甚至基本的政治准备。不仅农民群众，就連地方政权机关也不知道要向他們提出什么要求。农民听到謠言，国家要攫夺他們的牲畜和財产，他們非常憤慨。而这种謠言同事实的距离并不远。实际上，官僚實現了他們以前諷刺左翼反对派的那句話：“掠夺农村”。对农民來說，集体化似乎基本上就是沒收他的所有財物的一种形式。官僚机构不仅把馬、牛、羊、猪集体化，而且把新出生的小鸡也集体化了。正象一个外国觀察家所說的，官僚“把毡靴非富农化了，而这些毡靴都是从小孩子的脚上脱下来的”。結果，农民象患了流行病一样，紛紛廉价出售牲畜，或者为了得到肉和皮而把牲畜宰掉。

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一次莫斯科代表大会上，有一个中央委員安德烈耶夫描繪了一幅集体化的两面图景：一面是，他断言正在整个农村强有力地发展着的合作化运动，“現在将摧毁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另一面是，农民在加入合作社以前爭先恐后地出售自己的工具、牲畜甚至种子，这种情况“所占的比例肯定日益具有威胁性”。不管这两种概括多么矛盾，二者对比之下却正确地表明，集体化的迅速实行乃是絕望的一种标志。上面提到的那位外国評論家写道，“全盘集体化使国民經濟陷入一种几乎史无前例的毁灭境地，就象进行了三年战争一样。”

两千五百万单干农民的利己主义，昨天还是农业——虽然象

农民使用的老馬一样，但还有些力量——的唯一推动力，現在官僚却在缺乏技术設備、农学知識和农民本身的支持的情况下，設法一劳永逸地由两千个集体农庄管理处加以控制。这种冒险做法的悲惨后果，不久就产生了，并且一直延续了若干年。粮食的总收获量，一九三〇年曾經增长到八亿三千五百万担，在以后的两年中下降到七亿担以下。减少的数量从本身来看似乎并不是灾难性的，但它意味着，正好丧失了城市所需要的那一部分粮食，如果让城市即使保持那种长期的饥饿定量的話。在技术作物方面，后果还要糟。在集体化前夕，糖的产量曾經达到差不多一亿零九百万普特，到全盘集体化的高潮时期，由于缺少糖蘿卜，产量下降到四千八百万普特——也就是說，减少了一半。但是遭到破坏力最大的颶风的是动物的王国。馬匹的数目减少了 55%，即从一九二九年的三千四百六十万匹下降到一九三四年的一千五百六十万匹。牛的数目从三千零七十万只下降到一千九百五十万只，即减少了 40%。猪的数目减少了 55%；羊减少了 66%。人由于饥饿、寒冻、流行病以及鎮压措施而死去的数目，不幸，沒有象牲畜屠宰数統計得那么精确，不过也达几百万。造成这些牺牲的責任，并不在于集体化，而在于集体化时所使用的那一套盲目的、粗暴的和冒险性的方法。官僚机构一点預見性也沒有。甚至企图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同农庄的福利結合起来的集体农庄章程，到悲慘的农村遭到这样无情的破坏以后才公布出来。

这种新方針之所以具有强制性，是由于必須設法在一定的程度上摆脱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政策所带来的結果。但是即使如此，集体化本来也还是能够、也应当拥有一种比較合理的速度和比較慎重的形式。官僚既掌握着政权，也掌握着工业，本来可以把发展过程规划得不致把国家引向灾难的边缘。它本来可以、而且也应当采取比較符合农村的物质和精神資源的速度。“左翼反对派”

的流亡机关报在一九三〇年写道，“在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下，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在大約十年或十五年的时期內，可以得到彻底的改造并为集体化提供生产基础。但是在这个时期內，将会有不止一次的机会推翻苏維埃政权。”

这个警告并没有夸大其詞。在全盘集体化的年代里，十月革命的領土上从来没有这样直接地充滿了毁灭的气息。不满、不信任、苦难，逐步腐蝕着全国。通貨的混乱，稳定的“传统的”自由市場价格的高涨，国家和农民之間从貿易关系过渡到粮食、肉类和牛奶征稅，同大規模掠夺集体农庄財产以及大規模隐蔽这种掠夺行为进行的殊死斗争，为了反对富农的破坏行为（在“消灭”富农阶级后）党所进行的純粹軍事性的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恢复粮食卡片和饥饿口糧，最后还有恢复护照制度——所有这些措施使整个国家重新充滿了那种表面上早已結束的国内战争气氛。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8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5—27頁。

在农民政策还是針對着富裕农民的时期，據說在新經濟政策基础上开始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将通过合作社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完成。合作社由于一个接一个地拥有了购买、銷售和信貸的职能，最后一定也会使生产本身社会化。所有这些合起来，就叫做“列宁的合作社計劃”。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实际情况是沿着完全不同并且几乎相反的道路发展的，即用暴力来非富农化和全盘集体化。单个经济职能的逐步社会化，以及为此而在物质和文化条件方面进行准备，这些事都閉口不談了。集体化实行以后，好像共产主义制度在农业中也同时实现了。

这种做法带来的直接后果，不仅是一半以上的牲畜被消灭，而且更重要的是，集体农庄的成員对于社会化的財产以及自己的劳动成果根本漠不关心。政府被迫作了一次仓促的撤退。它又一次

提供給农民小鸡、猪、羊和乳牛，作为个人的財产。它把农場附近的土地分給农民，作为私人的土地。集体化的影片开始倒过来放映。

同上，第 52 頁。

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綱領應該从根本上排除沒收小农的土地和强迫实行集体化的可能性。只要小农认为可能或者有必要，就仍然讓他們作那一小块土地的主人。为了恢复社会主义綱領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必須无情地揭发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方法，这种方法不是根据农民或者工人的利益，而是根据官僚的利益决定的。

摘譯自《資本主義的垂死掙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938年 9月 3日)，紐約 1946 年版第 26—27 頁。

在苏維埃民主的条件下，即劳动者自己統治的条件下，反对富农的斗争本来不应采取那样震动的、惊扰的和野蛮的方式，本来可以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导致群众的經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反对富农的斗争，是踩在劳动者背上进行的一对一的决斗。因为角斗的双方沒有一方相信群众，因为它們都怕群众，所以斗争有著极其令人震惊的血腥性质。由于无产阶级的支持，斗争才以官僚的胜利而告終。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 年版下冊第 529 頁。

### 三、断言集体农庄不是社会主义企业

揚言全盘集体化决不是表示“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由于“缺乏技术和文化基础”，也“不能阻止小商

品生产者内部的分化”和资本主义分子的产生。攻击把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交给集体农庄，说这实质上是“废除了土地社会化”。说级差地租、不合理的土地分配和官僚的无限权力大大促进了集体农庄之间的进一步分化，形成一种“资产阶级农庄”。大农庄庄员的收入等于低等集体化农民收入的十倍到十五倍。普通农民从个体经营中所得的收入往往比从农庄所得收入多两倍。宣传出租土地“广泛地流行着”，不仅集体农庄，而且国营农场也出租土地。正是在农业中，集体化为“官僚的寄生主义”及其“同农庄上层集团相互帮助发展提供了巨大机会”。声称集体农庄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它是否会导致社会主义，“还要看一系列条件”，其中包括集体农庄内的、苏维埃制度的一般条件内的和世界舞台上的条件。低生产水平同社会主义的甚至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发生矛盾的情况，“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要严重得多”。

“全盘”集体化，即使在今后两、三年内真正实行，也绝不是表示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生产合作社的形式，由于缺乏技术和文化基础，并不能阻止小商品生产者内部的分化以及资本主义分子从他们中间出现。为了真正消灭富农，需要在农业技术方面来一次彻底的革命以及把农民同工业无产阶级一起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人和无产阶级社会的成员。但是，这是几十年以后的远景。由于个体农民的工具和工具占有者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占优势，正是在相对成功的集体化以后，亦即随着农业生产的普遍增长，农民的分化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发生和增强。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具有新的技术因素的集体化将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如果没有这种提高，集体化在经济上就没有什么道理，从而也

就維持不下去了)，那么这就会立即在現在人口已經过多的农村中造成一千万，二千万甚至更多的过剩工人，即使有最乐观的計劃，工业也不能够吸收这么多工人。隨着过剩的，也就是說，在集体农庄找不到位置的半无产和半貧民化的人口的增长，富裕的集体农庄以及貧穷的和中等的集体农庄內部的富裕农民将在另一个极端相应地增长起来。由于領導沒有远見，預先宣布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企业，資本主义农民分子就能把集体化当作自己最好的掩护，結果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更加危险。

因此，目前过渡时期的經濟成就，并沒有消灭基本矛盾，而是为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基础上更深一层地再現这些矛盾作了准备。

摘譯自《苏联的发展問題》(1931年4月4日)，  
紐約1931年版第7—8頁。

如左派反对派自一九二三年以来所宣布的，工业化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提。不发展工业化，无论麻布或釘子，更不用說拖拉机，都不能供給农民。但是工业化必須有如此的速度和依照如此的計劃，以使城市与乡村間貨物的量的关系坚定地进步，即使是緩慢地进步，使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标准提高。这一整个制度的安定之最先决条件，使工业化与集体化可以允許的速度受限制。

“五年計劃已廢除了階級和實現了社会主义嗎？”这閑話は无意思的。但我們必須要問：“城市与乡村間的聯盟已稳固了吗？”我們的回答是：“沒有，它（五年計劃）已动摇了和削弱了这聯盟。”斯大林在中央委員会全体会議的最近一次演說中吹牛說有計劃的集体化已超过了三倍以上，但是除官僚的吹牛家們以外，誰需要这些数字呢？集体化的統計代替不了面包。集体农庄是多，但是沒有肉类与菜蔬。城市沒有东西吃。因为工人挨餓而工业敗坏。城市与农民的关系已从半自願的經過糧食稅的交換轉变到强制征发，

換言之，轉變到戰時共產主義的方法。

飢餓的工人不滿于黨的政策。黨不滿于其領導。農民不滿于工業化、集體化和不滿于城市。一部分農民不滿于政治制度。哪一部分；我們不能知道，但在現在狀況之下，這種不滿顯然只有在發展。

“有計劃的集體化超過了三倍以上”！但這正是不幸的所在。被強迫組成的集體農莊不僅不走上社會主義，而且恰好相反，因其成為農民對城市罷工之組織的形式而動搖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農民對國家隱藏糧食，或有意限制播種，走上了富農的道路。農民說：“讓我自由地買賣吧”。從誰買和賣給誰呢？就是和那些出正確的價格的人做買賣，無論他是國家、私商或外國資本家。農民為國內貿易自由之鬥爭，立即引到要求對外貿易壟斷制之廢除。這是五年計劃的錯誤之邏輯。

摘自《熱月的危險》（1933年1月11日），載于《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新生命書局1933年版第134—136頁。

如果撇開集體農莊的貴族不談，那末，普通農民的日常需要，在較大的程度上還是依靠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而不是依靠參加集體農莊。一個農民從個體經營當中所得到的收入，特別是從事技術性工作，如種植果樹或飼養牲畜，往往比在集體經濟中所得到的多兩倍。這個事實已經為蘇聯的報刊本身所證明，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千百萬的勞動力，特別是婦女，在小型經營中完全野蠻地浪費掉了；另一方面，集體農莊的勞動生產率還非常低。

為了提高大規模集體農業的水平，必須再用農民所懂的語言同農民交談——這就是說，恢復市場，從實物稅再回到商業上來——一句話，把過早地送到撒旦那裡去的新經濟政策，再從撒旦那裡請回來。因此，過渡到一種多多少少穩定的貨幣核算，便成了

进一步发展农业的一个必要条件。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8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2—53页。

如果說工业企业“原則上”是社会主义企业，那末，集体农庄还不能这样說。集体农庄所依靠的不是国家，而是集体財产。同分散的个体經濟比較起来，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集体企业是不是会导致社会主义，那还要看一系列的条件，其中有一部分条件是在集体农庄的范围以内，有一部分是在苏維埃制度的一般条件以内，还有一部分——并且是同样大的一部分——則在世界舞台上。

农民和国家之間的斗争还远远沒有結束。目前还很不稳定的农业組織，只不过是两个斗争中的阵营在彼此之間进行了可怕的內战以后的一种暂时的妥协。的确，百分之九十的农庄已經集体化，百分之九十四的农产品是从集体农庄来的。即使考慮到有一定百分比的集体农庄是一种假象，在它們那里基本上是个体农民，但还是必須承认，战胜个体經濟的工作看来至少已經完成了十分之九。然而，农村地区的各种力量和傾向之間的真正斗争，远远不是局限于个体农民和集体农民之間的針鋒相对的对立这样一个范围。

为了安撫农民，国家认为自己不能不向农村的私有的和个体化的傾向作很大的让步，首先是把“永久”使用土地权正式轉交給集体农庄——这就是在实质上废除了土地的社会化。这是一种法律上的假象嗎？从力量对比来看，这种假象有可能成为現實，并且在最近的将来使全国范围的計劃經濟遭到巨大的困难。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国家被迫恢复了个体农民經濟，农民有了自己的小块田地，还有了自己的牛、猪、羊、家禽等等。由于这种违反社会化和限制集体化的做法，农民們才溫順地——虽然还没有多大热

情——同意了在集体农庄中干活，而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他們有机会完成对国家的交售义务，同时也可以使他們自己得到一些东西。这种新的关系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形式，因此即使苏联的統計学家比較誠实，也很难用数字来衡量这种关系。然而，从許多事情看来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結論，即从农民个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小块田地并不比集体农庄不重要。这一点意味着，个体化傾向和集体化傾向之間的斗争还在整个农村居民中进行，同时斗争的結果还没有决定。那末农民們究竟倾向于哪一条道路呢？他們自己还不太清楚。

一九三五年底农业人民委員說，“到目前为止，在完成国家的粮食供应計劃方面，我們遭到了富农分子的猖狂反抗。”換句話說，这一番話意味着，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到最近”（今天的情况又怎样呢？）还认为把粮食交给国家是一件对自己不利的事，他們倾向于搞私营商业。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证明，即国家制訂了严厉的法律来保护集体財产，防止集体化农民自己进行掠夺。很有启发的是，集体农庄向国家保险的財产是二百亿卢布，而集体化农民所保险的私有財产是二百一十亿卢布。如果这种对比不一定意味着分散的农民比集体农庄富足，那末无论如何說明了这一点，即农民在私有財产保险方面比在公共財产保险方面要慎重得多。

从我們的观点看来，同样說明問題的是畜牧业的发展情况。馬的数目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以前是在不斷地减少，只是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年才略有增加；而牛的数目到去年已經增加到四百万头。在一九三五年这个条件有利的年头，养馬計劃只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四，而养牛則大大超过了計劃。这些材料的意义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即馬只能是集体財产，而牛則已經是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可以私有的牲畜。这里只需要补充这样一点，即在草原地区，集体化农民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可以拥

有一匹馬，因此这些地区的馬比集体农庄的馬增加得快，而集体农庄的馬又比国营农場的馬增加得快些。这些情況并不是說，私有小經濟比大規模社会化經濟优越，而是說明从私有小經濟过渡到大規模社会化經濟，从野蛮主义过渡到文明，其中隱藏着許多困难，而这些困难都是不能仅仅用行政压力来克服的。

“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經濟制度以及由此經濟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出租土地虽然是法律所禁止的，实际上却很广泛地流行着，不仅如此，还以最致命的分成制形式流行着。这个集体农庄的土地租給那个集体农庄，有时租給一个外面的人，最后，有时甚至租給本农庄比較有个人事业心的庄員。說来难以相信，国营农場——即“社会主义”企业——居然也出租土地。另外，尤其說明問題的是，干这种事的竟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国营农場！在这个維护法律的高級机关的保护下，国营农場的經理向农民提出的租地条件，几乎完全是从旧地主与临时工訂的契約中抄下来的。我們从这些方面看到了官僚剥削农民的情况，这种官僚已經不再具有国家代理人的性质，而具有半合法地主的性质了。

尽管一点也沒有扩大这种丑恶現象的范围——这种現象当然无法統計——我們还是不能不看到这种現象所具有的巨大的带有征兆性的意义。这种現象明白无誤地证明了，在这个包括絕大多数人口的还极端落后的經濟部門，資产阶级傾向多么强烈。与此同时，尽管所有制关系具有新的結構，市場关系还是不可避免地加强着个体化傾向，加深着农村的社会分化。

平均計算，每个集体农庄的收入大約四千卢布。但是，关于农民的“平均”数字甚至比关于工人的“平均”数字还要具有欺騙性。例如在克里姆林宮，有人汇报說，集体化漁民在一九三五年的收入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一倍，即每人得到一千九百一十九卢布，后面这个数字得到了掌声，这一点說明这个数字大大超过集体化基本

群众的收入。另一方面，有些集体农庄的每户收入高达三万卢布，这还没有把个人经济的货币和实物收入计算在内，也没有把整个企业的实物收入计算在内。总的说来，这些大集体农庄的每个庄员的收入等于“平均”的工人工资和低等集体化农民收入的十倍到十五倍。

**收入的等级只是部分地决定于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勤奋程度。**集体农庄和农民个人的土地，由于气候、土壤和作物类别的不同以及距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远近不同，而必然处于非常不平等的状态。城乡的对立不仅没有在五年计划期间减轻，反而由于城市和新工业区的迅速发展而大大尖锐化。**苏维埃社会的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对立，主要是因为级差地租，不可避免地会在集体农庄之间以及集体农庄内部派生出矛盾。**

官僚的漫无限制的权力，也是促使社会分化的一个同样有力的工具。他们掌握着工资、物价、捐税、预算以及信贷这样一些杠杆。中亚地带有一系列种植棉花的集体农庄，收入很不平衡，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规定的价格不同，而不是由于集体农庄庄员的工作好坏。**某个居民阶层剥削另一个居民阶层的现象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掩盖起来了。**几万个“富裕”集体农庄庄员的幸福是牺牲其他集体农庄庄员和产业工人的利益而得到的。使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员都达到富裕的水平，是一个比牺牲多数人而使少数人拥有特权要困难得多和费时得多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左翼反对派曾宣称，“富农的收入已经增加得比工人的收入多到无法衡量的地步”，这个说法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上层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已经增加得比基本工农群众的收入多到无法估计的程度。目前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别也許比消灭富农以前还要悬殊。**

集体农庄内部的分化，一部分表现在个人的消费上；一部分表现在同集体农庄毗连的个人企业上，这是因为集体农庄本身的基

本財产已經社會化。集体农庄之間的分化已經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后果，因为富有的集体农庄有机会使用更多的肥料和更多的机器，因而可以更快地富足起来。取得成就的集体农庄往往雇用穷苦集体农庄的劳动力，而当局对此閉眼不問。把价值不等的土地分配給集体农庄，这就大大地促进了集体农庄之間的进一步分化，并因而形成一种資產阶级集体农庄，或者叫做“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甚至現在它們还被人这样称呼。

在农民发生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当然可以作为調整者进行干預。但是朝哪个方向做呢？干預到什么限度为止呢？进攻富农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員；这就会同农民当中比較“进步的”阶层发生新的冲突，而这种阶层的农民只是經歷了一段痛苦的停頓以后，現在才开始感到迫不及待地需要一种“幸福的生活”。不仅如此——而这一点还是主要的——国家政权本身变得越来越不能进行社会主义监督了。在农业当中也象在工业当中一样，国家政权設法寻找强有力的、順利的“田間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的支持和友誼，寻找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的支持和友誼。国家政权最初所关心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到最后就只关心自己了。正是在消費与生产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农业中，集体化已經为官僚的寄生主义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并为这种寄生主义同集体农庄的上层集团相互帮助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集体农庄的庄員在克里姆林宮的庄严會議上献給領導人的祝賀性“礼品”，只不过是他們向地方政权代表經常納貢的象征性表現。

由此可见，低生产水平同社会主义的甚至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地发生冲突的情况，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还要严重得多。归根到底，官僚正是从这种矛盾中产生的，而他們反过来又加深了这种矛盾。

同上，第 93—97 頁。

## (十) 关于苏联过渡时期的 阶级和阶级斗争

### 一、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 1. 說“誰战胜誰”的問題要 在长期阶级斗争中解决

說“‘誰战胜誰’的問題要在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文  
化戰線的各个方面长期进行阶级斗争来决定胜負。”

“誰战胜誰”的問題要在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文化戰線的各  
个方面长期进行阶级斗争来决定胜負——这个斗争将最后决定：  
是社会主义发展路綫呢，还是資本主义发展路綫；是按照社会主义  
路綫分配国民收入呢，还是按照資本主义路綫分配国民收入；是单  
一的无产阶级政权呢，还是和新资产阶级平分政权。在一个小农、  
小小农和一般的小有产者占压倒多数的国家里，最重大的事变常  
常是断断續續地和在暗中进行的，只是在最后才“意外地”爆发  
出来。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25頁。

## 2. 談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 期間的基本階級

認為蘇聯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期間的基本階級是工人階級、農民和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為其上層的新資產階級。富農、新資產階級和官僚相結合而且力量日益增長，工人階級和貧農的地位不斷削弱。

說以工業為主導基礎的問題是國內“階級鬥爭的中心問題”。斷言被推翻的階級、新形成的資產階級和官僚中的資產階層只有“通過反革命的顛覆”才能重建私有制。

認為國內的階級路線應當是：“工人和雇農，取得貧農支持，同中農聯盟，反對富農、耐普曼和官僚”。

**革命的社會矛盾就是階級矛盾。我國的基本階級都有哪些呢？一、無產階級，二、農民，三、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為其上層的新資產階級。**

從經濟作用和政治重要性的觀點看來，首要地位應該給予組織成為國家的無產階級，以及提供在我國經濟中占支配地位的農產品的農民。新資產階級的主要作用是作為蘇聯工業和農業之間，以及在蘇聯工業的不同部門和農村經濟的不同範圍之間的中間人。但它並不僅限於成為中間商，新資產階級還起一部分組織生產的作用。

摘譯自《官僚主義和革命》(1923年底)，  
載于《新方針》倫敦1956年版第36頁。

在我党中央机构的政策实际上决定于斯大林集团的这两年<sup>①</sup>的結束之际，我們可以认为已經充分证明了这个集团无力防止：（1）那些企图把我国的发展推上資本主义道路的勢力的无节制增长；（2）在富农、新資产阶级和官僚力量增长的相形之下，工人阶级和貧农地位的削弱；（3）工人国家在和国际資本主义斗争中一般地位的削弱，苏联国际威信的下降。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9頁。

在新經濟政策下，私人資本的作用在工业落后的边疆地区异常迅速地增长着。在这些地区，經濟机关常常把它們的賭注完全押在私人資本家身上。它們确定物价时不考慮貧农和中农群众的实际情况。它們人为地降低雇工的工資。它們无节制地在工业同供給原料的农民之間实行官僚主义的私人中介的办法。它們把合作社导向使乡村富裕阶层得到更多好处的方向。它們忽視特別落后的畜牧业者和半畜牧业者的利益。主要問題——如何实现工业建設計劃，特別是农业原料生产的机械化計劃——完全置諸脑后了。

同上，第64頁。

（6）我們必須坚决地糾正我們在國內的級階路綫。假使战争不可避免，只有严格的布尔什維克政策才能赢得战争，这就是：工人和雇农，取得貧农支持，同中农联盟，反对富农、耐普曼、官僚。

同上，第100頁。

### 三、“經濟命脉、首先是大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基

---

① 指1925—1926年。又，英譯者在此处加注說：“实际上是四年”。这可能是把1924和1927年也包括进去了。——編者注

础。”(中央提綱，第二条)

这是对的。但是党应当知道，这是反对派的論点，而且最初受到中央的激烈抨击。現在中央委員會也理解这一論点了。但是单单承认还是不够的。为了使大工业在事实上成为主导基础，需要有一个加强无产阶级經濟与政治陣地的明确的阶级政策。否則，关于“大工业是主导基础”的論点就会成为空洞无物的大言壮語。关于“主导基础”的問題是无产阶级和貧农与中农結成联盟向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进行阶级斗争的中心問題。中央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政策不是工业是“主导基础”的政策。这既表現在工业一直落后于整个經濟的发展，也表現在，中央沒有下决心着手实行重新分配国民收入(反对耐普曼、富农、官僚主义者)的坚决的阶级政策，以利于更快的工业化。

摘譯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綱》(1927年11月)，載于《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第254号第3版。

提綱的第二个缺点在于起草人忘記了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这就是：在新經濟政策发展的現阶段上，每一个有重大經濟意义的問題，尤其是整个經濟的五年計劃，都是阶级斗争的問題。向那些本来就发了財的人提出“发财吧”的口号，这并不难。这个口号永远会受到城乡新資產阶级代表們的拥护，而且会被他們百分之百地加以实现。延迟了两年多以后，好容易中央委員會在《宣言》和提綱中宣布了压制富农和耐普曼的口号，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认真看待这个口号的話，它是要求改变整个政策，重新配置力量，使所有国家机关有新的方針。这一点必須确切而明显地提出来。要知道，无论富农或者貧农都沒有忘記，中央委員會在两年当中所捍卫的完全是另一种政策。十分明显，提綱起草人所以閉口不談自己过去的方針，是以为改变政策只要发布新的“命令”就够了。可是，要想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新的口号，不克服一

些階級的猛烈反抗和不動員另一些階級的力量是不行的。

近几年來，富农越来越厉害地对农村中的貧农和城市中的國家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国家政权改变它的經濟計劃和打算。

富农、私人工商业者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不仅同国家的、而且同党的官僚制度的許多环节相接合，乃是我們社会生活中最无疑問、同时也是最令人担心的过程。从这里正在产生威胁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萌芽。

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为了认真地压制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特別是为了认真地使富农交納附加稅，首先必須揭露富农、其次必須查清富农所隐瞒的不断增加的收入。

沒有貧雇农本身的积极性，就不可能用适当的办法使貧雇农不受富农的剥削。但是，要使貧雇农能够說出自己的話并且真正帮助压制富农，就必须使他們不再害怕富农。必须使貧雇农在最后不至于說：我揭露了富农，苏維埃政权却抛弃了我；我又和富农面对面了，而現在将不会对我留情了，但是我已經无路可走，到处都是失业。为了避免这一切，必須认真組織农村貧农向富农作阶级斗争。誰不坚决参加这种斗争，不考慮斗争的后果，不制訂斗争的計劃，那末他只是徒然地提出“压制富农”的口号。結果只是爛动性的空話而已。

城市內压制耐普曼的事情也完全一样。近几年來，在城市中·耐普曼的卢布显然对工人的戈比施加了压力。它在住宅問題上、在国家机关內、在市場上、在学校里、在剧院里和其它等等地方，都在施加这种压力。为了扭轉这种情况，仅仅向財政人民委員部的稅收人員发布新的指令是不够的。只有愚蠢的官僚主义者才会认为全部問題仅在这里。如果不在城市內喚起工人的积极性，不在苏維埃中恢复工人民主，不使一切苏維埃机关对工人选民負起真正的（而不是做样子的）責任，那末压制耐普曼是不可想像的。对

于工会，而首先是对党來說，也同样如此。不解决所有这些最重大的阶级斗争問題，要执行稍为令人滿意的經濟五年計劃是不可想像的，但中央委員會的提綱对此不置一詞。

摘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国民經濟五年計劃的反提綱》(1927年11月)，載于《真理报》1927年11月17日第263号第3版。

苏联經濟和政治中的矛盾过程，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展着的。社会政权的性质首先由所有制关系决定。土地国有化，工业生产資料和交換資料的国有化以及国家掌握对外貿易的垄断，是苏联社会制度的基础。为十月革命所剥夺的各阶级，新形成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官僚中的资产阶层，都只有通过反革命的顛复才能重建土地、銀行、工厂、制造厂、铁路等等的私有制。这些所有制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基础，它为我們决定了苏联作为无产阶级國家的性质。

摘譯自《苏联的发展問題》(1931年)，  
紐約1931年版第3頁。

### 3. 斷言新的阶级分化不斷出現

說苏联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倾向在农民、知識分子和无产阶级上层集团中还有力量，城乡差別加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社会差別扩大，官僚阶层和下层人民的生活条件悬殊很大。苏联的工資差別比资本主义国家还大一些，不熟练工人、斯达汉諾夫工作者和专家的实际工資的比例是1:2:15。集体农民把自留地和私养家畜放在首位，产生出一批富裕农民。认为苏維埃社会的实际划分應該是：过着资产阶级生活的高

級官僚、专家等；过着小資产阶级生活的中下层；工人貴族和集体农民貴族；中等工人群众和集体农民；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地变成流氓无产者的下层工人和农民；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妓女，等等。

說新的社会分化不断出現；隨着生产力的发展，資产阶级分配标准实行得越来越彻底，这为資产阶级复辟創造条件。

在工业方面，生产資料的国有制几乎普遍地占着优势。在农业方面，这种所有制只是在国营农場中占着絕對优势，而这种农場在全部耕地中所占的百分比不超过百分之十。在集体农庄中，合作社的或者集体的所有制表現为各种不同比例的国有制和私有制的結合。土地虽然从法律上說是属于国家的，实际上已經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这种情况同集体所有制并沒有什么不同。拖拉机和复杂机器属于国家；較小的設備才属于集体农庄。此外，每个集体农民都經營个体农业經濟。最后，还有 10%以上的农民依然是个体农民。

根据一九三四年的人口調查，全国有 28.1% 的人口是国家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员。产业工人和建筑工人，不包括他們的家属，在一九三五年达七百五十万。集体农庄和手工业合作社的成員，在人口調查的时候，占人口的 45.9%。学生、紅軍的士兵、領养老金者以及其他直接依靠国家的人，共占 3.4%。总起來說，74% 的人口属于“社会主义部分”，而 95.8% 的国家基本資金分配在这 74% 的人口身上。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在一九三四年还占人口的 22.5%，而他們所占有的国家資金只不过比 4% 稍微多一些。

一九三四年以后，沒有再进行人口調查；下次調查将在一九三七年进行。然而，毫无疑问，在过去两年中，私营企业部分已經縮

小得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部分”。根据官方经济学家的估計，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現在大約占人口的10%，即大約一千七百万人。这些人在經濟上的重要性已經大大減小，远不及他們在人数上所拥有的重要性。中央委員會書記安德烈耶夫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宣布說，“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所占的相对比重，在一九三六年应当达到98.5%。这就是說，还有微不足道的1.5%属于非社会主义部分。”乍看起來，这些乐观的数字似乎无可辯駁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已經取得“最后和不可变更的”胜利。但是，誰要是不能看出数字背后的社会現象，那才可悲！

数字本身是有些夸大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集体农庄旁边那些私人小块土地也都算在“社会主义”部分內。然而，这还不是問題的关键。經濟的国有形式和集体形式在統計上所表現的完全无可怀疑的巨大优越性，虽然对将来是重要的，但它们并沒有消除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問題，即資产阶级傾向在“社会主义”部分当中所拥有的力量問題，而这种情况不仅在农业中存在，而且在工业中也存在。目前达到的物质水平已經足以提高人們对各方面的要求，但是，整个說来还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因此，經濟进展的动力必然会不仅在农民和“脑力”劳动的代表当中而且也在无产阶级上层集团中喚醒小資产阶级的欲望。只是把个体农民和集体农民，把个体手工业者和国营工业进行简单的对比，那还一点看不出这种欲望所具有的爆炸性力量；这种欲望可以渗透到整个国家經濟当中，而且一般地來說还会表現为这样一种愿望，即每个人給予社会的越少越好，而取之于社会的越多越好。

**国家在解决賺錢者和消費者的問題方面所花的精力 和智力，并不比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設方面少。这也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部分原因。在国家繼續同这些离心力的分散行动进行斗争的时候，統治集團本身却在变成个人合法和非法积累的主要貯藏所。**

在新法律标准的掩盖之下，小资产阶级倾向当然不容易从统计上加以确定。但是，这种倾向在经济生活当中所占的实际优势首先已为“社会主义的”官僚本身所证明；而官僚这种极端丑恶的内部矛盾重重的集团，这种丑恶的不断发展的社会变态，反过来又成为滋长社会毒害的泉源。

我們将会看到，新宪法的整个基础是把官僚和国家混为一谈，把国家和人民混为一谈。这个新宪法中說，“……国家所有制——即全体人民的所有物。”这种混为一谈的說法是官方学說的詭辯基础。一点不錯，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本人开始——在談到工人国家的时候，是把国家所有制、国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当作同义語来使用的。从广泛的历史范围上說，这种說法并没有什么特別不妥的地方。但是，运用到一个新社会的初期的和还没有得到保证的发展阶段上，而且是运用到一个孤立的和經濟上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上，这种說法就会变成产生根本錯誤和公然欺騙的泉源。

私有制要变成社会所有制，必須經過国有阶段，正好象幼虫要变成蝴蝶，必須經過蛹的阶段一样。但蛹并不是蝴蝶。无数的蛹沒有变成蝴蝶就死了。国家所有制要变成“全体人民”的所有制，只有到社会特权和社会差別消失的时候，到国家也因而沒有必要存在的时候。換句話說，国家所有制轉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程度决定于它本身不再是国家所有制的程度。反过來說也是正确的：苏維埃国家越是高高地站在人民的上面，越是强烈地把自己当做財产的保卫者而把人民当作財产的浪費者，就越是明显地证明它自己是反对这种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我們离彻底廢除阶级还很遙远”，这是官方报刊在談到城乡之間、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間还存在着差別时說出的一句話。这种純粹学院式的承认有这样一种好处，即可以使官僚在“脑力”劳

动这样可尊敬的名义下把自己的收入掩盖起来。“友人們”——这些人是：爱真理，但尤爱柏拉图<sup>①</sup>——也只限于学院式地承认还存在着旧的不平等“残余”。实际上，这些欺騙意味很濃的“残余”完全不足以解释苏联的現實。如果说城乡之間的差別在某些方面已經減輕了的話，那末，在另外一些方面是大大地加深了，这是因为城市和城市文化——也就是城市少数人的舒适——都发展得非常迅速。近年来，虽然从下层来的人使科学干部有所扩大，但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間的社会差別不是縮小了，而是扩大了。千年来在各方面限制着每个人的生活的阶级壁垒——文雅的城市人和粗野的农民，卓越的科学家和临时的小工——不仅沒有把过去保留下來的东西稍微減輕一点，反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重新产生出来，并且还具有越来越严重的性质。

“干部决定一切”这句臭名昭彰的口号典型地說明了苏維埃社会的性质，这种說明比斯大林本人所願意說明的远为坦率。干部就其本质來說代表著統治和指揮的机关。迷信“干部”首先意味着迷信官僚，迷信官吏——技术貴族。苏維埃政权在培养和发展干部方面，也正象在其他事情上一样，还不得不解决先进的資产阶级在他們本国早已解决了的那些問題。但是，由于苏維埃干部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产生出来的，他們便要求一种几乎是神圣的尊敬和一种不断增加的薪金。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干部的发展，資产阶级的不平等也恢复了。

从生产資料的所有权这个观点来看，元帅和女佣之間，托拉斯經理和临时小工之間，人民委員的儿子和无家可归的孩子之間，似乎根本沒有什么差別。虽然如此，可是前者占有堂皇的住宅，在乡

---

① 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曾說过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里把这句名言顛倒过来，意指这些“友人們”并不爱真理。——編者注

下不同的地点有好几处避暑別墅，还有最好的汽車供自己使用，并且早就忘記了怎样擦亮自己的皮鞋。后者則住在往往沒有隔开的木棚里，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他們之所以也不擦自己的皮鞋，只是因为他们是光着脚走路的。在官僚看来，这种差別似乎並不值得注意。然而，在临时小工看来，这却似乎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样看也并不是沒有理由的。

肤浅的“理論家們”当然可以用这样的话来为自己解嘲：財富的分配同財富的生产比較起来，毕竟是次要的因素。然而，交互作用的辩证法在这里还是具有它的全部效力的。国有生产資料的命运，归根到底，决定于个人生活上的那些差別究竟朝哪个方向发展。如果一只船宣布为集体財产，而乘客还是照旧分成头等二等三等，那末，显然对三等乘客來說，生活条件的差別要比所有权在法律上的改变重要得多。另一方面，头等乘客喝着咖啡，吸着雪茄，会提出这样一种想法：集体所有制是最最重要的，一間舒适的艙室則没有什么。从这种情况产生出来的对抗，很可能打破不稳定的集体所有制。

苏联报刊滿意地提到这样一件事：在莫斯科动物园里，記者問一个小孩：“这只象是誰的呢？”回答是：“国家的。”于是这家报刊馬上就得出这样的結論：“这就是說，有极小的一部分也是我的。”然而，如果这只象真被分配起来的話，那末，貴重的象牙会落在最上层的一些人手中，少数人会尝到象的大腿，大多数人則只能胡嚼烂咽象的蹄子和五臟。什么都分不到的孩子們是很难把国有財产和自己的財产合而为一的。至于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只有把国家的东西偷到自己手中的时候才认为是“自己的”。动物园里的那位小“社会主义者”也許是这样一位高級官員的儿子，他已經习惯于从这样一个公式中得出結論，即“朕即国家”。

如果我們用市場上的語言來說明社会主义关系的話，那末，我

們可以把公民当作拥有国家財产的一家公司的股东。如果說財产是属于全体人民的，那就应当假定“股票”是平均分配的，因而所有的“股东”都有权分得一样的紅利。然而，公民参加国家企业，不仅是作为“股东”，而且还要作为生产者。在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也就是在我們已經同意称为社会主义的阶段，劳动的报酬还是按照資产阶级标准来支付的——即按照技术和劳动强度等等来支付的。因此，从理論上說，每个公民的收入应当包括甲和乙两个部分——也就是紅利和工資两个部分。技术越高，工业的組織越完善，甲所占的地位就比乙越大，而个人劳动的差別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就越小。**苏联工資的差別不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小些，而是还要大些**，从这个事实必須得出这样的結論，即苏联公民所持有的股票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在他們的收入中，紅利和工資也不是一样的。不熟练的工人只能得到乙，这是在类似的条件下在資本主义企业中也可以得到的最低收入；斯达汉諾夫工作者或者官僚則可以得到 $2\text{甲} + \text{乙}$ ，或者 $3\text{甲} + \text{乙}$ ，等等，而这里的乙还可以变成 $2\text{乙}$ 、 $3\text{乙}$ ，等等。換句話說，收入的差別不仅决定于个人生产率的不同，而且还决定于隐蔽地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多少。拥有特权的少数股东是靠牺牲被剝夺了权利的多数股东的利益生活的。

如果你认为苏联的不熟练工人可以比在类似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下的資本主义企业收入多些——这就是說，他是一個小股東——那末，必須认为他的工資等于 $\text{甲} + \text{乙}$ 。工种較高的工資将表現为这样的公式： $3\text{甲} + 2\text{乙}$ ， $10\text{甲} + 15\text{乙}$ ，等等。这种情况意味着，不熟练工人只有一股，斯达汉諾夫工作者有三股，专家則有十股。不仅如此。他們的实际工資的比例是 $1:2:15$ 。在这种情况下，对神圣的社会主义財产的贊美，在經理或者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看来是很有說服力的，在普通工人或者集体农庄庄員看来則沒有什么令人信服的地方。然而，普通工人占社会的絕大多数。社会主

义所关心的正是这些工人，而不是那些新貴族。

“我国的工人不是工資奴隶，不是称之为劳动力的商品的出售者。他是一个自由的工人。”（《真理报》）在目前这个时期，这个漂亮的公式还不容許加以夸大。工厂轉到国家手中，只是从法律上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实际上，他还不得不在匱乏中生活，不得不为一定的工資干一定時間的活。工人从前对党和工会所抱的那些希望，在革命以后轉而寄托在自己所創造的国家身上了。但是，这种工具的有用职能却受到技术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为了提高这种水平，新的国家便用老一套办法来压制工人的筋肉和神經。一批鞭策奴隶的人已經成长起来。工业的管理工作变成超官僚主义式的了。工人对工厂的管理已經完全不能发生影响。在实行計件工資、物质生活条件艰苦、不能自由行动以及恐怖的警察压制深入到每个工厂的生活当中的情况下，的确很难让工人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工人”。他只能从官僚中看到他的經理，从国家方面看到他的雇主。自由劳动同官僚国家是不能并存的。

把上面說的話加以必要的改变，也同样地适用于农村。按照官方的理論，集体农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特殊形式。《真理报》写道，集体农庄“从本质上說已經和国营企业属于同样的类型，因此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它又立即补充說：农业社会主义发展的保证在于“布尔什維克党管理集体农庄”这样一个条件。这就是說，《真理报》告訴我們，这个問題已經从經濟方面轉到政治方面。这一点实质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关系還沒有在人与人的实际关系当中体现出来，而只是存在于当局仁慈的心中。如果工人們认真注意那顆心的話，那就很好了。实际上，集体农庄还站在个体經濟和国有經濟的当中，庄員經營的私有小块土地或者其他个人經濟的迅速发展，对于集体农庄內部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尽管个人耕种的土地只有四百万公頃，同集体农庄耕种的一亿零八百万公頃土地比較起来还不到百分之四，但是，由于这片土地精耕細作，特別是經營了菜园，結果它可以供給农民家庭最重要的消費品。大部分牛、羊和猪都是集体农民的財产，而不是集体农庄的財产。农民往往把自己的輔助性田地摆在主要地位，而让无利可图的集体农庄居于第二位。另一方面，劳动日報酬高的集体农庄正在不断地提高社会水平，产生一种富裕农民。离心傾向不仅还没有消失，相反，正在日益加强。无论如何，集体农庄到現在为止只是改变了农村中經濟关系的法律形式——特別是收入的分配方法——而旧茅草房子和菜园、仓库的杂活以及农民的整个繁重劳动，则几乎沒有什么改变。这些集体农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以过去的态度对待国家。国家的确不再为地主或者資产阶级服务，但是，它为了城市的利益从农村中拿走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供养的貪婪的官僚也太多了。

由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要进行人口調查，关于社会的分类已經拟出这样一张单子来：工人；职员；集体农民；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教士；其他非劳动人民。根据官方的解释，这个人口調查表之所以沒有包括任何其他社会特点，只是因为苏联已經沒有阶级。实际上，設計这个表格的直接意图是掩盖拥有特权的上层和被剥夺了权利的下层。苏維埃社会的实际划分是應該而且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一次誠实的人口調查而表現出来的，这种划分如下：过着資产阶级生活的高級官僚、专家等；过着小資产阶级生活的中下层；生活水平差不多的工人和集体农庄的貴族；中間的工人群众；中間的集体农民；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斷地变成流氓无产者的下层工人和农民；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妓女，等等。

新宪法宣称，“废除人对人的剥削”在苏联已經完成，这不是說

实話。新的社会分化已經創造条件，使人对人的剥削以最野蛮的形式复活，即又开始买卖人口来做个人的奴隶。在新的人口調查表上，个人的佣人根本沒有提到。这些人显然都列在一般的“工人”类当中了。然而，这样做有很多問題：社会主义公民有沒有佣人呢？有多少呢（如女仆、厨子、保姆、女管家、司机）？社会主义公民是否有汽車供自己使用呢？他占有多少房間呢？等等。这种表格竟只字不提收入的等級！如果剥削他人劳动者沒有政治权利这一条法律恢复的話，那就会有些出乎意料地出現这样的情况：統治集团的核心不在苏联宪法的保护范围以内。幸好他們已經为佣人和主人……建立了完全平等的权利！两种相反的傾向正在从苏維埃制度的深处滋长起来。与日益衰落的資本主义相反，苏維埃制度在发展生产力，这样它就正在准备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另一方面，为了上层的利益，它把資产阶级分配标准实行得越来越彻底，这样它就又在准备資本主义复辟。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标准之間的这种对立是不能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的。或者是資产阶级标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扩大到生产資料方面去，或者是使分配标准适应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体系。

官僚是怕暴露这种选择的。他們随时随地——在报刊上，在演說中，在統計中，在文学家的小說中，在詩人的詩篇中，最后在新宪法的条文中——都絞尽脑汁用社会主义字典中的抽象名詞来掩飾城市和农村的实际关系。这就說明了为什么官方的意識形态是那样的沒有生气、无能和虛伪。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1—179頁。

## 二、工 人

### 1. 宣传应当不断改善工人的生活

声称“工人阶级各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是估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情况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估计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发展的情况时，决定性的因素应当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优势——加上工人阶级各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改善在物质方面（产业工人就业的数目，实际工资的提高，工人预算的性质，居住条件，医药治疗等等）、在政治方面（党，工会，苏维埃，共青团）、最后在文化方面（学校，书籍，报纸，剧场）都应该是很明显的。企图把工人根本的具体利益放在不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个诬蔑性的借口之下把工人的根本的具体利益同工人阶级的总的历史利益对立起来，这种企图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2—33页。

### 2. 造谣工人生活水平显著下降

宣传“工人的生活水准明显地下降”，非熟练工人、季节工人、女工和青工下降尤甚，工人住房面积在社会各阶层中“居末位”，“失业打击着无产阶级的基本队伍”，从而断言工人所创造的一大部分剩余价值已被官僚和资产阶

級所盜取。

說雇农的工錢往往低于国家規定的最低标准，污蔑这是党执行“錯誤方針的后果”，“这种方針在实践上、在事实上、在生活中主要注意的是农村的上层，而不是下层”。

工人国家占有剩余价值当然不是剥削。但是首先，我們的工人国家是一个有官僚主义偏差的工人国家。庞大臃肿而享有特权的行政管理机构吞掉了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其次，日益成长的资产阶级用貿易和在不正常的差价上投机的手段，盜取了国营工业所創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3頁。

到一九二五年秋季为止，我們的經濟恢复时期使工資有了充分迅速的提高。但是从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实际工資大为降低的情况直到一九二七年初才被扭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会計年度的头两个季度，大工业中的每月平均工資以莫斯科卢布計算，分别为三十卢布六十七戈比和三十卢布三十三戈比；而一九二五年秋季为二十九卢布六十八戈比。第三季度——按照初步估計——为三十一卢布六十二戈比。因此今年的实际工資沒有变动，大致在一九二五年秋季的水平。

当然，特殊部类和特殊地区——首先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人的工資和一般物质水平无疑是高于这个平均水平的。但是另一方面，其他广大工人阶层的物质水平却大大低于这些平均数字。

而且，所有的資料都证明工資的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强度加强了，而恶劣的劳动条件仍然未变。

工資的提高越来越以要求加强劳动强度为条件。这种新趋势

是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相容的，而中央委员会在其著名的关于合理化的決議<sup>①</sup>中加强了这种趋势。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项決議。这种政策意味着，由于发展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增加的社会财富本身并不导致工资的增加。

工人数目的微小增长意味着每一个家庭中劳动成员的数目的降低。以实际卢布計算，从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以来，工人家庭的开支预算降低了。住房費用的增高迫使工人把他的一部分住房出租。失业者直接或間接地加重了工人預算的負担。迅速增加的酒类消費加重了他的預算負担。从总数可以看到工人的生活水准明显地下降了。除非在实行生产合理化的同时，把工业和交通扩大到足以吸收被解雇的工人，否则現在推行的生产合理化必将使得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实际上，“合理化”的結果常常是把一些工人“赶出去”，并且降低其余工人的物质条件。这必然使得工人群众对合理化本身充满不信任。

在劳动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常常是工人中最弱的部分最倒霉，这就是：非熟练工人，季节工人，女工，青工。

一九二六年，几乎在工业的所有部門中，女工的工资同男工相比較有了明显的下降。在三个工业部門的非熟练工人中，女工一九二六年三月的收入分別为男工收入的 51.8%，61.7% 和 83%。在泥炭工业和装卸工作等方面，一直沒有实行改善女工工作条件的必要措施。青工的平均收入和所有工人的收入相比較是在不断地下降。一九二三年为 47.1%，一九二四年为 45%，一九二五年为 43.4%，一九二六年为 40.5%，一九二七年为 39.5%<sup>②</sup>。

一九二六年三月，49.5% 的青工收入少于二十卢布<sup>③</sup>。規定在

① 《眞理报》，1927 年 3 月 25 日。——托洛茨基注

② 1924—1925 年和 1925—1926 年青年經濟状况調查。——托洛茨基注

③ 中央劳动統計局。——托洛茨基注

每一工业单位的一定数目的工人中要雇用一定数目的青工的条例被取消了，这对青年工人和工人家庭是沉重的打击。青工的失业数字正在大大地增加。

同上，第 34—35 頁。

工人通常的居住面积向来大大低于整个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积。大工业城市的工人在这方面是居民中受惠最少的。在所調查的一系列城市中，各社会阶层在居住面积分配上的情形如下：

产业工人，每人五点六平方米；职员，每人六点九平方米；自由职业者，每人十点九平方米；非工人成分，每人七点一平方米。**工人居末位。而且，工人的居住面积正在一年一年地縮小，而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居住面积却在扩大。**

同上，第 36 頁。

**工业化发展迟緩的情形在其他任何方面都不如在失业問題上表現得那样可怕，失业打击着工业无产阶级的基本队伍。**一九二七年四月失业登記的官方数字是一百四十七万八千<sup>①</sup>。失业的实际人数大約为二百万。失业人数的增长比起就业工人总数来快得无可比拟。按照国家計劃委員会所制定的五年計劃，我国工业在整个五年期間将吸收四十万稍多一点的固定就业工人。这意味着，加上不断从农村流入的工人，到一九三一年底时失业人数将增加到三百万人。**这种情勢将引起的后果是，无家可归的儿童、乞丐和妓女的增多。**付給失业者的少量失业保险金引起了人們正当的不满。救济金的平均数为十一点九卢布——約等于战前五卢布。工会救济金的平均数为六点五到七卢布——而且在失业的工会會員

---

① 《劳动报》，1927 年 8 月 27 日。——托洛茨基注

中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可以領到这种救济金。

同上，第 36—37 頁。

三十四、农村从事雇佣劳动的人总数为三百五十万，其中男女雇农为一百六十万。只有 20% 的雇农参加了工会。对于往往是奴役性的雇佣合同，未必进行了登记。雇农的工资往往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而且常常国营农場也不例外。实际工资平均不高于战前的 63%。工作日很少少于十小时，而且大多数实际上是沒有限制的。工资的发放不正常，发得很迟。雇农极其困苦的状况不仅是落后的农民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設的困难的結果，而且毫无疑问也是錯誤方針的后果，这种方針在实践上、在事实上、在生活中主要注意的是农村的上层，而不是下层。必須全面系統地保卫雇农的利益，不仅防止富农、而且也防止所謂殷实的中农的侵犯。

摘譯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 反提綱》(1927年 11 月)，載于《真理报》1927 年 11 月 5 日第 254 号第 4 版。

### 3. 声称无产阶级内部分化，出現工人貴族

說无产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在工资的不平等方面，苏联已經不仅赶上而且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工人或工人貴族每月收入达一两千卢布以上，而下层工人的收入还不到一百卢布；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的实际所得往往等于下层工人的二三十倍；专家的薪水往往等于八十到一百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声称“在无产阶级的底层，正在形成一个被遗弃的苏維埃貧民层”。

每个人的“平均”工資，連托拉斯的經理和女佣都包括在內，一九三五年大約是两千三百卢布，一九三六年将达两千五百卢布左右——即票面价值达七千五百法国法郎，虽然实际购买力很难超过三千五百到四千法郎。这个数字本身就很不高，而如果考虑到一九三六年的增加工資，是为了部分地补偿由于取消消費品的特价和取消一系列的免費服务而遭到的損失，那末，这个数字就更加微小了。但是，主要的还是，每年两千五百卢布，即每月两百零八卢布，正如我們所說的，是平均工資——即一种算术上的假象，这种假象的职能在于掩飾工資的真正悲慘的不平等。

毫无疑问，上层工人的情况，特別是所謂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的情况，去年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报刊不是沒有根据地那样热中于列举这个或那个得奖的工人自己买了多少衣服、鞋子、留声机、自行車或者多少瓶糖果。附带說一句，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普通工人得到这些好处的机会是多么微乎其微。斯大林在談到斯达汉諾夫运动的推动力的时候宣称，“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順利了。”在对計件工資制——这一点可以說明統治阶层的最大特色——所作的这种乐观的說明中，包含着这样一个平凡的真理，即工人貴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完全是由于国家以前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但是，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的动力并不是来自“愉快”的情緒，而是来自那种想得到更多的錢的欲望。莫洛托夫用这样的話糾正了斯大林的說法：“斯达汉諾夫工作者提高生产率的直接动机，就是对增加收入感到兴趣。”这句话一点也不錯。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一个工人阶层出現了，他們被称为“千字号人物”，因为他們每月的收入已經超过一千卢布。还有些人每月的收入甚至在两千卢布以上，而低等工人的收入往往还不到一百卢布。

看来好象只靠这种工資的差別就可以使“富”工人与“不富”工

人之間有足够的區別。但是对官僚來說，这一点还不够。他們把各种各样的特权几乎象下驟雨般地給予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給他們新住宅或者給他們修繕旧房子，优先把他們送到休养所或者疗养院去，派教师和医生到他們的家里去免費教授和治病，給他們发免費的电影票。在某些地方，他們还可以免費理发和修面，并且可以随到隨理。在这些特权中，好象有許多是故意用来伤害和侮辱一般工人的。当局方面之所以有这样过分的善意，除了权位观念以外，还由于他們良心上感到不安。地方上的統治集团，都急于抓住机会让上层工人同他們共享特权，以免自己陷于孤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的实际所得往往等于下层工人的二三十倍。至于那些特別幸运的专家，他們的薪水在許多情况下可以支付八十个到一百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資。在工資的不平等方面，苏联已經不仅赶上而且远远超过了資本主义国家！**

那些最优秀的真正为社会主义动机所推动的斯达汉諾夫工作者，对于自己得到的特权并不感到愉快，而是感到煩恼。这是不奇怪的。他們是在普遍貧困的情况下享受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因此周围充滿了嫉妒和恶意，这就使他們受到了損害。这种关系同社会主义道德的距离，比資本主义工厂的工人关系同这种道德的距离还要远得多，因为資本主义工厂的工人还能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剝削的斗争。

尽管如此，在日常生活方面，甚至熟练工人也是不好过的，在各个省里尤其如此。七小时工作日在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越来越受到損害，不仅如此，还要花費不少时间来另外設法补助生活。他們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來說明国营农場比較好的工人所过的特別幸福的生活，即拖拉机手、联合收割机手等等——这些人都是已經臭名远揚的貴族——都有自己的乳牛和猪。沒有牛奶的社会主义比沒有社会主义的牛奶好这样一种理論已經抛弃了。現在承认的

是，在既不缺牛也不缺猪的国营农业企业中，工人們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得到保障而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小經濟。同样显著的一件事是，官僚洋洋得意地宣称，哈尔科夫有九万六千名工人有自己的菜园——其他城市也都被要求同哈尔科夫竞争。在“自己的乳牛”和“自己的菜园”这些字眼里，包含着多么可怕的人力浪费！官僚加在工人身上的，特别是加在工人的妻子儿女身上的，又是怎样一种中世纪式的掏粪挖土的重担！

至于基本群众，当然既没有乳牛也没有菜园，大部分甚至没有自己的住宅。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每年是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卢布，甚至还要少些——这种情况在苏联的物价下就意味着一种贫困。作为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最可靠的标志的生活条件是极其恶劣的，常常是无法忍受的。绝大多数工人挤在公共宿舍里，其设备和维修比营房还要差得多。在有必要为工业部门遭到的失败、工人装病怠工和出产次品等现象辩解的时候，管理机关本身也会通过新闻记者的笔描绘出这样的生活状况来：“工人們睡在地板上，因为床上的臭虫咬得他們睡不着。椅子坏了；沒有喝水用的杯子，等等。”“两家人住在一間房子里。房頂是漏的。下雨的时候，他們就把屋內的雨水一桶一桶地倒出去。”“厕所髒得熏死人。”这种描述同全国各地都有联系，而且想写多少就可以写多少。由于这种不堪忍受的条件，例如石油工业的领导人就写道，“劳动力的流动性已經达到最高点。……由于沒有工人，很多油井完全废弃了。”在条件特別不利的某些地区，只有在其他地方由于各种各样的违反纪律行为而被开除或解雇的人，才願意来干活。因此，在无产阶级的底层，正在形成一个被遗弃的苏维埃贫民层，他們沒有权利，可是象石油生产这样重要的工业部门还不能不使用他們。

由于这种悬殊的工资差别，再加上专横的特权，官僚便在无产阶级当中制造了尖锐的矛盾。斯达汉諾夫运动的材料有时就呈现

出一幅小規模內戰的圖景。例如工會的機關報就寫道，“損壞和破壞機器是反對斯達漢諾夫運動的鬥爭所喜歡使用的（！）辦法。”接着又說，“階級鬥爭在每一個步驟當中都可以感觉得到。”在這個“階級”鬥爭中，工人站在一邊，工會站在另一邊。斯大林曾經公開建議，向那些反抗的人“直接開火”。中央委員會的其他委員也不止一次地進行威脅，要把“蠻橫的敵人”從地球上清除干淨。斯達漢諾夫運動的經驗特別清楚地表明，當局和無產階級之間存在著深刻的裂痕，官僚在運用“分而治之”這個的確並不是他們發明的格言時非常堅決。不仅如此，為了安慰工人，這種強制性的計件勞動被稱作“社會主義競賽”。這個名稱聽起來就象一種嘲弄！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89—92頁。

### 三、農 民

#### 1. 說農村在進行着日益尖銳的階級鬥爭

宣稱或者是無產階級國家克服小農經濟的落後性並把它們組織起來，或者是農村的資本主義勢力破壞“城市里的社會主義基礎”。指責聯共中央“在農業生產力增長的後面沒有看到日益增長和尖銳的階級矛盾”。

“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发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sup>①</sup> 或者是無產階級國家依靠工業的高度發展

① 《列寧全集》第31卷第6頁。——編者注

**和电气化去克服千百万的小企业技术上的落后性，并且在集中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把它們組織起来；或者是資本主义在农村积蓄力量，破坏城市里的社会主义基础。**

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农民——这是指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基本农民群众——是同盟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都依靠同它之間的正确联盟。关于农民問題，列宁在下面的話里早已正确地規定了我們現阶段的任务：“善于同中农达成協議，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貧农。”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2—43頁。

**二、反对派看到并考虑到由于十月革命而发生的一切重大变化。无产阶级专政，工业、运输业、信貸業的国有化，商业的社会化，对外貿易的垄断，合作社——这一切为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創造了可能。这个建設已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反对派反对粉飾現實，反对掩盖在我国特別严重的危险。**

粉飾現實必然会引起机会主义的錯誤。中央的提綱說：

“資本主义社会中工业的发展是以形成一种使基本中农群众破产、使他們由于无产阶级化而解体的國內市場为基础的。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國內市場形成过程是和資本主义条件下的國內市場形成过程根本不同的。这里市場的发展不是依靠基本农民群众的貧困化和无产化，而是依靠中农和貧农福利的增长。”(中央的提綱，第一条)<sup>①</sup>

后来中央不得不承认，富农的“福利”也在增长。这就是說，貧农、中农及富农的“福利”都在增长！这番田园风光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并不存在。农村中阶级斗争正在农业发展的条件下展开。

<sup>①</sup> 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決議汇編》，中文版第3分冊第396頁。——編者注

**同时农村在无产化，无力播种的农戶在增多。中央委員會在农业生产力增长的后面沒有看到日益增长和尖銳的阶级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下，在沒有阶级和农业根据大規模公有生产的原则組織起来时，才能談到全体居民群众福利的同样增长。由列宁起草的党綱对問題就是这样提的，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政綱对問題就是这样提的。**

摘譯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綱》（1927年11月），載于《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第254号第3版。

## **2. 指責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在 农民問題上修正列宁主义**

指責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在农民問題上对列宁主义作了八点修正：放弃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強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沿着集体化道路改造农业”这一基本原理；对貧雇农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社会基础这一点估計不足；把农业經濟的希望寄托在富农身上；“否认农民所有制和农民經濟的小資產阶级性质”；低估资本主义成分在农村中的发展并掩飾农民的阶级分化；认为富农总是无路可走的；“让富裕农民和富农發揮他們的經濟潛力”；“企图把列宁的合作社計劃同他的电气化計劃对立起来”。新資產阶级的代表利用这些修正主义傾向，“公然企图把农村政策扭轉到资本主义軌道上去”。

**在农民問題上，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正在修正列宁，他們修正的主要方面可以概括为以下八点：**

**（1）放弃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則，即：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

业才能帮助农民沿着集体化道路改造农业。

(2)对于雇农和贫农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地区的社会基础这个問題，估計不足。

(3)把我們农业經濟的希望寄托在所謂“力量强的”农民身上——这在实质上即是富农。

(4)忽視或公然否认农民所有制和农民經濟的小資產阶级性质。这是离开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轉向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說。

(5)低估資本主义成分目前在农村中的发展，并且掩飾农民中正在发生的阶级分化。

(6)創造了一种起瓦解作用的学說，大意是：“富农和富农組織反正是无路可走的，因为我国总的发展范围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所早就規定了的”<sup>①</sup>。

(7)鼓励“富农合作社的核心长入我們的制度里来”<sup>②</sup>。“这个問題可以表述为，必須让富裕农民和富农發揮他們的經濟潛力”<sup>③</sup>。

(8)企图把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同他的电气化計劃对立起来。按照列寧自己的意見，只有把这两个計劃結合起来才能保证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資產阶级的代表利用官方集团这些修正主义的傾向，已經同我們国家机关的某些环节勾結起来，他們正公然企图把我們在农村中的全部政策轉到資本主义的轨道上去。并且，附帶說一下，富农和富农思想的辩护人把他們的野心用关心生产力的发展、关心“一般的”商品产量的增长等等托詞掩盖起来。事实上，富农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农的商品生产的增长正在压制和阻碍着所有其

---

① 布哈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第49頁。——托洛茨基注

② 同上，第49頁。——托洛茨基注

③ 《真理报》，1925年4月24日。——托洛茨基注

他农民經濟生产力的发展。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3—44頁。

五、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农民、即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基本农民群众是一个重要的同盟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也就是說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和他們的正确关系。列宁用下面的話最确切地表述了現阶段我們在农民方面的任务：“善于同中农达成協議，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貧农。”(《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564頁①)反对派也正是这样看待工农关系問題的。

六、一九二五年党内形成了另一个修正主义思潮。最初否认富农的存在。

“富农是吓唬人的东西，是旧世界的幻影。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甚至不是一个集团，甚至也不是一小撮了。这是已在垂死的东西。”(波古舍夫斯基，載《布尔什維克》，第九——十期〔第63頁〕)。

后来制造出一种麻醉人心的理論，說富农在很好地长入社会主义。“富农和富农团体反正是无路可走的，因为在我国总的发展范围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所早就規定了的。”(布哈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49頁)

“我們給他(富农)帮助，而他也給我們帮助。到头来，也許富农的孙子还会因为我們这样对待他而向我們說声謝謝。”(尼·布哈林，載《布尔什維克》，一九二五年第8期)。

关于富农的这些“甜蜜蜜的謊言”(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資产阶级的謊言)和列宁学說的基础公然矛盾，因而娜·克魯普斯卡婭

---

① 《列寧全集》第28卷第173頁。——編者注

同志早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就不得不就布哈林的理論寫道：

“布哈林同志在另外一點上也是不正確的。他說，他不是農村階級鬥爭的擁護者。不管是不擁護者，但農村中階級鬥爭正在進行，不能不進行。”

我們看到，列寧對布哈林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使富農、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甜蜜化的言論作了一針見血的反擊：

“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並沒有終止，相反地，這種鬥爭會變得更廣泛、更尖銳和更殘酷。”（《關於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基本任務的提綱》，《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234頁）<sup>①</sup>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農民問題的決議中寫了下面一段話：

“大農是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企業主，他們通常在經營業務時都雇有幾個僱佣工人，他們所以同‘農民’有關，只是因為文化水平不高，生活習慣相同，親自參加自己農場的體力工作。這是直接地堅決地與革命無產階級為敵的那些資產階級階層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層。在農村工作中，共產黨應該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同這個階層進行的鬥爭上，把農村居民中被剝削的勞動者多數從這些剝削者的思想和政治影響下解放出來，等等。”<sup>②</sup>

列寧寫道：

“以前歐洲的革命都是這樣：由於工人軟弱，富農使共和制退到了君主制，使劳动人民的政權退到了剝削者、富人、寄生蟲的專政……富農可以而且不難同地主、沙皇、神甫講和，即使他們互相爭吵過，但是永遠不會同工人階級講和。……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上，他們屢次恢復過地主、皇帝、神父、資本家的政權。”（《工人同志

① 《列寧全集》第31卷第166頁。——編者注

② 參看《列寧全集》第31卷第136頁，全集無着重號。——編者注

們！大家都来进行最后一次决战！」，列寧研究院出版，第1—2頁)<sup>①</sup>

誰不了解这点，誰相信“富农长入社会主义”，他就只能使革命陷入困境。

### 七、然后又在农业中指靠所謂殷实的农民，即实质上指靠富农。

“我們对农村的政策应当朝下列方向发展，以放松和取消許多妨碍富裕农民的和富农的經濟增长的限制。应当对农民、对全体农民說：发财吧，发展自己的經濟吧，不要担心你們会受到压制”<sup>②</sup>，这是布哈林同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會議之前說的。

这一个从法国資产阶级那里套来的而布哈林仿佛已經抛弃了的口号，又由中央委員什尔卓夫在一九二七年西伯利亚边区代表會議上再一次提出来了：“在大好时光积累吧！”

这是重复烏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口号，即重复新資产阶级的口号，新資产阶级幻想依靠富农和耐普曼，依靠他們在經濟上的发展，以便首先在經濟上、然后在政治上向工人政权坚决进攻。

过了两年，布哈林同志現在若无其事地突然宣传，应当“現在轉而压制富农及一般資产阶级分子。這是我們应当实行的轉变，而且我們应当根据这个轉变的精神来进行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同一位布哈林同志現在写道：“应当轉入对資本主义分子、首先是對富农更为加紧的进攻。”（布哈林《关于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报告）

这就是某些无原則的政治家变来变去的典型！

但这也是說明，反对派并沒有徒然地进行斗争，既然它甚至能够在代表大会之前从布哈林那儿逼出这样言論来那它就是对的。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7—38頁，全集无着重号。——編者注

② 見《真理报》1925年4月24日第92号第5版。——托洛茨基注

为什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被宣布为在富农面前“惊慌失措”和“掠夺农民”的东西，现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却被宣布是正确的？布哈林写道，“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来了个大规模的随机应变。我们解除了中农的许多羁绊，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农实行让步，使富农能够‘转动’”（布哈林：《关于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报告）。

来了个随机应变！列宁有一次写道：“如果按照布哈林那样随机应变，就会把很好的革命断送掉。”（《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145页①）现在不禁令人想起列宁的这些话。布哈林用随机应变的话徒然地企图掩盖这样的事实：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委员会在农村问题上的政策不是列宁主义的政策，在反对派批评的影响下，现在不得不急剧地改变。最后，中央实行跟富农斗争的急剧转变（暂时还是口头上的）向党的政策的现在领导人提出下列问题。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仍然有效。可是老实说那为什么要向这些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富农宣战呢？或者宣布新方针的事实本身说明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但是那就应当直截了当地宣布这一点。

## 八、朝富农磕头的必然后果是脱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社会支柱的雇农和贫农。

中央书记之一柯秀尔同志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这样說：“难道你们不知道，在贫农当中有一定比例的根本就无所事事、简直可以称为懒汉的人？这些懒汉叫喊得最响，说我们执行富农的政策。”（速记记录，第313页）

资产阶级教授乌斯特里亚洛夫为此曾夸奖柯秀尔說：“由一位做地方实际工作的人員嘴里说出的这个神圣的真理是很不合反对

---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3页。——编者注

派官員們的口味的。”（烏斯特里亞洛夫教授的文章：《第十四次代表大會》）

加里寧同志說：“經營自然經濟的農村中的貧農是不幸的、生產中的殘廢者”。（《論農村》，改善學生生活委員會出版社 1925 年版第 61 頁）。

人民農業委員斯米尔諾夫寫道：“我們現代的農村痛恨富農，同樣也看不起懶漢。對於例如在農忙時不和大家一樣勞動，而是像通常所說的‘垂釣河邊’或‘到森林裏采蘑菇’的‘當家人’，勤勞的農家也只能如此對待……蘇維埃政權和這樣的‘貧農’當然是不能走一條路的。”（《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政策》，國家出版局一九二五年版第 42 頁）

“說無產階級現在在農村中的主要支柱是貧農，這是老生常談，這象一個無能的小學生按照從哪裏聽來的公式做一切事。說共產黨在農村中的主要支柱是貧農，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如果說只有貧農可能是蘇維埃政權的主要支柱，蘇維埃政權仅仅依靠貧農就能夠維持政權，這是否對呢？……在沒有戰爭、沒有人對我們進攻的和平時期，我們可以維持住政權，但是那時我們就是沒有貧農也可以維持政權……且舉徵收農民參軍為例：貧農中無文化、能力差的最多，而參軍的是最強的、最高的……最後，誰在軍隊中起作用？在體力上比較強的、比較發展的……而你們怎麼能指望，在戰爭時期、在國家真正危險時期能夠仅仅指靠貧農……”（加里寧在一九二七年春特維爾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貧農還有依賴心理，他們指靠國家政治保卫局，指靠領導，隨便什麼都指靠，只是不指靠自己，不指靠自己的力量。這種消極情緒和依賴心理應該從貧農意識中清除出去。”（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sup>①</sup>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275 頁。——編者注

上述中央委員會最有名的領導人的言論离开列寧關於貧農的言論之遠，猶如社會革命黨人的思想离开馬克思主義一樣。這不是無產階級對貧農的估價，而是富農的估價，是从小业主的观点作出的估價。

只有富农、小业主、小资产者在观察必然会日益削弱贫农经济的贫农无产者化的过程时，才会說这些贫农是“懒汉”、“靠别人养活的”等等。

**九、在關於农民所有制和农民經濟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問題上，也表現出离开馬克思主義立場走向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論。**

斯大林同志在談到西方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时写道：“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資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許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論列寧主义基础》）<sup>①</sup>

“农民按其地位來說是非社会主义性的。但是，他們应当走上而且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农民免于貧困和破产的道路。”（斯大林：《論列寧主义的几个問題》，第 56 頁）<sup>②</sup>

說这些話而只字不提农村阶级斗争和向富农作坚决斗争的必要性的人，就簡直是重弹机会主义者和小资产者、社会革命党人的老調。而这还作为列寧主义呈献給党！事实上这仅是粉飾富农、掩盖他們把农村扭轉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企图的政策。这是以虔誠的願望来掩盖和粉飾我国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因素。难怪乎《舵报》的立宪民主党人在讀了布哈林和斯大林关于富农的言論后写道：

“严格地說，社会革命党人現在有权安心地束手以待：时间和

① 《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119 頁，全集无着重号。——編者注

② 同上，第 8 卷第 79 頁，全集无着重号。——編者注

蘇維埃政权本身在为他們效劳。”(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社論)

十、离开馬克思主義关于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在集体化的原則下改造农业这一个基本原理，乃是修正主义。有人企图把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和列寧的电气化計劃对立起来。事实上列寧本人认为合作社不是取消、也不是代替电气化計劃，而是对电气化計劃的补充。

請看布哈林說的話：

“當我們轉而采取新經濟政策的时候，对于解决这个問題列寧同志曾有一个战略計劃，而当他写論合作制的文章，即給我們留在經濟政策原理方面的最后遺囑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战略計劃。”(《布尔什維克》，一九二五年第八期)中央的提綱对布哈林关于列寧彷彿曾有两个战略計劃的臆想也表示支持(第十一条)。

对列寧思想的这种歪曲与指靠“殷实的中农”的方針、与关于反对派有“超工业化傾向”的叫喊声完全吻合，并且是向小资产阶级对党的压力作直接的让步。把“合作社計劃”和电气化計劃对立，也就是否认大工业在經濟中和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主导”作用。

“增加財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沒有資本主义的大工厂，沒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談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來說就更談不上社会主义了；我們在俄国，对于这一点比以前知道得具体得多了，我們現在所談的已經不是模糊的或抽象的恢复大工业的方式，而是确定的、精确計算出的、具体的电气化計劃。”(《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分册第 260 頁)<sup>①</sup>

中央在反对派批評的压力下被迫退却，企图以对反对派的攻

---

① 《列寧全集》第 32 卷第 399 頁。——編者注

击作廉价的报复：

“应当指出，反对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相信能够通过合作社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这是放弃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从而也是反对派直接背离了列宁主义。这种背离是反对派否认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总的取消主义方针的必然结果。”

只要看一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政纲，就会相信这种论断是荒谬的。由于企图把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有不经过内部阶级斗争长入社会主义的单一的农民群众的典型观念归在列宁身上，这就更其是一种无可救药的诽谤了。其实这是在掩盖富农的作用及其控制合作社、使合作社成为自己发财工具的意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列宁主义的取消主义者是那些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两年内实际执行了掩盖富农的政策，向指出富农增长、富农积累及影响增长的人进行疯狂斗争的那些人。

**十一、和我們国家机关的一定环节攬在一起的新資產階級的代表依靠官方方針的这些修正主義傾向，公然企图把农村政策扭轉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而且富农及其思想家用关心发展生产力、提高“一般”商品率来掩盖自己的打算。其实富农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农商品率的增加只会减低和阻碍所有其余农户生产力的发展。**

中央委员会应当推翻这些指责或者申斥修正主义者。这些指责是以事实和文件作根据，它们是推翻不了的。所以只能实行后者。

摘译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纲》(1927年11月)，载于《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第254号。

### 3. 宣传农民的阶级分化

声称在新经济政策下，“工业的落后延缓了农业的发展”，“破坏了城乡联盟，引起了农民中迅速的阶级分化”。出租土地和雇工现象年年增多。机器和贷款“经常落入富农和富裕农民手中”，成为剥削贫雇农和下中农的工具。全国只有 8% 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

虽然我们农业恢复的过程比较迅速，但农民经济的商品生产是很低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期间，投入市场的商品总量为战前水平的 64%，出口量仅为一九一三年出口量的 24%。这除了由于农村本身一般消费量增加<sup>①</sup>以外，主要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差价，以及富农加紧囤积食物。甚至五年计划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一般地缺乏工业品，就使得城乡间货物的等价交换受到一定的限制，降低了可能投入市场的农产品数量”<sup>②</sup>。因此，工业的落后延缓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延缓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它破坏了城乡联盟，并且引起农民中迅速的阶级分化。

反对派在有关农民政策的有争论的问题上的看法，已经得到了完全、绝对的证实。在反对派尖锐批评的压力下，我们的总路线有了部分的改正，但是这些改正并没有阻止住官方集团继续倒向“力量强的农民”方面去的倾向。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从加里宁的报告来看，在第十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字提到农村的阶级分化或者富农的增长。

① 由于人口增加和财产分散，产粮区百分之三十八的农庄购进粮食。——托洛茨基注

② 第 117 页。——托洛茨基注

这种政策只有一个結果：我們將要失掉貧农，并且爭取不到中农。

近年来农业地区已經朝着資本主义阶级分化的方向走了很远。

在过去的四年間，无地和少地的阶层减少了 35—45%。同时占有六到十俄亩（合十七到二十八英亩）的阶层增加了 100—120%。占有十俄亩以上的阶层增加了 150—200%。无地和少地阶层百分比的减少，很大原因是由于破产和流散。例如，在西伯利亚，在一年的期間，15.8% 的无地农戶和 3.8% 的占有二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戶流散和消失了。在北高加索，14.1% 的无地农戶和 3.8% 的占有二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戶流散了。

沒有馬匹和农具的农戶要升入下中农地位是极端緩慢的。目前全国仍然有 30% 到 40% 沒有馬匹和农具的农戶，这类农戶中的基本群众正在下降到貧农的地位中去。

在北高加索，主要生产資料的分配如下：50% 的最貧穷农戶占有生产資料 15%。中間阶层，占农戶总数的 35%，占有主要生产資料的 35%。最高阶层，占农戶总数的 15%，占有生产資料 50%。在其他省份（西伯利亚、乌克兰等地）也可以看到生产資料分配的同样情形。

上述土地和生产資料分配不平等的情况在不同阶层农戶的存糧分配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农村中 58% 的剩余糧食是在 6% 的农戶手里。**<sup>①</sup>

**出租土地所占的比例一年年地增加。**在多数情况下，出租土地的业主都是占有生产資料的大土地所有者。在絕大多数的場合，为了逃稅，出租土地的事情是隱秘的。貧农既缺乏农具又缺乏

---

<sup>①</sup> 《統計汇报》，1927 年第 4 号第 15 頁。——托洛茨基注

牲口，他們大部分是用租来的工具和牲口耕种土地。地租的条件和农具及牲口租費的条件几乎苛刻到奴隶制的程度。伴随着这种物质上的奴役，金融上的高利貸也在发展。

目前农民所有权的分裂不但沒有减弱、而是加强了阶级分化的过程。机器和贷款并沒有在农业社会主义上发生作用，而是經常落入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手中，从而加强了对雇农、貧农和下中农的剥削。

除了土地和农具集中在最高阶层的手中以外，他們使用雇工的程度在日益增高。

另一方面，或者由于彻底破产和流散，或者由于个别家庭成员出走，因此一批数目不断增加的“雇农”正从下层和部分中层农户中出現。这些剩余劳动力有些落在富农和或“力量强的”中农的奴役之下，有些流入城市，还有很多人找不到任何职业。

尽管这些情况已經发展得很严重，并且使得中农在經濟上的比重下降，但中农仍然是在数量上最大的农民阶层。把中农爭取到社会主义农业政策方面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問題。把我們的希望放在所謂“力量强的农民”身上，实际上就是把我們的希望放在中間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上。

只有对雇农的适当关心，只有以貧农和貧农同中农联盟为基础的路綫，只有同富农坚决斗争，只有工业化的道路，只有阶级路綫的合作社道路和阶级路綫的农村信贷制度，才能把中农吸引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上来。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4—46頁。

十三、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間，农村中隨同十月革命而来的是人所共知的农村平等化。列宁在說到一九二〇年农村“中农化”的时候，指的正是这个。耕地极多和耕畜成群的农户大大减少了，

缺地和缺耕畜的农戶也減少了。

这种平等化的过程大概一直繼續到一九二二年。在新經濟政策下，分化过程恢复了。請看共产主义科学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对一九二四——二五年度預算的調查共同整理的材料。这些材料描繪了农戶按社会集团划分的鮮明图画。这是在供应国家粮食和出口方面都起决定作用的那些經濟地区的材料。

所有农戶分为五类：A、无产者，B、半无产者，C、中农，D、企业主，E、小資本主义。这里采用的按社会集团划分农戶的方法有碍于准确定规定富裕农戶的数量和比重。然而，可能作出的修正并不改变基本的結論，因为很大一部分第四类的农戶正在“发展”到資本主义的第五类去。

.....

应当极其仔細地看这些数字：第一，因为这是初次按社会集团划分所有农戶的认真嘗試，第二，因为这件工作是由权威机关做的，絕對不可能怀疑它們有所夸大。

我們把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农戶合为貧农集团，它們在上述地区<sup>①</sup>大致占全体农戶的 25—40%。中农集团占 40—50%，即占一半，而在两个地区（高加索和乌克兰）少于全体农戶的一半。最后，按照共产主义科学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分类的包括企业主和小資本主义农戶的这一类富裕集团占 15—25%。

苏联国家計劃委員会引用这个表格并加以解释时（《一九二七——二八年度控制数字》，第 353—355 頁）写道：“資本主义上层掌握了农村相当大的一部分財富。”这一承认非常重要：它根本推翻了仿佛反对派过高估計了富农的神話。如果国家計劃委員会不得不承认反对派两年来一再肯定的东西，却又企图安慰自己說，

---

① 指北高加索、乌克兰、烏拉尔和新西伯利亚区。——編者注

“然而，財富的主要部分并不在他們(資本主义上层)手中”，——必須认为，这种安慰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不仅农村相当大的一部分財富、而且財富的主要部分都轉入了資本主义上层手中，这就会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农村的胜利。以沒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安慰自己，是不聪明的。应当：一、承认反对派对富农在农村中的作用的估价是正确的；二、让全党和工人群众知道这点；三、由此作出实践的和政治的結論，而不要安慰自己說，資本主义虽然夺取了农村相当大的一部分財富，但沒有把它全部夺走。

某一类农戶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比重不仅取决于他們在經濟中的比重，而且也取决于占有基本生产資料的比重。

生产資料中分配得最不平衡的是机器。貧农农戶只占全部机器总值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只有在乌克兰占 12%。农村中的富裕农戶在全部机器总值中大致占 40—60%。在上述地区，半数或半数以上的机器集中在他們手中。

耕畜的分配大致也和机器的分配一样，虽然这方面某些地区貧农的比重要比机器分配方面大些。應該指出，关于耕畜的統計是按耕畜头數計算，而不是按它的价值計算的，而这并不是一回事。富裕农戶的馬匹总是要好些，更值錢些。因此如果不按数量，而按质量和价值計算耕畜的分配，那末富裕集团的比重就会大大增加，而貧农集团的比重将下降。

播种面积的分配略有不同，虽然和上述关系也很接近。貧农集团的播种面积占10—25%，中农集团在各地区約占一半，富裕农戶占25—45%。貧农部分在播种面积上比在机器和馬匹方面的比重要高些。这是因为，相当大的一部分貧农农戶沒有生产資料，用按照奴役性条件从富农那里租来的牲口和农具耕地。其次許多貧农农戶的播种地只是記在他們名下，而实际上是属于富裕农戶的，富裕农戶租用土地，但为了偷稅，便把这片租用土地的播种面积不

算作富裕农戶的，而算作貧农的。統計材料沒有覺察到這一點。

从這些數字中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基本生產資料的主要部分屬於農村的富裕階層。這些生產資料是富裕農戶手中剝削貧農的工具。**

摘譯自《托洛茨基反對派關於農村工作的反提綱》  
(1927年11月)，載於《真理報》1927年11月5日  
第254號第3版。

當然，“原則上”統治集團就在當時<sup>①</sup>也並沒有放棄農業集體化。他們只不過是按照自己的願望把這項工作推遲幾十年。後來擔任農業人民委員的雅柯夫列夫在一九二七年寫道，雖然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只有通過集體化才能完成，但是“這項工作顯然不是一年、兩年或者三年能夠完成的，也許十年也完不成。”他還說，“集體農莊和公社……現在和將來很長一個時期，毫無疑問都只不過是個體農業經濟這個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小島。”**實際上，那個時期只有8%的農戶加入了集體農莊。**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7—18頁。

#### 4. 攻擊官僚為爭權奪利 而進行反富農鬥爭

声称逐漸出現的富農階層“正重演資本原始积累的過程”，破壞社會主義的基礎。富農“要十足的土地所有權”，“要取得自由處理全部收成的權利”，竭力在城市中造成相應代理人——自由商人和自由工業家，要處理剩餘產品的權利，總之，富農同小工業家一起“力圖完全恢

<sup>①</sup> 指1923—1926年。——編者注

复資本主义”。“誰处理剩余产品，誰就取得了国家权力”。說官僚需要无产阶级的帮助来粉碎在新經濟政策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富农和小资产阶级，于是“为夺取剩余产品和权力而对小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斗争”，即反富农的斗争。攻击这种斗争說，在“劳动者自己統治的条件下，反对富农的斗争本来不应采取那样震动的、惊扰的和野蛮的方式，本来可以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导致群众的經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

同时新經濟政策在初步阶段的发展，沒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約和修正，将造成同样性质的更大危险。

**二千五百万小农戶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現的富农阶层，正重演資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装一个大地雷。这个过程的前途最終取决于国营企业增长和私营企业增长的对比。我們工业增长的緩慢步伐大大增加了农民中的阶级分化速度和由此而产生的在政治方面的危险。**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0頁。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斯大林和他的机器越来越大胆。特别是他們摆脱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限制性影响后。的确，官僚为了迎合它的同盟者的利益和要求，已經大胆地走得这么远，以致到一九二七年，就象一切有見識的经济学家一直看到的那样，大家清楚地看出他們的资产阶级同盟者的要求，由于他們的本性，是漫无止境的。**富农要土地，要十足的土地所有权。富农要取得自由处理其全部收成的权利。富农竭力制造以自由商人和自由工**

业家为形式的他自己在城市中的相应代理人。富农不想忍受以固定价格徵售其收成的强制办法。富农同小工业家一起，力图完全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对国家劳动的剩余产品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在最近的将来，由谁来处理剩余产品——由新资产阶级呢还是由苏维埃官僚？——这成了下一个问题。谁处理剩余产品，谁就取得了国家权力。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小资产阶级（它帮助官僚打垮了劳动群众及其发言人左翼反对派的抵抗）和热月式官僚主义本身（它帮助了小资产阶级骑在农民群众的头上）之间的斗争。这是争夺权力和争夺收入的直接的斗争。

显然，官僚击败无产阶级的先锋，摆脱国际革命的影响，和使不平等的哲学合法化，并不是为了向资产阶级投降，变成后者的仆从，而最后被拖离国家钱袋。官僚给自己的六年政策的后果吓得要死。因此它剧烈转而反对富农和耐普曼。

摘自《斯大林评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册第515—516页。

在头脑简单的人的心目中，“第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似乎推翻了关于俄国革命的热月政变时期的理论。然而事实上，这些理论和实践正好证实了关于热月政变的理论。热月政变的本质过去是、现在是、也不能不是社会性的。它代表着一个新的特权阶层的形成，一个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新下层的产生。觊觎这一身分的有两种人：小资产阶级和官僚本身。它们在〔打垮〕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抵抗的〔斗争〕中并肩作战。这一任务完成后，在它们之间爆发了残酷的斗争。官僚由于孤立和脱离无产阶级而感到害怕了。它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能够粉碎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和继续发展壮大起来的富农和小资产阶级；它需要无产阶级的帮助。因此，它集中力量，把为夺取剩余产品和权力而对小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这里，它不再同法国的热月政变有相同之处了。苏联的新的社会基础变得至高无上了。**保卫生产資料和土地的国有化，是官僚的生死攸关的法則**，因为这些是它的統治地位的社会根基。这就是它要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的原因。官僚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才能进行这一斗争，并把它进行到底。新反对派的代表們大批投降这一事实，是它已經取得这种支持的最好的证据。反对富农、反对右翼、反对机会主义——那一时期的官方口号——在工人們和許多左翼反对派的代表們听来，好象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活。当时，我們警告他們說：問題不仅仅在于正在做的是**什么**事，还在于**誰**在做这些事。**在苏維埃民主的条件下，即劳动者自己統治的条件下，反对富农的斗争本来不应采取那样震动的、惊扰的和野蛮的方式，本来可以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导致群众的經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反对富农的斗争，是踩在劳动者背上进行的以一对一的决斗。因为角斗的双方沒有一方相信群众，因为它們都怕群众，所以斗争有着极其令人震惊的血腥性质。由于无产阶级的支持，斗争才以官僚的胜利而告終。可是，无产阶级在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所特有的重量并没有因此而增加。

同上，第 529—530 頁。

## 5. 妄談党应当采取的政策

声称“在农村正在激烈起来的阶级斗争中，党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领导雇农、貧农和基本中农群众，并組織他們反对富农的剥削意向”。

认为“必須把有关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稅收和党在农村的政策的全部基本法令”提交应当經常召开的貧雇农代表會議和代表大会“預先討論”；貧雇农代表大会和

代表會議应当給在党领导下的“貧农联合会”創造基础，貧农联合会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执行它的政策的支柱”，是“团结那些准备和苏维埃政权一同建設社会主义农村、反对富农和投机分子、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基本农民群众的中心”。

說“把农村貧农組織成为集体农庄的任务”应当成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要尽力促进中农經濟的发展使中农逐渐过渡到大规模集体經濟，使农业合作制成为貧农和中农“反对富农經濟势力增长的斗争武器”。

宣称“应当粉碎并不断粉碎富农的基层組織”，“从各方面限制他們的剥削活动”。

**在目前正在進行的农村阶级斗争中，党必須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站在雇农、貧农和中农基本群众前面，并且把他們組織起来反对富农的剥削企图。**

为了加强农业无产者——这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阶级地位，需要采取我們在工人阶级的状况那一节里所提出的一系列措施。

必須不再使农业貸款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农村富裕阶层的特权。我們必須結束目前的状况——貧农的微乎其微的儲蓄不是用于他們所希望的用途上，而是用于为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服务上。

必須迅速发展集体化耕作，用以抵銷农村私人所有制的增长。必須有步骤地、逐年資助貧农組織集体农庄。

同时，我們必須更有步骤地帮助集体农庄以外的貧农，方式有：完全免稅，适当的土地政策，农具貸款，吸收他們参加农业合作社。“使苏维埃活跃起来，从而造成非党农民的活动中心”（斯大林-莫洛托夫），这个口号既沒有阶级內容，并且实际上会加强农

村上层的支配作用，我們必須采取下面的口号来代替它：“建立由雇农、贫农和接近雇贫农的中农所組成的非党活动中心。”

我們必須建立一个真正有計劃的、普遍的、长期的貧农組織，这个組織以生活中的实际政治和經濟問題为中心，諸如选举問題，稅收問題；对貸款、机器等的分配的影响、土地分配和利用、合作社的建立、貧农从合作劳动中得到現金報酬等等。

党應該用一切手段促进中农在經濟上的发展——在谷物价格上采取明智的政策，在組織貸款和合作社方面使他們可以得到貸款和加入合作社，有步驟地、逐漸地使这个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可以得到大規模的、使用机器的、集体經濟的好处。

党在日益增长的富农阶级这个問題上的任务應該是从各方面限制他們的剝削活動。我們絕不能允許繼續违背我們宪法載有的剝夺剝削阶级在苏維埃中的选举权的条款。下述的措施是必需的：实行累进税制度；采取国家立法措施保护雇农和規定农业工人的工資；在土地分配和土地使用問題上采取正确的阶级政策；在向农村提供拖拉机和其他生产工具問題上也同样采取正确的阶级政策。

农村地租制度的发展，目前使用土地的办法（按照这个办法，土地由土地公社处理，而土地公社是处在一切苏維埃的領導和控制之外并且日益处于富农的影响之下），第十四次苏維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在每年分配土地时“給以补偿”的決議——所有这一切都在破坏着土地国有化的基础。

加强土地国有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把这些土地公社从属于国家地方机关，在处理一切有关土地分配和使用的問題上确立地方苏維埃（清洗其中的富农分子）的有力控制。这种控制的目的應該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貧苦和无力的小农的利益免受人数众多的富农的侵害。必須在我們現有經驗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补充的措施，

用以制止土地公社中富农所占比例的过分增长。尤其是，必須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把作为土地出租者的富农置于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完全和絕對的监督和控制之下。

### 党應該粉碎一切旨在取消和破坏土地国有化的倾向——土地国有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基本支柱。

目前实行的普遍农业稅制度應該改变，改变的方針是：完全免除40—50%最貧困农戶的稅收，并且不許因此在中农基本群众身上增加任何稅收作为补偿。收稅的日期應該适合下层納稅人的利益。

應該撥出为数要大得多的一笔款項用于建立国营农場和集体农庄。必須最大限度地放寬新建立的集体农庄和其他形式的集体化組織归还貸款的期限。被剥夺选举权的人不能作为集体农庄的庄員。把小生产变成集体大生产的思想應該貫穿到合作社的全部工作中去。在机器供应方面必須坚决实行阶级路綫，必須对欺詐的机器公司特別进行斗争。

分配土地的工作必須繼續进行，其一切損失由国家負担，首先必須关心集体农庄和貧苦农戶，最大限度地保护它們的利益。

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應該保证貧农和中农里的基本群众起碼能够維持和逐漸提高他們現有的經濟水平。應該采取措施消除秋季和春季之間的谷物差价。因为这种差价对于农村貧苦阶层來說損失极大，而其全部利益都归于上层。

不仅必須大大地增加貧农基金的撥款，并且必須彻底改变农业貸款的方針，使之保证貧农和无力的中农能得到低利长期貸款，并且取消現在实行的保证人和担保的制度。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6—49頁。

农村社会主义建設問題就是要在大規模的、使用机器的、集体

**經濟的基础上改造农业。**正如列寧在《論合作制》一文里所說的，对于农民基本群众來說，合作制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简单的道路。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給予农民的巨大利益。只有发展农业机械化这个方法才能为社会主义合作制（或者集体制）造成广闊的基础。沒有生产方法上的技术革命——这就是說，沒有农业机器，沒有作物輪作制，沒有人造肥料，等等——，农业真正集体化的工作就不可能成功和展开。

供銷合作社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导向社会主义：（一）这个过程在社会主义成分（特别是大工业和工会）的經濟和政治的直接影响之下发生。（二）农业合作社發揮貿易职能的过程逐渐导致其本身的集体化。农业合作社的阶级性质不仅决定于参加合作的农民的不同阶层在数量上的比重，而且尤其决定于他們在經濟上的比重。党的任务就是要尽力使农业合作制成为貧农和中农的真正联盟，成为貧农和中农反对富农經濟势力增长的斗争武器。我們必須有步骤地和坚持不懈地把农业无产者引导到建立合作社的事业中来。

只有在参加合作的人口得到最大限度独立的条件下才可能有成功的合作社结构。合作社同大工业和无产阶级国家間的真正联盟應該是各合作社組織的正常制度联盟，不允许官僚主义的控制方法。

党领导显然背离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基本路线，他們倾向于寻求富裕农民和富农的支持；他們用反无产阶级的言詞掩盖他們这种背离行为，說什么“穷人的幻想”，“吃白飯”，“懒汉主义”，并說在保卫苏联上貧农的价值不大——鉴于所有这些情形，我們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牢記我們党綱上的話。在明确指出我們同中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之后，党綱简单明了地宣称：“俄国共产党在其全部农村工作中仍旧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农民力量。

党首先把他們組織为独立的力量，建立农村党核心，建立貧农組織，建立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的特殊类型的工会，諸如此类。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他們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使他們擺脫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sup>①</sup>

同上，第 49—50 頁。

**給予貧农真正的支持，使一般中农群众接近貧雇农，把后者組成独立的阶级力量——所有这一切在民族州和共和国里有著特別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把雇农真正組織起来，不建立合作社和組織貧农，我們就有使我国东方落后地区停留在他們传统的奴役状态中，使这些地区的地方党組織完全失掉真正下层阶级党员的危险。**

同上，第 65 頁。

**二十七、必須用集体組織的更为迅速的发展来对抗农村中发展着的私人农場。**

中央提綱的作者莫洛托夫同志的观点是极端錯誤的，他在不久以前在这个极重要的問題上提出了一个根本錯誤的方針：

“……決不能陷入关于就在目前条件下立即使广大农民群众集体化的貧农幻想之中。”（維·莫洛托夫：《党在农村的政策》，国家出版局版第 64—65 頁）

**恰恰相反，在大規模公共生产基础上改造千百万极小的貧苦农戶的基本道路正在于他們的集体化。**

**只有把貧农組織为集体农庄，才有可能在比較大的規模上实现給予貧农以經濟援助的任务。把农村貧农組織成为集体农庄的任务，應該作为我們农村工作中的中心任务提出来。只有把农村**

---

<sup>①</sup> 参看《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93 頁。——編者注

中党、合作社和苏维埃机关吸引来参加这个工作，而政府从国家预算中拨出足够的款项，以根据充分优惠的条件供应组织起来的集体以生产资料，才能胜利地完成这个任务。现在给贫农的拨款数目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分散到千百万农户，因而无论如何也完成了实际支援的任务。必须年复一年地对拨给组织成集体组织的贫农以相当数量的款项作为经济援助。应当从来自农村、熟悉农村情况的人们当中培养集体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应当在农村小学和农村青年学校中宣传集体农庄的优越性。

摘译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纲》(1927年11月)，载于《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第254号第4版。

应当对国营农場的建設投入更多的資金。

同时必须更加经常地支援没有参加集体组织的贫农农户，办法是完全免除他们的赋税，实行适当的土地整理政策、提供经济设备的贷款、吸收参加农业合作社等等。

同上。

在农村正在激烈起来的阶级斗争中，党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领导雇农、贫农和基本中农群众，并组织他们反对富农的剥削意向。

同上。

三十五、必须真正地、有计划地、普遍地、巩固地组织贫农围绕在生动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周围：如改选，税收运动，对信贷、机器等的分配的影响，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合作化，贫农合作基金的使用等等。

如果我们不建立真正巩固的组织，不确切指出贫农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那时团结贫农只会停留在口头上。

我们应当粉碎并不断粉碎富农的基层组织（不论它们用什么

形式作掩盖)。

雇农自然应当有完全独立的阶级组织(除了苏维埃和合作社外)。这就是工会。

中农的基本群众应当组织在村苏维埃和合作社周围。

贫农则正因为他们是贫农，需要有补充的组织(除了苏维埃和合作社以外)。

必须把有关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税收和党在农村的政策的全部基本法令提交贫雇农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预先讨论。

贫雇农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不应是偶而召开、而应经常召开。

和富农及富裕农民上层成立只能起反革命作用的“农民协会”的意图相对立，这些贫农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今后应当给组织在我党领导下的“贫农联合会”创造基础，在这个联合会中应保证无产阶级的影响，这个联合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执行它的政策的支柱。在农村以贫农和中农为一方、富农为另一方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这个贫农联合会应当保证和那些反对富农的基本中农群众的友好关系；贫农联合会尽力支持中农的这个斗争(在合作社、苏维埃等等中)，它是团结那些准备和苏维埃政权一同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反对富农和投机分子、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基本农民群众的中心。

三十六、党应当通过正确的采购价格政策，组织中农也能享受到的信贷和合作化，来尽力促进中农经济的发展，逐渐不断地使这个人数最多的农村阶层过渡到采用机器的大规模集体经济去。

三十七、党在对待日益增长的富农阶层方面的任务应当是用一切办法限制他们的剥削意图。绝对不许违背宪法中剥夺农村剥削阶层在苏维埃选举时选举权的条款。必须实行：急剧的累进税；国家立法保护雇佣劳动和调整农业工人工资的措施；在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方面正确的阶级政策。保护贫农不受奴役性合同的

損害，其中包括在貧农出租土地时从立法上予以保护。应当改变农村机器供应的整个政策，要比迄今为止更多地增加对貧农的供应。

同上。

## 6. 斷言全盤集体化沒有消灭富农， 反而培植了“资产阶级集体农庄”

断言“由于缺乏技术和文化基础”，全盤集体化沒有消灭富农阶级，不能阻止农村的阶级分化。相反地，为苏维埃社会基本阶级矛盾的加深作了准备。

說集体化以后，“农民和国家之間的斗争还远远沒有結束”，“个体化倾向和集体化倾向的斗争还在整个农村居民中进行”：大多数集体农民不願把余粮卖给国家；私养家畜大大超过公养家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出租土地的現象广泛流行；某个居民阶层剥削另一个居民阶层的現象并没有消失；市場关系“加強着个体化倾向，加深着农村的社会分化”。

认为“級差地租”在集体农庄之間以及在农庄內部造成“根本性的社会对立”，官僚的无限权力促进社会分化。农庄之間的分化表現在：富有的农庄能够使用“更多的肥料和更多的机器”，雇用穷农庄的劳动力。农庄內部的分化表現在个人消費和私营經濟上。說一九三五年集体农庄的平均收入約为四千卢布，有些集体农庄每戶收入高达三万卢布；大集体农庄每个庄員的收入等于“平均的”工人工資和低等集体农民的十倍到十五倍。农村中“形

成一种资产阶级集体农庄”——“百万富翁集体农庄”。

声称国家政权在設法寻找強有力的“田間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的“支持和友誼”，“寻找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的支持和友誼”。一部分人的“自觉的資本主义趋势”受到官僚的“有意識的鼓励”。

“全盘”集体化，即使在今后两、三年內真正实行，也決不是表示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生产合作社的形式，由于缺乏技术和文化基础，并不能阻止小商品生产者内部的分化以及資本主义分子从他們中間出現。为了真正消灭富农，需要在农业技术方面来一次彻底的革命以及把农民同工业无产阶级一起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經濟的工人和无产阶级社会的成员。但是，这是几十年以后的远景。由于个体农民的工具和工具占有者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占优势；正是在相对成功的集体化以后，亦即随着农业生产的普遍增长，农民的分化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发生和增强。如果我們进一步假定，具有新的技术因素的集体化将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如果没有这种提高，集体化在經濟上就沒有什么道理，从而也就維持不下去了），那么这就会立即在現在人口已經过多的农村中造成一千万、二千万甚至更多的过剩工人，即使有最乐观的計劃，工业也不能够吸收这么多工人。隨着过剩的，也就是說，在集体农庄找不到位置的半无产和半貧民化的人口的增长，富裕的集体农庄以及貧穷的和中等的集体农庄內部的富裕农民将在另一个极端相应地增长起来。由于領導沒有远見，預先宣布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企业，资本主义农民分子就能把集体化当作自己最好的掩护，結果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更加危险。

因此，目前过渡时期的經濟成就，并沒有消灭基本矛盾，而是为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基础上更深一层地再現这些矛盾作了

准备。

摘譯自《苏联的发展問題》(1931年4月4日),  
紐約1931年版第7—8頁。

如果說工业企业“原則上”是社会主义企业,那末,集体农庄还不能这样說。集体农庄所依靠的不是国家,而是集体所有制。同分散的个体經濟比較起来,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集体企业是不是会导致社会主义,那还要看一系列的条件,其中有一部分条件是在集体农庄的范围以内,有一部分是在苏維埃制度的一般条件以内,还有一部分——并且是同样大的一部分——則在世界舞台上。

**农民和国家之間的斗争还远远沒有結束。**目前还很不稳定的农业組織,只不过是两个斗争中的阵营在彼此之間进行了可怕的內战以后的一种暫时的妥协。的确,90%的农庄已經集体化,94%的农产品是从集体农庄来的。即使考慮到有一定百分比的集体农庄是一种假象,在它們那里基本上是个体农民,但还是必須承认,战胜个体經濟的工作看来至少已經完成了十分之九。然而,农村地区的各种力量和傾向之間的真正斗争,远远不是局限于个体农民和集体农民之間的針鋒相对的对立这样一个范围。

为了安撫农民,国家认为自己不能不向农村的私有的和个体化傾向作很大的让步,首先是把“永久”使用土地权正式轉交給集体农庄——这就是在实质上废除了土地的社会化。这是一种法律上的假象嗎?从力量对比来看,这种假象有可能成为現實,并且在最近的将来会使全国范围的計劃經濟遭到巨大的困难。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国家被迫恢复了个体农民經濟,农民有了自己的小块田地,还有了自己的牛、猪、羊、家禽等等。由于这种违反社会化和限制集体化的做法,农民們才溫順地——虽然还没有多大热情——同意了在集体农庄中干活,而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他們有机会完成

对国家的交售义务，同时也可以使他們自己得到一些东西。这种新的关系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形式，因此即使苏联的統計学家比較誠实，也很难用数字来衡量这种关系。然而，从許多事情看来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結論，即从农民个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小块田地并不比集体农庄不重要。这一点意味着，个体化倾向和集体化倾向之間的斗争还在整个农村居民中进行，同时斗争的結果还没有决定。那末农民們究竟倾向于哪一条道路呢？他們自己还不太清楚。

一九三五年年底农业人民委員說，“到目前为止，在完成国家的粮食供应計劃方面，我們遭到了富农分子的猖狂反抗。”換句話說，这一番話意味着，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到最近**”（今天的情况又怎样呢？）还认为把粮食交給国家是一件对自己不利的事，他們倾向于搞私营商业。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证明，即国家制訂了严厉的法律来保护集体財产，防止集体化农民自己进行掠夺。很有启发的是，集体农庄向国家保险的財产是二百亿卢布，而集体化农民所保险的私有財产是二百一十亿卢布。如果这种对比不一定意味着分散的农民比集体农庄富足，那末无论如何說明了这一点，即农民在私有財产保险方面比在公共財产保险方面要慎重得多。

从我們的观点看来，同样說明問題的是畜牧业的发展情况。馬的数目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以前是在不断地减少，只是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年才略有增加；而牛的数目到去年已經增加到四百万头。在一九三五年这个条件有利的年头，养馬計劃只完成了94%，而养牛則大大超过了計劃。这些材料的意义从这样一个事實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即馬只能是集体財产，而牛則已經是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可以私有的牲畜。这里只需要补充这样一点，即在草原地区，集体化农民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可以拥有一匹馬，因此这些地区的馬比集体农庄的馬增加得快，而集体农庄的馬又比国

营农場的馬增加得快些。这些情況并不是說，小私有經濟比大規模社會化經濟優越，而是說明从小私有經濟過渡到大規模社會化經濟，从野蠻主義過渡到文明，其中隱藏着許多困難，而這些困難都是不能仅仅用行政壓力來克服的。

“法權永不能超過社會經濟制度以及由此經濟制度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發展程度。”出租土地虽然是法律所禁止的，实际上却很广泛地流行着，不仅如此，还以最致命的分成制形式流行着。这个集体农庄的土地租給那个集体农庄，有时租給一个外面的人，最后，有时甚至租給本农庄比較有个人事业心的庄員。說來難以相信，国营农場——即“社会主义”企业——居然也出租土地。另外，尤其說明問題的是，干这种事的竟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国营农場！在这个維护法律的高級机关的保护下，国营农場的經理向农民提出的租地条件，几乎完全是从旧地主与临时工訂的契約中抄下来的。我們从这些方面看到了官僚剥削农民的情况，这种官僚已經不再具有国家代理人的性质，而具有半合法地主的性质了。

尽管一点也沒有扩大这种丑恶現象的范围——这种現象当然无法統計——我們还是不能不看到这种現象所具有的巨大的带有征兆性的意义。这种現象明白无誤地证明了，在这个包括絕大多数人口的还极端落后的經濟部門，資产阶级傾向多么强烈。与此同时，尽管所有制关系具有新的結構，市場关系还是不可避免地加强着个体化傾向，加深着农村的社会分化。

平均計算，每个集体农庄的收入大約四千卢布。但是，关于农民的“平均”数字甚至比关于工人的“平均”数字还要具有欺騙性。例如在克里姆林宮，有人汇报說，集体化漁民在一九三五年的收入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一倍，即每人得到一千九百一十九卢布，后面这个数字得到了掌声，这一点說明这个数字大大超过集体化基本群众的收入。另一方面，有些集体农庄的每戶收入高达三万卢布，

这还没有把个人經濟的貨币和实物收入計算在內，也沒有把整个企业的实物收入計算在內。总的說来，这些大集体农庄的每个庄員的收入等于“平均”的工人工資和低等集体化农民收入的十倍到十五倍。

收入的等級只是部分地决定于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勤奋程度。集体农庄和农民个人的土地，由于气候、土壤和作物类别的不同以及距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远近不同，而必然处于非常不平等的状态。城乡的对立不仅沒有在五年計劃期間減輕，反而由于城市和新工业区的迅速发展而大大尖銳化。苏維埃社会的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对立，主要是因为級差地租，不可避免地会在集体农庄之間以及集体农庄內部派生出矛盾。

官僚的漫无限制的权力，也是促使社会分化的一个同样有力的工具。他們掌握着工資、物价、稅捐、預算以及信貸这样一些杠杆。中亚地帶有許多种植棉花的集体农庄，收入很不平衡，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規定的价格不同，而不是由于集体农庄庄員的工作好坏。某个居民阶层剝削另一个居民阶层的現象并沒有消失，而是被掩盖起来了。几万个“富裕”集体农庄庄員的幸福是牺牲其他集体农庄庄員和产业工人的利益而得到的。使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員都达到富裕的水平，是一个比牺牲多数人而使少数人拥有特权要困难得多和費时得多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左翼反对派曾宣称，“富农的收入已經增加得比工人的收入多到无法衡量的地步”，这个說法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換了一种形式。上层集体农庄庄員的收入已經增加得比基本工农群众的收入多到无法估計的程度。目前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別也許比消灭富农以前还要悬殊。

集体农庄內部的分化，一部分表現在个人的消費上；一部分表現在同集体农庄毗連的个人企业上，这是因为集体农庄本身的基本財产已經社会化。集体农庄之間的分化已經产生了更为深刻的

后果，因为富有的集体农庄有机会使用更多的肥料和更多的机器，因而可以更快地富足起来。取得成就的集体农庄往往雇用穷苦集体农庄的劳动力，而当局对此闭眼不问。把价值不等的土地分配给集体农庄，这就大大地促进了集体农庄之间的进一步分化，并因而形成一种资产阶级集体农庄，或者叫做“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甚至现在它们还被人这样称呼。

在农民发生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当然可以作为调整者进行干预。但是朝哪个方向做呢？干预到什么限度为止呢？进攻富农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这就会同农民当中比较“进步的”阶层发生新的冲突，而这种阶层的农民只是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停顿以后，现在才开始感到迫不及待地需要一种“幸福的生活”。不仅如此——而这一点还是主要的——国家政权本身变得越来越不能进行社会主义监督了。在农业当中也象在工业中一样，国家政权设法寻找强有力的、顺利的“田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支持和友谊，寻找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的支持和友谊。国家政权最初所关心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到最后就只关心自己了。正是在消费与生产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农业中，集体化已经为官僚的寄生主义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并为这种寄生主义同集体农庄的上层集团相互帮助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集体农庄的庄员在克里姆林宫的庄严会议上献给领导人的祝贺性“礼品”，只不过是他们向地方政权代表经常纳贡的象征性表现。

由此可见，低生产水平同社会主义的甚至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地发生冲突的情况，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还要严重得多。归根到底，官僚正是从这种矛盾中产生的，而他们反过来又加深了这种矛盾。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8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3—97页。

即使在所謂“无阶级的”社会的下层群众内部，无疑也存在着与官僚内部所存在的完全一样的集团，只是表現得不那么鮮明而且人数不多，自觉的資本主义趋势成为集体农庄中的富裕的人們的主要特色，这些趋势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人的特色。但是这个阶层給自己准备了发展小資产阶级趋势的广泛基础，这种趋势也就是以普遍貧困为代价来积累个人財富，它受到官僚的有意識的鼓励。

摘譯自《資本主义的垂死掙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938年9月3日)，紐約1946年版第48頁。

#### 四、新資产阶级

說資本主义勢力在农村和城市中都有增长，其主要表現是农村資产阶级和城市私人資本家的“增多”。“农村上等阶层和城市資产阶级分子正越来越紧密地同我們國家-經濟机关的各种环节联結起来”。私人資本“正在从新开始原始积累的过程，首先是在商业領域，然后是在工业領域”，它已“不滿足于作中間人了”。

声称“官僚机构(一直包括它的最上层)对于富裕的、在进行积累的、在发财致富的上层的索求”“有求必应”。由于新資产阶级和富农比重不断增加、他們和官僚接近、领导的总的方針不正确，富农和耐普曼“能够影响基层苏維埃机关的成分和政策”。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危机是自然的，而且归根到底，危机是調节經濟的唯一办法，也就是協調工业中不同部門之間的关系和总产量与市場容量之間的关系的唯一办法。但在我們苏維埃經

濟——資本主義和社会主义的中間物——中，不能认为商业和工业危机是协调国民經濟不同部分关系的正常或者甚至必然的道路。危机会夺走、消灭或者分散国家財产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当中有一些便落入中間人、零售商手中，总之是落到了私人資本手里。由于我們所继承的是极其支离破碎的工业，在战前这种工业的各个部分彼此所起的作用与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比例完全不同，要想使工业的不同部分通过市場关系适应农民經濟从而达到工业各个部分的协调，是十分困难的。如果我們完全听命于危机的行动来实现必要的改組，那末就必然会把一切利益都让給私人資本，后者現在已經立足于我們和乡村之間，也就是立足于我們和农民及手工业者之間了。<sup>①</sup>

私人商业資本現在已获得相当大的利潤。它越来越不滿足于作为中間人了。它企图組織生产者和从国家手里租用工业企业。換句話說，它正在从新开始原始积累的过程，首先是在商业領域，然后是在工业領域。显然我們所經歷的每次失敗和每次損失，对于私人資本說来都是一种收获：首先，因为这会使我們的地位削弱，其次，因为这种損失的相当大一部分会落入新資本家的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有什么办法能够成功地打退私人資本呢？是不是有这种办法呢？确实有的一—那就是有意識地对市場、一般說来就是对經濟工作进行計劃控制。工人国家手里掌握了工业的基本生产能力以及交通運輸和信用手段。我們不需要等待局部危机和总危机来暴露我国經濟的各个因素間缺乏协调的情况。我們不需要在暗中摸索，因为市場的主要关键都掌握在我們手里。我們能够——而且我們必須学会！——不断改善对經濟的基本口

---

① 不待說，在最終建成社会主义經濟以前，我們还会有許多次危机。問題在于使他們的次数减至最低限度并使每次危机的危害性減輕。——托洛茨基注

素所作的估計，預測這些因素在生產過程和市場方面未來的相互關係，使所有經濟部門在數量方面和質量方面都協調一致，並使整個工業能夠適應農村經濟。這就是使“結合”能够發現的真正道路。

摘譯自《論城鄉“結合”》(1923年底)，載于  
《新方針》倫敦1956年版第92—94頁。

列寧說汽車常常駛往我們敵對力量所指示的地方，他這麼說使我們注意兩個極其重要的事實。第一，在我們社會里存在敵視我們事業的力量，這就是富農、新資產階級和官僚；他們利用我們的落後和我們政治上的錯誤，他們依靠國際資本主義的支持。第二，這些力量是強大到能把我們政府的、經濟的汽車推向錯誤的方向，並且最後甚至企圖(开头用隱蔽的形式)把汽車方向盤抓過去。

列寧的話給我們規定了如下的責任：

(1)對富農、新資產階級和官僚這些敵對力量的增長要提高警惕；

(2)要記住，隨着國家的全面恢復，這些力量將竭力聯合，把他們的“修正案”加進我們的計劃里去，對我們的政策施加日益增大的壓力，通過我們的各種機器來滿足他們的利益；

(3)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措施去削弱這些敵對力量的增長、聯合和壓力，防止他們在實際上(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來)造成兩個政權制度，這是他們一心想達到的目的；

(4)把這些問題的全部真相坦白地告訴全體勞動群眾。其中包括“熱月”的危險和反對這一危險的鬥爭這個根本問題的真相。

自从列寧發出他的警告以來，我們有許多事情改善了，但是也有許多事情更壞了。國家機器的影響在增長，但同時工人國家的官僚化也在發展。由於資本主義勢力在農村中的絕對和相對增長以及在城市中的絕對增長，因此我國資產階級分子開始產生政治上的自覺意識。這些分子對於他們在工作中和在社交中接觸到的

那部分共产党人，极力进行腐化，而其結果并不是总不成功的。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向左开火”的口号不能不促使党内右派分子和国内的资产阶级—烏斯特里雅洛夫分子更进一步联合起来。

.....

资本主义成分的主要表現是农村阶级分化和城市私人资本家的增多。农村的上等阶层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越来越紧密地同我們国家一經濟机关的各种环节联結起来。而这个机构常常在統計数字的掩盖下帮助新资产阶级，使它的增大自己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額的活动取得成功。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25頁。

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私营的貿易机构占去我們国民收入的一个很大份額，超过总生产量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近年来，私人資本以商业中間人的資格所經營的貿易，大大超过了全部貿易額的五分之一，每年的絕對数字則超过了五十亿。一直到現在，一般消費者所需产品的50%以上是来自私人資本家之手。这对于私人資本家則成为他們利潤和积累的根本来源。农业价格和工业价格的差額，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差額，农村經濟不同部門在不同地区和季节的价格的差額，國內和国际价格(走私貨品)的差額，这些都是私人收益的經常来源。

私人資本在貸款上获取高利，在政府公債上賺錢。

私人資本在工业上的活动也是很可观的。虽然在最近这个时期私人資本的相对数字减少了，但它的絕對数字仍在增长。登記的私人資本經營的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四亿。小型工业、家庭工业和手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十八亿以上。總計，各种非国营工业加起来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五分之一，占全部市場商品的40%左右。属于非国

营工业的广大群众和私人資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商业資本和家庭工业資本对于手工业工人群众各种公开的或隐蔽形式的剝削是新资产阶级积累資本的一个极其重要并且日益增大的来源。

同上，第 25—26 頁。

在新經濟政策下，私人資本的作用在工业落后的边疆地区异常迅速地增长着。在这些地区，經濟机关常常把它们的賭注完全押在私人資本家身上。它們确定物价时不考慮貧农和中农群众的实际状况。它們人为地降低雇工的工資。它們无节制地在工业同供給原料的农民之間实行官僚的私人中介的办法。它們把合作社导向使乡村富裕阶层得到更多好处的方向。它們忽視特別落后的畜牧业者和半畜牧业者的利益。主要問題——如何实现工业建設計劃，特别是农业原料生产的机械化計劃——完全被置諸脑后了。

同上，第 64 頁。

三十一、中央也不能容許地拖延了反对派早在七月全会上提出的另一个建議的执行。

农村中有了大量存糧。这些存糧集中在农村富裕阶层手中，并且远远超过必需的防灾儲备。另一方面，虽然这是第三个丰收年，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仍嫌不足。虽然这是第三个丰收年，粮食出口沒有增加，反而减少下去。虽然这是第三个丰收年，粮食采购量比去年还少，而粮价却已在上涨，农民卖粮的价格和消費者买粮的价格之間的悬殊太大。这种悬殊滋养了商业寄生阶层。富农存糧显然在阻碍工业和整个經濟的经济发展，破坏苏維埃政权的計劃。

必須通过征借的形式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存糧。这个措施只涉及到 10% 的农户，并且能够提供不少于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粮食，这些粮食可以成为出口、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新动力。强制执行这一措施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和貧农的。

如果工人阶级从自己的低工资中还能够并且在支持工业化的公债，那末使农村上层用自己那沉重地压在国民经济身上的一部分存粮来支持苏维埃国家、支持出口和工业，就不应有什么障碍了。为此只要不限于口头上向富农进攻，而要立即转入行动。

摘译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纲》(1927年11月)，载于《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第254号第4版。

给予人数众多的农村剥削分子以选举权的一九二五年的“指令”，仅仅是下列情况的明显表现之一：官僚机构（一直包括它的最上层）对于富裕的、在进行积累的、在发财致富的上层的索求何等地有求必应。这个实际破坏苏维埃宪法的指令的取消，无疑是反对派批评的结果。但是按照新指令实行的最初一批改造，在许多地方已经暴露了得到上面鼓励的、尽量缩小富裕阶层中被剥夺选举权人数的意图。然而，问题的中心已不在于此。在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比重不断增加，他们和官僚接近，领导的总的方针不正确的情况下，富农和耐普曼甚至被剥夺了权利，也仍然能够在幕后至少影响基层苏维埃机关的成分和政策。

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后来由于反对派的反对而局部遏止的富农或“富农的帮手”和城市市侩向基层苏维埃渗透的过程，是一个极深刻的政治过程，如果不注意或者掩盖这个过程就会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极严重的后果。

同上。

目前的市场关系与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下的市场关系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在于，目前的市场关系应当在国家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组织同各个公民之间没有中间人和私商的情况下得到直接的发展。然而，这一点只有从原则上看是不错的。国家和合作社的零售贸易额增长得很迅速，按照说明书，应当在一九三六年达到一千亿卢布。集体农庄的贸易额，一九三五年达到一

百六十亿，今年还会大大地增长。不合法的和半合法的中間人在这些貿易額当中以及以外究竟占什么地位——至少不是无足輕重的地位！——是很难断定的。不仅是个体农民，就是集体农庄，特別是集体农庄的个别庄員，也都很喜欢依靠中間人。家庭工业的工人、合作社社員以及与农民进行交易的地方工业，也都走同样的道路。漸漸地就发生了这样出乎意料的事，即在一个广大的地区，肉、牛油和鸡蛋等商业都被“投机商”垄断了。甚至最必需的日用品，如食盐、火柴、面粉、汽油等，尽管国家的仓库里儲备着足够的数量，但是在官僚化的农村合作社中有时竟好几个星期或者好几个月沒有。显然，农民会通过其他道路来取得他們所需要的物品。苏維埃报刊常常在談到經紀人的时候，就象談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一样。

至于其他形式的私人企业和积累，作用似乎比較小些。独立的馬車夫、小客栈的老板以及单独的手艺工人，就象单干的农民一样，都是半容許的职业。在莫斯科，就有相当多的私人小企业和修理店。这些商店的存在是得到默許的，因为它們填补了經濟中的巨大裂縫。可是还有多得多的私人企业家，在各种劳动組合和合作社的虚假招牌下或者在集体农庄的掩护下活动着——就好象是为了扩大計劃經濟中的裂縫这样一个特殊的目的。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員，常常按照恶毒的投机商这样的性质，把在街上出售家庭制造的圓扁帽或者布衬衫的饥餓妇女逮捕起来。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87 頁。

## 五、官僚阶层

(見本韦第十二部分：《关于苏維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官僚化”和“蜕化变质”問題》)

## (十一) 关于苏联国家的性质

### 一、污蔑当时苏联的社会制度 不是社会主义制度

1. 污蔑当时苏联是一个“以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由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来管理的并被他們叛卖了的国家”。

不平等(尤其是如此显著的不平等)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当然是絕對不可能有的。但是同官方和半官方的谎言相反，目前的苏維埃制度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过渡性质的。它的内部仍然有着可怕的资本主义残余，尤其是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存在于官僚和无产阶级之間，而且也存在于官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在一定阶段，不平等依然会存在，在某种限度内，发展社会主义所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工具如工资差别、奖金等等仍将作为竞赛的鼓励。

虽然不平等可以作这样解释，但是决不能因为目前制度的过渡性质，就能說官僚的无法无天的上层所据为己有的那些荒謬的(公开和秘密的)特权是正当的。左翼反对派……就曾宣布官僚主义的一切表現正在扯掉苏維埃社会的道德約束；在群众中引起尖銳而正当的不满，为巨大的危机准备基础。然而，官僚的特权本身并没有改变苏維埃社会的基础，因为官僚的特权并不是来自一个

**“階級”特有的特殊的所有制关系，而是来自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所有制关系，这种关系基本上是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

摘譯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年)，  
紐約1934年版第19—20頁。

不过，苏联的全部社会关系，包括苏维埃貴族的特权在内，归根到底是以从资产阶级那儿剥夺来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为基础的，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不同，它提供了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可能性，这仍然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十月革命所掘的历史鸿沟仍继续隔离着苏维埃有计划的国家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是为拯救私有制而进行的国家干预，用阻止生产力的发展和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办法来“调整”业已过时的经济体系。自由派经济学家惯常把苏维埃经济与法西斯（意大利、德国）经济等同看待，这是无知或冒充内行的结果。苏联波拿巴官僚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胜利还决不等于资本主义反革命的胜利，虽然它也为之扫清道路。

摘譯自《第四国际和苏联》(1936年7月)，載于  
《反对派通报》1937年3月第54—55期第50頁。

**苏联是个工人国家嗎？苏联是个基于无产阶级革命所創立的所有制关系上的、由机会主义分子即新的特权阶层来管理的并被他們叛卖了的国家。如果由机会主义分子即資本的代理人所管理的和被他們叛卖了的工会可以叫做工人組織的話，苏联才可以大致上叫做工人国家（虽然在規模上有巨大的差別）。**

同上，第51頁。

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原是为了加速物质力量的增长，这种标准应当为社会主义目的服务——但只是在最终的意义上是这样。国家直接并且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质：当它在生产資料方面維

护社会财产的时候，它是社会主义的；当生活日用品是以资本主义价值尺度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情况下进行分配的时候，它是资产阶级的。对于特点的这种矛盾的說法，可能使教条主义者和經院哲学家感到害怕；我們只能向他們表示吊慰。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7—38頁。

2. 說苏联“沒有建立起生产和分配的平衡制度”，苏維埃所有制形式的基础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差得多的“低劳动生产率”，因而断言苏联的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种預备性的过渡性制度”。

就个人生活状况而言，苏維埃社会目前已經出現了一个庞大的等級：从流浪儿、妓女和流氓无产者直到过着西欧資本巨头生活的“万把”統治者。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論斷相反，无论在苏联的客观的經濟关系（劳动生产率的标准）方面，无论在劳动群众的觉悟方面（个人消費的标准）社会主义都还没有取得胜利。

摘譯自《第四国际和苏联》(1936年7月)，載于  
《反对派通报》1937年3月第54—55期50頁。

苏联的經濟文化发展进程已經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可是还一点也沒有达到内部平衡的状态。如果你们記得，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团结一致和一切需要得到妥善的滿足为基础的无阶级的社会，那么，从这个根本的意义上來說，苏联還沒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固然，苏維埃社会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矛盾很不相同，但是这些矛盾还是很尖銳的。它們的表现是物质上的和文化上的不平等、政府的压制、政治上的各种派別以及派別斗争。警

察的压制可以緩和和改变政治斗争，但是不能消灭政治斗争。被压制的思想在每个阶段都对政府的政策发生影响，有时对它有帮助，有时对它是障碍。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序言》(1936年8月4日)，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5頁。

馬克思把新社会的这个初期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以区别于高級阶段；在高級阶段，物质上的不平等以及匱乏的最后痕迹将一齐消失。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經常是以新社会的低級阶段和高級阶段来对比的。目前官方的苏联學說是，“当然我們還沒有完成共产主义，但是我們已經建成了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为了证明这一点，官方提出的論据是，在工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国家托拉斯，农业中是集体农庄，商业中是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乍看起来，这种情况完全符合馬克思想象的——因而也是假定的——方案。但是，正是对于馬克思主义者來說，如果不問劳动生产率处于什么水平而只考慮所有制的形式，那末，这个問題并沒有真正解决。馬克思的意思是，归根結蒂，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从一开始就比最先进的資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些。从理論上說，这个概念是无可非議的，因为如果就世界范围來說，共产主义即使在其最初阶段也意味着，其发展水平要比資产阶级社会高些。此外，馬克思还曾預期，法国人将开始社会革命，德国人将把这种革命繼續下去，而由英国人来完成它；至于俄国人，馬克思把他們排列在很靠后的位置上。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次序被事实推翻了。現在誰要是想把馬克思的普遍历史概念机械地运用到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苏联这个特殊的例子上，誰就会立即陷入无法擺脫的矛盾。

在資本主义鏈条上，俄国并不是最坚固的环节，而是最薄弱的环节。目前的苏联并不是超过了世界经济水平，而只不过是在設

法赶上資本主义国家。如果馬克思把在資本主义时期最先进的資本主义的生产力社会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那末，这个名称显然不适用于苏联，因为今天它在技术、文化和生活享受方面仍旧比資本主义国家差得很多。因此，这样說比較真实，即目前拥有各种矛盾的苏联制度，不应称为社会主义制度，而应称为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种預備性的過渡性制度。

在这方面，一点也沒有搬弄辞藻、咬文嚼字的意思。制度的力量和稳定性，归根結蒂，决定于相对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經濟如果拥有比資本主义优越的技术，其社会主义发展就会真正得到保证——姑且說，保证自动发展——不幸，对苏联經濟來說，这一点还根本談不上。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8月)，  
同上，第32—33頁。

正是由于苏联还远远沒有达到社会主义的初級阶段，也就是说沒有建立生产和分配的平衡制度，因此苏联的发展不是和諧地进行的，而是在矛盾中进行的。經濟矛盾产生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有它自己的发展邏輯，它并不等待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我們刚刚看到，在富农的例子上这一点是多么真实。富农并不願意演变地“长入”社会主义，出乎官僚及其思想家的意料的是，富农要求进行一次新的补充的革命。掌握着权力和財产的官僚本身，願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嗎？关于这一点，肯定可以提出疑問。无论如何，如果相信官僚在这个問題上所說的話，那是輕率的。在未来的三年、五年或十年当中，苏联社会的經濟矛盾和社会矛盾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目前不能最后肯定地回答的一个問題。結局取决于活生生的社会力量的斗争——不是在一国范围内，而是在国际范围内。

同上，第33—34頁。

近年来，有好几次宣布，說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經“完全勝利”——在談到“消灭富农階級”問題時採取了特別明确的口氣。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日，《真理報》在闡述斯大林的一篇演說時說，“在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國經濟當中資本主義因素的最後殘余將被消灭。”（重點是我們加的）從這種前景來看，國家在同一時期一定會消亡，因為資本主義的“最後殘余”被消灭以後，國家便沒有事可做了。布尔什維克黨綱在這個問題上這樣說，“蘇維埃政權公開承認，只要社會劃分為階級的情況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整個國家權力沒有完全消失，每個國家就必不可免地具有階級性。”然而，有些不謹慎的莫斯科理論家，由於相信資本主義的“最後殘余”已被消灭而得出了國家消亡的結論，結果官僚便立即宣布了這種理論是“反革命的”。

官僚的理論錯誤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基本前提上呢？還是在結論上呢？兩方面都有錯誤。最初宣布“完全勝利”的時候，左翼反對派作出的答復是：你們不可以把自己局限於各種關係的社會法律形式上，因為這些關係是不成熟的，是互相矛盾的，在農業方面還很不穩定，同時離開了基本標準：生產力水平。法律形式本身由於它所依據的高度技術水平而具有一種本質上完全不同的社會內容。“法權永遠不能高於經濟結構以及由此而決定的文化水平”（馬克思語）。如果蘇維埃的所有制形式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即把最進的美國技術成就運用到經濟生活的各个部門去——那就的確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了。但是蘇維埃的所有制形式，如果以低劳动生產率為基礎，那就只能意味著一種過渡性的制度，而這種制度的命运，歷史還沒有作出最後的估計。

我們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寫道，“這不是怪事嗎？國家不能擺脫物品荒。每採取一個步驟都會發生供應停止的情況。孩子們沒有牛奶喝。但是官方的神諭却宣稱：‘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期！’

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玷污社会主义的名字更恶毒的嗎？”卡尔·拉狄克——現在是苏联統治集團的一位著名政論家——在德国自由派報紙《柏林日报》的一期苏联专号（一九三二年五月）上，对于上面的評論避而不答，而写了这样几句堪称不朽之作的話：“牛奶是乳牛的产物，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你們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同一个乳流成河的国家形象混为一談了，因此才不了解一个国家即使沒有相当大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条件，也能在一个时期达到較高的发展水平。”这几句話是在可怕的饥荒正在全国猖獗的时候写的。

**社会主义是一种使人类需要得到最大滿足的計劃生产結構；否則它就不配称为社会主义。**如果乳牛都社会化了，但是数量太少，或者产奶不够，那就会由于牛奶供应不足而在下列一些方面发生冲突：城市和乡村之間，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之間，无产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間，整个劳苦群众和官僚之間。事实上，正是由于把乳牛社会化，才引起农民大批屠宰乳牛。由于匱乏而产生的社会冲突，可以反过来引起“一切旧欺詐行为”的复活。从本质上說，这就是我們的答复。

同上，第42—44頁。

3. 认为“苏联是一个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社会”，它“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去”。

苏联工业生产資料的主要部分已經大大增长了，而且是集中在国家手里；而在农业方面則掌握在介于个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之間的集体农庄手里。但是，国有制也还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因为后者是以作为所有制保卫者的国家的消亡，减少不平等現象，

并在社会风尚和习惯上逐渐消除财产观念本身为前提的。近年来，苏联的实际发展道路恰恰相反：不平等现象在增长；同时国家的压制也在增长。在有利的国内外的形势下，目前的国有制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可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去。

摘译自《第四国际和苏联》（1936年7月），载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3月第54—55期第49页。

把苏维埃制度说成是过渡性的或者中间性的制度，那就意味着抛弃象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这样完整的社会范畴。这样一种定义除了本身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以外，还有可能产生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目前的苏维埃制度只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性。其实，这种制度倒退到资本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一个更加完整的定义必然是复杂的和烦琐的。

苏联是一个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生产力还远远不足以使国有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二）由于匮乏而造成的原始积累的倾向，通过计划经济的无数漏洞而滋长起来；（三）保持着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标准，建立在一种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上；（四）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使劳苦者的景况改善得很慢，另一方面却促进了特权阶层的迅速形成；（五）官僚利用社会的对抗而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不受监督的阶层；（六）社会革命虽然被执政党背叛了，但是在所有制关系和劳动群众的意识当中仍然存在；（七）日益增长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也可以退回到资本主义；（八）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将不得不击溃工人的抵抗；（九）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将不得不推翻官僚。归根到底，问题将决定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现有社会力量的斗争。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86页。

## 二、說超过限度的“資產階級的分配标准”摧毁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

1. 攻击“‘按劳分配’实际上是牺牲体力劳动、特别是不熟练劳动而对‘脑力’劳动有利的一种工資支付办法”，声称“只要被迫用強制的办法維护不平等”，国家就“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每个工人国家，在初期，都将为了提高生产力而保留工資制，或者象馬克思說的，保留“資產階級的分配标准”。不过，問題要由整个发展方向来决定。在先进国家卷入革命、社会財富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平等現象会迅速消除，而国家也就再沒有什么东西可“保卫”的了。在苏維埃国家处于孤立和落后的状态下，資產階級的分配标准就将带有一种粗暴的和羞辱的性质（骇人听聞的工資悬殊、奖金、头銜、勳章等等），并且产生危及国有制本身的复辟趋势。

摘譯自《第四国际和苏联》(1936年7月)，载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3月第54—55期第45頁。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美国那样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也不能立即滿足每个人的各种需要，因此它就会被迫鼓励每个人尽量增加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鼓励者的職責自然就落在国家身上，結果它只好采取資本主义所制訂的工資支付办法，尽管作了各种各样的修改和减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写道，“資產階級式的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在它經過长久的陣痛刚刚从資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

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会的文化发展。”<sup>①</sup>

列宁在解释这段值得注意的話的时候补充說，“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資產階級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資產階級的国家，因为如果沒有一个能够迫使人們遵守法規的机关，权利也就等于零。可是，〔下面还是引用列宁的話〕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內，不仅会保留資產階級的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国家！”<sup>②</sup> 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結論被当前官方的理論家完全忽視了，但它对于了解——或者更确切点說，对于初步了解——苏維埃国家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負有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国家，只要被迫用强制的办法维护不平等——即少数人在物质上的特权，那末它就依然一个“資產階級”国家，即使已經沒有資產階級。**这些話既沒有褒的意思，也沒有貶的意思；这些話只不过是如实描繪事实。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37 頁。

**苏維埃国家就其一切关系來說，与其說接近共产主义，不如說更为接近落后的资本主义。**它甚至还不能想象“按需分配”。而且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它也不能使自己的公民“各尽所能”地工作。苏維埃国家发觉自己不得不繼續保持計件工資制，而这种工資制的原則可以归纳为这样两句话：“取之于每个人的越多越好，給予每个人的則越少越好。”說实在的，从絕對的意义上說，在苏联沒有一個人的工作能够超过自己的“能力”，即超过自己在肉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潜力。但是，在资本主义下面也是这样。最粗暴的以及最巧妙的剥削方法都不能超过自然所規定的限度。甚至一匹驃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22 頁。——編者注

② 《列寧全集》第 25 卷第 458 頁。——編者注

子在鞭子下面也是“各尽所能”的，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結論說，鞭子是驃子的社會原則。甚至在蘇維埃制度下，工資劳动也仍然帶着令人感到羞辱的奴隶制标签。“按劳分配”实际上是牺牲体力劳动、特别是不熟练劳动而对“脑力”劳动有利的一种工資支付办法，这办法对多数人來說是不公平、压迫和强制的泉源，对少数人來說則是特权和“幸福生活”的泉源。

这部宪法的作者們不是坦率地承认苏联在劳动和分配方面还实行着资产阶级标准，而是把这个統一的共产主义原則分割成两半，把后一半推迟到无限遥远的未来，而宣布前一半已經實現，并把这一点同资本主义的計件工資标准机械地結合起来，然后就把这一套做法称为“社会主义原則”，并且在这个伪造的“原則”上面建立了他們的宪法結構！

同上，第 189—190 頁。

在經濟方面具有最大的实际意义的，毫无疑问是第十条。这一条同大多数条文相反，十分明确地保障公民在家庭經濟、消費、舒适和日常生活的用品方面的个人所有权，防止官僚本身加以侵犯。除了“家庭經濟”以外，这种所有权在清除了往往与之結合在一起的那种貪婪和妒忌心理以后，将不仅在共产主义下面存在，而且还会得到空前的发展。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人还会不会要一大堆奢侈品来拖累住自己，固然是一个疑問。但是，他是不会放弃已經得到的任何享受的。共产主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证人人过舒适的生活。然而，在苏联，个人所有权問題还具有小资产阶级面貌，而不是共产主义面貌。农民和不富裕的城市居民的个人財产是官僚方面进行粗暴掠夺的对象，官僚的下层也經常靠这种手段来保证自己的相对舒适的生活。国家的逐步繁荣可以消除这种侵占別人財产的現象，甚至还可以迫使政府保护个人的积累，作为提

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推动力。同时——而这一点并不是不重要的——由于法律保护农民、工人或者办事員的茅草小屋、乳牛和家具，也就使官僚的城市住宅、避暑別墅、汽車以及所有其它“属于个人消費和享受的东西”合法化，而这些东西都是官僚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則取得的。官僚的汽車肯定会比农民的馬車受到新的根本大法更为有效的保护。

同上，第 190 頁。

2. 声称社会不平等現象尖銳化，“‘資產阶级的分配标准’早就发展到所能容許的极限”，它“将最終破坏計劃經濟的社会紀律，从而也就摧毁国家-集体农庄所有制”。

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加上大量投資、巨額軍事开支和不受监督的机构的惊人浪费，意味着就是現在大多数居民最重要的日用品也是极端缺乏的。**經濟成就对显著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來說是微小的，但对分化出广大的特权阶层來說却是綽綽有余的了。**社会矛盾在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沒有緩和，而是大大加剧了。**不平等現象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幸福生活”的贊歌只是由上层人物来唱，而下层則不得不保持沉默。

摘譯自《第四国际和苏联》(1936 年 7 月)，  
載于《反对派通报》1937 年 3 月第 54—  
55 期第 48 頁。

上边已經說过，苏联社会的社会分化主要发生在分配方面，只有部分(**主要是在农业方面**)是在生产方面。但是，分配与生产之間并不是隔着一道无法超越的壁障。官僚激起私有的、集团的和

个体的野心的公然猖獗，从而敗坏公有制思想本身。經濟特权的增长在群众中产生一种合理的怀疑：整个制度归根到底是为誰服务的？“資產階級的分配標準”早就发展到所能容許的极限，將最終破坏計劃經濟的社會紀律，从而也就摧毁國家一集体农庄所有制。

同上，第 50 頁。

建立一个沒有官僚主义的国家的初次嘗試，首先遭到了这样的困难：群众对于自治不熟悉，缺少为社会主义而努力的熟练工人，等等；在遇到这些直接的困难以后，这种嘗試又很快地遇到其他一些更加严重的困难。党綱要求，国家改为执行“核算和监督”的职能，同时逐漸縮小强制的职能，这种改变至少具有一种普遍滿足的相对条件。恰恰沒有这种必要的条件。西方沒有給予援助。当时的任务是順應那些特权集团，因为他們的存在对于国防、工业、技术以及科学來說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苏維埃的权力便受到压制，甚至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把十个人創造的东西拿来給一个人用的这种絕對不是“社会主义”的做法，在分配方面便形成并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专业阶层。

最近一个时期在經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沒有緩和不平等关系，反而使不平等現象更加尖銳化了；与此同时，官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前是一种“腐化現象”，現在却变成一种行政制度了，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并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在試圖回答这个問題以前，讓我們听一听苏維埃官僚的权威領導人怎样估計他們自己的制度吧。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 年)，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41—42 頁。

### 三、攻击当时苏联已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向资产阶级政制

1. 宣称国家消亡的程度是“衡量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最可靠尺度”，国家消亡的始点应当是官僚的消灭，可是苏维埃国家存在了二十年以后还“没有开始‘消亡’”，“新宪法巩固了苏联社会特权阶层对劳动群众的专政”。

苏联新宪法的政治意义是同官方的解释截然相反的。“斯大林宪法”并没有象官方权威人士厚着脸皮所说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了一步，恰恰相反，是后退了一步，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到资产阶级以前的政制去。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政治方面，应当表现在国家消亡上面。这种消亡的程度是衡量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的最可靠的尺度。国家消亡的始点，应当是消灭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但是，事实上新宪法却使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合法化并固定下来。不可能不是这样：特权的增长需要宪兵来保护它。

摘译自《第四国际和苏联》(1936年7月)，载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3月第54—55期第50页。

同时宪法在法律上取消了无产阶级在国家里的事实上早已被剥夺了的统治地位。此后，专政被宣布为“没有阶级的”和“全民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人民”对自己专政应当意味着国家消融于社会之中，即国家的死亡。事实上，新宪法巩固了苏联社会特权阶层对劳动群众的专政，从而使国家和平消亡成为不可能，给官僚开辟了进行经济反革命的“合法”道路，即通过“陆”路恢复资本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官僚用

“社会主义胜利”的谎言所直接准备起来的。我們的任务是号召工人阶级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反抗官僚的压迫——保卫十月的伟大成果。

同上，第 51 頁。

从一九一七年开始——即从夺取政权成为党的一个实际問題的时候起——列宁一直在思考消灭这个“寄生虫”的問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每一章中都重复和說明了这一点：无产阶级在推翻剥削阶级以后，将打碎旧官僚机器而从职员和工人当中創立自己的机器。同时无产阶级将采取措施来防止自己的机器轉入官僚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分析过的办法：(一)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換；(二)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資，(三)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暫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sup>①</sup> 你不要以为列宁所說的是十年当中的問題。不是，这是“我們应当而且必須在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方面开始”采取的第一个步驟。

在夺取政权一年半以后，布尔什維克党的綱領，包括关于军队的部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这种大胆的看法有了完整的說明。强有力国家，但是沒有官吏；武装的政权，但是沒有武士！軍事的和国家的官僚制度的建立并不是由于防御任务，而是由于社会阶级結構带进了防御組織。军队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縮影。当然，在工人国家象在其他国家一样，防止外来危险的斗争，需要的是一个专门軍事技术組織，而不是一个特权的軍官阶层。党綱要求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常备軍。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从一开始就不再是原来意义的那种

---

① 《列寧全集》第 25 卷第 468 頁。——編者注

“国家”——即一个使大多数人服从的特殊工具。物质力量以及武器都直接立刻转入象苏维埃这样的工人组织手中。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天起，国家作为一个官僚工具开始消亡。这就是党纲发出的呼声——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奇怪的是，这种呼声听起来就象幽灵从陵墓中发出的声音。

尽管你可以解释目前苏维埃国家的性质，但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苏维埃国家生存了二十年以后，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没有开始“消亡”。更糟的是，它已经发展成一个前所未闻的强制工具。官僚不仅没有消失，让位给群众，而且已经变成一个支配群众的毫无控制的力量。军队不仅没有被武装的人民代替，而且已经产生了拥有特权的军官阶层，他们享有元帅的荣衔；而人民，即“专政的武装担负者”，现在在苏联却被禁止携带甚至非爆炸性的武器。无论怎么想入非非，也很难想象有什么比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想法描绘的工人国家的图案与现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实际国家之间的对照更为鲜明。列宁的著作还在继续出版（说实在的，检查官已经作了删节和歪曲），但是目前苏联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代表们，甚至没有提出为什么纲领和现实之间存在着这样显著的差别。我们一定要设法替他们做这项工作。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4—36页。

工人国家的最后面貌，应当决定于国家的资产阶级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倾向的胜利，事实上意味着宪兵的最后消灭——即国家溶化为自治社会。只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足够清楚地了解，苏联的官僚主义这个问题，无论就其本身来说，或者作为一种征候来说，具有多么无可估量的意义！

同上，第38页。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初步了解了布尔什維克綱領和苏联現實之間的根本矛盾。如果国家沒有消亡，反而變得越來越專橫，如果工人階級的全權代表們官僚化而官僚們凌駕于新社會之上，那末，這并不是由於過去的心理殘余等次要原因造成的，而是由於只要國家不能保證真正平等就會產生並支持擁有特權的少數人這樣一種鐵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結果。

官僚主義的傾向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遭到扼殺，這種傾向即使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後也會到處表現出來。但是非常明顯的是，從革命中產生的社會越是貧窮，這種“法權”的表現就會越加嚴酷越加赤裸，官僚主義所具有的形式就會越加粗暴，同時社會主義的發展也就会越加危險。蘇維埃國家不僅被阻止消亡，甚至被阻止擺脫官僚主義寄生蟲，這並不象斯大林那種赤裸裸的警察理論所說的，是以前的統治階級“殘余”造成的，因為這些殘余本身並沒有力量。蘇維埃國家所受到的阻止，是來自力量大得無可估計的一些因素，例如物質匱乏，文化落後，以及由此產生的“資產階級法權”在最直接最密切關係到個人的領域居於支配地位——即在保證個人生存的那些事情當中居於支配地位。

同上，第38—39頁。

2. 攻擊蘇聯新憲法規定的選舉制度是回到以全體居民的“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選舉為基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就是“從政治上”把無產階級“溶解於‘全民’之中”，“從法律上取消無產階級專政”。

在野蠻社會中，騎馬的人和步行的人構成兩個階級。汽車使社會分化的程度並不亞於有鞍的馬。只要甚至一輛中等的“福特牌”汽車還是為少數特權者所有，那麼，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一

**切关系和习惯就会保留下来。与此同时，不平等的维护者国家也会保留下来。**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0—41页。

我們現在从莫斯科一家報紙的最新一期上看看对于苏联現行制度的固定說法，这种說法是全国到处天天重复和学校的兒童必須牢記在心的許多說法之一，即“在苏联，資本家、地主和富农等寄生階級已經彻底消灭，因此已經永远結束了人剝削人的現象。整個國民經濟已經變成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日益高涨的斯达汉諾夫运动正在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真理报》)不用說，共产国际在全世界的报刊对于这个問題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如果剝削已經“永远結束”，如果國家現在的确已經走上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过渡到高級阶段的道路上，那末，社会除了最終扔掉國家这件紧身衣以外就沒有什幺可做的了。可是与此相反——这种矛盾現象甚至难以捉摸！——苏維埃国家反而具有了一种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的性质。

同上，第77頁。

在政治領域，新宪法同旧宪法的差別在于，从按照階級和产业团体进行选举的苏維埃制度又回到以全体居民进行所謂“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为基础的資产阶级民主制度。简单地說，这就是从法律上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沒有資本家的地方也就沒有无产阶级——新宪法的創作者这样說——因此国家本身已經由无产阶级国家变成全民国家。这种論断不管从表面上看多么动人，不是提得晚了十九年就是提得早了許多年。无产阶级在剥夺資本家的时候，实际上已經进入作为一个階級来消灭自己的时期。但是，从原則上消灭到实际上溶解于社会之中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新国家

被迫进行資本主义的初步工作越久，这条道路也就越长。蘇維埃无产阶级依旧作为一个与农民、技术知識分子和官僚大不相同的阶级存在，而且作为自始至終关心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阶级存在。新宪法要在这个阶级从經濟上溶解于社会当中以前很久，就从政治上把它溶解于“全民”之中。

同上，第 190—191 頁。

### 3. 揚言“无产阶级还必须再进行第二次补充革命来反对官僚专制”，以“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苏联工人阶级已經被剥夺了合法改造国家的最后可能。反对官僚的斗争必然要变成一場革命斗争。第四国际忠于馬克思主义的传统，坚决反对个人恐怖，就象它反对其他一切政治冒险主义手段一样。只有反对篡位者、寄生虫和压迫者的自觉的群众运动才能消灭官僚。

如果要苏联回到資本主义去需要一次社会反革命，即推翻生产資料和土地的国有制并恢复私有制，那么，对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來說，一場政治革命，即用暴力推翻蜕变变质的官僚的政治統治，以便保存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所有制关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苏联的无产阶级先鋒队，依靠全国的劳动群众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必須用暴力打倒官僚，恢复蘇維埃民主，消灭駭人听聞的特权，保证真正向社会平等前进。

摘譯自《第四国际和苏联》(1936年7月)，載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3月第54—55期第51頁。

正如我們已經听到过的，阶级矛盾的消除已經为政治上的平等奠定了基础。专政已經不再是阶级专政，而是“人民”专政了。但是，如果专政者变成摆脱了阶级矛盾的人民，那就只能意味着专政

已經溶解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首先意味着官僚已經消亡。馬克思的學說就是这样教導的。那麼也許是搞錯了吧？但是，宪法的作者們尽管小心翼翼，还是提到了列寧起草的党綱。这里就是党綱里真正說过的話：“……对政治权利的剥夺以及对自由的所有其它限制，只是作为临时措施來說才是必要的……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逐漸消失，这些临时措施的必要性也逐漸消失。”因此，放弃“对政治权利的剥夺”同废除“对自由的所有其它限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不仅在于农民同工人居于平等地位，也不仅在于资产阶级出身的少数公民恢复了政治权利，而且首先在于百分之百的居民享有真正的自由。隨着阶级的消灭，不仅官僚消亡，不仅专政消亡，而且国家本身也消亡了。然而，只要哪个不謹慎的人試圖在这方面拐弯抹角地說一句，国家政治保卫局就会在新宪法当中找到适当的根据把他送进无数集中营之一。阶级消灭了。苏維埃只留下了空名。但是官僚还存在。工人和农民的权利平等，实际上只不过意味着在官僚面前都沒有权利。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92—193頁。

一次工人革命所产生的国家存在下来，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国家所必需经历的阶段还没有先例可循。不錯，苏联的理論家和創造者希望，完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和具有灵活性的苏維埃制度将会使国家按照社会的經濟文化演变阶段来和平地轉变、解体和消亡。然而，在这里，生活再一次证明比理論所預期的要复杂得多。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注定要完成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这个历史特权，从一切迹象来看，无产阶级还必須再进行第二次补充革命来反对官僚专制。新革命的綱領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革命爆发的时刻、国家已經达到的水平以及国际形势。

这个綱領的基本因素已經清楚，在本书分析苏維埃制度的矛盾以后得出的客观論斷中已經指出。

同上，第 211—212 頁。

十月革命后建立了工人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生产資料的国家所有制使生产力有了迅速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工人国家的机构在这同时也发生了全面的蛻化：它从工人阶级的武器变成了官僚对工人阶级使用暴力手段的武器，并且日益成为破坏国家經濟的武器。一个落后而孤立的工人国家的官僚化和官僚的变成一个十分强大的特权等級的事实是对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最有說服力的反駁——不仅是在理論上，而且这一次是在实践上。

因此，苏联內部包含着可怕的矛盾。但是它仍然是一个蛻化的工人国家。对苏联的社会診断就是这样。其政治前景不外两种可能：要么是愈来愈成为世界資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机构的官僚集团推翻新的所有制形式，把国家拉回资本主义，要么是工人阶级起来粉碎官僚集团从而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摘自《資本主义的垂死掙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938 年 9 月 3 日)，紐約 1946 年版 第 47 頁。

## (十二) 关于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官僚化”和“蜕化变质”

### 一、說世界革命不取得胜利， 就会出現資本主义复辟

1. 胡說在落后國家內，革命勝利後無產階級隊伍中“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反動”。声称世界革命如不取得勝利，“長期孤立的不可避免的結局，不是民族共产主義，而是資本主义复辟”。

說到底，苏联发展的一切矛盾就这样导致了被孤立的工人國家同資本主义对它的包围之間的矛盾。由于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國家建設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經濟，就会使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矛盾每到一个新阶段都要以更大的規模和更大的深度重新出現。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世界其他部分的資本主义政权表明自己能够維持另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的話，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破坏。但是，只有那些相信資本主义是牢固的或长命的人才能认为这种前途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哪怕是最可能的。左派反对派与这种資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它也同样不能同意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这个理論是向資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投降的表現。

摘譯自《苏联的发展問題》(1931年4月4日)，  
紐約1931年版第9—10頁。

工人国家的正确政策不能降低到仅仅限于本民族的經濟建設。如果革命不循着无产阶级的螺旋綫向国际舞台扩展，那它必然会开始沿着官僚的螺旋綫局限于民族范围之内。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发展成欧洲和世界規模，它必然会朝着它本身崩溃的方向发展。作为广泛的历史远景，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无可爭辯的。

摘譯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 年)，  
紐約 1934 年版第 4 頁。

已經為官僚主義所削弱的蘇維埃政權瓦解的危機和無產階級團結在一個能夠拯救十月革命遺產的新黨周圍的時機，哪一個會先到來呢？對於這個問題沒有現成的答案，這要由鬥爭來決定。一個重大的歷史性考驗——可能是一次戰爭——將會決定力量的對比。總而言之，隨著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繼續衰落和法西斯統治的繼續擴大，蘇維埃政權已經不再可能單單依靠內部力量來維持下去，這一點是很明顯的。蘇維埃國家唯一徹底改造的基本條件是勝利地開展世界革命。

同上，第 26 頁。

戰后的革命危機，並沒有導致社會主義在歐洲取得勝利。社會民主黨人拯救了資產階級。在列寧和他的同事看來似乎是短暫的一段“喘息時機”，已經延長成一整個歷史時代。蘇聯的矛盾的社會結構及其國家的極端官僚主義性質，都是這種獨一無二的和“未能預見”的歷史停頓所帶來的直接結果，與此同時，這種歷史停頓還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導向法西斯主義和准法西斯主義的反動局面。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 年)，  
三聯書店 1963 年版第 41 頁。

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于世界形势和内部力量的具体对比。但是阶级本身是在沙皇統治和落后的资本主义的野蛮条

件下形成的，而絕不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形成的。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正是由于这一点，在許多方面还落后的无产阶级，才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以空前的速度从半封建的君主政体跳跃到社会主义专政；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的队伍中才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反动。这种反动发展成一系列連續不断的浪潮。外部条件和事态发展都不断促进这种反动。一次干涉接着一次干涉。革命沒有从西方直接得到帮助。国家沒有出現預期的繁荣，却长期陷于前景不妙的貧困状态。不仅如此，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国内战争中死亡，就是高升几級而脱离了群众。这样，在力量、希望和幻想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紧张阶段以后，便产生了疲倦、消沉和对革命結果极度失望的情緒。“平民自豪感”进入低潮而让位給胆怯和自私自利的浪潮。新統治阶层就在这种浪潮上达到自己的地位。

五百万紅軍的复員，对于官僚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指揮官，在地方苏維埃、經濟部門和教育部門担任了领导职务，他們把国内战争时期保证取得胜利的那种制度坚决地貫彻到每个地方。于是，群众便在各方面逐步地被排除实际参加国家的领导工作。

无产阶级内部的反动，使城乡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有了极大的希望和信心，新經濟政策給了他們新生命，他們越来越大胆。最初作为无产阶级代理人的年輕的官僚，現在开始觉得自己是各个阶级之間的仲裁法庭了。官僚的独立性越来越得到加强。

同上，第64頁。

說实在的，苏联的孤立并沒有产生人們本来所怕的那些具有直接危险的后果。资本主义世界太散漫混乱，瘫痪无力，因此它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潜力。事实证明“喘息时机”比有眼光的乐观主义者所敢希望的还要长些。由于孤立，由于即使在资本主义基础上

(对外貿易額从一九一三年以来已經減少了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也不能使用世界經濟資源，結果不仅使軍事防御費用浩大，而且使得生产力的分布极端不利，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但是，孤立和落后所產生的一个更有害的产物却是官僚主义這条孽魚。

革命所建立的法律和政治准则对落后的經濟起了一种进步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准则本身却受到那种落后所发生的消极影响。**苏联在資本主义的包围中的時間愈長，社會結構的蛻化也就愈深。长期孤立的不可避免的結局，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而是資本主义复辟。**

同上，第 219—220 頁。

2. 断言各国革命的失敗“摧毁了苏联群众对世界革命的信心”，把官僚看作“唯一的救星”；領袖們的心里“普通人的特性，自滿官吏的感情和兴趣复活起来了”，他們有了“自己的独立目的”，热中于歌舞享乐，利用群众的“困惑和消极情緒”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大胆地依靠同富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种“蛻化思想的产物”就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

但是，由于世界革命运动一系列的失敗和从而产生的悲观情緒，斯大林集团甚至自己也沒注意到，它对于目前时代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和本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估計。**一国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論”主要地是产生于这样的假設：資本主义的“稳定”将要持續几十年。这整个“理論”本质上是“稳定論”信徒的蛻化思想的产物。**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受到社会革命党、无论其右翼或左翼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切尔諾夫本人已經著文論述关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的民粹主义”問題。左翼社会革命党

机关报写道：“斯大林和布哈林正象民粹主义者那样，肯定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胜利。”<sup>①</sup> 社会革命党支持这个理論，因为他們从这里看到世界革命的策略已被放弃。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 年 9 月)，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92 頁。

領導过夺取政权斗争的革命者在某一阶段开始丧失——不論是以“和平的”方式或者通过灾变——政权，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某些思想或某些情緒的影响在革命指导分子当中日趋衰落，或者表明群众内部发生了革命精神的衰退，或者表明同时发生了这两种情况。经历了地下活动的党，其领导集团是受到革命初期的领袖們明白宣布并在实践中完滿地执行的革命倾向的激励的。正是因为这个緣故，他們才做了党的领导人，而且通过党做了工人群众的领袖，通过工人阶级做了国家领导者。某些个人就是經過这条道路把政权集中到自己手里的。但是革命初期的思想，在那些直接执掌政权的党员中，不知不觉地逐渐丧失了影响。

在国家中，也发生了一些过程，这些过程可以概括在“反动”这个总名称之下。这些过程也或多或少地波及工人阶级，甚至波及于他們的党组织。于是构成政权机关的那个阶层漸漸形成自己的独立目的，而且力图使革命服从这些新的目的。在那些代表阶级的历史路綫而且能超越机关观察形势的领袖以及把平庸的共产党人卷入漩渦的龐大、繁复、成分复杂的机关之間发生了分化。起初，这种分化只是心理性质而不是政治性质的。过去的时代在人脑子里的印象仍然很新鮮。十月革命的口号还没有被人遺忘。革命初期的领袖的威信还有很大作用。但在传统形式的掩盖下，一种不同的心理逐渐形成了。……国际范围的前景愈来愈黯淡。人們

---

<sup>①</sup> 《斗争的旗帜》1926 年第 17 号、18 号。——托洛茨基注

完全淹沒在日常工作之中。結果新的方法不是为旧的目的服务，却引起了新的目的，尤其是引起了一种新的心理。在許多人眼中，暂时的局面似乎变成了最終的目的。一种新类型的人是在形成了。

革命者归根到底也和其他一切人一样是由同样的社会材料构成的。但他們当然具备某些特出的个性，因而他們才能在历史过程中成为与众不同的一群。彼此的交往，理論工作，在同一明确旗帜下进行的斗争，集体的紀律，被危险的烈火中所受的鍛炼，——这些漸漸造成了革命类型。人們可以完全正当地說，布尔什維克的心理类型与孟什維克的心理类型完全不同。……然而这并不是說一个布尔什維克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布尔什維克。他們的心理中有許多沒有防卫的陣地，这些陣地在形势改变的时候很容易遭到外来和敌对思想的侵袭。在地下斗争时期，暴动时期，国内战争时期，这一类人只是党的战士。他們的思想都扣在一条心弦上，而这一条心弦的音响是与党的声音和諧一致的。但是等到紧张的局面緩和下来，从革命者的流浪生活过渡到安定生活的时候，普通人的特性，自滿官吏的感情和兴趣便在他們的心里复活起来。

我常常听到加里宁，伏罗希洛夫，斯大林，李可夫等人不时說出一些前后不連貫、令人担忧的話。我不禁自問：这些話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当我去参加会议的时候，我往往发现他們三五成群地在談話，他們一看見我到来，往往就停止不談了。他們这些談話中絲毫沒有反对我的东西，也完全沒有反对党的原則的地方。但这些談話表明了一种精神松懈，自滿，浅薄庸俗的情緒。人們开始感到有互相傾吐这种新情緒的冲动；順便說一句：在这种情緒中，小資产阶级的庸俗閑話占据非常显著的位置。

在新的当权阶层的生活中，娱乐活动愈来愈普遍。我所以不

去参加，并非因为道德的原因，而是因为我憎恨沾染上那些无聊的习气。互相拜訪，經常观看芭蕾舞剧，参加宴会，在宴会上私下議論人家的短长等等，这些我是毫不感兴趣的。新的統治集團认为我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他們甚至不想邀我去参加。正因为这个緣故，好多小集團的談話一見到我来就立即停止了，談話的人也散开了，他們自己感到有点难为情，同时也有点厌恶我。可以說，这就是我开始丧失政权的明白迹象。

反对不断革命論的論調，正是从这种心理根源产生出来的。这运动是庸俗、无知、而且簡直是愚蠢的。从观看芭蕾舞剧归来，或坐在一瓶酒面前閑聊的时候，这个自滿的官吏会对那个自滿的官吏說：“托洛茨基滿脑袋裝的只是不断革命。”与这种情緒密切联系着的还有一些对我的責备，說我孤僻不爱交际，个人主义，貴族气派。“不能一切一切、时时刻刻都为革命，也得多少想想自己。”——这个情緒随后便变成为一声：“打倒不断革命！”这些人对馬克思主义的严格理論要求和革命的严格政治要求的反抗逐渐地采取了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形式。在这个旗帜下，小資产阶级的原形就从布尔什維克面貌中显露出来。这便是我所以丧失政权的緣故，这也决定了我丧失政权的方式。

摘譯自《托洛茨基自傳》(1929年)，  
紐約 1930年版第502—505頁。

国际形势也以巨大的力量朝同一方向推进。世界工人阶级遭到的打击越沉重，苏維埃官僚的自信心越强。二者之間不仅有一种年代上的关系，而且有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在两方面都起作用。官僚的领导人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失败；而这种失败又促进了官僚的兴起。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亚起义的失败和德国工人党不光彩的退却，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起义企图的瓦解，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的被叛卖和波兰工人党在毕苏斯基上台时的可耻行为，一

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慘遭屠殺，最後還有德國和奧地利最近遭到的更為不祥的失敗——所有這些歷史性災禍，摧毀了蘇聯群眾對世界革命的信心，並使官僚作為唯一的救星而越來越提高自己的地位。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64—65頁。

的確，有成千上萬的革命戰士團聚在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派的旗幟周圍。先進的工人毫無疑問地是同情反對派的，但這種同情是消極的。群眾不相信一次新的鬥爭可以大大地改變局勢。與此同時，官僚說：“為了國際革命，反對派建議把我們拖進一次革命戰爭。動盪已經夠了！我們已經贏得了休息的權利。我們一定要在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請信賴我們，信賴你們的領導人！”這種休息的福音大大地鞏固了官僚以及軍官和國家官員，並且毫無疑問地在疲倦的工人當中，特別是在農民群眾當中得到了共鳴。他們問自己：反對派真是為了“不斷革命”的想法而準備犧牲蘇聯的利益嗎？實際上，這種鬥爭同蘇維埃國家的生存利益是一直有關係的。共產國際在德國執行的錯誤政策，十年後造成了希特勒的勝利——即造成了一種來自西方的具有威脅性的戰爭危險。在中國執行的同樣錯誤的政策，支援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使東方的危險大大迫近。然而，反動時期的特點，首先還在於缺乏勇敢的思想。

反對派被孤立了。官僚們則趁熱打鐵，利用工人的困惑和消極情緒，使其中比較落後的階層反對先進的階層，而且一般地說來越來越大胆地依靠同富農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在不多的幾年當中，官僚就這樣破壞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

同上，第65—66頁。

## 二、說當時蘇聯出現了五六百萬人的官僚階層，他們獨占了文明的新老成果

1. 胡說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就“改變了無產階級本身的內部結構”，出現了以“運用政權”為專門工作的固定社會集團，他們“急於解決自己的社會問題”。說蘇聯“由於政治路線和黨的制度的蛻化變質”，到一九三六年產生了五、六百萬人的官僚階層，而成為“專制的統治集團的真正社會基礎”的則達二千五百萬人。認為這些占人口總數“15%或20%的居民所享受的財富，並不比其余的80—85%的居民所享受的少多少”。

克里斯琴·拉柯夫斯基，以前擔任過烏克蘭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後來擔任過蘇聯駐倫敦和巴黎的大使，他在一九二八年流放期間曾經給他的朋友寫過一封信，簡略地探討蘇維埃官僚。這封信，我們在上面已經已用過好幾次，因為它至今還是關於這個問題所寫的一篇最好的東西。拉柯夫斯基在這封信中說，“在列寧的心中，以及我們大家的心中，黨領導的任務在於保護黨和工人階級，使他們不受當權者方面由於擁有特權、地位和任命權而做出的腐敗行動的影響，不同舊貴族和舊市民的殘余接近，不受新經濟政策的腐化的影响，不受資產階級道德和思想意識的誘惑……我們必須坦率地、明確地和高聲地說，黨機關並沒有完成這項任務，它暴露了自己完全沒有能力發揮保護者和教育者的雙重作用。它失敗了，破產了。”

.....

政权的取得不仅改变了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无产阶级本身的内部结构。运用政权成了一个固定社会集团的专门工作，这个集团越把自己的使命看得高，它就越急于解决自己的“社会問題”。拉柯夫斯基继续作了解释：“在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中，执政党的党员是不容许进行资本主义积累的，分化最初是职务上的，但是后来就成了社会上的了。我不是說这种分化变成一种阶级分化，而是說变成社会分化……拥有汽车、美好住宅、定期休假和得到党的最高薪水的共产党员，同在煤井中工作、每月得到五六十个卢布的共产党员比較起来，社会环境是不同的。”拉柯夫斯基列举了雅各宾党人在执政时期蜕化的原因——如追逐财富、参加政府的商业合同和供应等等，他还引用了巴贝夫的这样一种奇妙的評論：新統治阶层的蜕化，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受了以前的貴族小姐的影响，雅各宾党人对于她們是非常友好的。巴贝夫叫喊道，“你們这些小心眼的平民，你們在干什么呀？今天她們拥抱你們，明天她們就会絞死你們。”如果調查一下苏联統治阶层的妻子，那就会显示一种类似的景象。苏联的著名記者索斯諾夫斯基曾經指出“汽車-閨房的因素”对于形成苏維埃官僚的精神面貌所起的特殊作用。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3—74頁。

一九二三年，情况开始稳定。内战，象同波兰的战争一样，已肯定地过去了。饥荒的最可怕的后果已經克服，新經濟政策刺激了国民經濟，使它得到了蓬勃的恢复，經常把共产党员从一个崗位調到另一个崗位，从一个活动范围調到另一个活动范围，不久已成为例外的情况，而不再是一种常規。共产党员开始得到长期的职位，〔这是从他們自己的地盘导致更高的职位的地盤，他們〕开始以有計劃的方式来管理那些交給他們管理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地

区。〔他們迅速地变成官員，变成官僚，因为〕黨員和官員的职位安排有了一种更有系統和更有計劃的性质。任命职务不再被认为是临时性的和几乎是偶然性的了，任命的問題同个人的生活問題，〔被任命者的〕家庭的生活条件，他的前途，有愈来愈大的关系。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下冊第500—501頁。

目前在中央委員會和党的一般領導机关里存在着三种基本傾向。

第一种傾向是公然无忌的右傾。这种傾向又包括两个集團。其中之一，由于它的机会主义和軟弱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代表“經濟上有勢力的”中农的。它的路綫是中农决定的，它受到中农思想的指导。属于这个集團的有这样一些同志：李可夫，亚·彼·斯米尔諾夫，加里宁，格·彼得罗夫斯基，楚巴尔，卡敏斯基及其他人。紧紧圍繞着他們活動的是一些“非党”政客：康德拉节也夫之流，薩基林之流，查雅諾夫之流，以及富农的其他代表們，他們或多或少地公开宣揚烏斯特里雅洛夫的理論。在每一个省，尤其在每一个县都可以看到不少小康德拉节也夫和小薩基林，他們在那里拥有一份真正的权力和影响。第一种总傾向的另一个集團是由工会領袖构成的，他們代表著工人和職員中的高薪阶层。这个集團的特点是希望同阿姆斯特丹国际<sup>①</sup> 加强联系。这个集團的領袖是托姆斯基，麦里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同志。这两个集團之間有一定程度的摩擦，但是它們要使党和苏維埃国家的路綫无论在国际政策或國內政策上右傾的意图，却是一致的。它們都是以蔑視列寧主義理論和鄙弃世界革命策略著称的。

第二种傾向是官僚机器的“中派主义”。这种傾向的領袖是斯

① 改良主义的工会国际組織，正式名称是“国际工会联合会”，1919年7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受第二国际领导。1945年12月14日解散。——編者注

大林，莫洛托夫，烏格拉諾夫，卡岡諾維奇，米高揚，基洛夫諸同志。实际上就是現在的政治局。不断搖摆的布哈林“代表了”这一集团的政策。这个官方中間集團本身絕不代表任何广大群众的态度，但是它却企图——不是沒有成功——使自己代替党。党的、工会的、产业机构的、合作社的、国家机关的“行政人員”現在已达几万人。其中有不少“工人”官僚——这就是說，以前是工人，而現在同劳动群众已經失去了一切联系。

不消說，在对革命前途有如此巨大重要性的行政和領導机关里，当然也有成千上万坚定的革命者，他們是沒有同群众断絕联系、无限忠誠于工人事业的工作人員。他們在这些机构里进行着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由于政治路綫和党的制度的蛻化变质而產生了人数众多的真正官僚阶层这个事实。

这个阶层的实际权力是巨大的。正是这个“行政人員”集团坚持主张“安安靜靜”，“关心业务”——而最主要的是“不准討論”。正是这个集团自滿地宣布(并且有时是真正地认为)，我們已經“快要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綱領的十分之九”已經完成。正是这个集团“高高在上地俯視”全党，更加高高在上地俯視非熟练工人、失业者、雇农。这个集团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左边——这就是說，在革命的列寧主义者之中。这个集团提出“向左开火”的口号。

目前，右和“中間”这两种傾向，由于它們共同敵視反对派而團結起来。但是如果清除了反对派，它們之間的冲突就会加剧。

第三种傾向就是所謂“反对派”。这就是党的列寧主义派。由于統治集团要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它就可鄙地企图把反对派說成是一个右傾派別(“社会民主主义傾向”等等)。反对派是拥护党的統一的。斯大林硬說反对派要建立“第二个党”，他在这面謊言的旗帜之下宣传自己的綱領——“清除”反对派。反对派用自己的

口号回答道：“不惜任何代价維护列宁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統一”。目前这个文件闡明了反对派的綱領。黨內的工人阶级成分和一切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維克将会拥护它。

反对派不得不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列宁的事业而斗争，因此个别人背离反对派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三种倾向的領袖中間将会发生个别人的重新組合，但是这种重新組合并不能改变这个問題的根本事实。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4—76頁。

按照官方数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的中央国家机关領導人員約为五万五千人。但是，这个数字(最近几年又有了很大的增长)既沒有包括陸軍部、海軍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也沒有包括合作社和象国防航空化学协进会<sup>①</sup>这样的一系列所謂社会团体。此外，每个共和国还有自己的政府机关。

同国家机关、工人、合作社以及其他机关(有一部分是互相交错的)平行的，还有强有力的党机关。如果我們說苏联和各个共和国的上层领导集团有四十万人，那很难說是夸大。目前这个数字很可能已經增加到五十万。这还没有包括一般干部，而只包括“达官貴人”、“领导人”——姑且这么說——即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統治阶层，虽然說实在的，它本身又为很重要的界限分成若干等級。

这个拥有五十万人的上层，由一个巨大的行政金字塔支持着，而这个金字塔的基础是寬闊的和多方面的。各省各县的苏維埃执行委员会，以及与此平行的党机关、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运输机关、陸軍和海軍的司令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直属机构，总共大約有两百万人左右。同时我們还不能忘記六十万个城乡苏維

---

① 全称是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工业发展协进会。——英譯者注

埃的主席。

工业企业的直接管理权在一九三三年(沒有更新的材料)是掌握在一万七千名經理和副經理的手中。車間、工厂和矿山的全部行政管理人員和技术人員，甚至包括較低的职位如工长，大約有二十五万人(虽然其中有五万四千名专家，严格地說来并沒有担负行政管理的职能)。此外，我們还必須加上工厂中的党机关和工会机关。正象我們所知道的，在工厂里，行政管理就是以这种“三角”的形式进行的。有五十万人管理着全国性的工业企业，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个数字并沒有夸大。另外我們还必須加上各个共和国和地方苏維埃的企业中的管理人員。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官方的統計數字表明，一九三三年整个苏联經濟有八十六万以上的行政人員和专家——工业中有四十万以上，运输业中有十万以上，农业中是九万三千人，商业中是两万五千人。这个数字固然包括了沒有行政权力的专家，但并沒有包括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这些材料在最近两年半当中也大大地落后于实际情况了。

就二十五万个集体农庄來說，如果只計算主席和党的組織者，那就有五十万行政管理人員。实际数字要大得多。如果加上国营农場和机器拖拉机站，社会化农业的領導者总数，远远超过一百万。

一九三五年，国家有一十一万三千个商业部門，有二十万个合作社。这两类机构的領導人，从本质上說并不是商业雇員，而是国家干部，并且还是垄断者。連苏联报刊也不时地抱怨，“合作社的管理人員已經不把合作社社員看成自己的选民了”——好象合作社机构在性质上可以同工会、苏維埃和党本身截然分开！这整个阶层都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只是管理、下令、指揮、寬恕和惩罚，撇开教师和学生不算，这个阶层总在五六百万人之間。这个总数

就象构成这个数字的各个項目一样，根本談不上准确，但很够我們进行初步的研究。事實足以使我們确信，領導的“总路綫”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

在这个統治結構的各个阶层中，从下到上，共产党员大約占百分之二十到九十。在全部官僚当中，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大約有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人——由于接連不断的清洗，目前这个数字只有少了一些，而不会增加。这就是国家政权的支柱。这些共产党行政管理人員也正是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柱。以前的布尔什維克党，現在已經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鋒队，而成了官僚的政治組織。剩下的党员和共青團員只是构成这种“积极分子”的泉源——即补充官僚队伍的后备軍。非党的“积极分子”也是为同一目的服务的。从假定的意义上說，我們可以认为，工人貴族和集体化农民貴族、斯达汉諾夫工作者、非党“积极分子”、得到信任的人以及他們的近亲远戚，差不多等于我們估計的官僚數字，即大約也在五六百万人之間。如果再加上他們的家属，那这两个相互交錯的阶层大約有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我們对家庭成員的估計相对地來說比較低些，因为往往丈夫和妻子，有时甚至儿子和女儿都在机关里占着一个位置。此外，統治集团的妻子在限制家庭人口方面要比劳动妇女，特別是比农村妇女容易得多。目前的反墮胎运动是官僚发起的，但并不适用于他們自己。人口的 12%，也許有15%——这就是专制的統治集團的真正社会基础。

只要还是只有很少数人能够得到单独的住宅、足够的食品和整洁的衣服，那末，几百万大小官僚就会首先設法利用权力来保障自己的福利。这样就会使这个阶层具有濃厚的自私自利心理，使它的内部有一种牢固的團結一致精神，使它害怕群众的不滿情緒，使它頑固地坚持压制一切批評，最后还使它向“領袖”进行虛伪的宗教式的膜拜——这是因为这位“領袖”正是这些新貴族的权力和

特权的体现者和维护者。

**官僚本身在协调一致方面比无产阶级或农民还要差。**农村苏维埃的主席和克里姆林宫的达官贵人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各种范疇的低級干部基本上过着一种很原始的生活——比西方熟练工人的生活水平还要低。但是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他們周围的居民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得多。集体农庄主席的命运，党的組織者的命运，合作社下級管理人員的命运，就象最高級上司的命运一样，一点也不决定于所謂“选民”。为了平息某种不滿情緒，这些干部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自己的直接上司搞下去。但是他們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有时也可以高升一步。这些人至少在遇到第一次严重的波折以前，是由于共同的安全保障而同克里姆林宮結合在一起的。

**統治阶层在生活条件方面包括各种各样的等級，从边远地区的小資产阶级生活一直到大都会的大資产阶级生活。同这些物质条件相适应的，也有各自的习惯、兴趣和思想范围。**目前苏联工会的領導人在心理形态方面与西特令、石烏和格林<sup>①</sup>之流并沒有多大的不同。虽然言詞有所不同，但是同样的以傲慢的恩人态度对待群众，同样的以沒有良心的狡猾手段施展二流的阴谋詭計，同样的保守，同样的眼界狭小，同样的只关心自己的平静生活，最后，同样的崇拜最浅薄的資产阶级文化形式。苏联的大多数将校軍官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将校軍官也沒有什么不同，而且不顾一切地竭力模仿后者。苏联外交家从西方外交家那里学到的不仅是燕尾服，而且还有他們的思想方式。苏联新聞記者在愚弄讀者方面也不亚于他們的外国同行，虽然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方式。

**如果说估計官僚的人数是一件困难的事，那末，要确切地說出**

---

① 都是英、法、美的改良主义工会領袖。——編者注

**他們的收入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早在一九二七年左翼反对派就曾抗議，“龐大的享有特权的行政機關正在吞掉很大一部分剩余價值”。根据反对派綱領中的估計，单单貿易机关就“吞掉一大部分國民收入——占全部生产的十分之一以上”。由于这种估計，当局便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使別人无法再做这种估計。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經常性开支不仅沒有削減，反而增加了。

其他方面的情况并不比貿易方面好些。正如拉柯夫斯基一九三〇年所写到的，正是由于党的官僚和工会的官僚之間偶然发生的一次爭吵，居民才从报刊上发现，在工会的高达四亿卢布的預算中，就有八千万卢布是用来养活工作人員的。我們要指出，这里还只不过是一个合法預算的問題。除此以外，工会官僚还从工业部門的官僚方面得到大量表示友誼的礼品，例如現金、住宅、交通工具，等等。拉柯夫斯基問道，“究竟有多少錢是用来維持党、合作社、集体农庄、国营农場、工业机关和行政機關以及它們的分支机构呢？”他的回答是，“我們連假設的材料都沒有。”

**摆脱監督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濫用职权，其中包括金錢方面的不法行为。**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政府又一次被迫提出了合作社的工作情形不好的問題，在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签字下，政府确定了这样的事實：“在許多农庄消費合作社中，存在着大量掠奪、浪費和損失現象。”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执行委員會的一次会议上，財政人民委員抱怨說，地方执行委員會容許隨便濫用国家的資金。如果这位委員对于中央机关的情况保持沉默的話，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本人就属于那个范围。

要估計官僚在国民收入方面佔用了多大的比例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官僚連自己的合法收入也謹慎地隐蔽起来。也不仅是因为他們可以利用不法行为的最后界限，常常还可以越过这种界限来广泛地使用事先預計不到的收入。而主要是因为在社会福

**利、市政公用事业、舒适、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整体进步，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至少主要还是为这个特权上层服务的。**

关于官僚的消費情况，我們只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就可以把說过資產階級的話重說一遍。沒有理由夸大官僚对于个人消費品的欲望，这样做也沒有意义。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官僚几乎独占了文明的新老成果，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从名义上說，这些好东西当然是属于全体居民的，至少是属于城市居民的。但是实际上，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居民才可以得到这种东西。官僚的情况恰好相反，他們通常想什么时候使用就什么时候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就好象是他們个人的財产一样。如果不仅計算薪水和各种各样的实物收入以及各种型式的半合法补充收入，而且还加上官僚和苏維埃貴族在影剧院、休养所、医院、疗养院、避暑地、博物館、俱乐部以及体育场等地方所享受的待遇，那也許有必要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即**15%或20%的居民所享受的財富，并不比其余的80—85%的居民所享受的少多少。**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98—103頁。

2. 认为官僚不是“一个独立的統治阶级”，它不进行“阶级剥削”，而是“社会寄生”，它“并没有改变苏維埃社会的基础”。

阶级对于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具有极其重要的，而且有科学限制的意义。一个阶级并不是单单依据它参加国民所得的分配情况来确定的，同时还要根据它在整个經濟结构中的独立作用以及它在社会經濟基础中的独立根源来决定。每个阶级（封建貴族，农民，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其特殊的所有制

形式。官僚沒有这些社会特征。他們在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中沒有独立的地位。他們沒有独立的所有制基础。他們的作用基本上同階級統治的政治技巧有关，每一个階級統治都有各种形式和不同規模的官僚存在。它的政权是属于反映的性质。官僚同經濟上的統治階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依靠后者的社会基础而生存，它和后者一同存在，并隨着后者一同灭亡。

摘譯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年)，  
紐約 1934 年版第 18 頁。

在各种政权中，官僚总归是要吞沒不小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例如，計算一下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蝗虫所吞沒的国民所得也許不是沒有兴趣的！但是这个本身相当重要的事实，仍然完全不足以把法西斯官僚轉变成一个独立的統治階級。他們是資产阶级的走狗。尽管这种走狗常常騎在主子的脖子上，不时夺取他口中最肥的肉，而且还对着主子的秃头吐痰。不管你怎么說他們是极不听話的走狗！但是仅仅是走狗而已。資产阶级所以容忍他們，因为沒有他們，資产阶级和它的統治必然会灭亡。

把上面所說的作一些必要的更改就可以适用于斯大林官僚。他們吞沒，浪费，侵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所得。无产阶级为他們的管理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苏維埃社会中，他們不仅在享有政治和行政特权方面，而且在拥有巨大物质利益的方面都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但是最大的住宅，最肥美的肉排，甚至是洛尔斯·罗埃斯<sup>①</sup>都不能把官僚变成一个独立的統治階級。

同上，第 18—19 頁。

不平等（尤其是如此显著的不平等）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

---

① 英国汽車和飞机工业的大垄断企业，建于 1906 年。——編者注

当然是絕對不可能有的。但是同官方和半官方的謊言相反，目前的蘇維埃制度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过渡性质的。它的内部仍然有着可怕的资本主义残余，尤其是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存在在官僚和无产阶级之間，而且也存在在官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在一定阶段，不平等依然会存在，在某种限度内，发展社会主义所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工具如工资差别，奖金等等仍将作为竞赛的鼓励。

虽然不平等可以作这样解释，但是决不能因为目前制度的过渡性质，就能說官僚的无法无天的上层所据为己有的那些荒謬的（公开和秘密的）特权是正当的。左翼反对派……就曾宣布官僚主义的一切表现正在扯掉苏维埃社会的道德約束；在群众中引起尖銳而正当的不满，为巨大的危机准备基础。然而，官僚的特权本身并没有改变苏维埃社会的基础，因为官僚的特权并不是来自一个“阶级”特有的特殊的所有制关系，而是来自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所有制关系，这种关系基本上是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

坦白地說，尽管官僚掠夺人民（这种掠夺是各官僚以各种方式进行的），我們并不能說这是阶级剥削（按这个詞的科学意义而言），而只能說是社会寄生，虽然其規模非常大。……就寄生的特征而論，官僚以及教会牧师都接近于流氓无产阶级，正如大家所知，流氓无产阶级并不能說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同上，第19—21頁。

### 三、认为官僚統治的基础是缺乏消費品

断言“官僚統治的基础是社会缺乏消費品”，“把十个人創造的东西拿来給一个人用”，这就必然在分配方面“形成并发展成一个強有力的专家阶层”。胡說“誰也不会

在有財富可分的时候把自己除外”，“当然要把最大的好处留給自己”。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初步了解了布尔什維克綱領和苏联現實之間的根本矛盾。如果国家沒有消亡，反而變得越來越專橫，如果工人階級的全權代表們官僚化而官僚們駕于新社會之上，那末，這并不是由於過去的心理殘余等次要原因造成的，而是由於只要國家不能保證真正平等就會產生並支持擁有特權的少數人這樣一種鐵的必然性所造成的效果。

官僚主義的傾向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遭到扼殺，這種傾向即使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後也會到處表現出來。但是非常明顯的是，從革命中產生的社會越是貧窮，這種“法權”的表現就會越加嚴酷越加赤裸，官僚主義所具有的形式就會越加粗暴，同時社會主義的發展也就会越加危險。蘇維埃國家不僅被阻止消亡，甚至被阻止擺脫官僚寄生蟲，這並不象斯大林那種赤裸裸的警察理論所說的，是以前的統治階級“殘余”造成的，因為這些殘余本身並沒有力量。蘇維埃國家所受到的阻止，是來自力量大得無可估計的一些因素，例如物資匱乏，文化落後，以及由此產生的“資產階級法權”在最直接最密切關係到每個人的領域居於支配地位——即在保證個人生存的那些事情當中居於支配地位。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聯書店 1963 年版第 38—39 頁。

建立一個沒有官僚主義的國家的初次嘗試，首先遭到了這樣的困難：群眾對於自治不熟悉，缺少為社會主義而努力的熟練工人，等等；在遇到這些直接的困難以後，這種嘗試又很快地遇到其他一些更加嚴重的困難。黨綱要求，國家改為執行“核算和監督”的職能，同時逐漸縮小強制的職能，這種改變至少具有一種普遍滿

足的相对条件。恰恰沒有这种必要的条件。西方沒有給予援助。当时的任务是順應那些特权集团，因为他們的存在对于国防、工业、技术以及科学來說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苏維埃的权力便受到压制，甚至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把十个人創造的东西拿来給一个人用的这种絕對不是“社会主义”的行动，在分配方面便形成并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专家阶层。

最近一个时期在經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沒有緩和不平等关系，反而使不平等現象更加尖銳化了；与此同时，官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前是一种“腐化現象”，現在却变成一种行政制度了。

同上，第41—42頁。

实际上，他們也不能抛弃政权。要是用客观的語言來說就是这样：目前的苏維埃社会不能沒有一个国家，甚至也不能——适当地——沒有一个官僚阶层。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决不是过去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残余，而是目前的强大的力量和傾向，苏維埃国家作为强制性机关而存在的理由在于，目前的过渡性結構还充滿了社会矛盾，这种矛盾在消費領域——这是人人最亲切地最敏感地感觉得到的領域——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而且时时刻刻有在生产領域出現的危险。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說是最終的，也不能說是不可变更的。

官僚統治的基础是社会缺乏消費品，因此便引起了你爭我夺的斗争。如果商店里的貨物充足，购买者就可以随时去买。如果貨物很少，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而在队排得很长的时候，就必须指派一个警察来維持秩序。这就是苏維埃官僚的权力的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什么人必須等待。

乍看起来，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应当减少特权的必要性，縮小“资产阶级法权”适用的范围，从而动摇这种法权的保卫者即

官僚的立足点。实际上，情况恰好相反：截至目前为止，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各种形式的不平等、特权和优待都得到了极端的发展，官僚也因而得到了极端的发展。这也不是偶然的。

苏维埃制度在初期，毫无疑问要比现在平等得多，官僚作风也要少些。不过，当时是一种普遍贫穷的平等。国家的资源是那样贫乏，以至没有可能从居民群众中分化出一个特权阶层。同时，工资的“平等化”摧毁了个人的兴趣，也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苏维埃经济必须从它的贫穷基础上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特权的大量积蓄才有可能。目前的生产状态还远远不能保障每个人的一切需要，但是已经足够给予少数人相当大的特权，并且可以把不平等当作一条鞭子来驱赶大多数人。这就是生产的发展到现在为止没有加强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反而加强了它的资产阶级因素的第一个原因。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除了在现阶段支配资本主义工资制的经济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这个政治因素就是官僚本身。从本质上说，官僚阶层是不平等制度的建立者和保护者。它最初是作为工人国家的资产阶级机关出现的。在使少数人得到好处并维护这些好处的时候，它当然把最大的好处留给自己。谁也不会在有财富可分的时候把自己除外。这样，由于一种社会需要而产生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社会必要职能，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因而也就成为使整个社会机体遭到巨大危险的泉源。

苏维埃热月的社会意义，现在开始在我们面前具体化了。群众的贫穷和文化落后又一次体现为掌握大权的统治者的那种恶劣形象。被废除的和遭到诅咒的官僚，从社会的仆人又一次变成社会的主人了。它在社会方面和道德方面已经达到这样脱离人民群众的地步，以致它现在无论在活动方面或者收入方面都不容许任何监督了。

官僚对于“小投机商、侵占者和誹謗者”的近乎神秘的恐惧，由此便可得到完全合乎邏輯的說明。苏联經濟由于还不能滿足居民的基本需要，因此它每走一步都要产生和复活那些侵占和投机的傾向。另一方面，新貴族的特权在居民群众中也引起了一种傾向，这种傾向就是傾听反苏維埃的“誹謗”——也就是傾听对于上司的貪婪和专橫行为提出的任何批評，即使是悄悄的批評。因此，这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幽灵的問題，不是一个关于不再存在的殘余的問題，也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积蓄的問題，而是一个关于新的、有力的和不断重新生长的个人积累傾向的問題。国家的第一个繁荣的浪潮还是很微弱的，正因为还很微弱，因此它沒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这些离心傾向。另一方面，沒有特权的人也产生了这样一种欲望，即把新显貴的貪婪的手擋回去。于是社会斗争又趋于尖銳化。这就是官僚的权力的泉源。但是，也正是这个泉源产生了一种威胁，一种对官僚的权力的威胁。

同上，第80—82頁。

苏联是一个介乎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1) 生产力还远远不足以赋予国家所有制以社会主义的性质；(2) 由于貧乏而产生的进行原始积累的要求，通过計劃經濟的所有毛孔表現出来；(3) 保留着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标准是社会分化的基础；(4) 經濟的发展緩慢地改善劳动者的状况，但却促使一个特权阶层迅速形成起来；(5) 官僚利用了社会的对抗，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馳的、不受监督的等級；(6) 被占統治地位的党所出卖了的社会革命还活在所有制关系和劳动群众的意識中；(7) 积累起来的矛盾的繼續发展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也可能把社会拖回到資本主义去；(8) 在走向資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势力必須打垮工人的反抗；(9) 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必須推翻官僚。归根到底，問題将由两种活的社会力量在民

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内的斗争来最后解决。

摘译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伦敦1937年版  
第241页,参看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86页。

官僚机构把国民收入中它能够或靠使用暴力、或靠运用权势、或借直接干预经济关系而攫取那一部分据为己有。在有关国家剩余产品的問題上,官僚机构和小资产阶级很快地从联盟变成了敌人。对剩余产品的控制开辟了官僚机构取得政权的道路。

摘自《斯大林评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册第532页。

#### 四、攻击斯达汉諾夫运动培植了 工人貴族,集体化建立了一 批資产阶级集体农庄

声称“在商品流通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意味着“不平等的加剧”,“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新的社会分化也在发展”。攻击斯达汉諾夫运动培植了“工人貴族”;集体化“为官僚的寄生主义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在农村造成一批“资产阶级集体农庄”——“百万富翁集体农庄”。

“全盘”集体化,即使在今后两、三年内真正实行,也决不是表示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生产合作社的形式,由于缺乏技术和文化基础,并不能阻止小商品生产者内部的分化以及資本主义分子从他们中间出现。为了真正消灭富农,需要在农业技术方面来一次彻底的革命以及把农民同工业无产阶级一起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人和无阶级社会的成员。但是,这是几十年以后的远景。由于个体农民的工具和工具占有者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占优势,正是在相对成功的集体化以后,亦即随着农业生产的普遍

增长，农民的分化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发生和增强。如果我們进一步假定，具有新的技术因素的集体化将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如果没有这种提高，集体化在經濟上就没有什么道理，从而也就維持不下去了），那么这就会立即在現在人口已經过多的农村中造成一千万，二千万甚至更多的过剩工人，即使有最乐观的計劃，工业也不能够吸收这么多工人。随着过剩的，也就是說，在集体农庄找不到位置的半无产和半貧民化的人口的增长，富裕的集体农庄以及贫穷的和中等的集体农庄內部的富裕农民将在另一个极端相应地增长起来。由于領導沒有远見，預先宣布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企业，资本主义农民分子就能够把集体化当作自己最好的掩护，結果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更加危险。

因此，目前过渡时期的經濟成就，并沒有消灭基本矛盾，而是为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基础上更深一层地再現这些矛盾作了准备。

摘譯自《苏联的发展問題》（1931年4月4日），  
紐約1931年版第7—8頁。

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別是实行計件工資制以后，将来就可以增加商品的数量，降低物价，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即资本主义在繁荣时期也不例外的一面。社会的現象和进程还必須从彼此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方面进行考察。在商品流通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还意味着不平等的加剧。領導阶层的福利的提高开始远远超过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隨着国家財富的增加，新的社会分化也在发展。

按照日常生活条件，苏維埃社会已經分成安全的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和在貧乏中生活的多数人。不仅如此，从苏維埃社会的两种极端情形来看，这种不平等还具有极其对立的性质。准备广泛流通的产品，通常总是价格高而质量低，而且离开中心城市越远就

越难买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投机而且公然盗窃消费品，都成了普遍的現象。过去这些行为是計劃分配制下的一种补充，現在則成为苏維埃商业的一种調节办法了。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3頁。

毫无疑问，上层工人的情况，特別是所謂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的情况，去年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报刊不是沒有根据地那样热中于列举这个或那个得奖的工人为自己买了多少衣服、鞋子、留声机、自行車或者多少瓶糖果。附带說一句，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普通工人得到这些好处的机会是多么微乎其微。斯大林在談到斯达汉諾夫运动的推动力的时候宣称，“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順利了。”在对計件工資制——这一点可以說明統治阶层的最大特色——所作的这种乐观的說明中，包含着这样一个平凡的眞理，即工人貴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完全是由于国家以前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但是，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的动力并不是来自“愉快”的情緒，而是来自那种想得到更多的錢的欲望。莫洛托夫用这样的話糾正了斯大林的說法：“斯达汉諾夫工作者提高生产率的直接动机，就是对增加收入感到兴趣。”这句話一点也不錯。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一个工人阶层出現了，他們被称为“千字号人物”，因为他們每月的收入已經超过一千卢布。还有些人每月的收入甚至在两千卢布以上，而低等工人的收入往往还不到一百卢布。

看来好象只靠这种工資的差別就可以使“富”工人与“不富”工人之間有足够的区别。但是对官僚來說，这一点还不够。他們把各种各样的特权几乎象下驟雨般地給予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給他們新住宅或者給他們修繕旧房子，优先把他們送到休养所或者疗养院去，派教师和医生到他們的家里去免費教授和治病，給他們发

免費的电影票。在某些地方，他們还可以免費理发和修面，并且可以隨到隨理。在这些特权中，好象有許多是故意用来伤害和侮辱一般工人的。当局方面之所以有这样过分的善意，除了权位概念以外，还由于他們良心上感到不安。地方上的統治集團，都急于抓住机会让上层工人同他們共享特权，以免自己陷于孤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的实际所得往往等于下层工人的二三十倍。至于那些特別幸运的专家，他們的薪水在許多情况下可以支付八十个到一百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資。在工資的不平等方面，苏联已經不仅赶上而且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同上，第 90—91 頁。

平均計算，每个集体农庄的收入大約四千卢布。但是，关于农民的“平均”数字甚至比关于工人的“平均”数字还要具有欺騙性。例如在克里姆林宮，有人汇报說，集体化漁民在一九三五年的收入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一倍，即每人得到一千九百一十九卢布，后面这个数字得到了掌声，这一点說明这个数字大大超过集体化基本群众的收入。另一方面，有些集体农庄的每戶收入高达三万卢布，这还没有把个人經濟的貨币和实物收入計算在內，也沒有把整个企业的实物收入計算在內。总的說来，这些大集体农庄的每个庄員的收入等于“平均”的工人工資和低等集体化农民收入的十倍到十五倍。

收入的等級只是部分地决定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勤奋程度。集体农庄和农民个人的土地，由于气候、土壤和作物类别的不同以及距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远近不同，而必然处于非常不平等的状态。城乡的对立不仅沒有在五年計劃期間減輕，反而由于城市和新工业区的迅速发展而大大尖銳化。苏維埃社会的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对立，主要是因为級差地租，不可避免地会在集体农庄之間以及集体农庄內部派生出矛盾。

官僚的漫无限制的权力，也是促使社会分化的一个同样有力的工具。他們掌握着工資、物价、稅捐、預算以及信貸这样一些杠杆。中亚地带有一系列种植棉花的集体农庄，收入很不平衡，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規定的价格不同，而不是由于集体农庄庄員的工作好环。某个居民阶层剥削另一个居民阶层的現象并沒有消失，而是被掩盖起来了。几万个“富裕”集体农庄庄員的幸福是牺牲其他集体农庄庄員和产业工人的利益而得到的。使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員都达到富裕的水平，是一个比牺牲多数人而使少数人拥有特权要困难得多和費时得多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左翼反对派曾宣称，“富农的收入已經增加得比工人的收入多到无法衡量的地步”，这个說法到現在还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上层集体农庄庄員的收入已經增加得比基本工农群众的收入多到无法估計的程度。**目前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別也許比消灭富农以前还要悬殊。

集体农庄內部的分化，一部分表現在个人的消費上；一部分表現在同集体农庄毗連的个人企业上，这是因为集体农庄本身的基本財产已經社会化。集体农庄之間的分化已經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后果，因为富有集体农庄有机会使用更多的肥料和更多的机器，因而可以更快地富足起来。取得成就的集体农庄往往雇用穷苦集体农庄的劳动力，而当局对此閉眼不問。把价值不等的土地分配給集体农庄，这就大大地促进了集体农庄之間的进一步分化，并因而形成一种**資產阶级集体农庄**，或者叫做“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甚至現在它們还被人这样称呼。

在农民发生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当然可以作为調整者进行干預。但是朝哪个方向做呢？干預到什么限度为止呢？进攻富农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員，这就会同农民当中比較“进步的”阶层发生新的冲突，而这种阶层的农民只是經歷了一段痛苦的停頓以后，現在才开始感到迫不及待地需要一种“幸福的生活”。不

仅如此——而这一点还是主要的——国家政权本身变得越来越不能进行社会主义监督了。在农业当中也象在工业当中一样，国家政权設法寻找强有力的、順利的“田間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的支持和友誼，寻找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的支持和友誼。国家政权最初所关心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到最后就只关心自己了。正是在消費与生产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农业中，集体化已經为官僚的寄生主义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并为这种寄生主义同集体农庄的上层集团相互帮助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集体农庄的庄員在克里姆林宮的庄严會議上獻給领导人的祝賀性“礼品”，只不过是他們向地方政权代表經常納貢的象征性表現。

由此可见，低生产水平同社会主义的甚至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地发生冲突的情况，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还要严重得多。归根到底，官僚正是从这种矛盾中产生的，而他們反过来又加深了这种矛盾。

同上，第95—97頁。

## 五、斷言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和平溶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資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现复辟

1. 說耐普曼、富农、沒有逃到国外去的地主、資本家及其子弟混入党和国家机关，支持官僚集团，出現“两个政权并存的萌芽”。

苏維埃的官僚主义問題还不仅是一个文牘紛繁和机构人員庞大的問題。根本上这是官僚机构所扮演的阶级角色的問題，它的社会联系和同情的問題，它的权力和特权地位的問題，它同新資产阶

級和不熟练工人之間的关系，同知識分子和文盲之間的关系，同蘇維埃“閣下”夫人和无知农妇之間的关系等等，等等的問題。干部站在哪一边呢？这是千百万工人每天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提出的問題。

.....

必須注意，近几年来官員队伍的人数一直在增长。它在巩固自己，把自己置于一般人民之上，在同城市和农村的較富有的分子結合在一起。一九二五年的“指示”把选举权給了为数众多的剝削分子，这不过是一次很清楚的表現，表明这个官僚机构（直到它的頂峰）对于社會上富有的、发财的、兴旺的分子，已經變得有求必應了。取消这些指示——它們实际上是对苏維埃宪法的破坏——，是反对派批評的結果。但是在新指示下的第一次选举在一些地方已經暴露出有一种得到上面鼓励的意图，要尽可能地减少富裕阶层中被剝夺公民权的人数。但是，問題的中心不在这里。在新資產阶级和富农不断相对增长、并且日益同官僚机构靠攏的情况下，在我們总的领导机关的錯誤路綫下，即使富农和耐普曼被剝夺了选举权，他們仍然能够影响——虽然是在幕后——行政人員和政策，至少对基层苏維埃机关是如此。

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后来由于反对派的反击而局部遏止的下层富农和“半富农”分子及城市資产阶级对苏維埃的滲透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政治过程，如果忽視或者掩盖这个过程，就会給无产阶级专政带来可怕的后果。

城市苏維埃，这是使工人和劳动群众直到最后一人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的基本工具，近年来它已經失掉了一切真正的作用。这是阶级力量对比无可怀疑地向着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改变的表現。仅仅在行政上“复活”苏維埃来抵抗这种現象是不可想象的。只能用坚决的阶级政策来抵抗它——坚决反对新的剝削者，毫无例外地在苏維埃国家的一切組織和机关中增加无产阶级的活动和

比重。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0—62页。

近几年来，富农越来越厉害地对农村中的贫农和城市中的国家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国家政权改变它的经济计划和打算。

富农、私人工商业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同国家的、而且同党的官僚制度的许多环节相结合，乃是我們社会生活中最无疑问、同时也是最令人担心的过程。从这里正在产生威胁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萌芽。

摘译自《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反提纲》  
(1927年11月)，载于《真理报》1927年11月17日第263号第3版。

解决誰战胜誰的問題的办法是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文化戰線的一切陣地上的不斷的階級鬥爭：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按照哪种发展道路来分配国民收入，无产阶级完全掌握政权还是与新资产阶级平分政权。在我們这个小农和小小农与一般小业主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內，最重要的过程有时是分散和隐蔽地进行的，以后才一下子“突然”爆发出来。

资本主义的自发性首先表現在农村的分化和私人工商业者的增多。农村的上层分子以及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国家-经济机关的各种环节越来越密切地搅在一起。这个机关往往帮助新资产阶级用統計数字的迷雾来掩饰他們在爭取增加自己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成功的斗争。

……国家机关的影响正在增加，而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反常現象也随着滋长。由于乡村中资本主义的絕對增长和相对增长，以及城市中资本主义的絕對增长，使得我国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意識也在增长。这些分子也企图(并且常常不无成效)使一部分跟

他們在工作上和生活上有接觸的共產黨人精神墮落。

同上。

虽然十月革命的性质是无比深刻的，但“蘇維埃热月”的队伍，主要是从旧执政党的残余和它们的思想意識的代表們中間集結来的。那些沒有逃到国外去的地主、資本家、律师和他們的儿子被吸收到国家机器內，不少人甚至被吸收入了党。更多的进入国家和党机器里的人是小資产阶级的旧党员——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除此之外，还有許多彻头彻尾的市儈們，这些人在暴雨狂风的革命和内战的年月里，畏首畏尾躲在一旁，而最后相信苏維埃政府稳定了，以专一的热情致力于爭取安适的永久地位的高貴工作，如果不是在中央，起碼在各省是这样的。这一人数众多、形形色色的烏合之众是“热月”的当然支持者。

这一烏合之众的政治思想从淡淡的粉紅色直到雪白。当然，社会革命党人总在准备以一切方法維护农民的利益和反对卑賤的工业家的威胁。总的讲，孟什維克认为應該給农民資产阶级更多的自由和土地。他們也成了农民資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混得政府工作的上层資产阶级和地主的殘存的代表們，自然抓住农民作为他們的救生带。当时，他們在維护他們自己的阶级利益方面，不可能希望获得任何成功。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必得經過一个保卫农民阶级的阶段。这些集团沒有一个能公开出头露面。他們都需要执政党和傳統布尔什維主义作他們的保护色。对他们來說，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永远确立他們所曾遭受的剝奪的制度的斗争。他們自然而然乐于接受布尔什維克中那些反对不断革命的人作为他們的領袖。

經濟复苏了。出現了少量的剩余。自然，剩余集中在城市里，任凭統治阶层支配。随之，戏院、餐館和娱乐場所恢复了。在一种沉睡状态中度过了生气勃勃的内战年代的、数以十万計的各行各

业的人們，現在醒过来了，伸伸懶腰，开始参与重建正常生活的工作。所有这一切人都站在不断革命的反对者的一边。他們都需要和平，发展，和加强农民阶级，也需要城市里娱乐場所的继续繁荣。他們力求这一趋势不要間断，而不需要革命。烏斯特里雅洛夫教授对一九二一年的新經濟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还是一种“演变”表示怀疑。这个問題使列宁感到非常不安。事变的发展表明，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一种特殊的配置，这个“策略”变成了“演变”的根源。这个革命政党以后采取的战略退却是它的蛻化的开始。

当进步的社会成就开始丧失时，反革命开始了。这种进步的社会成就的丧失似乎是沒有止境的。然而，革命成就的某些部分始終被保持下来了。这样，尽管官僚机构进行了可怕的歪曲，苏联的阶级基础仍然是无产阶级的。可是，讓我們記着，这一丧失的过程还没有終結。欧洲和全世界今后几十年的前途还未确定。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版下冊第525—526頁。

## 2. 汚蔑苏維埃国家在国内外异己阶级的联合压力下实行“全面投降”：“通过‘政治上的新經濟政策’，通过‘新新經濟政策’回到资本主义去”。

我国存在着两个互不相容的立場。一个是建設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場，另一个是一心要把我們的发展轉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资产阶级立場。

资产阶级和追随它的小资产阶级各阶层这个阵营，把它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厂主的私人首創精神和个人利益上。这个阵营把它的賭注下在“力量强的农民”身上，要使合作社、工业和我們的对外貿易都为这种农民利益服务。这个阵营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不應該依靠国家預算，它不應該发展得太快以致損害农业資本家的利

益。爭取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日益加强的小資产阶级來說，就是压榨工人的体力和神經。爭取降低价格对它來說，就是为商业資本的利益减少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反对官僚主义对它來說意味着解散工业，削弱計劃中心；意味着把重工业置于不重要的地位——这又是进行一次有利于力量强的农民的調整，并且很快就放弃对外貿易垄断制。这就是烏斯特里雅洛夫之流的路綫。这条路綫的名字就是根据分期計劃實現資本主义复辟。这在我国是一个强大的趋势，它影响着我們黨內的某些集团。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0—31頁。

(一)在我們和英國断絕关系以及其他内外困难的影响下，在多数派的統治圈子里正准备着下述的“計劃”：(1)承认債務。(2)多或多或少地取消对外貿易的垄断制。(3)或从中国撤退——这就是，“暫时”撤銷我們对中国革命，一般地說即是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支持。(4)在國內实行向右的“策略”——这就是，把新經濟政策扩大一些。希望用这个代价来防止战争危险，改善苏联的国际形势，消除(至少减少)國內困难。这全部“計劃”是以資本主义有几十年的稳定这一假設为基础的。

实际上这不是“策略”，而是苏維埃国家这方面在目前形勢下的全面投降：通过“政治上的新經濟政策”，通过“新新經濟政策”，回到資本主义去。帝国主义者会接受我們的一切让步，然后更加迅速地进行新的攻击甚至战争。富农，耐普曼和官僚分子意識到我們的让步之后，他們会更加頑固地組織起所有反苏維埃力量来反对我們党。我們方面的这样一种“策略”将造成我們的新“資产阶级”同外国資产阶级之間最紧密的同盟。苏联的经济发展将落在国际資本的完全控制之下——一辨士的貸款等于一卢布的奴役。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将对苏維埃国家的强大，对苏維埃

国家知道领导人民走向哪里的能力开始失去信仰。

如果可能“用赎买办法使我们自己”免于战争，我们当然要尽力这样做。但是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强大和团结，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世界革命的策略，必须加强共产国际。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有可能使战争确实长期推迟，而不必付出会损毁我们力量基础的代价；同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真有可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并且赢得战争。

同上，第 97—98 頁。

小商品经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剥削者。随着农村恢复的程度，农民群众的分化也开始扩大。这种发展走上了过去走过的老路。富农的增长远远超过农业总的增长。在“面向农村”的口号下，政府的政策实际上是使自己转向富农。加在贫农身上的农业税比加在富裕农民身上的重得多，不仅如此，富裕农民还占有了国家的大部分贷款。余粮主要掌握在农村上层分子手中，这种余粮就被他们用来奴役贫农并进行投机，卖给城市资产阶级分子。当时的执政派理论家布哈林向农民提出了他的著名口号“发财吧！”从理论上说，这个口号的意思也许是富农逐步长入社会主义。实际上，它意味着牺牲压倒多数的利益而使少数人发财致富。

政府在自己政策的摆布下，面对着农村小资产阶级的要求被迫步步后退。在一九二五年，雇佣劳动力和租用土地在农业中已经合法化。农民在一方面是小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工之间日益两极化。与此同时，国家由于缺少工业商品而被排挤出农村市场。在富农和小家庭手工业者之间，就好象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出现了经纪人。国家企业本身，为了获得原料，越来越不得不同私商打交道。资本主义日益高涨的潮流到处可以看到。有头脑的人清楚地看出，在所有制的形式方面进行的一次革命，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问题，而只不过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而已。

一九二五年正当对富农的方針全力执行的时候，斯大林开始准备把土地非国有化。有一位苏联記者在他的暗示下提出了一个問題：“把每个农民耕种的土地立契出租十年，是不是符合农业的利益呢？”斯大林回答說：“符合，甚至可以出租四十年。”格魯吉亞的农业人民委員在斯大林本人的倡議下，提出了土地非国有化法草案。其目的是使农民对于自己的未来具有信心。在一九二六年春天這項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預定要出售的粮食有百分之六十是掌握在百分之六的农民有产者手中！国家不仅缺乏用来出口的粮食，而且連國內需要的粮食也不够。由于出口达到无足輕重的地步，結果必須放弃进口工业品，同时尽可能削減进口的机器和原料。

这种依靠富裕农民的政策推迟了工业化并且打击了一般农民群众，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的两年內清楚地显示了它的政治后果。这种政策使城市和乡村的小資產阶级大大地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使他們夺取了許多下层苏維埃，加强了官僚的力量和自信，加重了对工人的压力，并且完全压制了党和苏維埃的民主。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17頁。

3. 宣称官僚統治将引起“新統治阶级的产生”，但是“把政权轉入資产阶级手中，决不会只限于單純的腐化过程，而是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公开的暴力顛覆的形式”，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和平地溶入世界資本主义体系”。

苏联經濟和政治中的矛盾过程，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展着的。社会政权的性质首先由所有制关系决定。土地国有化，工业生产資料和交換手段的国有化以及国家掌握对外貿易的垄断，是苏联社会制度的基础。为十月革命所剝夺的各阶级，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官僚中的资产阶层，都只有通过反革命的顛

覆才能重建土地、銀行、工厂、制造厂、铁路等等的私有制。这些所有权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基础，它为我们决定了苏联作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

摘译自《苏联的发展问题》(1931年)，  
纽约1931年版第3页。

平民<sup>①</sup> 纪律的瓦解不仅会涉及到党、行政、经济、工会和合作社的机关，而且会涉及到红军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某些情况下，爆炸可能就在最后这一头开始。这已清楚表明，把政权转入资产阶级手中，决不会只限于单纯的腐化过程，而是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公开的暴力颠覆的形式。

这种情况会以哪种政治形式发生呢？在这方面，只可能揭示主要的倾向。左翼反对派一直把热月式颠覆理解为由无产阶级政权向资产阶级政权的转移，这种转移实质上已成定局，只是在形式上还是苏维埃制度的范围内，在官方党的一个派别反对另一个派别的旗帜下完成的。与此相反，波拿巴式的颠覆则是表现为较为公开和“成熟”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形式，这种反革命采用了在资产阶级财产的名义下举起赤裸裸的军刀的形式，反对整个苏维埃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党。摧毁党的右派，以及右派放弃自己的纲领，减少了采用前一种的、逐步的、隐蔽的颠覆形式即热月形式的机会。党的机构的平民式蜕化无疑增加了波拿巴形式的机会。尽管如此，热月和波拿巴主义并不代表不可调和的阶级类型，而只是同一类型的不同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活生生的历史过程无穷尽地创造出种种过渡的混合的形式。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资产阶级敢于公开提出政权问题，最后的答案将由各种阶级力量在决死战

① 指古罗马平民，他们是下层自由民，但最初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也不能使用公社土地，为此他们和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历数世纪才取得胜利。——编者注

斗中彼此較量而得出。

同上，第 30—31 頁。

承认目前苏联是个工人国家，这不仅表明，资产阶级要夺得政权非用武装暴动不可，而且也表明无产阶级还没有失去使官僚机构服从自己，使党获得新的生命力和改进专政政权的可能——不用进行新的革命，而是用改良的方法，走改良的道路。

同上，第 36 頁。

无产阶级专政是靠一次政治革命和三年内战而建立起来的。关于社会的阶级理論和历史經驗同样地证明：无产阶级通过和平方法，也就是没有经过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不手握武器，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既然是如此，那末怎么能想象资产阶级反革命是不知不觉地，“渐进地”进行的呢？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封建的以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从来不是“在机体内”进行的，这种反革命一概都需要实行军事上的外科手术。归根结蒂，改良主义理論（既然改良主义一般都形成了理論）的根本弱点在于不了解阶级对立的深刻性和不可调和性；因而怀有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希望。马克思关于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轉到另一个阶级手中的残酷性质的命題不仅适用于历史飞速前进的革命时期，并且也适用于社会倒退的反革命时期。說苏维埃政府已經从无产阶级性质逐渐地变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人們，那可以說只是把改良主义的影片倒着放映而已。

摘譯自《苏联与第四国际》(1934 年)，  
紐約 1934 年版第 4—5 頁。

官僚不是一个統治阶级。但是官僚統治的繼續发展能够引起新統治阶级的产生，不是通过机体的蛻化，而是通过反革命行动。我們把斯大林主义机构的人員称为中派正是因为它起着双重的作用；今天当一个馬克思主义的領導不再存在，并且還沒有这样的領

导出現的时候，它用它自己的方法卫护着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种方法却有利于明天敌人的胜利。誰要是不了解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双重作用，那他就什么也沒有了解。

同上，第 22 頁。

各个阶级是由它们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占的地位来划分的，并且首先是从它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的。在文明社会中，财产关系是得到法律的确认的。土地、工业生产资料以及运输和汇兑的国有化，再加上对外贸易的垄断，便构成苏维埃社会结构的基础。对于我们來說，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这些关系，苏联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便基本上确定下来。

苏维埃官僚在其仲裁和调节的职能上，在关心保持社会等级上，以及在为了个人目的而剥削国家机关上，都同任何其他官僚是类似的，特别是同法西斯官僚类似。可是也有很多地方不尽相同。在任何其他制度下，官僚从来没有摆脱统治阶级而达到这样独立的程度。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官僚代表有财产有教养的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拥有无数的日常手段来监督官僚的事务管理工作。苏维埃官僚则已经上升到一个几乎还没有摆脱贫困和黑暗的阶级之上，并且没有统治或者指挥的传统。法西斯分子掌握政权以后，用共同利益、友谊、婚姻等纽带同大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苏维埃官僚则只采取了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而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旁边。从这个意义上說，我們不能否认，官僚还不仅仅是官僚，而是苏维埃社会中不折不扣的唯一享有特权和发号施令的阶层。

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也同样重要。苏维埃官僚已經从政治上剥夺了无产阶级，以便用自己的方法来保卫社会的战利品。但是，官僚在一个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国家掌握政权，这就在官僚和全国富人之間創造了一种新的前所未聞的关系。**生产資**

料属于国家。但是，国家——姑且这么說——“属于”官僚。如果这些整个來說还很新的关系一旦固定下来，成为标准并且合法化，那末，不管有沒有工人的抵抗，归根到底，这种关系要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战利品完全毁灭。不过，現在談到这一点，至少为时还早。无产阶级还没有最后发言。官僚也沒有为自己在特殊的所有制类型的形式下进行統治創造社会支持力量。官僚不得不保卫作为自己的权力和收入的泉源的国有制。从官僚的活动的这个方面來說，官僚依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器。

試圖把苏維埃官僚当作一种“国家資本家”阶级，这显然經不起一駁。官僚既沒有股票，也沒有公債。官僚的增加、补充以及更新都是在不依靠自己的任何特殊的所有制关系的情况下用行政等級的形式来进行的。官僚个人并不能把他的剥削国家机关的权利传給他的后代。官僚是在濫用权力的形式下享受他們的特权的。他們隐瞒自己的收入；他們欺騙別人說，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團來說，官僚甚至根本不存在。官僚把一大部分国民收入据为己有的行为具有社会寄生虫的性质。所有这一切都使苏維埃指揮阶层处于非常矛盾、曖昧和不光彩的地位，尽管它拥有完整的权力，而且还有阿諛奉承的烟幕来为它打掩护。

资产阶级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經改換过許多种政治制度和官僚阶层，但是它的社会基础并沒有改变。它依靠自己的生产方法的优越性而保全了自己，使封建的和基尔特的关系不能复辟。国家政权已經有能力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或者是制止这种发展。但是，总的來說，生产力在私有制和競爭的基础上正在逐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此相反，从社会主义革命产生出来的所有制关系同新的国家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因为新的国家是这种所有制关系的貯藏所。社会主义傾向之所以比小资产阶级傾向优势，并不是經濟的自动发展——我們距这种情况还很

远——所保证的，而是专政所采取的政治措施给予了保证。因此，整个經濟的性质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

如果苏維埃制度崩溃，那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計劃經濟的崩溃，并进而导致国有制的废除。托拉斯同其工厂之間的强制性关系将会破裂。比較有成就的企业就会走上独立的道路。这种企业有可能改变为股份公司或者采取某种过渡的所有制形式——例如，工人也参加分配利潤这样一种形式。集体农庄将同时瓦解，而且容易得多。**如果目前的官僚专政垮台而不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話，那末，资本主义关系一定会恢复，接着而来的将是工业和文化的灾难性的衰落。**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对于保持和发展計劃經濟來說仍然是絕對必要的話，那末，最最重要的問題是：目前的苏維埃政府究竟依靠誰，并且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它的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举行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实际上是向党告別时对指揮集团說了这样一段話：“历史了解各种各样的轉变。依靠信念、忠誠以及其他最好的道德品质——在政治上这些都是不能认真看待的。”存在决定意識。在最近十五年中，政府已經改变了它的社会結構，甚至比改变它的思想还要深刻些。由于官僚在苏維埃社会的所有阶层中最好地解决了自己的社会問題并且完全滿足于現状，因此主观上对于自己的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經不再提出任何保证。**官僚之所以繼續保持国有制，只是因为他们害怕无产阶级。**这种絕无仅有的惧怕是布尔什維克一列宁派这个不合法政党所鼓励和支持的，这个政党是那些反对資产阶级反动——热月官僚已經完全浸透了这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最自觉的表现。官僚作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已經背叛了革命。但是，一次胜利的革命幸好不仅是一个綱領和一面旗帜，也不仅是一些政治机构，而且还是一种关于社会关系的制度。背

叛还不够。必須推翻才行。十月革命已經被統治阶层背叛，但是還沒有被它推翻。十月革命具有一种伟大的抵抗力量，这种力量就在于已經确立的所有制关系、无产阶级生气蓬勃的力量、它的最优秀分子的觉悟、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以及世界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81—184頁。

**如果說，資產階級不可能和平地長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那末，同样真实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和平地溶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摆在历史日程上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和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是接連不断的世界动乱：战争和革命。在苏联的國內生活中，动乱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官僚在爭取实现計劃經濟的斗争中被迫使富农非富农化，那末，工人阶级在爭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就会被迫使官僚非官僚化。后者的墓碑上将刻上这样的墓志銘：**

“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在此长眠。”

同上，第220頁。

因此虽然不能事先否认有可能在严格規定的情况下，与官僚的热月派結成“統一战綫”来对付資產阶级反革命的公开进攻，苏联的主要政治任务仍然是推翻同一热月的官僚。它的統治多延长的每一天，都有助于破坏社会主义經濟成份的基础，并且增加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共产国际作为斯大林集团的代理人和同謀者正是沿着这个方向扼杀了西班牙革命和瓦解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士气。

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官僚的主要力量不在它本身，而在群众幻想的破灭，在于群众的缺乏新的前途。和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除了野蛮統治更无节制这一点以外，斯大林的政治机

构与这种国家并没有什么两样)，今天在苏联只可能进行准备性的宣传工作。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国外的事件可能会成为推动苏联工人革命高潮的动力。全世界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是今天反对斯大林独裁的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有許多迹象說明，共产国际由于缺乏国家政治保卫局那样的直接基础，将比波拿巴主义集团和整个热月的官僚先垮台。

摘自《資本主义的垂死掙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1938年9月3日)，  
紐約1946年版第50—51頁。

## 六、声称党的执行机关之代替党、 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对立 将使党和老干部蜕化变质

1. 說党的执行机构的行政手段代替党的领导，使党官僚化；由知識分子构成的党的政治机器不止一次成为“党堕落的原因”。

而相反地，机关工作方法越是占优势，党的领导越会被它的执行机构（委员会、常委会、书记等）的行政手段所代替。我們看到，在这种方針得到加强的情况下一切事情都集中在一小群人手中，有时是书记一人手中，他任免，发布指令，追究責任，等等。在领导的这种蜕化下，党的基本的无可估价的优越性——它的多种多样的集体經驗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领导具有純粹組織上的性质，常常轉變成简单的发号施令和以瑣事扰人。党的机构日益陷于解决苏維埃机关的瑣碎任务和問題中去，一天到晚关心它的日常問題，受它的影响，变得只見树木不見森林了。如果說作为集体的党

組織一向具有比国家机构的任何机关更丰富的經驗，那末，对于党机构的个别負責人就决不能这么說了。认为书记有了书记这个头銜就能在他的身上体现党的領導所必需的全部知識和本領，这其实是幼稚的想法。实际上，他为自己建立起拥有官僚主义部門、官僚主义情报和文书的附属机构，并用这一使自己同苏維埃机构接近的机构，把自己和生气勃勃的党隔离开来。于是，产生了象德国的名言所說的情况：“你以为在推動別人，其实是別人在推動你。”苏維埃国家的官僚主义的日常生活的全部麻煩都轉入党的机构，造成了党机构內官僚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集体的党感觉不到自己的領導，因为沒有实行領導。因此，即使在領導实际上是正确的情况下，也出現了不滿或困惑。但是，这种領導无法坚持正确的路綫，因为它把精力耗費在瑣事上，不具备有条不紊的、有計劃的和集体的性质。这样，官僚主义不仅破坏党内團結，而且削弱党对国家机关的正确的影响作用。这一点总是那些在党对苏維埃国家的領導作用上叫喊得最响亮的人們所沒有注意到和所不理解的。

摘譯自《新方針（三）》（1923年12月），載于  
《真理报》1923年12月29日第295号第4版。

同样的現象以更加丑恶的形式出現在国家机关里。人們在那儿常常会遇到苏維埃“党”老爷的完善典型。在庄严的場合，他以十月革命的名义发誓；他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对自己的工作完全漠不关心；他彻头彻尾地生活在資产阶级环境中，背后大罵他的上級，而在党的會議上“痛斥”反对派。

一个領導党员（首先是书记）的实际权利要比一百个普通党员的实际权利大得多。这种日益以党机器代替党的情形是由斯大林的“理論”所促成的，这种“理論”背弃了对于每一个布尔什維克來說是不可破坏的列宁主义原則——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并且只能通

过党的专政来实现。

党内民主的死亡导致工会和其他所有非党群众组织内的一般工人民主的死亡。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2页。

党的报刊已经在耸人听闻的揭露的幌子下公布了阿尔乔莫夫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其他案件。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对腐化进行斗争的呼吁。问题到此似乎就算了结了，事实上是尚未开始。

首先，党内广大人士不能不感觉到，已经公布的只是一小部分——并没有谈正在发生的情况，只是谈已经暴露的情况。几乎每一个省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自己的“斯摩棱斯克”事件，而且不是今天才有，甚至不是今年才有的。早在“自我批评”时代以前，赤塔、赫尔松斯克、弗拉基米尔斯克和其他许多地方都爆发了这种事件，只是立刻就被扑灭下去了；百分之百的区委书记都被揭露出来，他们曾经偷偷地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浪费大笔钱财来维持自己家庭的仆从。每当这种事件暴露出来，都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成百的人、有时甚至上千的人，上千的党员对这些罪行了若指掌，但是都绝口不谈。他们保持沉默的时间常常长达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甚至报纸也提到过这种状况。但是，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因为要是这样做，就有必要完全重复反对派文件曾经非常谨慎温和地说过的那些话。不得出必要的结论，斯摩棱斯克和其他事件的暴露仍然只是耸人听闻的新闻。它们使党感到激动，并没有起教育作用，倒是分散了党的注意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机构越脱离党的控制而独立，依靠机构为命的人互相之间的依赖性也就越大。相互保险并不是地方性的“琐事”，而是官僚统治的根本特点。机构的某些扈从尽情干坏事，其他的人则保持沉默。党员群众呢？党员群众都吓怕了。真的，在曾

經實現十月革命的列寧的黨里，工人黨員却害怕大声說出機構的某个百分之百的扈从是一个流氓，一个侵吞公款者，一个惡霸。這是“斯摩棱斯克”事件揭露出来以后提供的根本教訓。受到这种教訓而不感到羞愧，就不是一个革命者。

从社会意义上說，阿尔乔莫夫斯克、斯摩棱斯克等等事件的主角是誰呢？他是一個已經擺脫党的积极控制、已經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旗手的官僚主义者。他在思想上已經枯竭，在道德上則放蕩不羈。他是一個享受特权、不負責任的干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极为粗野的人，一个酒囊飯袋，一个惡霸。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杰尔治摩尔达<sup>①</sup>（見列寧論民族問題的信件。这封信沒有向党公布）。但是我們的主角有他自己的“特色”：当他对人拳足交加、浪費国家資源或者是接受賄賂的时候，苏維埃的杰尔治摩尔达不是凭着“上帝的意志”而是以“社会主义建設”的名义发誓赌咒。当下面有任何人企图指摘他的时候，他不是像过去那样大叫“造反啦！”而是狂呼：“托派分子！”——于是就胜利了。

摘譯自《列寧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6—7月），  
紐約 1936 年版第 302—304 頁。

我們已經解釋過我們黨受到的压力的階級性质：黨機構內的仆从的串謀活動；黨機構的許多环节同國家官僚机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农村富农互相勾結；世界資產階級对各種力量的內部結構的压力——所有这一切造成了社會双重政权因素，他們通过党的机关对党施加压力。正是这个社会压力，在最近几年已經有所增长，并且已被党的机构利用來威胁党的无产阶级核心，迫害反对派，并且用組織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

---

① 杰尔治摩尔达是果戈里《钦差大臣》中一个爱打人的醫士。——編者注

**异己阶级的压力在一定限度内使党的机构高于党之上，强化党的机构，并且逐渐向它们灌输刚愎自用的思想。党的机关并不关心查明自己拥有“权力”的主要原因。它们把战胜党、战胜列宁主义路线的原因得意地归结为自己的聪明。但是这种压力，由于没有遇到抵制，正在日益增强，它已经超过了限度，而几乎威胁到党的机构的统治。它威胁到某种重要得多的事物，尾巴开始打脑袋了。**

摘译自《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6—7月)，  
纽约1936年版第304—305页。

**不应该忘记，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机器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的，他们的出身和生活条件是小资产阶级的，他们的思想和他们跟无产阶级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变成职业革命家的工人非常急切地参加到这派人中间去，他们参加进去以后就失掉自己的特点。党机器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及它对无产阶级的权威（这两点都不是偶然的，而完全是由历史的必然性决定的）不止一次成为党动摇的原因，最后成了党堕落的原因。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这个理论表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但是党机构中的人们按照自己的比较有限的經驗，只吸收这个理论的零星部分。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往往只是死记现成的公式，而闭目不视情况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缺乏同劳动群众的独立的日常接触，也缺乏对历史进程的全面了解。因此他们易于受到其它阶级的影响。战时，党的上层大半受到来自资产阶级人士的妥协主义倾向的影响，而普通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在抵抗席卷全国的护国主义歇斯底里方面表现了大得多的稳定性。**

摘自《斯大林评传》(1940年)，三联书店  
1963年上册第269页。

2. 說領導干部與全體黨員的對立會“使黨遭到蛻化”，吹捧青年是“黨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只有新老一代“經常相互影響”，才能使老一代免于“僵化”和機會主義蛻化。

官僚主義扼殺首創精神，從而阻礙黨的整個水平的提高。這就是它的主要過錯。既然更有經驗的有功的同志必然會進入黨的機構，所以機構的官僚主義最嚴重地影響黨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思想的提高。**青年——黨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對黨的官僚主義的反應最敏感**，其原因正在於此。

但是如果認為，似乎濫用機構的辦法來解決黨內問題的做法會對體現着黨的政治經驗及其革命傳統的老一輩毫無影響，那就錯了。不，這一方面的危險也是很大的。說我們黨內的老一輩有巨大意義（不僅就俄國範圍來說，而且也就國際範圍來說）是大可不必的，因為這是眾所周知和一致公認的。但如果把这个意義看作是獨立自在的事實，那就大錯特錯了。**只有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在黨內民主的範圍內經常相互影響，才能保持老近衛軍這一革命因素**。否則，老頭們就會僵化，就會在本人也沒感覺到的情況下成為機構的官僚主義的最完備的體現。

“老近衛軍”的蛻化在歷史上發生過不止一次。就拿第二國際的領袖和政黨這個最新最顯著的歷史實例來說，我們不是知道嗎，威廉·李卜克內西、倍倍爾、津蓋爾、維克多·阿德勒、考茨基、伯恩施坦、拉法格、蓋得等等，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教導出來的學生。但是，我們知道，所有這些領袖——有些人是局部地，另一些人是全部地——都在議會改良和黨及工會機構獨立發展的環境下朝機會主義方向蛻化了。我們看到，而在帝國主義大戰的前

夜尤为清楚，在老一輩的声望掩盖下的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机构怎样成了革命发展的极严重的障碍。我們——正是我們这些“老头子”——应当說，我們这一代在党内自然是起领导作用的，可是，假如党容許在政策中让机构的官僚主义的方法得到继续发展和加强，那末我們就沒有任何足以防止无产阶级精神和革命精神逐步地不知不觉地消沉下去的独立保障，因为这种方法使青年一代变成消极的教育对象，并不可避免地使机关和群众、老头和青年疏远起来。要防止这种无可置疑的危险，除了使方針作轉向党的民主方面的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改变，并越来越多地把直接参加生产的无产者吸收到党内来，是沒有别的办法的。

摘譯自《新方針（一）》（1923年12月8日），載于《真理报》1923年12月11日第281号第4版。

有一点是必須一开始就清楚了解的：我們所遭受的摩擦和困难，其实质不在于书记在某些地方作得过火了，因而必須稍为阻止他一下，实质在于，整个党要轉入更高的历史阶段。党员群众仿佛向党的领导机构說：“同志們，你們有十月革命以前的經驗，这些經驗是我們多数人所沒有的；可是，在你們的领导下我們获得了十月革命以后的經驗，这种經驗越来越多了。我們不仅想受你們領導，而且想同你們一起參加对阶级的领导。我們所以想这样作不只是因为這是我們党员的权利，而且因为这是整个工人阶级所切身需要的。沒有我們下层的經驗（不是简单地从上級那里吸取来的，而是我們自己积极地帶到党的生活中来的），党的领导机构是会官僚化的，而我們下层人物就会在非党群众面前感到自己沒有足够的思想武装。”

如上所述，目前的轉变是从过去的全部发展中产生的。肤浅的眼光所察觉不出的党的生活和意識上的細微变化过程，早就为轉变作了准备。銷售危机大大推动了思想批評工作。德国事变的

迫近使党精神一振。正是这个时刻非常突出地暴露了，党的两层楼生活已达到何等程度：上层作决定，下层只是打听決議。

摘譯自《新方針(三)》(1923年12月)，載于《真理报》1923年12月29日第295号第4版。

由于重大的历史原因和我們的錯誤而形成的旧方針，其主要危险在于它暴露出几千个领导干部同志和作为影响对象的全体党员群众日益对立的趋向。如果这种制度今后繼續固执地保持下去，无疑地，它最終会使党遭到蛻化的危险，而且，这种蛻化是在党的两极上同时发生的，即，既在青年党员身上也在领导干部身上发生。至于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工厂和学生支部等等，危险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相当多的党员由于感觉不到自己是全党工作中的积极参加者，由于自己向党所提出的問題得不到应有的及时答复，就会开始在各种各样的小集团和派別組織的形式下为自己寻找党员独立活动的代用品(錯誤的代用品)。象“工人集团”这样的小集团之所以具有征兆的意义，我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說的。

但在另一端上，即执政的一端上，这种拖延过久的、被党看作官僚主义的方針，它的危险性也是不小的。如果不懂得或看不到中央決議对官僚主义的譴責正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的譴責，那是可笑的、不体面的鶻鳥政策。問題不在于党的实践在个别地方有脱离正确的最完善的路綫的傾向，而正是在于机构的方針，在于它的官僚主义傾向。官僚主义是否包含有蛻化的危险呢？否认这种危险是盲目无知的。官僚主义化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有下列这些危险：脱离群众，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管理、挑选和調动的問題上，縮小眼界，削弱革命嗅觉，也就是，或多或少地使老一輩至少是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遭到机会主义的蛻化。这种过程是緩慢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发展着的，但暴露出来却是很快的。只有有了官僚主义的病态的神經過敏和机构的傲慢态度，才会从这个以客观

的馬克思主義預見为依据的警告中看到某种“侮辱”、“謀害”之类的东西。

可是，实际上这种蜕化的危险是否很大呢？党懂得或感到这种危险并对此有积极的反应——比如政治局的決議就是因此而問世的——，这个事实证明党有深厚的生命力，从而也发现抵制官僚主义之毒的抗毒素的活的源泉。这就是党的革命自卫的主要保障。但是，既然旧方針力图千方百計地通过压制，通过越来越多的人工选择和恫吓的办法保持下来，总之，通过对党采取官僚主义的不信任的办法保持下来，那末，大部分干部遭到蜕化的实际危险就会不可避免地增加起来。党是不能只依靠过去的本钱为生的。过去准备了現在，这已經够了。但必須使現在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能跟得上过去，为将来作准备。現在的任务則是：把發揮党的积极性的重心轉移到党的基本群众中去。

同上。

### 3. 声称官僚作风是“从中央經過省向县里发展的”。

官僚作风并不是个别省組織的偶然特征，而是普遍現象。它不是从县經過省向中央发展的，而是恰好相反，是从中央經過省向县里发展的。它决不是战争时期的“殘余”，而是把正是最近几年积累起来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方法搬到党里来的結果。不管战争时期的官僚主义在个别情况下具有何种畸形的形式，但它同目前的官僚主义比較起来，却是黃口小儿了，目前的官僚主义是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形成起来的，現在尽管党的思想水平有了提高，但党的机构仍继续固执地代替党考慮和决定問題。

摘譯自《新方針(三)》(1923年12月)，載于《真理报》  
1923年12月29日第295号第4版。

## (十三) 关于工会国家化

### 一、声称經濟机构和工会并存 不是“工人国家的原則”

声称經濟机构和工会并存不是“工人国家的原則”，而是过渡时期的“暫時現象”。所以出現这种現象是因为經濟落后、无产阶级的“准备不足”以及“低下的文化水平”。例如“在苏維埃政权的第一个时期工会曾試圖直接掌握生产机构”，但它们“沒有能力这样做”。

#### 1. 根據我們党綱的精神，由相应的工会来管理铁路和水运应当成为我們的目标。

但是党綱的意思决不是把管理直接轉交給在資本主义时代形成的那种样子的工会手里。在苏維埃制度下工会的社会作用根本改变了。与此相应，应当改变它的組織，应当选派負責工作人員。

旧的工会不是靠一紙决定就简单地变成生产机关的。只有通过选拔和培养工作人員、培养自己的专家、合理地和适当地分配力量等等坚持不懈的工作，它才会成为生产机关。

铁路机构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交通运输人民委員及其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机构，另一部分是应当包括全体运输工作人員的运输工会，——这是过渡时期的現象，在此期間将完成內部改組和适应于新任务的过程，即适应于既由运输部門的主管机关，也由

工会来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输工作。

这一过程迟早应当导致工会和行政机构完全合并，即导致建立统一的机关，它将同样地统管运输的行政-技术需要及其工作人员的各个方面和利益。

摘译自《在走向产业工会的道路上》(给铁路工会代表大会的意见)(1920年)，载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  
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386—387页。

2. 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工会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确和两重性。在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时期工会（在发生革命时的那种形式下）曾试图直接掌握生产机构。它们没有能力这样做。开始和它们并行地形成苏维埃管理工业及其他经济部门的机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工会的同时，这一苏维埃机构完全离它而独立了，并把对经济的领导完全集中在自己手里。

这样，工会的机构就和管理该工业部门的机构并行存在。行政经济机关的自主性和闭塞性越来越发展，因而它对工会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发展。换句话说，工会越来越被排除对经济生活的实际参与。

留给他的是在推荐经济工作岗位的人选和在生产宣传方面的相当不明确的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极其有限的作用。

在工会前面没有任何远景。然而为了发现合适的人选，以及进行生产宣传可以建立比工会远为经济的机关。工会的许多积极的工作人员为这种状况而苦恼，力图离开工会的工作。如果危机在其目前这种形式下拖下去的话，工会就有完全瓦解的危险。

3. 在工人国家内工会是旨在最正确和最有成效地服务于生产本身的利益和旨在同时提高工作人员本身的物质和精神水平的，包括该经济部门的工人的组织。产业工会不是从属于生产的工会，而是为了生产的工会，即为了全面地参加生产和为了领导

生产的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經濟机构和工会組織的平行只有作为暂时的現象，而不是作为工人国家的原則才是可以容忍的。

摘譯自《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1920年11月9日提交俄共中央的提綱初稿)，載于《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記記錄》莫斯科1933年版第786頁。

我认为，在这里洛佐夫斯基同志无疑是正确的——正是經濟政策上的轉变引出工会政策的形式。我們是从哪儿开始的呢？如昨天在这儿討論时所說的，如列寧同志在第三天的報告中所說的，我們在經濟政策中是以跟資產階級的过去急剧而不可調和的決裂开始的。过去有过市場，現在废除了，自由貿易废除了，競爭废除了，商业核算废除了。用什么代替这些？集中的、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它統管一切，組織一切，照顧一切：机器送往哪儿，原料送往哪儿，成品送往哪儿，——它从統一的中心出发通过自己的負責机构决定、統管一切。我們在這一計劃上失敗了。为什么？因为事实证明准备不足，或如列寧同志所說的，由于我們低下的文化水平……而如果沒失敗呢？或者換句話說，如果另一个工人阶级在其专政的某一阶段上，就文化修养而言有可能轉向这种集中的国家規模上的废除市場、競爭、核算，并以包罗一切和預見一切的統一的經濟計劃来代替它，——那时毫无疑问就不可能存在工会之間和經濟机关之間的兩重性。那时工会国家化和对社会主义經濟的計劃領導就会意味着同一過程的两个方面。那末，我們的錯誤到底在哪里呢？錯誤在于，如果从經濟观点來說，——昨天我曾极力指出，总的来讲問題在于革命的必然性，——但是如果单就經濟这一面而言，那么錯誤在于无产阶级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无力。在国家的当前条件下，在它本身的技术、生产和組織上的目前这种文化程度上，它不能集中地建設社会主义，但如果

它这样做了，如果它沿这条道路走了，那末除了工会国家化的道路以外，我个人就是現在也沒看到任何其他的道路。一种情况是从另一种来的。錯誤不在于国家化的要求，而在于不合条件的經濟政策。

摘譯自《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会問題的發言》（1922年3月29日），  
載于《联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記記錄》莫斯科1961年版第269—270頁。

## 二、鼓吹工会国家化，由工会来管理生产

声称在苏維埃制度下工会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它力图、准备并加以改組来掌握整个生产管理，否則它就用不着存在”。因此要求“更坚决、更迅速地使工会国家化”，使工会“变成真正生产組織”，“保证工会在經濟生活中的統治地位”，“把对經濟生活的全部领导集中在自己手中”。例如“铁路工会应当成为生产的，即管理运输的組織”，应当“把交通人民委員部的全部机构最終都变成工会的行政經濟机关”。

同志們，在这个問題上，在有了全俄铁路总执委会和其他非铁路工会在还没有改組得适宜于干預生产的时候去直接干預生产的經驗以后，現在似乎出現某种相反的极端：工会好象根本拒絕，在較近的将来——經過一年、两年、三年或五年（这取决于事情的发展情况）——好象拒絕領導生产，把自己的任务縮小为只是“协助”那些領導生产的机关和人。同志們，我认为这样提出問題是根本錯誤的，并会完全縮小工会的历史意义和作用。我們暫时按照习惯还繼續称它們为工会，虽然在苏維埃国家里，在向共产主义过渡

的时代，它們当然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社会作用、自己的社会职能和自己的使命。工会应当真正成为产业工会。**如果它現在还有意义和作用，那只是因为它力图、准备并加以改組来掌握整个生产的管理，否则它就用不着存在。**（鼓掌）

同志們，这是在关于你們工会問題上的主要准則，主要观点。如果我們不規定出工会这一生产領導机构的基本任务，我們就会在实际問題上迷失道路，絆腿跌交和常犯錯誤。它現在是不是这样的机构呢？不，不是。

在这里，我认为引证一下安奇波夫同志关于个别的然而是很重要的問題——关于綫路建設問題的提綱是有益的；在我看来，这个提綱好极了，虽然远不是你們所有的人都贊成这个提綱。

虽然如此，在这个提綱（发表在《汽笛报》第五十号上）里有一个論斷，我是不能同意的。安奇波夫說：“許多大工会已經最后形成为产业工会，并且已經巩固起来。”这是絕對不正确的。关于俄国的工会，决不能这样說，自然，这对铁路員工商会也是一样。工会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不是旧意义上的工会呢？不是。旧工会是工联，即本車間或本工业部門工人的联合，其任务是在反对資本和国家的斗争中提高他們的物质和道德水平，改善他們的处境。任何資本主义社会的工联、工团和工会都是如此。自然，你們的工会沒有这样的使命。在你們所建立的苏維埃国家里，工会跟国家进行阶级斗争是荒謬的事情。那么，实际上干什么呢？“协助”組織生产。协助——这固然也是一种作用，但这不够；为了这一点，不需要如此龐大的机构，不需要这种人数众多的組織以及包括大量的宝贵的人力的复杂的上层机构。但是，我們且把問題提得准确点。同志們，什么是协助組織生产呢？这里产生了什么是組織生产的問題。組織生产就是組織人們进行生产。这种組織不是无生命的技術性的，而是活生生的，是把劳动的人們結合在一起，即把

人和人(在各个工厂、管理处和办事处里)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因此，生产的基础是用特殊方式組織起来的集体的，即人数众多的人。誰来組織铁路員工呢？铁路工会、工会組織他們干什么？为了生产，在这里就是为了运输。因此，**铁路工会应当成为生产的，即管理运输的組織**。应当成为这样的組織。但是，依靠我們从过去接受来的那种形式的工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嗎？不，不能够。

全俄铁路总执行委员会的罪过和不幸在什么地方呢？據說，它干預了許多行政問題。它“干預”得好嗎？即把管理运输的工作組織得好嗎？不，不好。但是，**它力求把生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是否正确呢？絕對正确**。全部实质在于：这种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所产生出来的工会过去是工联主义的工会，它的内部組織适于另一些目的，即适于为爭取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而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而不适于組織运输。現在則要由原有的这些成分，这些人員建立另一种工会，另一种适合于管理生产的組織。这一点是可以办到的，正如同用同样一些磚瓦可以修建住房、教堂和练馬場一样。**我再說一次，必須由铁路員工建立直接适合于管理运输的組織**。这需要多少時間？我不来預言，这不仅仅取决于我們和我們的善良意願（虽然这自然也与它有关），而且也取决于我們还要花多少時間来打仗：我們是从你們这里調走工作人員（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作为軍事部門的代表說話的），还是相反地把工作人員从軍事部門抽調給工会；我們是全力恢复經濟，还是繼續把它消耗在战争的需要上。这里有几十种能推迟或加速铁路工会成为直接管理运输的机关的原因和影响。但是，我已經說过，在这許多原因当中，工会本身的各种内部傾向和要求也起着不良的作用。我們必須为自己提出由工会在各方面，首先是在生产方面掌握运输的任务。为此，就必須摆脱由过去工会的工联主义作用

所造成的一切传统。

摘译自《在全俄铁路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20年7月21日),载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  
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388—390页。

**我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使我們的工会变为真正生产组织，逐步掌握运输的机构并把运输需要的一切工作人员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最终应当完全消除工会组织和国家生产组织平行存在的现象，把它们联合为更高类型的组织。**

摘译自《给铁路和水运工人中央委员会的信》  
(1920年11月6日),同上,第409页。

**……共产党、产业工会和工人国家的机关的思想和精力应当用于使经济机关在较早或较迟的将来和工会合并，以便使工会一无例外地包括该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作人员，使行政经济机构成为工会内管生产的、即最重要的机关，在它的后面则有宣传教育、供应、纪律等机关。**

**4. 因此，对执掌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在工会方面的任务应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必须使工会掌握生产，另一方面必须使工会善于掌握生产，而不仅仅是给予“协助”。**

正是应当清楚明确地为工会提出这一目标。工会在工人国家中的生产作用根本有别于它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基本上是）“工联的”作用。同时，在保存和巩固国家-经济机关和工会机关的独立性的情况下，工会内部继续保存着把国家当作缔约一方的关系。由于上述情况的结果而流传在许多工会工作人员的心理中的这种工联主义成份对工会、对经济机关，换句话说，对整个工人阶级是极其危险的。

**5. 在为自己和工会提出清楚明确的任务，即保证工会在经济**

**生活中的統治地位的任务之后，党应当在自己和工会面前提出为此目标改組、改造工会，对它进行重新教育的任务。**

我們建立、改組、解散和重新建立經濟-蘇維埃机关，同时选拔和审核不同崗位上的不同工作人員。工会同这一工作几乎完全无关。然而极其明显，如果为工会提出在两三年之内掌握自己的生产的任务，那么現在就必须开始改組工会，即首先从这一观点出发去选拔領導人員。

6. 显然，整个說来，只有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蘇維埃国家才能对把工会从职业的改組成生产的工作<sup>①</sup>实行思想領導，才能为这种改組提供必要的人員和物质条件(人員、技术机构等等)。在某些地方(中央运输工会)旨在使工会接近产业类型的組織变更通过极其尖銳的和急剧的組織措施实现的，这种措施是由特殊条件引起的。如果清楚明确地規定蘇維埃国家工会組織的目标并使这一作用成为全体工会工作人員的財富，那么改組工会的組織措施就能在摩擦最少的情况下具有远为平靜的性质。然而极其明显，这一决定工会今后命运的(瓦解或者上升到較高的历史水平)有决定性意义的問題，工会是不能自行处理的，而必須听取党的清楚明确的指示和取得工人国家組織上和物质上的全面援助。这种領導和行动的机关在一种場合下是政治部(交通总政治部)，在另一种場合則是党中央委員会、相应的工会的中央委員会、經濟管理总局的代表参加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临时委員会。

.....

#### **8. 应当这样改組工会：**

(1) 賦予工会以广泛的生产的宗旨(掌握生产)，这个宗旨应当是鼓动宣传、組織、选拔人員的基础；

---

① 即职工会改組成产业工会。——編者注

.....

12. 在那些在該工业部門复兴的基础上业已完成向提高方面內部轉变的工会里，可以而且应当越来越广泛地采用工人民主的方法：在广泛的群众會議上系統地討論全部經濟-生产措施，一系列經濟-行政职位实行选举，同时使这些职位同生产組織內的一定地位結合起来，等等，等等。

.....

15. 继續发展这种制度，逐渐扩大运用从基层到上头的选举原則，越来越紧密地把工会中的負責作用和生产中的負責作用結合起来，我們就将在或早或迟的最近期間处于下列状况，即工会完全地和全面地統管某生产部門的同时，将运用选举和选拔的办法从自己那儿分出在协调所有經濟部門的工作的工人国家的总的监督和领导下的全部行政經濟机构。

摘譯自《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1920年11月9日提交俄共中央全会的提綱初稿），載于《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記記錄》莫斯科1933年版第786—789頁。

工会应当把对經濟生活的全部領導集中在自己手中。它們不是简单地协助生产，而应当組織生产，成为这一組織的有充分权力的領導者。和官僚主义斗争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可以由个别反官僚主义的技术专家（可惜，有这种专家）专门来搞的任务，——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只能在实际組織生产本身以及吸引劳动群众本身参加这一組織工作的基础上进行。請看我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問題的決議，在原則部分它只是重申党綱，而在实践部分它拟定了关于工会和經濟机关在其現存形式下如何协调工作的某些阶段、某些过渡阶梯；因为如果有必要使工会越来越成为經濟的領導机构，那就不能不看到，現在还没做到这一点，而試圖机械地把經濟轉交給个别工会的做法必遭失敗。这种情况我們在铁路运输

方面見到过，——曾通过全俄铁路总执委会作过这种嘗試，——而当时工会无法胜任、也不能胜任运输任务，因为，再說一遍，它是从旧时代来的，完整地保留着旧的組織系統、旧的工作习惯及旧的全班工作人員。象整个工业一样，旧运输业有两层：首先是行政、領導上层——私有制的桂冠——，其次是中級技术人員和下等工人群众。革命砍去了資本主义私有者的首脑，它摧毁了行政技术机构，不仅如此，它还接着从工人阶级中調走一批接一批的优秀工人，把他們送到國內战争的前綫或苏維埃工作的各部門去。因此，所剩下的在很大的程度上全都是些軟弱无力的人，成千上万富有經驗的老組織家都已离开，革命应当而且也有权把这些老組織家調走，否則它就不成其为革命了。革命不能不摧毁旧的行政机构，由于迫不得已它还砍去了另一个头領——思想革命組織的头領。而苏維埃国家不能把运输业交给这种被削弱的工会。为了使工会能够成为产业工会，它必須把全部参加生产的工作人員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因为运输业和工会所需要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員都应当参加組織运输的工作。在把各种工作人員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的同时，工会逐步地掌握生产机构。但是为此它应当积聚自己的力量，同时由于旧工会沒有碰到过这一任务，沒有按这一原則工作过，因而需要审核自己的領袖、老工作人員、老領導人；因为其中的許多人完全适于从事旧的組織斗争和工作、領導罢工和街垒战，然而他們中間并不是所有的人就其能力而言都适于运输本身的組織工作的。所以，从新的生产的观点，而不是从职业的观点严格地审核旧干部，在工作中对他們进行严格的挑选，——这是任务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从所有其他的机关，而在目前首先是从军队中抽調所有的下列工作人員，这些人以前是由铁路工人中还是从其他什么地方調去的都一样，只要他們在工作中显示出他的組織才干就行，必須把这些工作人員抽調到工会部門，并协助工会使之成

为产业工会。

摘譯自《在中央运输工会扩大全会上的发言》(1920年12月2日),載于《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412—414頁。

只有这样,从其他部門吸收行政技術人員,在工会內部进行重新教育,从工会中提拔大量的工人并使經濟机构和工会机构融合,工会才能創立工人民主。只有这样工会机关和苏維埃經濟机关并存局面才会消失。現在工会設立生产部这种做法是过渡措施。生产部及相应的分部无论如何都不能作为經濟管理机关而永存。这不是孤独自在的机关,这仅仅是从工会伸展到苏維埃經濟机关以促进融合过程的触須。每一个这样的分部必須有相应的工作部門的领导人参加;所有这些問題都应当一起討論,即这种分部应当参加經濟机关。經濟机构的人員中最有才干的实际工作者或专家应当参加工会。这样,存在于有專門知識的人和工会代表之間的鴻沟就会消失。这就是中央运输工会最根本的任务。

同上,第425—426頁。

1. **运输工会給自己提出的直接任务是真正成为产业工会,即不仅是按照生产組成的工人組織,而且是搞生产的組織。**

**在工人国家里只有当工会实际上掌握生产,把它的全体工作人員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改善劳动組織,提高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改善群众的物质状况和提高他們的精神水平,工会才具有意义。**

摘譯自《中央运输工会扩大全会就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工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通过的決議》(1920年12月8日),同上,第438頁。

在全俄铁路执行委员会解散之后,在去年六月工会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关于铁路工会的生产作用这一問題。我

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出了单行本。无论是否担任大会主席的鲁祖塔克同志，还是其他同志，都没有对我的报告的实质发表任何反对意见。这个报告印出以后由我分发给各中央委员，并鉴于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必须把工会从职业轨道转到生产轨道（例如，由此就必须在组织上不按地区，而按路线来建立工会，即根据生产本身的技术条件和行政管理条件来建立工会）这一问题在实践上的重要性，要求注意这份报告。显然，没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我的报告中找到任何不正确的地方，因为谁也没有在中央委员会内提出这方面的問題。用心看过上述报告的同志們确信，那里所談的正是关于工会的生产作用問題，关于工会必须把自己全部政策和全副力量用于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的問題，以便把交通人民委員部的全部机构最终都变成工会的行政经济机关，当然工会要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总监督下和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活动。

摘譯自《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1921年)，  
載于《真理报》1921年1月14日第2版。

但是，有一項建議即关于扩大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一問題，是此刻必須要談的。在“十人”草案中到处都提到，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太小，应当加以扩大和增大。但是，同志們，这里沒有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工会現在的环境和工作是同一九一七年末或一九一八年初不一样，当时就組織經濟來說，工会面临的是一片荒野或敌占区。現在我們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或初步的經濟組織体系。他們向工会說：“你們应当扩大自己在組織上对生产的影响。你們应当比以前更多地掌握直接領導組織經濟的工作。”这一点，在这个提綱里提过两三次，但这是什么意思呢？采取什么办法呢？你們知道，对合并进行了斗争。但是，在經濟方面，工会面前有現存的有組織的苏维埃国家机关。用什么办法工会才能增加自己在經濟上的領導作用，是越过这些机关，还是通过它們或者是用組織

**上和它們合併的辦法呢？這就是我們處處都要遇到的一個問題。**“工人反對派”有這樣解決問題的傾向，即由工會掌握經濟，撇開那些集中了我們三年建設經驗的經濟機關。這種解決辦法是絕對不正確的。這裡，“十人”草案中說，過去工會和經濟機關是同時并存的，由於當時經濟機關的薄弱，這種并存局面證明是必要的，而今後將怎樣呢？看來，工會今後進行自己的活動仍然是不越過、不反對或通過經濟機關，同時也不是把它們丟在一边，不是同它們並行工作，而是達到在組織上的結合，這種結合也就是合併。在這方面，我們已經得到了你們這方面的某些讓步。我們曾經力求使全俄工會代表大會和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在同一時期舉行會議，在主要工作上它們有共同的日程，有共同的小組活動，等等。如果有條件實現這一點，那末我們就在組織上的結合和合併方面進了一大步。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應當拋棄這個絕對不正確的提綱和這種既不能充實我們黨、也不能充實共產國際的混亂提法。同志們，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不能勸你們投票贊成這個決議案。

摘譯自《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工會問題的副報告》（1921年3月14日），載於《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莫斯科1933年版第360—361頁。

**因而，在一九二〇年二月第九次代表大會前夕我曾建議把余糧征集制改為糧食稅并在工業中實行合同關係，我在這一問題上在中央委員會得到四票贊同，十一票反對，在我的建議被否決以後，我得出必需消滅對經濟領導的雙重性，即更堅決、更迅速地使工會國家化的結論。而這是正確的結論。**

摘譯自《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工會問題的發言》（1922年3月29日），  
載於《聯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莫斯科1961年版第270頁。

### 三、詭称工会国家化不是工团主义

詭称他的观点不是“工团主义”，因为这不是在越过和不要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情况下，而是在它们的帮助下进行的。

7.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指责所述观点为工团主义是多么不慎重。工团主义指的是工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组织想在没有和越过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情况下掌握生产的倾向。对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才能帮助工会改组，以便使它能够掌握生产。

摘译自《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1920年11月9日提交俄共中央全会的提纲初稿)，载于《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33年版第786—789页。

## (十四) 关于党内派别斗争

### 一、妄談派別斗争的必然性

#### 1. 說派別斗争是社会矛盾的反映， 声称真正的革命組織不可能沒 有暫時的派別組織

认为“一个政党只代表一个阶级的例子在全部政治历史当中是找不到的”，一个阶级可以产生好几个政党，一个政党可以依靠不同阶级的几个部分。“一个阶级只有经过内部的各种倾向、集团和政党之间的斗争才能解决共同的问题”，真正的革命组织也不可能没有“暂时的派别组织”。说党内的派别集团反映各种阶级倾向，因此“每当党的路线急剧转变”，党内就会发生派别变化；偶然的意见分歧和暂时的思想派别也可能转变成固定的小集团”和“有组织的派别”。声称联共（布）中央和党的一般领导集团内的左中右三派的斗争不是“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而是社会矛盾在执政党机关中的反映。“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派别斗争的历史”。

我們是國內唯一的党，在专政时代不这样是不行的。工人阶级、农民、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要求都向我們的党压来，

力图通过党找到政治表现。发展中的种种困难和矛盾，无产阶级不同部分或全体无产阶级同农民在利益上的暂时不一致，——所有这一切都通过工人和农民的支部，通过国家机构，通过青年学生对党施加压力。甚至偶然的暂时的意见分歧和意见的细微差异也可能在某一个穷乡僻壤的机关中反映出一定社会利益的压力；偶然的意见分歧和暂时的思想派别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变成为固定的小集团；同时，后者又可能迟早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派别；最后，业已形成的派别把自己和党的其他部分对立起来，从而更多地受到来自党外的影响。在共产党出于必要而独揽政治生活领导权的时代，党内小集团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结论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想要派别组织，就不应当有经常性的小集团；如果不想要有经常性的小集团，就要躲开临时的小集团；最后，为了防止党内出现临时的小集团，务必使党内根本没有意见分歧，因为凡是有两种意见的地方，那里的人们总是结成集团的。

摘译自《新方针(二)》(1923年12月)，  
载于《真理报》1923年12月28日第  
294号第4版。

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是党。根据我们的即使是仅仅取之于一年间（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的经验，并根据芬兰、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亚、德国的补充经验，可以确定：由革命的准备工作转向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党内危机，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一般说来，每当党的路线急剧转变时，作为转变的序曲，或者作为转变的后果，就会产生党内危机。其原因是：在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要求一定的工作习惯和方法。策略上的转变，表明这些习惯和方法或多或少的破坏：这就是造成党内摩擦和危机的直接和最近的根源。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曾写道：“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

头，往往連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時間內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經失去任何意义。历史的轉变来得如此‘突然’，这些口号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义。”<sup>①</sup>由此就要产生一种危险：如果轉变过分急剧，或者过分突然，而在以前一个时期，在党的領導机构中聚集了过多的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分子，那么党就会不能在最紧要的关头实现自己的領導，尽管它几年来或几十年来就已經准备应付这个时机了。党被危机所侵害，运动越过了党而前进，走向失敗。

革命的政党处于其他政治势力的压力之下。它在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要制定抵御和击退这些政治势力的对策。每当策略轉变及由此而引起了内部派別变化和发生摩擦时，党的抵抗力量就要削弱。因此，由于策略轉变的必然性而发生的黨內各派別，經常有可能远远超过自己的出发点，而成为各种不同阶级傾向的支柱。簡言之，党如果不能与本阶级的历史任务步調一致，就要成为或者瀕于成为其他阶级的间接工具。

摘自《十月的教訓》(1924年)，載于《列寧主義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三聯書店1964年版第238—239頁。

目前在中央委員會和党的一般領導机关里存在着三种基本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公然无忌的右傾。这种倾向又包括两个集团。其中之一由于它的机会主义和軟弱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代表“經濟上有勢力的”中农的。它的路綫是中农决定的，它受到中农思想的指导。属于这个集团的有这样一些同志：李可夫，亚·彼·斯米尔諾夫，加里宁，格·彼得罗夫斯基，楚巴尔，卡敏斯基及其他

---

① 《列寧全集》第25卷第173頁。——編者注

人。緊緊圍繞着他們活動的是一些“非黨”政客：康德拉節也夫之流，薩基林之流，查雅諾夫之流，以及富農的其他代表們，他們或多或少地公開宣揚烏斯特里雅洛夫的理論。在每一个省，尤其在每一个縣都可以看到不少小康德拉節也夫和小薩基林，他們在那裡擁有一份真正的權力和影響。第一種總傾向的另一個集團是由工會領袖構成的，他們代表著工人和職員中的高薪階層。這個集團的特點是希望同阿姆斯特丹國際<sup>①</sup> 加強聯繫。這個集團的領袖是托姆斯基，米爾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同志。這兩個集團之間有一定程度的摩擦，但是它們要使黨和蘇維埃國家的路線無論在國際政策或國內政策上右傾的意圖，却是一致的。它們都是以蔑視列寧主義理論和鄙棄世界革命策略著稱的。

**第二種傾向是官方機器的“中派主義”。**這種傾向的領袖是斯大林、莫洛托夫、烏格拉諾夫、卡岡諾維奇、米高揚、基洛夫諸同志。**實際上就是現在的政治局。**不斷搖擺的布哈林“代表了”這一集團的政策。這個官方中間集團本身絕不代表任何廣大群眾的态度，但是它却企圖——不是沒有成功——使自己代替黨。黨的、工會的、產業機構的、合作社的、國家機關的“行政人員”這個階層，現在已達幾萬人。其中有不少“工人”官僚——這就是說，以前是工人，而現在同勞動群眾已經失去了一切聯繫。

不消說，在對革命前途有如此巨大重要性的行政和領導機關里，當然也有成千上萬堅定的革命者，他們是沒有同群眾斷絕聯繫、無限忠誠於工人事業的工作人員。他們在這些機構里進行著真正的共產主義勞動。

但是這並不能改變由於政治路線和黨的制度的蛻化變質而產生了人數眾多的真正官僚階層這個事實。

---

① 改良主義的工會國際組織，正式名稱是“國際工會聯合會”，1919年7月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成立，受第二國際領導。1945年12月14日解散。——編者注

这个阶层的实际权力是巨大的。正是这个“行政人員”集团坚持主张“安安靜靜”，“关心业务”——而最主要的是“不准討論”。正是这个集团自滿地宣布(并且有时是真正地认为)，我們已經“快要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綱領的十分之九”已經完成。正是这个集团“高高在上地俯視”全党，更加高高在上地俯視非熟练工人、失业者、雇农。这个集团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左边——这就是說，在革命的列寧主义者之中。这个集团提出“向左开火”的口号。

目前，右和“中間”这两种傾向，由于它們共同敵視反对派而團結起来。但是如果清除了反对派，它們之間的冲突就会加剧。

**第三种傾向是所謂“反对派”。这就是党的列寧主义派。**由于統治集团要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它就可鄙地企图把反对派說成是一个右傾派別(“社会民主主义傾向”等等)。反对派是拥护党的統一的。斯大林硬說反对派要建立“第二个党”，他在这面謊言的旗帜之下宣传自己的綱領——“清除”反对派。反对派用自己的口号回答道：“不惜任何代价維护列寧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統一。”目前这个文件闡明了反对派的綱領。黨內的工人阶级成分和一切真正的列寧主义的布尔什維克将会拥护它。

反对派不得不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列寧的事业而斗争，因此个別人背离反对派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三种傾向的領袖中間将会发生个別人的重新組合，但是这种重新組合并不能改变这个問題的根本事实。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4—76頁。

布尔什維克党准备了并且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它創建了苏維埃国家，并供給这个国家一副坚强的骨骼。党的蜕化是国家官僚化的原因，也是結果。必須至少簡短地說明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

布尔什維克党内部制度的特点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把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并没有一点矛盾的地方。党不仅密切注意二者的界限应当随时划清，而且还密切注意运用这种方法的人应当真正有权规定党的政策方向。批评自由和思想斗争是党内民主不可变更的内容。目前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不容许搞派别活动的说法，是堕落时期的神话。实际上，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派别斗争的历史。同时说实在的，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既然以推翻世界为自己的任务，把最大胆的叛逆者、战士和反抗者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那它要生存和发展下去，怎么能没有思想冲突、没有小圈子和暂时的派别组织呢？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远见，往往能使冲突缓和下来，使派别斗争的持续性减小，但也仅此而已。中央委员会所依靠的就是这种热烈的民主的支持。它正是从这种支持当中得到胆量，来作出决定和发布命令。领导在各个危急阶段所表现的明显的正确性，使中央委员会拥有很高的权威，这种权威是集中制的无价的精神资本。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7—68页。

**左、中、右三派的领导人都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同一个参谋部——政治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对于正在发展中的斗争政治意义认识不清。在肤浅的人看来，这似乎完全是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是一种争取列宁的“继承权”的斗争。但是在严峻的专政条件下，社会矛盾在初期除了通过执政党的机关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热月派人物都是从雅各宾党人当中产生的。波拿巴本人在早期就属于雅各宾党，后来法国的这位第一执政官和皇帝也正是从以前的雅各宾党人当中挑选其最忠实的臣仆的。时代改变了，雅各宾党人也随着改变了，二十世纪的雅各宾党人也不例外。**

同上，第70页。

那位美國記者訪問斯大林的時候提出一個關於新憲法中如何規定黨的作用的問題，斯大林回答說：“可是既然沒有階級，既然階級和階級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沒有階級了，階級和階級——已經沒有了！——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托洛茨基注〕，既然社會主義社會的各階層之間只留下了某些非根本性的差別，那就不会有形成互相鬥爭的政黨的土壤。沒有幾個階級的地方，就沒有幾個政黨，因為政黨是階級的一部分。”每個字都有錯誤，有些字而且是錯上加錯！從這段話看來，似乎階級是完整的，似乎階級的界限是劃分得清清楚楚的，而且一旦划清就不再變動了，似乎一個階級的意識嚴格地符合於它在社會中的地位。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關於政黨階級性的學說便被歪曲了。政治意識的動力由於行政方面的利益便被排除在歷史進程外面了。實際上，階級並不是完整的；它們往往被內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只有經過內部的各種傾向、集團和政黨之間的鬥爭才能解決共同的問題。附加一些條件才能夠承認“一個政黨是一個階級的部分”。但是，既然一個階級有許多“部分”——有些向前看，有些則向後看——那末，一個階級就可以產生好幾個政黨。根據同樣的理由，一個政黨也可以依靠不同階級的好幾個部分。一個政黨只代表一個階級的例子在全部政治歷史當中是找不到的——當然，除非是把政治的表面現象當作真實的東西。

從社會結構上說，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當中最完整的階級。雖然如此，象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這樣的“小階層”的存在，已經足夠產生機會主義政黨，這種政黨在事態發展的過程中變成資產階級統治的一種武器。不管從斯大林主義的社會學觀點來看，工人貴族和無產階級群眾之間的差別是帶有“根本性的”，或者只不過具有根本無足輕重的“某種性質”，正是由於這種差別，才有必要同社會民主主義決裂而創建了第三國際。即使在蘇維埃社會中

已經“沒有階級”，這個社會至少也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不完整得多，複雜得多，因而就能夠提供形成好幾個政黨的適當土壤。斯大林在理論領域所作的這種不謹慎的漫談，證明了比他所要證明的東西多得多。根據他的推論，不僅蘇聯不可能有不同的政黨，而且甚至不可能有一個政黨。因為既然沒有階級，一般地說來也就無所謂政治。然而，斯大林却從這個法則當中得出一個有利於他擔任總書記的那個政黨的“社會學”結論。

同上，第194—196頁。

## 2. 声称官僚主义是派別活动的主要来源之一

宣称“派別活动的主要来源之一正是机构的官僚主义，它压制批评，把不满情绪压往深处”；“机械的集中制不可避免地要由派別活动来补充”。“对党、对党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抱着偏执的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是产生机构制度中的一切祸害的主要原因”。“如果把回击官僚主义的行为看成是异己影响侵襲渠道的派別活动，那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明显的官僚主义侵襲的渠道。”污蔑說，如果说执政党内不再有派別斗争，那只是“因为現在不同的意見已經由政治警察的自动干涉解决了”。

在討論中和文章中最近經常指出，“純粹的”、“广泛的”、“理想的”民主是无法实现的，民主对我们說來决不是目的本身。这是完全无可爭辯的。但也可以有同样的权利和有同样的根据說，純粹的或絕對的集中制是无法实现的，是同群众性政党的本性不相容的，集中制和党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目的本身。民主和集

中是党的建設中的两个方面。任务在于，用最正确的办法即最符合环境的办法把这两个方面平衡起来。这种平衡在最近时期內丧失了。重心不正确地轉到机构身上去了。党的首創精神被贬到最低限度。这就养成了根本违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精神的管理习惯和办法。用削弱党内首創精神的办法大力加强机构的集中制，就会在党内产生身体不适之感。它在极端的一翼中得到了极其严重的病态表現，直到在露骨敌視共产主义的分子領導下在党内建立非法的小集团的地步。

摘譯自《新方針(一)》(1923年12月8日)，  
載于《真理报》1923年12月11日第281号  
第4版。

不錯，如果我們的党分裂成为几个派別，它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不应当有，而且也不会有的。它遭到作为独立的集体的整个党的制止。但是，只有发展、加强和巩固工人民主这一方針，党才能成功地清除派別活动的危险。派別活动的主要来源之一正是机构的官僚主义。它压制批評，把不满情緒压往深处。它总是喜欢給每一个提出批評或警告的个人或集体带上一頂宗派的帽子。机械的集中制不可避免地要由派別活动来补充，而后者又是对党内民主的毒辣諷刺和可怕的政治威胁。

同上。

最近党的报刊上举了不少例子，說明党的风气和关系有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蛻化現象。对批評的声音的回答是：“拿出你的党证来！”在中央委员会关于新方針的決議公布以前，官僚化了的机构代表人物把凡提起改变党内制度的必要性的都看作是异端，是派別活动和瓦解紀律。目前，他們在形式上也准备对新方針予以“查照”，也就是以官僚主义的方法使之化为烏有。革新党的机构——当然是在党章明确规定了的范围内——，其目的应当是由那些与集

体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或能够保证这种联系的新人物来代替官僚化分子。而首先应当把那些一听到批评、反对和抗议就要党证以进行迫害的人从党的岗位上撤销下来。“新方针”的出发点应该是：使大家在机构内从下到上都感到没有人敢恫吓党。

同上。

上面我們已經說过，每一个比較严重的和长期的党内小集团，尤其是有組織的派別，都有反映某些特殊的社會利益的趋向。作为小集团基础的每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在其发展中可能成为与无产阶级相敌对或半敌对阶级的利益的反映。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属于，甚至是首先属于官僚主义的。正是需要从这儿着手。說官僚主义是一种不正确的、不健康的倾向，可以預料，这是无可爭辯的。既然如此，那么，它在发展过程中就有使党脱离正确道路即阶级道路的危险。其危险正在于此。但是那些比別人更激烈、更坚决、有时更粗暴地主张每一个意見分歧、每一类意見（那怕是暂时性的）都是不同阶级利益表現的同志們，却不願意把这一标准运用于官僚主义，这是大可注意，同时也是极其令人不安的。其实，社会标准在这里是最恰当的了，因为我們认为官僚主义是十分明显的恶行，是有目共睹和公然的有害的倾向，它遭到正式的譴責但并未根除。而且它怎能一下子根除呢！但是，如果象中央決議中所說的，官僚主义有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因而也有削弱党的阶级性质的危险，那么，由此應該得出的結論是：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决不能預先同某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等量齐观。相反的，党力图保持自己无产阶级性质的意願必然会在党本身产生对官僚主义的反击。当然，在这种反击的旗帜下可能出现各种倾向，其中也有不正确的、不健康的和有害的倾向。只有对它們的思想內容进行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能揭露这些有害的倾向。但是，如果把回击官僚主义的行为純粹从形式上看成是异己影响侵袭渠道的派別

**活动，那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明显的官僚主义侵袭的“渠道”。**

摘譯自《新方針(二)》(1923年12月)，載于《眞理报》1923年12月28日第294号第4版。

对党的統一的关心是絕大多数同志最主要、最热切地关心的問題。但这里必須坦率地說：如果目前对党的統一有严重威胁的話，或者說，至少对党的思想一致有严重威胁的話，那么，这就是狂暴的官僚主义。正是从这个阵营中发出了只能被称之为挑撥的呼声。正是那儿有人胆敢說：我們不怕分裂！正是这个阵营的代表人物才在过去的历史中去搜寻，从中发掘一切能够使党内爭論更加尖銳起来的东西，人为地使人回想起过去的斗争和分裂，以便不知不觉地逐渐使党在思想上同意新的分裂这样一种骇人听聞的自杀罪行的可能性。党要求减少官僚主义制度，有人則打算使之与党的統一的要求相抵触。如果党走了这一条道路并牺牲了其自身民主所最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因素，那么，除了加剧内部斗争和动摇自身的基本團結之外，将一无所得的。如果对党本身都不信任，那么，决不能片面地和最后通牒式地要求党信任机构。这就是問題的实质。对党、对党的自觉性和紀律性抱着偏执的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是产生机构制度中一切祸害的主要原因。党不希望也不允許有派別。认为党会打碎自己的机构或允許某人去打碎自己的机构，这种想法是令人惊奇的。党知道，在机构的成員中有体现着过去大部份經驗的最宝贵的干部。但是党想革新机构，并向它提醒：它是党的机构，是由它选出来的，它不应当脱离党。

同上。

由于重大的历史原因和我們的錯誤而形成的旧方針，其主要危险在于它暴露出几千个领导干部同志和作为影响对象的全体党员群众日益对立的趋向。如果这种制度今后繼續固执地保持下去，无疑地，它最終会使党遭到蛻化的危险，而且，这种蛻化是在党

的两极上同时发生的，即，既在青年党员身上也在领导干部身上发生。至于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工厂和学生支部等等，危险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相当多的党员由于感觉不到自己是全党工作中的积极参加者，由于自己向党所提出的問題得不到应有的及时答复，就会开始在各种各样的小集团和派别組織的形式下为自己寻找党员独立活动的代用品（錯誤的代用品）。象“工人集团”这样的小集团之所以具有征兆的意义，我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說的。

摘譯自《新方針（三）》（1923年12月），載于  
《眞理报》1923年12月29日第295号。

列宁主义反对派<sup>①</sup> 在党內的成长，迫使最坏的官僚主义分子使用了在布尔什維克的实践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方法。由于再不能用命令阻止在党基层組織內討論政治問題，于是一部分官僚現在正轉向——恰好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建立暴徒組織，它們的任务就是用叫喊、吹口哨和熄灭灯光等办法来破坏关于党的問題的一切討論。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0頁。

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現在已經只剩下斯大林一人。当时的两个政治局委员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流亡时期都曾同列宁共事多年，現在却以莫須有的罪名服着十年徒刑。另外还有三个政治局委员，即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已經完全离开领导地位，但是由于采取了屈服的态度，目前担任着次要的职务。最后，还有本书的作者，目前在流亡中。列宁的寡妻克魯普斯卡娅，由于不能全力使自己完全适应热月，也遭到了軟禁。

目前的政治局委员，在布尔什維克史上都是居于次要地位

---

① 托派的自称。——編者注

的。如果有人在革命的头几年预言他们以后会高升到那样的地位，那他们首先会感到惊讶的，同时这种惊讶不会掺杂着虚伪的谦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目前的作法更加严格了，即政治局永远正确，反对政治局的人就不可能正确。但是不仅如此，由于斯大林不可能犯错误，因此政治局就不能反对斯大林，而斯大林也不能反对他自己。

在这整个时期，要求党内民主是所有反对派的口号。这种要求实现的希望越小，这些派别要求实现的决心就越大。上面提到的左翼反对派纲领，在一九二七年就要求在刑法中加入这样一条特别法律：“凡直接或间接迫害提出批评的工人，即以严重罪行惩处。”代替这条法律的是，刑法中加入了一条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法律。

.....

.....如果说一九三六年三月莫洛托夫已经能够向一个法国记者吹嘘说，执政党内部不再有派别斗争，那只是因为现在不同的意见已经由政治警察的自动干涉解决了。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死亡，再也没有什么力量会使它起死回生。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0--72页。

## 二、妄谈对待派别活动的办法

### 1. 攻击禁止反对派是非常时期 的临时不得已的坏做法

声称禁止反对党派的做法是党在非常时期所采取的“一种暂时的自卫手段”和“临时不得已的坏做法”，在局

勢好轉時應當取消。說禁止派別活動就是“惧怕批評”，用“派別活動的幻影恫吓人”。宣揚擴大“爭論俱樂部網”，“黨內少數在任何原則問題上的觀點，都應通過黨報等方式使全體黨員得知”。中央委員會必須“通過報紙以及特刊和小冊子，發表對黨至今隱瞞的全部文件”。

但不言而喻，——過去的經驗和健康的政治理智都向我們證明這一點——光是依靠禁止的辦法，不僅沒有足以使黨防止新的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小集團的絕對保障，而且根本就沒有稍為重大點的保障。基本保障是領導的正確性、對那些通過黨反映出來的發展中的一切要求予以及時注意、黨機構的靈活性，黨的機構不是麻痹而是發揮黨的主動性，它不惧怕批評，也不用派別活動的幻影恫吓人，因為恫吓多半是恐懼的產物！第十次代表大會作出的禁止派別活動的決議只有輔助的性質，可是，這個決議本身還不能提供解決一切及任何內部困難的鑰匙。如果認為，一個空頭決議——不問黨的發展進程、領導的錯誤、機構的保守主義、外部的影響，等等——就能使我們防止小集團的產生和派別的震盪，那就是過于無知的組織上的偶像崇拜。這種態度本身就已是深為官僚主義的了。

摘譯自《新方針（二）》（1923年12月），載于《真理報》1923年12月28日第294號。

不錯，派別組織是我們條件下的最大惡行，而小集團——哪怕是臨時性的——又會轉變成派別。但是，象經驗所證明的，為了使它們無法產生，光宣布它們是惡行是完全不夠的。為了切實取得這方面的成就，必須有一個眾所周知的政策，有一個正確的方針，而且每一次都要適應具體的環境。

同上。

党的輿論必然会在各种矛盾和意見分歧中形成起来。使这个过程仅仅局限于机构之内，然后把現成的成果即口号、命令等授給党，这就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削弱党。让全党都来参加決議的制訂——这就是助长暫時性的思想小集團，而这些小集團还有变成长期性的小集團，甚至变成派別組織的危险。到底怎么办？难道真的沒有出路了嗎？在党的“风平浪靜”状态和派別分裂之間难道就沒有党的路綫的余地了吗？不，这样的路綫是有的，而党内領導的全部任务在于：每一次，特别是在轉变关头上，都要根据当时具体的情况找出党的路綫来。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坦率地写道，**黨內的官僚主义制度是派別集團的根源之一**。这个真理目前未必需要证明。旧方針同“广泛的”民主相距很远，并且它不仅絲毫不能使党防止秘密派别的形成，而且不能使党防止本身就孕育着形成暫時性或长期性小集團的这种爭論的爆发（閉眼不瞧这一点是可笑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要求党的領導机构听取广大**黨員群众的呼声**，不要认为任何批評都是派別活動的表現，也不要以此把那些誠誠恳恳的和守紀律的黨員推上閉塞的和派別活動的道路。

摘譯自《新方針（二）》（1923年12月），載于《真理报》1923年12月28日第294号第4版。

然而不能把认为党內的意見分歧尤其是小集團活動是不同的阶级影响的斗争这种看法理解得过于简单和肤浅了。举例來說，对是否需要在一九二〇年用武力試探波兰的問題，我們是有过一时的意見分歧的。有些人主张实行比較大胆的政策，另一些人主张实行比較謹慎的政策。这里是不是有不同的阶级傾向呢？未必有人敢于作出这种武斷。这是对局势、力量和手段的估計上的意見分歧。但是，双方在估計問題上的基本标准是一致的。党对同一个任务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來解决。而意見分歧只出現在

哪一条途径更好、更短、更經濟的問題上。这类意見分歧可能根据問題的性质不同而涉及广大党员，但这决不是一定意味着这里有两种阶级倾向在进行斗争。毋庸置疑，这种現象今后在我們这里还会不止一次而是几十次地出現，因为我們面临的道路是艰巨的，不仅政治任务而且象社会主义建設的組織和經濟問題，都会造成意見分歧和暫时性的思想派別。用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各种微小的分歧进行政治檢驗，向来都是我党最必要的預防措施。但必須是具体的馬克思主义的檢驗，而不是作为官僚主义自卫武器的保守的死板公式。

摘譯自《新方針(二)》(1923年12月)，載于《真理报》  
1923年12月28日第294号第4版。

(一)必須象我們在列寧在世时所做的那样，在真正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准备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列寧写道：“每一个党员应当冷靜地和极其公正地研究：(1) 意見分歧的实质，(2) 斗爭的发展……这两个問題都需要研究，同时还一定要有能够从各方面进行检查的最精确的印刷文件。”<sup>①</sup> 中央委员会必須让每一个党员有可能研究目前党内分歧的实质和目前斗争的发展。为了这样做，它必須通过報紙以及特刊和小冊子，发表对党至今隐瞒的全部文件。

任何一个或一部分同志，都應該有机会在報紙上、會議上等等場合对党闡述自己的观点。

中央委员会的、地方組織的、个别党员的和部分党员的中心提綱（政綱），應該至少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在《真理报》（或者《真理报》增刊）和地方党报上发表。

爭論的进行應該是实事求是的和真正同志式的，不允許攻击

---

① 参看《列寧全集》第32卷第26—27頁。——編者注

个人和夸大事实。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全部准备工作的主要口号應該是统一——不是虚假的统一，而是俄国共产党的真正列宁主义的统一，整个共产国际的真正列宁主义的统一。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7页。

一般地說，党内少数在任何原則問題上的观点，都应通过党报等方式使全体党员得知。只有在有关問題是秘密的条件下，才允許有例外。不言而喻，在決議通过以后，就要按照布尔什維克铁的紀律予以执行。党的爭論俱乐部网必須扩大，必須使党的机关报刊能够被用来对党領導的錯誤进行真正的批評(采取爭論专頁，文选汇編等形式)。

同上，第78頁。

列宁和他的同事的注意中心是，經常地关心保护布尔什維克的队伍，使它不受当权者的那些恶习的影响。然而，在开头几年，党和国家机关的特別密切关系，以及有时实际上融合在一起，毫无疑问已經給党内制度的自由和弹性造成了損害。随着困难的增加，民主越来越少。最初，党曾祝愿和希望在苏維埃机构內保持政治斗争的自由。但是国内战争使这种打算作了很大的改变。反对党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禁止。这种显然同苏維埃民主精神矛盾的作用，布尔什維主义的领导人不是当作一种原則，而是当作一种暂时的自卫手段。

执政党的迅速成长，它的任务的新穎和广泛，不可避免地使党内发生了分歧。国内的各种反对暗流，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对唯一合法的政治組織施加压力，这样就加剧了派別斗争的尖銳性。国内战争結束的时候，这种斗争采取了这种尖銳的形式，以甚有动摇国家政权的危险。一九二一年三月，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叛乱，不少布尔什維克参加了这次叛乱，这时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有

必要禁止派別活動——這就是說，把國家實行的政治制度也運用到執政黨的內部生活中。這種禁止派別活動的做法也被當作一種非常措施，準備在局勢大大好轉的時候取消。與此同時，中央委員會極其謹慎地運用這種新辦法——這種辦法對於它本身的关系最大——以免因而扼殺了黨內生活。

可是，這種辦法原來只不過是對付困難局勢的一種必要的讓步，官僚却認為完全適合自己的胃口，於是他們便開始完全以行政上感到方便的觀點來處理黨內生活。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68—69頁。

讓蘇聯人民自由選舉“他們所要選的人”這個諾言，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公式，不如說是一句詩詞。蘇聯人民只有權利從中央和地方領導人在黨的旗幟下向他們提出的候選人中挑選“代表”。固然在蘇維埃時代的初期，布爾什維克黨實行的也是一種壟斷。但是，如果把這兩種現象混為一談，那就等於把表面現象當作現實。禁止反對黨派是在國內戰爭、封鎖、干涉和飢餓的條件下不得不採取的一種臨時措施。執政黨在那個時期代表真正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過著一種純潔的黨內生活。集團和派別的鬥爭在一定的程度上代替了政黨鬥爭。現在，在社會主義贏得了“最終的和不可變更的”勝利以後，組織派別反而要受到關進集中營或者槍斃的懲罰。禁止其他政黨本来是一種臨時不得已的壞做法，而現在已經確定為一項原則。甚至共產主義青年團也被取消了討論政治問題的權利，而且正是在新憲法公布的時候。不僅如此，男女公民年滿十八歲就享有選舉權，但是一九三六年以前所規定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年齡限制（二十三歲）現在却完全取消了。這樣，政治就被一勞永逸地宣布為不受監督的官僚的壟斷物。

同上，第194頁。

## 2. 妄談聯共黨內几种消除 派別活動的正確方法

認為在聯共(布)黨史上有以下几种正確的消除派別活動的方法：在十月革命前夜，“用革命的行動勝利”了派別活動和黨的分裂；在布列斯特時期，“暫時容忍黨內存在有組織的派別”，採取“爭論、解釋和靠政治經驗來檢驗”的辦法；在軍事建設問題上，靠“武器檢驗”來消除分歧；在工會問題爭論時期，主要由於黨“依靠自己極端重要的經濟決定和措施”勝利了已暴露出來的各種意見分歧和小集團。

**只要好好地細想一下我們黨的歷史，哪怕只是黨史上的革命時期，即當派別活動特別危險的時期，那就会清楚地看到，防止这种危险决不只是限于形式上对小集团的譴責和禁止。**

在世界歷史的最偉大的任務上，即一九一七年秋奪取政權的任務上，黨內產生了最嚴重的意見分歧。在事變的發展及其迅速的情況下，問題的尖銳性幾乎立即使意見分歧具有尖銳的派別活動的性質：反對奪取政權的人甚至事與願違地實際上同非黨人士結成了聯盟，在非黨的報刊上發表自己聲明，等等。黨的統一處於千鈞一發之際。如何避免了分裂的呢？只是由於事變的迅速發展和勝利的結局。如果事變拖延了幾個月，而尤其是，如果起義遭到了失敗，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黨在中央委員會多數的堅強領導下，以猛烈的進攻越過了反對派，奪得了政權，於是人數雖少但在黨的意義上富有學識的反對派也站到十月革命這方面來了。**派別活動和分裂的威脅，這次不是用形式上的法規，而是用革命**

的行动战胜的。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問題上產生了第二次規模巨大的意見分歧。** 主張革命戰爭的人結成了名副其實的派別，擁有自己的中央機關報，等等。我不知道，不久以前流傳的關於布哈林同志几乎要來逮捕列寧同志的政府的無稽之談有何根據。總之，這有些象拙劣的里德·梅恩式的作品<sup>①</sup> 或共產主義的……品克頓式的讀物<sup>②</sup>。應該認為，黨史研究所會把這些弄清楚的。但是，無疑地，左派共產主義派別的存在對黨的統一有極大的危險。在那個時期要把事情弄到分裂的地步是不必花費很大力氣的，也不需要領導方面的……聰敏英明：只要簡單地宣布左派共產主義派別已遭到禁止就行了。然而，黨採取了較為複雜的辦法：爭論、解釋和靠政治經驗來檢驗，而暫時容忍黨內存在有組織的派別這樣一種不正常的危險現象。

**在軍事建設問題上，我們黨內有相當頑強的小集團。** 按事情的實質說來，這個反對派是反對建立正規軍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產物的：集中的軍事機構，吸收專家，等等。有時鬥爭具有極其尖銳的性質。但是，這裡也和在十月革命時一樣，武器檢驗是有助於事的。政府軍事政策中某些不靈活的和夸大的地方有所減輕（不無反對派的影響），這對正規軍的集中的建設不僅無害，反而有利。反對派則逐漸消散了。反對派中很多非常積極的代表人物不僅參加了軍事工作，而且還在軍事工作中擔任非常負責的職務。

**在令人難忘的工會問題爭論時期中，小集團顯得很突出。** 現在，當我們有可能回顧這一個時代，並用後來的全部經驗來說明它時，一切就很清楚了，爭論的完全不是工會問題，甚至也不是工人民主問題：通過這些爭論表明黨患有重病，其根源在於戰時共產

---

① 里德，托馬斯·梅恩（1818—1883），英作家，寫過許多驚險小說。——編者注

② 指粗糙的偵探小說。——編者注

主义的經濟制度拖得过久。国家的整个經濟机体处在毫无出路的困境之中。在工会的作用和工人民主的表面爭論的掩盖下，轉弯抹角地寻找新的經濟道路。結果发现真正的出路在于废除余粮收集制和粮食垄断，在于使国营工业逐步摆脱总管理局制度的箝制。这些历史性決議为全体一致通过了，而它們完全压倒了工会問題的爭論，而且根据新經濟政策，工会的作用本身已完全不同了，所以几个月以后不得不根本修改关于工会的決議。

“工人反对派”这个小集团为时最久，某些方面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它歪曲地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矛盾、党的个别錯誤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主要客观困难。但是，这里的問題也决不是只限于一种形式上的禁止。在解决党内民主方面采取了形式上的步驟，但在清党方面却采取了实际的极为重要的步驟来接受“工人反对派”的批評和要求中正确的和健康的成分。而主要的，由于党依靠自己极端重要的經濟决定和措施在基本的重要方面战胜了已暴露出来的意見分歧和小集团，才使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形式上禁止派別組織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才有取得实际成效的希望。

摘譯自《新方針(二)》(1923年12月)，載于《真理报》1923年12月28日第294号第4版。

### 3. 攻击斯大林的办法是扼杀反对派， 进行人身攻击以至肉体消灭

污蔑斯大林采取下列方法来反对反对派：“取消党内民主”；剥夺反对派“在報紙上或在會議上的发言权”；“对于斯大林的孟什維主义严重錯誤的任何批評，都被說成是‘反党斗争’”；“誰不相信官方的話，誰就是反对派”。

誣称扼杀反对派，排挤他們，“把他們开除出党已經完全变成慣例”；任何公民如果“敢于大声讲出怀疑斯大林的絕對正确”，就会“失业”，“就会几乎当作恐怖阴谋的

同謀犯加以審訊和判罪”；“不是提出自己的觀點來同對手辯論，而是對他的對手進行人身攻擊，如果可能的話，在肉體上加以消滅”。

斯大林為自己所規定的當前任務是：分裂黨，清除反對派，使黨習慣於肉體消滅的方法。

摘自《俄國局勢真相》（1927年），  
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20頁。

黨內分歧被曲解了。對於那些被斥為“反對派”的布爾什維克的觀點，進行一連幾個月和幾年的惡意論戰。但是却不許這些布爾什維克在黨的報紙上闡述他們自己的觀點。昨天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崩得分子，猶太民族主義者，都在《真理報》上攻擊和譴責一些中央委員提交給中央委員會的文件。他們把這些文件斷章取義。但是文件本身却從來沒有發表過。黨的基層組織被迫投票“譴責”他們對之毫無所知的文件。

黨被迫根據官方的“說明”和注解來判斷我們的不同意見，而這些“說明”和注解往往既不真實又極無知，使人作嘔。列寧的話：“誰僅僅根據無稽之談而相信什麼，誰就是毫無希望的傻瓜”已由另外一句話代替：“誰不相信官方的話，誰就是反對派”。傾向反對派的產業工人為了他們的态度不得不付出失業的代價。普通黨員不能大聲說出自己的意見。黨的老幹部被剝奪了在報紙上或在會議上的發言權。

捍衛列寧觀點的布爾什維克被誣蔑為想要製造“兩個黨”。這個精心編造的指責，是為了使工人一致反對反對派，因為工人自然是熱情維護他們黨的統一的。對於斯大林的孟什維主義嚴重錯誤的任何批評（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英俄委員會等），都被說成是“反黨鬥爭”。情況就是這樣，儘管斯大林事先從來沒有向黨提出過任何問題，無論是中國革命政策，或者任何其他重要問題。關於反對派要製造“兩個黨”的指責，每天有一些人重複不休，這些人自己的

目的正是要把布尔什维克一列宁主义党员排挤出党，以便他们可以放手实行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

(六)几乎党的全部教育工作和全部基本政治文化事业現在都已成为整反对派的課程。强制的方法不仅几乎完全代替了說服的方法，而且补充以欺骗党的方法。党的教育成为仅仅是官方宣传，因此逃避这种教育成为一般的倾向。會議，党校和小组活动現在都供作整反对派之用，因此参加的人数大大下降。对于党机器目前的錯誤路綫，全党正在采取消极抵抗。

(七)近年来，不仅个人野心、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現象在党内日益发展，而且发源于异己和敌对阶级的浊流也流入党内——比如，排犹主义。党要保全自己就必须对这类污秽进行无情的斗争。

(八)虽然有这样一些事实，但是压制的措施却完全針對左派。由于反对派在其所属的支部会上发言，由于他們大声疾呼，由于他們企图宣讀列寧遺囑，因而把他們开除出党已經完全变成慣例。在政治認識水平上，更加重要的是在他們对党的事业的忠誠上，被开除者常常是高出于开除者的。这些同志虽然处于党外——因为对蒋介石、柏塞尔或他們自己的官僚“不信任”和“抱悲观主义”，因此有罪——，但他們繼續过党的生活。比起那些仍然是党员的野心家和市侩来，他們远为真誠地为党服务。

(九)由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临近，目前压制和威胁的冰雹大大地加紧了，为的是进一步威吓党。这就证明了这个事实：斯大林和李可夫联盟为了掩盖其政治錯誤，必然求助于极端手段。它在每一次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上把党置于既成事实之前。

(十)中央委員会的政治路綫（这是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同斯大林一致的原則制定的）是錯誤的。目前中央委員会的核心繼續在搖摆之中向右移动。取消党内民主是政治路綫根本錯誤这个事实的必然結果。既然这条路綫反映着小資产阶级成分的压力，反映着包围我們党的非无产阶级各阶层的影响，那么就必须

由上而下来强迫执行。

同上，第 72—74 頁。

同样致命的矛盾也表现在党的命运方面。在这里問題差不多可以这样加以表述：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旧統治阶级还拿着武器进行斗争，他們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积极支持，同时武装的富农对军队和国家的粮食供应工作进行着破坏活动——在这样的时候，为什么党内对于最严重的政策問題进行公开的和无所顾忌的爭論？而现在，干涉已經停止，剥削阶级已被推翻，工业化已經取得无可置疑的成就，絕大多数农民已經集体化，为什么反而不能容許对不可动摇的领导人进行最輕微的批評呢？为什么任何一个布尔什維克如果按照党章要求召开党代表大会，就会馬上被开除出党，而任何公民如果敢于大声讲出怀疑斯大林的絕對正确，就会几乎当作恐怖阴谋的同謀犯来进行审訊和判罪呢？这样可怕地、可恶地和难以容忍地加强鎮压和警察机关是什么緣故呢？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 年)，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77—78 頁。

左翼反对派在其斗争的最初十年当中，并沒有放弃下列綱領，即从思想上夺取党而不是通过夺取政权来反对党。当时它的口号是：改革，而不是革命。然而，就是在那个时候，官僚也已准备实行任何一种革命以保卫自己、反对民主改革。在一九二七年斗争达到特別激烈的阶段时，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就亲口对反对派說：“那些干部只有通过国内战争才能清除掉！”由于欧洲无产阶级遭到了一系列的失敗，斯大林这句話由所威胁的东西变成了历史事实。改革的道路变成了革命的道路。

党和苏維埃組織之所以不断地进行清洗，就是为了防止群众的不满情緒变成一种一致的政治表現。但是，压制并不能扑灭思想，而只不过是把思想赶到地下。广泛的共产党人集团以及非党公民都保持着两种思想体系，一种是公开的，另一种是秘密的。暗探和告密活动到处都在腐蝕着社会关系。官僚当然总是把自己的

敌人当作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伪造法律证据的帮助下——这种做法已經變成正常的情况——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把任何罪名强加在自己的敌人身上。他們还可以用枪决的威胁从脆弱的人那里弄到他們自己所授意的供詞，然后再把这种供詞作为控告比較坚强的人的依据。

同上，第 204—205 頁。

专政之剑本来是用来打倒那些要恢复資产阶级特权的人們的，現在却对准那些起来反抗官僚特权的人們。受到打击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职能上的这种基本变化相适应的是，政治警察以前都是从特別忠誠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布尔什維克当中挑选出来的，現在則由官僚当中最墮落的一部分人組成了。

热月派在迫害革命分子的时候，特別仇恨那些提醒他們記住过去和防范未来的人們。监狱、西伯利亚和中亚細亚最遥远的角落，以及迅速增加的集中营，都关满了布尔什維克党的精华——最刚强最忠实的人們。即使在西伯利亚单独监禁的牢獄中，反对派分子还是要受到搜查、禁止通訊和饥饿等迫害。在流放中，妻子被迫同自己的丈夫分离，这种做法的唯一目的是瓦解他們的反抗并使他們悔过。但是，就是悔了过的人也并没有得到安全。一有嫌疑或者有告密者暗中告发，这种人就会受到加倍的惩罚。即使亲属帮助流放的人，也被认为是一种罪行。互相帮助是被当作一种阴谋来惩罚的。

在这种情况下，自卫的唯一手段是絕食。国家政治保卫局則以强迫吃饭或者听任饿死作为对策。这些年来，有好几百名俄国的和外国的反对派分子已經被枪杀，或者在絕食中死去，或者自杀而死。在最近十二年当中，当局已經向全世界宣布了好多次：反对派已經被彻底根除。但是，在一九三五年最后一个月和一九三六年

上半年的“清洗”中，又有几十万党员被开除，其中有好几万“托洛茨基分子”。最积极的分子都立刻被逮捕，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至于其他人，斯大林则通过《真理报》公开劝告地方机关不要给他们工作。在一个国家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就意味着通过慢性饥饿而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旧原则已经代之以不服从者不得食这样的新原则。**自从一九二三年波拿巴主义时代开始以来，究竟有多少布尔什维克被开除、逮捕、流放和扑灭，要到我们检查斯大林政治警察的档案时才会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地下，也要到官僚开始破产的时候才会知道。

同上，第 206—207 頁。

**政治局中的多数坚决要扼杀反对派——至少，要闷死它，排挤它，开除它，逮捕它。**这就是斯大林反駁論点的方法。并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同意这种方針。但是逐渐地，斯大林把他们拖入了斗争。他削弱了他们精神上的保留，消磨他们的成見，使后一步成为前一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是他的擅长。在这方面，他手段之巧妙是无可爭辯的。持有不同意見的政治局委员终于甚至不再溫和地抗議斯大林的更粗魯的“活动家”的暴行。逐渐，他們被迫放弃不表示态度的沉默，而采取贊同一个又一个的暴行。

.....

.....他采用了自从他青年时期起就成为他一部分的那种做法，那就是：进行反駁时不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同对手辯論，而是对他的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如果可能的話，在肉体上消灭他。在論点和批評面前，智力上的无能引起了憤怒，而憤怒又驅使他匆忙采取措施来消灭反对派。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 年)，三联书店  
1963 年版下冊第 517—518 頁。

## (十五) 对列宁和斯大林的攻击

### 一、对列宁的攻击

攻击列宁是“无謂爭吵的能手”，“惯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尽搞“毫无意义的蠱惑勾当”，进行“狭隘的小集团的阴谋活动”，从事“无原則的分裂”活动，“一面高唱自下而上的統一，一面推行自上而下的分裂”，“用小集团和派别的定义来解释阶级斗争的概念”。胡說列宁主义的大厦是“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的，它是同“工人的党组织和政治组织势不两立的”。誣指列宁在国内战争中“曾經不止一次动摇过，并且好几次犯了严重錯誤”。

无謂爭吵的能手列宁，这个惯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他所經常掀起的恶劣的无謂爭吵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蠱惑勾当。任何一个智力未受損害的欧洲社会主义者都不会相信，会由于列宁在克拉柯夫賡造出来的那些意見分歧而造成分裂。

列宁的“成就”本身，无论这是怎样一种障碍，都不会引起我的更多的忧虑。現在不是一九〇三年，也不是一九〇八年。列宁用从考茨基和蔡特金那里挪扯到的“来历不明的金錢”办了一个机关报，給它挂了一块通俗报纸的招牌，拿出了一面“統一”和“非官方”的旗帜，招徠了許多工人讀者，他們一見出版了工人日报，自然就

认为是自己的一个巨大的收获。然后，当报纸站住了脚，列宁就把它变成小集团阴谋活动和无原则分裂行为的杠杆。但是，工人对统一的自发倾向是势不可挡的，于是列宁不得不经常同读者玩捉迷藏的游戏，一面高唱自下而上的统一，一面推行自上而下的分裂，用小集团的和派别的定义来解释阶级斗争的概念。总而言之，现在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都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它本身带有腐蝕自己的毒素。无庸怀疑，只要另一方措置得当，正是在统一还是分裂这个问题上，最近的将来列宁分子中间就会开始激烈的分化。

但是我重說一遍：这要以另一方措置得当为条件。如果列宁主义本身并不使人担忧，那么应当承认，我丝毫不相信我們的取消派朋友不会帮助列宁重整旗鼓，卷土再来。

現在可以有两种政策：从思想上和組織上摧毁各种过时的派別壁障，而这就意味着摧毁列宁主义的基础本身，因为列宁主义同工人的党组织和政治組織是势不两立的，然而却能在派別門閥的粪便上开出燦烂的花朵。或者相反，通过細心培植策略上的意見分歧，用派別的方式糾集一班反列宁主义者（孟什維克或取消派）。一部分孟什維克分子——最保守的——正是倾向于第二种政策。依我看来，主要的忧虑也就在这里。

摘自《給尼·謝·齊赫澤的信》（1913年4月1日），  
載于《列寧主義還是托洛茨基主義》三聯書店1964  
年版第290—291頁。

但是，結果杂志却被迁往瑞士出版，而且选定拉狄克为秘书，他在这一年內完成了从粉紅色国际主义向列宁的极端主义的演化。在这种情况下，罗兰·霍斯特和潘涅庫克这两个編輯就形同虛設，实际上却成了列宁的編輯。但那时杂志就只会是《共产党人》<sup>①</sup>的德文版。因此我們得出了一个結論：同这种杂志合作只不过是替它的狹隘的小集团性质打掩护，成为誘騙个别的国际主义

者的釣餌。

摘自《給莫·索·烏里茨基的信》  
(1913年),同上,第293—294頁。

可是,應該說,列寧的支持不是無條件的。列寧曾經不止一次動搖過,並且好幾次有嚴重的錯誤。我比他有利的條件在於我不間斷地到各個戰線旅行,同非常多的人接觸,從當地的農民、戰爭俘虜、逃兵,一直到前線最高級的軍隊和黨的領導人。這種各種各樣的大量印象是有不可估量的價值的。列寧從沒有離開莫斯科,而所有的線又都集中在他的手裡。他必須根據多半來自黨的高級機構的情報,對軍事問題做出決定,而軍事問題對我們所有人都是新問題。沒有人比列寧更能了解來自下面的個別呼聲。但是這種聲音只是在例外的情況下他才聽得到。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下冊第363頁。

## 二、對斯大林的攻擊

### 1. 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

誣蔑斯大林是具有“詭計多端、殘酷無情”等種族特點的亞細亞人,是殘忍已“發展到野蠻程度”的“成吉思汗”。斯大林已設法“使一個專制君王的一切特性在他身上得到發展”。他充滿了“權力欲、野心和嫉妒”。“他將他的一個創傷、憎恨、怨憤、嫉妒和愛慕從一個省的狹小範圍帶到全國廣大範圍內”。他最善于記恨。“對人的、

① 《共產黨人》——布爾什維克的雜誌,1915年在瑞士出版,由列寧主編。——編者注

肉体上的殘忍即通常所謂的虐待狂是斯大林的特点”。他駁斥对手的观点的方法是“人身攻击”和“肉体消灭”，并且“不惜在反犹主义的混水中摸魚”。

攻击斯大林“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观念、机会主义和妥协”。“新统治阶层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也就是他的观点”。他性格倔強，眼界狹小，不注意国际問題，对群众、对个人缺乏信任，經常走抵抗力最小的道路。他“在历史上一切伟大的轉折点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場”，“有时比孟什維克更右”。他是一个“在政治上采取中庸之道而又毫不犹豫地采取最极端的措施的政客”。“在战略上，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在战术上他是个‘革命家’。他是一种玩弄炸弹的机会主义者”，是“中派分子和折衷主义者”，是“出色的阴谋家”。

宣传斯大林是“从后門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在国内战争結束时还是个“最不出名的中央委员”，政治上“沒沒无聞”，只是凭借了对党的机构的控制才爬上去的。他的天性渴望一种集中的政治机器，他“割斷了机构和思想之間的臍帶，使机构成为独立存在之物”，成为他个人的工具。

斯大林为自己所規定的当前任务是：分裂党，清除反对派，使党习惯于肉体消灭的方法。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20 頁。

如果以为在群众中沒沒无聞的斯大林，是突然夹着完整的战略計劃出現的，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絕不是这样。在斯大林找到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已經找到了他。斯大林給官僚带来了一

切必要的保证：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威望，一种倔强的性格，狭小的眼界，以及同政治机器——他的努力的唯一来源——的密切联系。胜利落到他头上，最初是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这是新统治集团欢迎他的友好表示，这个集体企图摆脱贫旧的原则，摆脱群众的监督，同时在内部事务方面需要一个可靠的仲裁者。在群众面前和革命事态发展过程中作为二等人物的斯大林，显示了自己是热月式官僚的无可怀疑的领袖，是其中的第一号人物。

新统治阶层很快就流露出自己的想法、感情以及更为重要的私心。当前官僚当中较老一代的绝大多数人，在十月革命时期都是站在营垒的另一边的。（就以苏联的驻外大使为例吧：特罗扬諾夫斯基、馬伊斯基、波丹金、苏里茲、金楚克等就是这样。）要不然，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是站在斗争之外。在现在的官僚当中，那些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站在布尔什维克阵营里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至于年轻的官僚，都是年老一辈的官僚挑选和教育出来的，他们往往就是老官僚的子弟。这些人并不能完成十月革命，但是他们完全适合于利用十月革命。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66—67 頁。

从此以后，斯大林——当时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同他一道工作——便把全部努力放在促使党机器摆脱贫普通党员的监督方面。在这种“稳定”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中，事实证明了斯大林是他的同事当中最坚决最可靠的一个。他用不着分心去注意国际问题；他从来没有关心过那方面的問題。新统治阶层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也就是他自己的观点。他深信，建立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其本质來說是民族性的和行政性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是一个必要的坏东西，只要能为外交政策的目的服务，就应当加以利用。在他的眼睛里，他自己的党之所以还有价值，也不过是因为它驯服地支持国

**家机器。**

同上，第 69—70 頁。

我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找不出和克里姆林宮在斯大林領導下組織起來的規模庞大的謊言制造工厂相似、即使是略微相似的任何事物。而这座工厂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斯大林制造一部新传記。……有些来源是斯大林本人捏造的。

摘自《斯大林評傳》(1930 年)，三聯書店  
1963 年版上冊第 7 頁。

在这方面，斯大林是一个完全例外的現象。他既不是思想家，又不是著作家，也不是演說家。当举行凱旋式的队伍通过紅場时，群众还不能在人群中认出他的形象。而这时他已經取得权力。斯大林并不是依靠个人才能、而是依靠一个与人无关的机构取得权力的。而且并不是他創造了机构，而是机构制造了他。机构以及它拥有的力量和权威是布尔什維克党长期英勇斗争的产物。党本身又是思想的产物。这个机构本来是思想的体现，后来机构本身却成了目的。斯大林割断了机构和思想之間的臍帶，使机构成为独立存在之物。从那个时期开始，他就是这个机构的首脑。列寧通过經常联系群众的办法創造了这个机构——如果不是直接地、通过口語保持联系，就是以他的信徒作为媒介、通过印好的文字保持联系。斯大林并沒有創造、而是占有了这个机构。要做到这一点，必須有非常特殊的才能。然而这不是历史創造者、思想家、著作家或演說家的才能。机构是从思想中产生的。斯大林的才能首先就是蔑視思想。

同上，第 8 頁。

如果我沒有弄錯，第一个把斯大林叫做“亞細亞人”的是已經去世的列昂尼德·克拉辛。克拉辛是老革命家，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苏联外交家，而首先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当克拉辛把斯大林

叫做“亞細亞人”时，他想到的不是值得爭論的种族属性，而是被认为亚洲政治家共同具有的慷慨果敢、精明干练、诡计多端和残酷无情等特点的揉合。布哈林后来简化了这个名称，把斯大林叫做“成吉思汗”，显然是为了使人注意他已经发展到野蛮程度的残忍。斯大林本人和一个日本記者談話时，一度把自己称为“亞細亞人”。

同上，第9頁。

参加布尔什維克党对柯巴<sup>①</sup>來說是比较困难的，然而脱离这个党对他也同样比較困难，因为他既沒有理論的想象力，沒有直觉的历史洞察力，也沒有先見之明，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也不是一个輕率冒失的人。他的智力一直远逊于他的意志力。碰到錯綜复杂的情况需要做某些新的考虑的时候，柯巴宁愿等待时机，保持安靜，或者退却。凡是有必要在思想和政治机构之間作出抉择的时候，他总是倾向于选择机构。必須先建立一套执行綱領的机构，然后柯巴才可能对这种綱領表示任何尊重。他的本性是建立在对群众、对个人都缺乏信任的基础上的。他的經驗主义經常迫使他选择抵抗力最小的道路。这就說明，这个目光短浅的革命家为什么在历史上一切伟大的轉折点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場，这种立場使他和孟什維克极为接近，有时比孟什維克更右。与此同时，在解决他已经熟悉的問題时，他总是倾向于贊成采取最坚决的行动。照他看来，在一切情况下，組織得很好的暴力是达到目标的最迅速的捷徑。这里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作一种类比。俄国的恐怖主义者本性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然而他們极为坚决大胆。馬克思主义者习惯把他們叫做“玩弄炸弹的自由主义者”。斯大林过去一直是、現在也仍然是一个在政治上采取中庸之道而又毫不犹豫地采取最极端的措施的政客。在战略上，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在战

---

① 斯大林的化名。——編者注

术上，他是一个“革命家”。他是一种玩弄炸弹的机会主义者。

同上，第 72—73 頁。

关于斯大林究竟是在會議上当选的还是在以后由中央委員會补选为中央委員的問題，看来可能是不重要的。事实上，情况并不如此。斯大林想要成为中央委員。列宁认为有必要把他选进中央委員會。可以作为候选人的人选极为有限，以致二流人物也成为中央委員了。可是柯巴并未当选。为什么？列宁远不是他的黨內的独裁者。此外，一个革命政党不会容忍对自己的任何独裁！列宁在与代表們进行初步商談以后，显然认为不提出柯巴作为候选人是比較明智的，“在一九一二年列宁把斯大林带进中央委員會时”，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写道，“人們对此表示憤慨。沒有人公开反对此事。但是他們在談話中表示了憤慨。”这位前外交家提供的情況一向是不值得相信的，然而它令人感到兴趣，因为它反映了官僚的回忆和閑談。列宁无疑遭到严重的反对。只有一件事是他能够做的：等會議結束，然后向人数不多的領導核心呼吁，这个核心不是依靠列宁的推荐，就是同意他对候选人的估計。这样，斯大林就第一次从后門进入中央委員會。

同上，第 183—184 頁。

有一次，在一場爭論的过程中，據說斯大林暴露出自己是一个反猶太分子，他用格魯吉亞的粗暴話罵猶太人。

同上，第 230 頁。

內戰結束的时候，斯大林在政治上还是沒沒无聞的。黨內的应声虫們当然知道他，但是并不把他当作重要的領導人之一看待。尽管他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政治局的成員，然而对于一般黨員群众來說，他却是中央委員會中最不出名的委員之一。國內一般很少听到关于他的話。非蘇維埃世界甚至沒有感到有这个人存在。

同上，下冊第 435 頁。

要理解斯大林以及他后来获得成功的原因，必須首先弄清楚他的个性的主要动因：**权力欲、野心、嫉妒、——那种活跃的、永不熄灭的对于比他更有才能、更有权势、地位更高的人的嫉妒。**

同上，第 437 頁。

但是斯大林所消化了的只是列宁主义有关党的中央集权机器的概念。他一旦抓住了这个概念，就再也看不見它的理論考慮上的根源，它的綱領上的基础也变得根本不重要了，而由于他自己的过去，他自己的社会出身、培养和教育，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小資产阶级的观念、机会主义和妥协。在一九一七年，只是由于列宁不容許他那样做，他才沒有实现同孟什維克的合流；在中国革命期間，他打的是布尔什維克的旗号，实现的却完全是孟什維克的理想，用布尔什維克的手段，亦即他认为是布尔什維主义的实质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器，实施着孟什維克的綱領。在西班牙革命期間，他用更高明得多的手法，以絕頂的效率推行着同样的政策。

同上，第 459 頁。

对于斯大林，原則从来不起任何作用——而在民族問題上也許比在任何其他問題上更是如此。在他看来，**眼前的行政工作总是比一切历史法則要重大得多**。在一九〇五年的时候，他只有在党委允許之下才会注意到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在反动的年代里，他之所以保卫地下运动，只是由于**他的天性渴望一种集中的政治机器**。在二月革命以后，那种机器同不合法斗争一道被打碎了的时候，斯大林又看不出孟什維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之間的区别，并且准备同策烈铁里的党派联合起来。最后，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夺取了政权以后，一切任务，一切問題，一切前途都被置于国家这个工具中的工具的需要之下了。

同上，第 466 頁。

**政治局中的多数坚决要扼杀反对派——至少，要悶死它，排挤**

它，开除它，逮捕它。这就是斯大林反駁論点的方法。并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員都同意这种方針。但是逐漸地，斯大林把他們拖入了斗争。他削弱了他們精神上的保留，消磨他們的成見，使后一步成为前一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是他的擅长。在这方面，他手段之巧妙是无可爭辯的。持有不同意見的政治局委員終於甚至不再溫和地抗議斯大林的更粗魯的“活動家”的暴行。逐漸，他們被迫放弃不表示态度的沉默，而采取贊同一个又一个的暴行。

.....

.....他采用了自从他青年时期起就成为他一部分的那种做法，那就是：在进行反駁时不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同对手辯論，而是对他的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如果可能的話，在肉体上消灭他。在論点和批評面前，智力上的无能引起了憤怒，而憤怒又驅使他匆忙采取措施来消灭反对派。

同上，第 517—518 頁。

斯大林进行反駁，也不只是采用这几种办法。他和他的仆从甚至不惜在反犹主义的混水中摸魚。我特別記得《工人报》刊登的一张以“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为題的諷刺画。在党报中有許多这种具有反犹性质的諷刺画和打油詩。对这些詩画博得了奸险的窃笑。斯大林对这种越来越猖狂的反犹主义的态度是友好的中立。但是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不得不发表一个声明說：“我們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斗争，并不是因为他們是犹太人，而因为他們是反对派”，等等。对于任何从政治上考虑問題的人來說，事情十分清楚，他的故意含混的声明只是針對反犹主义的“过火行为”而发的，同时在所有的苏联报纸上传播这个含蓄的提示：“不要忘記，反对派的领袖是犹太人。”这种說法使反犹分子可以为所欲为。

同上，第 518—519 頁。

**斯大林，这个出色的阴谋家、中派分子和折衷主义者，这个零打碎敲的能手，为了他自己的利益逐步地利用了和无耻地滥用了〔对中央委员会的〕信任。**

同上，第 521 頁。

**毫无疑问，对人的、肉体上的残忍，即通常所謂的虐待狂是斯大林的特点。**当斯大林被监禁在巴庫监狱里的时候，和他同住一間囚室的一个人曾經梦想革命。当时名叫柯巴的斯大林出其不意地問他：“你渴望血嗎？”他拿出藏在靴子里的一把刀子，高高地提起一只褲脚，在腿上扎了一个深而又长的切口。“这是血，給你。”在他当上苏維埃的要人以后，他在他乡下的家里，以割断羊的喉嚨或将煤油倒在蟻冢上放火去烧来取乐。这些独立的旁观者說出的关于他的故事是很多的。世界上具有这些傾向的人是很少的。这些恶劣的自然本能发展到这种可怕的程度，必然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

**他将他的一切創伤、憎恨、怨憤、嫉妒和爱慕从一个省的狭小范围带到全国广大范围内。他任何事情都沒有遺忘。他的記憶力是最善于記恨的。他制訂了他自己进行报复的五年計劃，甚至十年計劃。**

同上，第 537—538 頁。

**斯大林只是在官僚机构在它自己的总书记的領導下完全消灭了列宁的全部工作人員后，才上升到天才的地位的。**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論題上都沒有发表过片言只字的人，在他年龄远远超过四十以后，自动地升到他的官僚机构的頂峰，——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天才。这是完全用不着证明的。

据尼古拉也夫斯基說，布哈林把斯大林說成是“一点一滴实现阴谋的天才”(*apportioner of genius*)。这是一个确切的說法，只是他并沒有“天才”。这是我第一次从加米涅夫那儿听来的。他指

的是斯大林一点一滴地、在一个分期計劃的基础上實現他的阴谋的才能。要使阴谋的实现成为可能，就需要一个强大的集中的政治机器。一点一滴实现阴谋的工作包括逐渐地顺着迂迴的道路钻进机器内部，然后控制这个国家的輿論。如果加速这个过程，一下子将这一变化全部摆在人們面前，就会引起惊惧、憤怒和抵抗。

在基督的十二个門徒中，只有犹大是一个叛徒。可是，倘若他大权在握，他会将其他十一个門徒以及所有的次要門徒（路可說，耶穌有七十个次要門徒）都說成是叛徒。

同上，第 539—540 頁。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斯大林已經設法使一个专制君王的一切特性在他身上得到发展。

同上，第 540 頁。

## 2. 攻击所謂斯大林主义

1. 攻击斯大林主义是中派主义、机会主义，其“实质”是“对无产阶级核心进行压制，同各国妥协分子友好，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这个官僚中派“经常搖摆于两条阶级路线之間，有步骤地游离无产阶级路线而走上小资产阶级路线”，它的“总的路线一直是在向右移动”的。它的“基本教条”是一国社会主义論。說这种机会主义有着深刻的客观根源，是官僚、冒牌工人、行政官员、工业经理、新私人资本家、享有特权的城乡知識分子、富农等等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产物。“‘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势力就是资本主义势力”，斯大林政制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个阶段”。

組織制度不是独立存在的。党的整个政治路綫表現在党的制度上。近几年来，这个政治路綫已經离开正軌——它的阶级核心和运动趋势已經从左轉向右，从无产阶级轉向小资产阶级，从工人轉向专家，从普通党员轉向干部，从雇农和貧农轉向富农，从上海工人轉向蒋介石，从中国农民轉向资产阶级的將軍，从英国无产阶级轉向柏塞尔、希克斯和总委员会<sup>①</sup>——这是举不胜举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就在这里。

摘自《俄国局势真相》(1927年9月)，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頁。

斯大林派似乎打击了左面(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也打击了右面(在北高加索)。事实上，这个“中間”派系的整个政策本身是在两条鞭子的抽打下前进的——一条来自右面，一条来自左面。这个官僚主义中間派系完全缺乏阶级基础，經常搖擺于两条阶级路綫之間，有步驟地游离无产阶级路綫而走上小资产阶级路綫。它不是直綫式地游离出去的，而是急驟地搖擺着游离出去的。已往那些搖擺情形，我們已經看到太多了。特別急驟而令人难忘的搖擺是：在富农的压力下(右面来的一鞭子)扩大选举权，紧跟着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左面来的一鞭子)取消扩大选举权的指令。在工人立法、工資政策、稅收政策、对于私人資本家的政策等等方面，这一类的搖擺事例，我們已經看够了。但是总的路綫一直是在向右移动。

同上，第16—17頁。

通过斯大林机构，通过斯大林主义政权而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的那些力量是：官僚、冒牌工人、行政官员、工业經理、新私人資本家、享有特权的城乡知識分子——所有这些社会成分現在都指着富农向工人說：“記住，小伙子！这回可不是一九一

① 总委员会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柏塞尔、希克斯是英国工运領袖，工党分子。——編者注

八年”。

同上，第 17 頁。

**斯大林政策的全部实质可以用这几句话包括：对无产阶级核心进行压制，同各国妥协分子友好，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

同上，第 21 頁。

列宁在他的《左派幼稚病》中，揭发了真正“极左派”的錯誤，同时写道，工人运动中布尔什維主义的主要敌人过去和現在都是机会主义。“現在它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sup>①</sup>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于上述的問題，列宁又补充道：“和这个問題相較，糾正共产主义左傾‘錯誤’是一个容易的問題。”<sup>②</sup> 当列宁說“左派”这个詞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极左派；可是斯大林，当他說和极左主义斗争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革命的列宁主义者。

和作为主要敌人的右傾机会主义运动坚决斗争，同时改正“左”傾錯誤——这是列宁的口号。我們——反对派，提出这同一个口号。

归根結蒂，“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勢力就是資本主义勢力。在战后危机的最初几年里（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資本主义迅速地掉进深渊，这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也随之在削弱并掉下去。近几年来資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带来了社会民主主义暫时的加强。意大利工人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失敗，德国无产阶级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的失敗，英国一九二六年大罢工的失敗，和中国无产阶级一九二七年的失敗，不管原因是什么，它們本身已經引起了无产阶级上层分子中間的革命浪潮的低落。它們在一定时期內加强了社会民主主义，而削弱了共产党。在共产党內，它們使右

① 《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13 頁。——編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203 頁有关字句如下：“另一个比較容易的任务，就是糾正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錯誤。”——編者注

派暂时居于統治地位，而排斥了左派。工人貴族的作用、工运官僚及其小資产阶级同事的作用，在这样一个时期变得特別大了，也特別反动了。

这些过程必不可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苏联共产党。行政“中央”已經集中向左开“火”，并且已經用完全机械的方法造成了一种新的内部力量对比，这对于左派列宁主义者是更加不利的。事实上已經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沒有党的选举，只有机器的选举。

这些就是在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和苏維埃国家的政策上，列宁派影响削弱的总原因。結果那些在十月革命后很長時間內仍然呆在敌人的队伍里，但是最后好象經過一段預备期似的被吸收到共产国际中来的半社会民主主义分子（馬尔丁諾夫，施米拉里，腊非也斯，D·彼得罗夫斯基，佩帕尔等人），越来越經常和越来越高声地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言。在这些人里还必須加进象海因茲·諾伊曼及其同类这样一些純粹冒险家的名字。但是在群众里面，新的左倾运动分子，新的革命起义的分子已經在聚集之中。反对派正在理論上和政治上为那个新日子从事准备。

同上，第 96—97 頁。

关于中央委員会的多数派在国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面所犯的严重錯誤，我們已經坦白地說明了我們的意見。我們已經指明中央委員会这些錯誤怎样削弱了我們的党，这个革命的根本工具。我們已經指明，虽然如此，但是我們党能够从內部改正它的政策。但是为了改正这个政策，必須清楚地和坦白地說明党領導上所犯錯誤的性质。

所犯的錯誤是机会主义的錯誤。根据列宁的經典式定义，机会主义在其发展了的形式中，是由工人阶级领袖和資产阶级組成的集团，它反对工人阶级的多数。在苏联現在的条件下，机会主义

在其已臻于完全的形式中，是工人阶级首领们要同正在发展的新资产阶级（富农和耐普曼）妥协，同世界资本主义妥协，而牺牲工人和贫农广大群众的利益的一种愿望。

同上，第106页。

在目前条件下，俄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有着深刻客观根源：（1）国际资产阶级的包围和资本主义的暂时的局部稳定，造成一种相信这是全面“稳定”的倾向。（2）新经济政策是一条绝对必要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它部分地复兴了资本主义，也复活了许多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3）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成分不能不渗入苏维埃和党。（4）党在政治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对革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这个事实也进一步造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危险。在列宁领导下的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曾经直接地和坦率地指出，我们党内已经存在着整批整批的人们（来自富裕农民的人，高级职员，知识分子），他们本来会加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如果这些党不是非法的话。（5）党所掌握的国家机关反过来使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流入党内，用机会主义影响党。（6）虽然专家、高级职员和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建设工作是必要的，但是从他们那里发出一种非无产阶级的影响，不断地侵入我们的各种机构——国家的、经济的和党的机构。

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列宁主义反对派对斯大林集团的明显的日益危险的背离倾向坚持敲起警钟。要是认为党的伟大的过去和它的老布尔什维克队伍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时间都是反对机会主义蜕化的保证，这是一种有罪的大意想法。这种想法是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这不是列宁所教导的思想。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道：“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质；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个

人品质，在政治上完全是不关紧要的东西。”<sup>①</sup>

同上，第 108—109 頁。

**恢复时期我国工业异常迅速地增长是产生机会主义錯觉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委员会在党和工人阶级里面系統地鼓励这种錯觉。和内战时期相較，工人的条件迅速地开始有所改善，这种情形使工人广大群众产生了迅速地和沒有痛苦地克服新經濟政策的矛盾的希望。上述的情形阻碍了党及时看清机会主义傾向的危险。**

同上，第 110 頁。

列宁一再重申：如果沒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资产阶级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并沒有想錯：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个阶段。

摘自《斯大林評传》(1940 年)，三联书店  
1963 年版下冊第 558 頁。

可是当苏維埃社会冷靜下来的上层分子反对十月革命的官僚的反动活动开始的时候，就立即向不断革命論开火了，这个理論比别的理論更加完全地反映第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时也公开揭露这次革命之未完的、局限的和部分的性质。于是，在排斥不断革命論的过程中产生了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論——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教条。

同上，第 565 頁。

2. 声称“斯大林主义是社会还无法摆脱国家的拘束衣的这种社会状态的产物”。斯大林主义并不来自布尔什維主义，“从布尔什維主义或馬克思主义之中推論出斯大林主义”，这等于“从革命中推論出反革命”。污蔑斯

<sup>①</sup> 参看《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253 頁。——編者注

大林主义是对馬克思列寧的最极端的修正主义，“在对馬克思的修正上伯恩施坦甚至沒敢走到斯大林的一半那么远”。斯大林官僚“根本沒有任何理論体系”，“它的‘意识形态’浸透了警察的主观主义，它的实践則是赤裸裸的暴力的經驗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在肉体上也是勢不两立的”。

攻击“斯大林政权凌駕于政治上分裂的社会之上，依靠警察和軍官集團，并且不受任何監督”。斯大林主义是凱撒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变种”，同法西斯主义“有很多特点是十分酷似的”。

凱撒主义或者它的資产阶级形式波拿巴主义，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进入舞台的：两个阵营的尖銳斗争把国家权力——姑且这么說——抬高到民族之上，而且表面上保证国家权力完全独立于阶级之外——实际上只不过保证这种权力拥有維护特权者所必需的自由。斯大林政权凌駕于政治上分裂的社会之上，依靠警察和軍官集團，并且不受任何監督，这样一种政权显然是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变种——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見过的新型的波拿巴主义。

凱撒主义是在由于內部斗争而动摇了的奴隶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波拿巴主义是資本主义制度在危急时期的政治武器之一。斯大林主义則是同一制度的一种变种，不过是在工人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国家已經被有組織的武装的苏維埃貴族和非武装的劳苦群众之間的对抗弄得四分五裂。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波拿巴主义同普遍的甚至秘密的投票制度相处得不錯。波拿巴主义的民主仪式是公民投票。因而常常就会有这样一个問題向公民們提出：对領袖是拥护呢，还是反对呢？

于是选民就感觉到枪口对着自己的两个肩膀之間的部位。自从拿破仑第三——現在看来，他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外行——那个时代以来，这种技术已經有了特殊发展。在公民投票的基础上建立波拿巴主义的苏联新宪法，就是这种制度的真正頂峰。

归根到底，苏維埃波拿巴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世界革命的推迟。但是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同一原因却造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样，我們就得出了一个乍看起来出乎意料而实际上却是不可避免的結論：苏維埃民主虽然是被全能的官僚所摧毁，資产阶级民主虽然是被法西斯主义所消灭，两者却出于同一原因，即世界无产阶级解决历史为它提出的問題太慢了。**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尽管社会基础很不一样，却是两种对称的現象。两者有很多特点是十分酷似的。**如果欧洲的革命运动取得胜利，那就会不仅使法西斯主义而且使苏維埃波拿巴主义立即动摇。斯大林主义官僚背弃国际革命的行为，从他們自己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他們只不过是按照自我保护的要求行事而已。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03—204頁。

历史不是由即使是“最优秀的”少数人創造的；不仅如此，这些“优秀分子”还可能在“异己的”即資产阶级的文化精神中蛻化。不仅苏維埃国家可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布尔什維克党也可能失去其布尔什維主义。

一九二三年最終形成的左翼反对派是以对这一危险的清楚认识为出发点的。它逐日記錄蛻化的征候，力求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意志来对抗已經到来的“热月”。然而結果发现，靠这一主观因素还是不够的。那些按照列宁的說法决定斗争結局的“广大群众”因内部貧困和过久地等待世界革命而疲憊不堪。群众灰心失望。官僚占了上风。他們制服了无产阶级先锋队，践踏了馬克思

主义，出卖了布尔什維克党。斯大林主义得胜了。布尔什維主义以左翼反对派为代表同苏联官僚及其共产国际决裂了。发展的实际进程就是这样。

不錯，从表面上看斯大林主义出自布尔什維主义。莫斯科的官僚集团甚至今天还繼續自称为布尔什維克党。它不过是利用布尔什維主义的旧商标，以便更好地欺骗群众。那些把表皮当內核、把皮相当实质的理論家尤其可怜。他們把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等同起来，給热月派帮了很大的忙，从而起了明显的反动作用。

在政治領域內排除所有其他党派的情况下，各居民阶层相互矛盾的利益和倾向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在执政党身上得到反映。随着政治重心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向官僚转移，党在社会成份上，在思想意識上也起了变化。由于暴风驟雨般的发展进程，党在最近十五年遭到比社会民主党在半世紀期間远为剧烈的蛻化。目前的“清洗”在布尔什維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間不只是划下一道血的紅綫，而是划下一条血的河流。杀絕布尔什維克的整个老一代，杀絕相当多的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中年一代以及較严肃地接受布尔什維主义传统的那部分青年，这表明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就是在肉体上也是势不两立的。

摘譯自《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維主义》  
(1937年)，載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  
9—10月第58—59期第10—11頁。

事实是：“国家”馬克思主义的一支，社会民主党，在执政之后成了資本的公开代理人。另外一支則产生了新的特权等級。显然，禍根在于国家。从广闊的历史观点看来，在这一論断中可以找到真理的核心。作为强制机关的国家无疑是政治和道德病害之源。象經驗所表明的那样，这也适用于工人国家。因此可以說斯大林

**主义是社会还无法摆脱国家的拘束衣的这种社会状态的产物。**

同上，第 11 頁。

**从布尔什維主义或馬克思主义之中推論出斯大林主义，这等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从革命中推論出反革命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思想以及后来的改良主义思想一直都是按照这种死板的公式行事的。**

同上，第 13 頁。

曾經密切参与西班牙革命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李斯頓·奧埃克就在前几天說过：“事实上，斯大林主义分子現在是馬克思和列寧的最极端的修正主义者——在对馬克思的修正上伯恩施坦甚至沒敢走到斯大林的一半那么远。”这是完全正确的。只需补充一点，伯恩施坦当时是真的有理論需要：他誠心誠意地試圖使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实践和它的綱領協調一致。而斯大林官僚不仅与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根本就沒有任何理論或体系。它的“意識形态”浸透了警察的主观主义，它的实践則是赤裸裸的暴力的經驗主义。就利害关系本身而言，篡夺者等級是仇視理論的：它不能使自己或別人了解自己的社会作用。**斯大林不是用理論家的笔尖，而是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皮靴去修正馬克思和列宁的。**

同上，第 16—17 頁。

### **3. 叫嚷反对对斯大林的“神化”**

叫嚷斯大林被“日益神化”，人們对領袖进行“宗教式的膜拜”，提出了“領袖不会犯錯誤的教条”，同时“禁止人們与沒錯的领导人有不同的想法”，“个人忠实于領袖和无条件服从”被說成是“人的最大光荣”。“由于斯大林不可能犯錯誤，因此政治局就不能反对斯大林，而斯大林

也不能反对他自己”。說斯大林自己也要報紙“天天对他大事吹捧，登他的照片”，“用大号鉛字排印他的名字”。攻击“連俄文句子都写不通順的斯大林，竟被宣布为文学风格的一种典范”。文学艺术甚至农业展览会都必須“繞着斯大林旋轉”。“关于苏維埃經濟，或國內外政策，人們只能抄襲‘領袖’演說中的一些陈辞濫調”。斯大林已成為“专制君王”，他可以說，“朕即社会”。

目前的政治局委員，在布尔什維克党史上都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如果有人在革命的头几年預言他們以后会高升到那样的地位，那他們首先会感到惊讶的，同时这种惊讶不会掺杂着虛伪的谦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目前的作法更加严格了，即政治局永远正确，反对政治局的人就不可能正确。但是不仅如此，由于斯大林不可能犯錯誤，因此政治局就不能反对斯大林，而斯大林也不能反对他自己。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1頁。

我們絕不想把抽象的专政和抽象的民主加以对比，在純粹理性的天秤上衡量二者的优劣。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只有变化是永恒的。布尔什維克党的专政，已为事实证明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进步工具之一。但是在这里也是一样，用詩人的话來說就是，“理性变成无理，仁慈变成灾禍。”反对党被禁止以后，派別也被禁止。而派別被禁止的結果則是，禁止人們与沒錯的领导人有不同的想法。由警察一手制造的党的磐石般一致，带来了官僚不受惩罚的結果，这种結果成了各种违法亂紀貪污腐化行为的泉源。

同上，第75頁。

只要还是只有很少数人能够得到单独的住宅、足够的食品和整洁的衣服，那末，几百万大小官僚就会首先設法利用权力来保障自己的福利。这样就会使这个阶层具有濃厚的自私自利心理，使它的内部有一种牢固的团结一致精神，使它害怕群众的不滿情緒，使它頑固地坚持压制一切批評，最后还使它向“領袖”进行虛伪的宗教式的膜拜——这是因为这位“領袖”正是这些新貴族的权力和特权的体现者和維护者。

同上，第 100—101 頁。

在工厂，在集体农庄，在营房，在大学，在教室，如果不是在托儿所的話，甚至也在幼儿园，人的最大光荣被說成是这样的，即个人忠实行領袖和无条件地服从。近来的許多教育上的警句和格言，似乎就是从戈培尔那里抄来的，如果大部分不是戈培尔从斯大林的同事那里抄來的話。

同上，第 116 頁。

在同党内反对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文学派別一个一个地被扼杀了。这不仅是一个文学的問題。所有的思想領域都出現了毁灭的过程，而由于这种过程大部分是不知不觉的，因此它进行得比較果断。目前的統治阶层认为自己的任务不仅是从政治上控制精神創作，而且还要規定它的发展道路。简单指揮的做法不仅应用到集中营里，而且同样地应用到农业科学和音乐方面。党的中央机关报刊載不署名的指示性社論，这种社論在建筑、文学、戏剧和芭蕾舞方面具有軍事命令的性质，至于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那就更不用說了。

官僚对于不直接为自己服务的东西以及自己所不懂的东西抱着一种迷信般的恐惧态度。当他們要求自然科学与生产有某种联系的时候，这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当他們命令科学的研究者只以直接的实际重要工作为目的的时候，这就威胁到堵塞最珍貴的发

明泉源，其中包括实际的发现，因为这些发现大半是在沒有預見到的道路上出現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語言学家以及軍事理論家，由于有过辛酸的教訓，都避免作出各种广泛的論断，他們怕哪一个“紅色教授”——一般总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钻营之徒——从列寧或者甚至从斯大林的言論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一段話来威胁他們。在这种情况下，要維护自己的思想，或者保持自己在科学上的尊严，就往往意味着要遭到压迫。

但是，在社会科学領域，情况还要坏得多。不要說新聞工作者，就是經濟学家、历史学家，甚至統計学家，也都特別注意不要同——即使是間接地——官方路線的暫时左右搖摆发生矛盾。**关于苏維埃經濟，或者國內外政策，人們只能抄袭“領袖”演說中的一些陈辭濫調**，并且事前就給自己規定了这样的任务，即在文章中要說明一切事物恰好是按照應該发展的那样发展着，甚至发展得还要好些。虽然这种百分之百地加以迎合的做法可以使人們免除日常的不愉快，但是它往往带来最重的惩罚：空洞无物。

尽管从形式上說，馬克思主义在苏联是国家所奉行的学說，但是在过去十二年中，沒有在經濟学、社会学、历史或哲学方面出現过一种值得注意和譯成外国文的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馬克思主义著作都不超过經院式的編纂范围（这种編纂只是重复那些事先批准了的旧概念），都是按照当时行政管理的需要重新編排那些旧引語。千百万册书籍和小册子通过国家机构分配到各地，这些书籍和小册子对任何人都沒有用处，都是一些用胶水、甜言蜜語和其他粘性物质拼湊起来的东西。可能說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和独立意見的馬克思主义者，不是关在牢里就是被迫默不作声，尽管事实上，社会形式的演变在每个阶段都提出了巨大的科学問題！进行理論工作所不可缺少的謹慎被玷污和践踏在脚下。甚至《列寧全集》的注释，在每次新版本中都从統治人物的个人利益出发作了彻

底的修改：对“领导人”的名字加以推崇，反对派的名字加以誹謗；事实則被掩盖起来。关于党史和革命史的教科书，情况也是一样。事实被歪曲，文献被隐藏起来或者加以伪造，名誉凭空制造出来或者有意加以訛毀。如果简单地比較一下任何一本书在过去十二年当中所作的修改，那末，我們就可以正确无誤地看出統治阶层的思想和良心蛻化的过程。

同上，第 131—132 頁。

由于斯大林对詩人馬雅柯夫斯基称赞了几句，文学估价在几个星期內便发生了变化，教科书重新改編，街道改名，雕象建立起来。新歌剧給予高貴听众的印象馬上变成作曲家的一种音乐指导。共青团的書記在一次作家代表會議上說，“斯大林同志的建議就是法律”，全体听众都鼓掌，但是毫无疑问，有些人是感到可耻的。好象是要彻底嘲弄文学一样，連俄文句子都写不通順的斯大林，竟被宣布为文学风格的一种典范。这种拜占廷主义和警察統治，虽然某些表現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喜劇情調，但是其中也包含着某种深刻的悲剧。

同上，第 133 頁。

象天主教一样，它在衰落时期提出了領袖不会犯錯誤的教条，但是它把这个教条高举到連罗馬教皇也从来没有夢想到的程度了。

对斯大林的日益神化以及这种神化所具有的种种漫画味道，是这个制度所必需的一个因素。官僚需要一个不可侵犯的最高仲裁者，即使不是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第一执政官，因此他們就把一个最能适应自己的統治要求的人抬到肩膀上。領袖的那种“性格力量”虽然使西方那些半真半假的文人雅士倾倒，实际上是一个不顾一切維护自己的地位的阶层所施加的集体压力的总表現。这个阶层的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位上都是这样想的：朕即国家。他們每个

人在斯大林身上都容易找到自己。而斯大林也能在每个人身上找到他自己的一小部分精神。**斯大林是官僚的化身。这就是他的政治人格的本质。**

同上，第 203 頁。

莫斯科几次审判已經表明：极权的寡头政治早已成为国家发展道路上的真正的障碍。經濟生活的日益复杂的需要的不断增长，再也不能容忍官僚的压制了。然而这群寄生虫还没有准备作任何让步。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他們破坏了國內一切最好的东西。不应认为在十二年間进行了三次革命的人民忽然变得愚蠢起来。人民是受到了压制，迷失了方向，但是正在注视着，正在思索着。官僚以其专橫的統治、压迫、貪婪和血腥报复，使人每天都想起他們的存在。半饥饿的工人和集体农民，怀着仇恨低声耳語控訴那些暴虐的部长老爷們的狂奢极欲的生活。为了斯大林的六十岁生日，烏拉尔工人不得不做一年半的苦工来为这位可恨的“人民之父”制造一尊宝石的巨大肖像，——这是古代波斯薛西斯大帝或埃及克娄巴特拉皇后一流人所做的事情。能够干出如此丑恶的事情的政权是不可能不激起群众的憤慨的。

摘譯自《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第四国际紧急會議宣言，1940 年 5 月)，第  
21—22 頁。

他的野心具有一种被欧洲技术所加深的粗野的亚洲的特色。他必須使報紙天天对他大事吹捧，登載他的照片，只要有一点借口就提到他，用大号鉛字排印他的名字。今天，就连电报局职员也知道，如果打給斯大林的电报，不称他为人民的父亲，或伟大的导师，或天才，他們就不能接发这个电报。小說，歌剧，电影，繪画，雕塑，甚至农业展览会等等，都必須繞着斯大林旋转，象繞着它的軸心旋转。斯大林时代的文学和艺术将作为最荒唐和卑鄙的拜占廷作风

的实例載入史冊。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下冊第511頁。

官僚第一次看到斯大林不是地位平等的人當中的領袖，而是一個亞細亞的暴君，一個專制君王，成吉思汗——布哈林曾這樣稱呼他。

同上，第544頁。

“朕即國家”這句話比起斯大林的集權政權的實際情況來說，几乎是一句自由主義的格言。路易十四只把自己與國家等同起來。羅馬教皇把他們自己與國家和教會等同起來——但也只是在教皇統治俗世的時代。集權國家遠遠超過凱撒-天主教。因為它還干預國家的全部經濟。斯大林不象太陽國王<sup>①</sup>，他可以正確地說：“朕即社會”。

同上，第546頁。

#### 4. 历数斯大林的“錯誤”

##### (1) 起初是孟什維克，一九〇六年屬分地派

造謠說，斯大林開始活動時“是一個孟什維克”。他參加革命時是個“土包子”，“經驗主義者”，“列寧關於革命的國際性的思想對他是不着边际的，陌生的”。宣傳他在一九〇六年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土地國有化綱領，而主張分地，說“他心目中想到的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對迫在眉睫的社會主義革命絲毫沒有認真考慮”。攻擊說，由於區別不清革命的低潮和高潮，“沒有能力確

---

① 指路易十四。——編者注

定自己的政治方向”，在革命的退潮中却参与了搶劫梯弗里斯銀行的冒险行动。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的几个最亲近的朋友在党报《东方曙光报》发表了一九〇三年警察当局的一篇报告如下：

“据我最近从我們的特工人員处获得的情报，朱加施維里〔斯大林〕在組織內的化名是索索和柯巴。一九〇二年以来，他先是作为孟什維克，后来是作为布尔什維克一直在社会民主黨內积极活动，担任宣传工作者和第一〔铁路〕区的領導。”

就我們所知，任何报刊上都沒有出現过斯大林的党羽駁斥这篇警察报告的文章。从报告中看来，**斯大林在开始活动的时候是一个孟什維克。**

摘譯自《斯大林的政治傳記資料》，載于《斯大林偽造學派》紐約 1937 年版第 180 頁。

在一九〇七年，斯大林参与了“剥夺”梯弗里斯銀行的行动。孟什維克們跟在資產階級市儈們的后面对布尔什維克的这一“阴谋”和“无政府的布朗基主义”大表憤慨。我們对于这种憤慨只能采取一种态度，那就是嗤之以鼻。斯大林既然参加了——即使只是部分地参加——一个断然打击敌人的行动，那末，这只会增加他的坚决革命的声誉。然而，人們不能不奇怪，为什么所有官方发表的斯大林的傳記中都畏首畏尾地略去了这一节事实？难道是怕有損于官僚的体面？我們大胆地认为原因不在这里。原因很可能是政治方面的。因为，虽然一桩剥夺行动的本身决不能在其他革命者的心目中損害一个革命者的面貌，然而，**斯大林对当时局势所作的錯誤估計却的确有損于他的政治家的声誉。**只有在群众采取攻势、也就是革命高涨的时候配合以局部打击敌人的机关——包括“財政机关”在内——的行动，才能相輔相成。**当群众正在退却的时**

候，局部的、孤立的和游击式的打击行动必然会退化为冒险行动，以至于挫折党的锐气。一九〇七年是革命正处于下降的时期，因此，剥夺行动也就成了冒险行动。总而言之，斯大林在那时期就表明了他没有能力区别低潮和高潮。他后来不止一次在重大的时局中表现出没有能力确定自己的政治方向（在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广州和“第三时期”）。

同上，第 181 頁。

因此，他这次发言支持并不十分受人欢迎的土地分配一定有更强有力的、使他不能不这样做的动机。按照現在也就是隔了三十多年以后所能作出的解释，斯大林的动机有两个，都是很能說明他的性格的。

柯巴<sup>①</sup> 参加革命时是一个平民民主主义者，一个土包子，一个經驗主义者。列宁关于革命的国际性的思想对他是不着边际的，陌生的。他希望找到近在眼前的“保证”。对个人土地所有制的向往在格魯吉亚农民身上比在俄罗斯农民身上显得更强烈，而且得到远为自发的表现，因为格魯吉亚农民缺乏直接的村社土地占有的經驗。因此，这位来自吉第里洛村的农民的儿子肯定认为使这些小財产所有者得到一份額外的土地是防止反革命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可以清楚看出：在他的情况下，“分配主义”并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信念——說实在的，他对从学說中得来的信念毫不在乎地加以拒絕——而是和他的最根本的性情气质、他的教养、他的社会环境完全合拍的有系統的綱領。事实上，二十年后，我們还会在他身上发现这种“分配主义”故态复萌的現象。

柯巴的第二种动机似乎也是同样明白无疑的。在他来看，十二月起义的失敗肯定使列宁的威信有所降低：他一向认为事实比

---

① 斯大林的化名。——編者注

思想更重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处于少数地位。柯巴和列宁站在一边不可能取胜。仅仅这个事实就大大减少了他对国有化綱領的兴趣。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认为和对方的綱領比較，分配土地的害处較小。因此，柯巴有理由希望在最后决定时，代表大会中的多数会就危害較小的方案达成協議。这样一来，激进民主主义者天生的气质就和阴谋家的策略考慮合而为一。但是柯巴的算盘打錯了：孟什維克拥有很大的多数，所以当他們宁愿采取为害較大的方案时，不必选择危害較小的方案。

为了将来参考，必須指出：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期間，斯大林效法列寧，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暂时性”的，也就是说，仅限于完成共同的民主任务。他連想也沒有想到应当指出，处于这种地位的农民将来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軍。二十年后，对农民的这种“不信任”将被宣布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邪說。当然，二十年后，許多事情都将改头換面重新出現。斯大林曾經在一九〇六年宣布孟什維克和布尔什維克的土地綱領“都是不能采納的”，认为分配土地“并不和经济发展趋向相抵触”。他心目中想到的实际上是資本主义发展的趋向。当时他对迫在眉睫的社会主义革命絲毫沒有认真考慮。他十分肯定地认为，还得过几十年才有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在這個期間，資本主义的自然法則将执行使农村經濟結構集中和无产阶级化的任务。柯巴在他的传单<sup>①</sup>中用聖經上的字眼“乐园”来形容遙远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沒有理由的。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上冊第105—106頁。

---

① 指斯大林写的《高加索的工人們，是复仇的时候了！》。这篇文章原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用传单形式印发的。見《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65—70頁。——編者注

## (2) 在反动年代是調和派分子

污蔑斯大林在反动年代是調和派分子。指責他把列寧反对取消派和調和派的斗争說成是“杯水风浪”，把《明星报》当作“調和派的机关报，直接反对列寧”，按他制訂的編輯方針出版的《真理报》上取消派三字被“勾消”了。攻击斯大林压下列寧要求抗議七名孟什維克杜馬党团代表压制六名布尔什維克杜馬代表的信，把同“取消派的團結”看得高于布尔什維克的“政治独立”。說斯大林贊成《真理报》同取消派的《光綫报》合并。胡說克拉柯夫會議明确无誤地譴責了斯大林的政策。說在布尔什維克关于战争的理論中，“斯大林沒有为它貢献一个字”。

**一九一二年，斯大林參加了布尔什維克的合法報紙《明星报》工作。彼得堡編輯部最初發行这份報紙时把它作为調和派的机关报，直接反对列寧。斯大林在一篇綱領性的社論中这样写道：**

“要是我們的報紙能够成功地捍卫坚实的民主的精神財富而不陷入不同派别的論战热，我們将感到滿意。这种坚实的民主的精神財富現在正遭到公开的敌人和虛伪的朋友的无耻践踏。”（《革命和苏联共产党——資料和文件》，第5卷第161頁。）

“不同派别的論战热”这句話的矛头完全是針對列寧的，是反对列寧“杯水风浪”<sup>①</sup>，反对列寧由于某种“論战热”而常常“暴跳如雷”的。

由此可知，斯大林这篇文章同他在上述一九一一年的信件內所表現出来的卑鄙的調和主义傾向是完全一致的。

摘譯自《斯大林的政治傳記資料》，載于《斯大林偽造學派》紐約1937年版第183—184頁。

<sup>①</sup> “杯水风浪”是俄文中的成語，指为无謂小事而激烈爭吵。——編者注

但是，作这种夸耀的动机只起輔助作用。这封神秘信件<sup>①</sup>的关键在最后一部分：

“当然，我們听到了关于国外的‘杯水风浪’的情况：一方面是列宁-普列汉諾夫联盟，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馬尔托夫-波格丹洛夫联盟。据我所知，工作者对第一个联盟的态度是贊同的。但是一般說，工作者开始看不起侨居国外的人員：‘讓他們任意在墙上爬吧；但是，至于我們，凡是珍視运动的利益的人，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令人可惊的話！斯大林认为列寧反对取消派和調和派的斗争是“杯水风浪”。**“工作者”——其中也有斯大林——“开始看不起”侨居国外的人員（也包括布尔什維克參謀部）。“凡是珍視运动的利益的人，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看来运动的利益与制訂运动綱領的理論斗争并无联系。

.....

.....他对“原則”的真正态度在第二封信里极为忠实地表示出来：“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这实质上就是許多不太聰明的調和分子的态度。**斯大林对“侨居国外的人員”使用了非常輕蔑的語句，这不仅因为粗暴是他的性格的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因为他指望得到有經驗的人特別是格尔曼諾夫的同情。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上冊 第176—178頁。

不錯，斯大林并不仅仅闡釋列寧的話。但是由于他要支持調和派，他就繼續在同时采取两条路線，从他在索里維切果茨克所写的两封信中，我們对这两条路線已很熟悉了，那就是：**同列寧在一起反对調和派，同調和派在一起反对列寧。**第一个政策是公开的，

---

① 指斯大林在1911年写給莫斯科布尔什維克的一封信。——編者注

**第二个政策是隐蔽的。**

同上，第 187 頁。

**这样，斯大林自己就肯定《真理报》編輯方針是他負責制訂的。这个方針的实质可以总括如下：“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不錯，四月二十二日，就在《真理报》第一期出版的那一天，斯大林本人被捕。但是，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內，《真理报》是忠实于他与別人联合制訂的这个方針的。**“取消派”这三个字从这家報紙的辞汇中勾消了。**

同上，第 189—190 頁。

这七名孟什維克大部分是知識分子，他們想要把这六名布尔什維克(沒有什么政治經驗的工人)置于他們自己的控制之下。十一月底，列宁亲自写信給瓦西里也夫〔斯大林〕：“既然我們在工人选民团中有六个代表，就决不能默默地服从那些西伯利亚人<sup>①</sup>。既然六人团受到多数的压制，他們就应提出强硬的抗議……”<sup>②</sup> 斯大林对这封信的答复，象对其它信的答复一样，仍然是郑重保管着的。但是列宁的呼吁并未得到同情：这六个人认为与那些被“开除出党”的取消派的團結离于他們自己的政治独立。在《真理报》发表的一項特別決議中，統一的党团承认，“社会民主党的團結是一个迫切的需要”，表示自己贊成将《真理报》与取消派的《光綫报》合併，并且作为朝这个方向走的一步，建議它的全部成員都成为两家報紙的撰稿人。十二月十八日，孟什維克的《光綫报》在它的撰稿人名单上胜利地公布了四个布尔什維克代表的名字（两人拒絕刊登自己的名字）；孟什維克派成員的名字同时在《真理报》的报头上出現。**調和主义再次获胜，这在实质上意味着布拉格代表會議的精神和文字的失敗。**

---

① 指在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者，他們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原編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425 頁。——編者注

不久，《光綫報》的撰稿人名单上又出現了一个名字——高尔基的名字。这使人感到是一个阴谋。“你怎么与《光綫報》搞在一起了呢???”列寧写信給高尔基，打上三个問号。“难道你可能是在步代表們的后尘？可是他們完全是上当了！”在調和派取得这个暫时的胜利的时期，斯大林在彼得堡，执行中央委員会对党团和对《真理報》的控制权。沒有任何人透露过关于他对严重打击了列寧的政策的这些决定表示抗議的任何情况——这是一个肯定的迹象，表明調和派阴谋的幕后鼓动者是斯大林本人。巴达也夫代表后来为他的犯罪行为辯解說：“象在其他一切場合一样，我們的决定……是与我們当时有机会与之討論我們的活动的那些黨內人士的态度一致的……”这个轉弯抹角的說法暗指中央委員会彼得堡局，首先是暗指斯大林本人。巴达也夫謹慎地声辯說，罪責不应从領導人身上轉移到被領導者的身上。

同上，第 194—195 頁。

尽管缺乏人員，列寧并不急于派斯大林回俄国。必須在他回去以前完成在彼得堡的“必要的改革”。另一方面，斯大林在克拉柯夫會議以后也不急于回到他从前工作的地方，这次會議明确无誤地（不管是多么間接地）譴責了他的政策。

同上，第 203 頁。

某些传記作家斷言斯大林是“失敗主义”理論或者“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國內战争”的公式的制訂者，这完全是捏造，并且证明他們完全不了解斯大林的智力和政治性格。他与政治革新和大胆創造理論的精神是最不符合的，他从未預見过任何事情；他从来没有走在任何人前面。他是一个經驗主义者，因此向來害怕預先作出結論，宁願在剪裁之前先量十遍。在这个革命者的内心，总是隱藏着一个保守的官僚。第二国际是一个强大的政治机构，斯大林是决不会主动与它決裂的。布尔什維克关于戰爭的理論的制訂完全

是列寧的成就的一個重要部分。斯大林沒有為它貢獻一個字，就象他沒有為革命理論貢獻一個字一樣。

同上，第 220 頁。

### (3) 二月革命後有考茨基主義傾向， 十月革命前夕暗中反對起義

攻擊二月革命後斯大林有“考茨基主義傾向”，採取“與孟什維克左派的精神一致的完全機會主義的立場”：“參與草擬”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蘇維埃的機會主義決議，“支持臨時政府”，“保卫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主張“同策烈鐵里式的孟什維克派聯合”，反對列寧的四月提綱，“企圖把斯維爾德洛夫排斥在中央委員會之外”，暗中反對列寧的主張而支持參加斯德哥爾摩社會黨會議，變相抗拒列寧的兩封信：《布尔什維克必須奪取政權》和《馬克思主義和起義》，在《真理報》上發表聲明，“在‘基本原則’上支持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對起義的行為。

斯大林同志在這裡列舉了別人的錯誤，却漏了談一談他本人的錯誤。如果“不斷革命”由於和列寧的真正觀點不同，是不正確的，可是它裡面仍然有某種正確的東西，這也就使我能夠走向布尔什維主義。譬如說，“不斷革命”並沒有妨礙我在同布尔什維主義進行了鬥爭的嘗試之後（上面已經說了，我這是不對的），在一九一七年在美國從根本上擬定了與列寧向黨發揮並執行了的那條路線原則上相同的路線。斯大林同志在二月革命後執行了錯誤的策略（其它《真理報》上的文章以及在關於有條件支持臨時政府的決議中），列寧曾經稱之為考茨基主義傾向。在民族問題上，在對外貿易壟斷問題上，在黨的專政及其他問題上，斯大林同志後來又犯了重

**大的錯誤。但是我认为，他現在所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他的关于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

摘譯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1926年12月)，載于《真理报》1926年12月14日第289号第2版。

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中旬同加米涅夫一起到达彼得格勒。当时的《真理报》在莫洛托夫和施略普尼柯夫负责编辑之下观点模糊，不成熟，但是在性质上是“左”的，是反对临时政府的。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认为旧的编辑部太左了，于是就改组了旧编辑部，采取了同孟什维克左派的精神一致的完全机会主义的立场：（一）支持临时政府，“只要临时政府能如何如何”；（二）在军事上保卫革命（即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国）；（三）同策烈铁里式的孟什维克派联合。《真理报》当时的态度的确是党的历史和斯大林的历史中的可耻的一页。他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发表的那些文章都是他在流放期间考虑问题时所得出的一些“革命性”的结论，为什么到今天我們还看不到斯大林在战争时期的任何论述，完全可以由这些文章来说明。

摘譯自《斯大林的政治传記資料》，載于《斯大林伪造学派》紐約1937年版第185頁。

象加米涅夫一样，斯大林更接近苏维埃中的多数派。《真理报》在编辑部易手后，早在三月十五日（二十八日）就宣布，“只要临时政府跟反动派或反革命进行斗争”，布尔什维克就坚决支持临时政府。这项宣布的自相矛盾之处是，反革命的唯一重要代理人就是临时政府本身。斯大林对战争的立场表现了同样精神：只要德国军队仍然服从德皇，俄国士兵就应该“坚守岗位，用子弹回敬子弹，用炮弹回敬炮弹”。好象帝国主义問題只是一个皇帝問題！文章是加米涅夫写的，但是斯大林絲毫沒有提出异议。如果他在那些日

子里跟加米涅夫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他要比他的伙伴更加閃爍其詞。《真理报》解釋說：“一切失敗主义，或者不如說是唯利是圖的報紙在沙皇檢查制度的保護下稱為失敗主义的东西，在第一个革命团队在彼得格勒大街上一出現时，就消失了。”这是公然否定了列寧的話（列寧在沙皇檢查制度所不及之处宣傳失敗主义），同时重申了加米涅夫在杜馬中的布尔什維克党团受审时所作的声明。但是这一次，这篇文章是斯大林认可的。至于“第一个革命团队”，它的出現只是意味着从拜占廷式的野蛮走到帝国主义文明的一个步驟。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上冊第249頁。

彼得格勒蘇維埃一致通過這項宣言一事<sup>①</sup> 不仅标志着帝国主义的米留可夫对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的胜利，而且还意味着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对左翼布尔什維克的胜利。所有的人向假的爱国紀律屈服了。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写道：“應該歡迎……蘇維埃昨天发出的……宣言。这个宣言如能深入广大群众，无疑会使數百數千的工人重新記起已經被遺忘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sup>②</sup>。实际上，在西方也有类似的呼吁，它們所干的只是帮助統治阶级維持为民主而战这样一个幻想。

斯大林关于宣言的文章不仅清楚地揭示了他在这个具体問題上的立場，而且还揭示了他的一般思想方法。他固有的机会主义在時間和环境的逼迫下会暫時隱藏在抽象的革命原則下，当事情到决定关头时，他的机会主义就抛弃了这些原則。他在文章的开始几乎是逐字重复列寧的論点：即使在推翻沙皇制度后，俄国参加

① 指通过1917年3月14日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告全世界人民》宣言。托洛茨基在前文中认为这个宣言是社会爱国主义的。——編者注

②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8—9頁。——編者注

戰爭仍然是帝国主义性的。但是当他要作出他的实际結論时，他不仅以含糊的限制条件欢迎社会护国主义宣言，而且还效法加米涅夫断然拒絕动员群众反对戰爭这一革命作法。他写道，“首先，把一个光禿禿的‘打倒戰爭！’的口号当做实际方法无疑是完全不适当的①……”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对临时政府施以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談判……”② 借助对资产阶级施加友好“压力”（对资产阶级來說，征服是戰爭的整个目的），斯大林希望根据“民族自决权”来实现和平。自从戰爭开始以来，列宁一直給予最严重打击的，恰恰就是这种市儈烏托邦主义。不論多少“压力”都不能使资产阶级不再成为资产阶级：必須推翻他們。但是斯大林完全由于害怕而不敢作出这个結論——正象妥协派那样。

同上，第 250—251 頁。

**斯大林把这种不可調和的阶级斗争**（尽管妥协派尽了一切努力，这个斗争日益紧张而要变为内战）說成只是两个政治机构之間的分工。甚至左翼孟什維克馬尔托夫也不会把問題說成是这样。这是策烈铁里——而策烈铁里是妥协派的圣人——的理論最庸俗的表現：“溫和的”和比較“坚决的”两派力量在一个叫做“民主”的舞台上演戏，两者合演一出戏，有的人在“征服”，有的人在“巩固”。这就是后来在中国（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在西班牙（一九三四——一九三九年）以及一般在他所有倒霉的“人民陣綫”中执行現成的斯大林主义政策公式。

同上，第 254 頁。

**斯大林在从西伯利亚回来的途中可能参与草拟了克拉斯諾雅尔斯克苏維埃的決議案。**可能他在感到代表們的态度之后，认为最好是稍为离开加米涅夫一点。但是，克拉斯諾雅尔斯克苏維埃的決議案的质量甚至比彼得堡的決議案的质量还要低：“……十分

---

①② 《斯大林全集》第 3 卷第 8—9 頁。——編者注

清楚地表明，临时政府的权力和威信的唯一源泉是临时政府必須完全服从的人民的意志……只要临时政府采取滿足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民的要求的方針，就支持临时政府。”从西伯利亚带来的这个騙人政策证明是十分簡單的：資產階級“必須完全服从”人民并“采取”工人和农民的“方針”。

同上，第 255 頁。

因此，布尔什維克代表會議在第二天的會議上考慮右翼孟什維克領袖策烈铁里关于两党合并的建議，并不是偶然的。斯大林以最同情的态度对此表示了反应：“我們應該这样做。有必要闡明我們关于統一的条件的建議。根据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的路綫統一是可能的。”所說的路綫就是在瑞士举行的两次社会党會議上的“路綫”，在这两次會議上，溫和的和平主义者占了优势。……但是，被称为市儈的斯大林堅持立場：“我們不應該跑在前头并促进分歧。党的生活是不可能沒有分歧的。我們会忘記黨內这些小分歧。”人們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斯大林宣布同苏維埃內占优势的集团的鼓动者策烈铁里的分歧是在黨內可以“忘記”的小分歧。这次討論是在四月一日（新历四月十四日）进行的。三天后，列宁宣布对策烈铁里进行誓死斗争。两个月以后，策烈铁里解除布尔什維克的武装并逮捕了他們。

同上，第 256—257 頁。

一九一七年三月會議对于了解布尔什維克党領導成員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思想状况，特别是在西伯利亚蟄居四年之后回来的斯大林的思想状况，特別重要。他是一个普通的民主分子和痴呆的乡下佬，后来有了点名气，时势迫使他披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他在那几周里写的文章和发表的讲话明确无誤地表明了他在战争年代的立場。如果他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間略微接受一点列宁的思想，象人們二十年后写的回忆录所声称的那样，他本来是不会象他

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那样无可挽回地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沼的。由于列宁不在和由于加米涅夫的影响，斯大林才有可能在革命爆发时显示他真正的为人，暴露他的最根深蒂固的特性——不信任群众，完全缺乏想象力，目光短浅，爱好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在以后的年代，每当斯大林有机会在重要的局势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时候，这种特性就继续暴露出来。斯大林在三月会议上十分彻底地暴露出自己是一个政客，因此三月会议今天已从党史中删去，有关这次会议的记录被封存起来。一九二三年，有人为“三人小组”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秘密准备了三个副本。只是一九二六年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反对斯大林时，我才设法从他们那里获得这项了不起的文件，这样，我才能够在国外以俄文和英文加以发表。

同上，第 257 頁。

继续由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编辑的《真理报》声称，列宁的提纲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并不同意他的意见，《真理报》本身将继续奉行自己的旧政策。这项声明是加米涅夫写的。斯大林默默地支持他。他必须长时期保持沉默。列宁的思想在他看来是流亡者的幻想，但是他等着瞧党机构如何反应。

同上，第 262 頁。

在代表会议上，有人曾企图把斯维尔德洛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死后谈及此事，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一个错误。他又说，“很幸运，我们得到了来自下面的纠正。”列宁本来很难有什么理由反对斯维尔德洛夫的候选资格。列宁只是通过通讯了解他是一个不倦的职业革命家。反对意见可能来自斯大林。斯大林没有忘记斯维尔德洛夫如何在他之后在彼得格勒把情况纠正过来，改组了《真理报》；他们在库莱卡的共同生活仅仅增进了他的敌意。斯大林决不宽恕任何事情。他显然企图在会议上进

行报复，以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我們只能猜測他用了什么办法）設法贏得列寧的支持。但是他的圖謀沒有得逞。如果說在一九一二年列寧想使斯大林进入中央委員會时遭到了代表們的反对，那末現在当他想排斥斯維爾德洛夫于中央委員會之外时，遭到了同样的反对。

同上，第 268 頁。

在斯德哥爾摩社會黨會議問題上爆发了公开冲突，举行这次會議的倡议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来的。想作垂死掙扎的俄国护国派和妥协派认为这次會議是“为和平而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被控同德国总參謀部有联系的列寧表示坚决反对参加显然是由德国政府发起的这次會議。在八月六日的中央执行委員會會議上，加米涅夫公开表示贊成参加这次會議。斯大林甚至沒有想到在《无产者报》（这是当时《真理报》的名字）为党的立場辯護。相反，斯大林沒有发表列寧反对加米涅夫的尖銳的文章，这篇文章只是在拖了十天以后，并且只在文章的作者坚持要求和向其他中央委員发出呼吁以后才发表。

同上，第 292 頁。

八月三十日，斯大林毫无保留地发表了季諾維也夫写的沒有署名的文章《不做什么》。这篇文章显然是反对准备起义的。

同上，第 293 頁。

在民主會議开幕的那天——（一切假民主會議中最愚蠢的一个）——列寧給党中央委員會写了两封著名的信件《布尔什維克必須夺取政权》和《馬克思主義和起义》。这次他要求立即行动：发动团队和工厂的人們，逮捕政府成員和民主會議成員，夺取政权。显然這項計劃不能在当天付諸实行；但是它的确引导中央委員會的思想和活动进入新的途徑。加米涅夫坚持斷然拒絕列寧的建議——說它是灾难性的！加米涅夫害怕这些信件在党和中央委員

会中传阅，他主张把副本全部毁掉，只留一份存入档案，他得到六票。斯大林建議“把这两封信发給最重要的党组织，并建議它們进行討論”。最近的評論說，斯大林的建議的目的在于“組織地方党委員会对中央委员会施加影响，力促它执行列宁的指示”。如果情况是这样，斯大林原会直接出来为列宁的建議辯护，原会以他自己的決議来对抗加米涅夫的決議！但是他的想法远非如此。各省的大多数委員会委員比中央委員会更右傾。把沒有得到中央委員会贊同的列宁信件发給他們看，等于是表示不贊成这些信件。斯大林提出这个建議是为了爭取時間，如果发生冲突，就有可能申辯說，地方委員会违抗。中央委員会由于优柔寡斷而陷于瘫瘓。會議决定把列宁信件問題推迟到下次會議討論。列宁极其不耐煩地等待答复。但是斯大林甚至沒有在五天后举行的下次會議上露面，信件問題甚至未被列入議程。气氛越热，斯大林的花招越冷。

同上，第298—299頁。

斯維爾德洛夫公布了列宁的信件，这封信斥責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工賊，要求把他們开除出党。由于在同一上午《真理报》发表了編輯部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辯护的声明，危机突然复杂化，声明說：“列宁同志的文章的尖銳語調并沒有改变我們基本上繼續同意他的意見的事实。”这个中央机关报认为指責列宁的抗議的“尖銳性”而不指責这两个中央委員反对党关于起义的决定的公开立場是适当的，而且表示它在“基本原則”上支持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好象在当时还有比起义問題更为根本的什么問題一样！中央委員們惊奇地揉揉自己的眼睛。

斯大林在編輯部的唯一的同事是索柯里尼柯夫——未来的苏联外交家，后来是“清洗”的受害者。但是索柯里尼柯夫宣布他与撰写反駁列宁的那篇社論的工作毫无关系，并且认为它是錯誤的。这样，斯大林迟在起义前四天，还在单独——在反对中央委員会和

反对他自己的編輯同事的情况下——支持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中央委員會是由于担心使危机延长才克制了它的憤怒。

斯大林繼續在起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間玩弄手法，他正式表示反对接受加米涅夫的辭呈，他爭辯說，“我們的整个形势是矛盾的。”加米涅夫的辭呈以五票对斯大林和另外两人的反对票被接受了。一項決議以六票对斯大林的一票被通过了，這項決議禁止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进行反对中央委員會的斗争。會議記錄說：“斯大林說，他要离开編輯部。”对他來說，这意味着放弃他在革命情况下能够担任的唯一职务。但是中央委員會拒絕接受他的辭呈，从而防止了另一次分裂的发生。

同上，第304—305頁。

#### (4) 在布列斯特和平談判时主张 只談判而不簽訂和約

污蔑斯大林在布列斯特和平談判期間“一無主見”，“游移不定，躲躲閃閃，或默然不語”。斯大林首說“托洛茨基的立場对当时的党來說是唯一可行的出路”。宣传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当德国已开始进攻的时候，还要求只进行談判不簽訂和約。

(十八)多年以来，斯大林和他的庫西宁之流一直在向全世界宣传所謂托洛茨基违反中央委員會的決議，頑固地决定不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上签字。斯大林甚至企图在报上证明这种說法。关于这一点，我們現在拿已經公布的一九一七年中央委員會會議速記記錄上的正式記載来作证明(国家出版社一九二九年版)：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會議。托洛茨基同志提議表決下述方案：我們停止战争，不締結和約。提付表决。九票贊成，七票

反对。”(同上，第 207 頁。)

这似乎已足够证明了。

(十九)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这个方案持什么态度呢？在举行那次以九票对七票的票数通过这一方案的會議之后一星期，斯大林說了下面这番話：

“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一月十九日)會議。斯大林同志：……中間观点——托洛茨基的立場——為我們提供了擺脫困境的出路。”(同上，第 214 頁。)

我們不能不奇怪，斯大林的这几句話怎么居然逃过了那位目光精細的編輯薩維利也夫的眼睛而一直保留在速記記錄內。因为这几句話彻底暴露了后来許多年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談問題上的宣传。現在看来，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二月一日)的时候认为托洛茨基的立場为党提供了一条“擺脫困境的出路”。在整个那个紧急时期里，黨組織和蘇維埃內的絕大多数人是贊成进行一場革命战争的，因而要貫彻列寧的立場，那除非是把党和政府推翻(那在当时当然是絕對办不到的)。如果我們記住这些情况，斯大林的那几句話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斯大林說托洛茨基的立場对当时的党說来是唯一可行的出路，这样說絲毫不錯。他不过是道出了一个无可爭辯的事实而已。

摘譯自《斯大林的政治傳記資料》，載于《斯大林偽造學派》紐約 1937 年版第 193—194 頁。

凡是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能清楚地想象得出斯大林由于自己缺乏任何考慮周密的立場而陷入的一筹莫展的狼狽境地。在二月十八日德国人已經夺占了得文斯克，他們以非常的速度向前推进着。阻击和牽制政策已經完全无效。斯大林却在二月二十三日建議不要簽訂和約，而要……进行談判。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期間，斯大林一无主見。他游

移不定，躲躲闪闪，或默然不語。最后总是投票贊成列寧的動議。斯大林当时那种不知所措和軟弱的态度甚至在經過官方“改正”后的中央委員會正式記錄中也流露得十分明确——虽然还不是纖毫毕露。

同上，第 194—195 頁。

了解当时情况的每个人——〔甚至象烏里茨基这样一个一貫极力主张同德意志帝国进行革命战争的人〕都可清楚看出，抵抗是毫无希望的。斯大林的話完全是由于根本沒有任何深思熟慮的立場。早在二月十八日，德国〔军队就攻占了〕得文斯克。它的进攻速度是特別快的。遇阻政策已經是山穷水尽了。〔但是〕斯大林却〔在五天后〕在二月二十三日建議不簽訂和約，而……进行談判。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下冊第 333 頁。

### (5) 在國內戰爭中违抗軍令， 是軍事反对派的首腦

指責在國內戰爭中斯大林利用中央委員的身份把沙皇时代“大公的权力”帶入军队中来，自己违反总司令的命令，同时“經常地慫恿別人違反戰線領導人的命令”。声称斯大林保卫察里津、彼得格勒的故事是伏罗希洛夫等篡改历史制造出来的“神話”。断言紅軍在华沙城下的失利是斯大林負責的西方集團軍司令部硬要攻占利沃夫而拒絕往援华沙的結果。污蔑斯大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扶植軍事反对派作为反对托洛茨基的杠杆，是“反对派的首腦”。

軍事机器保证有可能发号施令。但是斯大林并不是那个机器

的首腦。最初他只統率二十个軍中的一个軍；后来他領導五六个戰綫中的一个戰綫。他建立了严厉的紀律，紧紧抓住所有的杠杆，不容許不服从。同时作为一个集團軍的統帥，他經常地懲懲別人違反戰綫領導人的命令。在領導南部或西南部戰綫时，他违反了總司令部的命令。在沙皇軍隊中，除軍事上的从屬关系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关于从屬关系的規定：那些具有某种指揮官或高級行政职位的大公們，常常不把上級軍官放在眼里，从而在陸海軍的管理中造成混乱。我記得曾对列寧說，**斯大林不适当利用其党中央委員會委員地位的便利，把大公的权力帶入我們軍隊之中。**〔十年以后〕，伏羅希洛夫在他的关于斯大林和紅軍的文章中〔毫无隱諱地承认〕：“斯大林准备违反任何規章，任何从屬关系。”宪兵是从不法之徒中招募来的。

上下級之間有矛盾是自然的事。集團軍一級几乎总是对戰綫一級不滿，戰綫一級总是对總參謀部有意見，特別是在情况不十分順利的时候。**斯大林的特点是他經常利用这种摩擦，使它們发展成为激烈的抗爭。**斯大林把他的合作者拉进危险的冲突，从而把他們捏合在一起，使他們更依賴他。有两次，中央委員會直接下令把他从戰綫召回。但是每当形势有新的轉折时，他又被派出去。尽管屢有机会，他在軍隊中并未建立起威信。可是，那些在他指揮下的軍事合作者，一旦被拉入反对中央的斗争之中，以后就一直同他保持密切的关系。察里津集團成了斯大林派的核心。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下冊第354—355頁。

在內战年代发表的記述材料中，**关于察里津的故事是同斯大林名字毫无联系的許多事件之一。**他在幕后起的作用，最多也只能說是十分短的时期，只有很少数的人知道，絕對无必要多談到他。

同上，第369頁。

正如同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对付調和派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前对付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一样，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表面上与軍事上的反对派毫无关系，却努力地把它扶植起来并且利用它作为反对托洛茨基的杠杆〕。

.....

〔斯大林竭尽全力就軍事人民委員部在軍事問題上采取的立場在代表大会上散播毒素。〕所有手头的文件都充分证明，根据他在中央委員會和政府中采取的立場看来，斯大林是反对派的首腦。如果說我过去还只是有点疑惑，而現在则是坚信不疑，斯大林同烏克兰人搞的阴谋，他在烏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員會中的操纵以及諸如此类的行为都是同他在軍事反对派中的活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在察里津沒有能够得到桂冠，他就想在〔黑暗中〕找到报复的机会。

同上，第 388—389 頁。

〔十年之后，伏罗希洛夫利用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九年春末对彼得格勒所作的这次短暫的訪問，又一次酝酿篡改历史。現在这粒种子已經发展成为一个十足的神話，叫作“斯大林是彼得格勒的救星”。这是个狡黠的神話，他用一种相当奇怪的方式故意把事情发生的季节掉換了。事实是〕尤登尼奇在一九一九年曾經兩度打算占領〔彼得格勒〕——一次在五月間，另一次在十月間。

同上，第 401 頁。

〔一口咬定說在南方战線上取得了最后胜利的計劃是斯大林作出的这件事里有著諷刺性幽默的味道。然而这个罵倒一切的狡賴就是斯大林本人的作品，它所根据的证明文件就是斯大林給列寧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斯大林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我起初在口头上后来又通过书面形式提出的反駁七月一九月計劃的論点，而这些論点曾經是他和政治局大多数委員一道所批駁过的。

由于政治局的全体委员对这件事的原委都十分熟悉，因此斯大林在当时还不可能想到要把旧计划的责任栽在我的头上。相反地，他怪罪于总司令及其属下的“斗鸡式战略家”，也就是那个在七月间总司令部改组时斯大林所倚恃的古谢夫。

同上，第422页。

在华沙附近遭遇到的灾难之所以达到那样异乎寻常的程度，原因之一在于指向利沃夫（林堡）的由南方战线各军组成的西方集团军司令部的指挥不当。斯大林是这个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首脑。他要在斯米尔加和图哈切夫斯基预定进入华沙的时候，不惜以一切代价同时进入利沃夫。我军向维斯杜拉河的迅速前进已经使波兰军队的指挥部把全部力量，以及在法国军事代表团的协助下调动的大批预备队集中在华沙和卢布林一带。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西南战线的前沿同主要的西方战线的前沿成直角分道扬镳：斯大林独自作战。当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受到的威胁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总司令命令西南战线把前进的方向急剧地转向扎莫斯蒂-托马舍夫一线，以打击华沙附近的波兰部队的侧翼，然而西南战线司令部，在斯大林的慇恿下，却继续向西方前进：难道占领利沃夫本身不是比帮助“别人”攻占华沙更重要吗？在三、四天内我军总参谋部还没有能使这项命令付诸执行。只是在再三催促，外加威胁之后，西南战线司令部才改变了前进的方向。但是这时，几天的拖延已经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八月十六日，波兰人展开反攻，并且迫使我军后撤。

同上，第428—429页。

#### （6）在民族問題上犯过許多錯誤

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問題》是斯大林“唯一的理论著作”，这是在列宁的“启发”和“不断监督”下写成并由

“列寧逐字逐句修改”过的。攻击斯大林在民族問題上犯过許多錯誤：一九一七年的三月會議上斯大林發揮了“認為民族压迫是封建主义的产物的看法”，一九一九年初由于斯大林“不适当当地执行”了农民和民族政策，使乌克兰的苏維埃政府垮台，一九二三年他把大俄罗斯主义“同弱小民族的防卫性民族主义放在同等地位”，在处理格魯吉亞民族問題上采用軍事武斷和行政命令措施，命令紅軍“侵入”格魯吉亞。污蔑斯大林在奧爾忠尼启泽、捷尔任斯基的帮助下，在格魯吉亞煽动了一場“反对最优秀黨員的‘革命’”，“斯大林派在高加索把列寧派击潰了”。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无疑是斯大林最重要的——不如說是他的唯一的——理論著作。这一篇文章(它长达四十頁)使它的作者有权被承认是杰出的理論家。相当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以前或者以后，他沒有写出在质量上可以稍与比拟的任何东西呢？这个謎的解答在于：斯大林的这篇著作完全是列寧启发他写的，是在列寧不断监督下写成的，并且是由列寧逐字逐句修改的。**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上冊第210頁。

在維也納，斯大林在列寧指导下，写过一本有价值的关于民族問題的书，但是他在西伯利亚想独立繼續这个工作的結果，却使列寧甚至认为不可能发表他的文章。**在一九一七年的三月會議上，斯大林發揮了认为民族压迫是封建主义的产物的看法，而完全看不到帝国主义是我們时代民族压迫的主要因素。在一九二三年，他把具有悠久传统和压迫过弱小民族的大俄罗斯主义同弱小民族的防卫性民族主义放在同等地位。这些明显的錯誤，斯大林式的錯誤，放在一起看是可以理解的。上面已經指出，这是因为他在任**

任何一个問題上都沒有形成有系統的概念。他根据一时的需要利用一些互不相关的馬克思主义教条，就象在鞋舖里按大小挑选鞋子一样从中进行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每遇到事件轉折点他总是那么容易自相矛盾起来。因此，即使在他专长的民族問題上，斯大林也不能达到完整的概念。

同上，下冊第 343 頁。

他在烏克兰的时期充滿了失敗，因此关于这个时期的情况一直完全沒有透露。斯大林主义者所写的官方历史，被迫記錄下在斯大林担任民族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的整个时期在烏克兰貫彻党的路綫中所遭到的一次又一次失敗，但謹慎地避免提到他的名字同这种流行病般的失敗有关。这些历史不說：归根結底，“一九一九年初在烏克兰犯的关于农民和民族問題的錯誤——这个錯誤使那里的苏維埃政府垮台”，是由于斯大林完全不适当当地执行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員會所制訂的政策。

同上，第 347 頁。

作为民族人民委員，斯大林不再从他在一九一三年竭力頌揚的历史法則的观点出发，而是从行政机构的方便的观点出发来处理民族問題。这样一来，他必然发现自己同最落后的，最受压迫的民族的要求大为相左，并且为大俄罗斯的官僚帝国主义获致了不应有的权益。

格魯吉亚人民在成分上几乎完全是农民和小資产阶级，他們强烈地反对把他們的国家苏維埃化。但是由此引起的巨大困难却由于采用了軍事武断的方式和方法来使格魯吉亚苏維埃化而大大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对于格魯吉亚的群众，需要采取加倍审慎的态度。正是在这一点上列宁同斯大林之間发生了尖銳的不和，列宁坚持对格魯吉亚以及一般說来对外高加索采取一种格外灵活、謹慎而耐心的政策，而斯大林則认为，既然国家机器已經掌

**握在我們手中，我們的地位是穩固的。**斯大林在高加索的代理人是奧爾忠尼启澤，這個頭腦發熱而性情急躁的格魯吉亞的征服者認為每一件反抗的表示都是對他個人的冒犯。**[斯大林似乎忘記了不久以前]我們已經承認了格魯吉亞的獨立並且同它簽訂了條約。****[那是一九二〇年五月七日的事。但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紅軍部隊已經奉斯大林的命令侵入了格魯吉亞並且使我們面臨着既成事實。

同上，第466—467頁。

**[接着發生的事可以用簡單幾句話來說明。]**斯大林再一次辜負了列寧的信任。為了在格魯吉亞給自己建立堅實的政治支持，他背着列寧和整個中央委員會，借着奧爾忠尼启澤的帮助，同时也並非沒有得到捷爾任斯基的支持，在那裡煽動了一場不折不扣的**反對最優秀的黨員的“革命”，同時背信棄義地用中央委員會的權威把自己掩蓋起來。**由於他同格魯吉亞的同志們開會的情況达不到列寧那裡，斯大林就抓住這一點企圖用假的情報把他包圍起來。列寧覺察到有問題，就命令他的私人秘書處搜集有關格魯吉亞問題的全部情況；經過研究，他決定把問題公開提出來。很難說最使列寧感到震驚的是什麼：是斯大林個人不忠誠呢，還是他長期以來無力把握住布爾什維克黨的民族問題政策的要旨；很可能是兩者都有。

.....

**[列寧是做得對的。如果他認識到局勢的全部嚴重性，還要把它輕描淡寫那就太可惡了，因為正如托洛茨基八年以後所描繪的那樣，在他背後所發生的事實際上是]**斯大林派在高加索把列寧派擊潰了。這是黨內反動派的首次勝利。它掀開了革命的第二章**[——斯大林主義的反革命]。**

同上，第469—470頁。

## (7)和列寧的關係

攻擊斯大林早在一九二〇年，在慶祝列寧五十壽辰會上，公開“數說列寧的錯誤”；以後還會指責列寧犯有“民族自由主義的錯誤”。說在季諾維也夫支持斯大林擔任總書記之職時，列寧表示異議，認為“這位大司務除了辣菜之外再也不会做什麼別的”，列寧還指責斯大林“陰謀反對皮達可夫”。声称“列寧改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的建議完全是針對斯大林當時已經過度的官僚權力的，是針對着他的不忠順的”。列寧還會和托洛茨基協議，打算由中央委員會建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以反對斯大林負責的組織局內的官僚主義。列寧的遺囑“特別提到由於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應該免除他的總書記的職務”，並在兩個月之後同他斷絕了“私人和同志關係”。造謠列寧是被斯大林毒死的。

說斯大林用“最狂暴的話”斥責克魯普斯卡婭，列寧逝世後，斯大林還“指責她‘陰謀’反對他”，“她由於列寧觸怒斯大林而受到報復性的懲罰”，“遭到了軟禁”。

所有老的政治局委員都知道——斯大林比誰都清楚——，列寧那些說到陰謀反對忠誠、博學和天才的頓巴斯領導人的措詞尖銳的話<sup>①</sup>，指的是斯大林陰謀反對皮達可夫。

摘自《俄國局勢真相》(1927年)，  
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57頁。

象其他許多文件一樣對黨隱瞞起來的這些特別說明問題的通信，都是早於列寧那封著名的關於民族問題的信的。列寧關於斯

① 參看《列寧全集》第33卷第264頁。——編者注

大林的草案所說的話都是非常有节制的，語氣是緩和的。那时列寧仍然希望不經過大的冲突而糾正這個問題。他溫和地批評斯大林“急躁”。列寧把斯大林指責穆吉瓦尼主張“獨立”的話加上引號，顯然表明他自己是和這個指責无关的。此外，列寧特別強調，他要在同穆吉瓦尼和其他同志談話的基礎上提出他的修正案。

斯大林的回信完全相反，是以粗暴为特点的；第四点的最后一句特別值得注意：

“毫无疑问，这种‘急躁’将为鼓吹‘独立’的人火上添油，而有損列寧的民族自由主义（！）。”

这样一来，列寧就等于被指責犯有民族自由主义的錯誤。

关于民族問題的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使列寧看到，他不能用內部方式，或者說用在家庭內部影响斯大林的方法解决問題；必須把問題向代表大会、向党提出。为此，列寧写了几封关于民族問題的信。

摘自《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10月21日），載于《俄国局势真相》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6頁。

斯大林在这个問題上的行为首先向我清楚地表明，列寧的改組中央监察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的建議完全是針對着斯大林的当时已經过度的官僚主义权力，針對着他的不忠順的。所以斯大林頑固地反对列寧計劃。

同上，第170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了一会，然后說道（我在这里几乎逐字逐句引用了他的原話）：‘这就是說，我提議和蘇維埃的官僚主义斗争，而你要加上党的組織局的官僚主义。’

.....

“在我們談話結束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說，他將要提議由中央委員會建立一个和‘一般’官僚主义斗争的委員會，我們

可以通过这个委員會触及党的組織局。他答應‘進一步’考慮組織方面的問題。說到這裡我們就分手了。以後我有两个星期等着他召見，但是伊里奇的健康狀況繼續惡化，不久就臥床了。這之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他關於民族問題的信通過他的秘書送交給我。這樣，那項工作就再也沒有進行。”

**从实质上來說，列寧的計劃完全是針對斯大林的。**

同上，第 171 頁。

是的，我和列寧之間有過分歧。但是斯大林根據这些东西來歪曲我們關係的一般性質的企圖，一碰到我所提到的時期中的一些事實，就化作齷粉；在這個時期中，我已經說過，決定問題不是用不留記錄的談話和投票，而是用通信的方式；這也是列寧第一次和第二次患病之間的時期。其間的事實概括起來如下：

(一) 在民族問題上，列寧準備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對斯大林進行一次決定性的攻擊。關於這件事，是列寧的秘書以他的名義並在他的指示下告訴我的。她重複得次數最多的一句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準備一枚攻擊斯大林的炸彈。”

(二) 列寧在論工農檢查院的文章里說：

“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現在沒有絲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農檢查院這個機關搞得更壞的機關了，在目前情況下，對這個人民委員部沒什麼要求可提。……一個人民委員部，如果工作馬馬虎虎，得不到任何人信任，並且說話毫無威信，那又何必組織它呢？……

“我要問一問工農檢查院現在的領導人或任何與之有關的人，他能不能真心地告訴我，象工農檢查院這樣的人民委員部實際上有什么用處呢？”<sup>①</sup>

**在革命後的最初幾年間，斯大林始終是工農檢查院的首腦。**

<sup>①</sup> 參看《列寧全集》第 33 卷第 444、445 頁。——編者注

**列寧在這裡的打擊完全是針對他的。**

(三) 同一篇文章說：

“(官僚主義不僅在蘇維埃機關里有，而且在黨的機關里也有)。”<sup>①</sup>

這些話本身已經够清楚了，如果把它們同我在上面引述的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間的最後談話聯繫起來，意思就特別尖銳；在那次談話里，他說到我們組織一個集團來反對作為官僚主義發源地的組織局。括號中的列寧式的朴實語言完全是針對斯大林的。

(四) 關於遺囑不需要多說。其中充滿對斯大林，他的粗暴和不忠順的喪失信任。其中說到斯大林可能濫用權力以及因此引起的黨的分裂的危險。從遺囑的所有性格描述中引出的唯一組織結論是：“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位置調開。”

(五) 最後，列寧在世時所寫的——或者不如說所口授的——最後一封信，是給斯大林的斷絕和他之間一切同志關係的信。加米涅夫同志在這封信寫成的同一天夜里（一九二三年三月五六日）告訴了我這件事。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加米涅夫同志述說過這封信。瑪·伊·烏里揚諾娃<sup>②</sup>的證詞的速記記錄証實了這封信的存在。

季諾維也夫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全會上歷數列寧給斯大林的“警告”時說：

“第三個警告是這樣的：一九二三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給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中，斷絕了和他之間的一切同志關係。”<sup>③</sup>

---

① 參看《列寧全集》第33卷第449頁。——編者注

② “有關這個事件的文件是存在的。”——引自瑪·伊·烏里揚諾娃在聯席全會主席團上的聲明。——托洛茨基注

③ 速記記錄，第1號第32頁。——托洛茨基注

瑪·烏里揚諾娃試圖把事情說成是，列寧在逝世前給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中聲明斷絕一切同志關係這件事，是由個人的原因而不是政治的原因引起的。<sup>①</sup> 難道有必要指出，列寧的個人動機永遠產生於政治的、革命的、黨的原因嗎？“粗暴”和“不忠順”也是個人品質。但是列寧却在上面警告黨，不是為了“個人的”原因，而是為了黨的原因。列寧斷絕和斯大林間的一切同志關係的信有著完全相同的性質。那封信是在關於民族問題的信以後和在遺囑以後寫的。要減低列寧最後這封信的道義分量的圖謀，一直在煞費心機地進行著。可是黨有權利知道這封信！

这就是事實真相。这就是斯大林怎样地在欺騙党。

同上，第 171—173 頁。

列寧時期的政治局委員，現在已經只剩下斯大林一個人。當時的兩個政治局委員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流亡時期都曾經同列寧共事多年，現在却以莫須有的罪名服着十年徒刑。另外還有三個政治局委員，即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已經完全離開領導地位，但是由於採取了屈服的態度，目前擔任着次要的職務。最後，還有本書的作者，目前在流亡中。列寧的寡妻克魯普斯卡婭，由於不能全力使自己完全適應“熱月”，也遭到了軟禁。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 年)，  
三聯書店 1963 年版第 70—71 頁。

〔早在一九二〇年春天〕慶祝列寧的五十壽辰的儀式上，斯大林就發表了一通演說，數說列寧的錯誤。很難說他這樣做的動機是什么。不管怎麼說，這篇演說叫人听起来那样不入耳，以至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真理報》和《消息報》〔在報道這次慶祝會的消息中〕只提了一句，“斯大林同志談到了他們在革命以前一道工作

① 速記記錄，第 4 号第 104 頁。——托洛茨基注

期間的几件事”，再沒有別的了。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下冊第457頁。

〔列寧希望誰來繼承他呢？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他的病第二次發作使他躺下來之前，他並沒有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他滿心期望可以恢復健康，重新擔負起領導的責任來。他在幾天以後寫的遺囑中，顯然是試圖就各個繼任人選提出坦率的意見，而不是作出硬性的決定。正由於他的壓倒一切的威望使他握有大權，他不願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他提出贊成和反對的方面，推薦人選，特別是提到由於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應該免除他的總書記的職務，但是除了提出關於他的繼任人怎樣才能合作得最好的忠告，以及關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間的嚴重爭執會給黨和布爾什維克的事業帶來災難的警告之外，再也沒有說什麼別的。然而，不到兩個月之後，他就發現不得不採取決然一無反顧的步驟，正式同他的助手之一的斯大林斷絕了同志關係——這意味著斷絕一切政治上的和私人的聯繫。這個“革出教門”的行動發生在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的籌備期間，列寧在他的病第三次嚴重复发之下臥床不起，沒有能參加這次代表大會。這是第一個沒有列寧參加的代表大會，也是第一個充滿著由總書記親手挑選的代表的大會。它標誌著列寧主義政權末日的開始，標誌著斯大林主義這個新的政治方向的降臨。〕

同上，第464頁。

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期間，季諾維也夫和他的最親近的盟友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底支持斯大林擔任總書記之職，以期利用後者對我的敵視來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這時候，列寧對這個人選表示了異議，〔他在同他的密友們作的一次非正式的討論中〕這樣

說道，“这位大司务除了辣菜之外再不会做什么别的。”

同上，第 464—465 頁。

我开始不断地問自己：在列宁患病的时候，斯大林实际上起的是什么作用？这个門徒有沒有做什么事来加速他主人的死亡？

我比任何別的人更了解这种怀疑是使人吃惊的，但是从情况、事实和斯大林的性格来看，不能不有这种怀疑。在一九二二年，聰穎的列寧警告說：“这个大司务除了辣菜之外再不会做什么别的”。这些菜证明不仅是辣的，而且是下了毒的，这不仅是比喻的說法，而且实际上真是这样。

同上，第 485 頁。

医生关于列宁健康的報告越加不利，總書記的行为就越加大胆。在这些日子里，斯大林悶悶不乐，紧紧地咬着他的烟斗，他的猜忌的眼中露出阴险的光芒，回答別人时总是咆哮。他的命运是在危險中。他下定决心克服一切障碍。这就是他同列寧最后决裂的时候。

前苏联外交家季米特里耶夫斯基——他同斯大林非常友好——讲起过这个在總書記的隨從們中間传播的戏剧性的插曲：

“由于克魯普斯卡婬經常打扰他，他就非常討厭她。有一次，克魯普斯卡婬又打電話到乡下来找他要一些情况，斯大林……用最狂暴的話斥責她。克魯普斯卡婬滿面流泪，立即向列寧訴說。列寧的神經已經由于看到种种阴谋而紧张得快要破裂，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克魯普斯卡婬赶忙把列寧的信交給斯大林。……‘但是，你是了解弗拉基米尔·依里奇的，’克魯普斯卡婬胜利地对加米涅夫說，‘如果他不认为有必要在政治上打垮斯大林，他是決不会下决心断絕私人关系的。’”

克魯普斯卡婬的确說过这些話，但决非是“胜利地”說这些話；相反地，这个非常真誠和敏感的妇人对这件事非常不安和担心。說她向列寧“訴說”是不确的，相反地，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起

了緩沖的作用。但是，在回答列寧不斷的詢問時，她向他講的東西，不可能比書記告訴她的东西更多，而斯大林隱瞞了最重要的事情。三月六日向一個可靠的速記員口授的這封絕交信，或者毋寧說是寥寥數行的便條，冷冷地宣布斷絕“同斯大林的一切私人和同志關係”。這個便條是列寧留下来的最後一個文件，同時也是他同斯大林的關係的最後總結。接着，列寧最重要的一次中風發作了，失去了說話的能力。

一年後，當列寧已經塗上防腐劑躺在他的陵墓中的時候，造成這次決裂的責任儘管從季米特里耶夫斯基所講的情況看來很明顯，竟然公開推到克魯普斯卡婭的身上。斯大林指責她“陰謀”反對他。臭名昭彰的雅羅斯拉夫斯基（他常常替斯大林辦一些曖昧的差使）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說：“他們墮落到如此地步，竟敢向病中的列寧訴說他們受到斯大林傷害。多么可耻——用私人問題使關於這樣重大的問題的政策複雜化！”這裡，所謂“他們”指的是克魯普斯卡婭。她由於列寧觸怒斯大林而受到報復性的懲罰。至於克魯普斯卡婭，她告訴我說，列寧在他生命的最後時期，對斯大林極不信任。“沃洛佳說：‘他’（克魯普斯卡婭沒有提他的名字，但是她的頭朝着斯大林的房間擺了一擺）‘沒有最起碼的正直，沒有最微小的人的正直……。’”

同上，第487—488頁。

我大致這樣地設想事情的過程。列寧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底要毒藥。在三月初，他再次癱瘓。當時的醫療預斷是謹慎地不利的。斯大林感到自己更加有把握了，他開始象列寧已經死了一樣地行事。但是病人作弄了他。他的強有力的体质，在他的不屈不撓的意志的支持下，再次表現出自己的力量。快到冬天的時候，列寧開始慢慢地好轉，可以比較隨意地轉動；聽別人讀或自己閱讀；他的說話能力開始恢復。醫生的診斷越來越有希望。列寧的恢復，當

然不能阻止官僚反动势力替代革命。克魯普斯卡婭有正确的理由在一九二六年說：“如果沃洛佳还活着，他現在是在监牢里。”

对斯大林本人來說，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過程的問題，而是他自己命运的問題：他要末立即就在这一天設法成为党机器的头脑，从而成为党和国家的头脑，要末就要給貶黜到第三流的角色，直到他生命的結束。斯大林不顾一切地追求权力，全部权力。他已經牢牢地抓住了权力。他离目标已經很近了，但是从列宁那里来的危险离他更近。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一定下了决心：必須立即行动。他到处有自己的同謀，他們的命运同他自己的命运是完全連系在一起的。他旁边有药剂师雅戈达。斯大林是把毒药送給列寧、同时暗示医生认为他已沒有希望康复呢，还是采取更直接的手段，那我不知道。但是我坚信，斯大林在自己的命运悬在一根線上时，不能消极地等待，他只要稍微动一动，事情就定局了。

.....

.....斯大林在他的危险行动中受更具体的考慮的指导。他可能担心，我要把列寧的死同前一年关于毒药的談話連系起来，要問医生有沒有用过毒药，并要求进行特別的尸体检验。因此，从一切方面來說，在把遺体上防腐剂，內臟火化，而不再可能由于这种怀疑而进行驗尸之前，使我留在外边，那是比較安全的。<sup>①</sup>

同上，第495—497頁。

### (8)全盤集体化使用粗暴、冒险的方法， 使苏联充满了毁灭的气息

污蔑反富农的斗争是“踩在劳动者背上”进行的，具有“极其令人震惊的血腥性质”，集体化的方法是“盲目、粗暴和冒险性的”，在全盤集体化的年代里苏联“充滿了

<sup>①</sup> 托洛茨基当时正在南方疗养，沒有回莫斯科参加列寧的葬礼。——編者注

毁灭的气息”和“国内战争的气氛”。

造成这些牺牲的责任，并不在于集体化，而在于集体化时所使用的那一套盲目的、粗暴的和冒险性的方法。官僚机构一点预见性也没有。甚至企图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同农庄的福利结合起来的集体农庄章程，到悲惨的农村遭到这样无情的破坏以后才公布出来。

.....

.....在全盘集体化的年代里，十月革命的领土上从来没有这样直接充满了毁灭的气息。不满、不信任、苦难逐步腐蚀着全国。通货的混乱，稳定的“传统的”自由市场价格的高涨，国家和农民之间从贸易关系过渡到粮食、肉类和牛奶征税，同大规模掠夺集体农庄财产以及大规模隐蔽这种掠夺行为进行的殊死斗争，为了反对富农的破坏行为（在“消灭”富农阶级以后）党所进行的纯粹军事性的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恢复粮食卡片和饥饿口粮，最后还有恢复护照制度——所有这些措施使整个国家重新充满了那种表面上早已结束的国内战争气氛。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7页。

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应该从根本上排除没收小农的土地和强迫实行集体化的可能性。只要小农认为可能或者有必要，就仍然让他们作那一小块土地的主人。为了恢复社会主义纲领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必须无情地揭发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方法，这种方法不是根据农民或者工人的利益，而是根据官僚的利益决定的。

摘自《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938年9月3日)纽约1946年版第26—27页。

在苏维埃民主的条件下，即劳动者自己统治的条件下，反对富农的斗争本来不应采取那样震动的、惊扰的和野蛮的方式，本来可

以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导致群众的經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反对富农的斗争，是踩在劳动者背上进行的一对一的决斗。因为角斗的双方没有一方相信群众，因为它們都怕群众，所以斗争有着极其令人震惊的血腥性质。由于无产阶级的支持，斗争才以官僚的胜利而告終。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下冊第529頁。

### (9)暗害和处死了大批领导人

造謠說，斯大林用阴谋暗害伏龙芝，暗杀基洛夫，毒死高尔基。指責斯大林处死图哈切夫斯基，“消灭了陸軍、海軍和空軍的全部高級指揮人員”。

在真正估計形勢的時候，經常對政權的代表人採取的恐怖行為具有很大的意義。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一件事就是暗殺基洛夫案件。基洛夫是列寧格勒的聰明而比較隨便的獨裁者，是他那一伙人的典型代表。就恐怖行為本身來說，它推翻波拿巴主義寡頭政治的可能性最小。雖然各個官僚都害怕手槍，但是整個官僚階層却能利用一件恐怖行為來為自己的暴行辯護，而且能夠順便把它自己的政敵牽連在暗殺案件中（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案件就是这样）。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年)，  
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210頁。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一連串改變信仰的言論以幾何級數增加着，一九三六年八月他們却因此成了阶下囚，罪名是暗杀基洛夫，其實他們同這個罪名的联系當然沒有斯大林本人同這個罪名的联系來得密切。

摘譯自《〈斯大林偽造學派〉美國版序》(1937年  
3月3日)，紐約1937年版第XXXIII頁。

被告席上，坐在雅戈达旁边的是四名克里姆林宮的医生，被控謀杀高尔基和两名苏联內閣部长。……在审訊中，并不是一切都是扯謊。的确有被毒害的人，也有下毒的人。并不是所有下毒的人都在被告席內。下毒的主犯那时正在用電話指揮审訊。

高尔基既不是一个阴谋家，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軟心腸的老人，是那些被損害的人的保卫者，是一个重感情的抗議者。在十月革命初期，他起的就是这种作用。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計劃饥荒时期，不滿和鎮压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朝臣們抗議了。就连斯大林的妻子阿利路也娃也抗議了。在这种气氛中，高尔基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同欧洲的作家通信，外国人訪問他，被損害的人向他訴苦，他决定輿論。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不可能默然忍受当时正在准备的消灭他深交多年的那些老布尔什維克的做法。高尔基公开抗議这些誣栽案，就会立即在全世界眼前摧毁斯大林主义的魔力。

要让他保持沉默是决办不到的。逮捕他，流放他，則更加办不到，更別說枪毙他了。通过雅戈达“不流血地”加速消灭病中的高尔基，这种想法在这个克里姆林头子看来，一定是在当时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斯大林天生这样一付脑筋，只要想到馬上就作出决定。雅戈达接受这个任务后，就叫他“自己的”医生去执行。他根本不冒什么风险。据列文医生自己說，“拒絕，就会毀掉我自己和我的一家。”而且，“你是怎样也逃不过雅戈达的手掌的。雅戈达是一个什么东西也阻擋不了他的人。即使你躲到地下，他也会抓住你。”

但是这些权威的、受人尊敬的克里姆林宮医生为什么不由他們很熟悉的、作为他們的病人的政府及要人們控訴呢？仅仅在列文医生的病人名单上，就有二十四个高級官員，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員和人民委員會議成員在內。答案是，列文医生，象克里姆林宮內和周围的人一样，十分清楚雅戈达是誰的代理人。列文医生屈服

于雅戈达，是因为他沒有力量反对斯大林。

摘自《斯大林評傳》(1940年)，三聯書店  
1963年版下冊第493—494頁。

在他任职的几个月中，伏龙芝在保卫紅軍不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督問題上，表現出来过多的独立性；这就是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十二年后喪命的那种罪过。……党内流传的謠言說，伏龙芝的死是因为斯大林的需要。

根据現有材料，事情的經過是这样的：伏龙芝患了胃潰瘍；他的私人医生认为，他的心臟受不了哥罗芳麻醉剂；伏龙芝于是坚决反对动手术。斯大林派了中央委員会的一个医生——他的心腹特务——召集了一个挑选出来的医生小組，这个小組建議动手术；政治局批准了这一决定；伏龙芝不得不服从，就是說，不得不接受死于麻醉的結局。

同上，第542頁。

清洗是一种严重病症的表現。消除症候很难說就是治好病症。我們有沙皇政府专制政权的先例。这个政府在戰爭时期以叛国罪逮捕了国防大臣苏霍米尔諾夫。協約國的外交官对薩宗諾夫說，“你們的政府是个强大的政府，竟敢在戰爭时期逮捕它自己的国防大臣。”事实上，那个强大的政府当时正处在崩潰的邊緣。苏联政府不但逮捕了和处死了它的現任国防部长图哈切夫斯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它消灭了陸軍、海軍和空軍的全部高級指揮人員。斯大林宣传机器在圓通的駐莫斯科外国記者的帮助下，有計劃地就苏联的实际情况欺騙了世界輿論。所謂固若磐石的斯大林政府是一个神話。

同上，第545頁。